

1 9 8 9 接力-下部：改弦更张--"平暴"后的报告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谨献给 1 9 8 9 年中国民主运动和人权中国
"2 0 0 1 接力"联：广场生

六四必须死，中国必须生

目录：

一、 两次屈辱源于同一历史隧道

- 1、 家国、党国、核心国：王朝循环
- 2、 改朝换代：祸国殃民轮回
- 3、 落后挨打：什么落后，谁挨打
- 4、 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两不成
- 5、 人权是第一生产力，和平民主救中国

二、 战争民主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 1、 党指挥枪
- 2、 战争民主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 3、 战争民主是双刃剑
- 4、 又从种党走向党国
- 5、 和平民主救中国

三、 一国一制，民主中国

- 1、 两岸问题的历史对比
- 2、 一国一制：决不让自由民主亡于独裁专制
- 3、 中国军人的困惑
- 4、 一个中国：两岸三地有责任
- 5、 中山陵：警钟警谁
- 6、 人权无禁区，和平演变中国

四、 总书记悲剧链之迷

- 1、 生前死后：瞿秋白两次蒙难
- 2、 中共总书记殉难链
- 3、 总理被割去舌头

- 4、除了劳模、标兵：共和国不能忘记谁
- 5、绝处能生：共产党一队、二队、三队

五、三个代表，总代表：强行代表，强行祸国殃民

- 1、中国盛产总代表
- 2、总代表：强行代表什么
- 3、保持一致是剃刀
- 4、谁以公有窃取大众，以集体窃取个人
- 5、“组织决定”决定什么
- 6、谁扼杀公民，使人民沦为群众、分子
- 7、仁治德政：总代表决无仁德
- 8、制度性腐败只能用另一种制度铲除
- 9、总代表是奴隶奴才生产线工头
- 10、谁妖魔化中国
- 11、总代表扼杀人才
- 12、总代表以家国党国核心国，阻碍人民爱国
- 13、“一盘散沙”谁造，“亡国论”亡谁

六、长城长万里，睡狮睡万年，家国党国核心国传万代

- 1、保家卫国：主权高于人权，什么高于主权
- 2、长城，两手抓：保卫人权，还是统治特权
- 3、盛唐并未筑长城
- 4、明朝：船队最大，长城最强，最无能
- 5、海洋沦为统治长城：毁了“入世”与航空母舰
- 6、中国最需要什么长城
- 7、中国少年长城观

七、从斜阳到正阳，中国传统并非独裁专制

- 1、人权文明是正阳文明
- 2、“全盘西化”是反污，人权天赋不是数典忘祖
- 3、二元中华传统：民性与官性并存
- 4、民性中华文化与文明集萃
- 5、中华民族复兴不是西化

八、新中国新国歌

- 1、民族主权属于谁
- 2、四大不行，四项更糟：新三讲好
- 3、争做人权阶级
- 4、现代化核心：制度现代化
- 5、新长城，新国歌
- 6、警惕假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创立人权中国

九、尾声

十、附录：“1989接力”倡议书

正文：

下部：改弦更张

——“平暴”后的报告

一、两次屈辱发生于同一历史隧道

1、家国、党国、核心国：王朝循环

1918年5月鲁迅《狂人日记》呼啸而出：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

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

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六四镇压就是统治特权吃人权。

而且，它不是个案，六四之前有六四，六四迄今仍然有六四。回顾20世纪初期，中国近代

史记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

“内战大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低潮。

沧海桑田，星移党转。时隔62年，1989年6月4日，共产党制造了赫人听闻的六

四镇压，蛮横屠杀学生和各界民众，重演了“四·一二”，后退代替了进步，独裁代替了民主，

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中国进入新的统治恐怖轮回。

以家国利益和封建纲常为是非，以党国利益和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四项基本原则为是非，并

与它们保持一致，同样必然忽视人的存在，以统治特权吃人权。紫禁城、总统府、中南海，

一脉相传。满清、革命党、国民党、共产党；满清王朝、中华帝国、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家国、党国、核心国，都不是人民共和国。

尽管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广泛、最激烈、最多的一百年，但仍然不是变革最深刻的。

民主革命者，人权解放者，最后嬗变成为了统治者。

直到最近，除了台湾、香港、澳门等，它不仅没有抛弃帝制帝位帝王等制度，确立自由民主

国体，反而不亦乐乎地强化中央集权，制造核心，保守帝制帝位帝王。唯一不同的，是一人

一姓一家族独裁专制统治全国全民族全民，换成了一人一党。这实际是帝位易主，换党、换

人、换核心，人民仍然处于受统治帝位。

家国、党国、核心国在老路上翻来覆去，改朝换代，中国人民始终没有自己的国家。

这是中国人民最大的苦难：煮自己的血肉，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实现的不是理想。尽管国共两党都声称自己是孙中山事业继承者，但革命成功后，他们都把人民之财产、思想、

言论、行动、信仰等自由置于绝对控制。1928年开始，国民党推出了《训政纲领六条》

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等，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取代国民大会，对国家“独负其责”，规定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必要时可以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和出版等自由权，推出“国

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领导”等原则。1931年搞出的《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大

法形式，确定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治制度。可谓“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

国之名，无民国之实”。

共产党完全有理由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取得政权的20年统治期间，逐步成了民主革命的保

守派，日益醉心于固守独裁专制统治权利，甚至蜕变为反人民、反其他一切政党，只捍卫一

人一党之私利的独裁寡头政治”。

那时，它是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的总代表。如上溯至1936年，《中共中

央告全党同志书》提出：“只有民主运动的发展，抗日救亡运动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民

众力量乃能发挥，敌人才能被战胜。”

再上溯至1941年，邓小平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提出：“党的领导责任……不是遇事

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

他进一步指出：要“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

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

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反民主与坚持民主之际，国民党“飞机加大炮”输给了共产党“小米加步枪”。

可是，但是1949年以后，国民党党国“亡党亡国”的独裁专制遗毒传播了，中国继续以

共产党党国续写帝制帝位帝王史。刘少奇不得不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指出：“现在党的

代表大会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代替人民委员会，党委代替一切，在党内也代替了

党的代表大会，这是个大错误。”

虽然邓小平时代开创了改革开放，但扳倒“四大，两个凡是”，却又祭起了“四项基本原则，

两手抓”宪法。这是新的四个凡是，是政治恐怖，宪法恐怖，是“器变道不变，四项基本原

则不能丢”，是新时期的“阶级斗争”，是新的“独尊儒术，政治挂帅”一类的统治工具。

而江泽民时代的所谓反腐败、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三讲、三个代表、揭批法轮功等，更是

维护、稳定其六四镇压既得利益的一个伎俩。他的反腐败，更象是铲除异己。他谁也不能代

表，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社会主义，更不能代表中国与中国人民，他只能代表秦

制以来的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及其帝王后裔。他的“三讲”讲政治，不是讲人民应该享有的政

治权利，而是相反，是泛政治化，是一切政治为其帝位地位服务，是剥夺一切人的一切政治

权利而集中于他一个核心。忠于帝制帝位帝王是其最大政治。一切帝王、核心等独夫民贼，

都是天下大贼人，他哪里有什么以德治国呢？

他的德治，不可能解决权力原罪之缺德。一是统治者地位历来都是以六四镇压等对人民缺大

德而获得或巩固的，二是失去独立、对等监督、制横的权力必然腐败、犯罪、缺德。他坚持

四项，他的三讲、三个代表、揭批法轮功，只是为了确保他一个核心，高于领导集体，高于

党代会、人代会、政协，高于全国各族人民。他很好地继承了官性中华传统，他决不可能

复兴民性中华传统文化与文明。

独夫民贼，必然欺民缺德。他的法治顺序为：（1）颠覆政权，（2）邪教、会道门，（3）黑

帮、流氓犯罪，（4）拐卖妇女。至于政权内损公肥私、以权谋私、大官欺小官、以官欺民等

之腐败、丑恶现象，是不在他议事日程的。除非腐败危及到了稳定，除非需要用反腐败打击

政敌。

这与韩非子中央集权统治之法治“治民无常，唯以法治”如出一辙，实际是“刑治”延续至

今的现代版本。目的与春秋战国之法家如出一辙：加强君主个人权力，刑法人民，刑罚天下。

而且，他们打击人民“以德抗位”，以各种冷战、热战之统治暴力镇压的和平请愿、上书、不

满、批评与正义要求等，企图迫使人民象害怕其专制权力一样害怕法律。可见，他的法治，是治民的，而不是民治的。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他等六四既得利益当局“独有、独治、独享”。况且，法制法治，什么党法国法可以治他等各地各级各单位的大小党政一把手？独有（独占、垄断）必然侵犯他人，独治必然渎职，独享必然民无享。只要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其他人必然受其任意支配。帝制帝位，必然克隆帝王。官本位统治制度，必然克隆统治者。帝王为了独尊天下，不仅打击异己、异党，也必然打击同事、同党，他更会压制国民。

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后，人民分明还是看到了袁世凯称帝、国民党即刮民党、共产党即私产党等大搞帝制帝位帝王之国的魑魅魍魉。

一党制、终身制、家长制，就是帝制，绝对不是什么公有制、集体制，而真正是剥夺人民的私有制。可怜的党组织、国家机器、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与帝制帝位一样，成为了帝王与核心们，大小一把手们荣登九五尊位的脚手架。

但是，民主革命，是建立民主中国。中国不是主权在王、在党、在核心，不是外国侵略者殖民统治的中国，也不是国内统治者们治民统治的中国，是你我他一切中国人的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自己主权的中国。胡锦涛1999年指出：“民主，首先是推翻专制独裁的旧制度”，但如果推翻旧的独裁专制制度而不建立民主制度，并且帝制不变，帝位尚存，只是换党、换人、换核心，那“推翻”岂不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

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而统治当局固守独裁专制统治的演绎史。它几乎总以人民失败、国家衰败做结尾。中国从来没有因为有众多长城保守独裁专制制度而获得利益、强大。

而反观中国史，迄今仍旧是一部新老统治者粉墨登场的王朝与核心循环史，受伤的总是人民人权。

史前时代，恐龙因体积最大、力量最大而最重要。今天，中国并不因人民大众人数众多、民

声最高、民意最强、民心所向而重要，仍然是统治者因握有强权（诓骗人民军队而“党指挥枪”）而最重要。

如今中国，四项三讲还在走，自由民主无法走。党政官本位特权至高无上，人民人权低眉折腰事权贵。

2、改朝换代：祸国殃民轮回

（1）帝制帝位，阴气逼人。一人一姓国、一人一党国，家国、党国，皇帝国、核心国，

不仅都是改朝换代、王朝循环，还是统治恐怖轮回，即祸国殃民轮回。

统治，当然包括中央集权统治，是给予压制、压力，就是恐怖，制造恐怖、推行恐怖。统治

是一手握皮鞭、一手甜糖，统治是放牧，是主子操纵牲口，是奴隶主操纵奴隶，是少数人操纵多数人。

统治，就是从教育、教化（教育转化）、引导、领导、愚弄、精神控制、人身控制、禁锢到高压、暴政、镇压等，由轻渐重、逐步升级的压力、恐怖。而且，统治，就是统治者对人民大众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从来不曾停止，只不过开明时期是冷战，有伪善、伪装，以“教育教化、正面引导，治安处罚、劳改”等为主，残暴时期则是热战，凶相毕露，以“叛刑，抄斩，屠杀，武装镇压”等为主。这是由冷战必然上升到热战的恐怖轮回。

它虽有开明统治和残暴统治之分，但总会制造社会恐怖，六四镇压是典型的最残暴形式的统治恐怖。而且，开明专制不会自动过渡到民主制度。一是权力原罪，二是制度所逼，三是善恶人生的恶的一面，即所谓人的劣根性，决定了统治者本质上倾向于保守特权。这正如是民主制度使美国总统及其政府民主，而不是相反，不是他们使美国民主。

遭受统治的社会是压力社会，秦制以来，虽然历经改朝换代，但无论精神上，还是实际生活、工作上，乃至接受教育（部分是意识形态教化），中国人民实际上一一直处于统治恐怖之中。它

由轻而重，轮回反复。而且每一轮回，都重复着同样的渐变手段。文的如焚书坑儒之后有诗狱、史狱、文字狱、反右、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镇压、三讲等。武的如韩信、岳飞之后有彭德怀、贺龙，“敌国亡，良将死”，等等。不改弦更张，弃旧立新，六

四之后还会有七四。偶尔出现了盛世开明统治，也从未逃脱恐怖的性质，而且恐怖统治必定

强化官本位至上及其黑箱操作与腐败。

人们只道六四镇压前有军事戒严。实际上，统治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任何事、任何

人均保持了戒严。统治，离不开特务，它包括精神特务与肉体暴力特务。而一定程度上，统

治便是由特务统治（冷战）和武装（热战）统治组成。他们的高压统治使全社会遍布了高压

线，组成高压恐怖网。

善良的人们说：六四镇压，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其实，只要帝制帝位帝王之独裁专

制统治存在，六四之前有六四，六四之后也有六四，还会有七四、八四、九四。它是最可能

随时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明的、暗的，软的、硬的，精神的、肉体的，冷战、热战，两手

抓，统治者针对人民的六四恐怖从未间断。想想看，具体到一个人，宏观至一个省市、国家、

民族，乃至世界，无论你干什么，背后总有一个人、一种势力张开两手，阴险或猛烈地做出

狂爪状，随时准备抓你，多么狰狞、恐怖，令人不寒而栗。这两手抓实乃雷同于奴隶主的鞭

子。

人们的一个幻想是，祖国充满爱，社会主义大家庭充满温暖。也许有人不承认“恐怖”，甚至

认为言过其实。的确，祖国是爱人民的，但是“家国、党国、核心国”非民国、非祖国，其

治民之统治性质，而非民治之人民性质，决定了统治当局必然是反人民、反社会、反民族、

反国家、反人性人类的。白桦《苦恋》说：“祖国啊，我爱你，但是你爱我吗？”正确的答案

是：人民爱祖国，祖国爱人民；但家国、党国、核心国不完全是祖国，其私天下不是公天下。

它们不仅不爱人民，还离间了人民与祖国，更反人民。而且，这些私天下制造恐怖，迫使人

民只有爱它们，才能爱祖国，否则便只能听之任之、消沉、退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

过日子不问国事、出走、移民。它们阻碍人民爱国，因而也是反祖国的。

统治，就是针对人民的冷战与热战。随便想一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三讲，加强

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行宣传”等不正是“焚书坑儒，独尊儒术，文字狱，剿共，教

化，皇民教育、奴化教育”等的变体、翻版、接辈，乃至克隆吗？它们就是精神与文化恐怖，

是戒言戒脑。那些官本位之办事难，刁难人，乱收费，腐败，以“军队、武警、公检法”等

国家机器等坚持“一党制、核心制、终身制，三个代表、总代表、强行代表”，不正是行动恐

怖、财产恐怖、人身恐怖、信仰恐怖、宗教恐怖、政治恐怖和剥夺公民权利吗？官就是管，管就是引导、教育、控制、强制、管理、统治、禁锢、镇压（当然，如果顺应民

心则不是强制，这太少见）。有几个中国人不怕官，有哪个小官不怕大官，多少人能如《水

浒传》英雄们那般潇洒，不怕官的人几个有好下场？无官者怕官，官小者怕官，官大一级压

死人。中国人从小到大，受多少官管过，多少人见官腿哆嗦，哪朝哪代不是官府高高在上，

不是当官的为所欲为、黑箱操作、败坏社会风气，不是民众伺候当官的。

瞧那称呼，父母官、官老爷，臣民、子民、小民、百姓、平头百姓。不是官人可怕，而是他

手上不受制横、监督的权力太可怕，不依法行使权力太可怕。今天不当官，明天就没有人怕

他了，不必点头哈腰、送礼、请吃饭了。

不是官位本身恐怖，而是它们后面的组织力量太恐怖，而组织往往沦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邓小平认为常常有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如它为个人谋取的最大私利便是制造金字塔社会

结构、制造帝制、推出帝位、孵化皇帝与核心。皇帝、核心、过去能干预朝政的近臣宦官、

现在的政治局等金字塔顶端往往是社会恐怖的中心、中心发动机，他们通过金字塔组织系统

指导、强制、恐怖性地推行自己的统治意志、收获统治权益，而制造诸多恐怖也仅仅只是为

了金字塔顶端存在、不换人，或者换自己指定的人。

这往往与精神骚扰、刑事犯罪、武装暴力、有组织犯罪等恐怖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有组织

地对人民犯罪，它们唯一最大差别乃为其中一个是“官的，依法治国的，法治的，合法的”，

是批着人皮的狼，是政权性恐怖，是国家性恐怖，即它们是恐怖政权、恐怖国家、恐怖社会、

恐怖文明。

这些统治恐怖来自统治势力，包括皇权、族权、夫权、神权、意识形态权、党权、核心权、

强权、强行代表权，及其政权。它们主要是帝制帝位之皇权一把手官本位势力、几大班子，

它包括皇亲国戚、功臣、亲信、宦官、同姓同宗同族同党、贵族权贵党贵，并顺延至枪杆子、

情治系统、公检法系统、笔杆子系统等国家机器，当然还包括有价值进入“统一战线”的外围势力。现在具体讲便是党政系统，尤其是党组织系统，它是邓小平批评的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所以中国民主的一个大任务是使宪法规定不允许任何法西斯组织、政党存在，不许邪教组织存在，它们首先是奴役了其成员、党员、教徒，然后才是奴役全社会、全体人民。很多人不愿意入这样的党、入这样的会，正是为了保存一份自由、清静与独立，去掉一些肮脏与罪恶。

但是这类人往往更难存活于独裁专制社会，只得沦为社会边缘人，归隐山林、寺庙、流亡海外，如社会各界有作为人士、将军、正直官员、臭老九等。此即所谓清高、与世无争、独立性、怪、另类等。为什么与世无争？因为他们要争的不是升官发财、实惠，而是自由、民主与人权。统治恐怖使他们争不成，干脆不争，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统治政权容不下他们，而不是他们不愿意融入社会。如要改造社会，便是反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王朝兴衰，表面上是战乱、自然灾害、外敌入侵、腐败等所至，而本质上是独裁专制统治的恐怖性所至，是由轻渐重、由开明渐残暴的两手抓恐怖性所至，是统治恐怖轮回所至。正如历史由年的轮回组成，年由四季轮替完成，我们可以将这一轮回分为5个阶段。

（2）王朝（包括帝位换人）更迭完成后，第一阶段是冬之末、春之初，是战乱、内乱等后的“天下初定”，需要呵护。它是中央集权分崩离析后的重归一统的“天下初定”，统治者基业初创而不稳，社会财力、物力、人力、军力、笔杆子、思想基础、拥护程度、威信、崇拜等相对匮乏，中央集权比较薄弱。如连年战乱，祸国殃民至极，人民财富、社会繁荣与国力积累毁损殆尽，“自天子不能具浚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汉初时期）”，民不聊生。

收拾乱摊子，前朝因失德、暴政而亡，严法、苛政与酷刑行不通了。统治者认为首要任务是“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他们需要笼络人心，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他要巴结王公贵族、功臣战将、富商侠客，更要赢得人民称赞，“这皇帝不错，是个明君，我们没看错”，以后有

好日子过。

而且其时历经战乱，天下饥迫，民心思定，人民忙于生存，“给点吃的就行”。社会大众普遍

渴望休养生息，稳定发展。当局无需推行高压恐怖，统治者只需演奏春天的故事，让人民吃

饱饭即受推戴。

同时，统治者记忆尚可，招致前朝沦亡的暴政近在眼前，如秦末暴政、隋末暴政、国民党暴

政等，继法家、兵家等之后，“仁政德治，为人民服务”之儒学等重新受到重视，社会环境逐

渐宽松了，表现出“阶级调和，矛盾趋缓，社会和解，朝野同心”特征。

开明专制，春来发几枝。他开始推行休养生息、富天下政策，并找个火车头带动致富，允许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许诺“多少年不变”。如汉初文帝时，鼓励发展农工商贸，甚至曾经

“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盐铁论·错币》）”。许多富民政策延续多年，扶植了一批富商

大贾。

只是到了天下富足的汉武帝时期，才改变政策，打击私人工商业，垄断重要商品的生产与销

售，并搞起了盐铁官营专营等，大力发展官营工商业等所谓国有企业、集体集体、国有经济、

集体经济。还以“算缗令、告缗法”等剥夺了大批富商。诸般名义恐怕类似于“收归朝廷，

收归国有，实现公有制，保证大多数人利益，均贫富，实现共同致富”等。从文帝到武帝，

不知汉朝当局是否也曾经立下了一个类似“100年不变”的基本国策。可是，富民政策不

变，则意味着天下变。为了保证家天下不改姓，党天下不换党，核心国代代传，“100年不

变“是不可能的，统治者是一定要变的。不是汉武帝要变，而是家天下需要变。不是汉武帝，

换个汉A帝，或者汉B帝，同样要变。是时候到了，轮回期到了，该变了。

不仅是富商，就是同姓诸侯王、党内外高级干部、贵族等高干及其子弟也无一幸免。缺乏《大

宪章》等民主与法治保护，他们的政治地位连同经济利益等都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很容易灰

飞烟灭于“帝王至尊，核心至尊”之“七国之乱，削藩（当时出国避乱，没有现在方便）”一

类的“政治改革”。

独裁专制下，不论贵族与贫民、富民，均不能对“100年不变”抱有好的期待。变了，

平均了，贵族、富人得不着好，穷人也没有得着好，甚至干部官本位等也得不着多少好处。

只有帝王至尊最实惠：天下归一统，保持一致。值得指出的是，不是中国人民喜欢保护落后

的绝对平均主义，而是统治者惯常以平均主义剥夺人民，巩固其家天下、党天下、核心天下。

无论如何，这个时期的两手抓，以春风拂面为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减免田租，政治宽

松，社会愉悦。一手抓政权建设，一手抓经济基础等社会发展，而且更重于“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因为这不仅是满足人民生存的需要，更是修各种长城、加强内外防务、巩固政权根基

的需要。

虽然其统治恐怖以“天下初定，内紧外松，谨防内外敌对势力”为主，但仍有“一手硬，一

手软”嫌疑。

第二阶段是春夏，好政策、好时令使万物生长，国富民安，上上下下一片兴旺、满足，天下

太平，乃至出现太平盛世。但春天时万物可以这样成长，也可以那样成长，而且可以这样收

获，也可以那样收获，可以这样使用收获，也可以那样使用收获。因为毕竟还没有秋收、收

获，那些满足更多的是尚处于希望中的满足，人们的想法、社会的思潮开始活跃起来，多样

化起来。其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逐渐富裕、发达，逐渐充分发育、丰满，社会

各界均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产生了富而思进，各自自由思进的乐观情绪。

理想，对未来的期望，社会各界各各不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差别来自于统治者与人民大

众。他们一直不跑在一股道上，经济越发展，社会越繁荣，他们的理想差异越大，矛盾越来

越越集中，不可调和。其中，统治者休养生息的目的，在于“休而利治，富而利教，教而保

持一致”。

冬已去，寒气乃袭，天下人春天无春。这一时期，统治恐怖以“教育教化，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政治学习，统一思想”等精神恐怖为主。

人民，包括所有行业、贵族、地方势力等完成奔小康后，开始追求精神自由和政治、文化等

权利。尤其是不满足于受统治，缺乏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末民地位”。人们对

社会多元化、多极化等比较向往、赞赏。这些导致社会开始出现分化，而且主要是对统治者

地位及其权利的分化，对皇权为首的官本位权力体系敢于藐视、覬覦、挑战了，是所谓“得

志便猖狂”。因为生存问题解决了，民不以食为天，下一个目标便自然是政治、文化等权利。

这些社会利益主体多极化、收入来源多样化、思想信仰指导思想等的多元化，势必动摇统治

者的中央集权权威与程度、意识形态单一纯洁性与统治地位。总之，被当局称为“群众、百

姓”的人民不听话了，不争做四有新人、劳模、先进人物、顺民了。大众开始“以天下为己

任”，不接受统治者的那一套精神文明中的政治教化、糟粕与奴化教育了，社会出现了所谓右

派、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了。

但是这种盲目乐观、自由追求产生的多样化、多元化、多极化等忘记了危险，忘记了统治者

两手抓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使人民因为富裕而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个人意志与利益，不是

为了使人民可以自由言论、思想、结社、信仰、选择皇上核心领导人等，而是为了保持中央

集权、独裁专制统治权益，使人民更加服从于其独裁专制统治的终身制、一姓制、一党制。

而且与此同时，统治者也因经济建设成果而已经积累了非常强大的政权机器、统治镇压工具，

武器库强大了、先进了，修筑了各种各样的基业长城，强权、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强化。抓

经济的那一手一直硬着，抓政权建设的这一手也一直没有放松，它积蓄着、隐忍着、等待着，

保持着恐怖、威慑态势，一旦需要则马上硬，要多硬有多硬。他们“小小寰球，泱泱大国，

不怕几个蠹贼，不怕几个苍蝇碰壁，也不怕飞进来几个苍蝇、蚊子”。国库（家库，党库）充

盈，天下富足，我们早已做好了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一切准备。

第三阶段是秋季，包括秋冬之交。充满希望的秋天终于来了，秋天的最大喜悦是秋收、收获。

然而，它将引发、演变为对抗、冲突、暴力、流血、死亡。

秋收时节，人民不仅不满意于统治者的经济剥削，也非常不满于遭受的政治与文化等权利的

剥削。他们唱了“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又唱仓廩实而知礼节，社会应当有“礼”，执政者

应当“礼待，礼遇”人民。人民一方面收获物质劳动果实，另一方面要收获自由民主、多样

化、多元化、多极化、人权保障等精神进步，统治者要收获更稳固的帝制帝位、天下一统、

中央集权、一姓制、一党制、终身制等，及其特权文明保障体系。当然包括更的官权、政权

腐败。

这好比主人驾马车，人、马同跑一股道。临到终点，赶车人收获的是利润、目的达到了、进步，马收获的是一顿饱饭，是保证能够再次受主人驾驭而卖力气拉车的基本生理需求满足，是求得生存的基本人权，马是不配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人权的，这是人赶马车的基

本国情、特色决定的。如果你不满足，要参与分红，把大部分劳动成果、利润据为己有，甚至拉车时、拉车后夹杂了许多不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精神”的东西，突出个人意愿意志、个人主义的、自由化的东西。总而言之，如果你“脾气犟，个性强，不听话”，主人可就不客气了，开始“两手都要硬”了。

一是可以废了你，你能拉车、有才能，我不用你，让你调离岗位，提前退休、退役，不让你做贡献、出场拿金牌。想换个地方干，到私营、民营、外企，或者出国打球、淘金，我还不发通行证呢！窝死你。二是杀无赦，换人换班子。你能改变国情、特色吗，我做马，你赶车？

梦想！有第三条路吗，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能做主人，便必须做奴隶。要平等，市民、农民、奸商等不做末民，我等皇权官本位做末民不成？

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等主权在民是西化，平等、自由、民主、人权都不是民本主义的

东西，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玩意儿，腐朽、没落，不符合中国国情，走不通。况且那

还叫人赶马车吗，没人没马的，都平等了，怪没劲的！还是“独尊儒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否则，我们怎么走一人推动党、党推动人大政协、一府两院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党指挥枪，怎么走一人一党一把手一个领导班子推动各级政府、各地各行业各

人民团体各族人民各项事业前进的道路，怎么走党国政府推动型道路！我们怎么推动中华大

马车向前走！别忘了，我是开马车店，谁不服我派出的赶车人、我制定的交通规则，就是不

服我，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政府、反社会、反民族，就是危害国家安全、背叛国家！

“以天下为己任”，那天下是你们的？你们这些不是正当要求，而是“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卖国，非法组织，邪教”。你想毁灭我赶车人的事业，没马赶，没门！你小

老百姓懂得什么，统治就是赶马车，你这马还跟人争，你这小官还跟大官争，你这奴隶还跟

主子争，你这干活的还跟管理者争，掐死你！你不当马谁当马，我当？你闹吧，有你好看的，

软恐怖不听，我给你来硬的，“实际上，党和政府一直注视着事态发展，并随时做好了一切一系列的的正确准备、安排、部署”。我贮备着两手抓恐怖，我“严打”，我搞运动，我有思想阵地，有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保江山，我戒严、平暴！军队在我们手里，还有什么可怕的！

秋天满，天下急。这一时期，统治者如惊弓之鸟，全面敏感，统治恐怖以“严打”为主，天下则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为掩世人耳目，回避舆论风险，“严打”名目是单一的打击刑事与经济犯罪，整顿社会治安与经济秩序，实质内容却是双重的：搂草打兔子，反朝廷者，反党反政府反核心者，反家国情国核心国者，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犯们，哪里跑？当局以全面高压，确保稳定。这实际上是以堵截治理洪水，以杀头制止大脑思维，以堵嘴制止言论自由。而越稳定，越恐怖，火药桶越大。

人民大众，怨气四升，人心思变，渴望真诚，改天换地；统治者，稳定第一，一方面内紧外松，铁碗高抬，另一方面谎话盛行，粉饰太平，制造虚假繁荣。统治者加压，社会普遍感到压抑，只好大唱摇滚，猛进的厅，高喊“给我，给我，给我感觉”，或者沉醉于性爱、彩票发泄、足球发泄、个人爱好、子女教育等。作家们将自己的作品命名为《冰与火》、《苦恋》、《焚书》、《藏书》、《潜书》、《明夷待防录》。

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民不管那一套，继续轰轰烈烈地游行、示威、上书、演讲、静坐、绝食、盘踞、自焚，天赋平等、自由、民主、人权之天性引导他们开始公然与统治者对抗了！

所以虽然中国封建历史最长，虽然王朝、家国、党国等的政权马车店性质最长，虽然社会恐怖由轻渐重之轮回历史最长，但中国也是人民起义最多、农民（人民）战争最频繁的国家。

仅1900年以来，无论是政权之内，还是以外，中国必“动乱”一次。这些实在不是人民之错，而是统治者恐怖统治之罪！

然而无论如何，初冬来临了！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秋收之争毫无妥协余地，它带来了对抗、战争、严酷、残忍。人民与全社会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是所谓阶级斗争新动向、社会异动势力、反常现象，引起了统治者的警觉、警惕。他们总结的一条经验教训是“两手抓，两手都

要硬，这是一手硬、一手软造成的，说明过去抓得不够，不够坚决、不够彻底”。于是当局出手了，开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了。其实他以前也一直两手抓，但后一手潜伏着，

相对较软，还没露出硬来。但情况复杂了，不硬不行了，不出重拳镇压不行了。

独裁专制统

治的本质便是单一化、保持一致、中央集权制、极权制、一人制、一家制、一党制、终身制，

而人民追求的多样化、多元化、多极化便是自由化、权力分离制、议会制、多党制、司法独

立制、地方高度自治制、联邦制、选举制、任期制等。

这是统治者最不愿意看到的，最令人恼怒、愤慨的，把这视作疯狂反扑、猖狂进攻。“你们这

些穷鬼，刚吃饱肚子就不老实，富了就闹事、要自由民主、要人权，要取消“儒术、马术，

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想想，如果不是皇恩浩荡、党的政策好，哪有你们今天！不是我做明君

圣主，你们还在前朝昏君的旧社会里受罪呢！不是党，哪有新中国、新社会！哪有你们“不

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你们不感恩戴德，“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反而妄图取消党的领导，

搞自由化，想造反！真是富不得！天生的贱货、穷鬼，我说了100年不变，哪天我提前变，

打出缩小差别、人民共同致富的名义，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公有制剥夺你，让你再穷！让

你们回到万恶的旧社会，看你还怎么折腾！

所以中国统治者历来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和国情”，“中国特色的人权”就是首先满足生

存权、发展权，政治、经济、文化等联合国规定的公民权利太高级了，中国人不配。只能“民

以食为天”，象“奴隶、牲口”那样，“有吃有喝就得啦”，两耳莫闻窗外事、两眼莫看桌外事、

两腿莫管床外事、两手莫办屋外事，永远满足于以食为天，处于以食为天的状态，才最好、

最令人安心。汝等臣民、草民、党民、小民、贱民，处于生存状态就行了，那些发展权，政

治、经济和文化等权利是你们的事？做梦去吧。你们人权天赋了，搞自由投票选举、任期制、

多党轮流执政那一套，那我等的统治特权岂不是偷来的，一人制、一党制、终身制、家长制

岂不是泡汤了。西化，那是西方人的，你们也配，有那素质？

所以，中国统治者历来最恨富人、士人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独尊以皇权为首的党政官

本位，搞皇帝、党指挥枪。故而，戊戌政变、屠杀共产党、反右、阶级斗争、六四镇压等不

过是最硬的两手抓、最恐怖的统治而已。所以富了就变，搞平均主义，天下穷着点、恐怖点，是历朝历代统治政权的两个基本点，是统治者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等精神文明建设”而“抓住小康，保住稳定”、保守帝制帝位的法器。而民主也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免于贫穷，二是免于恐惧，它们与财产自由、言论自由共同挺立为民主的四大基本原则。当然，我们认为还应该加上第五原则“知情权自由”，或者表述为“免于无知”，这包括信息自由、接受教育自由等。

可见，独裁专制统治的本性、天性便是必须背离民主原则，必须打击自由化、民主，打击人权天赋，打击人权高于主权！而国际社会正是因为一些国家统治者特权高于了人权，才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新人权准则，以确保人民人权高于统治者特权及其独裁专制政权之主权！

这些就是民本主义、资本主义、人权精神等的“猖狂进攻”导致了帝制帝位帝王不安，可谓民富皇不安，渔阳鼓声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筑各类长城，两手抓之高压政策，苛政猛于虎，以及统治腐败等之升级，直接影响了社会再生产热情。穷困者、破产者，包括那些因为“公有制、官有制、党有制”而本身早已失去了生产资料者，根本没有再生产能力。一些致富者，人们看到的危险远大于光明前景。多数投资与收益已经不能成正比例增长，除非你贿赂官方，或者做不正当生意。这些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积极性，导致企业家，乃至全社会目光短浅、轻薄（逃去海外发展者，不在此列），不是抽逃资金，转移海外，埋于地窖，就是奢侈、高消费，哪怕是修豪华坟墓（越富越移民，历来东南沿海移民多，成因于此）、赌博、嫖娼、吸毒。至于依靠受贿、贪污等积聚的腐败资金，更是进一笔，埋一笔，死一笔。天网恢恢，它们洗成合法钱财的渠道少，可能性小。出于“安全”考虑，它们，包括一些公款、财政资金，不是沉淀于生产、流通领域下去，就是用于消费。

为什么吃喝风、会议风、旅游风、请客送礼风等屡禁不止？因为吃进肚里，花在风景里，玩在路途上，集体送礼是集体需要，你从何查起？它们以不增加附加值的形式，来源于腐败，

消化于腐败，助长了腐败。这些一方面刺激了流通领域的畸形发达，败坏社会风气，加剧社

会矛盾，另一方面又吸引了更多的加盟资金，帮助流通消费领域吹泡泡，继续膨胀，制造虚

假繁荣。同时，生产领域却日渐萎缩，国之基础削弱，国力下降。这是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

的痼疾。统治者往往看不到这些（或者不愿意），他们一面两手抓至上，一面也沉醉于小蜜、

歌星、好大喜功等歌舞升平，“看，我这任干得不错！”

总之，经济增长了，人民却没有分享富裕，生活更艰难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却发现国

库被掏空了，自己的钱袋也瘪了。社会进步了，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却是原地踏步，乃至退

步了。

人民天问，“悠悠苍天，曷其有常？”（《诗经·唐风·鸛羽》）

人民揭露，“昊天不佣，降其鞠凶（加言旁）。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诗经·小雅·节南山》）

人民怒指，“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尊（加口旁）沓背憎，职竞由人。”（《诗经·小雅·十月

之交》）

人民准备揭竿而起，“伐无道，诛暴秦”。或者和平非暴力大进军，静坐、示威、绝食、自

焚，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

第四阶段，秋已去，寒风烈，“末法”时期至。伪善的统治者紧张了、脆弱了，他们凶相毕露，

全面两手硬了。而且，“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人民人权和统治特权之矛盾

空前激化，即所谓“奸党纷起，邪教丛生”，阶级斗争愈演愈烈。人民越反对其统治特权，它

越走极端，越残暴。他们栽赃，指责人民是“一小撮”，挑起“动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是罪犯，是历史罪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必须代表人民镇压人民。

他们惊恐万状，高度敏感，叫嚷把“一切突发事件控制在萌芽状态，就地解决，决不许扩大

范围，波及外地，乃至全国”，“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走一个”。他们的顽固引发了对抗升

级和“魔高一丈”的暴力打击升级，是起义与战争，是武装镇压、军事恐怖和秘密警察恐怖

（统治者对人民的冷战恐怖）统治的升级，是大雪纷飞、狂风暴烈，是严冬酷寒、天下荒芜、

人心惶惶、各项事业停滞难前、社会凋零。统治恐怖进入“戒言，戒严，镇压，内紧外紧”

等全面高压阶段，也即是全面恐怖时期。

最残酷的军事镇压、最惨烈的抗争形成了最高级形式的统治恐怖之后，社会处于老王朝或朝

代分崩离析或死亡一样的休眠时期，并开始向新王朝诞生过度，迈向改朝换代，换核心。这

一阶段的特征是崩溃、灭亡前的苟延残喘，是统治恐怖及其孳生的罪恶大展演，是最后的疯

狂与残暴。统治当局失去理智，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他们决不反省、检讨自己的错误，

因为那要伤筋动骨，触及帝制帝位帝王。

他们带头讲假话，社会失去信仰、信用，人们互不信任，一盘散沙。官本位大肆腐败，丑恶

现象横生，非是公平的市场因素而是官本位特权因素导致了贫富悬殊，春江花月夜时大多数

人生存困难，民不聊生。社会失去正义，邪气上升，盖过了正气，好人一生不平安，坏人坏

事猖獗、有市场。人们普遍不满，但只管自己，也只能管自己，等等。

此乃真正的“奸邪丛生，国之将亡”。这王朝后期有时挺长，有时挺短，如秦二世才延续了两

年，戊戌政变后满清仅再存续了13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也仅在大陆执政20年左右，

我们期待六四后政权能硬撑多久？

暴政恐怖统治后，政权往往加速灭亡，为什么？不是完全是人民打击了它的元气，而是暴政

使人民确信“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昏君无道，王朝气数已尽，老天爷要换人了”，揭去了当

局的伪善和“为人民服务”面纱，暴露了当局的丑恶德行。

而且除了“人心思变”、人民普遍倾向于反叛，它还使党政官本位体系里的官员发生了分化，

使中央集权裂缝加大，加速崩溃。一部分继续维护暴政既得利益，另一部分正直有为者则看

透了这个政权，摸定了它的气数，决定辞官、下海、隐退、引退、出世，所谓“动摇了、不

跟党走”，或者在岗、不在岗都“离心离德”、积极准备、伺机而动，准备代替他、推翻他，

为民做主。还有一部分官员“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们不与当局合作，决不出仕暴政

当局（如六四后的许多国人），宁愿自我流放，打入另册，成为另类，或闲居于家，或归隐山

林，或下海经商，或出国巡游。

还有一部分人也看透了这个政权的道貌岸然，他们开始大做一项对终结这个政权有决定性作

用的工作，他们是特洛伊木马，他们是第五纵队，他们是内部攻坚者，他们是政权内的腐败

分子、腐败集团。他们一方面看透了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另一方面觉得这个政权不会长久。但他们不是制止它，做好事，而是相反，开始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捞、贪污、享受、及时行乐、腐败。与其说他们被糖衣炮弹打倒了，不如说他们直接挖了政权墙角、所谓社会主义墙角。苛政、腐败与暴政一起反弹，他们破坏力极大。现在的腐败大案，初发期多是六四镇压后的九十年代初。这就是邓小平说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党内”。可是，以军事镇压打击党外民主要求，当局能以什么遏止党内腐败，反腐败？有时候，“默认腐败，纵容腐败，甚至引诱腐败”还是统治者“笼络人心，拉住追随者，控制部下，确保天下”的好工具。反腐败可以打击政敌，纵容、奖励腐败则可以扩大势力。当然，暴政还坚定了反对者的信念与决心，使流亡者与外部势力既愤慨又看到了希望，从而加紧活动。重要的是，普天下与当局离心离德的同时，必然对新势力倍感亲切。总之，与其说六四镇压等暴政及其恐怖镇压了人民，不如说他从政权内外失去人心，从各个方面把人民、社会各阶层人民推向更远，置于对立面，制造了更多的反叛者，使人心思变、一心思变，使全天下为终结它、迎接新生活而共同做准备，最后是天下联合、全民和解，剑指当局。这便是气数已尽！说明白了，“改朝换代问题还是出在王朝以内，政权问题还是出在政权以内，出于其恐怖统治”。另外，每当内外交困时，统治者思路清晰：外贼要钱财、土地、利益，家奴要江山、命根子。前者好办，可以退让；后者凶险，万万不可。为了固守其统治地位，统治者抱定了这样的两手抓：“国内事务比国际事务重要；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守内虚外，防寇甚于防民，攘外必先安内，内紧外松”。这种思路迟早通往卖国，出卖国家、民族与人民利益。他们内强外弱，内硬外软，善于内斗，弱于外争。一方面，对外不惜代价“结与国之欢心”，能堵住谴责的嘴，拉住几个帮腔的朋友，则不惜出卖领土、商贸利益，大众人权、国家尊严等国家与民族利益。“使馆炸了，战机毁了，没关系，表示道歉，我在人民面前有面子便行”，国际社会还承认我这个政权，帝王还坐于帝制帝位顶端便行。另一方面，疯狂禁锢、严打、镇

压国内人民的任何不满与反抗。当然，人民既看穿了当局的反人民本质，也明白了被当局称为“反华”的国内外“倒独裁专制制度，倒皇帝与核心”的势力与行动并不是针对中国人民与“一个中国”的，而是针对帝制帝位帝王与家国、党国、核心国的。人民不给他们撑腰了

（所谓政治热情下降了，社会缺乏凝聚力了，象一盘散沙），而是冷眼旁观，暗中准备，促其垮台，组织新国家、新政府。

况且，一头大象轰然倒地之前，各路猎食者早已觊觎良久了。教科书、尉安妇等都敢于翻案了，边界海域纷争、国人受辱海外等频频发生。乱摊子总会有人收拾。乘虚而入，也是世界政治的一个定理，或者准公理。每每统治轮回至此时期，中央政权之腐败、堕落、混乱等常常诱使（“国际国内”）内外部势力（包括少数民族等）萌动变异、取而代之、侵略之心。越是近现代，国际势力因素表现得越明显、越强烈。这些往往加重了分裂、战祸、社会破坏、人民苦难、文明毁损等。考察历史，各改朝换代时期，如宋末、明末、清末、国民党大陆政权后期等，中国几乎都或面临、或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然，有些最终证明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一个过程。

但是，就当时而言，这则是统治恐怖与腐败等祸国殃民的一个侧面。现在，由于江泽民六四既得利益当局拒不厉行政治改革，反而顽固推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他等不改弦易辙，名为走符合中国国情与特色的道路，实乃帝制帝位朽没之路，招致内外交困，致使真实的中国国情危如累卵。什么能保证他等不祸国殃民至深渊，致使国家分裂，并再次遭受入侵之危险？

至此，统治者仁政德治没有了，显学与经学撕去了面纱，伪善露出了狰狞，天道（世界大同、太平天国、共产主义理想等）坠落了，天堂失落了。大众失去了信仰，干劲没有了，前途渺茫了。人心思变，全社会再次天问，中国何去何从？天地人齐声怒吼孔子临终前的悲歌：“泰山坏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等待新一轮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的整合。整合为人权至上文明形态，则是改弦易辙，走了新路。如果帝制帝位帝王依存，独裁专制统治特权文明至尊仍然盛行，则是虽然开始了新王朝，但老路必然通往老的覆亡方式，为改朝

换代增添一个老调。

第五阶段，“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群雄并起，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各种社会势力开

始独自或者联合反对现政权之统治高压与恐怖，并且是以起义、暴动等恐怖形式反对恐怖统

治，即所谓以革命反对反革命。他们“敛起铁器做长枪，昏君赃官杀个光（隋末瓦岗军）”，

“天街踏尽公卿骨，……甲第朱门无一半（唐末黄巢起义）”。最后，“王者，兵强马壮者为之”，

改朝换代，开始了新的统治轮回，强权又是真理。

统治恐怖进入“天下分裂，群雄并起，战火四烧，战祸不断”等阶段。它以分裂与战争恐怖

为特征，达到统治恐怖的颠峰阶段。

它时常与第四阶段交叉存在，但一直持续到改朝换代，或者帝位换党、换人，或者停步于“虽

然失败了，但沉重打击了统治当局的反革命气焰”。最终，各种国内外综合势力导致了家国改

姓朝、党国换党，或者家多换代、党国换核心，完成了“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的一个轮回。

这也是第一阶段的重复开始，是高压、残暴恐怖导致了战乱及王朝更迭、帝位换党换人，是

新一轮由轻渐重的恐怖轮回的开始。它可谓首尾交接阶段，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王朝由代组成，每个大跨度的帝制帝位之王朝统治恐怖轮回通常是由若

干代皇帝、核心等的小跨度统治恐怖轮回组成的，故而是一个王朝有几代皇帝、核心，人民便

通常有几次盼头，便受几茬折腾、几茬苦。

如根据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三位核心论（毛泽东并没有提出什么自己是第一代核心而推出后来

的几代核心，是后人为了自己做核心而给毛泽东硬加了个违背本人意愿的第一代核心的帽

子），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而进入以“解放思想、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

开放”为特征的邓小平时代后，直到六四镇压，这10年历史也是一个由轻渐重、形态完整

的统治恐怖轮回。江泽民时代由于六四镇压，而实际上早已如惊弓之鸟了，他们对一切风吹

草动，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异动等都异常“敏感”，都要大规模揭批、镇压，“消灭于萌芽

状态”。而且，以所谓党政一把手负责制推行封建连坐制（这是当局以封建主义思路建设所谓

社会主义的一个旁证）。可以说，无论是对人民大众，还是对广大党员干部，其恐怖统治轮回

正加剧进入末期！既虚弱，又凶狠，因为虚弱而凶狠。
而且，各朝各代中，越非开国皇帝，越是老人政治（熬白了头，哪能很快便下台），继位合法性问题越多，越不符合家法、党法（党章）、国法，越是缺乏威望威信，其政权便越脆弱、越敏感，越如惊弓之鸟，越易于偏早进入戒言、戒严、严打、镇压时期，而且偏恶，更凶残。其胸襟也越窄，眼光越短，发展越小，开明时期也越短。总起来说，就是劣迹与无为多，业绩少；歪事多，正经事少；其坏事多，好事少。正面的如汉之文景之治、汉武帝中兴，唐之贞观之治，清之康乾盛世，反面的如1949年以来的当今江泽民时代。当然也越薄待人民，越卖国，是所谓王朝末期易于产生昏君、暴君、败家子、卖国贼。而且，一山不容二主，一个朝代、时代只能有一个核心。把玩臣下，猫捉老鼠，驾驭百官之权术，是帝王们之反经的必修科目。遏制臣属，被逼谋反，打击异己，诛灭叛逆，是皇帝制帝位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革命不仅仅常常牺牲了革命先行者，王朝循环完成后，革命的堡垒还常常沦为变质者的反革命、反人民工具。如明教、党组织、国家机器等部分沦为统治恐怖的工具如如。除了前王朝、时代的遗存势力，新的统治恐怖轮回往往从最重要、最亲近的人物开始，如元老重臣、大臣、功臣、战友、统一战线伙伴等。古有“敌国亡，良将死”（所谓兔死狗烹，卸磨杀驴），杯酒释兵权，近有天京事变、国民党屠杀共产党。1949年以来，多少功勋卓著的老干部与统一战线中坚们死于非命，或者靠边站。仅六四后时代和邓小平后时代以来，又有多少老干部遭遇排挤、打击？可以这样说，统治恐怖轮回等不仅仅使人民、国家、民族遭殃，演绎最惨烈形态的遭殃者往往是具有才能、有德行的最亲密战友等人。甚至可以说，独裁专制统治下，最无人权保障的不是普通人家，而是开国功臣、王侯公卿、达官贵人、有特殊贡献、才能者等。他们鲜有善终，而且祸及家属、家乡。

（3）通过五个阶段，我们不难看出，是人民争取人权进步直接推动了“历史前进”。

但是，给历史前进加上引号，是想说明历史并没有前进。人民代表一些人战斗，可每逢起义

胜利、革命胜利，轮到分享果实时，他们便失去了代表资格，反而被代表了。家国由一姓代表，党国由一党代表，最后都由一个皇帝、一个核心代表。现在，中国人民难道不是被“三个代表，总代表，一个领导集体的核心”代表了吗？

鲁迅客气了一点，他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事实上，人民、民族、国家流了血，帝制帝位帝王乃存，什么也不曾改变。中央集权、帝制、核心制、一人制、一党制、家长制、终身制等丝毫无损，所改变的只是家国改姓，党国易主。

人民流血了，历史没有前进，中国并未从独裁专制统治特权至上型文明进步到人权是第一生产力型文明。起义、暴动、革命、改革、和平民主大进军等，屡屡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秦制以来，中国历史基本是由王朝循环史组成的，一朝换一朝，一党换一党，一代换一代，一核心换一核心等，不是进步，而是原地踏步，是“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的轮回。迄今登基了的是皇帝，没登基的皇帝是核心，他们300多人轮流坐庄，没有一个是民选的。各朝开国皇帝（包括李世民、邓小平等二代、三代）多少还有一些民主性，因为虽然未经和平民主选举，但赢得战争，建立新政权，至少能表明他们是受到了大多数人拥戴、支持的，因而也是合法的。人民以战争民主选择了他们。现在，江泽民算什么？一无战争民主选举，二无和平民主选举，那宫廷政变能说明什么？非法！

虽然人民彼此不相识、不是同时代人，根本没有什么“串通、复辟”之嫌，虽然人权天赋之人性使他们一事接一事、一地接一地、一代接一代地对独裁专制统治展开了“疯狂反扑、猖狂进攻”，如改革开放前有“右派的猖狂进攻，天安门事件”，改革开放后有“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天安门事件”等，虽然这些被称作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动力，但他们往往更多的是被用作家国改姓、党国改党、帝位换人的一个动力，是固守斜阳，是在独裁专制统治特权文明里重复打滚，而不是推出了正阳，不是推动中华民族与文明进步到主权在民的人权文明时代。

这并不否定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而是说明了中国人民作为动力的悲哀，我们前

仆后继地“推”了，但王朝性质没有“动”，总是收获了另外一个家国、另外一个党国，另外一个皇帝、另外一个核心，民国、主权在民之民主中国仍然是无踪无影。家国循环、党国循环、核心循环等演绎的王朝循环不是历史的真正进步，统治恐怖的轮回演出不是天赋人权的真正进步，帝制不变的帝位换姓换党换人不是人民民主革命成功了！而且，与统治恐怖相伴随的，是统治腐败、生产力兴衰、文化进退、财富位移、特权挤压人权、人民幸福、社会稳定繁荣与动荡、综合国力强弱、统治者气度宽窄、开明与残暴、帝国胸怀之宽广与狭窄、政权盛衰、等的同步轮回。它们将独裁专制统治者制度与权力原罪，及其当局与当时者的吃人本性暴露无遗，将官性儒学与官性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纲常伦理、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济世利民、所谓共产主义觉悟与风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假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的虚伪揭露殆尽。人民做脊梁与老黄牛，全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最后得到的竟然是国破家亡，社会全面腐烂崩溃。改朝换代，新的王朝开始运行了。但综观历史，不改弦易辙，革旧鼎新，沿着老路老辙老轮回，二十六史，哪一朝，哪一代，最后不是亡于山穷水尽，并把国家、民族与全体人民推向困难深渊？

诸般轮回组成了王朝循环，它们总体上就是祸国殃民的轮回。它还可以表述为：统一或一统——独裁专制——异动、战乱、分裂——统一或一统，繁荣——穷困，强盛——衰败。不改弦更张，这是老套路的必然轮回。只有创立“一个中国，民主中国”，中华民族才能避免来自内部的轮番摧残与绞杀，才能长盛不衰，复兴、创新中华文化与文明。否则，虽然历朝历代均创造了一些繁荣与文明，但最终也毁于他们。我不禁想起了一句斯大林名言，大意是：世界是一幅幅图画，摧毁了，再重建。这些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从冷战到热战，直到改朝换代开始新一轮的休养生息，形成了统治恐怖轮回的主脉。如此反复的循环、轮回，是绞杀，也是中国“酱缸文化”的根源。中国民本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民富国强之繁荣等麻烦正在于此。斜阳及其恐怖的轮回，每次都是对社会新生之自由民主思潮、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重大打击，都是对资本主义萌芽、官本位以外新型社会势力、社会先进生产力及其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等的连根拔

除、一锅端、胎死腹中，剩下皇权为首的官本位及其独裁专制统治意识形态等糟粕们得意洋洋、惟我独尊。

以至于国内外常常疑惑，为什么发端于明末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到现在仍然处于萌芽状态，

为什么四大发明没有形成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与工业革命，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势力太弱小，

为什么人们总结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败于太软弱，为什么从汉族明王朝到满清、

为什么从三民主义到马列主义、为什么从不同的家国到不同的党国中国仍然秉承帝制帝位而

推出了帝王。

中国民主革命的麻烦也正在于此，仅近代以来，承接先古时期秦朝企图传万世与汉高祖刘邦

之“非刘姓为王者，天下共击之”之遗训，太平天国最后收获了“非洪姓不得封王”，辛亥革命

命收获了袁世凯复辟帝制，中华民国收获了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之“一个主义、一个政

党、一个领袖”和蒋氏两代总统、台湾38年军事戒严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收获了共产党

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之“三代领导集体、三个核心”。

家国，党国，他们的共同理想是“永远不改姓，永远不变党”，这也是他们的最高价值观。什

么人民、国家与民族利益，包括世界和平与繁荣等，都靠边站吧。可见，自我标榜为孙中山

信徒的人和政党都记住了秦始皇、刘邦、洪秀全等的传家宝，却偏偏忘记了先生“敢以帝制

自为者，天下共击之”遗训，抢着轮回给中国社会制造统治性恐怖，由轻渐重的两手抓统治

性恐怖。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几个类似的王朝统治恐怖轮回，六四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新轮

回，目前正处于这个轮回的末期！这一次，中国能够真正跳出这个王朝恐怖统治的终身制轮

回，进入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离制、议会制、多党制、任期制轮回吗？中国难道永远不能解除

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恐怖，以主权在民收获多样化、多元化与多极化之民主中国？

但是虽然民主中国尚未创立，而且历史有它自己的轨迹，王朝兴盛也有它自己的轨迹，可它

们的运行轨迹都是人民追求人权的推动力和统治者固守统治特权的反动力共同作用确定的坐

标，它们都离不了人民减轻、摆脱推翻统治恐怖等追求人权进步的推动作用。

否则的话，5000年中华文明史会是什么样的呢，至少从秦制以来是一潭死水，皇帝都是秦家后代，臣民永远是臣民，它日复一日，没有任何变化，因为它不需要任何变化，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王朝更迭、家国改姓、党国改党。当然说美一点，它如横亘不变的桃花源，可独裁专制王朝之统治恐怖有那么美好吗，它允许人民享有桃花源中那般自由、和谐、无忧无虑和良辰美景吗？它比一潭死水还糟，是一潭恶丑的死水！

（4）诸般统治轮回中，有一个逻辑主线。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治国原则是两手抓，一手抓政权，一手抓保政权。“抓政权”是一贯的，一刻不可放松。保政权的方法则多种多样，不同时期有所侧重的。顺着其“江山不改姓，不变色”的最高治国思想境界，该主线由经济——思想（政治）——军事。这是统治三部曲。第一步是经济为中心，轮回之初，天下甫定，全国上下（统治者与大众）需要稳定，“民以食为天”，吃饱饭是最大的政治。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是最好的统治良方。这也是所谓开明专制、开明统治时期，是“明君，圣主”高产期。如洋务运动，后面还有“祖宗之法不可变”。抗日，后面还有“勿忘共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头阵，勿忘后面还有督军“两个基本点”。第二步政治挂帅。“饱暖思淫欲”，人民由生存权而追求政治、文化权，导致“思想繁多，精神污染邪升，奸党丛生”。明君及其接班人们开始变脸了，他们开始两手都要硬，要求天下讲政治。其政治的最高要义、最大价值目标是“保持一致”。其思维是“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具体方法是以“守内虚外，防民甚于防寇，攘外必先安内，两手抓促发展，内紧外松保稳定”，坚持帝制，维护帝位，与帝王、核心保持一致。否则皇家内外，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六亲不认。“保持一致”须得高压，这使它基本上沦落为意识形态，是整人的同义词，整异己，整大众，整社会（所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化）。此时，宣传教育教化系统往往很了不起，所谓笔杆子保江山。它们代表总代表大声说话，到处说话，占据绝大多数媒体舆论机构。目的就是“占领思想阵地，陶冶情操”，让别人不说话，

不独立思考。宣传部成为戒言部、禁言部、戒脑部。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揭批“邪教”，社论、评论员文章等，实际上是制造新的文字狱，营造社会之新的文化与精神恐怖。为了戒言，张志新临刑前被割掉了舌头，而有案可查的近50年中国史实表明，她之前同样被割掉舌头的有3位，她之后还有20多位。

第三步抓秘密特务恐怖与军事统治恐怖（有时内紧外松）。越抓政治、讲政治，经济越垮。经济越糟，社会衰败、混乱，人心思变，政权“变情”增大。最后政治不行了，笔杆子不行了，亦即冷战或文战不行了。戒言不行了，必须戒严。割舌头不行了，必须割脑袋。必须军事戒严才能戒言，必须消灭肉体才能消灭嘴巴、大脑。当局开始抓枪杆子，调遣军队，抓军事，抓流血镇压，抓政变，开始热战。如军事戒严、六四镇压，威胁台湾等。这是两手抓的最好境界，也是残暴统治的高发期。

总之，官本位猖獗，文恬武奢。两手抓，硬起来！你瞎想，我戒脑。你瞎说，我戒言。你乱动，就是动乱，我戒严。你阻止，你反抗，就是暴乱，我平暴，我镇压。你要我的江山，我要你的命。枪杆子打下江山，最后还得枪杆子保江山。这名为“保”，实际是又“打”了一次江山。它剪除异己，威慑、打击了一切敌对势力，江山甫定，新的统治循环与轮回开始。

（5）时势造英雄，也造狗熊；盛世造明君，乱世造暴君。不是明君生性是明君，不是暴君生来抢做暴君。他们有共同特点，一旦坐上帝位做帝王，必然拼命固守帝制（如封建纲常、社会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理想等），走向以统治特权吃人权的独夫民贼之王霸路。他们的不同业绩与声誉，乃是由王朝统治轮回的阶段性变化决定的。

可以说，独裁专制制度下，天行有常，轮回分明。冥冥之中，繁荣衰败，明君暴君，盛世乱世，改朝换代等，早有安排。有时候，繁荣潮流把他们推上了风光无限好，是所谓水可载舟。有时候，末法时期使他们灰头土脸，心烦意乱，狼狈不堪，想求功名却留恶名，是所谓水可覆舟。这些都是历史与人民人权进步的内在动力使然。尤其是对于昏君、暴君而言，顺应人权潮流则意味着下台（其实是伟大的再生，是凤凰涅槃[加木字底]），非暴不足已固守其家。

天下、党天下、核心天下。所以，逆潮而动，也是他等必然的选择。否则，至少自戊戌变法以来，中国便已经从君主皇权专制走向了君主立宪。它包含的三权分离、议会代议制民主、多党政治、自由选举、司法独立、舆论自由等也必将逐步扩张、扩大、成熟、完善、完美，中华人权有保障矣，民富国强矣。我们可以想象无限。然而，近代以来，由统治者压迫所至的中国革命往往采取了暴力与武装的形式。它们革命时伸张正义，保障人权，革命胜利后却丝毫不能从制度上消除党证官本位统治特权至上及其腐败，并走向了新人新党的独裁专制。而且，由于强权即是真理盛行华夏大地，中国的一大遗憾在于选择顺应人权潮流的人，往往遭遇不测。如光绪、康有为、谭嗣同、1976年以前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六四时期的全国人民等。至于日本人热衷于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则可以这样理解了：他们君主立宪的民主甜头，决不让中国以变法、民主共和等方式获得。否则，一旦中国福庇于受自由民主制度等催生、保障的人权第一生产力，民富国强，日本人便不能为所欲为了。迄今，有些日本人，包括其他外国人，仍然保持了吹捧中国的嗜好，如“你们变化大，发展快；你们的改革是成功的；你们真了不起，解决了12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等。这些一乃出于礼节、礼貌，二乃求主子评奖，赏口饭吃，三乃取得分享中国市场大蛋糕的事业秘籍，四乃同病相怜，五乃麻痹中国，达到其捧杀目的。无论有意、无意，它们都起到了捧杀中国的效用，是昏睡中国的迷魂汤。自己“突出主旋律，正面宣传，报喜不报忧，报灾不报灾之根源”等还不够，还要出卖国家利益拉几个帮腔的。而对于国内外批评等清醒剂，当局都认为苦口的不是良药，逆耳的不是忠言，回报以“颠覆国家，干涉内政”的打击。对君主与专制国家装傻子、国际脸，搔首弄姿，多说点儿好话，忘掉或藏起正义与人权至上（有些是被迫的），便会多分得市场蛋糕，各类利益。这是国际政治、国际商业间成本最低、最容易得手，回报却是最大的投资。中国每年邀请、接待了多少这样的国际脸？民脂民膏铺垫了统治者获得国际支持、国际宽松环境的道路。这是统治轮回的外部条件，也是祸国殃民

的同谋。

自然界有磁场，练功有气场。以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为单位的人类社会，不同时期都有

不同的人气场。它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由人们的心理倾向状态与实际行动决定，当

然还包括自然界变化的因素。如人心思变与人心思定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气场，商品购买

力旺盛与低落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气场，国际关系紧张与缓和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气场，

和风细雨与狂风暴雨也会形成完全不同的人气场。人气场是社会的基础，是金字塔的底部，

其主流成分是人民追求人权进步。它决定上层的状态。

具体而言，独裁专制社会里，人气场等变化决定了一个王朝的不同统治时期必然呈现不同的

良莠状态。对人气场潮流变化的选择，如顺应或者逆行，决定了强权握有者——帝王们的业

绩与声誉（无权者无所谓选择，只能跟着走，或者本身就是潮流的一分子）。一些历史明君，

如唐太宗、文帝景帝、汉武帝、康熙乾隆等非常走运，主要是历史轮回幸顾、造就了他们的

盛名及其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康乾盛世等盛世，而不主要是他们创造、推动了历史。否则，

不尊重人气场，不遵循统治恐怖由轻而重的轮回规律，不修养生息，其祖辈们创下的基业，

必然如秦二世、隋二世、国民党大陆政权等那般短命。而且，盛世之后，人民追求人权的动

力势不可挡，必然使其后继下一个烫手的山芋（如江泽民之接手），并逐渐走向固守中的腐

烂、溃败、改朝换代。

一些昏君、暴君等倒霉蛋、所谓败家子等，是时运不济而背上了骂名，是轮回轮到他们挨骂、

如丧家之犬流亡、上吊、被推翻了。改朝换代，统治轮回，其实也是帝王核心们声誉之有为

——无为——昏庸——中兴——残暴——败家子等的轮回。

看来，一些明君是轮回运气好，一些则是急流勇退的结果，另一些是死得好。突然驾崩是急

流勇退的特殊形式，只有功，没有过了，也不会卷于其他斗争漩涡而蒙难辱名节（好些老干

部、革命英雄等能有好名声，是因为他们不幸早早牺牲了，便不受反右、文革和所谓林彪、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等罪名牵连了）。否则，继续活下去，面对人权潮流，如不顺应潮流或急流

勇退，谁保证他们不走向后退，不走向反人权，镇压人民？谁能阻挡他们自辱英明，自取其

羞的勇气？岳飞、晁盖、李大钊、任弼时、陈潭秋、吉鸿昌等没人骂，不必平凡，就是很好
的证明。突然、意外与不幸遇难成就了他们的声名。反观宋江、林彪等，评价则各各不同。
不是变质了，就是被帝制政治斗争整得死去活来。
不过，有一点已经是肯定的。如果江泽民等六四既得利益当局仍然如果不主动推行民主，等
待他们的必然是崩溃、覆灭，乃至暴亡，或者是死后“重新评价”。
其实，尽管是历史规定了他们在位时的时代走向，确定了他们的所做所为，尽管人们常常不
能不顺应历史，而且顺应人权进步史是明君，顺应特权进步史则是倒霉蛋，尽管远古的我们
不能要求，但如果近代史以来，哪位皇帝、领袖顶住了特权文明史之顽固存活、扩张，并回
击它，使中国历史轨迹从此走向主权在民的人权进步史，那么他便是真正改天换地的历史伟
人！
只要回顾、尊重祖先的人权文化遗产和睁眼看世界，只要抛弃帝欲私心，将战争民主转化为
和平民主，将特殊时期形成的代表权主动交出来，由人民另行定期择优委托，我们便可以成
功了。
所以邓小平不如毛泽东，江泽民则不可同日而语。邓小平应该是一位伟人，如果他以自己的
威信创立了民主中国，而不是留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样
一个政治遗产，他就更伟大了。也许时间不允许他更伟大了，可不进则退，剩余时间反损害
了他已有的伟大。
我们不能不感慨，如果他没有发动六四镇压，如果六四发生于他身后，他岂不更伟大，人民
岂不如怀念毛泽东那样怀念他！这是邓小平的遗憾，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遗憾，更是中国的遗
憾，更是中华民族与文明的遗憾，也是世界人权事业的遗憾！这是“一个中国，民主中国”
的悲剧，这是中华民族与文明的悲剧！

（6）王朝更迭规律告诉我们，是人权进步引起了特权恐慌，是暴政引发了暴亡，也即是人
民追求实现人权进步以及人权保障引起了统治者保障特权的恐慌与暴政，是统治暴政扼杀人
权也直接导致了政权自身暴亡，是新的王朝必须顺应人心才能存在，否则立即遭到颠覆。夏、

商之覆亡如此，秦、汉、唐如此，元、明、清也莫不是如此，国民党大陆政权更是如此。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共八大曾经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否定了它，究竟是出于痛恨“官僚主义阶级（他老人家把这些官本位人称做党内党外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势力）”而保障人权理想，还是出于保障政权地位的需要，或是两者都有，还有待研究，这里头的是是非非还难以下结论，但直到1976年以后才恢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是事实。而且，文革后任何一位掌权者都会推行休养生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非此不足以立足。“解放思想，废除两个凡是”大受拥护便是明证。六四镇压的动力直接来自“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正是新时期新的一人一方独裁专制统治政权针对人民人权的阶级斗争。而六四暴政后政权之所以能够存续，一方面是有开明，另一方面是他们享用了六四前经济建设所积累的物质文明和巩固了各种长城，人民生活还过得去，没有到“被迫上街、起义”临界点，故而尚未逼出“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只有揭竿而起”的被动起义。比较之下，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是富而思进性质的，是主动进发，是自觉自愿的人权大进军，因而更可贵。而当时认为“还过得去，不着急，稳定最重要”而没有跟上、跟进，观望、犹豫甚或反对的人，现在傻眼了，因为当局使他们现在“过不去”了，可挑头的还没有出来，只好忍着、等着。而且当年挑头的太伤心了，只有他们是受害者、牺牲者，更有一些人吃了蘸他们血的人血馒头。我们还能这样吗？接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旗吧！它是新的迷信，是四个凡是迷信！不要忘记，独裁专制统治的特点是从引导、教育（教化）、领导、管制到强制、镇压等由轻渐重的恐怖，它不会让任何人永远舒坦、过得去的，就是皇帝自己也难以安生。如果有人再挑头，不顾一切跟上去！

3、落后挨打：什么落后，谁挨打

统治恐怖的结果，是内忧外患，是国难。国难就是以皇帝为首的官本位统治制度发难，人民

受难。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统治者由冷战而对人民发动热战、镇压时，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

都伴以国耻，统治者招惹的国耻。

上溯2200多年，商鞅变法即断言：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

世纪之交，回首百年：公元1900年，为什么正是北京刀光剑影，顺乎世界人权政治潮流

的1898年戊戌变法被独裁专制王朝镇压，光绪皇帝遭囚于中南海，谭嗣同等变法君子人

头落地，康有为等逃亡海外之后，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又使中国被迫带着首都沦陷于八国联军

的耻辱进入了20世纪？当时，“祖宗之法不可变，器变道不变”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文

化科技、国防等发展的最大障碍。

公元1999年，为什么正是北京戒严、战车隆隆、硝烟弥漫、血光惨淡，1989年

中国民主人权大潮被一党独裁专制政权镇压，赵紫阳被等软禁（或许也是中南海）、被削官或

投进监狱，大批人民死于六四镇压，民主人士逃亡海外之后，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又使中国与

人民带着被国际制裁、被孤立，驻外大使馆被多国联军即北约轰炸的耻辱进入了21世纪？

当时至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禁忌。

百年间，为什么两次屈辱都发生在一个政治生态、行为程序与恶果几乎相同的历史隧道

里？甚至连一些细节都惊人相似：帝制之外，都还有退居二线的太上皇主政，戊戌事变前后

有人垂帘听政，六四镇压前后也有人垂帘听政。

肇事者相同，八国联军、北约，都是联军。

招惹屈辱的旗号，也都是近乎雷同的“祖宗之法不可变，器变道不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丢，

两手抓，一手抓变，一手抓不变，两手都要硬”。但实质上，它们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什么“党

和人民、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而都是维护一人一姓一家一党一核心独裁专制

全党全军全国全民的特权统治地位，是对人民人权事业的阶级斗争。

而且，两次都使中国倒退于自由民主的开端—改良、改革、开放，倒退于由绝对独裁专制转

向开明独裁专制之际。真可谓“老的不下去，新的上不来”。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

摇”，是一手抓经济进步，一手抓政治落后。它不是什么新发明，一点也不新鲜。

而且，历史

证明，它注定贻误经济发展，要失败，并祸国殃民。清代洋务运动没能振兴中华，也没能挽

救大清之覆亡命运。不改弦易辙，辞旧迎新，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两手抓”，也必将败阵于社会科学规律。

有人说屈辱问题是国家问题、是实力问题，是农业文明落后于工业文明，是我国工业水平落后于人家的工业与信息产业，是经济与科技落后，所以才挨打。但国家问题，包括农业、工业、信息产业等经济生态方面，归根到底是政治生态问题，是制度问题，是“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的独裁专制制度落后于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四项三讲的迷信愚昧、意识形态与历代经学等一样组成了闭关锁国、愚弄人民的长城，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特权利益高于人民人权的如一丘之貉，是制度落后就要挨打。一句话，国家对话是实力对话，实力对话是制度对话，是人权对话。国家与国力问题是人权问题，是人权落后就要挨打，是践踏人权就要挨打，而且是独裁专制主挨打，是奴隶主挨打，是特权高于人权就要挨打。

只不过，除了他们在长城内制造的灾难与痛苦，统治者者们还总有办法把他们从长城外面招惹的痛苦、灾难转嫁到人民头上。这应该是中国人民人民遭受双重、三重、多重压迫、剥削、打击的由来，而总根子只有一重：一人一家一姓一党一核心独裁专制统治全党全军全国全民。

戊戌变法失败于封建王朝之顽固，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被攻占可鉴。国民党醉心于一党独裁专制之党国，日本军国主义者肆虐中国可鉴。政治体制改革中断于六四镇压之血腥，公元1999年的驻外使馆被炸可鉴。侵略是无耻和非正义的，任何残暴也是要受到清算的，但国弱民贫，百年屈辱辱为何如出一

辙？统治责任哪里去了？中国人民更应该清算谁，找谁秋后算帐？面对中国的落后现状，满清政府有什么资格自称“天朝上国”；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有什么颜面自称“三个代表”？一切专制政权更是三个阻碍：阻碍先进生产力，阻碍先进文化，阻碍人民利益。最终是阻碍人民，阻碍国家，阻碍世界，阻碍人类人权事业。它迫使人民至少

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三个方面成为三无人员，无自由，无民主，无人权。

国家尊严与帝制帝位帝王尊严不可等量齐观，家国、党国、核心国之私天下尊严不可与主权在民公天下尊严等量齐观，民族尊严与当局尊严不可同日而语，人民尊严和统治者个人尊严完全是两回事。而且，没有大众的个人尊严，没有国民尊严，便不会有国家尊严，更

不会有什么朝廷尊严、政府尊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更是统治者的一个政治骗局。他们继续用假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掩盖真独裁专制主义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使我们想起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麻醉华夏大地时，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是因为百年来独裁专制统治政权如出一辙，都是它惹的祸，都是“国治，断君，弱”的不幸写照，都是“全国人民拥护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党中央，党中央服从一个人”等“高度统一，绝对服从，保持一致”造成的民贫国弱。

外敌骚扰、入侵是暂时、有限的，而独裁专制制度一日不除，中国人民便要永远面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便要永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不在长城之外，而在长城以内，它是独裁专制制度及其当局，是统治者特权高于人民人权。它致使国际形象受损，国际形势窘迫，中国国家价值难以发挥，中华文明难以发扬光大。

民间资本、民营企业难以生存、发展。人民的才能、财富与爱国热情无用武之地，人民移民外逃、难保尊严。军功等各行各业贡献卓著者屡受迫害。科技教育与实业国防难以兴国，诺贝尔奖无缘。信息网络业在控制中慢步前进，电视、电台、报纸、通讯社等新闻舆论的社会第四力量越来越只是“万马齐喑，唯有四项三讲、凡是迷信”的帮手。体育、文化与文艺娱乐难以尽兴。政府无能，人不得不浮于事，社会效率低下。水土流失、环境恶化与自然灾害。人们越来越被逼上走私、造假与欺骗，就业无门与就学无钱现象普遍。越强调实质为“党有制，官有制，真正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热心社会公益者、党政官本位里为人民服务者却越来越少，他们带头违法乱纪、不交个人所得税，个人腐败、殃及家庭家属，党政腐败，祸国殃民。社会流行大吃大喝，道德水平下滑。民工、下岗工人如社会贱民的现象有增无减。武装部队指战员、武警官兵、广大公安干警越来越累。民间“笑贫不笑娼”，刑事犯罪、报复与破坏活动增加，无望者、吸毒者等社会边缘人增多，民生维艰，四海无闲人，却是穷苦人等，都是形形色色的掌权者推行形形色色的独裁专制制度招惹的祸国殃民。

为什么中华民国曾经不是“民国”？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共和，不能组成人民委托主权的合法政府？

为什么中国仍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党国”，“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莫非党民”？

为什么不管专制政权如何五花八门，中国总是落得被动挨打的同一结局，中国人民总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为什么中国人民经历了 21 世纪的百年民主奋斗，虽前仆后继“盗天火”，仍然被迫披挂独裁

专制国体，在独裁专制者们的禁锢、看押下爬进了 21 世纪？

为什么以人民当家做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仍然坚持对人民实行一党独裁专制？

为什么接受教育、就业，评职称、晋级，担任社会公职，出国等，意识形态的政治是每个人、每件事的“考试”科目？

为什么每位中国人都有“唱诗班”的经历？为什么中国官方总是忙于统一思想？

为什么中国人仍然会因言获罪，因思想而倒霉？

为什么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法轮功练习者必须被盯梢、蹲监狱，或者流亡海外？

什么时候对皇帝及其独裁专制体制的“离经叛道与犯上作乱”不是中国法典和社会里的罪名？

为什么在独裁专制日渐式微的地球村里，中国政治体制与社会还仅仅只重复着换党或换人的

独裁专制的“王朝循环”的朽曲腐调？

为什么龙袍进了博物馆中国却仍然有皇帝？

为什么一人一党仍然对人民和国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为什么人民总要被动接受皇帝或皇子或钦定接班人的统治，而不能主动地监督、更换“民选总统”的执政？

为什么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等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欺骗，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

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式的民主倒不是政治欺骗？

为什么宪法撤除了“四大”，扳倒“两个凡是”，又塞进了“四项”，偏偏仇视人民主权的

三权分离的民主制度？

为什么四项三讲还能延续对人民“阶级斗争”和帽子工厂杀威棒的香火？

为什么独裁专制还在制度性地侵吃中国人民的人权？

什么时候，中国能够真正没有皇帝，人民能够把“某某王朝的第某代皇帝的某年间”，把“以某某为核心的第某代领导人”，改为民选的“第某任总统”？难道古往今来冒出 300 多个

皇帝的中华文明一定要向第四百号皇帝进军？

为什么中国没有溥仪、没有了王朝贵族，又出现了党政官本位贵族？为什么他们有的比贵族

还贵族？

为什么中国不能避免个人与个党犯错误，遭殃的却是国家与人民，个人与个党及其一人一党

独裁专制却永远光荣、伟大、正确？

为什么反对一人一家一姓一族对全民全国全社会的独裁专制是“危害国家罪”，而反对一人对

全党全国全民全军全社会的独裁专制仍然可以被定为“危害国家罪”？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改革开放一定要落后与经济改革开放？甚至停步，甚至后退？

为什么中国人民享有的自由民主不能与致富同步增长？为什么中国人权状况不能与经济增长

同步增长？

为什么党校那么神圣、那么多，那么不遗余力培养干部，还培训出那么多腐化分子？

为什么中国人民在最先进的“三个代表”领导下，总在受党的教育（教化），却总在受穷？是

受教育太多，还是受教育不够？

为什么中国人日子过得不怎么样，还必须对皇帝、对党“感恩戴德”、富而思源：谢主隆恩，

圣上英明，感谢党，我们有工作，我们有饭吃，我们有房住，我们有生命，我们能生孩子？

为什么鲁迅先生描述的“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做稳了奴隶与连奴隶都做不稳的两种状态”继续

存在？为什么中国还有人不知己、不悟己、不耻己之为奴？不奋争己之不为奴？

什么时候中国人民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能够享有宗教信仰和言论

自由？

什么时候，中国政府能够不是朝廷，人民能够不是“臣民”或儿女，能够真正是人民主

权国家的主人，能够制定法律，监督所有社会公共权力的运行及其行使者，把那些自尊自大、

自称为“人民父母官”的权位规劝回“人民公仆”的原形？

为什么中国在世纪之末“不见四化，但见“四项”，只剩‘三讲’”？这“四项、三讲”与“句

句是真理”、“两个凡是”有什么差别？

为什么百年前谭嗣同慷慨悲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

何处是神州”，如今中国人民“世间无物抵人权，合向民主哭不休。十二亿人自由泪，天涯何

处是民国”？

这些是为什么？反思历朝历代，中国人民的灾难远不是几个奸臣昏君的造孽。是独裁专制统

治制度及其固守之，害苦了中国。续接秦始皇帝制帝位传万世、刘邦“今后非刘姓为王者，

天下共击之”之古代版本的四项基本原则，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屡屡因“非洪姓不得封

王”，“非国民党党员不得出任重要职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

度”等走回了帝制帝位老路。

4、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则两不成

（1）振兴中华，人人有责。出于各种原因，历代统治者、领导人在稳固政权之后，还是孜孜以求，不断探索、奋进的。清代有洋务运动，国民党蒋介石也是雄心勃勃，共产党中国更是前无古人。

1978年以来，较之“以阶级斗争为纲”，虽然“以经济建设一个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

有很大进步。但是，它终究没有抛弃独裁专制统治政权及其领导者必然以统治者身份对人民

搞阶级斗争的老路。改革开放的推进器与监斩官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手却互为反向

力量：经济致富，并不意味着人民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成为人权阶级。仍然是一

党制、核心制、家长制等的被动接受者。

这为“经济改革开放，政治保守帝制帝位帝王之独裁专制统治”定下了基调。它貌似重视“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实则是一个垂帘听政架构。即：“两个基本点”监控、监管着“一个中心”，

而且经济建设的成果为巩固“两个基本点”服务，最终是益于帝制帝位制度。否则，“一个

中心，经济建设”必遭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等思想的教育，坚决反对自由化、全盘西化，

坚决打击非法组织、邪教”。

可以说，如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针人民对自由民主等的热战，那么“一个中心，两个基

本点”则无疑是冷战。冷战之两手抓无力阻挡人权进程时，热战之两手抓登场了：

5.19戒

严令，直到六四镇压。这些实质是统治特权对人民人权搞阶级斗争的继续，是最高形式、最

残酷的两手抓。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

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

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

够完成。”显然，“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指的是秦汉以来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

集权独裁专制政治制度，及其官本位等思想。

他慷慨陈词，仗义直言：“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妥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领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

他决心改革我国政治、经济体制。

他首先破除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及其公有制是高度集中的管制经济，它具体表现为管理

上集中统一，财政方面统支统收，物质方面统分统配，就业方面统包统配，商业方面统购统

销，外贸方面统进统出等等。一个“统”字，充分暴露了独裁专制的全部含义。它是独裁专

制权力的附属经济，实质就是权力经济，独裁专制经济。它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旗号，干

独裁专制的勾当，它垄断一切社会资源、生产成果、文化思想等的开发与分配，甚至垄断、

规定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生殖生育等。它依据行政权力，如红头文件、等级

职位安排、隶属关系等配置资源、安排生产，调解、仲裁、决断纠纷，分配成果、利益等。

它排斥市场对生产要素、资源的自由配置作用，排斥企业、个人对市场要素与讯号的民主抉

择。它需要绝对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权威维持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当然好。它的前提是经济主体的地位平等、意志自由。它是自由经济，需要自由思

想、自由移动的生产要素、资源、销售市场。它是民主经济，它藐视独裁专制权力，服从由

广大个体组成的群体意志，服从社会。它是博爱经济，它奉行的原则是“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它工作的目的在于交换。它极少考虑自己，而只有考虑人民大众、天下、社会，去生产、

去服务，产品才有销路，个人与企业才有出路。它天生热爱自由，需要自由的环境保证人人、

每个企业及其生产与消费环节都能够自由选择、配置。它也因此需要市场政治——人人可以

以选票等自由表达、自由选择的民主，即民主政治，为它配套、服务。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最后成功，更需要民主政治先行。东方的日本，北边的俄罗斯，都
是很好的例证。
遗憾的是，我们仍然沿用清代那一套，“祖宗成法不可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丢”。“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一手硬了中国经济建设，一手软了政治改革开放，即国家政治生活仍然没有从
一党制、核心制、终身制、政治局开会、黑箱操作等统治统制政治，向社会大众开放，走向
多党制、代议制、任期制、公开制等民主政治。这似乎预示着中国经济改革走向失败。不改
弦易辙，弃旧请新，“戊戌政变”使戊戌变法流产，已经是前车之鉴。

（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断言：“19 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但窃喜之余，如果没有民主与法治，如果政府不是人权的保护者，中国人不敢奢望 21 世纪的辉煌。
国家本身是一个工具，制度不必一定归属于意识形态，它本身是没有政治斗争色彩的。它其实也是附属于国家政权的一个社会工具，是如邓小平所云的“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工具。它大体只能分为独裁专制的，或者自由民主的，主权在民的，或者主权“在王，在党，在核心”的。其本质可以是约束与限制，更可以是动能、激励与促进创新。
它可以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推行政治理念的政治工具，也可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纯粹性经济工具，如联产承包、个体经营、民营私营企业、租赁、个人承包等。它对经济文化等社会诸多方面均有促进，或者压制、阻碍作用。
近代中国以来，上个世纪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本世纪呢，虽然力度加大，但
无论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国，还是狂飙突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国民党党国时期，还是 1949 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民主的政治制度形态和政治文化形态均未能取代独裁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人权为特征的政治文化、政府理念，从来未能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占据主流地位，未能担当国之大纲。
究其原因，表面为：一、封建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人们被禁锢了的思想，顽强抵制、排拒民

主精神在中国落地生根。二、当时的中国，民族问题最重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是中国革命的主旋律。而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很短，文化启蒙的思想导向，一瞬间就转成了救亡图存的政治导向，并主要局限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民主口号缺乏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而逐渐消亡。三、以农耕为主的小生产方式没有改观，封建专制主义的独裁政治和文化结构仍有深厚的基础。四、西方文化是随着军舰大炮强行冲入国门的，并非内部酝酿成熟的结果，而且军事暴力使无辜的文化受到情感的愤怒抵制。其实，最重要的原因，乃帝制帝位帝王是自由民主等人类人权事业的天生反对者，乃统治者们为了保护自身权利而对世界民主潮流的排斥。因为社会民主变革必然扩大人民的天然人权，人民人权的扩大必然是独裁专制特权的减少。人民的幸福与科技进步，对独裁者们往往不是好事。

哈佛大学历史学 and 经济学荣誉教授戴维·兰德斯著有《国富与国穷》一书，他讲述了独裁主义者以各种令人讨厌的借口，如政治、军事、宗教 and 知识方面等，竭力阻挠企业和经济进步的情况。他分析指出：“为什么中国发明了印刷术、火药、原始钟、指南针、陶瓷、纺纱机、甚至鼓风炉，却没有发生像欧洲后来出现的那种航海、科学和工业革命？原因可能很多，但重要的一条是：进步与独裁专制统治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

如印刷术可以促进知识的传播，但确立平民教育体制会危及独裁者们对知识的垄断；指南针的航海性促使国人睁眼看世界，但外部世界会“蛊惑民心”，开放的国民与国门必然危及独裁专制的封闭体系；大量出现的纺纱机等工业化，必然促使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城市里自由劳动的市民，而以前中国城市的功能不是生产基地，是独裁专制官僚机构统辖一地的权力中心，是消费中心。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落后，都是制度的落后，即拒绝了自由民主活性因子的独裁专制统治制度的落后。任何社会最基本的矛盾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对矛盾在当今中国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人民自由民主的人权与独裁专制的特权之间的矛盾。

（3）近二十年来，政出权门的独裁专制狂飙减退之后，中国人并不是没有亲身体验制度变革带来的喜悦。

起于1978年的中国农村改革，实际起始于取消权力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制度，这是在从政治体制开刀。土地承包责任制则直接从经济体制着手，明确了所有权、使用权、自主权、收益权、责任权等。它给了农民自由、民主支配生产资料、劳动成果的权力，解放了农民的人权。依附于土地的农民不象农奴，有点象个土地主人的样子了。这些开明的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重视人权，使农村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而且，没有枷锁的农民精力旺盛，不仅使土地为共和国产生了巨大财富，还异军突起，转向工业。不论是个体、私营工业，还是集体工业，都使国有工业企业大受震动。一些富裕农村，开始用工业反哺农业。

自由了，民主了。一个好政策，重视、解放了人权，政府膀不动腰不摇，中国农民就自己富

裕起来了，使华夏农田充满了希望。我们可以借用科学术语“纳米”来阐释这个奇迹。“纳米”

是长度的计量单位，是一米的十亿分之一，当任何材料（用科技手段）被细化到这一量级时，

该材料物化性能都发生极大的变化，其先前潜在的极大的原始能量，开始显现出极高的活性，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到质变”。国家、社会与世界是整体，如果每个个人都能享有纳米化

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权益时，那么全国全社会全世界的创造创新活力则无可限量。除了这新时期的土地革命（即从独裁专制下解放出来，回到农民手里的“耕者有其田”的革命），

那些遍布城乡的工商个体户、私营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等一系列中国新的资本家、知

本家、文体明星等得益于相关政策，各种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管理能力等资本权、

经营权、分配权、投资权、再生产权等回归了其所有者，则构成了当今中国经济生龙活虎的

局面，并必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基调发展。

这些事实，比雄辩、说教等简捷、朴素了许多。它们充分说明一个真理：提高人的素质和富

裕是件简单事，人民有多少人权，便有多高素质，便能收获多少富裕。现在，乡镇企业面临

的发展困境，是已经得到改革的体制又不适应新发展境界的困境。只有进一步推进政治制度

改革，减少政治负担、机构伸手、官僚权限，使责权利在更宽阔的自由、民主的人权道路上，能在更长久的时期内，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克服乡镇企业的短期效应，才能使它继续辉煌。

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得到了最多的贷款、用工等支持，为什么一直是老大难？因为它在政

治方面受统治、统制、压迫最深，承担的政权费用等负担最重。名为“国家与人民拥有”的

国有企业，由于党政不分，而且党高于政、高于一切，最后是皇帝高于党，高于一切，它们

实质是官府企业、官商企业、党有企业，甚至皇帝企业，一把手企业。

它们的最大特征不是其产品、市场占有率、科技含量、税收、提供就业等情况，而是它们属

于什么部委、省市、地县、区街居委会、村社等，是什么行政级别，上级是谁。它们和乡镇

企业并不是一上一下的跷跷板关系，他们应该是在市场力量作用下相互渗透、互为依托的发

展关系。但为什么一些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纷纷败阵于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

原因固然很多，但基本原因是乡镇企业等先进灵活的自由民主经济体制，打败了国有企业落

后僵化、且容易使内部产生腐败的独裁专制计划经济体制。

中央集权，三个代表、总代表。权力有原罪，如不分其势，则难以防范其滥用、作恶。它最

危险的劣迹必定是侵犯自由，破坏其他人、团体与事物的权利，如人权、政党权、自然权（包

括生态环境等）。核心与党不分的恶果是党组织与全体党员没有自由，党国不分的恶果是国家

没有自由、全体国民没有自由，党政不分的恶果是各级人大与政府没有自由，党企不分的恶

果是企业没有自由。企业与人一样，没有自由，则必受禁锢，是难以发展的。一个封建关系

的人，怎么比自由人更幸福？一个封建生产关系的企业，怎么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企业媲

美，更有发展？

回首国企改革，从1978年至1983年的放权让利，1983年至1987年的利改税，1987年至1992

年的经营承包，1992年至1995年的转机建制，到1995年至今的整体搞活，包括三年脱困，

几乎是每改每糟，越改越破产，越改下岗职工越多。其关键在于国企很无奈，它们由党政官

本位把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坚定、最彻底、最不动摇。而且六四以来，党政官本位统治

体系不仅维持了原状，还普遍有所加强。

官方舆论常误导人民说：国企难搞，难在负担重，如企业办社会，退休工人多、医疗、失业保险等多。他们就是不敢昭示天下，政企不分和党政官本位高于一切是国企机制不灵活的最大僵化物，是最重的负担，是最大的发展障碍。而政企不分的病根在于党国不分和党高于国家、核心高于党。官本位是需要其掌管的下级或奴仆创造的金钱和物质支撑的。如一是国企内部的官本位自吃，二是国企外部来自官本位的摊派。这还不包括报销旅游费、嫖娼费、吃喝费、装修费、子女入学赞助费、养情人、巴结上级、转移国有资产办个人企业等等腐败费用在内。

国企，常常被称作一党独裁专制统治政权的命脉。其实，它们更是官本位自家的儿子、孙子（正如统治者既妄称自己的人民的父母官，又谦恭人民为衣食父母）。国企更是官本位的帐房先生和金库，用起来十分方便。经理不听使唤，就换人。哪个国企胆敢不听使唤，我就一直换下去。与其说国企是听话的大儿子，不如说它必须听话的孙子。中国财经界流行“宰熟”一词，党政官本位无疑是“宰熟”高手，“党宰、官宰”都冲亲戚邻居关系近、朋友同事关系熟的国企等下手，对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当然要小心着点。所以当党政官本位要与企业交朋友，以神的面目驱鬼辟邪，为你护航。你可得小心，你怎敢不敬神、不供奉神？而且请神容易送神难。国企是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就是人民财产。但独裁专制党官本位高高在上，如同封建家国的君臣、父子关系，它是党国下必须听话的儿子，而只能享有少得可怜的企业权。这被剥夺的企业权因其公有性质而就是被剥夺的人民人权。人权在中国不受重视、保障，企业家不拥有完整的人事权、经营权、管理权、决策权等人权，企业权也必定难保，中国经济也够餓。人们常说“国企外部环境不好”，实质就是指党政官本位对其的独裁专制统治不好。这也是全中国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不好与恶化的根源。一些外资企业常常要享受“国民待遇”，这种待遇（负担）它们承受得了吗？而中国企业一旦与国际接轨，不承担这些党政负担与欺压，谁说它们不能优胜于国际市场竞争。

如果国企仍然不享有自由，是党企、官企，党政仍然是国企 的厉害婆婆，国企改革不走出遭独裁专制统治的噩梦模式，不走进尊重人民财产迁徙等主权的社会公众所有制（所谓私有制），如果社会政治经济等体制仍然只利于官本位私有利益而损于公众，那国企改革将注定继续不成功，中国经济也难以真正成功。

（4）企业不是党和政府的儿子，不是党政机关的下级，企业人员不是机关干部的下等人。中国各类企业的出路在于不被独裁专制，在于尊重企业家人权，让他们的高才能获得高收益，不尊重企业家的经济是没有希望的经济。鲁迅说中国社会吃人，它更吃企业。吃企业家。国有企业这难那难，就是因为它们实质是党管党有企业，它们被“两手抓”抓得最凶。它们内部有一个凌驾一切之上的非生产性的太上皇累赘：即禁锢人民的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政组织系统。他们管人的灵魂，也管生产的灵魂。他们不生产，却要保证什么生产方向对头；他们不科研，不生产劳动，却要保证一切成果用于巩固一党独裁专制；他们可以随时督察、干预、停止一切生产活动。而被他们视为灵魂的生产方向是什么呢？根本不是什么共产主义信念，而是“稳定”，利于“稳定”一党独裁专制，利于“稳定”官本位特权。这与固守大宋、大元、大明、大清、蒋介石国民党等皇家王朝利益没有什么两样。

什么时候，政党、政府等社会一切机构及其官员反仆为主，能死掐企业，死掐企业家，死掐人民，能对社会一切经济活动享有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干预，能对企业 and 企业家吆三喝四，中国经济就走背字。

什么时候，党政官员降尊纡贵，成为纳税人的真正公仆，企业家等中国人民拥有自由民主的人权资本，社会地位显赫于党政官员，中国企业就能发展壮大，进入世界500强，中国经济就能腾飞，那时中国就是21世纪的主人。储时健等企业家的悲哀，是独裁专制体制不尊重企业家的经济悲哀，是中国企业难以做大的悲哀，也是“实业救国者”的悲哀。自鸦片战争以降，无数中国仁人志士厌弃独裁专制政治，又无力改变，只好纷纷走上“实业救国”道路。早年张东荪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

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还有人说，“实业

盛则国势盛，实业有进步则国势有进步，实业甲全球则国势甲全球。”

但是，至少张东荪以后的历史表明，由于独裁专制是政权即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实业不过是

孙子，它救中国的能力十分有限。“实业”从来无法单独保障人权，也没有救中国，甚至自身

难保。它们或者被独裁专制借用了、“公有”了，或者被管死了，被腐败掉了，被挤出国门了，

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本被迫出逃找“绿卡”了。独裁专制下，“实业”宛如官本位之孙子，

如宦海中的泥菩萨，自身难保，岂能救国。只有民主制度解放了“实业”，“实业”才能富国

强民。只要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是社会总管，管企业、管企业家，插手一切经济活动，任何

实业都是做不大、做不好的，更难以甲全球。许多仁人志士们常常“出师未捷身先死”，救国

不成，反被敲诈、政治诬陷，或者被“逼良为娼”而行贿，“身先死”于把持国家的一人一党

独裁专制制度。或者迫于四项凡是迷信及其苛政猛于虎的压力，如企业的多头管理、多头

收费，不敢把企业做大，或者稍有起色即慌忙抽逃资金，移民海外。或者不敢把资金用于扩

大再生产，任其沉淀在保险柜、地窖里，荒废在大吃大喝、修坟、洗浴按摩、包二奶里，等

等。

中国实业的唯一祸根是独裁专制制度，它比黑社会还厉害，不讲义气。黑社会讲究“拿人钱

财，与人消灾”，它却常常收了钱也不办事，收了税也不给纳税人办事。也许，独裁专制社会

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黑社会，它“黑”企业与经济，“黑”文化教育体育，“黑”言论信仰，

“黑”人民的自由民主，“黑”人权，无所不黑。中国必须走制度救国的道路，自由救国，民

主救国，人权救国！

六四后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企业家的重灾期，名将纷纷落马，或下台，或被出丑，或

进监狱，或被迫隐退，或被迫出国。同时，党组、党委、纪检委、组织部、宣传部门等“党

字号”即皇字号系统却几乎从来没有腐败、不出差错、没有职务犯罪、渎职等。但仅只一个

储时健，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多少党政官员的总和？为什么各行各业在一线“扛活”

的中国人总是容易倒霉，而在二线督政的“党字号”系统总是成绩优异呢？谁贡献大，谁能干，谁倒霉，这是独裁专制下的中国国情？赵紫阳等八十年代的果实还有人在摘取，在享受，他不是还在倒霉吗？倒霉了的企业家几乎有同样的摆不上台面的罪状：目中无人，藐视党委等党字号体系。他们是市场经济高手，但难逃独裁专制政治黑幕。如果他们长于独裁专制黑箱政治操作，几乎也绝对不能成为市场经济高手。这决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个人因素所至，而是一党专政的独裁专制“吃人”社会所至，至少是因为企业家按劳分配的正当经济人权没有得到体现，按能力分配的政治人权没有得到保障。官本位的一党专制社会里，企业家是难以有所作为的，有作为之日即是倒霉之时。好象只有鲁冠球硕果仅存了，你要多多保重！

（5）我们需要民主制度保护市场经济，保护个人奋斗的成果与社会公正。虽然民主制度不是最好、万能的，但至少它目前最能防止腐败、打击腐败，更能尊重人权，更能解放、发展生产力，更能造福人民。诚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列宁则说：“俄国工人阶级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而是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中国统治者，不要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干独裁专制的勾当。邓小平以人为本，全力打破独裁专制计划经济体制，他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些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如以联产承包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实质是邓小平领导的一次自上而下的中国农民起义，使农民在“耕者有其田，自主分配劳动成果”中真正拥有土地、拥有劳动成果，从而焕发出了努力向上的积极进取的主人精神。而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最终出路也在于私有化，在于变党有、官有为民有，在于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实质就是退公还私，减官增民，少党多民，就是打破独裁专制权力经济体制，打破部门、行业、地区、级别等封建壁垒，引进民间与外资力量，

让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流动自由，组合自由，生产自由，销售自由，使用自由、利润支配自由等，走向以自由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现在，中国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深刻变化，多元利益主体的市场经济格局已经形成。这自由的市场经济呼唤自由的市场政治，即民主政治，也即政治由自由主导，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力。正如捧着自由选择商品，他自由填写选票，立法、选择执政党、执政者、选择头头脑脑，并随时可质询、弹劾、罢免他们。

可见，经济权利直接铺设了实现政治权利的轨道，是政治权利的先驱，多元化经济必定催生独裁专制一元化一党独裁专制的反面——多元化政治，并最终“建立一个人民有权选择谁统治他们以及如何统治他们的自由世界”（尼克松语）。

虽然发生了六四镇压，但邓小平的一些政治改革思想还是不可抹杀的。改革开放之初，亦即他取得最高权力之初，他身体力行，竭力反对权力过于集中到个人身上。他认为这是我国党政领导体制中的传统弊病。他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

他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来说，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

他批评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他认为，“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他警告，“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他曾经说，出气应该允许，出气是没有民主的惩罚。有了正常民主，大字报也可少。要建立

民主制度，支持新生力量。思想领域的问题，要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来解决。他还在第四次

全国文代会上提出了“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

本来，中国有着非常好的政治改革势头。李维汉1980年5月24日上午约拜邓小平时

指出：“文革”等暴露了封建主义传统，是用封建主义去反对所谓资本主义、走资派、党内走

资派，采取的方法是封建法西斯专政……很多人搞一言堂、家长制……还有个人崇拜，造神

等。这实质上是搞独裁专制。

邓小平插话说，不是一两个人在里头，而是一个社会基础，包括党内党外的基础。

李维汉还讲，我们对封建主义清算不够、不彻底，如果不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问题，不彻

底清算，那组织上和制度上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

同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的重要报告，并用第三、第四两个部分对封建主义思想影响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充分的论

述，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和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的历史性任务。

以后，中共

中央又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肃清封建遗毒问题作了表述，如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并从制度上、组织上作了相应规

定。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六四以后，针对独裁专制的这些改革搁浅了，停止了，甚至一度倒退

了。一党独裁专制使中国各地各单位一言堂盛行，人民共和国继续是“一党国，一言国，一

人国”。封建家法规矩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如今的中国是“国人12亿，主事一党一

人一把手”。对国家政治生活来讲，这是从瞄准总病根回到了封闭加强总病根，从攻坚战变成

了维护防卫战。九十年代，把本来要取消的企业党委、支部等又加强了。强调在经济与社会

多元化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即政治一元化。具体措施是力争在所有经济领域，所有

空白点、死角，如外资企业、个体摊群、临时工作组等，建立党组织，加强领导控制，巩固

独裁者个人权力。这些不是借经济多元化积极推行政治多元化改革，还权于民，而是倒行逆

施。它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纪神权恐惧商业和印刷等新技术，当代独裁专制者们也恐惧经济多

元化和因特网等新技术。他们需要发展经济和采用新技术，他们同时又极力避免、扼杀由此带来的新思维新思想和人权解放。

迄今，中国社会遭受独裁专制统治，仍有两个特征。一是中央集权化、极权化、总体化、一元化，国家和社会没有分化，包括政企不分、政社不分、党政不分、党国不分。一个党政巨人包揽一切，社会自由受到了极大侵害，个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乃至临时活动组织必定难以摆脱对党政权力、大小核心一把手权力的依附。二是原子化，国家消除了民间各种有形无形的自发组织，每个个人、单位、机构、地区、行业、事务等层层呈直线直接面对上级、国家。虽然天下归一，万众归一，都向中央集权及其一个核心表示了忠诚而得以生存、发展，但整个社会也被独裁专制统治制度治理得条块分割，彼此独立，象一盘散沙，难以集结成为一个真正利益共同体（如人权）的整体力量。

现在，极权化、总体化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正处于强化态势，朝邓小平反对的一元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子化则没有太大变化，各人民团体、民间组织与个人对社会的捐款行善、义务劳动、救援救灾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人民没有言论、结社、信仰、财产等自由，只能是“行政巨人”的被动接受者，或者受害者。

清代，一切由旗人管着。现在，一党管一切，党委书记管企业家，或者变个董事长的身份管企业家，都是糟蹋社会、人民、企业、经济 and 国家的，都是一党专制的政治一元化的对社会进步的违背，是注定行不通的。

（6）一些学者总结中国说：“中国传统文化确有严重的缺陷。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学，不重视生产技术，不鼓励学术自由。政治专制、思想僵化，实是中国落后的基本原因”。

古代灿烂中国文化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于创造能力的民族，但独裁的意识形态始终不把“创造”列为社会基本价值，并极力排斥，把它视为异端的思想派别。不但国民精神受到压抑，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严重阻挠。单看当今时代的电视屏幕，几个皇帝，几个皇妃与公主等人物，轮番占领频道，而祖冲之、蒯祥、李时珍等几被遗忘，民族的民主英雄更是坐

在冷板凳上蒙受独裁撒落的灰尘。这些对社会非常有害，它严重压抑了人民的创造力。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的价值目标、

共同理想、思维法则和文化规范的最高体现，且与时代精神休戚相关。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

着手，在民族精神中恢复、注入民主意识。政治制度是社会第一生产关系，民主政治制度是

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生产关系。改革，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说到底

是解放人，为人松绑，释放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是冷藏独裁专制，尊崇人民民主。不革除

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我国的经济改革很难走向最后成功，人民将会因此承受更多更重的

灾难。

按照“三步走”的百年建国方略，中国将在21世纪前期，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一个富

强、民主、文明的中国。这就是说，经济上富强——政治上民主——精神上文明，是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果如此，则可结束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

“农业自然经济——封建专制政治——封建蒙昧文化”的独裁的封建主义三位一体，真正建

立“市场经济——民主民主——科学”三结合的社会发展政治体制，此乃民族、国家、人民

之大幸。

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政治民主”放在第一位考虑，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人权问题的基础，

而人权正是第一生产力。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证，否则被独裁掏空

的国民财富与被专制压抑的国民精神将使人权等精神文明没有可供着陆的土地。当今独裁专制当局推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际上是清朝末年顽固派人士

应变资本主义

风起云涌的“中为体，西为用”的变体，即大清政权不变，大清的独裁专制统治基础和结构

不变，并且是纲，是主体。运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引进新的生产（注意：不是政治

的）管理方法，只是为了巩固独裁专制政治制度，巩固皇权，巩固家天下。显然，现在则是

巩固个人独裁权威，巩固一党天下，巩固一党专制政治制度。

但是，政治制度又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韩非子》云：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则不两成。

仔细看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资本主义先进的物质文明并必将导向个人自由的

生产方式——自由的市场经济，一手抓与一切自由背道而驰的政治独裁专制体制。这些，实际上是左手固守独裁专制体制，右手抓经济的改革开放，结果两难成。经济成果一是会受到左手遏制，二是会被左手的官僚体制吃掉，愈演愈烈的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腐败现象已经表明了此点，三是经由腐败吞噬的经济成果，除了以消费形式刺激生产外，由于害怕法律制裁，它们往往积淀于银行帐户、瓦罐、棉被、鞋底、烟道里，或者逃至海外，很少能投入社会再生产。而独裁专制统治，最终将在毁损人权中遭受改朝换代。

除了物质文明，我国为什么不能正确对待、学习资本主义组成国家、政府的政治文明理念与方式、成果呢？的确，列宁说过“充当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掘墓人”的话，但他的原话是“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掘墓人、后继人和继承人。”虽然前苏联的崩溃是及其复杂的历史现象，但其实质原因恐怕与只当了掘墓人难脱干系，致使独裁专制盛行，腐败滔天。为什么偏偏抛弃“后继人和继承人”的历史使命呢？

现在，虽然我国不自做老大，不扛旗子充当掘墓人的角色，但也一直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的人权道路”，“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暴”，“反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等自欺欺人的口号，拒绝担当“后继人和继承人”的角色。

正象蒸汽机、工业革命等发端于英国而不姓英一样，科学技术、生产管理、市场经济等物质文明是人类历史共同积累的文明成果，不姓资，也不姓社，而姓人类。“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反映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是迫使一切要继续生存的民族和国家必须采纳的人民主权的委托方式。它姓人类，都可以用，且不用不仅不利于自己，还会偏离人类进步大道，对世界和平人权事业构成威胁。

譬如，资本主义以人民主权为导向的三权分离，以人民自由民主为基础的选举制，任期制，远远高明于封建独裁专制的世袭制、终身制，远远高明于我国现行的干部考察制、任命制、接班人制、等额选举制，非党员不能担任重要国家职务制等等。因为权力制衡原则是禅让、

公推、暴力、政变、选举、自由选举等人类数千年政治生活实践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人类

社会目前还没有发现比以人民主权为导向的更好更有效更文明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

六四镇压是中国人民之痛，是中华民族之灾难。古人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当今之

中国人民之痛，在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治制度扼杀自由民主，不通向人权。目标宏伟起步

难。议人易，议事易，束己难。独裁易，民主难。六四，就在第二代领导核心任内发生。六

四，就发生在总设计师头脑十分清醒的年代。难呐，民主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而跨过这一

步，敢于革自己的命，就是最伟大！当今时代，我们不禁又要重复称颂两位毅然对自己革命

的大写的人：

戈尔巴乔夫，德克勒克！

德克勒克，戈尔巴乔夫！

这是两个流光溢彩的名字！这是两个人类历史之所幸运的名字！可是，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

创导的公开性、新思维等，国内六四镇压新权贵们，平暴既得利益者们因相形见拙而颇有微

词，认为他应该对苏共覆灭负主要责任。

其实，伟人从来不曾左右历史，他们只是在恰当的时候推动、顺应了历史。苏共一党独裁专

制政权垮台是历史必然。中国人民大学有教授分析认为，苏共及其主要负责人斯大林从二十

年代起，就推行极权主义的国家政治体制，其要害是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

定接班人制，党政不分制，干部等级授职制和党政官僚特权制。

我们认为，这六制使人民国家政权带有明显的专制君主色彩，背离了民主共和。

同时，苏联

在党的生存、活动与领导模式上也搞了六制：总书记个人集权制，总书记终身职务制，总书

记指定接班人制，政治局中心权力制，监委会隶属制和取缔党内不同政见制。

这六制也使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因缺乏党内民主而走样变形，“各个党组织无条件服从中

央，全党服从一个人”，致使党成为个人独裁专制的工具，使党因为个人而蒙上了扼杀党内外

民主的专制主义政党的尘垢。正是独裁专制制度的尘垢堆积成山，蓄成不可阻挡的雷霆万钧

之历史潮流，使前苏联和苏共一夜之间失去政权，而人民与世界则大快人心。

如今，毛主席已去，邓小平总设计师已去，两位未能完成民主伟业的反封建斗士已去。他们

在世时，都明白民主对国民、对国家的重要性，但他们各自的四大与四项都没能实现其理想。

而1989年席卷全国的人权运动很大程度上源自经济多元化改革，伟人本来只需轻轻一推

既可大功告成。

然而六四镇压却鬼使神差出动了，它把中国独裁专制历史推上了耻辱的新高峰。

中国民主事

业的遗憾正在这里。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哪方英雄豪杰，无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国产的，

洋产的，中外嫁接产的，由于拒绝引进科学的民主制度，盲目搞什么特色，最终归于失败。

孙中山先生虽然留下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遗训，但刘邦的“非刘姓封王者，

天下共击之”一人一姓一家族一党独裁专制仍然是中国的现实。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后，

出现了袁世凯复辟帝制；赶走了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后，又有了共产党一人一党独

裁专制政权。它们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就是帝制！致使民国无公民，共和国无共和，国人一

直处于臣民、私民、党民、井田民、单位民等奴民状态。

没有民主制度，一些个人个党总是有机会视中国为一人一党之帝国，视天下公有财产为一

党之私产，视中国公民为为一党之党民、私民、臣民、王民、皇民、群众。一些掌握国家

机器的独裁专制者们每每能有效防范、打退“天下共击之”的人民。

1989年6月4日2时许，我们盘踞天安门广场，看到了中南海续接大陆国民党总统府、

满清紫禁城，正诬骗共和国长城，把中国独裁专制统治历史推向新耻辱、新高峰。

5、人权是第一生产力，和平民主救中国

推翻老爷，不是自己做老爷；立志推翻满清王朝，不是使“太平天国”成为统治人民的新王

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赶走国民党“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一人一党

独裁专制，不是自己搞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资本主义，不是变

换词语的文字游戏，搞成全封建，搞成人民仍然一无所有的什么公有制、官有制、党有制。

正如热衷于修筑各类统治长城一样，统治者往往发明很多原则固守其统治地位。

秦代有“焚

书坑儒”原则，汉代有“非刘姓为王者，天下共击之”原则，明清有“禁海，禁党，文字狱”

与“祖宗之法不可变”原则，太平天国有“非洪姓不封王”原则，国民党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党禁，剿匪”原则。共产党执政以来，毛泽东时代有“反右，阶级斗争”原则，邓小平时代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原则，充满血腥的江泽民及其六四当局有“稳定核心最重要，三讲，反腐败反异己，打击非法组织与邪教”原则。

50年来，他们的共同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一个领导集体，一个核心”和“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原则。2000多年，所有原则的共同特点便是“惟我独尊，保持一致，江山传万代”。它们的载体与执行者是官本位体系，手段是持续发动的针对人民的冷战与热战。这些原则象一个硕大的黑盖子，黑暗了中国。它们黑自由，黑民主，黑人权。它们吃人权放眼当今世界，是四项阻碍了四化，是三讲耽误了翻三番，是“两手抓”僵化了中国，是一党独裁专制滞缓了中华文明。

国家利益至上，集体主义很好。但是，国家、集体，这些个人的幸福屏障，多少次沦为少数个人特权剥夺大多数个人人权的工具。如果不是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至上，如果保障个人人权不是其他社会事业（如集体人权）等的前提，而且家国党国，“朕即国家”，那么国家利益与集体主义便真正沦为极端个人主义的工具了。它们暗渡陈仓，帮助绝对少数之皇帝、核心等党政官本位之个人人权，吞噬绝对多数之大众之个人人权。

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民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可怕的是个人财产得不到民主与法治的保护，可怕的是多数人个人财富随时可以因“公有、集体”等名义而遭一个党、少数人任意支配。几乎所有贫穷都是特权欺凌人权的恶果。

有人说中国太穷，底子薄，民主进程不能太快，应该先建设，后民主。我们说这是糊涂。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相对欠缺，但官本位体系及其权力无边与所谓五花八门的管理则绝对过剩。贫穷不是经济问题，它是政策问题，政治问题，制度问题。难道中国的自然资源等底子，比明治维新迄今的日本还薄吗？不要忘记，德国和日本都是在二战废墟上由自由民主导航，走向繁荣的。中国底子薄，薄在哪里？薄在制度，薄在一党独裁专制无处不在，薄在四项

凡是迷信盛行，薄在自由民主少得可怜，薄在人大政协等只是虚假民主，薄在统治特权薄待人权。

有人说中国科技落后。但四大发明不落后吧，可独裁专制桎梏下，它们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由于科技天命改善人权，而独裁专制则保守特权。它们得不到尊重，无法用于提高生产力，

推动产业革命，改善人权。它们被迫依据价值规律参与国际大循环，等到出口转内销时，我

们则被自己的发明打败了：指南针引导商船、军舰肆行于海岸江河；火药帮着洋枪洋炮使我

们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陷入深渊；印刷术繁衍的传媒业、大片、网络业、IT业等，则使

我们象小学生那样亦步亦趋地学习。

有人说“中国最大的落后是思想观念落后”。不对！落后的只是执政者或统治者、当局者

等的独裁专制观念落后。不是中国人民封建意识浓厚，而是受当权者的封建意识形态压迫太

深。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认为被独裁专制比拥有自由民主好！从来不认为特权高于人权好！也

从来没有停止为自由民主而战！为人权而战！

还有人说中国人素质太低，不争气，不关心政治、人权，搞不起民主。这也是糊涂。即使最

富裕的奴隶，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比最贫穷的自由人幸福！中国第一大党报《人民日报》的公

费、强迫订阅，也敌不过《参考消息》、《南方周末》等的自然、自费订阅，这说明中国人民

不关系政治吗？仅只民主在台湾、香港、澳门的成功，仅只5000万海外华人的业绩，就

足以说明中国人的素质了。虽然物质是人们“有素质”的基础，富人几乎都被说成是素质高

的，但近代以来的富裕国家几乎都是人民主权立法选举政府、聘任总统的民主国家。而在贫

富悬殊的穷国中，如果说富人都有富的理由，但穷人显然没有穷的理由。不是“欲维新我国，

当先维新我民”，而是“人权维新国民，国民维新国家”。

不要装糊涂，人的素质问题是政治问题，自由民主和人权本身是一个人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是第一生产要素，解放人的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曾经是这样的第一生产力，它们解除

人民于沉重的劳动。但比较起来，自由民主与人权更能解放人，使人独立思考、自由思想、

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行动、自由创造、自由创新等，它们更是第一生产力。时代不同

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是“器变道不变，两手抓”的延续，自由民主才是第一生产

力！人权是第一生产力！保障人权的主权在民之民主政治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认为，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但综合国力不是统治者可以制造多少长城，拥有多少

各种各样的长城，而是人民与全社会拥有多少自由、民主与人权。可以说，综合国力不能以

点与线表示，也不能以面积表示，它应该以体积表示。

一国的综合国力，等于：长 \times 宽 \times 高。

长是每个人享有的自由程度的加权平均数，宽是民主的社会普及程度，高是人权受到保障的

力度与实现程度。它们的积服从体积最大定律或者木桶效应。长、宽、高总值一定的条件下，

只有当三个参数协调一致，并尽可能差别小、趋同时，其打造的体积空间才会尽可能大。如

前苏联，虽然拥有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与武器库长城，但缺乏自由民主与人权保障，它一夜

之间失落于超级大国地位。这不是“卫星上了天，红旗落了地”造成的，而是“卫星上了天，

人权落了地”的恶果。

物质基础不是综合国力强弱的最重要因素，自由民主与人权才是。它们使自然资源贫瘠的日

本成为强国，很多自然资源丰富而人权保障贫瘠的地区，却是饱受贫穷磨难。长城宽宽的，

高高的，厚厚的，各类长城多多的，那不是综合国力。长城以内的人权才是。不改弦易辙，

不革旧请新，不强自由民主而强人权，不强人权而强国，什么可以保证大陆当局不使中国步

前苏联之后尘？什么可以保证中国大陆人民免遭前苏联人民之苦难？

生产力问题，综合国力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它是政治问题！发展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

它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是人权问题！

2000年初，中国科学院曾经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中国若要在21世纪实现可持续

发展战略目标，则必须依次实现三大“零增长”。即：2030年实现人口数量零增长，20

40年实现能源和资源消耗速率零增长，2050年实现生态环境退化速率零增长。这三个

零增长很好！但是，仅有这三个技术速率的零增长是不够的。中国还必须摆脱四项三讲等的

干扰，实现自由正增长，民主正增长，人权正增长，直到确立人民主权立法的人权政治制度。

我们都熟悉《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真理：“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

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我们还熟悉一种说法：“从

17世纪40年代到1911年，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彻底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

使中国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地坠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现在，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创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力。如此看来，究竟谁是先

进生产力的代表呢？谁是“三个代表”？其实，“工业革命”不只是新材料、零件组合与机

器的革命，它是人的革命，是人民对统治人民者的革命，它从起始到终极目的都是人权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富人的革命，社会因为这个革命而产生更多的富人；它本质上是生产并

保护更多富人的革命，是使人人有机会成为富人的革命，即它是减少穷人而产生更多富人的

革命，是人民对握有独裁专制统治权者的革命。

一句话，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哪个单个阶级的革命，是全体公民革除独裁专制制度，不做私民、

臣民、党民的革命，是人民自由民主革命，是人类人权革命！

20世纪初，有人断言中国比西方落后两个世纪；20世纪末，有人断言“中国落后于西方

至少500年”，还有人说中国的发展在于“稳定”。天哪，稳定500年的落后差距，足以导

致亡国、灭族。这些都是不科学的断言。时段长短不是不可逾越，我们需要稳定，但不是稳

定独裁专制体制不被民主取代的停滞不前的稳定，更不是巩固它和滋生腐败的稳定，而是跨

越、前进中的稳定，是“抛弃独裁专制，建立自由民主中国”的稳定。罢工、罢课、罢市、

罢农、罢军训等造成的损失，远远小于官本位腐败、首长意志决策、意识形态教育等对综合

国力的损害。

历史已经表明，每当独裁专制威权不断增长，达到“空前稳定”的时候，也是中国危机四伏，

国势走向衰微、民族日趋屈辱的时候。康乾盛世后如此，清末中兴后如此，蒋介石国民党独

裁专制一统中国后如此，稳定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民族代价也是如此。

不要听任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及其代表人物之“稳定”。家国、党国、核心国，也许，我们唯一

的落后在于它们的稳定，在于“稳定落后”。破除四项，才能解放思想；清除三讲，才能实事

求是；破除稳定落后，才能稳定发展。

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流行“减负”。这个新词很好！国计民生，千头万绪。轻徭薄赋，

农民减负，学生减负，警察减负，部队减负，企业减负，城镇减负，经济减负，文化减负，
体育减负，社会减负，制度减负，自由减负，民主减负，全党减三讲之负担，人民人权减负
等一切减负，中国轻装前进，必须剪除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及其官本位至上之负担，必须让“四
项、三讲”等丑名昭著，必须从主动放弃或铲除独裁专制统治制度这个源头开始，它才是中
华民族与文明、一个中国”等的总负担。
贫穷不可怕，可怕在限制致富，而官本位最富；贫富不均不可怕，可怕在官本位最富；失学、
失业不可怕，可怕在官本位无限膨胀；缺少创造不可怕，可怕在创造流失、人才流失；学生
考低分不可怕，可怕在政治考分至上；不自由不可怕，可怕在统治者官本位为所欲为；落后
不可怕，可怕在奖励落后；挨打不可怕，可怕在统治者招惹挨打，可怕在无力还手，可怕由
人民承受；官员不可怕，可怕在官本位至上，权力原罪泛滥；腐败者不可怕，可怕在制度性
制造腐败，可怕在源头性腐败引导上行下效；多元化、多样化不可怕，可怕在一元化、保持
一致；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不可怕，可怕在它们成全了家天下、党天下；大众
私有制不可怕，社会主义公有制也不可怕，可怕在以公有制搞党有制、官有制等真正的私有
制；国家机器不可怕，可怕在统治者指挥国家机器；两手抓不可怕，可怕在一手发展自由民
主经济，一手保守独裁专制政治；牺牲不可怕，可怕在宁愿牺牲人民人权，也要保守统治特
权；人治德政不可怕，可怕在没有民主制度监督执政者必须仁治德政；危机与存亡关头不可
怕，可怕在仍然压制自由民主，坚持一党制、终身制、核心制、一元化、极权化、中央集权
化等等独裁专制统治。
事实上，科技兴国、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等所有的尝试都收效不大，它们都受到了政治制度
限制。千新万新，要制度创新。我们唯一没做而必须做的是：制度创新，即废除一人一党独
裁专制政治体制这个中国社会总病根，由独裁专制走向自由民主！
历史已经凝固，从现实做起！从创新体制开始！中国的进步，不需要暴力、动乱与战争，需
要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和司法独立等项下的平等、和平、民主的自由投票竞选！
不要战争

与阶级斗争，要和平竞选！中国人民，一切有良知的党员人民，各阶层中国人民，人民民主
共和国，就是主权在民主政，就是人民民主主政！民主，没有专门富人的民主，也没有专门
穷人的民主，没有钱贵或富贵的民主，更没有专门的人贵、族贵、姓贵、党贵、权贵的民主，
它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天赋平等的人民民主！
民主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争取自由民主，不是推翻他人独裁
专制，而自己独裁专制。剔除他人特权，不是为了自己享有特权！人权，是一切人平等的人
权！不要因为“阶级划分”而彼此敌视、斗争！不要喊“打倒谁谁”了，如同不要喊“打倒
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专政”，也不要喊“打倒4700万党徒”，不要喊“打倒无产阶级
专政”。阶级划分本来就是错误的，是挑动人民内斗、统治者坐收渔利的工具，我们不要重蹈
覆辙。况且，目前之中国，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无产阶级被专政？天下一家，党员也
好，非党员也好，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他们都是天赋人权遭统治特权剥夺者。他
们从来没有没有独裁专制统治他人，从来是一人一姓或者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及其党政官
本位在对全体人民推行专政和独裁专制统治。
不要被统治者“分而治之”花招眯了眼，也不要被其煽动的“爱国家，必须爱独裁专制制度
与政权”迷失了方向。
中国需要和解！让全军全民全民族全国和解，“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人权长城！”中国人
民最大的敌人不在长城以外，而在长城以内。我们共同的敌人不是任何人，它是独裁专制制
度，它是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制度。它们总是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它是三座大
山的总头子，学习孙中山、毛泽东主席等先进的中国人吧，继续搬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独
裁专制大山，使人民民主事业实现制度行可持续发展！
人民无法忘记六四，但必须“放眼未来”？我们必须“和解过去，放眼未来”。六四是暴
政，也是废墟，它更是火山口。让我们团结起来，续接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
次革命、五四运动、早期中国共产党革命、长征、抗日战争全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右
派、文革、民主墙、“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民主运动和法轮功等的民主

精神，开始中国全民和解的和平非暴力的自由民主之人权大进军，直到独裁专制制度崩溃，直到民主中国创立！

这个全民和解包括大陆与台港澳等中国各地区间和解，包括党政官本位体系与人民大众和解，包括人民与人民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和解，包括各民族和解，包括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和解，包括社会各阶层和解。这个大进军包括人大政协独立运作、军队中立国家化、公检法等国家机器人民主权化、各党派平等化、空校运动、企事业单位不合作。包括在很多重要的日子里（也许是长年累月）集中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天津东广场、青岛汇泉广场、上海人民广场、福州五一广场、杭州西湖、广州火车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碑、郑州二七罢工纪念碑、西安新城广场、延安宝塔山、太原五一广场、兰州东方红广场、拉萨八角街、成都人民广场、重庆新广场解放碑、南京鼓楼广场、武汉阅马场、长沙火车站、贵阳火车站、昆明机场、大连斯大林广场、沈阳省政府广场、长春一汽门口、哈尔滨太阳岛、等各地公共场所以去聚集，包括集中到中央国务院中南海、省委省政府大院、市委市政府大楼等各党政办公场所去围坐，包括罢工、罢农、罢运、罢飞、罢开车、罢科研、罢市、罢股票证券交易、罢商品流通资金划拨、罢网络运行、罢课、罢教、罢训、罢值勤、罢办公、罢会、罢唱、罢演艺、罢说话、罢新闻报道、罢写、罢拍、罢主持，包括集中上访、请愿、演讲、北上南下宣传团、游行、静坐、绝食，包括一切的对当今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及其政权的非暴力不合作！

中国的出路在于创新，在于演变、瓦解、崩溃一切独裁专制政治体制！中国的新生在于创新，在于确立人民主权立法的自由民主之政治制度！自由不可剥夺，民主天赋，人权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之最后希望之希望！

二、战争民主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1、党指挥枪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争、革命、改革；国民党、共产党；帝王、领袖、核心；一代核心，二代核心，三代核心。他们已成历史，民主中国都不曾创立。

我们还能期待第四代、第五代核心吗？

有人会说，1921年迄今，共产党内部组织体制一直未有大变化，它怎么会判若两党？它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就表明它那套是行之有效的，也能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强大的新中国。我们怎么能否定它的能力，机构组织有效性，正确性，三个代表性？

让我们先看看共产党的历史。

不难发现，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政党能象中国共产党那样饱受外界磨难、打击、围剿、制裁、孤立（无论取得政权前后），却最终走向成功。它第一次开代表大会，中途被外国巡捕打断，被迫转移开会地点。大量党员被军阀杀害，如李大钊等。正跟国民党团结合作，打击军阀，进行民主革命，合作者突然反目，宣布它为非法，并四处追捕、杀戮。它钻进山区，躲入城市，一次次被围杀，出卖，分裂，内乱，最后被迫流亡、长征。后来，它一边抗击外敌入侵，一边被友军从后边捅刀子；一边与人谈判，谋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一边被迫陷入内战。刚成立了政权，又被众多内外势力搞颠覆破坏，面临死于摇篮的威胁。受压迫越深，仇恨越大。仇恨与险恶下的生存本能，能使共产党人纪律严明、疾恶如仇，痛恨反对者，而且只有打倒对手才能坚持自己的正确。受压迫越深，越需要独裁专制铁腕来抵抗、求生。可怕可悲的是，这可能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与连锁反应。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保证秘密状态下的党组织战斗力，一度强调“厉行中央集权制”。¹

1922年，二大制定了第一个党章，要求党员服从组织，党的下级服从上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后来，这逐步演变成为中央服从政治局，政治局服从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会服从一个核心，是党组织与党国能够推行独裁专制制度的根源）。

1925年，四大《对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提出：在党内，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据学者研究，党组织对“集中”的解释主要是“限制”，而不是“集中多数人的意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遭受“四·一二”大屠杀等悲剧后，为了使党组织坚强一致、具有战斗力，1927年6月

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明确规定“党部的指导

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从此，它成为中国共产党党章明文规定的根本组织原则。本来，它的确

切含义应当是“先民主，把大多数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实施”，但绝大多数时候它成了推

行“一言堂”的工具。下级党组织、下级党员与全体党员的民主权力被剥夺殆尽。尽管这是

战时独裁专制，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但一旦成为执政党，并在和平时期延续它，却不转换

战争民主为和平民主，则必定会践踏公民（当然包括党员公民）的自由民主与人权。

三个多月以后，1927年9月29日，刚刚开始拥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著名的

“三湾改编”。它最早发生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出发点是党指挥枪。1928年5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毛泽东为部队设立政治部采取了过度性措施：

军级和团级

党委设立机关，兼负政治部职能。

1929年3月中旬，红四军在福建长汀开展改编，又将纵队（团）以上的党委机关改为同

级政治部。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决议》又强调了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是根本

原则。

“三湾改编”的精神实质与成果是“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

团以上建立党委，全军由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

党指挥枪。当时，在“枪指挥党、指挥一切”情况下，虽然它加强了军队的政治民主、军事

民主和经济民主，使军队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和战斗能力，并坚持了人民革命性（那时共

产党的民主性远远强于现在），但它逐渐演变成绝对了“党指挥枪”，则埋下党管一切、党高

于军队、党高于国家，和个人高于党、高于军队、高于国家的隐患，走向了反民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面临国民党围追堵截的险境，为解决集体讨

论作战部署不能适应军事形势变幻莫测的矛盾，中共中央恢复了“三人团”，即“三人军事小

组”。实质上，它是政治局常委会的上级。

1942年9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

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它指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

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就是迄今党政不分、以

党代政、党高于政，党管一切、党国不分、中国是党国、党高于国的根源。

1943年，中国共产党集权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未经全体党员

同意，几个人通过自己开会，出台了一项剥夺全体党员而扩大自己权力的决议：

《关于中央机

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它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

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

它还规定：“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

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问题，”

“新的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会议中的讨论的问题，

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这一成不变的规定演变到1975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毛泽东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

话都十分困难，中共中央根据他的意见，指定他的侄儿毛远新担任中共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

局之间的联络员。

可见，共产政治局、书记处往往是由一个人说了算的，即全体党员的民主权力集中于政治

局，然后集中于个人。毛泽东去世以后，虽有改革开放，但“两手抓”把“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等塞进了宪法，这从国家根本大法上规定了“党高于国家，高于政府，高于全体国民，

高于全民族，中央委员会高于全体党员，政治局高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高于政治局，

个人高于政治局常委”。这完全是一个反人民民主原则的政治组织结构。它使党国不分、个

人高于党、党高于国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达到了新颠峰。这个特定个人位于金字塔顶尖，

虽未加冕，但他不是皇帝，是什么？这不是“主权在王”的帝国政治结构，难道还是“主权

在民”的民主政治制度？

虽然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内外、中国内外，一直“有人、有‘集团’、有势力”

反对一人一

党独裁专制统治全党全国全民族全军，如陈毅的一大罪名曾经是“反对设立政治委员”，但党

内与政权或国内的政治组织制度等力量等总是不使他们处于上风，而且能轻而易举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或集团”。如当今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如宪法、人民代表大会等，能够限制一人对全党的独裁专制，能够制止一人一党对全国全民族的独裁专制，没有什么可以确保“党的内部组织必须符合民主原则，党组织及其领导人不得剥夺其党员的任何法定公民权利”。它们使得全体党员只能是党的决议、“最后决定之权”的被动接受者、领会者、贯彻落实者，不能参与、不能建议、不能修改、不能反对，党员决无党内民主权力可言，不同意见往往会受到不同目的的攻击、惩罚、组织处理。共产党员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党外“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等更是少得可怜。党的各级、各地、各单位领导人通过“党法”的形式赋予了绝对权力即独裁专制权力，个人专断能取代集体领导。他们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或者令人生畏，这是黑箱操作得以盛行的根源。在新中国里屡屡阻碍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等的“瞎指挥、封建长官意志”等，其实质是“一党独裁专制”意志。

从理论上讲，也许，中国民主事业要从改造中国共产党开始，中国人权事业要从保障中共党员的人权开始。堡垒要从内部攻克，共产党员先觉悟了，率先改造党内的独裁专制结构，在党内谋求党员的民主权利，然后再扩大到全社会，可能是一条不错的路子。不过，内部如果难以主动配合和平演变，中国的现实可能还是从外部开始，用人民自由民主解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一切人民之人权。

而再把中国共产党历史回放到共产国际大背景中，各国共产党在没有取得政权前都处于地下斗争、武装斗争时，强调集中亦即独裁专制无疑有其历史原因。如 1919 年第三国际成立时，它采取的即是所谓高度集中领导，这自然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 1935 年第三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对此做了重要改变，不久它还解散了，但其影响力是长久的。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这个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实质是便利了一人对全党全国实行独裁专制，相反说它在理论上还高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且埋怨苏共二十大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政治风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造成了巨大损失，那么不揭盖子、一直维持独裁专制黑箱操作原貌就能是巨大进步了？

2、战争民主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

（1）胜利者最有发言权。有人会说：共产党从弱到强，从山沟沟打败国民党，建立政权，
也没搞三权分离、多党制、司法独立等西方民主，还是一人说了算好，终身制好，一党制好，
民主集中制好，党的组织纪律原则好！
有人会说，能导向胜利，就证明正确、实用，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不就是靠着党内的独裁
专制模式发展、壮大、取得成功的吗？凭着它，艰难困苦战争时期能胜利，和平建设岂不
易如反掌。如今不搞西方那一套民主（注意：民主制度是科学，科学没有姓氏，不分东方、
西方，正如人就是人，人权就是人权，没有西方特有的人权，也，没有什么东方特色的人权），
共产党照样有能力使中国繁荣富强。
怎么看待独裁专制制度引导共产党赢得战争，走向胜利？战争时期，难道共产党不受内外民
主因子的影响吗？事实远非如此。与其说战争及战争独裁专制制度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
大陆，莫如说是战争民主使然。
这个特殊民主不同于和平民主，是“战时民主”，即“战争民主”！如何解释它？
战争本身是一个磁场，它同时存在两极。一极是战争制造了显性的战争独裁专制，
因为战争
要求“一切服从战争”，求生存、求胜利的压力使战争状态中的各方需要隐秘（黑箱操作）、
需要快速决断、需要权威。
另一极是战争铸造了隐性的战争民主，对阵就是权力分离，敌对者、对手就是反对党，民心、
舆论及其评判也是相对独立的。但由于“战争民主”无形、隐秘，不易察觉，常常是非主动
而被动运用的，而“战争独裁”则是主观运用，故“战争民主”的功劳通常被忽略，甚至误
被归功于“战争独裁”罢了。
具体来讲，战争对各方会从诸多方面产生一个强烈求生的“压力社会环境”，对处于弱势的中
国共产党尤其如此。如一是交战对手的压力，如国民党的压力。二是赢得非参战者的认同、
好感、支持与追随的压力，即国内民心和其他党派团体的压力。三是党内稳住阵脚的需要，

以民主作风减少离心力，以包容而非排斥实现党内团结，以“共存亡”产生一致对外的凝聚

力（这些并不妨碍秋后算帐）。四是中国已经不是封闭的中国，它是国际社会生活或者斗争中

的中国，有争取国际支持的需要。五是欲得天下者先得人心的需要。因为独裁专制乃排斥，

越排斥越小，而民主乃容，有容乃大。越包容，越得人心，越浩浩荡荡，越有王者相。

虽然战争民主是隐形的，不如和平民主那样显性可见，易于觉察，但它不是虚拟民主，它也

实实在在存在，并影响事态发展，个人个体兴衰，历史走向。战争压力相当于一套民主监督

机制，它强加给战争各方，敌对的一方类似于和平时期的在野党、反对党，各方必须面对、

周旋、接受，并在“战争民主”压力下自我约束、隐忍。行为做事，使自身内外均不敢轻易

犯错，内要凝聚（拉拢）、团结、官兵一致、领导者不搞特殊化，外要不留破绽、漏洞等。同

时，它使局外人、非参战者等持有更多自由观察、思考、比较、判断、选择的机会。

这个“压力社会环境”有诸多构成，其核心是包容、团结、求同存异、加强凝聚力、争取外

援与认同等。但为了战胜对手，取得最后胜利，各方内对同志，外对友人，均自觉或被迫采

取了开明态度。很多方面，这些与和平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舆论自

由等是相通、相同的。其实，有形的和平民主，那经费筹集、广告宣传、大选谋略、竞选纲

领、争取选民、论战、电视现场辩论、一轮又一轮的自由投票选举等又何尝不是战争。

俗话说，赛场如战场。如一场足球比赛，就是一场战争。表面上，你争我夺，拼命攻防，甚

至血染绿茵，是彼此力图以进球得分置对方于死地的残酷竞争。然而，民主存在于其中，它

演绎着战争民主，并受战争民主制约、导航。

比赛来临，可谓大敌当前。由于荣辱与共，面对比赛及其你胜我败的压力，各队内部均会抛

弃前嫌，群策群力，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摆出最佳阵容，迎战对手，争取胜利。而且，任何比赛，如同战争一样，都是公开进行的。各队虽然可以在赛前大肆密

谋策划，即

后台黑箱操作，乃至收买关键执法人员，搞黑哨假球（有事后曝光受罚的可能性）等，但正

式比赛中，各队必须如正人君子，公正廉洁等，不能搞歪门邪道、犯规，否则必遭惩罚。

各队及球员个人，除了依据实力自我奋斗，还懂得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他们会尽力树立良好形象，讨得观众欢心，赢得人心，获得呐喊、助威等支持，为赢得比赛做好外势。任何公开的比赛，都是在十分严密的多维立体监督下进行的。一维是裁判和比赛监督等执法者，二维是新闻媒体等社会舆论监督，三维是观众监督，四维是对手监督（参赛队各自享有申诉权、申辩权），五是足球、行业管理等组织及其官员的监督。六是兴奋剂检查等药检监督。七维是国际舆论等监督。八是公安警察、武警等治安监督。比赛越重要，监督者越多，越严密。

诸多监督不只对准比赛各方，更是可以连环监督、制约。如球员、球队可以抗议执法不公、球迷骚扰、舆论有偏向等；观众可以加油助威，还可以喝倒彩，也可以高呼“假球！黑哨！换裁判，某某某上”等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了诸般监督，即使收受了贿赂的裁判、球星，也不敢肆无忌惮地吹黑哨，踢假球。新闻记者更不可能搞不公正，乃至虚假的报道。观众也不敢违法干预比赛，搞人身攻击。足协组织则可以免费听到大量的不同意见，随时审视、检查、修正有关规定与政策。

而且，由于公开性与监督并存，除非违法，任何受到监督、建议、批评的一方，乃至受到反对、批评的，都不可能采取什么组织措施、歧视措施、内部处理一类的玩意儿给他人穿小鞋，更不可能明目张胆打击报复批评者。更不可能自以为是，以中心正统、神圣不可侵犯自居，因为任何人对一个足球俱乐部的竞争方式、总教练的排兵布阵与战术、总经理董事会主席用人，新闻导向、球员场内外表现、足协官员及其言行等持有不同意见，甚或给予批评、激烈反对，便给这些人罗织“反政府，反社会，反人民，反科学，反最高领导人，反民族，汉奸，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一类的罪名。

从策划比赛，到进行比赛、结束比赛，较之足协、俱乐部、教练、球员、保安部门等，观众与媒体是最远离决策中心的，他们几乎好象只是这一切的被动接受者。然而，正如政党执政、政府决策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他们的地位与监督却尤其突出。观众，除了掏钱捧场（买票就是对足球事业的投票）、观赏比赛，实际上也是监督者，更是评论者、参与者。而且由于电视

等媒体的普及，他们人数可以无限多，直到跨越国界、洲界。他们评选团，他们就是（球场）选民，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国会。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意见和建议，并可能从一场球引申到关于赛制、足协组织及其领导人等的评价。有时候，尽管不恰当，甚至违法，当对阵双方发生争执、不愉快事情时，一些观众会冲入场地，加入“战斗”。这些监督、评判几乎构成了民主政治的多个层面。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甚至不愿意看比赛的人本身也代表了一种态度。他们权力分离，（看比赛）角度迥异，但一个共同特征是使比赛更精彩，水平更高，更有经济与社会收益（包括购票观看比赛者，他们觉得值，便是收益），是进步、发展。他们组成了一个完善庞大的民主政治体系。总之，在社会大众等参与、监督下，比赛本身及比赛双方实际上活灵活现演绎了两党政治，形成了战争民主。它几乎囊括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所有要素：公开性、主权在民（观众是上帝）、权力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舆论自由等。事实上，体育界，尤其是足球界，可能是中国政坛和社会生活中最尊重民意、最具有民主精神的。如教练引咎辞职、球星高薪、球员转会、引进外援（包括外籍教练）等。球迷真的成了上帝，成了（足球场的）选民。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最没权力的人最没偏见，最公正，最有觉悟。有观众，有电视直播，有新闻监督，有战争民主，试图象政治局开会那样搞黑箱操作，象组织部门那样“暗撤或内定省长、市长”，没那么容易。同时，热战有战争民主，冷战也有战争民主。联合国的一大作用在于它是冷战时期的民主论坛。美苏两大阵营对峙时，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古巴、伊朗、伊拉克、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等，都是冷战战争民主的受益者，亦即都如通常表述的那样曾经是各种大小三角外交关系的受益者。以色列、埃及、约旦等也是如此。而国内，许多在官场中周旋或夹缝求生于不同派系的国人，或受益，或受害，应当对“领导相争，殃及或益及自身”是深有体会的。

（2）考证历史，虽然战争民主是个新鲜提法，但它有祖先。三足鼎立，三位一体，三生万物，是对战争民主的极佳注释。他们以三分三维形态，乃至多

分多维形态，互生互克，对立统一而存在，阐明了互相支撑（借势），互相倚靠（攻击），共

同存在、发展的道理，与三权分离、新闻舆论发展为社会第四力量等何等神似。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诸多三角、多角外交关系，也是战争民主的几个侧面表现形式。

中华先祖传有“敌戒”理论，意思是“敌对势力的存在”，如敌手、敌国、反对党、自然灾害

等，能使自己内部抛隐嫌隙、振奋精神、一致对外，取得胜利。创造假想敌、瞄准高水平竞

争对手等策略，也类似于“敌戒”，它们存在于官场、商界等。

细读《春秋战国》、《三国演义》、国共两党对峙史等，非但君择臣，臣亦可择君；非但党员可

以择党，党也可以择党员。国强而虐待、慢怠臣民者败望，国小而上下一心者胜出；党大而

自做种党、欺民者必败，党小而统一战线、重民者必胜。它们淋漓尽致，早已演绎了战争民

主。

列宁有关于“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取得革命胜利”的论断，并反对“把政治军事斗争时

期取得的经验用来解决经济任务”，认为这样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

毛泽东思想，如1928年10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11月《井冈山的

斗争》，还有1930年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

战略问题》、1938年11月《战争和战略问题》、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

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表明，通过对国内外局势、国情、物质条件、阶级基础、工农

武装割据、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分析、论述，及其采取的相应策略，毛泽东共产党对战争民主

的认识与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针对国际形式，邓小平提出“加快改革开放步

伐”等也是符合国际冷战之战争民主形势的。

而且，追溯历史，中国共产党，乃至世界共产主义的产生、发展、壮大均曾得益于战争民主。

20世纪初，国际战乱不断，“一战”打了四年，原有世界格局被打破。中国国内则在推翻清

王朝后，军阀混战，连年不断，等等。这些都为国内外的各种社会思潮、主义，留下了充分

发育、成长的宽松空间，并成就了几多事业。“十月革命”，俄罗斯苏维埃横空出世。巴黎和

平协议和中国五四运动等，择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些因素权重极大，都深刻影响

了世界历史走势，使全球呈现全新格局。
紧接着，二战爆发后，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法西斯，美英苏等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鸿沟，
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它形成的战争民主，又分别挽救、壮大了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等，
并以此形成了空前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否则，很难料定 1945 年以后的中国走势。至于
前苏联，如果它战前为巩固独裁专制的肃反等内部残杀势头不是被二战的战争民主阻挡，不
是因为从二战中获得了实力、人心等，并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者和一些组织的共同支持，很难
想象它能够支撑 70 年。更难想象共产主义阵营会空前庞大。
可见，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北伐、红军时期、长征、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结束，乃至新
中国的头几年里，它一直成长、壮大在一个比寻常权力分离、民主制衡、监控压力更大的民
主环境里。尤其是抗日战争、二战和解放战争，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共产党抗日根据地救国于危亡，也救自身于覆灭。如果不发生日寇入侵，没有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没有解放战争中的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难设想中国共产党完成长征、入主延安以后
的走势与历史。
正是坚持人民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环境制造的战争民主的两者合力，帮助中国共产党
代表人民打败了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并最终建立了大陆政权（建国后，也获益于美苏冷战
战争民主）。
虽然不同于战争独裁专制与和平民主制度，战争民主往往是非自觉、被迫的运用。但无论自
觉与否，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战争民主作用的结果。它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提供的
战争民主，密切相关。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被动或主动，前中国共产党（1949
年以前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是依靠民主完成了夺取政权的胜利（当然包括人民的前仆后继与
牺牲）！

（3）事实上，迫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压力，国民党不仅“停止剿共，共同抗日”，团
结共产党，还于 1938 年 3 月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利于民主的《抗日
建国纲领》，内容包括“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注意改善人民生

活”，“充实民众武力”，“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等。并于同年7月在汉口正式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各抗日民主党派及各界爱国人士，成为各党派发表政见的讲坛。此外，国民党政府还释放了许多政治犯，废除或修改了一些不符合团结抗日的法令等。蒋介石甚至在1945年元旦，许诺要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这些措施，在抗日战争前是不可想象的。那时，无论出自自身信仰与努力，还是迫于外界压力，共产党的确是三个代表，代表自由、民主和人权。续接大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政权，它于抗战时期完备了“抗日民主政权”。根据地，它精兵简政，“放手发动群众”，厉行“三三制”，土地改革，整风运动，确定减租减息为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建立统一战线等。甚至改革了婚姻制度，提倡以男女自愿结合、夫妻权利义务对等、地位对等为婚姻基础，消除了婚姻生活中的性别压迫（妇女解放也同时强化了根据地政权活力）。它不允许任何人享有特权，甚至共产党员犯法还要“从严治罪”，理由为“他是共产党员，严格要求”。现在则完全相反，一纸“组织处理，内部处理”成为豁免罪犯的尚方宝剑。四项基本原则宪法则确立了种党特权制度，它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不平等。群众路线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之一，即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等。从抗日战争开始，它能够在身陷日、伪、顽、匪等强敌围剿，且毫无外援的恶劣环境下，最后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胜利，一是党内空气好、民主气氛浓，这实质是坚持党内群众路线，使党员享有民主权力。二是以民主政治制度在边区建立、健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发展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主要内容：一是实行了普遍民主选举，二是推行了“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共产党成为抗战和民主的核心，三是厉行人民民主议政。这些便是民主政权的雏形，因而深得人心，赢得了党内外、边区内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赢得了边区外人民的好感和向往、投奔、盼望。国统区，它推行“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还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非常精彩的民主言论。如毛泽东说：“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周恩来引述孙中山先生的话说：“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董比武主张：“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邓小平 1941 年发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提出：“党的领导责任……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他接着指出：要“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以党治国’是国民党的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新华日报》1944 年 5 月 16 日发表社论：《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陆定一 1946 年 1 月 11 日为《新华日报》撰写创刊八周年纪念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等等。

它把统一战线列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之首，开始处处建立、维护统一战线。而且，为了巩固统一战线，共产党明确反对党内滋长的“左”的危险：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无限制的斗争，不懂得适可而止；二是把中间势力同顽固势力混为一谈，不注意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三是对执行“三三制”政策消极怠工，不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等等。1940 年 3 月和 12 月，毛泽东还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等重要著作，全力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为它是“胜利的基本条件，共产党的一切政策，都必须考虑到巩固、扩大它”。

台湾学者王健民在其《中国共产党史》中说：“中共的窃取大陆，得力于中共自身的努力者较少，而得力于非共及反共面的一中国的外国的一助力者较多。换言之，自由世界的若干大事，是造成了中共猖獗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的“自由世界的若干大事”是：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西安事变、日本军阀侵略中国、雅尔塔协定、马歇尔调处。这五件大事造成了“中国大陆的沦陷”。

蒋纬国也有“夹杀”论。他在《我的父亲蒋介石》中断言：“我敢肯定地说，如果中华民国抗

日胜利后，不受到国际间美、英、苏诸国设计的‘夹杀’，中华民国政府不会退出大陆。”显

然，“夹杀”是战争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那个时期，国内外社会对国民党政权背弃

三民主义，推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恐怖统治感到失望、厌恶、愤怒了，并力图改变它，至少

是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或其他什么党派出面制约它、平衡它。如抗战后期美国确立了

“扶蒋溶共”政策，一方面是扶蒋反共，另一方面是鼓励国共协商，推动国民党进行某些民

主改革，“溶共，溶民主”，力图建立一个由蒋介石领导的、各党派参加的亲美联合政府。这

是马歇尔调停的基本使命。诸如此类的“夹杀”，当然不受国民党喜爱。

至于蒋纬国先生还在书中借此认为，美、英、苏等“夹杀”是惟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强盛

起来，担心中国成为大国，则是不准确的。它与当今大陆总是宣传“反党即是叛国”、“反一

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即是反华”等是一个思路，是家国党国一人国，以个人代国、以党代国

等思想的反映。家国党国之政权与国家不是同一概念，政权或政府可以更迭，可以换届，这

不是颠覆国家、卖国、做汉奸。“夹杀”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不是夹杀中国，反国民党统治不是

反华，正如现在反共产党一党独裁专制不是反华，制裁六四当局不是反华。“反华”干什么，

是要美国人来做中国总统吗？我们看人家没有这个意思，而至少部分是希望中国人民有权自

由投票，推出一个民选的中国总统。那些默认、恭维、拍马六四镇压当局者才是反华。

王健民的“五件大事”与蒋纬国的“夹杀”，均与国内外战局有关，与世界大国三角关系有关。

其中，我们认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入侵，在民族危亡面前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等

十分关键。它结束了内战，促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这“统一战线”既是战争

民主的威力所至，又是战争民主本身的运作、体现形式。所以，如果说是日本人客观上帮助

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莫如说是统一战线等战争民主天助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

政权！难怪当时处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地位的蒋介石曾经不无胆寒地哀叹：共产党的统

一战线太可怕了！

其实，对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政权而言，是战争民主太可怕了！是自由民主太可怕了！而

且，历史上的一切独裁专制政权都非常害怕战争民主的威力。为剿灭它，他们不惜祸国殃民。

“攘外必先安内；日本人是皮肤病，共产党是心脏病”等不为蒋介石国民党首创。至少，宋

太祖赵匡胤是一个前辈，他有“守内虚外（长城内外）”原则。他大搞叠床架层的官僚机构，

用兵无常帅，削弱了军队战斗力，是靖康之耻乃至南宋政权灭亡的祸祖。

且仅说近代。如鸦片战争期间，清庭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以“防民甚于防寇”的老四项

基本原则，不忙于御外，反而急于收缴民间武器，瓦解、镇压民众的自发抗英。如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期，“后党”们也是极力阻扰洋务运动，镇压维新变

法，叫嚷“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汉人”，扬言“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人民最

后成全了他们的“扬言”）。如袁世凯为取得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不惜签定《二十一条》，出

卖国家和人民权益。而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的“治国之纲”

竟然是“宁忘九·一八，勿忘共产党”，“攘外必先安内”，“日本人是皮肤病，共产党是心脏病”。

史学界认为，抗战初期的失利，重大原因之一是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府不敢发动全国

人民，不敢完全放开党禁，并排挤、打击非嫡系部队等。此前它还阻挠中共北上抗日。

当今中国大陆，面对国家利益至上和其帝制帝位帝王利益的冲突，六四后政权能够做出与满

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不同的抉择吗？不会！他们最恐惧1989年民主运动重演。他们想方

设法，把最大的精力用于对付“敏感时期、敏感事务、敏感问题、敏感人物”。其最大价值目

标不是四化，也不是四项，不是三讲，也不是翻三番，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而是求得“稳定”，求得六四镇压既得利益的稳定。

1999年驻外使馆被炸引发了国内游行示威，他们最害怕的是由此反思，而使活动发生“性

质变化”，极力防止全社会转向，把矛头对准“党中央和政府”。他们极力防止一切战争民主

的出现。所以他们拼命修筑城墙、四项、思想等各类长城而两手抓的真实目的，更多的是对

付国内人民，是防止并立即扑灭“后院起火”，“露头就打，处置、消灭于萌芽状态”。

（4）事实上，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还代表中共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

对民主政体作过详细论述。当年，黄炎培先生同四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

泽东等高级领导人接见。返回重庆后，他写了《延安归来》。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

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

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

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

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

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

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

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

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

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

的。”

从“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中，我们看到了“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这就是民主！这真

是一条伟大的新路——民主之路！能够走在这条新路上，能够“人民来监督政府”，“中国人

民从此站起来了”才能够真正实现。

不难看出，这番谈话是诚挚的。它不是“欲得天下者，必先得人心”的幌子，而是把民主政

治思想作为跳出“王朝循环，国家民族呈周期动荡”的良方，是民主救国。

可是，如何科学设计“人民来监督政府”，如何科学实施“人人起来负责”？它不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橡皮图章不敌党章，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
不是人大政协会议对政治局会议决议与文件精神的走过场表决、通过、衷心支持、坚决拥护，
不是法律屈从人治，不是一府两院、军队等国家机器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工具。它不
是不容异己的反右及其扩大化，不是文革及其“四大”，不是“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六四镇压”，不是四项三讲监督，不是“党委决定，政府办事，
人大挑刺”式的监督，不是违背常理的下级对上级的无效监督，不是党内监督，不是监察、
反贪、纪委等的监督，不是党内监督代替人民监督，也不完全是停留于批评、建议、检举、
举报、控告、上访、游行、静坐、绝食等的基层组织和普通人民监督。
而是人民主权立法监督，三权分离监督，是定期自由选举、多党政治与轮流执政等监督，是
司法独立的法治监督，是军队国家化的监督，是言论自由监督，是新闻舆论自由监督，是人
权至上监督，等等。
可见，这条伟大的民主之路后来中断了，它仍然在延安，在理想中。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走过
这样的新路，我们被迫在王朝循环的老路里蹒跚。
从延安、窑洞到西柏坡，到北京、中南海，我们都曾因民主而激动。建国时期，中共中央在
中南海勤政殿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最后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勤政
殿主席台上结束了讲话：“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
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
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而且，从1949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共产党还是竭尽力量体现了民主
联合政府的精神，人民民主制度的建设也是按照这个方针进行的。1949年3月中共七届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党必须把党外大多数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
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
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作出成绩来”。

在“内阁”的组成上，周恩来表示要同民主人士商量，党的方针是“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

结果，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知名人士和社会贤达，

几乎都在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拥有一席之地。1949年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

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正式任命了政务院总理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等主要负

责人。“内阁”名单里，民主人士占了相当大的比重：4位副总理中，民主人士占2位。21

名政务院领导成员中，民主人士占了11名。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

民主人士占了49个，而且有15个正职。

所有这些，其总体比例几近50%。这一比例在背离民主中江河日下，并且发展到只有共产

党员才能担任任何部门、机构、单位等正职。如今，给右派、十次路线斗争牺牲者平反，却

不恢复民主联合政府，只有总代表万岁，党国万岁了，只剩下“政治局常委会决议”掩盖

下的个人意见一言堂。“民主与民主联合政府”等名头早已无踪无影，凡是由“中共中央、国

务院，核心”一锤定音。

3、 战争民主是双刃剑

（1）战争民主是人民追求和平民主的被迫形式。但是，人民以战争民主“选举”出“三

个代表”，不是为了使“三个代表”能够搞和平时期的终身制，而是要使“三权分离、多党政

治、司法独立”等代议制和平民主续接战争民主的香火。

人民民主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永久的和平民主制度，使“三个代表”能够被定期选举，轮

流执政，而不是谁能借着执政时掌握国家机器，总赖着不下台，成为人民的新独裁专制主子。

否则，战争结束了，战争民主消失了，战时独裁专制却延续下来了。这双刃剑最终伤及民主

本身。

列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都说他诞生了社会主义，他改变了20世纪。但是，一方面他关于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取得革命胜利”的论断获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他的一些更好的学说却

没有得到尊重、实施。他反对“把政治军事斗争时期取得的经验用来解决经济任务”，认为这

样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他还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别的社会主义。”

显然，他身后的领导人与前苏联，包括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绝大多数由于对其学说断章取

义，而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根本性的错误”。这便是把战时独裁专制沿用于了和平时期，

并以资本主义为假想敌与靶子，高压与教育教化（愚弄）并用，建立起了“别的社会主义”：

俄罗斯沙皇独裁专制式社会主义，中国皇帝式社会主义等，这些都是封建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

如苏联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形成斯大林铁碗统治；1949年以后的和平建国时期，中国共

产党迄今仍然沿用了“三人团、民主集中制、书记处与政治局核心制、党指挥枪、党国不分、

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政治上是极权集权政治，经济上是集体农庄、

人民公社、计划经济和所谓公有制，文化上是意识形态一元化、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等。

事实上，以1949年为界，“一统江山”前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经过了两个阶段，有质

的变化。

乱世用人，一统灭人。最初，它的目的是宽容异己，减少“敌对分子”，团结一切力量，对抗、

摧毁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如，继上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外，1947年12月中共中

央陕北米脂县杨家沟“12月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北压迫阶

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

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阐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

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表示要纠正土改运动、工

商业政策、整党、镇压反革命、统一战线等中的“左”的偏向。

但是，1949年以后，它不是包容异己了，而是要求各方面异己与其保持一致，差一点还

要挨整，受排斥、打击。革命成功了，应该分享果实了，江山打下来了，该坐江山了，应该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还政于民了，它最大存在价值却恰好走向了前一阶段的反面。不纠正“左”

的偏向了，甚至以反右及其扩大化、公社制、国有化、公有化、镇压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镇压、镇压法轮功等搞出了许多“极左”。很多“政治运动”实际

上是以“左”的面目出现，以打击异己、打击“统一战线的各组成部分”，以破坏统一战线为

标志的。它是不必“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而是统治一切应该受到统治的人，使一切力量

屈从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乃至利用它排斥、同化、揉没化或绞杀一切社会“异动力

量”，是巩固共产党一党独裁专制。更可悲的是，统一战线成为“全社会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

决议、政策、事变”等的表决、变态机器，既是约束、麻痹、分化中国民主力量的工具，又

是愚弄人民的独裁专制统治法器。

值得指出的是，统一战线在第一阶段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变质的倾向。中国共产党编写的《中

国革命史》说：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内滋长了一种“左”的倾向，并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

一是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无限制的斗争，不懂得适可而止；二是把中间势力同顽固势力混为

一谈，不注意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三是对执行“三三制”政策消极怠工，不善于和党外人

士合作共事，等等。

鉴于此，当然也针对“右倾”现象，毛泽东在1940年3月和12月，先后写了《目前抗

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等重要著作，全力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认为它是“胜利的基本条件，共产党的一切政策，都必须考虑到巩固、扩大它”。抗日战争后

的解放战争期间，为了巩固统一战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层是从来没有忽视防止“左”，

纠正、克服“左”的。

而极左与极右，虽然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但他们有共同点，即“大权独揽，非此即彼，

独裁专制”。可以说，尽管对左倾最厉害的词是克服，对右倾最厉害的词是打击，这本身包含

了“左比右好，可爱”的倾向，但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最终还是能够“左右”排除干扰，

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力挽统一战线于破灭。

这正是他和共产党最终能走向1949年以后的“伟大”的地方。

但是，1949年以后，为什么统一战线会出现质变？而且，甚至在没等到1949年10月以后，还在1948年12月，中共即通过毛泽东主席写的1949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各民主党派发出了“要一致，要合作，没有中间道路、第三条可走”的警告。

因为“一统”后，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一缺永久的制度性的和平民主，二缺临时的隐性战争民主，而且执政或者统治力量大到可以单独领导、独裁专制统治了。可以不需要“国统区的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了，可以自恃无需利用“统一战线”争取最大程度的社会支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制衡了，可以无所顾忌、无情地打击要求分享革命成果者、持不同政见者、异己分子、反对分子了（或者圈养起来），可以惟我独尊了，可以强权了。可以不必“一切政策，都必须考虑到巩固、扩大它”了，有了政权与国家机器，没有“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也是“可能取得胜利的了”。

什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一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只有一条路可走，要么走，要么完蛋。是统治地位必然使它与一切被统治者对立或为敌了。于是，可以反右及其扩大化了，可以文革了，可以镇压民主墙了，可以清除精神污染了，可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可以六四镇压了，可以对法轮功等一切社会“异动力”“发功”了，可以对一切“两手抓”了。难怪邓小平告戒说，“左的东西害死人”，“防止右，主要是防止左”。

（2）国际上，类似蒋介石国民党借口“反共”而大搞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决不是个别案例，欧洲、亚洲等都有。但是，尊重共产党，本身是尊重民主。如果使其合法存在，而不是逼上梁山，则更能益于民主。

正是民主世界不容异己的“反共”违背了民主原则，正是一些幼稚做法，不是和平演变，不是民主包容，正是“反共”（而自己独裁专制的）战争——即战争民主，使一些主义，如共产主义等在世界更大范围内获得了普及，以及更广泛的被信仰、被自由投票、被选择、选举的机会，是战争民主成就了二战后共产主义事业的辉煌胜利（而当今，正是因坚持独裁专制而镇

压法轮功，反而使法轮功更加蜚声海内外、走向世界，走向人民！这也是战争民主，与“越是禁书，读者越多”道理等同）。

当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但我们完全不能否认人民曾经发自内心的对社会主义的认可、选择、追求、拥护和捍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或许是人类人权事业走向进步的必要试验与过程，至少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有的不完善和一些弊病，使很多人决定另辟蹊径。

二战后不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来自战争民主，一些国家的分裂也是战争民主的结果。如朝鲜与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东德与西德等。一国之内，不能宽容、包容异己，只认为自己是唯一光荣、伟大、正确、神圣的，只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人民代表、三个代表，不能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竞选执政，甚至要吞灭、消灭对手。但如果无力吃掉对方，就只好各走各的阳关路了（注意，虽同为分裂，中国的两个政权却与另外两对完全不同。共产党与国民党虽誓不两立，不能跑在一条道上，却分别在大陆与台湾实行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

这种以分裂形式表现出来的战争民主结果，有点象同胞兄弟争吵、打斗后的扬镳分道，分家、单过。兄弟们过不到一起，就分家、分过；政党们不实行民主，不彼此和平宽容，过不到一起，就排斥、剿灭异己，就分裂国土，分割人民。可见，任何派别、主义、名目的独裁专制观念，实乃国家分裂的祸首。

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不仅成困于热战本身，还在冷战中得到加强。美国西欧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对立，北约与华约的军事对立，欧共体、欧盟与经合组织等的经济对立，等等，都是冷战战争民主的结果。

作为双刃剑，战争独裁专制在和平时期的延续也是非常可怕的。两大阵营对立产生的和平“冷战战争民主”背后，一些国家政权搞起了“和平独裁专制”。它们对万事万物万时均要求全国乃至国家集团保持一致，只允许“用一个大脑思考，用一个声音说话，用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指导行动”。它们用战争民主的福庇，不去建设民主制度，反而使和平独裁专制达到了顶峰。

世界历史上，罗马帝国也好，蒙古帝国也好，轴心国也好，还不曾有一个独裁专制王朝象二

战后的社会主义阵营那样庞大、森严，使人们在向往共产主义和公有制的喜悦中，喝尽了人

权被践踏的苦酒，地球为之颤抖，宇宙也为之哭泣。而且同时，另一方面，即使是民主世界，

打着反共、反独裁专制统治旗号而自己大行独裁专制统治的也不在少数。如韩国与国民党台

湾的军事独裁专制统治。甚至政治迫害，违背民主原则的麦卡锡主义也一度猖獗于美国。

可见，战争民主确实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牵制、收敛、制止独裁专制统治，又会出新的。它

使得国共两党后来分别在台湾和大陆成功推行了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在大陆，它导致许多 1

9 4 9 年以前在国共两党中如鱼得水的民主党派及其人士偃旗息鼓了，销声匿迹了，或者死

亡了。而反右及其扩大化，还有文革六四三讲等，只不过是独裁专制数千年来为中国民主事

业预备的悲剧套餐的正点上菜。

可以说，北伐胜利后，哪怕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如果国民党不是赶走其自身左派，屠杀共产

党，而是平等与共产党等各党派、政治团体和平共处，和平竞选、竞争，哪怕是怀柔、绥靖

政策，中国大陆决不会先后遭受国民党和共产党及其核心之独裁专制统治，“一个中国”也不

会是两岸三地这般光景。

世界范围内，如果民主国家不是对苏联大加封锁、制裁、围攻，而是早早采取了和平接触、

和平共处、和平演变策略，甚至就是宽容，和平竞赛，世界不会有那么多战祸、悲剧。社会

主义阵营也不会以极端独裁专制统治的面目走向颠峰。

和平非暴力是永恒的人权原则。高税往往奖励了走私，苛政往往流失了国力，暴力常常惩罚

了和平。除了隐形的战争民主，战争则更直接地形成了战争独裁专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

——书记处——核心体制，包括民主集中制、党指挥枪、武装斗争、武装割据等，是强加给

它的战争的直接结果，是逼上梁山。

有时候，穷兵黩武打别人，恰恰反伤自己。这是战争民主的神秘威力所至。这似乎也是正义

战争必胜的近义词。除去六四当局的非正义性和台湾因民主化而正义无比，这是六四当局不

敢对台动武的一个致命原因。开战之时，便是它败亡之日。

让一个人脱掉外衣，不是施展狂风冰雹，而是阳光与温暖。让人民不遭受独裁专制制度统治，不是制裁、围攻、战争，而是宽容异己，和平共处，自由竞争。如此，必能事半功倍，而且少留仇恨、后遗症。

（3）“结束战争（冷战或者热战）一方取得完全胜利”，而不推行和平民主制度，政权（注意，政权不是国家的同义词）归一统或统一，它对一个地区乃至世界的多样化发展与繁荣强大，并不意味着什么好事。如春秋战国，各国纵横，彼此制掣，大众自主性强。东奔西走，周游列国，连护照也不要。多数派无法以保持一致，剃掉少数派，少数派也无法以强权搞强行代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信仰自由、从师自由，财产自由与人身自由等也相对比较宽松，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尽其才，群英会萃。正是秦国灭六国、一统中国后，秦国才有必要，也才能毫无忌讳地废私学，毁灭教育、学术与言论之自由，才胆敢焚书坑儒，对持不同政见者下毒手。而且天下都姓秦，六国已灭，它们促成的战争民主（即战争议会）不复存在，遭废者、受迫害者逃无可逃，只死路一条，坐等“镇压”。乱世用英雄，一统灭英雄。汉初“敌国亡，良将死（兔死狗烹，卸磨杀驴）”，刘邦轻慢儒生，诛杀功臣（张良乃明白人，隐退而保全身）。而且，整个西汉、东汉400年，社会批评的方式、质量、数量等是不断恶劣的，当面批评、上书批评、直言批逐渐减少，它们让位与上疏批评、上奏批评、借古讽今、匿名批评和因言获罪（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位于反右派极其扩大化，言论自由由于人大政协“提案”）。三国时代，为什么将帅如海，谋士如云，人才辈出？因为战争民主需要他们，也能保护他们。至少，选才、用才是当务之急，迫使帝王们收敛“保持一致”剃刀，任英雄自由驰骋。否则，决无诸葛亮等英才大展智慧武功。比较曹操与刘备，人们常说曹操是奸雄，刘备是明君。其实，刘备也决不会好到哪里去，他可能会更是。他没有熬到天下一统那一天。否则，他必然也是刘邦的孝子贤孙，先摔儿子，拜官封王，收买人心得江山。然后，为了儿子后代们能够

坐稳江山，便剃刀上阵，削官去王宰诸侯，剪除异己，迟早会杀了诸葛亮、姜维、赵云、关云长、张飞等，并假惺惺感慨“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那些英勇作战，死得早的且留英名，死得晚的必获“反贼、奸臣、叛党投敌、汉奸”等骂名而屈死。蜀国还没成气候，魏延也还没怎么样，便死于“莫须有”。可谓“死得晚的，功劳大的，不如死得早的，死得巧的。”帝制帝位帝王下，为臣的不仅要能干、会干，还要会巧干、奸干，更要会死。遭两手抓，迟早是死，死于敌手，死于帝王正需要用人时，便是“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如果死于帝王之手，便是前功尽弃，“生得卑琐，轻如鸿毛”。我常常想，一批已经取得了良好评价的中共高级干部，如李大钊、陈潭秋、方志敏、任弼时等，如果没有死于战场，没有死于1949年以前，如果他们更长寿一些，等待他们的盖棺定论会不会是别的什么？反之，如果陈独秀、林彪等死得早一些，死于国民党、日本人之手，评价恐怕又不一样了。一个不能尊重当代史的年代，必定是有问题的年代，它也不可能完全尊重过去的历史，不可能真正对待自己的民族史。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尊重历史，尊重正在发生的历史，而不是多少年后的平反、翻案，当事人“留待后人去评说”悲叹、凄凉？独裁专制制度是不可能做到的，惟自由民主制度堪当！

隋朝一统中国后，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科举制，以“八股文，会考，全国统一考试”等形式流传至今。它等虽然加强了教育事业，却也“两手抓，读书做官，教育出人才，为中央集权服务”。迄今，试题内容、科目，考试方式与人才标准等有了许多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讲政治，政治素质，政治要求，政治标准”。“两手抓，政治考试最重要，政治思想品质是人才的第一标准”。这些一手抓进步，一手抓保守，以教化成分损害了教育事业，以重意识形态、效忠帝制帝位帝王，浪费、延误人才，损害了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官方给考试优异者好处，上了其套，便是其人。欲改弦易辙，难矣。致使学术文化部分地无有正用，沦为升官发财的工具（有时相当严重），教育不能救国，教化则祸国殃民，泯灭大众活力，损害了社会创新与创造。

难怪自唐以后，民性逐弱，无论自然或社会科学，中国士人旷达不羁者逐少，李白难再了。

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出圈，自然科学之创造发明艰难，卓有成效者也不受朝廷重视。而且，较之直接服务于帝制帝位帝王们的“显学、经学”、吹鼓手等一帮御用文人而言，

自然科技者更难讨好。二十四史，帝王与文人骚客很多，哪怕杨贵妃、陈圆圆等也不少，就是难见徐光启等自然科学家。要不是使馆挨炸，哪个统治者想得起给钱学森等颁奖啊！给袁隆平、吴文俊奖励500万，只有50万属于个人，还不如那些决策错误损失与贪官污吏祸害的一个零头。

更令人后怕的是，实际上，统一考试不仅为统治者选拔了人才，更将有才华的国人圈养、束缚、禁锢起来了，迫使他们就范，将大部分才干用于“认真领会上级精神，紧跟主旋律”，难得独立思考、自由思想，更甭提造反，做反对派、在野党，除非你移民、出国，或者甘于归隐，做处士、田园诗人等。全国人都读“经学，显学，官性马克思主义”等，读懂了，有发展，更好；读不懂，也没关系，那是神学。学无止境嘛，谁说真理是朴素、简单的？几十卷、几百卷，成千上万卷摆在那里，它们博大精深，需要你穷经皓首，用尽毕生精力。只要你绕进去了，你便不可能研究透了。它们能够吓死你，围住你，耗尽你等才人心脉就行。只要你们还在“彀中”，还顺着思路，还在学，还在研究，很投入，不出圈，不出彀，还在射程，还在手心，不胡思乱想，不持不同意见，不独立思考就行。只要保持一致就行，这是意识形态的天职。它的教化作用，就是教育转化。教化天下，首先要教化人才，教化读书人，教化精英。我也给你俸禄，给你评职称，它不是官，也相当于一定级别的官位，甚至提供一些出国、交流，乃至国内挂职任职的机会，认为你是我党的一部分，让你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等都过得去，相对体面，甚至比大众还强一点。该安心了，不独立思考，不创新、谋反了吧！如果这些还稳不住你们，那我只好焚书坑儒、反右、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社论戒言、军事戒严、武装镇压了。

唐太宗目睹新科进士从端门列队而出时，他大为安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张弓之射程也；入彀，比喻猎物进入圈射程或圈套以内，可任由处置也。

以焚书坑儒而“统一思想，保持一致”是有次数的，“统一考试，入彀天下英雄”则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永恒的。每次统考，可将天下英雄一网打尽。年年统考，漏网者鲜矣。洪秀全是欲取功名而不得，才促成其最终造反的。如果考取了，历史上可能便没有洪秀全了。当然，还会有王秀全。顾炎武斥科举制等“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其实，“统一考试”，此路一条，别无他择，还排挤、浪费了部分人才，毁损国家思维与国力。一些人看不惯现政权者，不愿凑合，他们抱定“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纷纷闲适居家，归隐南山，或逍遥江湖。现在，世界变小了，很多人还采取了出国移民的方式躲避它。而伴君如伴虎。无论忠臣、奸臣，很多为帝王、核心出大力大智的人，没有得到善终。他们本事再大，也只是帝制帝位的工具，帝王们用完一个杀一个。虽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大臣在皇帝眼里是不值钱的。天下英雄已尽入其彀中矣，少一个，自然会补上一个。曹操战将如云，谋士似林，杀得完么。不是不杀，是時候未到。不为我用，必然遭杀，更甭说妨碍、反对他了。杀有文杀与武杀之分，如软禁、废其武功，斩首等。李斯、韩信、晁错、岳飞已经遭杀，张学良、赵紫阳不是至今仍遭文杀么？名臣身前遇害，奸臣身后难逃。你看秦桧已经跪了1000年。为了家国江山传万代，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统一考试”，最终走向了阻碍人才、浪费人才、排挤人才、摧残人才、扼杀人才，激怒人才。此等教育教化弊端，实乃中国大患大祸也。我们再也不要说“政治科目及其考试”等“学而无用”了，作为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部分，它们的效能太大，太法力无边、骇人听闻了。对这等引诱人才、圈废人才、浪费人才、挤迫人才、陷害人才、迫害人才，是对中华民族血脉的流放。除了积极的一面，御用文人、人才，实乃御养人才、御圈人才、御废人才、御害人才、御杀人才也。可惜，很多国人陷入其中而不自知，可悲的是更有一些人自我感觉良好，更甭提那些失去良知，沦为急先锋、帮凶的文人了。唐初有李世民“纳谏之风”，往后便销声匿迹了。宋初则有“杯酒释兵权”。

明初朱元璋登基以后，干掉了所有为他南征北战的功臣名将，并对其后代说：你们现在可以

安稳做皇帝、坐江山了，亦即朱姓江山不会变姓变色了。

近代，正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才推行了有些方面更甚于清庭的独裁专制制度，才有了

“非洪姓不得封王”，才不容异己、不容意见异见、不容分权，才有了内讧、天京事变、王王

残杀与分裂。此前，太平天国节节胜利的一个重大原因，在于其“人间天上”，有“两套权力

体系”相互交叉，同时作用。它们既相互制约、监督，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与正确性，又提

高了权力者的积极性，保证了号召力。分析太平天国败因时，认为“天上神权，地上皇权”

是其天京事变并走向衰弱的根源没有错，可是有人依次认为“如果洪秀全从起义开始便树立

了绝对权力地位，不至于发生内讧”则是不妥当的。相反，如果定都后，洪杨不相互算计争

“一统，独揽”，继续以“和平制横”各保权力，则是更有作为的。

正是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后，国民党才有了《国民党组织法案》，才有亲嫡系、打击

杂牌，才有了排共、剿共，才有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正是蒋介石国民党自以为强大无比，才拒绝在抗日战争以后成立中国民主联合政府。

现代，正是1949年统一中国大陆、和平以后，中国共产党才在政权建设中逐步放弃了战

争时期的“三三制”根据地民主政权模式，走向了绝对的一党独裁专制；才由从给农民分土

地的“土地改革”走向了收回农民土地的公社制度；才由允许、鼓励发展工商业，走向了“公

私合营，人民公社”、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才由想方设法建立统一战线，

走向“非符合意识形态的、持不同政见的”都是牛鬼蛇神，走向反右派及其扩大化，走向“两

个凡是”，走向六四，走向四项四个凡是与三讲(李鼎铭等只能存活于延安时期)；才有从党

内民主走向了党内“无情斗争，无情打击，你死我活”，才有那么多老干部、老帅、老将领、

老英雄死于和平时期。

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正是天下归一、权力高度集中、“稳定”高于一切时，中国才陆续收拾

了民主墙、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后发生了六四镇压。

江泽民时代，正是他大权独揽，并“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中国才出现了排斥异己、三讲

恐怖、镇压法轮功、腐败丛生，大量干部落马，靠边站。

我们还有理由赞成以“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它不仅分裂国家，更会于一统后铲除异己，祸国殃民。

（4）其实，是战争与战争民主造就了将军，他们不是被提拔嘉奖出来的，而是战争民主使
他们必须被提拔，是他们自己打出来的。可是，没有和平民主的独裁专制毁灭了将军，如功
高震主，或拥军招危，或被逼谋反，或指责彭德怀等“煽动军队向党进攻”，等等。
和平时期，独裁专制统治制度毒害任何人，包括军人在内。没有和平民主做保障，军人很难
确保战场上的胜果。虽然“王军、党军，党指挥枪”等常常使军人军队被愚弄为勤王、勤党，
“器变道不变，坚持四项凡是迷信”等的独裁专制工具，并因此地位颇高，但一旦进入没有
和平民主的独裁专制制度里，他们便权益难保。一朝君子一朝臣，换人换班子换政策等，也
使得军人，尤其是将领们的地位朝夕难料。以军人的秉性气质，也许一句话即会招致死罪。
莫说权力，莫说地位、荣誉等高级人权难保，就是生死等基本人权也难以料定，而且还殃及
家属，难以善终，人生结局比普通人差远了。对比二战以来的世界军界，多少一人一党独裁
专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反侵略英雄死于战后，而又有多少民主国家的将帅们至今仍然享受
着荣誉和人民的馈赠、尊崇！正是二战爆发阻止了苏联肃反，正是二战结束后苏联又恢复了
肃反一类的政治悲剧。看看我们自己，多少中国抗战英雄未得善终！
秦制以来，死得最惨的，家属受牵连的，四处流亡的，遭满门抄斩的，大多是高级将领一族。
有道是“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多半是大众对战争的感叹。但“天下一统，江山独得”后，即
使很多将帅们免除了“敌国亡，良将死”的遭遇，他们也难逃独裁专制的宫廷政治斗争。但
独裁专制制度里，没有光明正大的议会政治，却充满了暗箭难防的宫廷政治。这些带兵打仗、
卓有功勋的军人，往往不擅长宫廷政治斗争，也厌恶它。“王军，皇军，党指挥枪，两手抓”
等身份地位和使命，使他们及全体军队只能附属于个人、个党，无法以“军队国家化”的独
立地位保障他们的人权等权益，他们不是被迫卷入，就是被宫廷政治斗争利用，总难逃牺牲
品的结局。

岂只是“胜者王，败者寇”，没紧跟，站错队，也是寇。虽身经百战而胜存，却难逃宫廷一战而败亡。可怜彭德怀等诸将帅，一世威名，克敌制胜、游刃有余，挥洒自由精神，由于失却了战争与战争民主的庇护，最后惨死于和平时期的独裁专制盛行的政权内部。多少人因此落得了“没有才智，头脑简单，不懂政治，把握不准政治方向，不讲政治，不懂政治，不过一介莽汉武夫”的名声。一些没有男人味的男人，宫廷政治的老手，反倒成了英雄。“党指挥枪”嘛，这带兵打仗的司令员，就是玩不过“政委，书记，总书记”。古有韩信、岳飞等，今有彭德怀、贺龙、林彪、罗瑞卿等，还有杨家将军。那吕后、秦桧、皇亲国戚、旗人等，应当属于因“党指挥枪，两手抓”而是掌握方向的“古代政委、书记”吧。不会打仗，但管着打仗的，确保王朝江山不改姓，不变色。这就象不会经营管理赚钱的书记，管着会增值、赚取利润的经理厂长，直到国营企业亏空、垮了完事。结果，小处说，当官的捞饱了，工人下岗了。大处说，国家崩溃了，领导人逍遥海外了。其实，从古至今，任何独裁专制统治政权里，一直存在一种势力，他们不显山露水，常常摆不上台面，几乎不是国家机器有名有份的组成部分。但相形之下，他们更重要，更显赫。他们直接为皇权、党权、核心权效力，最大使命是巩固帝制帝位帝王。他们垂帘听政，把握方向，是管理衙门的衙门，是管理官员的官员。他们曾经表现为秦代监御史、汉代部刺史，以及御史、亲信、阉党、宫人、东厂、西厂、苏州织造、党部等。他们现在的表现形式是党组织系统。而且，为了加强所谓政治思想工作，六四当局不仅否定了六四前准备撤消局级以下党委的改革措施，反而要在个体摊群、临时活动小组等设立诸等“部刺史”，刺探人民准备干什么，加强防范，以备“消灭于萌芽状态”，这不啻与文革向阳院乃一丘之貉，“防范一切阶级敌人与阶级破坏”。我曾经问过一位抗日民族英雄的后代，“您父亲如果不是死于战场，他能逃过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吗？”我以为会有尴尬，或者掩饰，谁知她不假思索，一口答到：“不能，以他疾恶如仇的刚直性格，恐怕连文化大革命也熬不到”。可见，人人都有一本帐。想想看，解放后至今，有多少比这位英雄更有抗日贡献的将军，有多少一辈子听从“党指挥枪”、为“两手抓”出力

的老军人、老干部，最后被“反党分子，反党集团，分裂党”等罪名，被一人一党独裁专制

独裁专制搞得灰溜溜的，受审挨整，蹲自己人的、党的监狱，或含冤死去，“身败名裂”，“永

不得翻案”，祸及子女。甚至有人叫嚣“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不得翻身”？而且，挨整过程中，挨完了整，都不准对“党和党的领袖”表示抱怨、不满，即使临到被党

枪毙了，还要保持“对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保持高度一致”，高喊“党万岁，领袖万岁”，

“把一切工资与存款作为最后一次党费，全部交给组织”。你只能说“党是伟大的，领袖是伟

大的，是少数野心家太坏”。否则，被整死了也没好结果，不得平反。至于被逼而反，自杀、

外逃等，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理该遗臭万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西斯政党制度，这是一

个什么样的邪教组织？有时候，为什么成员只有放弃自己的基本人权，如独立思考，自由言

论，所有财产等，才能是好成员？

岳飞遭斩时，恐怕也是“朝廷上下一致赞成，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吧？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认

识到是皇帝与秦桧等联手害死岳家忠烈的？后人算帐，秦桧能跪于岳武穆墓前，皇帝就豁免

了？出于民意与政权需要，岳飞死后多久，才由皇帝平反昭雪的？林彪什么时候平反？仅只

抗日民族英雄一条，就足以为他平反、恢复名誉了。

仅共产党内部，多少英雄不亡于日寇，幸存于国内战争，最后却冤死于战后和平，死于既无

战争民主，又无和平民主，死于和平时期的一统，一人一党独裁专制。而也许就在同时，那

些曾经完败于他们之手的侵略者，那些靠党的好政策正过着舒服日子的“内外战犯”们，正

喜出望外，“好哇，真好，打败我们的人被他们自己人收拾了，这仇可算报了”。

1950年，

中国政府对二战战犯的政策是“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

个不杀。”受惠于党的好政策，战犯们还活着，可共产党的功臣们、英雄们却一个个倒于党内

斗争，党为什么不把好政策留给他们？我们常常宣称“改造战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

党内斗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自己人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却也登峰造极了，令人

寒心。可谓“亲者痛，仇者快”。

也许，统治恐怖轮回，首先是对功臣、英雄、有作为者、权重者的恐怖轮回。这也是一种形

式的两手抓，其目的都一样，名义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实质为巩固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帝

制帝位服务。这些岂只是中国军人及其家属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中国的悲剧！

个人家族个党独裁专制下，伴君如伴虎，但如果没有君，没有皇帝，而是在民主制度下，军

队国家化，伴着人民，岂不没有落入虎口之虞。刘邦等嗟叹“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头痛于接

班人难选，可事实不是天下无猛士、将帅、栋梁，也不是国人、军人们等不愿为国家出力，

而是帝制、帝位、帝王们历来不能善待人才。他们选人才、用人才，他们更处心积虑提防、

暗算人才，与奸臣、阉党、后宫等联手谋害人才。其政权因灭尽天下英雄而后稳定，他们正

“且喜壮士今无多”呢。不正是刘邦主谋，除掉了英布、韩信、彭越、黥布等左膀右臂吗？

不正是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迫使开国元勋提前离退休了吗？不正是赵匡胤的后代继承先

王，主谋杀害了满门忠烈的岳飞一家，并遣散了岳家军吗？还用继续举例子吗，难道眼前没

有，国共两党之例证还少？很多人靠边站了，至少江泽民正以“灭尽天下英雄”推行其稳定。

可笑、可怜、可恶的这些君王，还呜呼哀哉“安得人才，为国出力”。其实，在他们眼里，求

贤如渴与诛灭人才，都是为了“家国党国传万代”，维护帝制帝位帝王。不过，在保持稳定、

坐江山的时候，他们不要阳刚，只需阴气了，猛士、元帅、将军、谋士等远不如后宫阉人、

粉黛、大内总管、御用文人、耳目喉舌等可爱。

家国、党国、核心国，盼壮士，杀壮士，盼英雄，杀英雄，盼忠良，害忠良，自古壮士、英

雄、忠良等无有好下场。不要再说“刘邦好，吕后坏；皇帝好，帝制好（社会主义制度和共

产主义好），少数野心家坏了”，是皇帝靠不住，是帝制、帝位靠不住。它们导演了优败劣胜、

优祸劣福。没有帝制、帝位，哪来皇帝、核心、三个代表、总代表？哪来少数野心家作恶，

而广大干部与人民却长时期束手无策？帝制帝位克隆帝王，也必然克隆悲剧、罪恶与祸国殃

民。

上访、上书，期待恶人下台，明君平反，不如创立一个尽量少地制造悲剧而保障人权的民主

制度。

惟有民主制度与军队国家化、非政治化、非党化，可以管制少数野心家于萌芽，可以保全军人的人权！

军人们，将军们，武装警察和公检法等国家机器们，把宣誓“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恢复为更高尚的秩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忠于党。不管你是什么党的党员，你首先是“中国的人”，是中国人民的一员，故“忠于党”是排位最后的。而且如果党组织及其把持者有害于人民自由民主与人权，我们还要勇于退党、改造党、取缔党、反党。无论如何，一定要拒绝“党指挥枪”，拒绝成为党卫军、私家军！否则，中国军队将永远无法真正完成保家卫国、保障人权之使命。

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不能没有军队。但军队不是“统一，而独裁专制统治”的法器。一如晚清有新军，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我们收获了什么？袁世凯复辟帝制。二如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我们收获了什么？国民党党国。三如八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军力空前强大，我们收获了什么？是国民党决不成立中国民主联合政府，是它不惜发动内战，坚持一党专制。四如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后，人民人权真的获得了解放？没有，它仍然匍匐于新的党国统治特权，正如它从秦朝到清朝一直匍匐于家国统治特权。五如从四大到四项，从三项最高指示、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三讲，受蒙蔽、误导、利用而参与六四镇压之后，中国怎么样，变的更好了吗？不是，是统治当局空前腐败、无能、歹毒、卖国。不要屈从“两手抓”，别为独裁专制制度而战，它属于少数人。你们是人民军队，是卫国军，是卫民军！是人民的国家机器！为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战吧！

民主与民生唇齿相依，民主属于全体国民，庇护军人，庇护全民！为人权而战！人权保护军人人权，保护所有人的人权！

人民将与军队一起，推动军队国家化！军队属于国家，属于人民主权的国家，而不是属于朝廷，而不是属于王军皇军党军个人军，而不是家丁家将，这是对军队军人的最大尊重！它使军队军人不仅不会被个别人愚弄而镇压人民，也保护军队军人不受个人个体迫害。

战争民主是军人、将军们获得成功、得到庇护的隐形制度屏障。但我们也不要以为战争结束，“一统，统一”是将帅等之坟墓，而拒绝结束战争，反对统一。统一的，并且是民主的，即

“一个中国，民主中国”，才是所有人人权的最佳庇护。
军人的使命是防止战争、制止战争，是保卫和平、维持和平，我们不能总靠战争民主使自己
免遭迫害、获取功名，我们本身更需要和平民主保障军队军人的尊严和权益。但是在战后，
如果没有三权分离、多党政治、代议制、司法独立等人民主权立法的和平民主继续提供庇护，
没有军队国家化，没有和平民主，那么战争的结束，即意味着战争民主与一切民主的死亡。
战争民主与和平民主，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民主的庇护，军人、将帅们的价值与地位必将受到
挑战、藐视，难以稳固、善终。大家回想一下，多少共产党的优秀将领，多少坚定的“无产
阶级革命、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戎马一生、幸存于红区与白区战争，却没有品尝到民主革
命的芬芳，倒霉、含恨、冤死于和平一统的独裁专制时期？
我们后人还能容忍这般害人、吃人的独裁专制制度吗？

（5）岂止于将帅、军人们失意、倒霉于不创立和平民主制度、又终止了战争民主的一统，
各行各业各地的各级下级官员与普通人民，也几乎都是“敌国亡，良将死”的受害者。官位
高至皇帝、总书记，低至芝麻官，得江山、上台当官前，为了得到同僚支持和大众基础，他
们都亲切和蔼，“眼里有人”，与左右同僚、下级们称兄道弟，“哥们前，姐们后”地打成一片，
还不时辅以小恩小惠，获得“够哥们，够意思”的美誉。
一旦当官了，升级了，“进步”了，地位变了、高了，或许是制度与人性并存、综合作用的原
因，他们便琢磨着如何统治过去的哥们、姐们。他们“一阔脸就变”，开始眼里没人了，凶相
毕露，巴结下面，打击下面，压制左右。手段也毒起来，处心积虑防范、排挤、压制、打击
“彼可取而代之”的竞争者。这是在党内、圈内、政权内。在党外呢，统一战线也不重要了，
继续走中间道路的，反对的，统统拿下，统统“反右”掉，只许“拥护，完全拥护”，使得本
为交朋友、争取中间势力、战胜对手即独裁专制的砝码的统一战线，反而沦为软禁“朋友，
中间势力”的政治囚笼，沦为换人换班子继续独裁专制的工具。
这便是一统而为皇帝、总书记、升官后，并推行独裁专制的必然结果。没有战争或者和平民
主机制制约，皇帝、总书记等官员的权力一方面既不受民主监督，另一方面其权力也因缺乏

民主制度保护而有丧失的可能性，他们便天性“我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不会保障曾经是

“一个战壕的战友，哥们姐们，同僚们，同志们”的人权。而且，比对待投诚的敌人、逃到

远方的敌人还过分，因为他们最担心“堡垒从内部被攻破”，最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这也是“小人得志便猖狂”的由来，包括皇帝在内，独裁专制制度使他们“得志便做小人，

也只能做小人”，拿朋友、战友开刀。不做小人，不用强权，没有和平民主制度，用什么保护

他们的既得权益？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民主结束而一统，一统又不建立民主制度而以和平独裁专制续之，除了

保持独裁专制权威的“兔死工具烹”和大小尊卑、翻脸不认人等悲剧，政权内部还必然产生

“窝里斗”悲剧。窝里斗是个常见的名词，它指的是内部斗争，自己人整自己人，打自己人，

其惨烈程度往往超过对敌斗争。窝里斗是争权夺利的需要，也是意见相左、路线不同，但必

须坚持己见而事业才能继续前进的需要。它以一方彻底打垮、制服、消灭另一方或几方为特

征，即所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无情斗争，残酷打击”。只有这样，胜者才能令所有的

决议都“一致通过”，没有弃权，没有反对，才能令天下对其“保持一致”，推行自己的政见。

所以说，除了争权夺利，窝里斗实际上是独裁专制制度内政治生活与斗争的必然形式，党内

十几次路线斗争就是它的突出表现。独裁专制政治不同民主政治，它不能，也不允许如议会

政治那样对一些问题、政策、政见等做公开的讨论、辩论、投票、通过，它只能暗地里进行，

黑箱操作，以拉拢人，党同伐异，软禁或消灭异己，形成自己的绝对权威势力，才能贯彻自

己的政治意图。这造成权术、斗争往往比政见本身更重要，站错了队，比抛弃真理和理想还

可怕。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逼迫着人们忙过关，说违心话，做违心事。

这注定了独裁专制制度政治是个人崇拜的，是威权主义的，是残酷、黑暗的政治，是政治家

本身也与人民一样缺乏人权保障的政治，是政治家把脑袋别在裤腰带的政治，

“胜者王侯败者

寇”，不成功，便成仁，别无他图。最后，不仅难逃死亡或身败名裂，连个普通人的安静日子

也过不成，祸及家属。大家想一想，姑且搁置1949年以前战争时期的党内斗争，搁置党

外斗争，1949年以来和平时期的党内斗争不也是殊死搏斗、充满血腥吗？多少优秀共产

党员，华夏英雄，卓越的炎黄子孙，死于独裁专制制度内部的窝里斗？

但是，即使共产党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三权分离的民主政治制度，而在党内允许不同意见存

在，允许党内自由竞争，并逐渐形成共产党一队、二队、三队等，保障持不同意见者的人身

安全，同时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以民主的自由投票体现集中，而不是以集中去消除民主，

岂不是利党利国利民利干部！

面对复杂的内部斗争，这关于“共产党一队、二队、三队”的设想可能是幼稚的，但它是中

国不流血而走向民主的途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党的利益，它们需要多少党就可以组建

多少党，宪法不能有反党罪；分裂党、反党、组建新党，不是分裂国家，不是危害民族，不

是罪过，它是创立民主中国的必须！必须取消四项凡是迷信和“保持一致”，必须取消党内的

帝制、帝位、皇帝，必须使共产党民主化，必须保障党员的自由民主权力，必须允许共产党

自然分裂，派生出其他党派，必须保障其他党派与共产党平等竞争。

这种窝里斗还影响到了中国经济、企业、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军界等各行各业，是“一

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三条虫”和“中国不过是一盘散沙”的基本成因，败坏了中国

人和中国国家的国际形象。但与其说窝里斗是中国人的痼疾，不如说中国人深受其害，深受

独裁专制制度之害。

大陆各级党政官员们，所有中国人，人权事业是每个人的事业。别喊“党国万岁”，应该是民

主中国万岁！三权分离、议会政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没有皇帝等的民主

政治才是安全的政治，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是祸国殃民糟蹋人的政治。为了自己的治国安邦事

业与理想，为了人民利益，为了自己及家人的前途，为了“兔死工具烹，小人得志便猖狂，

窝里斗”等政权内部悲剧不再危害个人与中国，也应该创立民主中国！与人民携手，与台湾、

香港、澳门等联手，创立民主中国！

（6）战争民主与和平民主，都是实质民主，都是人民人权的天然保障。前者不得已而为，

是流血形式的。但人民反抗独裁专制的战争本身是为了和平与自由民主之人权，故而和平民

主更可贵。战后，战争民主自动消隐了，走什么路？是以人大政协类虚假民主、泡沫民主糊

弄天下，沿用战争独裁专制，还是改弦易辙，除旧布新，创立和平民主制度续之？这是任何

民主革命能否真正成功的一个攸关问题。

1949年以来，在和平而独裁专制的时期，此消彼长，一退则有一进，两种性质的民主都

没有了，稳定了，独裁专制的个人个体主义则势必越来越膨胀。一个空间内，一个政体内，

一个国家内，他等大小官员个人个体仰仗国家机器和强权，使自己膨胀了，留给军人、他人、

党外与人民的空间势必越来越少，即其包容量与包容性越来越小，越来越装不进民心民意，

最终导致排斥、压抑、打击民心民意，甚至与人民为敌。当然，也最终失去人民、军队，失

去政权。

但至少，如果没有一个独裁专制政权对全国全民与各地区（各“国”各省市自治区）政权的

一统或统一，良将们与普通人一样，必有战争民主支撑他们自由选择的余地和机会，此处不

留爷，自有留爷处！至少，国家以内，人民必将享有更多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你国民党搞独

裁专制，我可以到延安等共产党根据地去；他不信仰共产主义， he 可以到国统区去。你大陆

一党独裁专制苛政猛于虎，我可以自由移民外地、他国嘛！民主的一项指标就是提供充分的

选择机会，就是鼓励自由选择，人民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力，不是所谓背叛、叛徒行径。

统一中国是伟大的事业，但中国被独裁专制政权统一，则未必是伟大的事业。设想一下，如

果不是政权归一统或者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统一即它独得了天下，即如果不是失去了战争民主，

那么，对社会上的自由民主等“异动势力”，拉拢、收买、三顾茅庐等都来不及，他们怎么会

杀良将、反右派、“无情打击”，韩信们怎么会不死于战争时期而死于和平时期、死于胜利后、

死于统一后，怎么会倒霉于“杯酒释兵权”，死于“敌国亡，良将死”？

在此，特别注明，我们不是反对中国统一，不是说过去的“统一中国”不好，而是分析历史

现象，以利于“民主统一中国”，或“统一中国，必须建设民主”，尤其要防止“独裁专制统

一中国，或者中国统一后，被迫走向独裁专制”。

而且，有鉴于战争引发的战争民主和战争独裁专制的双刃剑，必须提请注意，我们现在应当

倍加提防，防止、制止中国的独裁专制者利用台海战争或其他战争，包括对人民的恐怖冷战，甚至有意扩大事态、谎报军情、捏造事实而挑起战争，妄图以新的战争民主和战争独裁专制拒绝和平民主，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核心周围的空前保持一致，统一”的效果，延喘其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期限。我们一定要警惕、阻止、扑灭一些人权践踏者“跟着战争（民主）成长，以战争、高压等极端两手抓延续独裁专制统治”的狂想。历史也还会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战争民主的压力，“统一中国”而不推行和平民主，却任由独裁专制膨胀，只能使它在腐败中膨胀，在膨胀中腐败，并不可收拾，最后在人民起义等的战争民主中结束。也许，战争民主的最后一个含义是利用战争，如独裁专制发动的战争，或者人民起义、军队起义、直接对独裁专制宣战等其他什么引起的战争，或者就是全民和解的和平非暴力人权大进军，推翻独裁专制制度，创立民主中国。不过，我们必须避免战争民主只能带来独裁专制新王朝循环的开始！

（7）但细分起来，中国独裁专制的王朝循环连绵至今，它以中央集权为特征，有两种形态。一是起于秦始皇的一人一家一姓独裁专制全国全民，是家天下。二是起于国民党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全党全国全民，是党天下。两者虽然有家天下和党天下之分，但实质上都是个人个人的天下。个人天下的王朝循环，其起点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结束。那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不是它以后的中央集权，正是它以前的那些权力分散、地位平等的小国联合体，正是在那里，人民能够在其中享有相对的独立选择权力。正是虽然没有和平民主，但人民却能够在其中找到战争自由民主的小国联合体所形成的“联邦制”大中国，奠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基础。那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时代。套用现在的话，它就是一个古典的多党制、权力分离制横制、舆论自由等的民主时代。而一旦中央集权秦制确立，并经宋代等发展完备以来，虽然我们不否认其进步意义，但其破坏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例证很多，统一思想，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天敌。保持一

致，是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剃刀。2000多年以来，由享受家国朝廷、党国政府优待

、关怀、奉养而公费搞出的各类经书、大典、学术研究、意识形态一元化，路越走越窄。它

们更换名目，颠来倒去，无非是为了巩固帝制帝位，继续顺产或者难产、怪产一堆帝王、核

心。这导致官方制导的社会主流文化几乎走进了死胡同。其文化与文明价值（主要指政治思

想方面），远远低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祖先们独立思考、自由研究、自费传播、辛苦奔波、风

餐露宿创作的诸子百家、世界经典。数百年的分门别类、多姿多彩，可以成书成册，数千年

的“经学、显学、意识形态”却一统统一、大同小异，写于一张纸足矣。前者是珍珠钻石，

后者是一个大草包。耀光之后，是2000多年的黑暗。中国制造，它照亮了世界，惟独难

以福庇中国。比较一下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图书馆，看看谁书种多，内容丰富？什么书位

置最高，最重要？真是浪费。

有战争民主伴随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固定僵化的模式，没有独尊的权威，“天下之人各为所

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篇》）”。中国思想文化经济等各行各业异常活跃，其“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产生的诸子百家思想等，至今为世人享用，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立国之瑰宝。

至少，无战争民主，则无孔子周游列国之讲学，则难有民性儒学矣。有人认为“诸子百家”

的光辉是思想大解放的结果，其实，虽然思想始终天性地追求解放，并只有在解放中发展，

但由于它易于被独裁专制等生存环境禁锢，故而很少能自己解放自己。

回顾近代史，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盛极一时，很大程度是因为满清

覆灭后，还没有一派军阀，一个党派，一个核心，强大到足以“一统、独裁专制”中国。

五四运动之前，袁世凯依靠单边强大的北洋军阀势力，得以“一统”而恢复帝制，做了83

天皇帝，他怎么会不刺杀、追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孙中山等？

五四运动之后，单边势力强大的国民党，依靠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推出了“一个领袖，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一统”，这般“一统”及其推出的帝制与皇帝，怎能容忍共产党、

中国民盟等，怎能使中国文化永远如五四运动那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国民党之后的中国大陆，仍被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强大的意识形态等全方位的“一统，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皇帝们以共产主义理想和“老人政治”的混合体，进行“在位最久，执政时间最长”的竞赛，怎么会不制造“统一思想，保持一致”而真正贯彻、激活“双百”方针？怎么会不阻碍中国文明的复兴？

试想一下，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下，四项三讲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下，非自由民主制度保障下，中国能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皇皇景观吗？当代中国能不如同秦代的焚书坑儒、明代镇压东林党人、清代文字狱等那样，持续出现镇压五四新文化运动、迫害共产党、镇压学生运动、枪杀闻一多等知识分子、1957年反右、反右扩大化、80年代初镇压民主墙、反对和平演变、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制裁1986年学潮、1989年六四镇压、1999年镇压法轮功吗？有成串的国耻与民族悲剧，中华文化文明能不受拖累、侵害吗，能在“双百”中发扬光大吗？正是军阀混战、国共内战等，正是上海有了租界，才有了鲁迅。否则，他早被掐死了。

而历史表明，一旦秦始皇建立了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就一直被一人一家一党独裁专制到现在。除了五四运动等一些亮点，思想文化等很多方面陷入了僵化落后的窘境，只有伪儒学、伪三民主义、伪马克思主义等经学一统天下。还有人以暧昧或赞叹的语调说：“秦国最终战胜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制，影响中国长达2000多年”。中国一直是统一国家是不会有错的，但“建立秦制，影响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秦制——中央封建集权政治体制”，则无疑至少从近代以来妨碍了中国的发展。

可见，“思想大解放”、文明的产生与复兴，很大程度上不能够做到自主解放，而应当是被动语态，是思想被解放、文明被复兴了。被谁？被“春秋战国，群雄并起”的战争民主与自由解放了，被没有“借一统而独裁专制”势力而有鼎立势力存在的社会环境解放了。现在，台湾、香港、澳门，不正是因免除了独裁专制困扰而得以“言论自由，百家争鸣”地发展中华文明吗？千万别让他们亡于大陆帝制帝位帝王之“统一思想，保持一致”，中华文化与文明需要他们领航前进。

也许，至少从戊戌变法以来，秦制无过，因为不是它妨碍了中国发展，而是当权者选择了它妨碍中国发展。2200多年的秦制不是它自己延续的，而是后来者对其的亲睐与嗜好延续了它。满清王朝、袁世凯、张勋、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和共产党一党独裁专制虽彼此痛恨，却殊途同归选择了独裁专制政治体制。

（8）秦制以来，二十四史已经是二十六史了。其实，虽然2000多年来，每次改朝换代后都披上了同一独裁专制体制外衣，但改朝换代本身也是战争民主的结果。在“新王朝建立——兴盛——稳定——腐烂衰亡——民不聊生——混乱与群雄并起——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的模式中，“违逆民意和顺应民心”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得人心者得天下。“群雄并起”使原本如铁桶般稳定的王朝出现裂口，群雄们如同反对党、民主党，总是给人民一些自由选择未来的机会。人民以直接参与的方式，分成不同的对阵营垒，最后，虽然不排除群雄的个人魅力，但“民心所向者——获选票多者”，获得新王朝。这是毛泽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注释。可见，没有和平选举，改朝换代也是战争民主和战争选举的结果。只不过这选举，这民心与民主不是用纸与笔表达出来，而是人民用刀、枪、暴力、流血、残疾、死亡等在行使投票权力。

世界史的长河里，中国是封建史最漫长的国家，也是人民起义最频繁的国家。然而，尽管勇敢无畏，尽管血脉里充溢代代相传的执着，但是，迄今的中国历史表明，这些以血肉选举、以生命投票的战争民主，总没有使中国人民获得真正的和平民主。一些建立了政权的农民起义最终不过是与朝廷分庭抗礼，没有逃出旧体制的羁绊，或者主动沿袭旧体制，在独裁专制的旧窑上烧制新的王朝。反对等级制度者建立了更加严格的等级制度，主张女权者最后歧视妇女时一点也不比其他君王差。而尽管借口、名目、主义都不一样，但反对他人他党一党独裁专制者推行了毫不逊色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但历史的结果表明，虽然都顺应民心，借用了战争民主，但不成功的人民人权起义，如大顺政权、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等，失败于急于称帝、急于因袭君主独裁专制制度，失败于继续顺应民心，建立民主政权。成功的兵变、崛起，也都顺应了民心和战争民主，如陈桥兵变、

清朝崛起于关外白山黑水之间，国民党纵横中华，等等，也失败于顽固坚守独裁专制，拒绝

人民的民主要求。中国历史推出了四大名著，前三部是厮杀、征伐与战争，最后一部是衰落。

其中，在厮杀与战争中，有惩恶扬善，不乏人民求自由、争民主，不乏取经、维护人权。但

厮杀与战争如果都只是独裁专制王朝循环的一个过程，但如果人民因追求宽松（自由民主）、

幸福生活而投身战争的结果只是重新被另一个政权独裁专制，只是得到一个又一个的《红楼

梦》，那一个个王朝注定是要兴盛—衰落的，中华文明也是难以前进的。

但是，建立一个又一个《红楼梦》，不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宿命！也只有走出“红楼梦”，

并且不是进山做和尚，不是迁避海外，或者闭门研究，而是抛弃旧体制，走出金字塔的官本

位社会结构体系，建立点点平等的网络社会结构，而是只有突破“红楼梦”的独裁专制社会

框架，只有突破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治体制，只有以人民主权立法，转型走向自由民主的人

权文明，中国才能发展、富强！

现在，共产党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不做李自成”，江泽民四项三讲

时代的共产党能够既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又成功地“不做李自成”吗？我们可以断定，如果

不推进共产党民主化，使党内民主化，使每位党员享有作为党员和公民的民主权益，如果不

推进中国民主化，不使每位公民享有民主权益，使中国融入民主世界，那么“不做李自成，

不做国民党败退大陆第二”，是很困难的！

当年，国民党尚有台湾可退。现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一旦沦为战犯，还往哪里退，哪里

躲？

4、又从种党走向党国、核心国

（1）战争及其战争民主，即人民革命的目的，不在于革命本身，而在于革命成功后建立什

么样的政权。否则，民主事业必然遭遇糟改，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血肉，只能成全独裁专制

的江山。古人古党没有这样的觉悟，今人今党应该有。

但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农民运动、红军革

命、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学生运动等革命，却总是被违背初衷，没有收到革命时期盼望的民主支票。

我们都记得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一张照片，天安门城楼上站满了民主人士和各

界代表，他们真实地衬托出了当时的共产党的伟大，“众星捧月，众望所归”嘛！但从那时到

现在，这一特定人数指标曲线的斜率是负数，是下降的。它反映了一党独裁专制在不断扩张，

而人民民主不断缩小的趋势，也是独裁专制空间膨胀而人民自由民主不断缩小的空间对比图，

是一党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特权不断欺压人民人权的走势图。

其实，早在战争结束、新中国正式成立之前，成为大党的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已经初露端倪

了。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主席写的1949新年献词——《将革命

进行到底》。献词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策划“和平”阴谋，在革命阵营里“制

造反对派”，指出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这里是

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果然，23天后的1949年1月22日，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

民主人士的代表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声明。强调

“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并与

“中间路线”彻底决裂，一致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是跟随国民党，就是追随共产党。端正态度，统一思想，保持一致，

只许天下归一，万众一心。不是反对派，就是拥护派，决不允许存在什么中间派、第三条道

路。否则，必然遭遇糟改。

可是，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古人还曰“三位一体”。一党、一个

核心、一极单极化、一位一体一元等，是难以稳定的，除非它是金字塔结构。三角形、三权

分离、两党政治、多党政治最稳定。允许第三条道路中间派、反对派、少数派存在、发展，

等对民主中国是多么重要。他们可以形成政治架构的三分形态、多分形态，是社会民主与否

的一项硬指标，也是基石。历史已经证明，以一分为二反对一分为三、为四，以非黑即白反

对黑白灰共存，以非此即彼扼杀你我他共存，是平等大忌，自由大忌，民主大忌，人权大忌。

中国大吃此亏。

“战争民主”中的反对派行将滚蛋，和平民主中的反对派也不许存在。奋力反对国民党一党

独裁专制并取得成功的结果，是必须拥护、绝对服从共产党一党独裁专制。这是一颗苦涩的

成功果。民主党派代表中国人民追求的民主政治在哪里？他们被迫放弃的不仅仅是“第三条

道路”，而是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等民主中国架构。一个假民主的政协，一展怀柔、

圈养技艺，一网打尽了民主中国的中间势力，也是中坚势力。

想抗争，我引蛇出洞，先给你们来个“反右及其扩大化”。你们老实了，又有他人怂恿你们，

或者亲自登场，占领广场，我再给你们来个“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社

论戒言、军事戒严与武装清场。看谁不服？战争结束了，想要和平民主，没那么容易，我两

手抓，有冷战、热战等着你们。

不难看出，新中国尚未建立前，曾经“与各民主党派休戚与共”的共产党早已经没有打算与

其他政党、人民团体共享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国有资产等了，没有打算“民有，民治，民

享”了，而是抱定了一党“独有、独占、独享”的政见。这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曾经提出的“立

党为公”论断，走向了“立党为党，立党为私，立党为核心”之为私的反方向。这些继续迫

使中国走向了家国、党国之私天下循环的老路。

无论自愿或强迫，各民主党派因放弃民主而成为陪衬，已经被定位为大一统的一党独裁专制

的儿子党、孙子党地位了，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各种不符合中国共产党（包括不被其认可）

的路线、思想、学说、势力、个人、生活方式、社会行为、治国方略等已经被处于取消、禁

锢、消灭的刀俎地位了。一党独裁专制成为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大势，不符合“党的领导核

心”者视同分裂党、反对党，必被拿下。

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据史料记载：1949年9月18日，北平党政军各界群众团体在

中南海瀛台大殿设宴，欢迎到达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的代表们。瀛台曾经是戊戌政变后，

改良改革派代表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历史表明，这应该是中国民主事业的一个不祥征兆，

因为1949年以来，中国政协里的各民主党派和各团体代表等，都被老子党囚禁为儿子党

地位了，民主权力一年不如一年，完全成为一个只能“我赞同，我拥护”的表态机器了。

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主性质越来越淡薄，专制倾向越来越强。如1954年确立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写进了宪法，却在1975年被删去，直到7年后才得到

名义上的恢复。五十年代中叶以后，独裁专制制度从“反右”开始排斥政治异己力量，乃至

提建议、意见者。任何人、任何其他政党的首要生存条件是不反对党，不参加反对党，不做

反对党。又如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维护独裁专制地位的内容写进了宪法，这相当于一

个人、一个集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是神，应该永远独自主宰天下，并且用立法的形式巩固

它，真是荒唐、荒诞而遗笑世界。

很多人因为不甘心吞吃这独裁专制苦果而倍受打击，甚至在抗争中死去。五十年代的右派罹

难，1959年、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事件等中共高层动荡，应当是中国民主事业对中国

独裁专制历史痼疾发起又一次悲壮冲击的悲剧结果！他们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接辈人，也是1

989年民主运动的前辈！大浪淘沙人权在，中国不应当只给他们平反，更应为他们立碑！

但党国官史却认为，这些为共同筹建新中国打下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从后来的历次所谓党内

党外政治斗争，镇压民主墙，反对精神污染、和平演变及六四镇压等，直到目前的宣布法轮

功为邪教等，就政治理念、治国方略、处理社会不同意见的方式方法等而言，从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不是人民主权立法的机构而是一党独裁专制御用的立法机构而言，从四项三讲墙阻挡、

耽误改革开放而言，从中国没有能够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却冒出了一个什么第三代

领导集体的核心而言，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重要的政治基础”影子。六四镇压后的199

3年，秉承上级旨意，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塞进宪法，它成为了“国家意志”（这是当局的所谓依法治国）。

民主，是人人平等，也是党党平等，是人人与党党都可以是国家社会生活的种子选手。政党

政治本身是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但是，中国一党独裁专制下的其他一切政党都被统称为永远只能处于儿子地位的“民主党派”。这种老子党—儿子党模式，完全不能与执政党—在野党模式相提并论。后者确保多党民主政治，前者确保一党独裁专制政治，最终确保一人独裁专制政治，即皇帝政治。

从实质上讲，这老子党—儿子党模式，类似于“种姓、种族制度”，是“种党制度”。¹⁹²

5年《国民党组织法案》也开过“中国种党制度”的先河，它们排斥自由竞争，助长官场权谋、黑箱操作与腐败。最大特点是党党不平等的，党员与非党员不平等，造成“党有贵贱，党贵民贱”。不是党员，低人一等，参政、经济与文化等公民权利俱受影响。种党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权利不平等，是各种不平等的根源，最终造成全体公民之间不平等，是被独裁专制的中国社会缺乏公正平等的根源之一。老子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地位高于任何其他党，永远“光荣、伟大、正确”，是皇党，其执政地位终身不变，是终身制，政权与国家机器等是他们的终身财产。

老子党生产核心、皇帝，皇帝分封大小党政父母官，制造党民、子民、群众、贱民等。顺延下来，或者祸及下来，由“种党制度”派生了“种人制度”，中国的社会等级诞生了、延续了：

党的领导人，党魁，党的领导干部，党员，党员干部，非党员干部，以工代干群众，革命群众，先进群众，群众，落后群众，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应该接受劳改、教育教化的人，反革命分子，应该镇压的人，直到汉奸与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只是大致的分级，细化的更复杂，那“党内有级，党外有别”的名堂多了。结果，如同国民党一样，本来以反对不平等为使命的共产党，则不可避免地违背了立党宗旨，反而成为新的不平等金字塔的权重位高者，而且不能容忍他党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毫无疑问，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那些政治等级高的，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享有更多的自由民主等人权，如参政、议政、定政权，知情权，经济收益权，甚至免于刑事处罚权。

当然，中国还是在进步，市场经济已经对独裁专制政治体制注射、打入了市场政治的讯号，即民主政治的讯号。现在，不入党，不走官路，曾经是最低层、最没社会地位的、最遭白眼

的“非党员群众”也有其他的成功机会了。如，经济富有者有时可以比政治富有者更有人权。

但是，与这进步同时而来的几个落后则对谁都是致命的。

一方面：我当官的凭什么比有钱人差？于是刁难他，以党权、党员身份压制他，以权泄愤，

不让他的企业好受，阻碍了经济发展；于是向他看齐，既然钱好，那就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由多吃多占等多捞些，而多贪污些、多受贿些，最终腐烂了老子党及其独裁专制政权。

另一方面：既然入党做官，党票、官位值钱，管它什么信仰、主义，我想方设法得到它们，

买官、杀官顶替都可以干，这是不会赔本的买卖。无怪乎福建的一个贪官县委书记说：“当官

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诸如此类的党政官本位腐败范围之广，危

害之烈，是不胜枚举的。

这些社会丑恶，是不是那一至今仍然主宰中国的“重要政治基础”的同根同源的版本？显然，

种党以外的无权者是不具备做贪官、腐蚀社会的“重要政治基础”的。独裁专制下，人民是

种姓种党制度的受害者，人民也只能是受害者，人民没有“重要的政治基础”去或者学习贪

官，或者反击腐败。否则，天下大乱，无权无势无钱者更倒霉，人民被逼到暴力革命的绝路

上。

（2）儿子党、孙子党，都是儿孙党，它们在中国有一个貌似好听的雅号——民主党派。“民主

党派”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了搞清它，我们可以从“群众”一词着手。

在家国、党国之政治字典里，相对统治者而言，群众通常泛指受统治的社会大众，它的一个

同义词是“百姓”。这是家国时代传下来的。一人一姓之家国统治时代，国家有姓，如姓刘、

李、赵、朱、爱新觉罗等，是所谓家天下。而且非其姓者，不得封王，只有一人一家族一姓

是至高无上的，其他人则不必计较什么名分、称呼了，都是儿子，可统称为百姓（这比日本

强一点，古时普通日本人没有姓）。

党国时代，国家也有姓，它姓党，如姓国民党、共产党，是所谓党天下。而且非其党，不得

做大小单位、地区、部门、临时活动团体、出国考察小组等的一把手，不得出任国家重要职

务，为国出力，只有一党是至高无上的，其他党都是民主党，种党之下之百姓党、群众党。

可见，民主党就是接受统治的政党总称，就是儿子党，就是政党形式的群众、百姓，就是永远不可能成为执政党的政党，就是老子党、种党对其他政党的蔑称。

往好处说了，它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十足的假民主真独裁专制的虚饰，成全了中国人政协般的虚假民主、泡沫民主。每次开人代会、政协会和党的重要会议等，中国这老子党大家长多气派：端坐主席台，俯身一看，民主党派都来了，无党及各界代表人士都来了。我多民主，哈哈，都在阅读、讨论、学习伟大圣旨、御批、批示。民心民意民情算什么，长城外面的不满算什么，都是“颠覆国家，干涉内政，灭我家国党国核心国”的一丘之貉。人民算什么，法律算什么，都由我来定。家国御批治国，党国核心国是我批示治国、指示治国。人民大会堂，一言堂治国，一党言治国，一人言治国。我儿孙满堂。恩（加口旁），儿孙们还很听话，会没开走样，贯彻了家长族长党长的旨意，没有反对意见，天下归一统，天下一心。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哇，共产主义理想好！否则，这帝制帝位不存，哪有我等今天之荣耀？

可见，民主党派之“民主”含义，正是糟改民主、反民主的意思。无论如何吹，如何有特色，符合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治，儿子党与非党员人民实质上不过是一个空幻的组成部分。“新中国重要的政治基础”老子党—儿子党模式，也是中国人大和政协沦为橡皮图章的根源。50年后，1999年《中国人权白皮书》还声言“民主党派作为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都要反复向各民主党派征求意见，协商解决”，是十足的欺世盗名，是糊弄天下。

老子党——儿子党之定位，实际上是种党种人对其他党、其他人的人权冷战宣言。这一“重要的政治基础”完全否定了新中国的“人民国家”性质。如虽然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明确规定：

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和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等等，但是，人民发现“人民主人的位子被占了，那不是人民主权的中国，而是一党独裁专制的中国”，国家被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以“三个代表”等名义长期独自霸占。而现在，较之当初，人大政协的“民主性能”更差了。社会上流行的“年纪大了不要怕，不进政协进人大”，表明人大政协连“民主政治”的花架子都难保了。除去它们所做的大量的有益工作，它们已经成了安排党政要员的箩筐、元老院，是种党执政党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很多人还可以利用这两个“虚饰的议院”到国际上去访问、考察、蒙事，捞点个人便宜。

5、和平民主救中国

“战争推动了历史发展”已经是老生常谈。与其如此说，不如说是“战争民主推动了历史发展”。一些战争，尤其是人民起义（包括现代的静坐、绝食、游行、请愿、上访、练功等），本身就是人民对独裁专制王朝种人种党政权的反抗，本身就是为自由民主与人权而战。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如抗日战争，也是如此。所以说，战争民主还有一层意思：“战争推动了民主”。战争与战争民主，增加了人民的选择机会，这是流血的民主。为自由民主而战的战争，其原因通常都是统治者的顽固，而且常常是统治者率先放弃了统治冷战，而选择了暴力与战争等热战阻挡自由民主。但是，我们分析战争民主，说它好，不是说我们喜欢战争，崇拜战争。恰恰相反，我们反对战争！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多么希望不是战争民主，而是和平民主推进中华文明！不是战争民主，而是和平民主推进了英法等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军备竞赛与武器库，不是战争威胁威慑等确保了世界和平，不是一战、二战和冷战等战争民主，而是和平民主使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自由竞争并分出伯仲！而是和平演变代替冲突流血建立民主中国！我们不会因为战争民主能够推动民主而好战，也不会说中国重返春秋战国时代才叫好，也不

会喊叫把中国分成“11块、7块”，而是希望建立一种和平的民主制度，续接人民热爱自由民主的香火。这个制度能使民主不因为战争消失而消失，能使人民不陷入“不要战争、不起义、不打仗、非暴力”则不能得到民主的尴尬境地，能使民主不因为出现强人强党而消失，能使民主不因为一统或统一而消失，能使“结束内乱，走向统一”不是走向独裁专制，而是走向自由民主，能使社会不因为民主消失而蕴涵下一次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起义或者战争，从而抑制战争，能使国家、世界不陷入战争--战后复兴--兴盛--衰落--混乱--战争的恶性循环，能使和平繁荣永存。

这个制度不是阶级斗争，不是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不是四大，不是群众运动。这个制度更不是四项三讲、揭批法轮功。这个制度不为研究、开创者独有，不为先行者独有，不为其他国家独有，而为人类人权事业共有。它不因为所谓“西化，或者东化”而为一些地区独有，而为人类社会共有。这个制度能成功代替战争民主，并阻止战争，以和平的方式确保民主。这个制度是人类社会科学史的精华，是保障人权的一个工具与载体，正如四大发明作为工具使人类世界普遍进步了一样，它应当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受到普遍尊重与遵守。这个制度便是人民主权立法的民主制度，它以多党政治、三权分离和司法独立为基本特征，使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投票选择权，是人权至上！

继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之后，还有人叹息“中国封建体制具有超稳定结构”。那么，当今江泽民时代的四项凡是迷信与三讲三个代表，是不是正忙于强化这种独裁专制的“超稳定结构”？这样的“超稳定结构”是人民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大敌，它是一个阴森的大黑洞，吞噬人民战争时期的革命成果，吞噬人民和平时期的劳动成果。这样的“稳定”，这般天下太平，肯定是孔子等圣人不愿意看到的，这不应当是中华文明主流。中华文明的主流在中国被独裁专制统治之前，它还将在续航在中国结束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之后，并获得大规模的复兴、发展。从上古至今，中华文明推出了很多使全世界受益的人权至上思想，一个遗憾是不曾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载体（制度）实践它们。

当今中国大陆，失去了战争民主，又没有依三权分离原则存在的和平反对党、在野党等能够

挺身而出，那些来自内部的整风、三讲，民主评议干部，反腐败，加强干部政治思想教育和

廉政建设，设立纪检委、监察局、反贪局，逮捕、枪毙，等等老金刚钻，都不会管用了，都

不会使干部觉得有“无形和有形的民主”在监督他。民风曰：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

锋的干部无踪无影，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江泽民的干部腐败成风。中共历史上，好象只

有毛泽东主席时代的干部两袖清风，他真正管住了干部作为人的“人之初，性本恶”的天然

劣性：以不公平不合理不正当乃至非法手段满足个人占有欲。那些干部是被老人家称之为“官

僚主义阶级”的党政官本位群落。

现在，战时国民党的围剿、辱骂没有搞倒、骂丑共产党，为什么和平时期的共产党倒整天被

人民争自由民主的人权事业搞得狼狈不堪，忙于应付国际指责，倍感江山岌岌可危？为什么

很多肩扛民主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及盟友在 1949 年以后倍感失落，并不得好报？一个吸收了

很多优秀中华儿女加盟的共产党组织为什么会没有威信，人民普遍唉声叹气、民怨沸腾，但

求“变天”？为什么共产党的事业推进困难，不说名声有些臭，至少形象不太好吧！

这原因便在于一无战争民主，二无和平民主，只有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在逞能。在于一人一

党独裁专制全党全军全国全民愈演愈烈，在于 2 0 0 0 年中国军队换装还要高喊“感谢江泽

民总书记的关怀”，在于“三讲”，在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必须“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于江泽民等大小一把手可为所欲为。他等一个人能管什么大用

呢？他非要管大用，即是中国非要倒大霉！这是曾经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悲哀！这

是致力于国富民强的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的悲哀！这是中国与世界人权事业的悲哀！

“战争民主”是特殊民主，它太痛苦，它至少吞噬了 3 0 0 0 万中国人。它也不灵了，世界

应该全力避免它，中国更需要和平民主，需要永恒的人民主权的代议制民主。然而，1949 年

以后，共产党成为独一无二的执政党，“战争民主环境”不复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又不是真正主权在民的和平民主制度，“战争独裁专制”却延用至今。

独裁专制制度必然产生统治及其统治者，即产生帝位帝党帝人，即产生统治地位与统治利益，

即产生一人制、一姓制、一党制、终身制等，即产生顽固、保守它们的本能，这是人民自由

民主与人权的最大侵害者。

这导致中国共产党变质了，如同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建立政权后变质了是一个道理。

他们都由为人民夺取政权，或者仅仅是个旗号，嬗变为反对人民染指、参与政权，保守一人

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即最终是以皇帝为首的大小官员至高无上的王朝政权。这如同过去的农

民起义军变质，使得本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组织及其成员，成为全社会最富有最有权

势的权贵，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最后才能

解放自己”，而是自己如六四镇压那样掉转枪口对准人民，统治人民。共产党不是如标榜的那

样“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是它的利益”，而是它有“统治人民的利益”，先锋

队成了统治队、先捞队、先得队、先分队、先富队。所以，第一代核心等王朝高祖往往是人

权英雄、人民大救星，受人民爱戴，第二代的威望等便要差一些了，第三代则有堕落为狗熊

的危险了，直到垮台、为人不齿。

俱往矣！我们不能选择历史，但我们可以选择现实；我们不可以改变历史，但可以改变现实。

我们总结历史，便是为了选择现实，改变现实，并因此可以创造历史：我们必将可以改变一

人——一党独裁专制的现实，而谱写推进中国民主的历史。

战争民主是苦涩、流血的。中国民主事业进步缓慢，不是人民奴性强，不是民主革命少了，

而是民主革命被盗窃得太多了，才收获少了。现在，我们最紧迫的任务不是以革命而为独裁

专制的改朝换代傻卖力气，而是如何使战争民主不再成全“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的王

朝循环，而是开拓出一个主权在民的新社会。

如果说以战争推翻任何名目任何政党任何人的独裁专制统治是战争民主的最后一个含义，那

么，让我们采用新型战争，如非暴力、不合作、静坐、游行、绝食、上书、和平演变等，以

全民和解的和平非暴力人权大进军创立民主中国！

三、一国一制，民主中国

1、两岸问题的历史对比

把脉过去，我们发现历史常常惊人地相似。如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包括澎湖列岛等8

8个岛屿），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受外国列强侵略、侵占，又多次与祖国的其它地区和平共处。

近代以来围绕分裂与统一，它与中国大陆有两条极其相同的大势走线：

明朝末年——李自成——吴三桂——盘据东北的清兵入关——清朝——荷兰殖民者1642

年霸占统治台湾——郑成功1662年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奉明朝万历年号。

那时，大陆已是清朝统治。虽然南明永历政权已经灭亡，可是郑氏台湾认为自己不仅是正根，

至少是一个实际上的独立政权（注意，独立政权不是独立国家），与大陆也没有主从关系——

拒不接受大陆新的独裁专制政权的统治，它先“反清复明”，后又无力反攻，郑成功家族经营

台湾，发展国际政治经济等关系，谋求独立，使得台湾岛的开发与经济发展强于以前——遭大

陆围攻，康熙22年（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1684年台湾成为清朝的一

个府，1885年清庭正式设立台湾省。

清末民初——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东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军

国者1895年占领台湾，中国政府1945年收复台湾，蒋介石蒋经国国民党等蒋家王朝

败退至台湾。

那时，大陆以改朝换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自以为是正根，由“反攻大陆”、“光复大陆”

至无力反攻，并拒绝大陆独裁专制政权的统治，哪怕“一国两制”也不行。结束军事管制后，

逐步推行民主政治体制此时，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更充分。——迄今，大陆的“解放”与台

湾的“光复”相持不下，谈判加威胁，均无结果。岛内出现独立倾向，大陆虽愿意以“一国

两制”实现和平统一，但也威胁如清朝那样收复台湾。

历史对中国、中华民族开了两次无法挽回的大玩笑，国际玩笑。其方式、结果、力量对比、

力量转换、性质转变，都是如此接近，甚至可以看出如此清晰的轮廓。

如一：晚明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它是独裁专制王朝官本位下的王商官商型资本主义，其政府行为多与腐败严重等造成了政权岌岌可危，使人民纷纷造反，反对政权及其它翼下的资本主义萌芽。结果，一个更加独裁专制的满清王朝取代了明朝。而且，与元朝入主中原一样，来自较落后地区的统治者往往本身要经历一个“征服者被征服”的同化过程。这一些一方面延长了本来已经早熟了的的中国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推迟了本来已经发育迟滞了的中国资本主义，负负而更负，萌芽了的中国资本主义斩灭殆尽，至少是气息微弱。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悲哀，更是独裁专制政权官商型资本主义的必然败亡。因为明朝败于它自己的官本位腐败，而非败于满清本身，是官商型资本主义扼杀了资本主义。虽然独裁专制的满清王朝把已经具备条件的晚明赶出了大陆，但晚明之官商本身是搞不成资本主义的，如现在国企一样。

郑氏家族经营台湾，其初期目的是“反清复明”。后来，尤其是郑成功死后，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尤其是海洋贸易）和国家性质的关系，离异心渐强，最终演变为谋求独立。它的基本口号是决不服从满清王朝的独裁统治，并成为中华民族反抗满清专制暴政的基地。它直接导致了清王朝实施海禁，阻止了渔业、航海、海上贸易等的发展，进入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这使中国虽然有着数万公里的海岸线，却表现得象个内陆国家，只能局限于土地文明（因西部多是崇山峻岭与荒漠而不得更好地发展土地文明），只能象人类初始那样从土地上获得财富，阻碍了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这个获取财富的方式继续丰富、造福华夏文明，也阻碍了未来的太空文明的发展。

如二：中华民国的大陆时期已经培育了相当水平的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它是蒋介石国民党推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下的党商官商型资本主义，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反而很难立足，其政权的政治文化权力加经济权力的绞合型腐败等象毒瘤一样腐烂了资本主义及其政权本身。它造成的“资本主义是个坏东西”的国民心理贻害至今，而事实上迄今为止，除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中国还从来没有实践真正的资本主义。

那个毒瘤终于癌症化扩散了，1949年最终共产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取代了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几乎一切形式的资本主义统统被更加严厉的“高大全”的党有官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斩除。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再次受到空前绝后的打击。与晚明一样，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悲哀，也是推行党商官商资本主义政权的悲哀。各政权都仇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革命，原因在于这些实质都是人权革命，是人民大众革统治者的命。一个官商资本主义覆灭了明朝，一个党商官商资本主义崩溃了国民党国民党政权，它们都有台湾岛可逃、可守。现在，如果大陆共产党政权不推进民主化，继续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两手抓等大搞党商官商资本主义，可一旦崩溃于自身腐败，还有第二个台湾岛可退吗？清朝一定意义上也是覆灭于其晚期的官商型资本主义——洋务运动。不过，中国民主革命成熟了，不会象过去那样把对手穷追猛打、斩尽杀绝，而是依法治国、和平竞赛。此时，蒋氏国民党政权象郑氏政权那样被赶到了台湾岛，两岸关系开始处于“不是大陆统一台湾，就是台湾统一大陆”求统一状态。蒋氏家族党族经营台湾，其初期目的是“光复大陆”，并大力发展经济，谋求国际地位。正如郑成功死后一样，蒋氏父子死后，蒋家势力逐渐退出台湾政坛，军事反攻大陆成为天方夜谈，离异心渐强，最终抛弃“一个中国”原则，谋求独立。它的基本口号是决不让自由中国亡于独裁专制，并成为海外华人谋求创立民主中国的基地（香港也承担了类似作用）。这部分地使新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受制裁的孤立地位。这如同清王朝的海禁，并使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长期因备战而得不到发展，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大陆的“反右、大跃进、自力更生、文化大革命、盲目自大、闭关锁国”。但一个面临被“扼杀于摇篮”的新生政权只能、也必须依靠独裁专制高压乃至暴政求得生存，以公有制剥夺人民与全社会财富。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保持接触的和平演变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胜性。值得强调的是，其三，郑氏家族反清复明不成，然后借口国内民族矛盾“不愿归化”，搞台湾独立。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满族以外的汉族朝廷，这无疑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因为当时大陆与

台湾谁也没有建立一个人民主权性质的国家政权，不同姓氏（党派）的王朝国家政权并未改变各自的家国私有性质。它们间的差别不过是甲奴隶主比乙奴隶主少或多一点凶狠罢了。清庭维护国家统一，出兵收回台湾无可指责，正如如果是台湾郑氏反攻大陆、统一了中国而无可指责一样。这是两个王朝政权间的火并，其胜利与人民无关大碍，最后不是解放人权，而是特权继续，帝位换人。相反，少一个皇帝，还少了一套鱼肉人民的皇权官本位体系。

2、一国一制：决不让自由民主亡于独裁专制

（1）可以看出，近300年间，无论地理方位、地缘政治面貌、经济状态、人物因素等，清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两岸关系的成因、政策演变、大局走势竟然如出一辙。唯一最大不同的，是台湾已经民主化了，这使两岸关系今非昔比了。我们的态度是，决不让自由民主亡于独裁专制。为获取独裁专制统治地位而剿灭异己的战争，是千百年来中国任何一个强大的独裁专制王朝解体后战乱不断，国家处于分裂、分割状态的基本原因。没有一个主权在民、人民为王而是强者为王的法律体系与政权框架，便不能和平、自由、民主地把各种政治势力、不同利益团体等团结起来，使他们完全置于人民主权的监督、制衡、竞选之下。相反，各种势力希望，也只能凭借武力搞掉对手，剿灭异己，独霸中国，才能生存，并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中国人有智慧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和平共处等五项基本原则，为什么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不能推行百党共处、百党竞选、优者执政的治国方略？为什么各省各地区个行业不能自由竞争，而万事皆由一人一党专制？为什么反而以四项基本原则阻止大陆民主，以“一国两制”阻止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民主普及中国？1949年至1988年间的两岸关系（台湾民主化以前）与清初雷同，类似割据关系。不过是从两个一人一姓王朝政权对峙，变成了两个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对峙而已。它们的统治身份是一样的，谁也不是主权在民。这分裂是大党派动辄诉诸武力造成的，是大党派不能和平民主竞争人民选票而大搞你死我活的斗争使中国陷入了内战与分裂状态。

国共两党历来互不敬重，彼此为敌。当年国民党搞党天下，始终保持对共产党及其延安等根据地的据地的高压与剿灭态势，延安则高举民主大旗，赢得国内外多种势力的同情、投奔和襄助，并壮大起来，最终取得了大陆政权。

现在，台湾与当年的延安如出一辙，两党历史冤仇与独占中国的思想又使处于弱势的国民党倒霉了。这都是没有民主制度保证政党之间和平竞争、竞选、发展、取得民心恶果。强大方总是穷兵黩武，一心欲置对手于死地，致使河山破碎、国家分裂。

历史已经表明，抗战后中国一是发生了内战，二是中国共产党席卷全中国，三是国家处于两个政权并立的分裂状态。这份遗产的部分原因在于国民党拒绝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如果二战后国民党放弃一人一党独裁专制，而平等对待共产党等各中国政党，设议会，组成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决非今天这般光景，中国人民人权事业也决不会屡受重创。中国没有国民党坚持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也决不会有后来的共产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当时的国民党真不是东西！

它拒绝成立中国民主联合政府，赶杀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才把中国推到今天这般境地。

如今“一国两制”统一方针，因赏给了中国部分地区的部分人选择另一制度的自由而具有一点民主性，它优于当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剿杀，有进步。但是，它终究是拒绝由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人民组成中国民主联合政府或联邦政府的篱笆，是通过“圣上赏给其地方政府高度自治权利”而维持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极权统治全国的一种手段。

虽然，它的进步意义具体表现于“领土统一，制度可以（暂时）不统一”，即为了国家统一，共产党可以暂时不将独裁专制制度强加于大陆以外的中国人。但是，它的非进步与逆行在于继续保持中国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政权。以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名为社会主义制度实为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并以“一国两制”固守它，这构成了中国统一的制度性障碍。它名为统一，更是制造分裂。

（2）况且，“一国两制”也不是什么创举，它不仅过时、落后了，而且丝毫不新鲜。

关于它的“一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或者中国概念从来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是“一个国家”。

如香港、澳门回归中国的学名是中国对它们“恢复行使主权”，它们的过去是中国未对其行使

主权，是主权的暂时出让，即他们始终仍在一国之内。

如台湾民主化以前则是一个国家内另外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如大陆政权则因为各方面的强

大和坚持一个中国(不能如东西德、南北韩并立)立场而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代表”。

这个“中国代表”隐含的一个意义是：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完整的统一国家，大陆只是一

个代表，它并不就是“一个中国”本身。而且大陆以外的“其他被代表者不听从‘中国代表’

指挥”，尤其是与台湾还处于随时可能动武的你死我活状态。

可以说，“一个中国”从来没有遭到抛弃和否定，所谓分裂只是割据政权之间的隶属或者联邦

关系没有得到确认，只是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权力中心及政权并存。必须提醒，虽然中国以

内同时有多个权力中心或政权并存，但我们从没听说“多个中国”并存，即：中国只有一个，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解、统一之前，谁势力大，谁做“中国代表”。

关于它的“两制”也不新鲜。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三制”、“四制”等都有过。历史更是告

诉我们，中国社会历来“多制”并存，如封建制、农奴制等。即便进入1949年，中国社

会也不是“一国一制”。如大陆曾经共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西南少数民族领主制土司制和西藏

农奴制等，后来还发展了深圳特区等地的准资本主义制度。台湾则经历了国民党一党独裁专

制和民主政治。香港、澳门则一直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可以说，进入1840年后中国领土上历来是多种制度并存，从来不是一国一制，而是一国

多制。甚至大城市如上海、广州、青岛等还是“一市多制”。而且虽然所有“多制”都是内外

势力作用的结果，如被“租借”、割据、分裂、土围子等，但世界上还从未有“多个中国”一

词。

总之，一国两制可以构想，但当今世界，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不能共存。

“统一国家，统一的主权国家”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意识，它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与

事业。只要不搞任何形式的对人民的独裁专制，只要实现主权在民，尊重人权，使人民普遍

享有对执政党和政府等的自由选择权，享有财产、言论、信仰、宗教等自由，推行“统一的

民主制度，统一的中国”原则，则统一步伐必然加快。

民主制度下，不用说“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三制，一国九制，一国百省百制”都可以，甚至联邦制也不在话下。因为它们都是“一国一制”，即统一民主制度下的统一中国，这才是统一中国的未来。

（3）1949年来的50年间，海峡两岸最大的不变和变化，就是自由民主和独裁专制制度的变化与否。1988年台湾取消军事戒严，1992年台湾首次大选，2000年台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不流血的政权易主，这使得仍然顽固推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共产党大陆政权十分尴尬。初期“共产党大陆和国民党台湾”形成的“一个国家，两个政党，一种政权，两个政权（两个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对峙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民主化已经改变了台湾面貌，台湾已经不是国民党政权的台湾，不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的台湾，而是实现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新闻舆论独立化了的台湾。这使国民党，包括任何其他一人一党，都没有资格独自决定台湾未来了，而是主权在民决定一切。注意，这不是国民党失败了，而是它进步了，它新生于多党民主政治，卷土重来未可知。个党个人的帝位帝王利益让位于国家民族利益不是进步，难道还是退步！国民党不是因此下野、分裂或死亡，而是因此不朽。它因此而真正实现了1912年创立中华民国的理想。遗憾的是，50年来面对海内外民主浪潮，即使猛烈如1989年之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也毫不醒悟，也不做丝毫检讨。不仅拒不推行民主政治改革，而是变本加厉坚守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乃至现在，大陆仍然是共产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的大陆，还是共产党的大陆，而不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大陆。这个政权已经不如当今台湾的民选政府那样更具有人民代表性。它对全社会的独裁专制愈演愈烈，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左一篇社论，右一篇评论员文章，前一个讲话，后一个指示，全社会依圣旨、党旨、人旨而行。大肆“四项”、“三讲”，攻击法轮功，威胁台湾民主等，搞得大陆沉闷不堪、乌烟瘴气，人心思变。这表明台湾进步了，大陆停滞乃至退步了。政治民主多元化，经济自由市场化，社会生活多

样化，这些尊重人权的“兴邦国策”使台湾几近成为人权导航成功的典范。共产党大陆不仅因为台湾民主化了而相形见绌，也失去了老思路“两党对等谈判”的老对手国民党。

台湾不是“党权党国”了，是真正的“民权民国”，想用两党秘密谈判、黑箱操作等决定中国命运的时代过去了。统一中国的基础由两个独裁专制政权的“两党对等谈判”彻底上升了一个高层次，它就是“两岸人民主权政权的对等谈判”。

也许，届时“人民主权”的一致性使一切迎刃而解，两岸无需艰苦谈判而自然统一了。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欧洲尚且能够尊重人权而成为畅行无阻的统一欧洲，人权指导下的中国统一当然也会是顺理成章的“人权之作”。

两岸人权事业上的一进一退，意义昭彰。它使海峡两岸形成了“一个国家，两种政权，一个党国（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一个民国（主权在民政权）”。比较而言，民主化了的台湾政权更能代表国家、人民与民族。

事情不那么简单了，传统的党派竞争与武力统一，已经让位于是否尊重人民主权的制度竞争。

民主台湾已经是一个超越个党主权的人民主权的政权了，“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显然已经不合适宜了。

国民党现在并不能代表台湾，它只是众多党派之一，打倒国民党并不能打倒台湾人民主权的政权。共产党大陆已经找不到国民党这个老对手了，国事——中国统一之事，已经不是党事了，不是国共两党之事了，而是完完全全的人民主权之事。

否则，任何对台湾的武力进攻都是对台湾人民自由投票选举产生的人民主权及其政府的进攻，是“打倒台湾人民，解放全中国”式的进攻。

（4）台湾民主一马当先，中国人民开始真正掌握国家命运了！台湾民主化使“一个中国”突破了家国党国之局限，燃起了中国人民创立民主中国的希望。这更使原先的“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失去基础，新谈判基础是“两岸人民主权政权的对等谈判”。而共产党大陆一党独裁专制政权无法达标“新谈判基础”的“人民主权”标准。

显然，仍然把中国大陆“据为党国”是实现中国统一的最大障碍，而大陆民主化是中国再统一之关键。“一国两制”的部分含义，与大陆推行民主政治改革、缩短与台湾的对等谈判差距

等背道而驰。它更代表了分裂，而非统一。

根据2000年2月大陆发布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统一后实行‘一国

两制’，中国的主体（中国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其实质即是中国大陆继续坚持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台湾可以继续坚持日趋成熟的三权分

离的多党民主政治。

这就是“一国两制”下一个中国之面貌：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继续盛行，台湾、香港、澳

门等的自由民主岌岌可危，随时有被“两手抓”的危险。显然，“一国两制”是权宜之计，它

靠不住，不会长久。两岸三地，只要大陆独裁专制统治一丑尚存，则民主三小俊危机四伏。

专制消亡，民主崛起，是世界潮流，是人权文明进步的必然，更是人类前进方向。

“一国一制”

最可靠，民主才是凝聚中国的指航灯，才是中国统一、富强的基石。如同南方蓄奴制度有碍

美国发展，如同美国人民不能容忍其南北实行截然不同的奴隶与自由制度，不同地域、不同

民族的中国人，所有中国人民，也不能容忍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人权差距。“一个

美国”不要南方的奴隶制，“一个中国”不要大陆的奴隶制。

大陆民情与国情，不是遭独裁专制统治才合适，“一个中国”不是“一国两制、多制”才能存

在。中国人民不是生来厌恶自由、拒绝民主，乐于做经济、文化、思想、信仰和政治等奴隶。

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适合于香港、澳门、台湾，它们也适合于中国大陆。它们

适合于地球上每一个地区、国家、民族和每一个人。而除非有人甘做奴隶，否则独裁专制统

治不适合任何人。1949年后大陆政权曾经是反对蓄奴制的，不料保守统治地位，反使它

以“一国两制”保护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党有制、官有制等的蓄奴制。

既然同是一国之公民，大家应该享有同样的人权，正如美国白人黑人等各民族享有同样的人

权。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能对它的公民实行不同等级的人权标准！“一国两制，两种人权”不能

被人民接受，这是封建专制等级制度的翻版，是种姓种党种人制度的袭承。大陆人民不接受，

台湾人民、香港人民、澳门人民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不能接受。这是地域人权歧视，是种

族歧视的变种。

如果真的把台湾“一国两制”了，那么台湾人民能够自由投票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首脑，大陆人民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中国人的选举权只能在台湾实现，那中国人民都愿意去台湾，我们都做台湾人。

（5）换个角度看，台湾坚持民主，拒绝“一国两制”，是对大陆民主化的极好引导，是创立统一的民主中国的前奏。

独裁专制痛恨自由民主，特权痛恨人权，反之亦然。六四镇压不仅推迟了大陆民主化进程，

还使台湾人民产生了离心力，害怕遭独裁专制统治而害怕统一，害怕因违抗“党指挥枪，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而被“两手抓”，害怕重新陷入满清时期、日本侵占时期、国民党时期等的

独裁专制之黑暗。

六四后大陆政权拉大了大陆与台湾间的民主差距，使民主基础上的和平统一更加崎岖不平。

而且近代以来，台湾每一次谋求独立都是因为独裁专制制度迫使它缺少向心力、凝聚力，国

家分裂与台湾闹独立正是独裁专制制度及其暴政离心力的过错，正是帝制帝党帝位帝王势力

挤迫的恶果。六四对中国的危害岂止于大陆，岂止于当局控制的疆土，岂止于当局者在任的

短暂时空，它对中华民族的心理创伤、对中国统一大业的影响深远巨大，至少持续500年。

类似分裂使中国如“有裂缝的鸡蛋”，给外国蚊子解馋、撒毒的机会。它是中国落后、被人耻

笑、外国势力容易骑墙而渗透、挑事拨非的基本原因。完全可以说，当今中国之分裂局面，

主要是国共两大党互不相容却又同样信奉独裁专制治国理念所至。正是政党、强人们的敌对

导致了国家分裂，正是政党不和导致了同胞的分离。可谓两党互斗祸人权，两党互独乱中华。

近现代以来，中国之祸历来都是独人独家独党独裁专制之祸！

我们重申我们盼望统一，但无法期望“一国两制”既维护一党独裁专制又能统一中国，我们

更不能相信它能使中国富强。它的要义是大陆独裁专制制度不变，并将“民主三小俊”纳入

“独裁一大丑”麾下，实现所谓制度不统一的国家统一。

但制度不统一，国家无法统一，社会发展也受到限制。而且如同中国人民不愿看到国家分裂，

如同中国人民不愿意看到当年共产党延安被国民党独裁专制剿灭，今天中国人民也不愿意看

到一个自由民主台湾被大陆独裁专制暴力毁灭于一旦，我们更愿意看到自由民主与人权旗帜下的团结统一。

“一国两制”行不通，它是台湾民主，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可怕陷阱，是最终瓦解、统战、吃掉自由民主的陷阱。它很难导向自由民主统一中国，而极具独裁专制一统中国的危险。一

国一制的民主中国才是海峡两岸的共同期盼。现在，台湾民主面临着被剿灭的危险，但统一

已经不是武力征服，而是民心民意对人权精神的认同。统治已经不是管辖，而是经人民自由

投票选举而受到权力委托、代理者的为人民服务。我们相信，如果尽快实现大陆民主化，尽

快实现由大陆、台、港、澳等共同推动而创立民主中国，和平统一、国家稳定水到渠成。

现在，台湾民主进程推进很快，如自由投票大选、多党自由竞选政治等，基本属于国内外公

认的“民主社会”范畴。如同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世界落入希特勒法西斯等任何形式的独裁铁

蹄之下，中国人民也不能容忍台湾“民主社会”被任何独裁专制势力从地球上抹掉。同时，

率先于享受民主权利的台湾人民，也决不愿意再次退回到不能选举自己领导人、不能决定自

己命运的政治奴隶地位。

血浓于水，人权基础上的民族大义、领土完整与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炎黄子孙拥护统一。但

自由金贵于独裁，民主高于专制，人权高于特权，恰如电视片《中国命运之大决战》中毛泽

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反击国民党围剿时的讲话：“决不让中国民主牺牲在国民党独裁专制

统治之下。”

现在，我们说“决不让中国民主之先锋——民主台湾，牺牲在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之下”。这

也是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事业一如既往的良好祝愿。

我们也不会忘记元朝独裁专制政权不仅仅是灭亡了宋朝，它更毁灭了极有希望孵化出中国近

代资本主义人权文明的历史机遇。

俱往矣，看今朝。台湾人民不要六四，不要解除国民党独裁专制后再陷入共产党独裁专制，

中国人民与全世界都不愿意看到一个坚持六四错误的政权继续扩展他可能侵犯人权、犯错误

的领地。对台湾人民来讲，自由民不愿重做政治奴隶，对大陆人民来讲，政治奴隶也不愿看

到自由的同胞重陷囹圄，并且盼望被救出不专制政治的囚笼。

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在人民的盼望与支援下所向披靡的。
何谓自由民主？从禁锢、束缚、虐待、压迫、专制中解放出来，获得自主、自立是也。人民
自主自立的根本在于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之家国党国。
解放军解放
什么？解放人民自由民主于独裁专制，解放人权于特权！解放人权的军队，谁不欢迎！中国
不是一党之国，人民军队不是一党之党军。人民军队，继续解放人民人权吧！

3、中国军人的困惑

1989年，甚至直到现在，我们常常能看到，中国军人一方面“反对动乱，执行戒严任务”，
另一方面困惑不解。
那年6月4日2时40分许，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东面，一些人情绪激昂，开始向博物馆方向
闯去。我不知道他们会碰到什么不测，赶忙跟了上去。他们跨过广场东侧路，接近围上来了
的戒严部队。他们相信人民军队不会对无辜下毒手，镇定而不掩愤慨，扯起嗓门解释事情真相、劝解人民军队不要被利用，不要对同胞们开枪。尽管此前，全国各团体、各阶层人士的
“撤消戒严，人民军队不对人民开枪”等呼吁已经被击得粉碎。
这是一支臂绑白巾的部队。也许，可爱的官兵们开始琢磨自己究竟被愚弄到什么程度了，
他们个个流露出疑惑为难的表情。这些就是暴徒吗？从何说起？何从下手？我们刻苦训练，
加强思想政治学习，提高认识觉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服从“党指挥枪”，我们是钢铁长城，
是共和国的坚强卫士，就是为了掉转枪口，对付长城内的这些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仅仅因
为他们要求军队国家化、人民指挥枪？仅仅因为他们要求选举，要求结束一党制、终身制、
老人政治，要求“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文化、思想、舆论等自由化，
要求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仅仅因为他们要求人民利益高于党国利益、高于政府利益，
要求人权高于朝廷政府等政权主权？仅仅因为他们准备为共和国献身，为和平民主救中国献身？这就是1949年以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由先锋队进行
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行动吗？
我们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面前要被“清场”的学生、工人、农民、市民、知识

分子、各界军政企事业单位干部等，不也是无产阶级吗？这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怎么还是无产阶级阶级？他们跟我们一样，大部分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根本没有见过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嘛，这些不是虚幻的假想敌吗？他们怎么会喜欢资产阶级自由化，搞精神污染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是死对头吗，外国的资产阶级怎么还帮助国内的无产阶级呢？究竟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我们在为谁，专政谁，莫非是我们自己的另一半？有没有搞错？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了，但听说还存在着红色资产阶级。“红色资产阶级”？他们是谁，就是掌握或窃取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官僚主义阶级”的人吗？他们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承认自己是红色资产阶级，是“官僚主义阶级”，但为什么要给他们按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这不是冤枉了资产阶级吗？况且根据中共党史与理论，中国资产阶级一直很窝囊、很软弱、很无能，它无力对抗、推翻统治阶级，它领导的民主革命总不成功，最后才由无产阶级走上中国历史舞台，并挑起民主革命领导重担嘛。怎么建立了政权，便以为“民主革命成功”了，不以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制衡、监督权力，制止权力原罪，不主动消除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掌权者可能嬗变、堕落为新的统治者、党政官本位者、权贵等制度性痼疾，反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开刀，说它们很坏、很可怕、是最大敌人，必须对其实行全面专政，彻底铲除他们，才能放心、安心。这不对嘛，它理论上不一致，不能自圆其说。况且能力强的应该带领能力弱的前进，而不是消灭他们！

1949年以后“拒腐蚀、永不沾，割资本主义尾巴、当前最大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都是冲根本不存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下手的，而所谓红色资产阶级等常常安然无恙。

可见中国大陆共产党政权含义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还不完全清楚。而真正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全体人民、民本主义，就是平等天赋、自由天赋、民主天赋、人权天赋！那“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底是什么，不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吗，不就是人民

民主革命吗？这些被称作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坏东西，为什么总对“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闻风而动，是内在要求，还是外界影响？是西化、全盘西化，还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即所有人民、人类的人性内在要求，还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与“一个中国”前进的必然？

马克思列宁主义倒不是西化，是中国自己的？

看来不是什么西化不西化，不是拿来不拿来、借鉴不借鉴、学习不学习、融合不融合，而是以什么姿态融合什么，西化什么、拿来什么、借鉴什么、学习什么，而是发扬光大我们自己

的什么。奇怪得很，每次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统治者总是污蔑说这是盲目西化、崇洋媚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不是的，中国民性传统文化从来不缺平等、自由、民主、人本、民本与人权文化精髓，中国人民不分穷富与受教育程度，从古至今始终激荡着这些人性与人类本能。

参加近代民主革命以来的中国人民，包括农民、市民、学生、知识分子、官员、军人等都不是资产阶级，洪仁轩、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初期、刘少奇、邓小平、方励之、魏京生、李洪志等都不是资产阶级出身嘛，怎么他们领导的革命与改革开放等都被说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远的原谅了，近的被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子”。

那些挂社会主义招牌、被称作红色资产阶级的，怎么与总与封建主义满清等共一条裤裆，总是视资产阶级自由化即人民民主为天敌。况且，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好，我看他们比党政官僚主义阶级、封建主义阶级好得多！它就是全体人民！人民都愿意争取富裕生活，争做富人、中产阶级、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人愿意贫穷，贫穷是人类的天敌。

可党政官僚主义阶级总是以名为公有制实为党有制、官有制剥夺人民、扼杀富人、限制资本家，使人民陷入贫穷、困厄。他们居心何在？便于他们稳定、固守独裁专制统治权益，便于他们愚弄、统治人民！现在，他们收拾了资产阶级，又收拾无产阶级。为了保证他们终身执政、终身制、终身上岗，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社会各阶层必须下岗。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是什么阶级，怎么谁都不放过，可谓动物凶猛。

不管如何，他们都掌握着国家政权，是领导者，是独夫民贼，是民权窃贼。他们属于被猛烈批判过的“旧社会的统治阶级”一类。发动文革的毛主席说他们是官僚主义阶级，这便是统治阶级的同义词！他们有党政官本位特权，而其他所有人不分贫富地是人权受特权践踏者。我们不能以物质财富多寡划分阶级，更不能以剥夺他人，使他人成为穷人的方式成全自己成为富人。因为贫富可能改变、转换，物质财富可以后天创造或者失去，而人权乃天赋，是任何人生来最重要的资产。而独裁专制制度的原罪是剥夺人权，在它之下，任何人权被剥夺者，都是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看来，对独裁专制政治体制及其统治体系而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任何人不分差别地是人民，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均匍匐于独裁专制制度及其统治阶级特权之下。

毛泽东太伟大了，他那个时代敢于把其政权内部新生的统治者称为“还乡团、复辟者”。只不过前面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帽子是不恰当、不准确、容易引起误解，因而是错误的。这“还乡团、复辟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所谓红色资产阶级，不是同一批人而是同一种人，而是只要不实现主权在民而因袭“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的帝制帝位旧制度，他们便会

被重复克隆出来。他们是不同家国党国、不同时期的永恒的同一种人——统治阶层、掌权者、当权者、当局！

他们不仅如毛泽东所云是“党内最危险的敌人”，更是人民重新遭受官本位统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根源。抬头看看公元2000年之中国，工人、农民、官兵、知识分子与学生、各行业人士等是不是正遭受了党政官本位统治、盘剥之苦，共产党的声名是不是被他们糟蹋了，全中国是不是匍匐于他们统治特权利益之下。

孙中山曾警告说，“大家若是有了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就要同志打同志，二来本国人便要打本国人。”

他还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确实，蒋介石国民党亡掉了大陆，下一个是谁？

但是，是国民党、蒋介石不好吗，是共产党、毛泽东不好吗，是邓小平不好吗？不！是权力

原罪对人、政党、政权的变质、嬗变、异化等不好。任何人都可能因为任何原因而掌权，掌

握社会公共权力，而成为统治阶级，去统治所有人。

看来，人与党组织是无辜的，有罪的是统治权力，更有罪的是制造统治者的制度，是使权力

成为统治权力而非公仆服务权力的独裁专制制度。权力有原罪，仅有德治仁政无法制止它缺

德、不仁不义、祸害社会。它不受监督便容易谋私、放任自流、作恶，它不受制衡便容易使

用不当、滥用、出偏差，它没有任期限制便容易失去竞争、趋于保守、不公平、失去活力。

为了确保权力不犯罪，为了保证掌握权力者无特权而人民有人权，人民最大的任务，不是区

分你富我穷，不是互斗，而是能有效监督、制衡、限制自己委托出去的公共权力。其中，最科学、最有效、最公平的办法便是建立以人民主权立法为基石，以三权

分离、多党

政治、司法独立等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这样才能保证人民民主专政，它不是对无产阶

级专政，也不是对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对掌权者、执政者的专政，不是对知识分子等任何

人的专政，它是所有人民（包括掌权者或者称之为接受人民委托权力者）对社会公共权力系

统专政，并由此打击各类犯罪，保障社会公平、合理、正常、有效地运转。

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好，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好，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革命也好，任何民主革

命不是改朝换代，不是帝制仍然可以确保帝位地位与财富等在不同人之间的转换，不是产生

新的统治者，而是主权在民制度确保没有统治者，只有人民自由投票选举出来的权力被委托

者。

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徽和毛主席画像，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毛主

席纪念馆，战争与战争民主结束以后，你们为什么不继续革命，以和平民主制度永革社会公

共权力系统之命，以主权在民制度剔除统治者这一概念，使任何社会公共权力掌握者只能是

人民自由选举、聘请、雇佣的受制衡、有任期、可以被弹劾、罢免的“为人民服务”者、打

工者，避免使民主革命沦落为改朝换代，而是由人民最终控制社会公共权力系统。可是，为什么秦制以来，一切改朝换代和革命，中国历朝历代历党历人的专政，

总是统治阶

级对一切人民的专政，而不是最终创立民主中国：一切人民对权力系统专政！

毛主席啊，共产党，我们好困惑。背负当局死命令，冲破人民的层层重围、阻拦，杀到广场，

就是为了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共和国公民，爱国者？

作为军人，从新军、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新四军到解放军，什么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

新军、人民军、人权军，而不是家丁、党丁，家军、党军，家卫队、党卫队？不属于“党指

挥枪”，而是“军队国家化，人民指挥枪”？

从1911年至今，为反对帝制帝位帝王，中国军人曾经先后发起了辛亥革命、护法战争、

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解放战争、“五·七一工程”和粉碎“四人帮”

等。如今，作为中国军人，我们的正义、良心与血性哪里去了？

难道，真的全做了“党指挥枪”的俘虏？

4、一个中国：两岸三地有责任

中国只有一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作为国家概念一直是统一的，一直是统一国家，

是“一国”。“中国统一”的实质不是领土和理念的统一，而是政权的统一。中国之所以有时

被称做“分裂”，实质是“一国”之下的多个政权分治。中国之所以被认为“不统一”，实质

是也指同时有多个权力中心或政权并存。这是政权的不统一，是一个或几个政权对另外一个

或几个政权诉求认同和归属时的不统一。而且，哪个中心或几个政权也没有恰当方法和足

够能力使另外一个或几个政权归顺、臣服，并形成传统的以中央集权为标志的统一国家，或

者形成现代的以主权在民为标志联邦制统一国家。

“一国两制”主导的“回归”，对香港、澳门、台湾等都适用吗？不！如果香港、澳门的回归

是国际问题，是“被租让地区及其分权力中心”对国家主权的“回归”，那么台湾在习惯措辞

与情感上存在回归问题（岛屿回归大陆），在法理上则不存在回归问题。大陆与台湾是海峡两

岸两个中国政权长期敌对的问题，他们谁也不曾征服、管理、统治谁，而一直是一国之内彼

此独立运行、各有空间的两个政权体系。

台湾民主化以前，两者统一是一国之内以对等谈判或武力征服而合二为一的范畴。现在，大

陆的台湾问题或者台湾的大陆问题也是国家内政问题，是两岸问题。“台湾回归（大陆），实

现祖国统一”命题不准确，台湾和大陆同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回归”总有点被掠而复回、

游子向母亲靠拢、子体回归母体或者叛逆者归顺的意思。大陆和台湾有面积大小、人口多少

之差别，但两个政权没有大小、长幼的辈分之分，没有主从、主仆关系之分，没有正统与非

正统之分。它们是对等平等、各有尊严的。

而且应该来讲，由于历史趋势与台湾人民的自觉奋斗，使国民党民主化了、台湾民主化了，

目前以人民主权为特征的台湾民主政权应该比非人民自由投票选举的大陆一党独裁专制政权

更有尊严，更有人民性、代表性。大陆政权虽然可以因面积大、人口多、市场大等而“挟天

子以令诸侯”，国际社会不得不与之打交道，并因此获得在联合国代表“一个中国”的荣誉，

但这并不能同时掩盖其因缺乏人民主权而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中国”的事实，它同台湾一样

只是一个中国的一部分。故而，“回归”二字不恰当，它错误否定了“两岸平等”事实，还错

误肯定了“大陆中央集权政权比民主台湾高一级，是台湾的上级中央”这个前提。

其实，海峡两岸格局不是美国与夏威夷间的关系，也没有下辖或属下关系，不是整体与部分

关系，也不是主臣关系，彼此间不存在“谁回归谁”问题，而是平等基础上和平民主而“合

二为一”的问题。如果非要牵强说台湾属于“回归”，那么不谈实力，我们也可以说：香港和

澳门等目前同样是一个中国的家庭成员，它们都是一个中国内享有高度自治的一部分，它们

相对游离于中央集权以外，它们和大陆一样，也有资格接受台湾回归，而且最好能回归到人

民主权手里，壮大创立民主中国的实力。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国大陆也是中国一部分。他们谁也不能单独代

表“一个中国”，谁也不能说只有自己是“一个中国”，别人不是中国。这就象北京、上海、

云南、河北等谁也不能单独代表中国，就象东北、华北、华南、西北、华中等谁也不能单独

代表中国，就象台北、高雄等谁也不能单独代表台湾。谁以“一个中国”自居，视他人为臣

下、仆从、非正统，否则拒绝谈判，谁无视他人而企图单独代表中国，谁就是分裂中国的祸

首。

1949年以后，“一个中国”是理念、是理想，准确讲，是“一个中华”。海峡两岸分治表明，

人民眼里只有两个政权，而非两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即简称的中国大陆

和中国台湾。“一个中国”是中国统一事业，它不是某一个政权的同义词。如今“统一中国”

正在进行中，“一个中国”还在理想中，还在奋斗中，它怎么能成为谈判与否的前提？它怎么

能被要求成为两岸谈判的核心问题？它早已经是两岸不言而喻的核心前提，正因为它早已存

在于我们固有的民族思想意识与文明历史中，世界上才有一个“两岸问题”。我们怎么能以“一

个中国”胁迫台湾承认“大陆政权是主子，是一个中国”而决定是否谈判！“一个中国”原

则不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中央集权统一中国，不是“一个独裁专制政权覆盖中国”，我们更不

能容忍它暗含的对中国民主先锋的杀机。把它作为谈判条件，不过是其确立其“中心政权之

霸主地位”的一个强硬借口。

显然，“一个中国”是理想，民主是手段。如同不能把理想本身视为实现理想的障碍，我们不

能把“一个中国”作为拒绝谈判的冠冕堂皇借口，更不能用“一个政权”代替“一个中国”，

并以此阻碍中国统一。必须注意，以“一国两制”统一中国，不是“一个独裁专制政权，两

种制度”统一中国。

古语云：正统之所在，天下归之。得天命者得天统，得天统者得正统，正统有合理合法统一

天下的权力与义务。但是，不同时期，正统有不同的内涵与标准。过去，它是以德抗位的，

嫡传的，血亲的，一人一姓一家族的，一人一党的，私传的。当今世界，它是自由、民主与

人权，是它们至尊。人权是天下最大的天命，是天统、正统。中央集权、官本位、家国、党

国等私天下均已过时了，民主与公天下才是人权保障的最好选择。两岸问题核心是民主，中

国统一核心是民主。和平谈判才能走向“一个中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不是一个政权

要求另一个臣服、归顺，或者下跪朝拜，我们似乎从回归后的香港澳门看到了这点意思。如

果非要说“一中一台”、“两国论”等是分裂中国，那么固守独裁专制中央集权统治思维，固

守“一个中国，即帝制帝位”而拒绝谈判，也是分裂中国、有害于中华民族的。

传统“合二为一”统一是政权间战争，是征战、讨伐、征服、消灭，是一个政权对余者的吞

并。它是争地盘、争正统，是通过“收复、制服、臣服”确立霸主地位而建立中央集权的统

一国家。在这王朝更迭中，人民因为是臣民党民官民私民而不享有对王朝及其执政者执政党

的选择权，哪个政权、哪个党、哪个个人赢了，人民就是那个政权的臣民、党民、私民。以

“中央集权为标志”的统一模式是人民、国家、民族的好事吗？不是的！它已经过失了，只

有主权在民政权才是众望所归。现在，中国统一障碍在于台湾已经建立了主权在民政权，而

大陆仍然固守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没有上升到“人民主权”高层次，并且频频威胁民主

台湾的安全与生存。

现代“合二为一”统一是人民主权基础上“合二为一”，是“民主共和”，是建立一个主权在

民的自由民主新中国。当今时代与传统最大不同是人民已经不应该是臣民，而是主人，执政

者或统治者不过是人民委托权力、投票聘请的有任期限制的过客。政权是主权在民的政权，

国家是主权在民的国家。哪个分裂政权也不能自称为正统，或通过武力确立其“正统”地位，

只有主权在民是正统，只有统一的自由民主的主权在民的政权是中国统一的基础、希望和最终

国体。亦即不是王朝更迭或吞并决定人民归属，而是主权在民决定政权的统一合并方式及

统一合并后的走向，决定政权的更迭或执政党。

也许，联邦制是创立统一的民主中国的必由之路！

17世纪台湾“反清复明”没有意思，它只是不换帝制、不动帝位、单单换姓换皇帝的改朝

换代而已。1949年后台湾“反攻大陆，光复大陆”也没有意思，它同样只是不换帝制、

不换帝位、单单换党换领袖的党国换号而已，不过是试图以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替换共

产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而已。如果不推行民主，不尊重两岸人民的人权，17世纪收复台湾

或者1949年以后的“解放台湾，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又有多大意义。这哪里是回到祖国

怀抱，分明是重新受中央集权统治，重新受大陆独裁专制政权奴役。考虑到17世纪世界民

主大潮尚未成气候的时代局限，大清之大陆政权以帝制帝位帝王收复台湾、并继续推行独裁

专制统治是维护国家统一而有意义的，那么当今大陆政权如果仍然以独裁专制统治收复台湾

而不实行民主制度，并继续推行帝制帝位帝王，则是全国人民坚决不答应的，是行不通的。

况且，台湾已非 17 世纪台湾，它已经是民主台湾，是中华民族创立民主中国之征程的重要

里程碑与基地，是“和平民主救中国”的新起点。

海峡两岸，无需战火，需要民主！中国同胞，无需内战，需要和解！现在完全可以说，任何

武力统一是不得人心、不合民意的。军事进攻台湾已经不是对国民党政权的进攻，而是对台

湾人民主权政权的进攻，是对民主中国先锋的扼杀。而且不仅大陆独裁专制政权对民主台湾

的武力统一行不通，反之亦然。我们不能期望任何名义的暴力可以获得持久和平，不能期望

任何名义的反自由民主可以恢复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不能期望任何名义的非人权可以保障

实现人人平等的天赋人权。当今世界，中国统一只能是以地域和解、军民和解、党派和解、

民族和解、政权和解、人民大和解等为基础、以尊重人权为前提的和平民主统一。这样的基

础在哪里？这样的前提在哪里？所有和解需要 960 万平方公里国土上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

所有前提是尊重人人的人权，所有方法是和平民主。我们有信心实现和解，除了统治者

刻意离间，所有不同职业、地域、民族、思想、信仰等的人民从来没有矛盾，他们希望享有

同样标准、内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天赋权利。我们有这样的前体，人权从来是人人心中

的至宝。我们看到了和平民主救中国的前景，民主化了的台湾、香港、澳门等不能用做增强

独裁专制政权实力的工具，它们必将是创立民主中国的先驱。有一天历史会这样书写：中华

民族终于以创立民主中国续写了它 5000 年不曾间断的文明史。在完成融入世界的民主化

历程中，它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先于大陆走在了前列。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明是政治及其制度文明，民主化了台湾、香港、澳门等是中

华文明的新榜样。中国统一是民主制度基础上的一国一制的统一，是大陆在政治制度上向它

们看齐后的统一，而不是保留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统一，不是“一国两制”的统一。今天的

统一，不是一国内哪个政权吞并、吃掉另外一个或几个政权的统一，不是哪个或哪些政权对

其他政权称王称霸的统一，不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要求全体人民、民族、

军队、政党、文化、思想、信仰等对其“保持一致”的统一，不是政权的单赢、双赢和多赢，而是自由赢、民主赢、人权赢、主权在民赢！而是平等、自由、民主、和平与人权基础上的所有主权在民政权的合并与统一！这将是一个统一的联邦制民主中国，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制帝位帝王中央集权中国！

民主是灯塔，是中国统一的引擎，也是中国统一的方向，更是中国光辉未来之所依。什么是“中国光辉未来”的障碍？不是台湾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结束了，不是台湾民主化了，不是香港、澳门回归后50年不变，而是民主台湾受到威胁，而是50年后怎么办。也不全是“一国两制”，而是与“一国两制”有关，是它“两制”中的另一制，是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是它威胁民主台湾的生存、发展，是它异化香港、澳门的民主，是它有吞并自由民主而一统的秉性。故而中国统一的一个关键而是如何捍卫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民主，使民主中国的先锋们不至于受遏制、中断、亡于独裁专制制度。相反要竭尽全力保留民主中国的火种、保全先锋们的尊严与地位，使它们在当地及大陆党员人民和非党员人民等的共同爱护、支援下发扬光大于大陆，最终建立民主中国。

对此，大陆政权所要做的很简单，仅仅只是放弃独裁专制统治特权而成全人权而已。它只需放弃一人对全党独裁专制，只需放弃一党对大陆独裁专制，只需放弃一人一党对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在内的全中国的独裁专制。至少可以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废除用党组织纪律保持所谓的“全党高度一致、统一，全党一致通过”等，使党组织形式等方面成为一个宽松、开放、公开、民主的党，使广大党员真正拥有民主权力，允许不同意见、政见存在、传播，由全体党员自由投票决定什么政策好、谁是党的领袖、谁执政。其次，保证党员人权，党员首先是国民，其次才是党员，国家宪法对党员人权的保护，高于党纪对其的约束，国法保证党纪不能践踏党员和非党员人权；允许不同意见党员脱党，或者所谓“分裂”党、另外组党。再次，开放党禁、报禁等，废除宪法“四项凡是迷信”，在大陆推行多党自由民主竞选制，等等。总之，朝民主化方向前进，怎么快、好、有效、安全怎么干。只要不引起社会动

荡，还可以直接推行全民大选。届时，大陆政治制度看齐台湾、香港、澳门后，平等、自由、民主、和平、统一的民主中国当是水到渠成、指日可待！当然，也可以好直接废除“四项凡是迷信”，由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共同参与，建立民主中国。不过，这难度可能大一些。但一个中国原则下，邀请台湾、香港、澳门到大陆推动民主化进程，或者你们主动请缨，该不算干涉内政吧！否则，这类指责就是制造“两个中国，三个、四个中国”，自家人管自家事岂能是“干涉内政”！一家人么，你们比外国势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更有优势。如果台资、港资、澳资等内资企业同时罢资、罢工怎么样？如果正在大陆的台湾人、香港人、澳门人等中国人，包括其他华人等同时上街、游行、静坐、请愿、绝食、占领天安门广场等，中国又当怎么样？这些不是干涉内政，这是中国人自己当家作主！中国民主需要它们“帮助，干涉大陆内政”。独裁专制统治政权常常不遂自由民主人权愿，当局及其代表人物的顽固可能会使事情恶化，甚至动荡、流血。这是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它戕害人民、祸害世界和平。大陆民主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缓缓推进，但决不能停滞于目前的“四项，三讲，三个代表”，甚至倒行逆施。长痛短痛都是痛，长痛不如短痛，长痛只会延长贪污腐化者们作案的时间与空间，使党祸官祸加倍贻误国家民族。稳定、稳定，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稳定帝制帝位帝王”上了，这是罪过。我们赞成一方面保持社会稳定，一方面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可行的。不得人心的东西都可以一举荡平而不引起社会动荡。人民公社、文革都是一夜之间结束的，改革开放也是平地起波澜，它们都没有使中国不稳定。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只要利于人民自由民主与人权事业，只要一些个人和政治势力不刻意肇事，只要一些统治当局不挑动社会动乱，不以平暴制造起义“暴乱”，中国可以一夜之间翻天覆地而不发生社会动荡，相反紧跟它们的是发展、繁荣和社会进步。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后中国没有动荡，人民欢呼“民国”。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没有动荡，五四运动刮起暴风骤雨，中国没有动荡。赶走日本侵略者，中国没有动荡。1949年赶走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政权，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没有动荡。运行多年的人民公社和文革几乎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中国没有动荡。家庭承包、乡镇企业等农村改革快速推进，中国没有动荡。修改宪法、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翻来到的改革，中国都没有动荡。台湾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没有动荡，台湾人民由被动接受接班人而行使主权投票选举领导人没有动荡。相反，违反民心、民愿的保守独裁专制统治特权的举动几乎都引起了社会动荡和沉默下的潜在危机。可见，以“稳定”防止“社会动荡”不是延迟、拒绝民主政治改革的借口，它只是为“做一天皇帝算一天，那管死后洪水滔天”而谋求所谓稳定的一种伎俩。任何中国人民都有觉悟拒绝皇帝和皇党，6 0 0 0 万党员人民也决不会因为一个没收他们党员权力和基本人权的帝制帝位帝王核心等组织体系的土崩瓦解而使“社会动荡”。人民不会高喊“还我皇帝”，党员不会高喊“还我核心，还我领导集体，还我政治局，还我太上皇”，他们只会因为解除了独裁专制束缚而高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人权万岁！”他们只会说“这个民选总统还行，支持他再干一届”，或者说“这家伙不行，好好管着他，下次把他选下去”。只要个别人不为保持一人对全党全国全军的独裁专制统治帝位而煽动、造成党员、军队、党政机关等的混乱，中国加速推进民主政治改革，以主权在民立法取缔“四项基本原则”，建立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民主中国，国家决不会动荡，人民只会拍手称快，并密切注视、保护它的顺利推进。终结 2 0 0 0 多年封建皇帝独裁专制统治家国历史中国没有动荡，怎么会反倒因为终结国民党党国和共产党党国统治历史而动荡？毛泽东主席去世中国没有动荡，江泽民、李鹏等六四镇压既得利益者下台中国反倒动荡？世纪性践踏人权的六四镇压没有使中国动荡，为六四死难者昭雪、继承他们的民主事业，建立民主中国，中国人民反倒消受不起、反倒要动乱、动荡了？中国人民那么贱，生来愿意被奴役？不会！不是！中国党员和非党员人民、各社会团体不因此炸鞭放炮、吃喜面才怪呢！记住吧，人民不会因为获得自由、致富而暴乱，社会不会因为民主、繁荣而动荡。相反，有独裁专制统治则穷，穷则变，变则起义，变则革命！中国是独裁专制集权统治历史延续时间最长的国

家，也是人民起义最频繁的国家，这是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基本根源。中国之祸不是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不是三权分离而是中央集权，不是多党制而是一人制、一党制，不是司法独立而是皇法、家法、党法高于民法、国法，不是军队人民化、国家化而是军队皇家化、党化、党指挥枪。正是剥夺自由迫使人民反抗！正是剥夺民主迫使人民上街、静坐、游行、示威、绝食！正是皇权与党权等镇压、平暴等破坏人权才迫使人民奋起起义、“暴乱”、保卫人权！正是盗窃人权才使得当局当权及其独夫民贼们惶惶不可终日，愚弄、诓骗、调用军队、公检法、宣传舆论等国家机器，把一年365天统统当作敏感日子去警戒，把12亿公民全部当作反贼去防范！他们太虚弱、脆弱了！有一天他们将不堪一击。大陆集权极权统治者，学学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等吧！俄罗斯政治改革是一个榜样。我们不要再妄语人家是“失败的激进式民主改革”了，不要再酸溜溜讽刺、挖苦人家了。学学南非吧，学学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等吧，它不是因为种族平等而骚乱、动荡，而是因为种族歧视、不平等才危机四伏。中国大陆正是因为种党种人之统治特权高于人权才如一盘散沙，正是因为党治人治高于法治才充满不平等和冲突危机，人民正是因为无自由才民心失散、各打各的算盘，正是因为无民主才对社会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才缺乏创造创新力，正是因为没有人权才叹息国权。至少，大陆执政集团可以就近到台湾、香港、澳门等进行国内考察学习、留学吧，学习它们如何平稳过度，实现代议制、多党政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民主时代。具体到已经拥有自由民主等人权的中国其他地区，如台湾、香港、澳门等，包括因流亡而自了的中国人，还是那句话，一个中国之内，民主化了国土对未民主化的有责任，民主了的中国人对未民主有责任。即民主化了的对中国对未民主化的中国有责任。民主台湾对民主中国有责任，香港、澳门回归大陆后最大抱负不应当是满足于高度自治，而是积极参与大陆即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你们对民主大陆有责任。你们是旗舰，是“一个中国，民主中国”的“高山上的省”。勿忘以你们正在实践的三权分离

等民主政治改造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

5、中山陵：警钟警谁

（1）国父孙中山临终前，念念不忘“和平民主救中国”。他警告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他留下了封杀帝制帝位帝王的遗训：“敢以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可是，尽管他的巨幅画像每年国庆节必供奉于天安门广场，可他面对的仍然是一人一党独裁

专制之帝制统治中国，是中南海续接紫禁城统治中国，是帝制有长城维护，是帝位有人争抢，

是帝王、核心们仍然站在他对面的天安门城楼上对他、对人民挥手致意、示威，“我站在这里，

我君临天下，天下是我的，你们看见了吗？”这难道不是嘲笑、讽刺、羞辱他吗！也许前两

代核心没有帝王思想，不过第三代核心比较倒霉，他必须穿防弹背心过帝王上瘾了。把50

周年庆典办得死气沉沉的。这预示着什么！

许多海内外同胞、国际友人，常常拜谒南京中山陵。然而中山陵本身意味着什么？我最

近一次拜谒它是1998年9月2日上午10点10分。巍峨钟山，汉白玉“博爱”牌坊灵雅、庄

重，它左后侧一块半平方米见方的木牌很不显眼。但它写着：

中山陵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陵墓的平面图呈警钟形象，象征孙中

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唤醒民众，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奋斗不息的精神。1961年国务院公布中山陵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简言之，中山陵是钟，是警钟！钟，钟是中华文明最传统的文化符号之一，它集响器、乐器、

礼器和法器等于一身，记载历史，褒扬功德，警世劝善，祁福纳寿，是为民、卫民、顺民、

利民等之钟。反人民、反人权之言行是不会荣耀于钟的，故而中华钟乃人权钟！中国人民把民主国父的陵墓做为中华大地之警钟，警钟警谁？警惕人民防止帝制帝位帝王之

独裁专制统治，警告当权者们莫要凌驾于国家组织之上、特权高于人权，警示大陆人民勿忘

团结奋斗、终结帝制帝位，警示“一个中国”内已经率先民主化了的台湾、香港、澳门勿忘

自己担负的“一个中国，民主中国”的先锋责任，警示海内外华人、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

事业。

中山陵是一面警钟，警世钟！创立民主中国的警世钟！孙中山的遗言是“和平……民主……

救中国”，为此他敲钟，他生前身后不停地敲钟。他化作了钟，他就是一口巨钟，他还是为了

敲钟！他是敲钟人，毕生致力于敲响华夏大地，唤醒民众，使人民不再沉睡于统治者奴役奴

化之麻木，而是勇猛地天下共击之，拯救国家、民族于独裁专制之恐怖统治。

中国人的一大使命便是不断敲响民主中国警世钟。但是，先生的遗训和警世钟令帝制帝位帝

王们很害怕，他们历来漠视、抛弃和阳奉阴违地供奉他。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续接了孙

中山先生的敲钟，它虽然失败了，但它无疑也敲响了六四后政权的丧钟，敲响了2200多

年来使中国人民饱受王朝循环统治恐怖奴役之苦的帝制帝位帝王之秦制丧钟！

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大陆期间，曾有大批高级军官哭陵，哀告国父，警醒天下，痛

斥蒋介石党国政权违背了民主理想。但抗战胜利以后，硕大的警钟并没有促使国民党遵守和

平民主的建国原则，它因强大而自负，拒不与共产党等党派、团体团结携手，拒不构成中国

民主联合政府。后来，蒋介石国民党在其发动的一场意欲独得中国的内战中败退台湾，并终

于荣登“九五之尊”，成为很痛苦的偏安一隅的小朝廷。

内战期间，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国命运之决战》中因为意欲坚持民主而信心百倍：

“蒋介石忘

记三民主义，建立独裁政府。……我们要打倒蒋介石，团结各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共同建立新中国。”我时常觉得把一心搞独裁专制而祸害中国的臭棋完全推之与蒋公一人也有

失公允，他有基础，他只是国民党内大批因独裁专制统治获益，并且将进一步获益的最大

代表而已。他们前后的大批独裁专制政权的得手也莫不如此。

在独裁专制当局眼里，孙中山实际上是最大的西化代表，他的遗训与警钟是最恼人的丧钟，

他们拼命排斥、打击、淹没它，使天下人民忘记他，听不见他的和平民主救中国之警世之钟

声。国父的民主事业迄今未成，并屡遭利用、污辱、篡改，致使他身后仍饱受独裁专制统治

之苦，钟不得敲，谁敲谁倒霉，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危害国家安全、叛国，敲也无人听。

（2）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民主中国行，有一片，保一片，她始于

台湾、香港和澳门。

如今，台湾、香港、澳门等中国民主三小俊，已经民主化了。但这只是民主台湾，民主香港，民主澳门，勿忘“一个中国，民主中国”。继续敲钟吧，反敲大陆独裁专制制度，勿使同胞失望！

大陆需要你们的资金、管理、技术等，更需要你们言论自由、普及民主，更需要你们那样的

主权在民政治制度！香港、澳门已经被“一国两制”了，而民主台湾则坚决不能退步，不仅

决不屈服于一国两制，而要坚持以“一国一制民主制”统一中国！你们千万不要被任何形式

的独裁专制统治吞并！你们是中国民主“三小俊”，也应当是改造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

“一大丑”的希望与基地！保全自身并挺身而出，改造并且承担自己应尽的创立民主中国的

历史责任！

进步的对落后有使命，自由民主的对终结独裁专制统治有使命。民主化了，台湾、香港、澳

门等应该自图安乐，更不应该以独立或回避、不过问大陆政事等方式忘却民主中国理想。相

反，你们应该在中国统一大业上多一些责任心、进取心，多一些同舟共济的奉献精神。不要

因为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势力强大而怯于声张人权正义，不要因为大陆有原子弹而缺

乏对整个中国民主事业的进取心，并滋生退而求次、退而偏安一隅的狭隘。

在此，如果说大陆台湾政策“从‘解放’到‘回归’”是一个进步，那台湾大陆政策“从‘光

复’到‘独立’”则是一个退步。为什么选择走向退步？如果非说大陆与台湾是远亲，那也没

有比彼此更近的近亲！如果非说大陆与台湾是近邻，那我们彼此也没有更近的近邻了。

台湾，大陆，香港，澳门，巍巍大中华，中国人一家！虽然我们反对大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与进攻，也不赞成台湾“反攻大陆”，它曾经迫使大陆人民不得不跟随一党独裁专制政权用敌

情观念看待、分析一切，并被迫在内外政策上更趋独裁专制，并且贻害至今。但是，我们也

不赞成“台湾太小，无力顾及大陆民主”是无为，更不赞成台湾“民主了，可以自得其乐”

的寻求独立的保守。

我们深信恰如历史一贯之走向，即使再迈进一万年，大陆与台湾均不会永远远离“一个中国”。

他们是一家人，顶多只会时而分家单过，时而同灶同桌共餐。当然这不是有长幼尊卑之分、

有家长的家长制一家人，而是各成员均对“一个中国”负有同等责任与义务、享有平等主权的自由民主联合体、联邦。只是台湾由于屡遭大陆独裁专制政权威胁与强行统治，并曾遭割让、占领，这些容易使人产生独立等想法。另外地理位置不同，尤其是隔海而可以偏安一隅也容易使人产生其它想法。

一个人进步是全人类进步，一个地区进步是全世界进步。一个地区民主，是全国全世界民主事业的进步！民主于台湾捷足先登，但这不仅仅只属于台湾，它属于全中国，属于“一个中国”。这不仅仅是台湾的进步，而是台湾代表“一个中国”与华人在世界民主事业中的亮相与进步，是整个中国民主事业的进步，是整个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光荣与进步。台湾民主不只是台湾民主化了，更是全中国的民主，更会推动全中国民主化。台湾民主正走向深入，这是代表“一个中国”对自由民主的探索！这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千百年来各种形式独裁专制统治的突破！民主是普世价值，它虽然是世界性的人类共同目标，但它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也可以先在一个国家的个别地区先行登陆。民主可以在中国同时“统一”实现，也可以分阶段、分地域实现。人民的责任是成熟一个、实现一个，保护一个、推动一个，直到最终以联邦制等形式实现“天下一统”。

既然民主台湾使5000年中华文明史首次实现了不流血的权力和平移交，既然历史把中国民主突破使命性地落在了台湾，台湾应该有责任使命性地以扩大民主续写中国历史，继续在“一个中国”的更大范围内普及民主。大陆虽大，独裁专制统治乃小；台湾虽小，民主化乃大。与香港、澳门一样，与世界任何民主政治一样，台湾民主实践也应该是推动大陆政治走向文明的榜样。

台湾民主了，民主台湾诞生了！它的荣誉与责任、使命等也同时诞生。尚未自由的对自由有要求，尚未民主的对民主有要求，自由民主对独裁专制有要求。台湾，你民主了，但不能“有喜偷着乐！”台湾民主化是“一个中国”内的民主化，它属于中华民族，它是海峡两岸中华民族人权事业的突破！大陆没有理由拒绝这光荣的突破，台湾也没有理由独享这份荣誉。

先得民主的台湾应该有民族使命感：民主应该泽被全国、惠及全民，使全中华民族共浴人权

灯塔的光芒。台湾，勿以地盘小而不为之，勿要轻视民主化而拥有的人权力量。勿要忽视藐视强大、稳定的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下涌动着不可遏止的民主大潮。勿要害怕如庞然大物的独裁专制政权，大陆人民必然救助、保持、学习台湾来之不易的民主文明。况且这个政权已经烂透了，一根羽毛已经可以压垮一只暴虐的熊。不要忘记，当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正是扛顶解放人民自由民主与人权大旗，才从延安山沟打败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政权而红遍了台湾以外的全中国，还代表“一个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他和共产党的全部力量来自反抗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人民，来自国民党党政官本位特权高于人权，来自“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猖獗，来自只有拥护、服从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才是爱国者、好人、良民，来自腐败分子只要拥护国民党独裁专制就能如鱼得水、继续作恶，来自执政的国民党人尽揽社会升官发财、获得教育的机会，来自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官本位系统普遍比人民大众生活好、实惠多，来自国内人民与国际社会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政权之腐败、苛政、弊政的痛恨。现在台湾虽小，但民主化乃大，况且各种实力比共产党延安时期强多了。而且导致1949年国民党败退、垮台的病因几乎都被借此打败它的共产党因袭了，这同样是民主战胜独裁专制政权的力量源泉。也许同根同祖，由于民主化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等更相似，台湾民主对大陆更具有借鉴性。它已经在开放党禁、报禁，放弃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军队国家化、发展经济、普及教育、走向现代文明等方面获取了许多经验。如反对党存活问题，解决党产变国产民产问题，解决党库通国库问题，变党军为民军国军问题等。同根同源同方法，在改造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进程中，台湾经验可以比其他经验受到更多重视，发挥更大作用。这是大陆人民的期盼，也应该是同胞情谊的愿望，更是历史进步的召唤！大陆政权若真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便应该放弃一人制的个人终身制和一党制的个人永远执政制的统治利益。包括党员人民在内的全大陆人民也应该反对、推翻帝制、帝位、帝人。帝制孵化帝位，帝位孵化帝人，这三个坏东西是民主大敌。最好一锅端，但若帝制难动，便先动

容易的帝位、帝人，终身制的帝位与帝人往往是阻碍、扼杀民主的直接刽子手。大陆人民、人民军队应该反对内战，反对针对台湾的社论、军事演习或演戏等威胁，坚决保卫民主台湾安全与尊严，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飞弹、演习、白皮书、强制下的各界表态等威胁只会更加坚定人民的民主信念。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一个中国”下的所有公民，不要被“分裂中国，背叛祖国”等罪名吓倒！不服从或称之为不回归于大陆独裁专制政权的统治，与其说是台湾分裂中国，不如说是民主台湾被视作妨碍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欲统治全党全国全民的眼中钉。过去，人们常言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分割的领土，现在民主化真正使台湾神圣了。与其说台湾是美国航空母舰，更不如说台湾是创立民主中国的旗舰！“一个中国”下的所有中国人民决不能袖手旁观民主台湾臣服、失败于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然而遗憾的是，当今大陆政权因坚持独裁专制统治而正加速加大了台湾离心力。它每一次针对台湾的恶言恶行，如社论、演习、白皮书、声明、国际打压等，都把台湾推离距大陆更深更远处的大海。但我们大胆预言，现代海内外情势已经迥异于明末清初，对民主台湾的任何进攻将直接导致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的最终解体。我们不害怕大陆独裁专制政权对自由台湾的进攻，这是它自掘坟墓的开始，开战之日便是它自取灭亡之时。人们常开玩笑：解放军打过去没问题，怕是打过去不回来了。都是中国么，而且那是自由的

中国，他们将掉头解放大陆。的确，没有自由的人民更渴望自由，没有民主的人民更珍惜民主，争取自由使人民勇敢无畏，奋斗民主使人民自豪，为人权而战使人民死得其所。我们会忘记，正是东德人民率先推倒柏林墙促进了德国统一，正是中国人民自己本世纪上半叶先后推翻了帝制帝位帝王的清王朝，赶走了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中国人民还将推翻任何人的独裁专制统治。

理直气壮吧！不接受“一国两制”不是分裂中国，李登辉执政时期国民党民主化、台湾民主化也不是分裂中国。恰恰相反，正是“一国两制”分裂中国，虽然香港、澳门回归了，但制度不统一，它们实质上仍然于大陆处于分裂状态。“一国两制”因为坚持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

制而不惜分裂中国，是它使得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等人民被“两制”了、被
四地隔离、
割裂了，而不能真正共同参与“一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社会。是
它排斥多党
政治、议会政治、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而使得大陆以外的中国望而却步。是它
拒绝了 1 9
8 9 年中国大陆民主运动中“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的呼吁。是它拒
绝了大陆以
外的中国人不能参与对统一中国的民主治理而分裂了中国，是它制造“四个中
国”。

（3）如果非要找出台湾民主化的分裂因子，那也是有的。即它分裂了海峡
两岸政权曾
经共同拥有的独裁专制制度及其思想，使中国数千年一人终身制、一党终身制不
再是独裁专
制铁板一块。它裂变了，露出了崭新的民主新牙，使吃人的政治黑箱操作射进了
人权光芒。
陈水扁作为非国民党党员而成为台湾首位民选领导人，这是对民主中国的极大鼓
舞和促进。
无论如何，它结束了中国人民一直不曾真正当家作主的耻辱，它终于在 2 0 世纪
最后一年揭
开了中国通过人民主权而自由投票选举而决定领导人的序幕。
自由民主之于独裁专制，犹如玉石之于瓦砾。台湾民主化是中华文明新亮点，它
代表了中国
历史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历史划纪元的新起点！是中国人权事业的新丰碑！从此，
还在理想
中的“民主中国”跃上了新台阶！在台湾与香港、澳门等领跑下，她会前进得更
快！它进一
步表明“一个中国”的事情，所有地区和中央等的中国事情都将不再是一人之
事、一党之事、
一个政权之事，而激励中国人民今后将尽力把所有事情都置于“人民主权决定”
下去发展。
台港澳等地公民及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等导演的民主新牙意义非凡，它们并
不因为嫩小
而缺乏力量，它们甚至已经如核裂变般爆发了巨大能量而对大陆独裁专制政权形
成了巨大的
相形见绌的舆论、心理攻势。
这恐怕是大陆政权对李登辉、台湾选举、台湾民主、国民党的反对党、台湾拓展
国际空间等
恨之入骨、大为光火、加速“统一”的根本原因。它害怕了，它害怕台湾、香港、
澳门等地
以民主而得人心、坐大，最后迫使大陆民主化，或者以民主光复大陆。自由、民
主与人权是

比武力更有效的武器，谁拥有它们谁得天下，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实际上是人权得天下、人

民得天下。

同样是一个台湾，过去推行独裁专制统治的台湾政权因为没有道义优势而不可怕，现在实现

了主权在民的民主台湾太可怕了，它会向大陆传播自由、民主、人权一类的普世价值。它具

备的民主中国的先锋性质将直接从多方面对大陆政权构成威胁，并瓦解它。而如果大陆知独

裁专制政权之耻而追自由、顺应民主，主动改革，推进民主化，它便不必害怕民主台湾、害

怕民主。相反，如果它在民主化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人民包括国际社会则必然支持天、

捍卫它，谁也不会坐视它瓦解、崩溃。其实，国民党台湾政权已经被主权在民吃掉了，这是

天大的好事，这是进步，也是必然。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何必计较、担心“谁吃掉谁”，

因为最终是主权在民吃掉王权、党权、特权，是民主中国吃掉家国、党国等。

大陆当权者急于“统一中国”是假，防止民主中国嫩芽扩散、最终吃掉它们才是真。“一国

两制”已经限制了香港、澳门之民主对大陆的扩散、传播、先锋作用，它们不仅一定程度上

不是从前的那个创立民主中国的基地，而且恐怕自身难保。50年不变，50年之后变不变，

怎么变，会不会提前变。事实上，它们已经提前变了。世界上变得最快的便是人治，不尊重

法治，人治想怎么变便怎么变，谁管得了它！回归后，每次看到香港和澳门的领导人到北京

象大臣朝拜皇帝或儿子觐见老子那样的电视镜头、报刊图文报道，我们便深感悲哀，悲哀两

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蚕食、流逝，悲哀民主中国、乃至世界民主之退步。

明摆着，大陆独裁专制政权统治之下，岂容自由民主酣睡！特权之下岂容人权安身！奴隶主

之下岂容他人幸福！现在，大陆政权极力扼杀民主台湾，便是为了象排除香港、澳门这两枚

民主炸弹、基地一样，确保其安全，便是力图阻止民主中国壮大，阻止大陆不遭受独裁专制

统治而创立了统一的民主中国。它的所谓统一是为了政权统一，为了固守独裁专制政权的政

权统一。我们不要受愚弄、上它的当，借口捍卫祖国统一而固守独裁专制统治权益是历来中

国统治者玩弄假民族主义、真独裁专制的伎俩。

独裁专制政权岂容民主台湾威胁，其卧榻之下，民主台湾岂能安睡。独木难支，高度自治或

者独立，怎么行得通、走得好。没有一个民主的中国，属于“一个中国，中国人”而遭排斥、不能参与全中国社会生活，便不会真正确保香港、澳门地区的民主，便不会有民主台湾的安
全。回归了，但不是大陆政权的臣子，要做“一个中国”的主人，参政、议政、定政、督政、干政。不要被“一国两制”捆住手脚，要继续奋斗、创立民主中国，“一国一制民主制”才能确保自由民主。民主台湾与台湾民主化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新先锋，不仅不能、不能独立而偏安一隅，也不能害怕大陆强权，更要担当民主先锋的进攻、普世责任。有时候，和平演变、主动演变式进攻才是积极、有效的防御。台湾，谈判吧！为什么不接受谈判呢？只要保持谈判等接触，便能和平演变、扩大民主影响。谈判本身孕育着许多推广民主的机会。我们期待大陆当局自行民主，也会因其固守集权极权统治而失望，但民主台湾与
其的接触、谈判等和平演变必定可以推动、加快它的民主进程。只有参与了，才能逐渐扯开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防线，才能推进民主中国进程。这也是历史赋予台湾中国民主先锋称号的使命与责任。

（4）人类人权事业让部分人跑得快是因为它希望所有人的人权都能跑得快！只有帮助落后的，进步的才能更进步。作为一个中国的一部分，民主台湾跑得快是因为历史希望民主中国早日上路，也跑得快！如果大陆不主动推行民主政治改革，那么台湾，坚持民主吧！不用暴力与武力，也不惧怕武力，但需要进取心，普及民主，和平演变大陆独裁专制政权。相信吧，即使不是民主台湾统一了全中国，但历史肯定会说“台湾民主化促进了中国民主，是民主统一了中国”。不要害怕威胁，也不要退缩而寻求“独立”！要乐于被指责为“戈尔巴乔夫第二”，千万不要使台湾成为“香港第二”或“澳门第二”，要雄起、挺住。民主台湾接招吧，对大陆民主和同胞之人权多一些责任、多一些进取心！不要舍弃大陆民主而贪恋自己民主化了的“世外桃源”，更不要因为短视而忙于建立“独立王国”。承担推进民主中国的责任，也是对自己前途的最好回报。两岸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平竞赛关

系，而是民主台湾对推进大陆民主、创立民主中国有道义，这是推动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进步的历史道义。

大陆不是声称“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吗？从“一国两制”谈起，首先要求“一

国一制，建立民主中国”。同时多要求一些人权附加条款，要求在对等、透明有大众舆论监督、

电视直播等情况下谈。谈“和平民主统一”，要求杜绝黑箱操作，要求举行两岸电视公开辩论、

全民公决等。

只要在谈判，只要在接触，在与大陆接触，台湾民主便有机会冲破极权统治铁幕而与大陆人

民交流，宣扬自由民主与人权价值。这必然可以监督并改善大陆人权状况，至少可保障大陆

人民获得更多知情权。你地位特殊，如对等、内政等身份，比香港、澳门谈判时少了许多“不

得干涉内政”的无理指责。都是“一个中国”的组成部分，内政、外交等你什么都可以谈，

不让谈，便是制造两个中国。

你可以比香港、澳门等胆子再大一些，边谈边要求解决六四、法轮功等人权问题，要求大陆

开放报禁、党禁、网络禁等，实现财产、言论、出版、宗教等自由，要求参与“一个中国”

的全方位设计、运作。如民主台湾也曾得益于大陆和平统一政策，它迫使蒋氏国民党失去了

延续军事戒严之高压政策的借口，帮助台湾较早走向了民主化道路。他们借口独立威胁、打

击你们，但他们更害怕你们和平演变大陆。

总之，创造条件，帮助大陆人民有机会把民主台湾当作一个参照系，认清独裁专制统治政权

的反人民性，不受其愚弄，并痛恨、拒绝、抛弃它，从而主动追求民主。

“一国两制”不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我们只选择自由民主等保障人权的政治制度。我们要阻

止任何人、任何党对“一个中国”的任何独裁专制统治，使它们不能号令人民和国家事务。

放任“一国两制”，难道不是对中国大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默认和推波助澜。不能成全

它，使它形成更大的集权。也不要被利用，大陆对民主台湾大动肝火、百般威胁的重要原因

之一，便是试图使台湾为对抗进攻而重新陷入军事独裁专制的境地。这可使大陆不至于因为

“国民党民主化了，民主台湾诞生了”而自己仍然固守独裁专制政党与政权模式而陷入难堪，

陷入民愤、国愤、族愤、国际愤怒、人神共愤、千夫所指的压力境地。好在适得其反，武力、

飞弹、社论等恫吓反而坚定了台湾人民选择、捍卫民主的信念与勇气。

值得提醒的是，民主先锋也千万不能上当，遭逼而离心离德又离异，走上了独立之路。台湾！

担起创立民主中国的旗舰责任！和平参与大陆政治、普及民主、成就民主中国！这是保全自

身、光大中国的希望！这是中国统一的希望！这是民强国富的希望！

香港！澳门！回归了，但不要对大陆违反人权的劣举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乃至密切合作。

“一个中国”构架内，以地方政府、国家主人等身份坚持人权正义，大胆过问、弹劾、抗议、

罢免大陆政权践踏人权之举。回归了，你们的行动与意见不是干涉内政，而是行使国家主人

权力。利用有利地位吧，改造独裁专制，发展中国，发展中华。“一国两制”不能是对你们搞

家长制的绳索，不能被它限制得“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人权河水就是要犯极权井水。不要

不关心大陆同胞人权状况，而要以国家主人身份积极参与“一个中国”的一切政治、经济、

文化和统一等事业，要尽力普及自由民主价值观。

正如玩火者被火完，隔岸观火，可能火烧过岸，观火者也可能被火关。放任“两手抓”，则可

能被“两手抓”。香港学生不是也已经尝到了“清场”与被称为“暴徒”的滋味吗？哼，你们

1989年充当支持大陆“学潮—动乱—暴乱”的基地，送那么多帐篷到广场，以为我不防

范你们，不对你们“秋后算帐”吗？

我们要恢复香港、澳门的民主中国基地价值，我们要保全民主台湾的民主中国旗舰价值。

大陆人民也必然知独裁专制统治之耻而后勇，况且我们一直很勇敢。大陆、台湾、香港、澳

门，中国人民心连心、共同奋斗，创立民主中国。

“一个中国”的中国同胞们，建设现代中国，一是民主，二是统一，两者同等重要，不可偏

废。有人曾经认为必先统一，而后民主。虽然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的独裁专

制中央集权影响中国至今有其历史道理，但最迟从近代以来，这样的历史理由早已不复存在。

独裁专制政权及其统治统一中国，行不通了！

中国人不会忘记，近代以来中外历史上的独裁专制政权从没带来真正的国富民强。他们也从

来没有吃掉自由民主以后再建立自由民主。每次被独裁专制方式统一的结果只是：经济、文

化、科技、教育和人民自由民主人权等的高压暴政稳定（剥夺自由的暴政稳定）、
虚假兴盛（积聚个人而“朝廷有、公有、党有、官有”的虚假繁荣）、奸臣与腐败危害国家，
它们重复演绎
反抗、衰败、落后、萎靡、战乱、毁灭、王朝循环等。
如蒋介石国民党曾经统一了中国，但他们把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强加给了中国人民与全
世界。如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大陆，他们也同样把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党天下强加给了中国。历史
已然表明，统一不一定给中国带来民主，甚至走向了自由民主的反面——独裁专制极权统治。
而且独裁专制式的统一本身就是一个烈性劣性定时炸弹，其最终结局是战乱、分裂、生灵涂
炭、祸及全球。

大陆极权政权对民主台湾的威胁已经使亚洲与世界充满了火药味。但我们不要战争，要
和平民主统一中国！我们也不害怕战争！玩火者，必自焚！谁发动台海战争，
人民与历史，
必将以战争罪起诉他！
同胞们，建设现代的统一中国，不是建设统一的独裁专制中国，而是统一的自由民主中国，
是主权在民中国，是人权中国！
一切中国人，勿忘孙中山先生遗训：和平民主救中国！我们不分彼此都是中国人，
帮助大陆，
帮助台湾，帮助香港，帮助澳门，都是帮助中国！人民对自由民主等人权的渴望
和奋斗必将
是中国统一的希望与基石！
一切炎黄子孙，支持大陆民主，演变独裁专制统治！民主了，台港澳自然安稳了！
中国自然
统一了！民主中国指日可待！和平、民主、繁荣、统一的中国，也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
稳定、繁荣和发展的希望！
总之，大陆主动走民主之路，台湾、香港、澳门决不放弃民主。所有“一个中国”
的公民，
决不放弃民主统一中国的大旗！厚积薄发，厚积突发，中国会天翻地覆的，民主
中国是会在
一夜之间实现的！中国人民还会发展中华民族与文明，还会给世界人权事业一些
惊喜！

6、人权无禁区，和平演变中国

中国人权事业不止是中国的事情。
国际社会，参与吧，不要制裁中国！高税奖励走私者，制裁、封闭只会奖励独裁专制统治者！

不要造成“独裁专制者犯错，中国人民吃药”的人权悲剧！国际社会对他们紧一扣，他们就
对中国人民紧两扣。
邀请吧，开门吧！请中国走出去！包容中国！不要再用阻止中国申办奥运这样的
近视使中国
人民气馁！中国不自由，但奥运可以推动自由。任何融入国际社会的举措更会帮助中国人民
冲破独裁专制铁幕，努力获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来吧，参与中国吧！邀请中国吧！只要门开着，只要走进来，只要走出去，只要在接触，那
就是在影响、融合！
和平演变，机会多多！尽管我们从感情上厌恶独裁专制者们在国际舞台上神气活现，装腔作
势，但保持接触，和平演变，非暴力人权大进军，是目前最好最可行的这个自由民主之路。
它暂时不能解除独裁专制这个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世界人权事业的巨大威胁，但至少能减
少独裁专制的压力，减少人民的痛苦。但愿丘吉尔“俄国怕我们的友谊甚于我们的敌意”的
和平演变的经典能在中国成功上演。
人权无禁区！
来吧！支持“新北京，新奥运”吧！“新奥运”必将和平演变“老北京”，促进
“新北京”，帮
助中国人民洗净蒙在北京城上的六四耻辱。
政治的问题最终靠经济解决，经济权利是政治权利的先驱，经济多元化的天然结果是政治主
体多元化。以自由、民主、博爱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终究会推进人权事业。
来吧来吧！外资外企！来吧来吧！国际组织！国际活动！国际旅游！中国改革吧！
开放吧！
走出去吧！入关吧！入世吧！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吧！国际投资等接触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
的变化，而是掀去独裁专制的长久愚弄的持久的新风，是培养新生代的捷径，这些深入中国
人民精髓的思想上的变化是对一党独裁专制铁幕的真实突破，是中国未来向自由民主变革的
希望和真实基础。它们可以暂时被禁锢，但不可以被灭亡。
越接触，越和平演变，中国被独裁专制的强度就越弱、越少、越小，世界越和平、安全、稳
定。一次又一次的“关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式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不会成功。表面
上，独裁专制控制下的 12 亿人消费市场战胜了人权正义，未来的实质将是人权战胜独裁专制。
和平演变的不战而胜不是麻木不仁，更不是妥协而放任自流，是新型的较好的战而胜之。所

以，我们一方面赞成国际社会各界力量采取与中国大陆保持接触的政策，但同时勿忘附加条

款，也是宗旨：中国人民人权事业。

而且，我们希望，也相信，正如共和党的尼克松总统打破中美 20 余年的僵局利于孕育在改革

开放中的中国人权事业，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结束因六四引发的国际制裁下的封锁也应当是

符合世界人权事业准则的。相信这一切不是对中国人权事业的不恭、不公，而是对独裁者们

的不可逆转的慢性的致命打击和对一党专制制度的和平演变。

林肯总统说得好：“我们给奴隶自由，正是为了使自由人的自由得到保证。”那么，我们帮助

人权被剥夺者，正是为了使自己的人权得到保证。只有每人个人的人权得到尊重，才能尊重

每个个人的人权。借此机会，我们还想提请国际社会对肯尼迪总统的一句话给予足够的重视。

尽管自助者天助，但他 1961 年 1 月 9 日在马萨诸塞州议会发表演说时留下了铁肩担道义

的伟大使命与理想：“赋予谁的多，对谁的要求也就多。”

中国人民也有一句广为知晓的成语：一花独放不是春！人类人权事业的先行者们不应在独裁

专制者们面前发抖、退缩，而应该秉承“高山上的国家”的传统，带领人权被褫夺者们冲破

暴政的囚笼，共享绚丽自由的空气和灿烂民主的阳光。

美国自由屋组织的主席曾披露说，该组织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自由的胜负盈亏做了详细的记

录，1995 年世界上 191 个主权国家中的 76 个是自由民主国家，而 1985 年的 167 个主权国家

中有 53 个。然而，虽然 10 年中民主国家增加了 23 个，但自由国家人民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

比却反而下降了 15%，即由 1985 年的 35% 降至 1995 年的 20%。其余的 80% 中，半自由和

完全不自由的国家几乎各占一半。一人对一个 6000 万党员的大党的独裁专制绝对不正常！一

党对全中国的独裁专制绝对不正常！一人对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独裁专制绝对充满错误与罪

恶！他等绝对践踏自由，蹂躏民主，破坏人权！一切有良知的人民对此坚决不能容忍！军国

主义分子的独裁专制使日本走过弯路；纳粹党的独裁专制，使全德意志人民失去了思考和明

辨是非的能力，全听了一个希特勒。世界范围内的独裁专制体系正逐步瓦解，余下的独裁专

制等流氓政权仍然是世界和平与人权事业的威胁。民主社会若不能帮助众多人民摆脱独裁专

制的奴役，自由与民主的和平保障必将受到威胁。
民主在中国的失败，是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损失。而推动它成功，那也无疑是世界人权事业的辉煌成功与有力保障。相信人类的正义不会坐视不管！人类不准任何独裁专制愚弄、暴政
人民，正如法律不准任何人虐待家庭成员。
人类的自由民主应该成熟起来，德国工业化和明治维新等人类自由民主指导下的成果，再也
不能被迫成全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等的独裁专制。

四、总书记悲剧之迷

1、生前死后，瞿秋白两次蒙难

天苍苍，夜潸潸。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4时许，天安门广场照明设施再次突然全部熄灭，世界陷入黑暗。这是立即清场的信号。
同时，叫嚣多时的通告持续铺天盖地来。我们拿什么去抵抗？从人链、人环、人墙、人城、人靶、人桩到这纪念碑下最后的人权盘踞人阵，我们已经被逼到死角。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悲唱《国际歌》。它起于个人之心扉，合唱如人民大海之奔腾，激昂如万丈瀑布之倾泻。它冲向中南海：自由天赋，怎忍夺之？民主天赋，谁能夺之？
人权天赋，岂能夺之！岂容夺之！
《国际歌》鼓舞了一代代人前进，它在中国有故事。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据史料记载，他第一个翻译《国际歌》并将其介绍到中国，他也是唯一和列宁谈过话的中共领导人。李维汉曾说：瞿秋白不搞家长制，是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中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人之一。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认为，这是对父亲最好的评价。

早期的共产党人都是民主革命者，他们与1949年执政前后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没有
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舆论自由等外部独立的监督、制衡，政权、政府等的执政
便嬗变统治的同义词。执政党、执政者很容易把其统治利益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等利益对立
起来，把其意志强加于国家、民族和人民，乃至外界。同时，那些中央集权式纪检、执政、

监察、反贪等只是自家人管自家人的内部监督、反腐，这些机构本身可能更多被用于排斥内

外异己、打击政敌，巩固中央集权，从而走向民主的反面。并在所谓保持稳定中，一面关闭

党内外监督大门，一面大开滋生、引诱、成全腐败的黑箱操作大门。瞿秋白致力于民主革命，

他反对因执政而放弃民主革命道路的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统治。他被捕后，于1935年6月

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据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回忆，瞿秋白神态从容，他

环视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后，微笑着说：“此地很好”。而后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

慨就义。

那个年代，“共产党万岁”喊得好！同时，也多亏了瞿秋白没有象张志新那样被割断喉

管，否则世人还难以确定他就义前的一刹那仍然是坚定的共产党员，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

然而，即便如此，他死后多年仍受到怀疑、批判、打击。他不知道他梦寐以求、为之献身的

社会主义新中国，后来也步了中华民国被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后尘。如国民党执政后以“四·一

二”政变、围剿屠杀共产党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动内战等拒绝组成中国民主联合政府，

共产党执政后则以反右、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镇压、警惕和平演变等

一系列持续反右拒绝创立民主中国。原因同样是民主革命党在转化为执政党后被统治利益扭

曲、带坏了，因保守统治权益而走向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人民、反进步。当然，毛

泽东一生的第二件大事即以文革继续革命则是另一回事。瞿秋白当时决没料到自己的同伴违

背了共产党人民民主革命的初衷，他更无法料想自己身后的故事。做了30多年著名烈士后，

在独裁专制即极左盛行的六十年代，一些人为改写整部党史，他被打成了叛徒。起因与辫子

是《多余的话》一文。

当年，他由于目睹了王明路线的猖獗而无法力挽狂澜，便在文中说了一些内疚与自责的

话。可是，独裁专制是决不容许多余存在的，它的特点便是不容异己、异心、异志、异想、

异事、异地异国，不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要罢黜百家、千党、万民，独尊儒术、一术、

一党、一人一核心，它要独树一帜、独揽大权。它要保持一致，要用一个声音说话，要纯而

又纯。不符合帝制帝位帝人统治权益的，不符合官方、党政官本位即所谓主流的，不符合独裁专制统治路线、意识形态的，便都是多余的人、多余的老朋友老功臣、多余的党、多余的法律、多余的机构、多余的民意民心、多余的思想、多余的举动等等，都要灭掉、清除的。它决不容留多余。右派、老干部、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精神“污染”、自由化、1989年人权盘踞、法轮功等都是多余的，都要清场掉，两手抓掉、平暴掉。统治者的所谓统治，就是防止多余，剪除多余，或者开明一点，逼迫其靠边站、软禁、滚蛋、流亡。那整套国家机器的效用，常常被浪费于此。可没有多余的，谁能振兴中华？人权文明席卷世界的近代以来，从大清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即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中国统治者一直醉心于剪除多余，保持一致。所以他们虽然两手抓，可一直不曾振兴中华。在国民党眼里，瞿秋白与共产党都是多余的。杀害瞿秋白，正是急欲剪除其眼中钉的多余——共产党。可是害人者害己，国民党被赶走了，瞿秋白别世高喊的“共产党万岁”实现了。可是，他忘了“万岁与永远执政、终身制”的关联，它们本身就意味着别人、别党不能万岁、不能执政。这势必导致剪除多余的循环，剪除党内党外的一切多余。所以，瞿秋白这样的民主革命者死后也要被自己人、自己党当做多余再被剪除一遍。瞿秋白《多余的话》岂止是多余，它惹了祸，是灾难。它是独裁专制整治异己的匕首、砍刀，成为祸从口出、因言获罪的写照。果然，他灵魂在九泉也在劫难逃，惨遭批判、蒙冤受辱，全家更在文革期间无一幸免。夫人杨之华被整整关押了六年，受尽非人折磨而惨死。直到1980年，他及家人人才得到平反昭雪。

对杨之华等蒙受的苦难来讲，对全国人的良心来讲，对中共党史来讲，《多余的话》可真是多余！然而，多余的正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正是当今中国缺少的。不，自秦制以来，多余一直是中国社会缺少的。所以春秋战国文化依然是中国高峰，而秦制开创帝制帝位帝王以来，中国文化便一直处在这个伟峰以下趑趄、寒颤。独尊官性儒学，独尊官性马列，独尊

一人，多余的文化怎么发展，多余的人怎么发展。包容多余，容许多余存在，正是我们急需的。被打倒、镇压的，被两手抓清场的，正是需要的。我们多么希望一切多余的能够在中国自由存活、发展。也许，多余的不被视作多余，多余的不多余，没有多余的，正是民主真谛。

有一天，中国不排斥多余的，多余的享有自由民主权力，便是民主了。

生前为了民主，瞿秋白含笑死于对手国民党。死后30余年，他在冥界又受辱于自己人

共产党。战争年代缺乏民主体制的保护，“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核心”残害

了《国际歌》的中国翻译者、执行者、推行者。和平年代同样由于缺乏民主体制的庇护，《国

际歌》未能从“万岁，第一代核心”等那里保护它的信仰者、捐躯者。

可见，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只有独裁专制制度是他民主革命的永恒对手。

只要独裁专

制制度存在，他不是国民党的多余，就是共产党的多余。总之，他是个多余。所有自由民主

都是多余。

现在，只要仍然推行帝制帝位、推出帝人，第二代、第三代核心就不会重蹈覆辙，打击多余，

祸国殃民？

2、中共总书记殉难链

（1）民主一生不平安，生前死后皆多余。这是中国最大两个执政党交替导演的黑色幽

默故事，受害者是同一个人。可我觉得它一点也不滑稽，我笑不出来。它泣血，令人悚然警

醒。主人翁生前死后，两次多余，两受枪杀、批判，元凶却只有一个：独裁专制制度。

历史表明，很多坚持自由民主的中国共产党人生前难得好下场。除了幸免者，不是死于外部

敌人，就是倒霉于内部，甚至更惨烈。仅拿倒霉了的总书记来讲，瞿秋白不是第一个，也不

是最后一个， he 之前有陈独秀， he 之后有张闻天、邓小平，有胡耀邦，有赵紫阳。华国锋也

应该位列其中。他们都是不同时代的多余，都至少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和平等表达的权力，都

遭受了“组织决定，全会一致通过”，都被“两手抓”抓了、抓过，抓得很惨。看来，两手抓

也从来不会放过抓领导、抓黑后台、抓头头。

这些总书记是中共党史的人权丰碑，他们也是多余的，他们组成的“中共总书记殉难链”是

多么悲鸿，何等辛酸！这是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一个缩影，是中国人权毫无保障的典型案列。

1989年人民游行队伍里有“公开评价耀邦功过”、“公开耀邦辞职真相”、“再看耀邦一眼”、

“为耀邦送行”横幅，复旦大学呼吁“追任耀邦同志为终身总书记”等等，这些岂止是华夏

大地对耀邦的怀念。

1980年瞿秋白被平反了，邓小平当然也早被人民平反了，可赵紫阳什么时候获得自由？

“还我总书记”、“紫阳出来”等，岂只是对紫阳的呼唤与解救。它们是对自由民主受到不公

正待遇、打压的愤慨与解救，是由来已久对天赋人权的渴望。4月16日，湘潭大学的一幅

挽联写得极好：“悼念胡总书记，讨伐封建专制主义，弘扬民主、科学精神”。

可是，同样悲剧为什么总在一个国家内重复上演？同样悲剧为什么总在同一个政党内重复上

演？而且，有些人是悲剧之后获得平反，有些人则是喜剧之后获得重新评价。相对而言，身

后之重新评价部不正是对其生前的翻案吗，不也正是其悲剧吗？古时更过分，改朝换代时，

很多不可一世的帝王帝族惨遭掘棺扬尸。

一个政党，如果不删除制造这些悲剧的组织机制和政党理念，即使它后来以平反、拨乱反正

等正视历史上的这些错误和污点，它也难免走旧路、重犯同类错误。这些不仅屡喷党史之血

腥，还祸及国家民族与人民，它有什么理由不自我批评，不集体辞职，不向人民道歉，不向

国家与民族赔罪？它有什么理由不改造自身，不民主化自身？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胡耀邦，平

反深入到了AB团时期，却不得善终。

为什么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总是爆发在共产党内开明领袖辞世之时？197

6年4月5日人民从悼念周恩来爆发了“革命的、正义的‘天安门事件’”，1989年4月

至6月人民从悼念胡耀邦爆发了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全国性民主运动？这些不是所谓的“用

死人压活人”，是悼念式民主，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特殊爆发形式。它表明人民开始不是反党，

而总是对党及党内的开明领袖寄予希望的。不是共产党不好，不是共产党员不好，是共产党

内对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的所有党员的独裁专制制度不好，是它被作为工具对国家人民推行

独裁专制制度不好！

是党国不好！党内斗争与党对党员人民和非党员人民的斗争，演绎了多少悲剧。文革期间，华夏大地流行“万恶的旧社会”口头禅，其实，万恶之首实乃以皇帝、核心为首的官本位独裁专制统治制度。

有人辩解说：“文革”是强加给党的。六四也是如此吗？注意，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陈述句里，“强加”是动词，“文革”和六四是动作的承受者宾语，为什么要省去主语？主语是什么？是谁的作用力，使世界为文革、为六四镇压中的中国与人民哭泣、愤怒？个人的力量能够有此威力吗？几千万作为优秀中国人的共产党员干什么去了？几千万人的党为什么总是对个人独断专行束手无策？“战无不胜的强大的党”为什么总是能被党内几个人制得服服帖帖，乃至打得屁滚尿流、不堪一击？

一方面，总书记们受难而没有几个党员可以出面保护，哪怕说几句公道话，法律更是爱莫能助；另一方面，碰上一个江泽民等，眼看他推行独裁专制统治而误国误民，竟然也难以有人能够成功反对，并且往往是“出师未捷身先死”。

党为什么总能成为个人工具？党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张志新们、总书记们等，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意见、思考、思想、主张、政策、路线、方针政策等，为什么总是“多余的”，总是不得生存、发展，总能轻易被诛杀？这些难道还不能证明党的组织、管理、活动方法与纪律、产生领袖的程序等有重大问题吗？区区几个人、几个人帮就能承担这巨大的历史责任吗？一纸“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安定团结，坚持四项”之两手抓，而不触动制度，谁能保证“乱”之不卷土重来？

而且不要忘记，很多错误决议，很多批判，很多悲剧，都是党的会议“一致举手，全体同意”通过的，都是各级各地媒体代表人民表态“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拥护”。不要忘记，有些受害人，曾经是这个制度的积极推动者，始作俑者。不要忘记，一些总书记、高干们自己受害前，或者主动，或者被动，或者随波逐流，或者赶浪头，或者踩他人自己上，也给他人使过绊子，至少是附和了，“踏上了一支脚”。据说，当时的重要领导人都在“王光美死刑书”上签了字。

1959年庐山会议，只有周小舟等少数人“坚持不批彭德怀”。据披露，胡耀邦曾经公开承认“说过违心话”，很后悔。而且，可能正因为如此，周、胡等才倒霉。他们因为“不合时宜而多余”，周之不批彭是多余，胡之反省、后悔也是多余。最后，邓小平及其家属也成了江之多余。谁敢替邓家说话？不是中国人生来奴颜媚骨、奴性强，缺钙、缺乏硬骨头，不是中国人窝囊，喜欢做宦官，不是中国人生来阴险、毒辣，不是中国人缺乏正气，不敢坚持真理，而是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太凶猛，党组织作为个人工具太凶猛。不紧跟，不变态，不保持一致，不仅位子难保，还难以存活。它动辄满门抄斩，取消待遇，祸及家属。它常常可以令大众知道你是坚持真理之前，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罪名一大堆，“有经济问题，女人问题”，等等。林彪死后，有些权重者一方面大笑，另一方面大哭。他们太明白了：韩信、岳飞等古已有之，下一个林彪是谁？为巩固中央集权，李斯参与设计了焚书坑儒，晁错向景帝进谏削弱同姓藩王权力（并不是完全否定他们），最后也都难逃腰斩厄运，并株连族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同一条路，连续车祸，必是路况有毛病。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总是反复出现同一种悲剧，必是制度有毛病。该是改弦易辙，辞旧维新了！

（2）广大党员与干部没有错误，他们的人权党权也因一人对全党全国独裁专制而被剥夺，他们本身是受害者。而最终，也许最高领袖们、皇帝、总代表、核心们也是无错的。我们都埋怨他们搞终身制。但是，制度是有强制力量的。必须遵守独裁专制制度本身是一列毒辣无情的狂飙火车。它的运行规则不由法治与主权在民决定，而黑箱操作、卑劣下流、残酷无情、阴险无常、侵犯人权、流血冲突等是它最大的规则。它没有正常的不流血的停站掣动系统，如法治、任期制、自由选举制、三权分离制、司法独立等，无法妥善安排，和平解决下上车旅客间的关系。任何人坐上它，或者被推上去，便身不由己，只得听其使唤了。再强的人，也只能顺应它，由它推着走。最成功的人，不一定是最有才华、最能干的人，而是顺应得最好的人。也许，

此时顺应本身是最重要的才能。而那些，顺应得慢的人，没有反应的人，不顺应的人，乃至
胆敢反对而逆行的人，必是生前即掉队，即遭受排挤、打击的人。故而，最成功的人必须搞
终身制，确保终身独揽大权。并以钦定接班人的方式，延续其权力、思想、地位等。
这造就了独裁专制制度的一站式列车的政治运行模式。一国或地区，整个独裁专制统治时期
由众多的一站式列车运行组成。最高领导人是各自的车长兼司机，他们的轮替，即各个一站
式列车的起程与终止，组成了王朝循环与时代循环。各一站式列车运行的站长、终点只由一
个因素决定：自然与意外死亡，或者遭推翻，被赶下台。否则，任何中途停车，任何正常退
休，任何善良的愿望如主动交出权力等，都意味着失败，遭清算，难以善终。掩埋尸骨，清
洗血腥，安抚天下，是任何下一列一站式政治列车的起点。它的停车换人，极少能平稳过度，
每次均带来地震般的破坏。所以，题目既带动社会前进，也祸国殃民。
这是制度的无情。它如同一种自然力量，非人为可以控制（其实，民主制度也是一种领导人
无力控制的力量。这种力量经由主权在民确定）。它令人欲罢不能，成者为王败者寇，不为英
雄，则是狗熊。而且，身处毒辣无情的狂飙火车，哪能不得罪人，哪能有意无意间不做坏事。
那吃人的制度，就是挑动人们互吃，你不吃他，他吃你。无论生前如何风光，一手遮天，身
后遭遇重新评价（所谓翻案，或不得好报）是不可避免的。
这从一个方面表明，接班人制度是终身制的必然。独裁专制制度下，接班人制是终身制的延
续。除了延续有抱负的帝王们的政治理念，接班人们的一个重要条件与使命是
“不翻案，全
盘继承搞凡是，前任永远正确”。有抱负、不受前任连累的接班人，可以把“翻案”作为确立
自己威信的王牌。卑琐而又“翻案，则必祸及自身”的接班人，尤其当他是前任错误乃至罪
恶的既得利益者时，他是会想方设法，不惜牺牲国家、民族与人民利益，也要坚定不移，当
好不折不扣的接班人的。如江泽民是六四镇压的最大既得利益者。
但历史表明，历史要前进，则必然整理历史。接班人制度最终不可能阻止“翻案”，重新评价，
它只能延缓这一过程。有的长达数百年，有的长达数十年、数年，有的则只有数月、几天。

中国的遗憾在于，推翻六四镇压壮举至今未来。而我们曾经乐观却幼稚地人为，最多不出三年。我们还等什么，跟它拼了。

可见，我们唯一必须反对的，是任何名目、任何党团、任何人的独裁专制统治制度。是帝制产生了帝位，是帝位产生了帝王，最终产生了祸国殃民，危害世界。

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踢开党委闹革命”也不是说党员和全党都坏了、全腐败了、都对人民“当官做老爷”了，而主要是一些特权党员“变质”了。也许全民和解的人权旗帜下，皇帝也可以受原谅，但唯一不能原谅的是任何帝制帝位，是任何对个人、对党、对民族和国家的任何独裁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

正如现代国家不是家国、党国、家天下、党天下、四项基本原则国、凡是国，而是主权在民的人民主权立法国，是民国、公民国；正如人民不是什么王民、皇民、臣民、党民，而是有独立尊严、人格的国民、公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员也不应当是什么党的好儿女、模范党员，而是党组织的主人；正如官员不应当是什么父母官，而是公仆，党组织也不应当强制党员爱其甚于爱爹娘、妻子子女、国家、民族，不能为了党可以“六亲不认，民族国家不认”，沦为与邪教无异耳。

人民要有人权，党员要有党员权。党员与党组织以及党的领袖之间至少要有平等的双向选择权。而且人权高于党员权。人民、党员人民，都应当享有超越党组织之上的基本人权，人权事业也应该为广大党员争取人权。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宪法规定：“党的内部组织必须符合民主原则，党的组织和领导人不得剥夺其成员的自由民主等公民权利”，我们的党员就有人权党权了，党的总书记们等便不会有悲剧了，党就会少犯错误了，国家与人民、党员均不受其拖累了。

我们曾经集中全党智慧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抵制文革、六四等错误呢？

不是广大党员和中国人民缺乏正义，而是制度迫使他们没有权力、没有能力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不真正推行党内党外民主，不厉行法治，仅靠文革四大民主、四项、三讲、保持一致、空前

团结，仅靠平反、拨乱反正等保持正义、追求真理等不仅不会成功，还会产生新的问题和独裁专制统治。

可见，开明独裁专制不会自动进步到民主，统治特权难以自动为人权让路。是先有皇帝，还

是先有帝制帝位？我们无需争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但自从有了鸡以来，是先有鸡，后

有蛋。自从秦制以来，是帝制帝位胎生了皇帝与核心。否则，300多位皇帝将毛之不存。

他们自称天子，一代接一代，将巩固中央集权视做天命。而诸多养鸡的目的，只是为了胎生

更多的蛋，更多皇帝、核心。

至少，中国的政治生态仍然是：中央集权制、一党制、核心制、家长制、终身制、继嗣制，

排斥了三权分离、多党制、任期制、自由投票竞选制。是统治特权高于大众人权。

（3）邓总设计师曾说：有了文革教训，才有了改革开放。难道一定要有了六四，才能有民

主中国，正如一定有了戊戌政变，才有辛亥革命？

难道共产党永远只能自我批评，不能听取、接受党外人民的建议和意见吗？难道中国共产党

一定不能再接再厉、爬上自由民主等人权高峰？难道中国一定要因为共产党大陆政权拒绝民

主而长期处于分裂状态？难道民主一定是晚期中国共产党因排斥它而最终将败于它的克星？

没收自由，拒绝民主，这是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还是中国官性统

治传统文化的传统？都不是，这是古往今来一切独裁专制统治的传统。

我常常缅想邓总设计师老骥拉车的镜头，他忘了“老之已至”，推动中国前进的精神却使他更

象小伙子。虽嘴不听使唤，手哆嗦，身体颤抖，他仍然以极大勇气和毅力推动中国改革。一

想到他是用生命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们就觉得对他的任何指责、批评可能都是苛求，但

有些事情必须说清楚。

什么体制使邓小平一定要熬到高龄才能施展抱负？为什么中国一定要靠高龄的邓小平推动改

革开放？为什么刘邓五六十年代即已是成熟、可行、受到人民欢迎的“三自一包”等经济路

线要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能得到运用、发展、完善为农村改革？多亏老天有眼，使

他逃生于政治漩涡而能最终引导中国走向改革开放？

但是，为什么赵紫阳时期的股份制等非要等到若干年之后才能大上快上？而政治体制改革虽

然停滞，但赵紫阳时期的党组织等退出企业和国家机关等社会生活也必将是由之路。

六四后时代里，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倒退，如坚持“四项四个凡是”、大搞“三讲”等，

我们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几乎是照搬、抄袭六四前时代的思路与办法，为什么？有人说西太后是最丑恶的独裁专制保守者，她毒辣镇压戊戌变法，却在二三年后不断推出改

革措施。可惜晚了，不改革是绝路，迟到的改革也是绝路。辛亥革命只是顺应历史前进时推

了一下腐朽的独裁专制大清江山，它就轰然坍塌，土崩瓦解，尘埃散尽。尽管可以把死马当

活马医，但马死不能复生，假忙活不能救活它。晚了！六四后极权时代面临着同样的命运。

新时代的辛亥革命，中国全民和解和平人权大进军不会太远！

也许，改造中国要从改造共产党及其组织原则开始，建立民主中国要从使共产党民主化开始。

但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被六四既得利益者拖累，被六四镇压拖累，被四项三讲拖累，被“凡

是”迷信神话的帝欲用心野心伤透民心，恐怕它不仅救不了中国，还会自身难保。

“文革”后

的国内外局势和共产党本身的能力还允许共产党自我纠偏、拨乱反正、继续前进。延续至今的六四错误表明一人对一党的独裁专制已经连累共产党不能顺应民心了，它伤透了

人民的心和国际正义，人民还能相允许它从内部改正六四错误，凝聚大陆各地各族各界人民

前进吗？够呛！这一次，人民恐怕不只满足于提议、接受、表态、拥护了，而是参与、主政，

亲自办理。共产党员和党组织，摒弃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吧，奋起自救！中国，奋起自救！

再回首，同样悲剧为什么总在中国重复上演？清代，作为满清统治阶层“总书记”的光绪皇

帝，为什么会被软禁？为什么总书记后面还有人，是个人，而不是集体与人民？国内外各种

进步力量宁愿冒着“妄议朝政，干涉内政，无耻的侵略与制裁”等的指控与打击，为什么仍

然无法解救光绪等？

他等代表的君主立宪、改革开放为什么会被斩灭？为什么清代改革派的其他人物也无一例外

能在帝制内善终，他们与民主革命派同样倒霉，甚至更倒霉？清代以前，又有哪个王朝的改

革派完美安详于其时代？

帝制帝位帝王之王朝循环表明，开明独裁专制决不会自动前进到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制度

的改革者，只有确立了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善终！党员忠于党、爱党与人民拥护党，最好的办法是反对党内独裁专制与党外独裁专制，是反对任何党组织、团体，任何个人与核心等对其成员和非成员的法西斯统治，是促进共产党组织民主化，党的领导民主化。这样，才能避免其步国民党1949年与1999年后尘。而且，如果大陆真能如1999年台湾那样，以和平民主，实现不流血之政党轮替、政府换届，则实乃共产党本身与国家、民族之大幸。分裂党，以一党之私，换来民富国强，何乐不为？

“一个中国”以内，不要骂李登辉、陈水扁。国际上，不要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嘀咕咕。也许，共产党组织民主化，是中国民主化，“一个中国，民主中国”的起点。趁早设立一队、二队、三队，趁早取消党禁。既推进党内民主，又与中国各党派联手共存，走向和平对等、对抗，多党自由竞争，主动推进民主化进程。这是“一个中国”逐步、顺利地实现“和平民主”的捷径。否则不是必有内乱与分裂，就是从战争、政变、暴力等走向民主。别作“历史罪人、罪党！”

3、 总理被割去了舌头

（1）因为说了“多余的话”，生前死后，瞿秋白两次蒙难。他获得了平反。但导致他不得安宁的根源仍然延续，中国人还是不能说“多余的话”的，还是没有言论自由的。1989年6月4日6时25分，流亡广场，返回单位的路上，我无意间看到了东交民巷上的中国记者协会办公楼，它是灰色的。当时，远处不时有枪声传来，四周还围裹着稀疏的装甲车等战车的驰骋轰隆声。中国新闻单位能对人民负责，揭露党国镇压人民的罪行吗？事实证明，党性高于人民性更使它更灰。一个崇高职业沦落为谋生手段，甚至堕落为两手抓、精神禁锢长城的帮凶，大批满怀正义、立志为人民代言而从业新闻的中国人因此倍感失落、压抑、无望。六四后时代，当局一直叫嚷什么“枪杆子，笔杆子，两杆子保江山”，对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推行更加严厉的舆论集权主义，中国新闻界将更大程度上沦为当局愚弄人民、欺骗天下的工具，新闻自由被剥夺殆尽。

早于 1946 年，联合国大会便宣布“新闻自由是基本人权，是联合国所致力争取的一切自由的试金石”，新闻舆论与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并列为社会第四力量。它是一面不偏不倚的镜子，照亮社会各个层面、人物、事件。它提供舆论舞台，使人民有机会参与、监督、管理、引导社会生活。它代表人民说话，尤其代表隐没于权力权贵阴影中的普通人说话。新闻舆论应该人民自由、民主和人权提供系统化、制度化保障，是其最大社会价值所在。然而，中国独裁专制统治当局则使它成了没有脑子，不能独立思考的耳目喉舌。它从属各级党政组织，自身独立性差。耳目喉舌等身体附属器官只能听命于大脑中枢，一个子公司如何监督母公司？一个儿子如何监督老子？耳目喉舌如何监督大脑？下级何以监督上级？人民人权何以监督统治特权？

1998 年，当中国总理朱（容加金旁）基在中央电视台声明新闻机构是“人民喉舌”，舆论可以监督他时，他这“多余”的讲话立即遭到修改与删节。第二天，以为春风来了的国人打开报纸，便忿忿不平，“报纸登的，怎么与现场直播不一样？”一些遑早的老人聚集公园，感慨万千：“总理的话都敢改，这人是谁？”有人公开发表言论，为此鸣不平，结果“日子很难过”。

朱总理的日子也很难过吧？为此，他是否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了？他不学乖点，会不会遭到罢免？1949 年以来，中国二把手鲜有好结局，他会否沦为刘少奇、林彪、胡耀邦、赵紫阳？不久，针对这闪光于当局一嘴遮天的“纰漏”，中国各媒体得到指示：今后无论什么领导的视察等工作讲话，即便是政治局常委的，也必须经由舆论控制机关审稿把关后才能公开发表。而且，即使是广播与电视等的现场直播讲话，各媒体也不得随便转摘。一国总理尚且不能自由言论，他人何复言哉？我们怎么能够说这个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是尊重人权的。不知怎的，我想起过去所有因言获罪的右派们、彭德怀们、“三家村”们、马寅初、张志新们，还有秦始皇时代的 460 多位儒生们。

张志新临刑前还被割去了舌头！如此看来，独裁专制之下，所有中国人，说话的，写字的，唱歌的，跳舞的，走路的等等，凡是不符合总代表利益的，凡是自由言论的，自由行为的，都是多余的。

我们不能不缅怀 1948 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它对思想、言论等自由作了明确

表述：“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

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比较之下，所有中国舆论传媒，都不同程度被割去了舌头，乃至割去了耳朵。统治者不同意

的，他们不能说；统治者不愿意听的，他们要装聋子听不见。

舆论控制部门，如宣传部，成了禁止说话部、戒言部，割舌部、封嘴部。思想研究部则成了

禁脑部、洗脑部。枪杆子、笔杆子，通告、通稿，戒严、戒言，真可谓两杆子保江山。

由一张大嘴统管一切，一对大耳统听一切，中国是总理被割去了舌头的国家，是各级党政军

等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干部被割去了舌头的国家，是人民被割去了舌头的国家！我们有什么脸

皮发表赞扬自己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

什么时候，中国总理，中国人民，能不被割去舌头？也许，总理能自由言论是中国民主事业

出发点之一。

（2）然而，经常受到独裁者们污蔑、贬低的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又是怎么回事呢？

言论自由是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宪法最高价值准则之一，如美国《第一修正案》掷地有声保证：

“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因为这是民主的前提，也便于由了解

真相的公众制定政府政策。同时，其中包含的人民自由监督公务人员与公共措施的权利，以

及人民自由交流意见的权利，是人民“其它所有权利的唯一有效保障”。

1998 年底，“拉链门”一叠余波，就足以令独裁专制者们害怕新闻力量。拉里·富林特是美国

著名生活杂志《赫斯特勒》发行人，他 1998 年 10 月斥巨资在《华盛顿邮报》上作整版广

告，悬赏百万美元购买美国政要绯闻。广告全文是：拉里·富林特和《赫斯特勒》杂志宣布

它将支付现款，其最高额可达 100 万美元。您是否与现任的美国国会或高级政府官员有通奸

关系？如果您能提供文件证明您与国会议员、参议员或其他著名官员有非法的性关系，拉

里·富林特和《赫斯特勒》杂志将最多付给您 100 万美元。条件是我们选择出版您的经过证

实的故事，并使用您的材料。

拉里·富林特向报界透露，这则广告刊登后的一周内，他便接到了 2000 个电话。其中的 85% 对他的行为表示赞扬，有 300 个电话是由妇女打来的。后来，据该刊物广告部负责人称，该部平均每天都能接到 3—4 个应征者打来的电话。到 1999 年 1 月，富林特已经向几位“合格”应征者支付了数百万美圆的赏金。美国《时代》周刊称拉里·富林特这番举动是向美国国会投下了一枚“臭气炸弹”。据悉，这枚“臭气炸弹”已经开始发挥效用，为社会公众服务。正是由于它的功劳，导致了共和党众议员利文思顿的婚外情曝光，并使其不得不宣布放弃即将就任的众院议长职务。这枚“臭气炸弹”利用新闻自由的监督力量，如此“胡来”，如此“胆大妄为”，如此“犯上”，独裁者们怎么能允许中国制度民主化，把权力交给人民？怎么甘心社会与人民掌握新闻自由这一民主利器？丑闻累累的独裁们精明过人，他们决不甘心把社会第四力量交给人民行使。

《易》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是指只有接受大众舆论监督的人，才能得到舆论支持、人民拥戴，做代表。独裁专制政权反大道而行之，总是企图用掌握舆论去控制天下、国家、民族、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总是力图囚笼第四力量，封杀第四力量，借以包庇恶行，保全自己。他们一脉相传放出话来：枪杆子打江山，笔杆子保江山，“两杆子保帝制帝位”。我不禁想起了冯玉祥将军《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的一段话：“全世界无论哪一国，不会有两千几百家报馆，全都抓在一个人手里吧？！……然而，蒋介石却是两千多家报馆的后台老板。因此上海、天津、广州、成都等各大城市的舆论，都边成了蒋介石的传声机。蒋介石利用他御用的中央通讯社，制造谣言，颠倒是非。又压迫各报馆，替他传播谣言。这种情形，还说不是独裁，不是专制，不是希特勒的作风，是什么呢？”太精辟了！虽然蒋介石到台湾去了，但中国大陆一直奉行的舆论控制体系等“不是独裁专制的传声机，又是什么呢？”据 2000 年 2 月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披露：现在中国大陆共出版 2053 种报纸，各类杂志期刊 7999，广播电台 284 座，各级有线无线电视台 1822 座，并以此说明中国人民享

有广泛的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等自由。真是愚蠢，事实是这么多的媒体的主要版面、黄金时间等全部听命于一党一人对全国的发号施令，多么恐怖，中国思想、言论、宗教信仰等自由遭受了何等惨重的扼杀！

陆定一曾经对于光远说：“我们的宣传部门那许许多多年的工作，还不是整完一个人再整一个人。”岂止于整一个个人，他们禁锢思想，大张挞伐，揭批、诛灭异己，完全是整社会，整人民，整中华民族与文明。从反右、反击右倾翻案风、清除精神污染，到新近对法轮功的围剿，哪一次不令人发指？这是中华文明的传统？

（3）1989年6月4日清晨，透过阵阵铁甲与纪念碑，我们看到了华表。面对紫禁城和中南海等新老独裁专制统治基地，它们孤苦无助。

中国有华表，它原典意义是什么？其实，揭开统治者的欺瞒、篡改，华表，不仅是华夏古老文明的象征，本质上还是人民监督与人民民主的象征。《吕氏春秋》疏义曰：华，文采也；表，柱也。华表又称桓表，它源于古时的诽谤之木。人民用横木交于其柱头，一般被“立于朝”，即矗立于“大路交衢施焉”，如码头、城门、桥梁、衙门等处。那里人口集中、人流稠密，人民可以在它上面自由发表关于时政、社会的建议与意见。即使说错了，亦可赦免无罪。

这人类早期的辉煌民主工具——诽谤之木，虽传说由上古时代的尧帝所创，却被中国第一个最大的独裁专制者秦始皇废之。短命的暴政专制秦王朝成了后来人的反面教材。到汉代时，儒家的民本民主风又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华表受到重视。至到汉文帝时，大为兴盛。唐、宋及以后，沿用不衰。从考古、石刻、绘画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桥头等公众场合有华表傲立的情况。

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尧设诽谤之木于四达之衢”，即华表在尧舜时期便开始出现，并被作为自由表达社会民意和行使新闻等社会舆论监督的一种工具。（帝尧还同时开创了禅让，不传血亲而将帝位传给德才兼备的舜，这无私的民主政治风范至今是华夏大地的千古美

谈。)专家还考证,华表也是人类社会舆论史上最早的舆论监督工具,他们行使指导社会进步

的社会第四力量的巨大威力。

可见,华表是言论自由、人民监督与人民民主的载体,是尊重民意的象征。它是最早的大字

报、海德公园与“百花争鸣,百家齐放”,是提倡民主。这就是华表精神!

但是,在君主专制或中央集权专制盛行的漫长岁月里,统治者们不愿意受到限制的绝对权力

与来自社会舆论监督的强大限制力从来冰炭不容。独裁者们不是毁除华表,就是把它们束之

高阁,使华表最初具有的自由民主的进步意义逐渐消弭殆尽。后来,由于帝制帝位帝人等对

中国先民与文化的恶意歪曲,华表们仅仅沦落为“光明社会”的一种象征物而留传后世,并

被主要用于建筑装饰方面。

极具浓烈讽刺意味的是,华表还常常被独裁专制的帝王们作为其墓地的装饰物。

这是表白他

们死后才愿意接受新闻等社会舆论监督,还是标榜他们文治武功治理下的“光明社会”般的

丰功伟绩?显然,帝王们意在后者,他们害怕民主,却为自己标榜民主。

虽然帝王们的独裁专制意志强奸了社会民意,改变了华表的自由民主属性,但华表充分

证实了中国自古不缺自由民主,且源远流长,只不过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被独裁专制欺凌的受

奴役地位而已。

在一个把代表人民监督与人民民主的华表,当作国家民族象征的国度里,人民力图回归人民

主权,欲行文明的民主政治,如何成了“全盘西化”?民主不只西方独有,人权至上是人类

公理!谁敢侮辱我中华文化缺少民主基因?谁敢侮辱我中国人民奴性强?谁敢夺我中华民族

的民主权力?怎能?怎忍?

我们盼望华表能在当今中国恢复它们最初的属性,成为中国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好望”。我

们盼望中国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继承华表精神,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华表,成为人民的耳

目喉舌,代表人权,监督政府,而不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监督、愚弄人民。我们盼望每

位国民都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的华表,去观察,讨论,投票,竞选,监督,弹

劾,罢免,选举,立法,修理政党,修理领袖,修理政策,修正宪法等。这也正是一切人权

的基石,也正是人民此番直面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基本意义!

4、除了劳模、标兵：共和国不能忘记谁

六四镇压以后，当局派长城阻隔，中国人再也无法亲近人民英雄纪念碑了。人民人权事业应该永垂不朽。然而，除了毛泽东时代，历朝历代统治者似乎都十分害怕人权英雄，乃至处处回避、贬低、遗忘他们，凭借掌握的舆论工具，对他们制造民族集体遗忘症。他们十分脆弱，敏感、害怕一切反对统治当局的历史大事、日子、人物、地点、口号、主张、纪念物、纪念碑。如六四镇压后，当局不再播放世界各地的任何学生、市民、农民等的罢工、罢课、罢市与游行等，不再纪念重要的农民起义事件及其人物，他们把人民英雄纪念碑圈起来，禁止人民瞻仰、盘踞，等等。

现在，六四当局的社会主流及其媒体不提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了，不敢提农民起义了，更不敢提及民主运动的尖兵——学生运动了。就是自称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等字样讳莫如深，恐惧于触及人民民主革命的神经，引发静坐、游行、示威等人权运动。只有当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去世时，我们才可以在其讣告中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字样，而他们早年时代反独裁争自由追民主的精神与事迹被隐匿殆尽，只剩下“对党无限忠诚”。至于民主思想家、资产阶级革命者更是倒霉了。而所有这些人的同一称号都是人民民主革命家。

完全可以这样说，目前的共产党已经变色了，它既不是无产阶级人民的政党，也不是资产阶级人民的政党。总之，它已经不是人民的政党，只是一个维护帝制帝位，保守、“稳定”独裁专制统治权力的工具。这个工具的第一性是所谓“党性”，第二性是人民性，而且当“党性”和“人民性”发生冲突对立时，它只坚持“党性”。它渐渐背离了起家的人民性，经常背弃了所有人民，并且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剥夺人民人权。

这是对毛泽东主席等老一辈中国民主革命家事业的污辱。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八组浮雕的全部内容他们都不敢提及了，凡是不利于独裁专制统治与交接班的古今中外的案例、新闻他们都不敢上版面、上镜头了。奴隶起义、农民起义、维新运动、军事起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知识分子运动、工商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等等，他们都不敢提及了。他们害怕一切人民

民主革命，他们对一切非独裁专制者和自由民主搞“阶级斗争”。他们害怕陈胜、吴广，害怕白莲教，害怕“二·七”大罢工，害怕五四运动，害怕“一二·九”，害怕“八·一南昌起义”，害怕“法轮功”，害怕自由民主。他们害怕“共产”，害怕人民与他们共享天下，害怕人民团体、其他党派与他们共组政府，害怕共同执政，害怕共享国家政权。一切人民民主革命的日子，都成了令他们惊恐万状、惶惑不安的所谓“敏感日子”，人民民主革命的象征物都成了他们躲避不及的“夺命神”。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及其民主运动，被他们用放长假的伎俩荒疏、废弃、淹没了，“两手抓”抓了：学生们，青年们，所有国民们，旅游吧，玩吧，忘记民主吧，玩物丧志吧，我们只要政权稳定。可笑的是，放长假的名义则是尊重工人阶级的五一节，可工人们都面临着被官本位勒令下岗的威胁。不单只学生和工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一切都因为自 1840 年以来的中国人民反对形形色色的独裁专制的民主革命而熠熠生辉，他们又因为目前的独裁专制而黯淡无力，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再现英雄本色？

1999 年建国 50 周年，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播发了许多“共和国不会忘记”的人物介绍，一大批熠熠闪光的名字令人起敬。他们是很多方面的优秀代表人物，如黄继光、邱少云、孟泰、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林巧稚、钱三强、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袁隆平、张海迪、蒋竹英、张华、徐洪刚、李国安、徐虎、吴天祥、王廷江、李素丽、邹延龄、侯殿禄、王涛、李向群、范玉恕、方红霄等。

但是，细细看，左等右等，我们发现“人民共和国”惟独忘记、抛弃了这样的优秀儿女：彭德怀、罗隆基、章乃器、马寅初、孙冶方、赵树理、张闻天、贺龙、顾准、张志新、遇罗克、杜鹏程、白桦、王蒙、老右派们等。他们不做顺臣，因为思想而倒霉，很多都为坚持真理而吃尽了苦头，有的甚至舍生取义，蒙冤死去。更不用提那些亡于六四、蹲监狱，至今仍流亡海外的民主中国斗士、英雄。还有一批老人如彭真等，获得“解放”后为中国走向民主与法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他们有思想，有独立精神，独立思考，并因此而获罪，被“两手抓”。但他们虽代表人民，却

被迫孤独地为真理而斗争，宁死而不屈服，更不用说为了房子、位子、票子、职称等个人利益而退缩，乃至放弃。他们是真正“站直喽，别趴下”的中国人，他们与前者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真正脊梁，是时代的良心。

我们还可以恭敬地列出一大串日月昭彰的民主英魂。

革命胜利后，独裁专制统治衣钵相传。为了自由民主，他们继续高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1989年，盘踞广场者，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是夏明翰的后来人）”。在独裁专制黑云压国天下黑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坚决不做独裁专制的顺臣。他们都是独裁专制的反抗者，是自由民主的追求者，是人权真理的实践者，当然也必然成为反对独裁专制统治的献身者。

较之雷锋、李四光等埋头苦干、英勇奉献的公民，这些人并行不悖，与反抗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闻一多、李公朴等一样，与众多的牺牲于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员一样，没有一点理由不堪称为真中国英雄，也是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他们同样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他们甚至还有一些特殊意义。他们因为身处逆境，不被官方社会主流承认和赞扬，甚至面对威胁和死亡，因而更加闪光、值得赞扬！

然而，虽然张志新等最后获得了“面对被捕、坐牢、严刑拷打，却始终对党无怨无悔，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的评价，但张志新们可以瞑目、可以安息吗？不可以，也不会！

他们是因为反对独裁专制而获罪，现在他们反对的东西还存在。我们为什么永远忌讳槟除一人一党对全党全民全国独裁专制的罪因？中国能否不让自己的优秀儿女惨获这带血的高风亮节？

然而，即便有怨有悔，或者因此而立志要改造党内一人独裁专制和国内一党独裁专制的中国人，就不是优秀共产党员吗？就不是对人民与国家的高风亮节吗？我看他们更高风亮节。正是这样的中国人被排斥、打击、赶走、流亡，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民主性才在不断退化，新中国的人民主权性质才不断蜕化为“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然而，一个曾经以“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赢得天下的政党背离了自由民主！

然而，一个有很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国家，不认为追求自由、坚持民主和热爱人权是爱国

主义不可或缺的圣典！

然而，一个国号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方大国忘记了张志新们！

然而，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刻意忘记了雷锋等以外的中国脊梁，他们因为害怕而阴险地从共和

国的历史上抛弃了这些勇敢的思想者、民主奋斗者。

然而，一个无需人权思想者的民族是一个什么样民族，一个没有人权思想的民族会跌落到什

么深渊？而高高在上的中央党校等一批独裁专制下的最重要的思想库，究竟为发展中国文化

做出了什么贡献？他们代表是什么样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电视台、人民广播电台、报

纸等中国媒体、出版社等，难道不能坚持人民性、为弘扬自由民主等人权事业做出更来劲的

报道？

中国，也不能忘记步鑫生、张艺谋、王塑、王海、储时健、禹作敏、牟其中等，不论他们有

多大缺点！

再往前溯，一个魏源，一个龚自珍，比多少清王朝的皇帝大臣更利于中国发展，更不用说明

末清初的一个青楼女子李香君。然而，据南京大学的几个青年人在 1999 年 11 月 25 日的《人

民日报》上发表图文说：南京城里，魏源故居破烂不堪，名妓李香君的故居已经被休整得富

丽堂皇。而前者可以激励人们睁眼看世界，锐意革除独裁专制，后者则可以麻痹人民闭眼不

管独裁专制的现实，及时享乐。我们不禁想起了一些民间的讽刺笑话：各种三陪盛行好，利

于社会稳定。社会稳定之实质不过是“只要个人位子稳定，哪怕死后洪水滔天”，他们花在稳

定个人位子上的时间精力，远远大于富强国家、服务人民。

又如民主革命者彭家珍 1912 年 1 月刺杀清庭重臣而壮烈牺牲，被孙中山先生赐予“大将军”

称号，他与先前刺杀袁世凯的张先培等五人被合葬在北京北面，立有一座五面碑，分别镌刻

着每一位烈士的大名。后来，那块地方先是被划给了北京动物园，再由于动物园不断扩建，

这座中国民主英雄们的纪念碑竟然早已不知去向了。还有多少民主英雄没有得到祭奠、弘扬？

如徐锡麟，他因维新与民主革命不仅被砍掉了脑袋，心肝还被剜出来炒着吃了，还有陈天华、

秋瑾、聂耳……

我们为什么不培养公民意识、平民意识、平等意识！难道只有欣赏古装武打片、拜读金庸的

武侠小说才能宣泄中国人民的为平等自由民主而奋斗的精神？

当今中国，自由英雄没牌位了，民主英雄没祭台了，人权英雄没圣坛了，他们占据不了主流媒体的黄金时间和黄金版面。各级大小皇帝们却又神采奕奕、大展宏图了，现实生活中他们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隆重出场后，马上又在影视剧里大摇大摆、轮番上镜，不想看的人躲都躲不开。为什么独裁者们的活动一定是头条新闻？江泽民是六四既得利益者，也顺便收获了很多头衔：江头条，江明星，江皇帝等。

看看中国影视界的“爆炒皇帝”，是应该皇帝又吃香、受到人民欢迎了？还是人民盼望盼望好皇帝，盼望“明君圣主”救中国？还是特意逢迎或讽刺一些“帝欲”极强者？还是当今有人想当皇帝？古代的中国科学家、发明创新者、建筑家、艺术家、探险家、军事家、思想家，哪一个不比绝大多数皇帝对中国进步更有推动作用，他们就上不了当代中国的镜头？甚至皇帝的附属如宫妃、太监等也比他们值钱？

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落户东方文化大国——中国，不要埋怨中国作家无能，也不要埋怨评选环境不公正，一个皇帝文化、独裁专制意识形态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国度，的确很难产生人性化作品。不弘扬自由民主精神，宣扬做奴才好、宫女好、阉人好、宫人好，宣扬干什么也不要忘记“谢主隆恩”，怎么能是“三个代表”之一的先进文化代表，怎么能获奖？有人说张艺谋、王朔、崔健等不行，很多事实证明他们行，至少他们没有一部歌颂皇帝好、独裁专制有意思有趣味的作品。

毛泽东要求文艺等一切面向人民大众，为什么现在的官方主流文化中帝王文化不绝于耳？普通农民、工人、军人、知识分子、研究人员、企业家、商人等为什么总是处于社会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应该说诺贝尔文化奖降临中国有望了，但只是国际社会太造蛋、有眼无珠，偏偏不承认我们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这是为什么？这算一个什么自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谁在作祟，败坏、毒化了社会风气？他们危害中国，使人民的公民意识越来越薄弱，不仅使想做皇帝的人多了，还使想做和绅和刘罗锅的人多了，使想做宦官而擅权的人多了，使想做姨太太、香妃的人多了，使想做公主、太子的孩子们多了，更

使找捷径升官发财“做个奴才也不错”的人多了。甚至连经济界称王称霸的也多了起来，“画王”、“彩霸”、“凉霸”等不绝于耳。多么可怕可悲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倾向！可怜的中国

女人又要悲叹阴盛阳衰，四处呼唤、寻找男子汉了！

大清皇族尚有后裔，我们不需要老皇帝，也更不需要新皇帝。

皇帝们不能东山再起了！

没有神仙救世主，没有皇帝或什么其他“核心”能救中国，只有“和平……民主……救中国”，

只有人权强中国！

张志新们的舌头不能白白被割掉了！

徐锡麟们的心肝不能白白被剜出来炒着吃了！

我们很难相信党和政府真的为彭德怀、张志新、遇罗克、瞿秋白、张闻天、刘少奇等中国英

雄平反了！

我们很难相信中国因“拨乱反正”而真的反独裁专制之乱、立人民人权之正了！

中国人不能没有记性了！

中华民族不能没有记性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没有记性了！

中国人民不允许没有记性了！

制度性的问题必须从解决制度着手！

辽宁完全应该建立一个张志新广场，北京应该有纪念遇罗克的场所，……他们都应该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他们理应比帝王更为显赫。

50年历史不算长，但从共和国50年“不能忘记的人”的名单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自秦

王朝以来的所有独裁专制者们对先秦经典儒学等中华文化文明的肆意篡改、歪曲、压制的痕

迹。除了获奖者的正当性，他们话说一半，更多地是把“模范、标兵、社会荣誉、评奖”等

服务于其愚民、顺民政策，排斥、打击任何反对一党制、核心制、终身制等的中华民族爱国

者、持不同政见者。

凡是利于人民自由民主人权事业的，他们都视做洪水猛兽，蛮横扼杀自由思想者，刻意培养、

重赏顺从者。如果说千百年来的独裁专制统治披过不同的外衣，那对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回

避、压制、歪曲、剿杀，对追求自由民主者的排斥、抛弃、打击则完全是共同的。秦时“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今，“非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全

盘西化、邪教者，惟自然科学”，余下均是与四项不保持一致者，必须遭蹲监狱、流放，禁绝。

他们可以结交、正确评价很多人，就是不敢与一个人权英雄，如魏京生、王丹、李洪志等，

面对面交谈，更甭说拍电影。

也许，50年时间不算长，但时间最能说明问题。岳飞、李贽、李大钊等都是后来平反的，

刘少奇也将平反希望寄托于人民。彭德怀、张志新等已经平反了。但是，所有话说一半、平

反不到位的，所有没有平反的，和所有正在遭受磨难的，一旦民主中国创立，都将得到彻底

平反。

5、绝处能生：共产党一队、二队、三队

其实，1949年前后国共两党即使不容异党，也还是可以各自推行党内民主的。但他们做

不到，独裁专制政党的一大特征是首先独裁专制其组织、其成员。谈国民党已经意义不大了，

它已经于20世纪末在台湾裂变了，我们多谈谈1949年以后的大陆共产党吧。

它的党内民主是不可能通过民主集中制体现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践结果已经证明其只能是最

终归于“集中、集权”，而且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实就是集中、集权，它往往演变为证明“集

中、集权”是正确、合法、符合组织程序的。如果说共产主义理想不容否定，只能有一个，

那实现它的方法至少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殊途同归”，仅此便可以把持不同意见者分为共产

党一队、二队、三队等，并实行和平竞争而胜出者执政，这样的党内民主才是货真价实、利

于党、利于实现共产主义、利于民主中国，至少可以少有悲剧、内讧、你死我活、无情斗争。

可麻烦的是共产党新中国不仅是党外有党禁，而且党内也有党禁。党内不同意见、不同声音

也不允许存在，要灭杀，要根除，持不同意见和心存疑虑等都被贴上“反党、分裂党”的标

签而拿下。

这似乎成了共产党的一个规律：谁与占优势集团地位者持不同意见、不“保持一致”，谁就是

“反革命分子或集团”，谁就是分裂党，谁生命和政治生命就被终结。这些“全党全国13亿

人用一人的一个声音说话”，全国媒体每日千篇一律，不就是“一句顶万句”的荒谬吗？可是，

它们被美其名曰为“全党一致，全国一致，统一意志，空前团结，空前强大”等，殊不知它

几乎每次都是共产党内部大悲剧并殃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源。

历史还将证明，江三讲、江代表倒行逆施，正在制造大悲剧。
而且，党内外没有竞争对手，失去磨砺自己、提高水平、成长壮大的机会，注定将自我倦怠、
萎缩、腐败、衰弱，成为外好内烂的空中楼阁，最终外力难败汝、而汝不得不败于自身。听
说动物园圈养的东北虎已经丧失了大部分战斗力，不能逮猫，也不能抓狗。再封圈无忧地闭
养下去，恐怕就要传出惨遭猫狗戏弄的笑闻了，尽管距离自毙还算遥远。道理太浅显了，党
内缺乏党员充分的自由和民主，党就会逐步丧失理想和战斗竞争力；个人缺乏自由和民主，
以创新为特征的综合国力就要受损，人民与国家都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完善。
管子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一党制、终身制等，一个核
心、一个声音说话、保持一致等，便是惟我独尊、排斥异己，是辞水、辞土石，其必不能如
海大，如山高。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告戒，全
党“对这个问题要清醒。”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
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
的确，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历史必将无情地抛弃人类人权事业的落伍者！可是，民族无
强党，民族何以强大？国无强党，国何以强大？我们忧你，更忧民族与国家。其实，主动创
立一个和平民主环境（毛泽东主席是以四大、派性斗争等文革做了一些创举、尝试的），它必
然续接战争民主的效用，使共产党继续升华至极，更加强大无比，战无不胜。
巍巍大中华，政党可以如织，主义可以繁茂，领袖可以如林。可以设想，暂且不谈 1
9 4 9 年以前国共两党能和平竞赛、不内斗，而和平时期，如果允许、鼓励毛泽东时代的刘
少奇、邓小平时代的赵紫阳、江泽民时代的陈希同，甚至“四人帮”、三种人等，以及党内各
个时期的不同方针、政策、路线等的代表人物，允许他们脱党、退党、分裂党、反对党，并
按民主原则裂变成共产党一队、二队、三队等，或组成新党，让所谓左派、右派、投机派、
托派、共产国际派等各有生存活动的空间，并依据选举原则执政、施政，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独尊一术一派，那中国要避免多少灾难，获得多少发展机会。
多少优秀中国人、正确思想、智慧、人权、发展、繁荣被“斗争、统一”掉。我们难道

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每一次经过肃清、斗争而达到全党高度团结统一的过程，就是中国退步、停滞、遭殃的磨难过程；每一次中共的党内斗争与悲剧，都是以独裁专制“保持一致”的恶

果。我们可以对这些悲剧一一平反、重新评价，可我们能够挽回这些悲剧给国家、人民、民

族及党本身造成的损失吗？什么叫折腾中国，这就是！它们都是“保持一致”而独裁专制统

治的结果。中国还经得起这类折腾吗！

政党政治不是你死我活，政党没有对人民发动揭批、镇压、战争的权力，而是人民主

权（至少也是党员主权）裁定下的执政与在野。党外敌对或“儿对孙对”，党内不民主，广大

党员对党和党的政策、领导人没有发言权、决定权，只有绝对服从权，这就是封建迷信、滋

生个人崇拜的根源。这个自上而下、握有绝对权柄的金字塔组织结构与尊重人民主权的“网

络平等，没有中心而又各为中心”的现代民主政治背道而驰，是产生、制造独裁专制的基础。

好端端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被搞成了“以党谋私”做大小皇帝的工具，充满幸福理想的社会主

义公有制被搞成了“以公谋私”的最佳黑箱操作平台。这岂止是中国人民的悲哀，这是以

人民民主为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党员的共同悲哀！

人民厌恶一人对一党的独裁专制而认为党员无过而且是受害者，人民反对任何一党对国

家的独裁专制而不反对任何党。不是总书记控制党员，而是党员选择总书记；不是党号召人

民，领导人民，人民跟党走，而是人民引导党，推进党，选举执政党；不是党控制公检法、

军队等国家机器，而是国家机器监督党，控制党，使它和它的领袖不能为了个体个人利益而

为所欲为，迫使它因如履薄冰而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每一次集

会、抗议、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等都是人权引导前进；每一次针对人民或者党内的政治

运动等社会惨剧，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其最终目的几乎都是为了维持、巩固独裁专制，

中国政治运动就是巩固独裁专制的残酷。但从现状看起来，改革开放等发展经济也是为了巩

固独裁专制实力。可见，经济发展不一定自然过渡到民主政治，人民人权尚需努力。

核裂变的力量是无穷的，任何事物的消失正是它的永恒。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即表示“共

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共产党一队、二队、三队”不是共产党的瓦解，而是共产党的再生，它以后会因获得中国诸党及多党政治鼻祖的荣誉而永恒。“共产党一队、二队、三队”等党内民主是广大党员的福音，更是中国进一步走向民主的基础，但我们不能假设历史了。因为目前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滑向更加严厉的一人对一党一国的独裁专制。这个时代可以看得见的进步仅是从“杀头到软禁”而已，是恩准把知名度较高持不同政见者放逐国外，是赵紫阳等还活着，是万里还做了委员长，是胡启立、田纪云等还被允许坐上主席台。当然，明里暗里被勒得越来越紧的独裁专制统治缰绳更是随处可见。当然，无论如何，不师从1980年以前那样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得人心的，是进步的，值得肯定。

现在，中国共产党没有以“一队、二队、三队”等核裂变形式获得永生，但它是不是在“保持一致”中永生了呢？没有！在夺取政权、成为统治者以前，共产党确实正大无私，它没有自己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它的全部。它成为人民对立面的变质，是它成为执政党而又不推行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后的不幸嬗变。这种嬗变使它成为一个日益脱离人民的利益集团，并且是与人民、与其它一切政党与社会团体和机构争夺一切社会资源与控制权的重大利益集团。人民的利益已经不是它的全部，它有着自己的利益，而一党专制的独裁专制体制使它随时可以动用任何国家手段，确保它战胜人民和社会其它的一切利益集团的压倒优势。

有总代表，一个总书记，又算什么？

五、三个代表，总代表：强行代表，强行祸国殃民

1、中国盛产总代表

（1）真理不是权威的孩子，自由民主不是独裁专制的学生，人权不是特权的晚辈，人民不

是帝制帝位帝王的臣民。相反，人类之初，人权道一以贯之，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人权等正是等级、独裁、专制、特权等的先辈。这先辈、先进最终战胜其后辈、后进正是人类发展的主线。

富兰克林·罗斯福说得好！他于1941年1月20日发表总统就职演说：“在人类历史上，

渴望民主并不是最近阶段的事情。它本身就是一部人类史。这样的例子在古代各国人民的生

活中俯拾皆是。它在中世纪重新燃起了火炬。它被载入了英国大宪章。”的确，中国独裁专制

统治势力固然不断以家国、党国、核心国等改朝换代炫耀它的强大与顽固，但人类史与中华

民族文明史并不偏袒它。

仰望宇宙，俯瞰地幔。人类进步史归根结底就是解除自然和社会之独裁专制力约束，奔向独

立、个性解放、自我发现与创新，不断完善、发展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权的历史。人类史

展开于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人权与特权等之角逐史。

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它由人民和权力两个词源组合而成，涵义为人民的权力，即由人民

执掌政权、共同治理国家。虽然它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著作，但人类

进化史告诉世界，人权光辉一视同仁，民主并不偏爱西方，民主之于东方从来不是西方泊来

品。四海一家，无论东方或西方，或世界任何人类驻足地，民主都不是罕见之物。原始社会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其原始民主是人类民主历史的发展源头。人之

初，性本恶，

而权力更有原罪。尤其是掌握社会公共权力者，如果失去制横、监督，很难防范、保证他们

不对公众犯罪。原始社会以后，人的天然劣根性进入了放肆时期。

但史学界认为，与西方相比，多种原因促使东方较早滋长了氏族部落首领个人权力，它于国

家形成时顺转为王权，即形成君主制国家，并进一步发展或并入专制国家体系。仅有少数国

家，如古代西亚和印度的城市国家，其原生国家形式是贵族制或共和制，但它们很快被君主

制或专制制国家吞并，并且很少再度出现。

而西方原始社会末期，希腊、罗马由于氏族部落首领个人权力膨胀，也走向了君主制，如亚

里斯多德曾指出“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原生国家形式普遍是君主制。

确实，不同地域的文明历程，必然遵循差异发展原则。当东方的专制国家越来越等级化、官

本位化、暴力、专制时，希腊、罗马却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民主遗风，并进入了军事民主制国家组织结构阶段。同时，它们还有王、长老会议和民众大会等三种权力机构并行存在，而且虽然王的个人权力日渐扩大，但后两种集体性质的权力机构始终存在，并能实质上构成制约王权的态势。

另外国家城邦制的诸多特点也使贵族势力得以不断增强，国家权力不断下移，致使君主制建立一段时期后便由比较民主的贵族制所代。同时，雅典和罗马等由于自由小生产相对稳定存在、发展，平民力量不断强大并坚持斗争，贵族制又分别被民主制与共和制取代，形成古典民主，它们实现了多数人参与政治、共同执掌国家权力、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制，此即是亚里士多德的“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意志，大多数人意志就是正义”。

故此通常来讲，原始民主结束后世界范围内还存活着古典民主，它们胎生于一些古希腊城邦，如雅典、叙拉古、阿各斯、阿布德拉等，并尤其以雅典民主制最发达、完备。雅典于公元前五世纪、四世纪缔造了人类历史第一个民主国家。

尤其是伯利克里执政时期，他进一步打击贵族，使全体公民都享有了政治权利，因而最充分实施了古代奴隶制民主原则。可以说当时民主作为制度，已经扮演了经济、文化等文明发展的重要引擎，并使雅典达到繁荣顶峰，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伯利克里黄金时代”。

依附于城邦国家的民主制和共和制，各自与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权重的军事领袖和军事独裁的个人权力不断周旋、抗衡、生存，顽强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它们才完败于被更强大的专制力量，淹没于专制主义潮流。

就早期的贵族民主而言，它也曾活跃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过时间短些、程度浅些罢了。如中国西周时期，巫士等神学政治势力下降，卿士、三公等王室成员与其分享了军事、行政、司法、外事等权利。卿士是王室的最高政务官员，几乎与巫师平级。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太”职权高于巫师与卿士，仅仅位于周王之下。三太地位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成员与常委，但他们更有权力。有时能驾驭周王，代行王权。如周召共和。可以说，人权与工业革命以前，无论东方文明古国，还是西方希腊罗马，世界原始民主以后，

国家形式都起源于君主制，终于专制制。但两者相比，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是，在东方，各种形式的民主（贵族制或共和制）“很少再度出现”，几乎是东方专制主义一统天下，君主专制制度长期存在、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西方，贵族制，特别是民主制和共和制，长期存在且得到高度发展，更大程度上培育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求知、开拓精神。故而，不带偏见，也不盲目自大地考察历史，从政治文化角度来讲，东方人类文明史主要实践并培育了灿烂的独裁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艺术，西方人类文明（比东方）更突出地实践，并培育了灿烂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艺术，并由在新大陆立足的美国在 200 多年前将自由民主与人权等发扬光大。

（2）古希腊时代的城市孵化了现代民主，历史学家誉希腊文明为“国家政体形式的百花园”是非常贴切的。那个时期，希腊人创设、实践了诸多种类的民主政治制度，如：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没有任命制，容不得终身制、世袭制，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共职位轮流坐庄，而且大多一年一选，任期一届，连任极少，可谓“皇帝轮流坐，人人皆可为尧舜”。这些“主权在民”孕育的民主精神影响至今。即使中世纪，西方也不如通常蔑称的“我们有四大发明，西方仍然一片漆黑，处于蒙昧状态”，它们有着很好的城市。其城市是一个特权团体，有自治权、城市法，居民也有自己的特殊组织，如行会等。这些均培养出富有独立精神的市民，他们在个人企业与个人竞争推动下进一步进化发展，成为早期资产阶级分子。而且较之农村，城市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使人权与自由经济同时得到发展，如集市就发源于意大利。这些对人类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和人权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构建了稳固框架。新经济史学派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从一系列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演进中寻找地球人类的现代化起源，发现西欧中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自治城市才是一系列制度演进的母体，并同时认定这些自治城市以及与它们相伴随的法治，乃是中世纪留给近代欧

洲最重要遗产。

此两者都产生于十一世纪由教皇革命所导致的独特多元政治结构，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结

构也正是在此时、此地酝酿、脱胎、形成的。政治多元结构打破了独裁专制一元结构的一线

天、一面结构，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立体结构，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

社会生活提供了工具、渠道和可能性，并拓展了空间，使人类人权事业得到发展。反之，也

许正是人权发展的历史动力促进了这些社会文明事业的发展。

如13世纪，英国大小城市几乎都摆脱了“上交利润，人事调配”等封建独裁专制勒索和控

制，多少取得了一些自治权，这使城市逐渐成为市民和商业公会等个人和经济组织的城市，

而不是“王的城市”，不是党政官本位掌管一切的城市。据英共作家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

介绍，到14世纪末，伦敦已经进步到市长只可从12个大行会里选举产生，后来又进步了

全民选举。

较之同时期中国封建时代，城市没有自治权，它只是皇帝等官僚实施政治、军事、经济与文

化等统治的机关重地及其娱乐生活消费场所，它是财富的集中地和消费地，生产功能较少，

近代以前尤其如此。而且，市长至今还停留于“组织考察，上级任命”阶段。皇帝、贵族、

官僚等士大夫是特权阶层，是主要利益集团，他们位于城市金字塔顶端。金字塔下层是农、

工、商等人士，他们没有社会地位。

如公元1800年前后，世界上只有1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其中5个在中国，它们栖居着

中国总人口的5—6%。他们是因血缘、战功、治国等有功于建立王朝、巩固王朝、稳定王

朝的贵族、官吏，是社会主流，余者也是因为“有资格”服务于独裁专制官本位而存活于城

市，工商业等只能匍匐于政权及其脚下，求得保护、发展。

中国统治者极力防范、压制可能动摇他们统治地位的人性发展，如人的个性、个人主义、独

立自主精神和商业、手工业、科技文化等的发展，将原本可以发展成为独立阶层或利益集团

的商人、手工业者、文人等纳入其“政协、统一战线”等虚虚实实的外围统治体系，不能成

为独立、有实力的社会利益集团或势力。这些致使中国社会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

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工等，永远是一成不变的农业官僚社会，人民与统治当局的巨

大鸿沟等使独裁专制制度恒久延续。难怪五十年代刘少奇访苏时向斯大林提出的报告对城市

做了这样评价：“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

确实，中国城市的政治统治功能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文化等功能，它们对制造业、贸易、文化、

教育等自由发展的监视、压制、所谓管理等远远大于对它们促进、推动，即统治特权远远大

于人民人权。它们不是市民的城市，更不是农民的城市，它是党政官本位统治体系的城市。

它以满足党政官本位办公（统治、管理）、生活为主要目的而存在，它意味着特权。

直到今天，中国城市除了工商金融等经济文化功能增强了以外，它的政治人权等并无太多同

步进步。全国的繁荣与福利集中于城市，城市又主要集中于统治系统，而非全体市民。农民

朋友别独自不平，跟全体人民一起不平吧，城市平民比你们日子也好不了一点，无非是对官

本位“洋气”生活环境等多看了几眼而已，这是城市老鼠和乡下老鼠的差别。

迄今，中国最大的社会差别是城乡差别，其实质便是人权差别，它也是最大的社会矛盾。但

它通常不是市民、手工业者、商人、工人、士人等城市人民与农村人民间的矛盾，而是农村

人民人权与独裁专制统治官僚主义阶级特权之间的人权矛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农业人口巨多、占比大，加上工商信贷、第

三产业等一直受到压制、不发达，官本位以外的城市人实际上不过长期生活于“都市里的村

庄”，“农村人民”几乎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故而中国社会最大矛盾实质是中国人民与

中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最大人权差别实质就是人民人权与统治者特权之间的差别。

况且人民不应以物质财产多寡而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人民不要因此自己斗自己。人

民最大的资产不是物质，而是人权。相对于独裁专制统治者拥有特权资产而言，所有人民都

是无人权资产的无产阶级。农民或人民起义也不是如过去所定性的“穷人对富人”革命，即

“对农村地主阶级、城市资产阶级、红色资产阶级”革命，而总体就是人民人权对独裁专制

当局统治特权的革命。

从项羽火烧阿房宫开始，农民进城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烧毁城市，毁灭财富。其实他们对财

富没仇，是财富对他们有仇。他们也不对市民有仇，而是对官本位统治特权有仇。是独裁专

制统治当局剥夺他们而天然不公的仇。

当今中国城市，人们常常看到公用电话、建筑设施等遭损坏，调查结果表明多为民工所为。

为什么？因为他们既爱城市，又恨城市，他们建设城市，在城市发财，但城市从各个方面限

制他们，这证那证，这费那费，少了一证或一费都会被罚款、收容、乃至蹲监狱，赶回老家。

他们高喊“城市是中国人的城市，不只是城里人的城市”，但没人理睬，他们便采取暴力、破

坏，发泄不满，而且向恶性发展。

不光城乡存在这些对立，行业、地区、阶层间也不同程度存在这些“不光彩”的“国事”，如

很多人对一些所谓富户被盗叫好。

不理解者认为中国人素质低，不讲文明，破坏性、攻击性强，其实质是人们对独裁专制社会

不公的发泄。看看当今中国，火灾、爆炸、翻车、车祸、盗窃、凶杀、沉船等各类案件呈上

升趋势，它们与独裁专制官本位的统治腐败、统治恐怖、统治贫穷、统治道德等指数曲线几

乎呈同一走势。这是否是“穷才革命，越穷越革命”和“保持艰苦朴素，勿忘继续革命”的

来源？

可见独裁专制统治不仅是“穷”的制造者，不仅是官本位自己富裕的制造者，也是毁灭与破

坏的制造者，也是针对其的暴力与革命的制造者，是其自身遭改朝换代的原动力制造者。

回首历史，迄今为止，中国各种形式的独裁专制政权的王朝循环更迭，包括辛亥革命和毛泽

东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没有一次不是以农民力量为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民

的最大代表，可他们之人权历来最少、最小，最被剥夺。“剪刀差”可以剥夺他们的物质财富，

“乡镇企业挖社会主义墙角”之指责可以令他们岌岌可危，进城农民时刻防止查“三证、四

证”，时刻有被遣送回乡的可能性。就是民工与其他人一起见义勇为而罹难，当他人追认为“英

勇牺牲的烈士”时，民工则是“遇难”。即便回家过年，也会挨运输部门“票价上浮”宰刀。

一次，一名小学生非常诧异，指着报纸上“农民受惠‘三放活’”问：“农民怎么也能受贿呢？”

他没分清“惠与贿”。是啊，中国农民有什么权力，引导人们贿赂他们？中国是一个童稚也知

“农民不行”的国家。农民最无权力，最没地位，除非“关牛棚”、走投无路，谁会贿赂他们，求他们办事？

一纸户口、蓝印户口，便是告诉农民和他的子女们：你们是中国脊梁，民富国强有你们的贡献。但是，中国的城市不属于你们，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精华，不属于你们。较之城市市民，你们更少有权力分享社会繁荣与进步。想进城，规矩多着呢，门槛高着呢。

中国“民工”与农民的不值钱，完全折射出了普通中国公民缺乏人权保护的悲哀。什么时候他们有人权了，中国人权事业便真正进步了。

城市、集镇等集中了官本位统治特权，它们远远高于普通人民人权。巨大利益鸿沟形成的人权矛盾使农民既羡慕、爱城市，又妒忌、仇恨城市。人权矛盾平和时，天下太平；它激化时，农民揭杆而起，袭击城市，占领城市。成气候的，统治城市，不到火候或者没有志向的，就烧毁城市，泄愤或者以此削弱对手。

虽然“平和”与“激化”呈周期性变化，但统计表明，每次中国农民起义之目标必是攻打城市，杀贪官、烧豪宅，而不幸的是，流血双方其实多半仍是农民、普通市民，都是基层人民。

回顾公元1949年前也好，放眼那以后也好，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农民革命时期“城市和市人”陪着被折腾的影子，如火烧阿房宫，干部下放劳动，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山下乡，民工故意损坏公用电话等城市公用设施，等等。

现在，秉承最高指示“稳定”，中国一些城市找出各种理由，限制农民进城就业、旅游、访亲探友，搞一些“清理、收容、揩油”把戏，甚至扼杀民工正当工作的权力，尽皆赶回原籍。

这与当年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是同工异曲吗？农民以自然经济死守农村，市民以公有制、集体制死守单位，军人以“党指挥枪”死守军营，各级干部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死守官本位，一切死守帝制帝位，帝王帝党统治政权稳定无忧矣。

当少数人为此得意时，须不知这些践踏人权的恶招劣迹埋下了多少迷惘、仇恨、复仇种子。

或者零散，或者集中，但它们肯定不知何时何事何地何等规模便会突发、爆发出来。

须不知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城市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城市，是城市人的城市，也是农民

与民工的城市。把城市垄断为只是城市人的城市，不把城市当作农民的，排斥农民进城，或者欺压民工，就是不尊重人民人权，就是排斥中国人民做国家主人的独裁专制统治理念的反映。不知怎的，我由此想起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排外主义事件，想起了种族歧视、纳粹等。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急剧加速，从职业与人群角度来讲，也许，最无人权保障的是农民与民工。

中国农民人权革命也往往败于城市，成功如李自成仅雄居北京城、统治几十天，洪秀全也在南京城里统治了12年。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起家，深知城市重要性。他进城前小心翼翼，称他和同事们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进京赶考”，非常担心成为“李自成第二”，白白丢了天下。

为什么？因为很多进城的人民人权英雄及其建立的政权往往没有建立尊重人权的民主制度，革命成果不过是身份错位、帝位换人、官本位体系换人，以新人新帝王新核心延续了旧帝制帝位之统治特权而已，并就此走向丧失人心、政权衰亡的历程，所谓成功之时正是其走向失败之日。

人民起义、民主革命的成果是抹平、平等人民人权与官僚主义阶级统治特权之差异，不是仅以特权易主而维持人权鸿沟原状告终。

但什么可以管住官僚主义阶级特权危害人权，实现全国人权平等，是人民群众运动、暴力、夺权，文革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还是主权在民的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等？

毛泽东以前的中国农民革命果是城市换主人，是改朝换代、换了皇帝与朝臣，虽然人民可以因此更有理由期望“好皇帝和清官”出现，但缺乏制衡、监督而滋生的权力原罪必然使人民人权落空，新的统治者必令人民感受“天下乌鸦一般黑”，它只是一个新的稳定—动乱—改朝换代周期的开始。

但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蓝图、动力，毛泽东和共产党显然比前辈农民领袖更英明伟大，他们一心铲平人权鸿沟。尤其是毛泽东主席，他革命、革命、再革命，“革那些革过命而不想再革自己命的人的命”，他瞄准党内官僚主义阶级，号召人民永保革命本色，力图使“文

革能够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不可能实现他的人权理想，但老人家的人权理念永远值得人民歌颂。

他是一个失败的人权英雄！他痛恨剥夺人民人权的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但没有认识到通过文

革等“运动掉、夺掉官僚主义阶级特权”的人会蜕变为新的官僚主义特权阶级，人民民主革

命会因此不断产生新的革命对象：统治者。

如推翻满清后的中华民国之一人一党独裁专制者正是新的满清，推翻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

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共产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者正是新的国民党。

如从政治制度上讲，结束文革的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核心时代有什么不同，第三代核心江泽

民时代更没什么不同。

又如无产阶级国家，第一代核心与领导集体多半都是无产阶级，那江泽民等算什么阶级，他

等只能是统治阶级。

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不如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那样能随时随地随事制

横监督权力。他失败的唯一原因只是他没有找到或者没有相信人民主权下的三权分离等民主

秘方。

应该说，民主革命不是针对某些个人和阶层，而是针对独裁专制制度。毛泽东四大、邓小平

四项、六四镇压、江泽民三讲等表明，不改变一人一家一族一党对全民全国独裁专制统治制

度，不建立人民主权立法的民主制度，起始于农民革命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永远也不可能真

正成功！反过去说，不还权于民，不建立民主制度，有什么能保障不出现“李自成第二”，不

出现毛泽东第二？有什么能保障总代表永远做总代表，而不消逝于王朝循环？显然，主权在

民，以政府换届取代王朝循环，方乃中国大幸。

“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民主革命，不是农民包围市民、工人、工商业者和一切文化人，不

是农林牧业包围工业、商业、网络业等领域，不是要毁掉城市，也不是衙门换人，宫廷易主，

更不是维持原来的城乡人权差别，而是要包围，并解械、改造衙门、朝廷、王朝、政权、政

府、紫禁城、中南海等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特权制度及其机构，包围“主权在王，在党，在

核心，在个人”，并清除产生他们的帝制帝位，建设一个主权在民、人人人权平等的自由民主

社会。

可以说，什么时候城市的统治属性逐渐下降，直到消失了，不是人民对立物，城乡没有不受人民监督而可以随意行使社会公共权力的党政机关和官员，中国不是官本位无所不能、无所不管，官本位不是中国社会运作前进的核心和引擎，中国才能真正走出独裁专制统治误区。

（3）如今，走进北京，走进中国各城市，走进中国各集镇，我们仍然能看到中南海、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镇党委镇政府等高墙大楼。不是这些建筑有毛病，而是非主权在民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它们有很大的毛病。人民既畏惧它们，又憎恨它们，也不得不依附它们、顶礼膜拜它们。当然，逼急了人民，人民便会从找它们上访、静坐、请愿等转成向它们起义。不要忘记1989年5月10日，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学院、太原工业大学等3000多青年游行时打出了“省委大楼天下第一，人民生活倒数第二”和“打倒官倒，打倒腐败”等横幅。的确，很多国人对官府衙门衙门的感觉与六十年前一位中国历史学者的感觉是一致的。他写到：“1939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乡，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四周则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户环之而居。我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之中，使我恍惚联想到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毫无疑问，封建城堡里最大的内涵就是统治者特权绝对高于人民人权。大家说说，那城堡制、井田制、单位制，那碉堡、平屋，那封建领主、庄主、一把手、佃户、下属、基层干部等，那“管人的有无限权力，而被管的没有丝毫权力”，那指派委任干部而非民选官员，那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那国家机器的官性十足而民性极少，那皇帝、那意识形态，“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存在于你、我、他的生活工作之中？今天的中南海与过去的紫禁城，今天的省委地委县委等与过去的王府、总督府等有什么不同？而且通过各种各样的长城，他们至今还把全中国人民困厄于一个种党种姓种人至上的等级森严的独裁专制统治城堡，并宣扬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天，儿子问：“爸爸，五四运动是怎么回事？”

“是青年学生与全国人民反对军阀独裁专制统治，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我答到。

“谁胜了？”儿子又问。

“至今未分胜负。”

“现在的军阀是谁？”儿子有点气愤，急急逼问。

“恩（加口旁）……，没有军阀了，是……”。我转移到了别的话题。他毕竟还小，我省略了

“是党阀，核心，总代表。他们“党指挥枪”，诓骗了人民军队。”

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已经走过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国民党旧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及其初级

阶段革命。但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什么迄今仍然处于独裁专制统治状态，如市民没有

城市权，更没有农村权，农民没有农村权，更没有市民权，总起来便是国民无国权、无人权？

那么，这些权利统统跑到哪里去了呢？

它们——人民的权利，都被代表了，强行代表了。

它们都跑到衙门、官府、党政机关里去了，被以皇权为首的党政官本位统治特权体系一扫而

光、独吞了。他们一直独尊于中国社会，他们反对任何权力分离、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

自由化、独立化、对等化等，反对一切对其的制横、监督，他们以保持一致而阻遏、扼杀一

切其他权力，他们强行做一切的三个代表、总代表、总师爷。他们以种种篱笆、长城等压制

人民自由民主与人权，较之公园门口的，可能还是虚幻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些“奴

隶与狗不得入内”更可恶、可恨，而且危害时间长，范围大，程度深。

5000年来，总代表的借口与理论基础多种多样。夏代有“夏服天命”。殷商贵族有“至人

神”护身符，上帝是至上神，也是商族祖宗神；大众要服从上帝，又要服从商族统治，尤其

要服从商族政治权力总代表——商王的统治（管理）。周朝统治者以“天”代替“上帝”，周

王是“天子”。以后迄今，不经投票选举的帝王、核心，都堪称“天子”。可见，“君权神授”，

帝制帝位及其帝王，最早起源于神学、宗教。

现在，中国当局作为新的总代表，常常把官性马克思主义学说称为老祖宗。可是，中华民族

哪来的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呢？民主大潮下，帝驴计穷，支撑帝制帝位帝王合理性的本土产品

不灵了。总代表们笃信外来和尚会念经，他们批上共产主义等洋衣，骨子还是中国统治者的

“君权神授”一类的宗教玩意儿。

我们决不否认其走向帝制帝位前的人权革命正义性。而且，以中外结合的宗教外衣搞人权革

命，最后走向了革命的反面，这并不是首创。至少，19世纪的“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就

是先行者。

有了家国、党国，帝国、核心国，君权神授、总代表等的一脉相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没有送来马克思主义，更没有给中国送来什么跨时代的超越性新理念。它在世界范围内，至

少是在中国大陆，抵制了人人平等的人权文明，复活、苟延残喘了帝制帝位至尊的特权文明。

但原它是人类帝制帝位帝王们的最后一剂强心针。

2、总代表：强行代表了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

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1989年6月4日6时许，站在广场东南角驰目西望，越过装甲车阵等钢铁长城，越过毛

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越过广场，我依稀看到了人民大会堂。

它算什么？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权里，执政党党外不与其他党派平等和平共处，党内不存异

己，不要一队、二队、三队，不要权力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有一个“三个代表，总

代表”统治一切，它真正代表了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它不是表态、首肯、拥护、坚决

拥护、走过场和表忠心、受教育的堂会？

不，缺乏主权在民的有效制横、监督，官僚主义阶级只能是统治者。他们连同其政权，决不

能代表人民，最终只能代表自己。而且，为了固守总代表权，他们必然以终身制、一党制困

厄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力，反对任何他人、任何其他团体有个性、有主见、有自己，反对任何

权力分离、对等、独立，更甭谈什么异见、反对意见、反对党、反对派。他们走向镇压人民，

践踏人权，反人民，反民族，反国家，反社会。

秦制以来，比较而言，中国盛产总代表，而且时间跨度长，范围全面。无论家国、党国、核

心国，以皇帝为首的官本位中国统治者，常常以“真龙天子，三个代表，总代表”自居。集

权、极权体制下，他们位于金字塔顶端。

他们以统治特权，代表国家、人民，代表一切人权。而且是唯一的代表，其他人、组织、机构、团体等，包括被代表者，不得出其左右，与其分享，形成鼎立、抗衡局面，否则必被“保持一致”掉。

（1）“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神权、宗教权等一直具有有形、无形的统治效力。它常常可以独立于国家机器，并“治愈”、安抚受伤于现实政治、国家机器的大众。东汉黄巾军“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元末的明教，横亘元明清三代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拜上帝教”，乃至20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理想、法轮功等，能够起事、成事，都是因为它们在王朝轮回的末期（即“末法时期”）顺应了历史，能够高擎火炬，“出而救世”，使大众在绝望中看到新生活希望。

但是，不建立民主制度，受权力原罪腐蚀，“救世者”常常沦为治世者，新的统治者。所以，虽然中国社会一直存在泛神论，神仙多、神系统庞大复杂，却从不曾存在神本位。它几乎不曾与皇权对等、独立，分享权力。依此而论，中国实乃世界上真正的“无神论”国度。为什么？与皇权相比，神权在中国一直不享有超然、独立地位，更谈不上超越，其最大统治效力是协助、匍匐于皇权。即使是帮助帝王们夺得天下的各“教”，最终也功成身退，屈服于新的皇权。如明教、拜上帝教最后都屈从了朱姓家国和洪姓家天下。官方儒学被称为儒教，其实不是“教”，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独“宗教”，它只是独裁专制官本位统治的“一条听使唤的腿”。当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学说，最大功效是巩固帝制帝位，稳定帝王核心权势。

中国基督教协会1950年9月提出“自治、自养、自传”等“三自”原则，名义上是“抵制敌对势力利用基督教‘西化’、‘分化’中国”，实际上是确保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工具，

“别听他们的，自己干吧，光听我的”。如中国各地虽然挂了一些“某某省某某教爱国委员会”

大招牌，好象中国人民是信教自由的，但实际上“爱皇帝，爱帝制，爱党，爱家

国，爱党，爱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及其政权”远远重要于“爱国、爱民族、爱教”。否则，你就是非法

组织、邪教，不予登记、注册，不允许存在，遭受揭批、镇压。

又如1949年以后的“西藏民主改革”，即使没有建立三权分离等议会制民主政治制度，但

如果不以推行一党独裁专制制度排斥、打压藏传佛教，西藏的繁荣进步可能比现在要大得多。

西藏的事实昭示天下，民主改革不是挤下他人，自己取而代之，不是指责他人政教合一，自

己却大搞意识形态“政教合一”。

可见，虽然中国人也是信神的，但神却被皇帝天子掠走、利用了，他们使自己“天神合一，

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混然是一家子的。他们“挟神令人民”。在官本位主导下，中国历史

上一直反对宗教，不令其享有独立地位，不许宗教领袖“蛊惑人心，争夺群众”。很多宗教是

因为隐忍，或者温顺、利于独裁专制政权，甚至配合了，才获准传道、存在。佛教、伊斯兰

教等均无地位，他们处于边缘地带，地理位置是深山老林，社会位置是软禁或者帮衬。所谓

儒教也如同当今马克思主义一样，只是被篡改符合“勤王”需要后才被大为吹捧的意识形态。

六四镇压以后，中国兴起了气功热，原因在于“官方默许”。当局错误以为人民练“气功”是

不参与政治的逃避现实，利于稳定。但它为什么对法轮功下狠手？因为它“出格越轨”，“不

老实”，不利于“稳定”，不仅不顺从、帮助、维护一党独裁专制及其官本位，反而“造反”，

围攻它，反对它，动摇它”。让人民开心的事情，他们当然要反对。

法轮功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名词，它应该是一个动作：中国人民渴望对一切独裁专制统治“法

轮功”！对一切帝制帝位帝王“发功”！

对中国人权事业来讲，它曾经多么需要一个或数个宗教有头有脸有地位，与党政官本位帝制

帝位抗衡，为人民在皇权独裁专制统治黑箱里挣开一带自由呼吸、自由选择的裂缝，为人民

在党政官本位统治铁幕里锻造一个可以“说不的神坛”。难怪绝望的中国人民唱戏说：“天哪

天，你枉为天；地哪地，你枉为地。你是非不分，你与人间的坏官一起欺辱我”。其实，天神

地神等不是是非不分，而是他们只能听从官本位独裁专制。

当今中国各寺庙香火越烧越旺，为什么？从《少林寺》到“笑傲江湖”，中国影视与武侠

小说等的创作中，但凡宗教界、民间与官府朝廷发生争斗，编剧导演作者与观者读者等都一

门心思地表明正义在前者，后者总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令人痛快、叫好。尽管现实生活截然

相反，人民总是倒霉，但这般创作表现倾向总是很卖座，有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民数

千年来有一个祖辈相传的潜意识，希望有一个或几个力量能够对抗皇权官本位独裁专制统治，

为人民争自由民主，主持正义。

用今天的话讲，社会民意普遍希望有一个或几个反对党、在野党和宗教团体存在，分化、瓦解、削弱一党独裁专制统治，改变其给社会带来的不健康东西，普遍希望能有民营、外资企

业打破一些党有企业垄断领域，引入竞争机制。

王朔、崔健、张艺谋等作品大行其道，“另类、丑星”们因具反叛精神而倍受追捧，一些所谓

正面宣传却揭露腐败等的作品也十分受欢迎，人民盼清官、青天，甚至盼鬼神等等，也是这

个意思。我们常常感到，宗教、休闲、娱乐等不是人民在躲避、退缩、无为，寻求单纯的寄托、遁世，而是积蓄力量，准备战斗。

你能相信干部下海、“十佳律师”进山做和尚，是放弃了对正义的追求？

（2）神仙、宗教没地位，作为天下另一半的中国妇女更没地位、没女权。中国官本位

拆细了说，是男权皇权官本位要求“三纲五常”，迫使妇女“三从四德”，其实质便是皇权父

权夫权男权一元化之官本位。

人言吕后吕氏篡权，却忽略了吕氏家族有很多开国功臣，论功行赏，刘家江山有其一份。按

当今民主观念解释，所谓吕氏篡权、挤兑刘家的举动，实际是对自身民主权利的争取，但这

为男权官本位帝制帝位观念不容。他们最后遭刘家皇权“两手抓”，被“清君侧”，还落个千

古骂名，不守妇道。刘家江山是相传了，可“妈妈们”不仅没有“母以子贵”，反而鲜有好结

果，以后历朝也是如此。莫非中国皇帝皇子皇孙们真是“天子”，不是他妈妈苦苦怀胎哺育的？

都说中国有“重孝”传统，可这不孝顺母亲母权、不尊重女权的社会，怎能算“重孝”？那

些“重礼、忠诚、仁爱”又从何谈起？

男权独裁专制官本位之下，父子关系重于夫妻关系、父母关系、父女母女关系，同伺父母，

孝顺程度也是有级别的。“重孝、重礼、忠诚”等实际上是只重父权、男权、君王权、皇权等。

汉武帝立太子刘弗陵后，赐死钩戈夫人：“快走，你不能活了！”他问社会反应如何，左右传

话答：“外人说，既立其子，何去其母？”他讲了心理话：“这不是尔等愚蠢之辈所能懂得的。

往古国家之所以乱，往往由于皇帝年幼，母后健壮。女主一旦专权，淫乱恣肆，很难禁止。

你们没有听见吕后的事吗？故朕不得不去掉她！”

而更有甚者，北魏时期为了防止母权干政，保障父死子继制度，统治者专门推出了“子贵母

死”天条：皇帝确立储君时，立即将其母亲先行处死。这完全把“子贵”变成了“母难”。中

国官本位独裁专制之烈，男权官本位独裁专制之烈，由此可略见一斑。

难怪有些家庭、家族、村子、皇宫里，女人不生儿子站不住脚跟，生了儿子也难以善终。皇

帝等男权内部官本位斗争总是殃及每个男人的母体、母性、母权和女权，母亲不过是“君侧”，

难逃“两手抓，清君侧”厄运。难怪中国人那么争着生儿子，难怪生儿子的“牛气”，家里没

个“带把”的，眼睁睁“见人低三分”。不是正根儿，立不起来、没地位嘛。难怪有的中国女

性瞧不起自己，难怪有的大胆挑战男权，难怪有的感叹“做女人难”。

岂只做女人难，做“女人的亲戚都难”，都被贬称为“外戚”，是“外人”，都是“两手抓”对

象。其实，这也不只是中国女人、女权的辛酸，每个古往今来的中国男人都是从娘肚子里出

来的，都是“外戚”一员，都是女人那边的人，即便那些做皇帝的也有妈妈，根本不是什么

天上掉下来的“天子”。

暂不谈政治手段、作为与态度，中国历史出现了武则天、文明太后、慈禧等，真是中国

女人、外戚等的幸运。她们统治时间虽短，最后都被收拾了，可怎么着还是出过头，也自豪

过。她们阐释了女权力量：中国并不历来是男权统治的铁板一块。虽然这些女人与男权一样

推行了独裁专制统治，但刘晓庆塑造的武则天、金庸小说里的众多女性和赵薇小燕子等形象

应当是益于中国女权发展的。尤其是刘晓庆，一方面感叹“做女人难”，一方面大演《武则天》，

其精神难能可贵。

如果中国男权不那么“独”，不总是把“皇后权，女权，外戚权”等“两手抓”抓掉、“阶级

斗争”掉，多尊重一些女权，如果女性之社会地位一直不那么低，女权强一些，女性早觉悟、

少守一些所谓妇道，少一些贞节牌坊，如果卫道士不那么冲女性来劲，如果多出一批吕后、武则天，多出几个女王等，中国社会的整体民主层次可能比现在要可观多了。应该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女性最扬眉吐气的日子，那年代谁敢不尊重妇女，哪个官员胆敢包二奶，或者利用职权性骚扰？“半边天”精神享用至今，不仅使女性大受其益，中国也因此“芙蓉国里多朝晖”。她们在很多行业里取得佳绩，并为国增光，甚至因“阴盛阳衰”而使中国老爷们倍感尴尬。

也许，不谈一些女性的个人政绩、政治观点和好恶及其公众评价，女权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权益或势力，它是全社会天生的自由民主基因之一。它若有地位，则必然可以正常行使其世界自由民主孵化器功能。世界历史上，尤其是欧洲，女儿继承王位，王后、母后主政等并不稀罕，没有引起朝野震怒，天下不安，现在则更是女王、女相、女总理一大排。甚至希腊神话里，也是男神、女神并列。中国则连神界也没有多少女性的地位。现在还有人考证说观世音菩萨也是女扮男装。

欧美能一开近代世界自由民主与人权文明之先河，并领跑至今，与其女权有地位是密不可分。而古代中国，出个武则天，只敢自立无字碑；慈禧垂帘听政，几乎被人骂死了；江青的一大罪名也是“企图做女皇”。台湾民选的女副总统吕秀莲，也弄得一批人不痛快。看看还有哪个女人敢在中国政坛露面。所有这些，表面是男尊女卑之男权至尊作怪，本质上则是男权皇权官本位至尊作怪。

也许，如果社会舆论允许，如果不是武则天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如果慈禧管他后世如何评说，不守什么妇德，不搞垂帘听政，反而如武则天那般大大方方，大刀阔斧，亲自理政，亲自推动戊戌变法而不是反对它，近代中国可能还要发展得快一些。

某种意义上说，垂帘听政不是个坏词，是个辛酸词，它射出了中国女性与女权的悲哀，也道出了女权等中国各路民主与人权势力始终受到男权官本位压抑的屈辱。同时，对打破男权独裁专制而言，它又是一个勇敢、坚强的词：敢于对男权男性垂帘听政。但是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如果进取一点，去帘主政，岂不更好！世界历史上，好象还没有特别窝囊的女皇帝！

再看看当今中国政坛，七名政治局常委七个老爷儿们，没有一位女性，即使历史上所有的百余名政治局常委都加起来，也没有几位女性。就是自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以来，无论国民党民主革命，还是共产党民主革命，女性也多半只是政坛小配角。六七十年代，女性叱咤风云的历史好象都销声匿迹、很难再现了。这从侧面体现了男权官本位之中国特色，当权者喜欢包二奶、歌星、小蜜，却不喜欢会议桌边坐位女性官员、政治家。不重视女权的社会是不民主的，而“重孝、忠诚”等也主要是为皇权夫权父权男权党权等独裁专制统治服务。说句浪漫话，如果当年刘、吕夫妻俩“有话好好说”，尊重夫权男权，也尊重妻权女权，互相尊重，不搞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两家族讲和平，顺势分裂为皇党与皇后党，或者“共和党、民主党”，推行两家轮流坐庄的政治与政权模式，并不断完善，虽比三权分离民主政治差许多，那中国政坛现在也决不会是如今这幅德行。而且，在过渡到现代民主制度以前，刘吕两家的江山几乎肯定不会改姓变色。

（3）当年吕后等的女权，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贵族权的一部分。贵族权本是皇权一部分，西周时期，它一度可以制掣皇权，形成共和，如周召共和。但秦制以后，它必须彻底屈从中国皇权。而且要足够小，小到不足以对总代表、皇权构成威胁。秦始皇以“郡县制”、中央集权委派官吏制（概不世袭）等，废除同姓与异姓贵族参政议政权，并受到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追捧（本文决不否认近代人权文明兴起以前，秦制对中华民族与文明的独特贡献）。从此，“朕即天下，天下皆奴”，一家之统治权又集中为一人独揽（公元前2200年左右，禹传位与儿子启，淹没了禅让制。这结束了原始军事民主时期，父传子、兄传弟，改“公天下”为私天下性质的一家一姓之家天下），皇权以下无人享有人权不受侵犯的权力。皇帝对一切臣民，哪怕是丞相、元帅，自己的同胞手足、长辈宗亲等，都享有任意生杀予夺的权力。汉代初期，诸侯势力回潮，甚至发生了“七王之乱”。汉武帝以“推恩法”等再次削弱、分解了诸侯国势力。他曾借口诸侯所献酎金不足，夺爵106人。其后至今，大一统与地方割据局面交替出现，各领风骚几百年，但决无诸侯国一说。是兵强马壮者拥强自重，形成了割据与分裂。当今两岸关系即是如此。

没有类似1215年英国《大宪章》那样的约定，中国历朝历代王公贵族其实也是挺没劲的，他们只能在吃喝玩乐、物质生活等小儿科方面享有特权，议政、参政、督政等政治特权却也不比普通百姓多到哪里去。

而且，老的都下去，颁发新军衔，起用新人，是历代统治者维持独裁专制地位的必然招法。他们有打击老干部的传统，古有李斯、韩信等受害者，1949年以后则近在眼前，江泽民上台后排挤、打击的老干部还少吗？

如果中国历朝历代的贵族可以与皇帝平等讨论政事，

如果建国以来共产党元老、老干部、二线老领导，都不惧于一言堂而能享有平等发言权，不是发言、发表不同见解就是不利于稳定，

如果现在对大部分高干子弟与烈士后代（即所谓太子党）的打击不是为了保守少部分高干子弟和烈士后代的独裁专制权益，

如果明知“世袭贵族，党贵”有碍公正、平等、自由竞争等人权原则，但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剥夺后代自由奋斗的权力也不对，

如果中国各朝真的发展出了贵族民主、元老民主，

如果现代中国发展出了政治局常委民主、政治局委员民主、中央委员民主、高干民主等，

如果中国真的发展出了行会民主、富商民主、名人民主，

如果人大政协真的民主了，人大图章能盖过党章，政治协商能受理政治局决议，

那中国民主也不至于象今天这般惨兮兮，匍匐于一个核心、一个权威之下，受制于“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

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因为贵族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而痛恨它、排斥它。民主有一个从独裁专制统治当局内核向外扩张的过程，即从少数人扩张、过渡、普及到全体公民。今天，它

虽然不必是必需过程，但是否经历了它，不同国家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状况因此是大有差别的。

英国《大宪章》促进了英国贵族民主和议会政治，并最终促使世界历史把最早的世界民主革

命、工业革命和日不落帝国称号赐予了它。这表面是简单的一纸《大宪章》所为，实质乃自

由民主等人权是第一生产力所为！

贵族民主也可以理解为元老民主、高层民主和精英民主。可以想象，如果满清王爷可以参与王朝治理，

如果本世纪以来的中国各政党各阶段高层历史人物不被“保持一致”掉，不被“空前团结、空前统一”掉，不被“阶级斗争”斗掉，不被“两手抓”抓掉，

如果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各省军部等高干能够充分行使民主权，真正参与国家内外大事的讨论、设计、制定和执行，而不是“核心言行”的被动接受者、执行

者，不是“理解的要执行，部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愚人愚官政治，

如果高干子弟可以通过公平正常的途径进入政界军界财界，而不是以“干部子女不准这，

不准那”损害其人权，或者以“随便什么都可以”损害他人人权，

那么中国民主进步大矣。不仅中国政党史不因为清洗而充满血腥，而且中国肯定已经过

渡成为全民民主国家了。

尤其是对“干部子弟，家属，身边工作的人”等的排挤，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掌权的干部子弟

以“两手抓，阶级斗争”伎俩，对其他干部子弟的排挤，是皇帝等对其他皇亲国戚的排挤，

是对吕后、六王等的排挤。你江泽民、李鹏等难道不是干部后代吗？你们做得，别人就做不

得？

这等避免亡党王国而反腐败是假，避免亡帝制亡帝位而反腐败才是真，避免他人对其独裁专

制权威的威胁才是真。虽然反腐败很重要，但无论如何，反腐败不是规定什么“干部子弟，

家属，配偶，身边工作的人”等，或者“政府职能部门、军队、海关、法院、检察院、公安

局、新闻单位”等机关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等，不得经商、炒股票、担任外企领导职务、

不得干什么等，否则，如何如何。这岂不是侵犯了他们作为普通公民的人权，造成新的不平

等。

这类规定难道不是新时期的出身论吗？它与过去“出身不好，‘五类分子’等子弟不得入党、

上大学、提干”没有什么实质不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都是侵犯、践踏人权而保

障独裁专制统治特权。

没有办法，独裁专制制度就是这样，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利益，不是走入这个极端，就是钻入

那个极端，它无法公正、公平。它必须从各方面“两手抓”，它必需完全违背人权事业的平等

标准：保障人权是保障人人平等的人权，是剥夺特权保障人权，而不是剥夺一部分人的人权

保障另一部分人的人权。

也难怪，它顽固拒绝建立民主中国，本身就是对全体公民全社会的不公平。而自由民主制度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保证人人享有平等的天赋人权。它不规定什么人可以干什么，什么人不可以干什么，它只在法律范围内鼓励人人有自由意志，有什么能力干什么事情，鼓励自由竞争，鼓励成功。如果有兴趣、有能力，前任总统的儿子也可以竞选总统。不论出身，如果有能力，能公平赢得竞选，即使有残疾，总统也当得，干个总经理、董事长、会长、理事长算什么。关键是一切要由主权在民法则确定。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些不该有的顾忌呢？

看看近代中国，从清朝到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朝接一朝，一茬接一茬、一代核心接一代核心的，父辈辉煌，往往意味着子辈背井离乡、隐姓埋名、倒霉、遭人暗算、排斥等尴尬与悲剧。多少大臣、要员、干部的子弟及其家属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们的生活景况、基本人权甚至比非干部者更糟糕。当干部的人，尤其是开国功臣，多数功不可没，再差也为社会做了一些贡献，有些人甚至功勋卓著，他们及其后代为什么难得公正评价与善终？因为他们最有可能对帝位造成威胁。

清点一下1949年以来的干部史，贡献越大、官阶越高，结局越惨，这都是帝制帝位造成的。世人不要再跟着幸灾乐祸了，说什么“爬得高，摔得惨”一类的帮闲话。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它们制度性“吃人”是吃普通人、吃群众，其实它们更“吃官人、官家、官族”，吃社会中每一个人，连皇帝、核心也在所难逃。古往今来，哪位帝王逃脱了挖棺、鞭尸、重新评价，其后人不隐姓埋名、流落他乡异国？多少家族因其一个高官而被“株连九族”地惨遭灭门？

这也是中国历来有“富不过三代，爵位难久传，无有世家”的说法。不是中国人不善于理财，不是不勤俭，不是不创业、守业，而是如果有人能够借助帝制帝位自传万代，他人便不可能传三代。集权与极权制度下，财富、地位等主要来源于官位与政治地位，改朝与换代均可以换位财富，政治变革必然涉及财富、地位位移，而且主要是从一批官员转移到另一批官员手里，所谓一朝君子一朝臣，实际是一朝君子一朝贵族、一朝富人。且看从清末到军阀混战，

从国民党党国到共产党党国，从一个核心到另外一个核心（毛泽东除外），谁不是暴力推翻或

和平换掉原来的执政者，然后自己从社会地位和财富方面捞个钵满罐盈。

具体看，从第一代核心毛泽东主席到所谓第三代江泽民，他们的配偶、亲属、子女与身

边工作的人的命运变迁，是不是证实了这个道理？甚至有些家族、有些人不得不亡命天涯，

有些已经冤屈致死。不倒翁实在太少了。没有民主制度与人民主权的法治，有什么能保障什

么人的利益，哪怕是前一代核心及其配偶、子女、身边工作过的人等的利益？现在，谁能保

障邓家的辉煌？将来谁能保障江家的辉煌？更甚的是，这党国极权时代比家国极权时代更恐

怖，核心变得快，君子与朝臣也变得快，况且接班人与前任没有父子关系，那“同志”关系

使后人下手更无顾忌，更快、更狠、更毒。

而且每逢改朝换代时，没跑了的，交出财富，交给另一批执政掌权者；跑了的，财富早已转

移海外，国际上称之为资本转移，多少国家、地区、公司和个人因此大发横财。个人方面，

这样的达官贵人不计其数，海外寓公海了去；集体或政权方面，仅一个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

便从大陆带走了多少民财、国宝？好在都是一个中国，肥水没流外人田。可两岸的老百姓都

不曾因为财富在官本位之间的转移而得到什么实惠，长此以往，中国能富强，人民能富裕？

更可恶的是，由于制度不能保证私人财产不得侵犯，官本位中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改朝换

代，什么时候皇上、组织会免他的职位，让他靠边站，他不是抓紧时间为人民服务，而是抓

紧时间猛捞、猛贪污。这些与承包经营、异地做官等一样，短期行为盛行，只讲产出、捞、

及时行乐、腐败，不讲积累、发展后劲和长期发展，能捞多少捞多少。

所以，现在中国一些地方、单位，老百姓一方面希望换届、换班子、换领导，另一方面又害

怕换。刚刚喂肥了饿狼，可如果走了肥的，来了瘦的，岂不更遭殃。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

业逐渐萎缩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除去优秀干部，换一任官，短期行为一任，贪污腐化一任，

刮一任皮，变卖一任资产，还有错误指挥、决策失误等，不能不是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地官员因各种各样原因换了多少任，有几任不收刮民财，不借建设国

家的工程发横财？小官小刮，大官大刮，换一个刮一个，中华民族与文明、中国人民，哪里

经得起这般刮皮？这恐怕是民贫国弱，都瘦得皮包骨一样的基本原因之一。

这是讲贵族、高干权等“富不过三代”及其危害，后面讲到的军人权、知识权、物质财

富权、干部权等其实都“富不过三代”，也是同样道理所至。

遗憾的是，中国至今还没有象《大宪章》那般如星火却雄壮至伟的民生、民主、民权等的开

山之作。

当然，推崇贵族民主，不是说中国现在还有机会、还必须从它过渡到全民民主。

现在，全民

民主已经风行全世界了，人人有选票，人人有选择权，人人都可以是政治贵族，中国人民恐

怕不会同意实行贵族民主过渡，而是要求直接到位，全民大选，实现全民民主。

况且，有限

的现行中国民主已经是等级纷纭的了，如从政治局常委、委员等党员干部、人大政协到党外

民主人士、基层干部、群众、基层群众等一级接一级，已经有数不清的级别了。

（4）行会权等各类社团权也是倍受防范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青年会、学

生会、同乡会、同学会等各种协会、学会、团体组织等倒是不少，但哪一个不是一人一党独

裁专制统治的小媳妇、酸孙子，不是被“两手抓，阶级斗争”抓掉、斗掉了，或者是党组织

的外围统治基础。可谓只要帝制帝位在，谁也没治没地位。

中国过去一直是农业经济社会，统治者虽然把农业经济作为社会支柱，但绝对不允许它就此

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农业经济权。他们不鼓励或不允许把科技用于大规模农业生产，不允许出

现农业经济与农民联合组织，如农民协会等，他们认为农业经济，而且是小农经济更利于官

本位独裁专制统治。

所以中国农村、农业人口和农业经济始终只是官本位至尊的附属品，当局决不会推出一个独

立的农民权。其他产业及其从业者也不会生成相应的经济权和人权，如市民权、工人权。似

乎只有毛泽东主席曾经尊重了农民协会，为了反对统治者，他说“痞子运动好得很。如今，

8亿中国农民没有一个组织代表他们说话，一个乡镇企业家协会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它的会

长早已倒霉透顶了。

再拿工会来说，50年来“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为政体”的中国政权并没有产生一个什么产业工人权，“工会”不过是“让工人听党的话”的

工具，或者是福利机构，决不能组织罢工、游行等。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时期也是如此，中

华民国除了国民党党权至上，也没有发展出一个有地位的独立社团。

现在，中国正朝四个现代化迈进，农业、工业、商业、文化产业、信息业、IT 网络业、科

学技术业、知识经济等都有了，同样还是什么经济权也没有产生，也没有顺便生出个什么农

民权、工人权、商人权、学生权、企业家权、知识者权、网络权。一切权利还是附属于独裁

专制统治权。如同封建王朝是皇帝官本位对全民单向独裁专制统治，如今城乡国民也只都是

一党独裁专制单向统治的被动接受者。

为什么经济很重要，但不允许它产生经济权呢？为什么财富很重要，却不允许它转化为资本

权呢？为什么企业很重要，却不允许发展为企业权呢？为什么实业家、民营企业家等很重要，

但不允许他们拥有政治权呢，如组党、集会、帮助竞选、影响政治进程等？为什么文化很重

要，文化界、文化人却不能转化为独立的文化权？为什么科技、教育很重要，为什么人大政

协很重要，等等，但它们必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前进？为什么各行各业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各

人等都很重要，却不能发展各种权？

这是个企业家，那只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家，或干脆贬称为摆摊的，这是个唱歌的，那是个

拍电影等等。只要不是党政官本位系列，尽可以随意蔑称、贬称。为什么官方主流要想尽办

法贬低产业、知识、科技、文化等经济界人士呢？为什么这种贬低与冷嘲热讽海外民主选举、

政府换届、政党轮换等如出一辙？

因为“三个代表，总代表”欲图代表一切，则必须收缴各行各业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各事各人

自己等的自我代表权！（可是中国人民一看见自己被强行代表了，便烦得很）这是四项三讲和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需要，是独裁专制统治需要。

历代统治者，尤其注重打压非官营官商的民间经济权、资本权。为确保皇权垄断社会物质财

富，控制劳动者人身自由，乃至控制思想、“戒言”，统治者一方面将民间工商业者定为“四

民之末”，另一方面则由政权本身控制了大部分工商业的生产与流通。名目为官府手工业、官

营商业、社会主义公有制国营企业与集体企业，实则为帝王企业、皇权企业、党有企业、官

有企业、核心企业、一把手企业。

视商为末，重农抑商最甚者，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该流派之“法”，乃致力于专制制度

建设也。他们认为商业破坏小农自然经济，造成农民贫困、破产，引发社会动荡、社稷倾覆。

商人是社会“五蠹之一”，祸国殃民。韩非子进言秦王，“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工业

革命以后，虽然雍正昭令天下，“四民平等”，但满清皇帝有新的末业说。而1949年以来，

从公私合营、割资本主义尾巴，到个体户、摊贩、私营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从计划经

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人民走过了一条多么曲折、

辛酸的道路。直到现在，从产业界定、银行贷款、司法，到税费率、摊派、审批等方面，歧

视、限制民间资本的条条框框多如牛毛。“100年后变不变，怎么变”，还如一把妖魔之剑，

悬于人民头顶、国家之命脉、民族复兴。

当今信息时代，中国当局骨子里是把网络信息产业视做末业的，网络民主，不能以内参搞信

息封锁了，他们拼命建立网上长城。他们重视信息产业实在出于无奈，不发展它，倒台得更

快。麻烦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经济发展也是双刃剑。顺应民心，巩固了帝制帝位，也宠

坏了人民群众。他们得陇望蜀，解决温饱人权，便索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人权。不过还好，

有两手抓，两手都硬，笔杆子不行，还有枪杆子伺候。

自汉至唐，中国城市一直厉行了坊市制度，严禁市与坊混杂。而且派驻市吏监管，“日中为市”，

不许开设夜市，违者禁断。至于专营政策，重税政策，剥夺商人的算缗令、告缗法、率贷、

借商之令、接商、和买、宫市等则遍布城乡经济活动。

所谓公私合营、公有化、割资本主义尾巴、“私营民营企业是私生子，争戴红帽子”、反对私

有化、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100年不变，以后怎么变”、害怕民工潮、“允许海外私人资

本进入国内市场，并贷款，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却排挤国内民间资本参与重大经济活动，否

则便是侵吞国有资产，要判刑”等，相当程度上不过是二十六史“打击民商，巩固社稷”的

余韵。它们同路同辙，一脉相传，不过殊词同归而已。

出于对工商业及其从业者“祸国殃民”的工具，统治者完全没有“私人财产不可侵犯，公民

享有财产自由权”的概念。他们认为“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王夫之）”，他们对商人推行

政治歧视与压迫。秦汉时，经商者入市籍，身份同罪谪，低于庶民，将“优先”服兵役、苦役。“工商之家不得與与仕”，不得穿丝绸，乘车骑马坐轿子，购置田产，本人与子孙不得入仕做官。

事实上，由农民而为工商业者，正是个人人权与社会进步的一种普遍过程与形式。

财产私有权利、经济权利等就是“资本”位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权利，就是人民权利，它们天然就是官本主义和官僚阶级的对手。财产等经济因子很重要，财富会转化为资本、再生财富、资本，并使人民脱离官本位、官权羁绊而独立存在，并在力量足够大的时候谋求代表经济利益的独立政治权。所以经济权也会产生与官本位独裁专制政治权利抗衡、对立、分权等的威胁，所以历代统治当局才要抑商、贬商、打杀商，自古即对人民造谣“无商不奸，五蠹之一，祸国殃民”。商“奸”于何处？“奸”于买卖经营，也“奸”于官本位独裁专制统治基础，奸于家国、党国之覆亡也，改朝换代也。

可见，商为大众人权之首，故乃统治特权之末。确实，虽然“商”是人民寻求自由民主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工具，但对独裁专制官本位而言，财富、商业、产业、资本等经济权利无疑是“奸”的，其“奸”足以危害官本位独裁专制制度及其特权地位。商重利润，利润是金钱，有拜金主义，则必然拜金不拜官，有钱不怕官。富裕了的人民，再加上金钱万能，必然引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并威胁官本位个人主义控制下的所谓集体主义、家国党国之所谓爱国主义、党政纪律等地位，使党政官本位权力失去统治效能。“商”可谓“无商不奸，奸指独裁专制统治及其官本位”。故而统治当局痛恨、压制中国工商业资本及其所有者与从业者，致使中国经济落后，他们也痛恨外国“资本主义和工商业”进入中国，常常称“外国商人和传教士是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先锋”。爱国的中国人，请注意，这个“入侵”不是入侵中国和人民人权，而是首先挑战、入侵了满清王朝及其独裁专制统治特权。

我们的爱国热情不要被帝制帝位利用了。爱国者，应该爱资本主义，爱私有制。人人可以拥有天下、拥有私人财产，以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所谓私有制，才是真正的

“由于社会全体均可共有而成”公有制。属于人民的私有制好得很，属于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的公有制糟得很！后者是真正私有制，它方便了当权者盗窃贪污、以公谋私，并且是统治者控制人民的可靠工具。

虽然“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帝制帝位天生痛恨能够助人民发展自由民主一臂之力的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所以“三个有利于”之后还有“两手抓，器变道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即四项凡是迷信）”把关，否则“三个代表”、总代表岂不是当不成、泡汤了？所以当局只

发展他们控制得住，并且利于统治权益的所谓皇家经济、国营经济、党营经济、公有制经济。

这些经济组织的特征是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对其有无限权力而广大人民无丝毫权力，它们是

真正的官有制、私有制，乃至奴隶制。

中国人民不能继续相信六四当局“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反对私有化”的骗人鬼话了。中

国目前发展经济而拒绝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私有化，就是固守独裁专制政治权利之一元化

地位之需要。所以，中国要拼命发展“官商经济、党商经济”，“搞活所谓的国有企业”，要把

有限的贷款等社会资源用于“死马也要当活马医”，目的便是确保党国利益、核心利益。官商、

党商经济控制于朝廷、政府、大小皇帝、党政官本位手里，能为巩固独裁专制所用，而不会

“坐大谋反”，索要什么政治权利。

官商经济者本身有政治权利，它的产生、发展都要借助独裁专制官本位权利，所以它基本不

会反对现行体制。除非有事业心，要做大、被逼急了。但对于政治上（往往夹带个人利益、

意愿）不听话的企业和领导人，党组织或者个人随时有权将其“拿下”，这便是公有制的好处。

国有企业及其企业家均是很可怜的，企业做大了就该挨宰，功高震主就该倒霉，做好人就是

拉选票、争夺群众，就该被灭，不仅仅是出于贪婪、眼红、妒忌，更是保守独裁专制权威及

其稳定的需要。如今，维护“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权威与稳定”的名义下，多少中国豪强、多

少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社会异动势力倒下了，被迫迁往海外了？多少无形与有形资本、多少

综合国力的引擎等被阻止、废置、扼杀了？多少个点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景气点，被迫掉头向

下了？

我们常常听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中国经济及其人士等所有生产力从未获得与其匹配的
政治经济权利，他们总是附属于、匍匐于、孙子于、完蛋于、移民于一元化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政治权利之下，所以中国经济总不甚发达。
近代以来，中国工商业资本很难发展，民营与国有企业均很难做大，难有驰骋国际市场的跨国公司，资本家与企业家也难有善终。为什么？因为统治当局害怕它们成长、壮大。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纲领中有一条“决不允许操纵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与发展”。
其实，1949年以来工商合营、没收私人资本、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击“小摊小贩”、反对私有化、打击资本主义、警惕资本主义和平演变、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等，根本不是为了实现什么社会主义事业、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公有制，而是此举利于独裁专制统治，他们可以以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的公有制名义剥夺人民而成全少数官僚主义阶级统治者的私有制，这都是“两手抓，阶级斗争”的伎俩。

上述痛恨私人资本的做法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不会忽略当今官吏每每谈到王朝兴盛时期都如出一辙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如对文景之治，他们说：“社会异动势力在汉初主要是豪强势力。这些豪强既有六国之后，也有宗法贵族、大官僚以及大地主和商人阶级。他们垄断一方，横行乡里，大肆兼并土地，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给中央集权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
从刘邦时期开始，就有意识地将一批豪强势力迁往关中，以便于中央政府的控制。文景继续奉行这一政策，使豪强远离故土，瓦解其社会基础，从而有效维护了中央权威和地方稳定。”
从对“这一政策”倍受赞赏可以看出，迄今当局仍然认为一切不利于王朝独裁专制统治而利于个人个体发展的社会势力、土围子等都会“干扰”帝制帝位帝党帝王等统治体系下的“正常”社会秩序，都是社会“异动势力”。你们“富不思源，富不思进”，反而“富而异动”，以经济多元化谋求政治多元化。这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核心领导，是违法，是造反。
我先加强你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说服你们，如果不听，我还有狠招，我有的是办法，让你们明

白“三个代表”是谁。你们人民算什么，什么劳动致富、创新致富，那是我的政策好，我的政策会变化，能让你们富，也能让你们再穷。至少随便找个词，抓几个进了监狱，看你还富个什么劲！

别以为我们只对岳飞等人可以定“莫须有”之罪，我们随时可以为任何人定任何罪。你们人

民就是贱，穷了才老实，一乍富就不认识自己，不甘于“末民地位”。要什么自由民主、人权，

要什么政治权力，花钱混进政权，或者找代理人、代言人，瓦解我政权。“富可敌国”很可怕，

以富裕而成为什么中产阶级、人权阶级，从而藐视家国、党国、核心国，最后推翻我们，变

天，建立什么民主国家。没门！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资产阶级国家，是少数人的国家。

家国一个姓，党国一个党，这些才是大多数人的国家。至少，虽然未经选举，但我们仍然代

表了多数人。

所以不能让你们富，所以宪法不能保障私人财产，要充公，要“公有化”，要消灭富人，消灭

私有财产，严防私有化。

还是“公有制好”。让你们整天为衣食住行操心，处于“民以食为天”吃饱了事的自然人状态，

你们就没功夫嚷嚷什么“自由天赋，民主天赋，人权天赋”，就不会折腾什么“民以人权为天”

了，更没功夫教导我“王者以民为天（《汉书》）”了。一群贱骨头！尤其是臭老九知识分子，

必须整得“九儒十丐”，都象孔乙己那般酸腐、贫困、没地位才好，穷到“偷书不能算偷、来

一碟茴香豆”地步，看你们还有劲发牢骚、思想、空想，蛊惑人心。

富人权、豪强等异动势力是历代统治当局眼中钉、肉中刺，必须对他们搞阶级斗争，“两

手抓”打击一切豪强、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等异动势力，

没收个人财产等人权，必先除之而后有“中央权威与江山稳定”。其手段则不仅仅是“迁往、

远离”一类的和平瓦解、和平演变，更多的则是“无情打击，无偿没收，贬为庶民，下放劳

动，非自愿、非正常的强制移民”等，或者干脆镇压，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这些不是与人民

为敌吗？这些都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沾边吗？难怪有人说王莽等早就搞了社会主义，而太

平天国的公有制也曾经是十分完美诱人的。别给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摸黑了！

中国人啊，独裁专制当局剥夺富人、豪强等人民之财产、言论、信仰、结社、宗教自由等人权，并没有增加同为人民的穷人人权，受惠的只是人民人权的共同敌人统治特权。它只是平均，平均的结果是大家都穷了，惟独独裁专制政权及其官本位体系富裕了。富人、豪强等千万不要忘记“达，则兼济天下”祖训，尤其不要满足于以捐钱、赞助、贡献等方式被当局收编为外围统治势力，应当不仅自己更上以层楼，朝真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进军，而且力所能及，帮助他人致富。只有富人越来越多，穷人越来越少，所有人的

人权才越来越有保障。

让我们支持富人、豪强吧，争做富人豪强！只有富人豪强多了，独裁专制官本位体系才不敢、不能对无官权者为所欲为。千万不要被假社会主义、真独裁专制蒙蔽了自己双眼！千万不要受骗于假公有制、真党有官有独有私有制！

富裕了，繁荣了，进步了，人民应该拥有更多选择权力，这包括对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接受教育、政治、领导人、价值观等的识别与选择权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各行业涌现出了多少这样的“豪强异动势力”？“豪强”的产生与结构，其对“中央集权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与汉初多么雷同！他们难兄难弟的结局又何等相似！我们应该反思，1949年以后中国资本家、农民、工人、军人、右派、学运、人民罢工、知本家、“暴乱、骚乱”等屡屡分别独自与独裁专制政权对抗，社会其他各界屡屡保持冷漠、沉默，甚至还支持、拥护当局，这是见死不救，这是对同胞犯错误，这也最终将危及自身的错误。

只要有一个人得不到公正对待，他的同伴、同学、同事、同乡、同胞也厄运不远了。只要有一个人被逼上梁山，便会有一群人遭受威胁。下一个是谁？

不要让任何一支、一次人权人权奋斗孤军奋战，不要让他们流泪、夭折。人人有良知，才能人人平等。各行各业各地各民族各阶层有良心，才能社会平等、有人权。中国人民只有联手反对帝制帝位之任何独裁专制统治当局，才能前进、共同前进。受统治者分化，自以为过得去，最后必然也过不去。

对他人人权奋斗的沉默，必将使统治特权更易于吞噬自己的人权。

（5）知识文化权、思想权与自由言论权是独裁专制统治的心腹大患。

学习、思想、写、说话，包括影视剧，是会因求知、思想、言论等获罪的。公元前 221 年

秦始皇确立中央集权统治制度不久，不识相的知识分子因为对政权与社会现状没有表示“热

烈拥护，热烈欢迎”、“保持一致”，反而秉承了战国时代好议论时政的光荣遗风，执着地嘟囔

了一些不同看法，“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

高，率群下以造谤”，便被“焚书坑儒”两手抓了。

而且，“焚书”主要是针对独立思考、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等的，“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

之书（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 103 页）”。遭“坑”的，主要是民本位思想更加突出的

儒生。显然，较之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更是帝制帝位的“眼中钉”，更容易受到打击。

这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应该是中国“反右”、文字狱、因言获罪、肃反、清洗、镇压

等的鼻祖。明代有屠杀东林党人、清代有文字狱。1927 年国民党腰杆才挺几年，便诛灭

异己、屠杀共产党、镇压工人农民与学生运动。1957 年新中国才成立 8 年，便出现了“反

右及其扩大化”，实际是因为厌恶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而投奔共产党民主世界的中国民主人士

及其继承者们（很多曾经是统一战线法宝的中坚）对新中国“嘟囔了一些不同看法”、不保持

一致等而遭罪的。1984 年文告结束才 8 年又有人已经因为“民主墙、精神污染、资产阶

级自由化”等遭罪了，等等。

这些实际都是千百年来统治者一代接一代“焚书坑儒，诗狱，史狱，文字狱”等一脉相传

造成的。中国立一个右派纪念碑，名单最起码应该从第一代遭“焚书坑儒”的 400 多个儒

生等开始，他们是第一代右派。考古吧，找出咸阳城外那个“焚书坑儒”之坑。1989 年

六四镇压，则是极端手段“两手抓”，是对全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事业的“焚书坑儒”。

那坑就是天安门广场，就是北京大街小巷，就是北京城，就是华夏大地。

知识力量总被独裁专制统治当局定性为“蛊惑人心，扰乱天下‘太平’，引起社会混乱，制造

社会不‘稳定’”，是颠覆王朝朝廷、国家政权的首恶。他们比“暴民”还可怕，必须猛打猛

杀，杀一次，管保江山不改姓，不变色，至少也要管它几十年太平。现在，很多解放思想、

传播自由民主与人权正义的书籍、音像作品等，只能在黑市上出售，挡不住的网
络也正在被
管理、挡起来。

诸多“焚书坑儒”只是对知识产权的事件性显形打击，它的默默毒害几乎无处不
在。常常有著

名高等院校人士抱怨：“我们学校出名人，但出不了‘大家’”，中国学界也几
乎如此。世人常

常纳闷，中国社会蓬勃发展、出名人，但很难出泰斗、大家。这些不是中国人无
志向无能造

成的，而是“大家，大师”都被“保持一致”掉了，被“两手抓”抓掉了，而是
中国独裁专

制统治当局不允许很特别、很出色的人存在，不允许“异动”，不允许具备异动
能力者存在，

不允许有任何大家能大到高于、威胁其独裁专制统治权威。

古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有“两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有
此等经学坐阵，

旁的不可能是显学，出“大家”。

所以，我们惯常于墙内开花墙外香，或者香的难香、味的难味。所以，我们一直
与诺贝尔等

世界大奖无缘，很多海外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有“政治思想品质至上，政
治思想工作、

四项三讲两手抓”等围为着他们，那些奖项是万万不可能得到的。所以，张艺谋
等国外风风

光光获大奖，回国后必须“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因为允许你等出名，就是
皇恩浩荡，还

想做“大家”，还想怎么的，想翻天不成？因为任何中国人背后都有一个“两手
抓”等着他。

因为中国只有独裁专制官本位至高无上、是大家、总师爷、总代表，任何过火的
风光、显露、

探索、创新都是可能获罪的。你们搞学术研究、搞业务、做具体事的人不与我保
持一致，倒

超过我成了大家，我等帝制帝位一把手党政官老爷往哪儿放？学术方面，中国只
有独裁专制

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思想工作等是大家，其他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中

华文明与文化算什么，都得让路、匍匐。

为了附和、符合独裁专制利益，多少中国文化被改头换面、遭篡改，儒学就是其
一。据罗尔

纲考证，《水浒传》70回本成书于元明更替之际，其主题思想本是宣扬农民起
义军与宋王朝

对立，最终建立新政权。100回本以投降朝廷结束，则是明宣德、正统年间所
改（毛泽东

四大时代，大批宋江投降，仍然令人回味）甚至为了避讳刘邦，《诗经》中的《邦
风》被迫改

名为《国风》。

现在，即使所有制多元化了，也决不容许指导思想多元化，“（被利用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占

据全国思想文化的指导地位”，许它滥觞，其他的只能是小家，纯理工等研究的可以放松一点。

我宣传部、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国家级大媒体、党的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学说等没有获

得国际大奖，没有被承认为大家，其他的怎么能够越级，怎么能够是大家？本来，中国人可

能在1999年实现世纪突破，收获一枚诺贝尔和平奖，又是独裁专制政权两手抓，百般阻

挠，坏了全民族好事。

不止校园、研究所等大楼越盖越高，大师越来越少，全社会都是大楼越盖越高，高官或

享受待遇者越来越多，下岗人员却也越来越多，找工作越来越困难，人民生存越来越窘迫，

人民人权事业越来越萎缩。为什么？因为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力并没有与社会物质财富同步增

长。相反，自由民主高一尺，独裁专制高一丈。经济增长了、综合国力提高了，用于独裁专

制的国家机器也更强大了。楼高、人民强，“两手抓”更甚，“长城”更高、统治者更强。统

统保持一致掉，看你人权折腾啥？

过去，我们一直认同“知识就是力量”是真理，但现在却发现这六个字于帝制帝位统治的中

国仍然不是真理，或者尚未兑现。按理，知识越多力量越大、个人的自由度越高，社会自由

精神越强，但这对统治当局意味着反叛意识强，不好糊弄、愚弄，是可怕的，是瓦解力量，

因而有更多的“两手抓”等着抓知识者及知识力量。当局害怕人民拥有知识力量，害怕顾准

《红墨水》呼吁“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

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所以“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历朝历代都要收拾它，象收拾神权、军权、民族权、女人权、

商人权、经济权等一样收拾它，或者“焚它”、“坑它”，或者口诛笔伐它，或者让它“接受改

造”、接受“再教育（教化）”。迄今，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求知、思想、言论，付出了多少代价？

这中华民族与文明的损失正是保守帝制帝位帝王权益的代价。

所以，也不能让知识有产权。你坚信知识有产权，这不就是以知识要人权么，不就是要挟党

和政府要好处么？我等统治特权怎么摆？往哪儿搁？哪我等意识形态特权还有没有权威？你
等人权长一寸，我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特权便要退一寸。哼，文化下移，扫盲，普及教育，
重视知识，培养人才，那是统治者、领导们的恩德、关怀，你们怎么没良心，不念好，反而
以此为资本，要挟朝廷、党和政府，要什么人权？
什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什么知识分子、知本家？你们算什么？你们都穷酸得像孔乙己，
都倒霉落魄，天下才太平呢！况且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能怎么样，我帝制帝位帝
王以及官本位才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总代表！稳定，稳定我等总代表才堪称压倒一切
的重要。重视你、捧你，只是我“两手抓”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手等着你呢。你“科技兴国”，
但如果你兴人权而不兴我特权、政权，不利于兴我统治、稳定，你甭想兴国、
兴民、兴人权！我是总代表，我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我是一切第一的第一，我“两手抓”、
总抓，不符合我独裁专制统治的第一都甭想做第一！不符合我总代表独裁专制利益，你不“红”
只专，你这第一生产力连刀耕火种也不如，狗屁不是，你甭存在。而且非得把你搞丑、打翻
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因为你等跟他人不一样，这第一生产力要是反叛了，威力还挺大。
你等没看见古代四大发明等的下场，它们连我的鸟笼、玩物、狩猎场都不如。没看见古今中
国科技专家、发明者的悲惨境遇，没看见近现代科技人员外流的事实，他们连我的宠妃、宦
官、秘书都不如。滚吧，到国外去发展、发明、获奖吧，没把你窝死国内就是便宜你们了。
我只需要官员、帮手，他们才是我江山运转的基础，是最大、最重要的人才。我举用人才的
第一标准是政治思想品质过硬，能坚持四项，又红又专不变色。你们不要太清高了，别忘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可以解放你，也可以让你重返丑老九，一棵指头，
一个红头文件的事儿。
所有科学、创新的共同环境要求，是自由。恶待社会人文科学，必然妨碍自然科学进步。中
国科技落后是不难理解的。
英国李约瑟博士的一个困惑世人的问题不难理解。他在洋洋 7 卷 20 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提出：“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于满足于人

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如宋元时期，继三国时刘徽注《九章算术》等，中国数学发展到了新层次，它们超越实际应用而“抽象”起来，如一元高次方程解法、一次同余式组解法、四元四次方程组、高阶插值公式、二项展开式系数表等，均是具有世界历史级意义的成果。但从元代中叶直到明末，中国数学再也没有达到宋元时的水平，形成我国数学史上的“宋元数学发展中断”悲剧。显然，不保障自由民主等人权的朝廷政府不仅缺乏凝聚力、亲和力，还泯灭人民的创新、开拓力。研科学技术是不能被提倡、鼓励的，甚至是得不到好处，是自找倒霉的。古代独裁专制政治体制对科技的恐惧、排斥、拒绝、打压，如同现在的独裁专制对互联网等的恐惧、打压一样。

大家还记得，“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流行于改革开放初期。这还得了？你小小臣民有点科技知识，就想跳槽，从这个井田单位跳到那个井田单位，从这个省这个市跳到那个省那个市，还跳出国门。本事大了，这自由流动，胡蹦乱跳，天下还太平嘛？可恶的是，它还引起思想变化，我“两手抓”的思想政治与教育教化宣传工作跟不上呀，把支部建在摊群上、外资企业等地方，把临时支部、流动支部建立在任何有人的地方，也难以奏效哇。唉！这不是破坏了我的独裁专制统治根基嘛？江山岂不是有变色之虞？

科学技术是人权进步的阶梯，如同商人及其资本位的流动性会直接动摇官本位，造成社会会发展而不利于独裁专制体制“稳定”。它们被视为“贱业末技”，如同“奇计淫巧”，也会直接动摇独裁专制的统治根基。如，历来统治者无例外地对无业人员、民工、“流氓”、“流寇”等怕得要死。被套牢在土地上的农民如果因为科技而离开土地，则必然增加独裁专制政权的内部离心力，提高社会因摆脱独裁专制而出现的进步型动荡——即发展的机率。这是独裁专制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发展型“天下不太平”。他们宁愿人民不懂科技，没有商业，宁愿稳定：象中国封建独裁专制已经创人类历史记录地以“超级稳定结构”延续了2000多年一样，让一人对全党全国全民的独裁专制继续苟延残喘，稳定一万年。

另外，在独裁专制意识形态绝对占据主流地位的社会里，“读经学，做大官”主导了的价格

价值观取向，社会没有提供其他更好的投入产出供人民选择。不是中国士大夫等“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黄遵宪语）”，而是独裁专制社会的价值导向所至。在那种社会里，对个人发展来讲，千军万马俱奔官场独木桥，进入官本位是最大、也是最实惠、最光宗耀祖的事业成功。至于科学技术嘛，由于无补于读书做官的大事业与全家全族希望，当然就是“雕虫小技”、“不务正业”了。看看《四库全书》的官学经典，哪怕是昏庸透顶的皇帝，或者是害国误民的奸臣，都榜上有名，但谁知道大雁塔、故宫等的设计者？四大美女可能家喻户晓，可祖冲之、李时珍等进入了多少家庭？虽然袁隆平成了大股东，但相形之下，为什么当代中国科学家的所得普遍不成比例？

不是史学家与人民缺乏分辨力，而是统治者强制和愚弄人民把不正常的当作正常的接受；不是社会分配没按价值规律运作，而是独裁专制价值规律以外的难起作用。独裁专制的价值导向有偏差，它单一而不多元化，留给人民的选择机会极少（出国是一个）。它只偏向于独裁专制国家机器指定的轨道，只按利于维持金字塔式独裁专制统治而运作。所以，在利于独裁专制统治的最大价值规律铁定下，科技人才、艺术家、体育家、资本等很多各种形式的中国国宝，或者不能发挥价值，只好跟着“混”，或者忍辱负重，借机发挥，或者自生自灭，或者按其自身价值规律流落海外。同时，独裁专制这种充满压制性、排他性、单一性的价值规律，更难吸引海外人才。甭说非本国籍的人才，就是留学生也很难回国，先进的科技也会被他们束之高阁。据史书记载，“圣明”的康熙大帝对科学怀有浓厚兴趣。虽然他曾经为德国科学家约翰·亚当·沙尔·冯·贝耳（即汤若望）平反，还罗致了一批西方传教士研究数学天文，但他仅限于欣赏，从未让西方科技走出宫廷。据说，德国人莱布尼茨受《易经》影响，在数学领域第一个提出了二进制的运算法则。1672年，他依此发明了一种手摇演算计算机，并赠给康熙。康熙却把它当作西洋贡品藏于深宫，治国之余，以此与王妃宫娥门逗乐消闲。最后，为了叩头等独裁专制礼仪之争，清廷与罗马教廷关系破裂，其闭关锁国政策彻底阻滞了中外科技交流。

康熙皇帝能够被称得上是“大帝”，文治武功与眼光远在一般皇帝之上，可他对科技之与国家发展的眼光却如此“短浅”。他那为了“臣下对天子叩头”的礼仪，不惜封杀中外科技经济文化等交流的蠢举，说不定还有人击节称赞、拍马屁呢：他毅然决然“两手抓”，拒绝了西方列强的无礼，捍卫了中华民族尊严！

他的后代又能怎么样？乾隆七次下江南，哪一次是为了推动经济、文化与科技等的发展？娱乐游玩也只是表面文章，他深入民间、微服私访，乃探访民情，以疑心查探异心、反心，以图良策，巩固家天下也。那江浙一带，富甲天下，当年抵制清军也最烈，他不敢掉以轻心。独裁专制制度的一切后代又能怎么样？“科技兴国”又能怎么样？只有科技能兴、先兴我独裁专制，才能允许它兴国！他们后代的进步，家国党国个人国帝国等一切独裁专制衣钵的继承者们的进步，也仅仅止于“器变道不变”、“两手抓”而已，也仅仅是从社会主义到其初级阶段的进步而已，借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力量，浇铸我独裁专制的江山。

可笑的是，当今中国，有关雍正、乾隆等的皇帝权谋影视作品与书籍十分上座，有销路。一些干部为了生存、上升于官场，他们“讲学习”，钻研两套书，一套是意识形态，摆在桌面上，这是“讲政治”；一套是《雍正王朝》、《厚黑学》之类的权谋书，供在抽屉里，这是“讲正气”，“两手抓”。他们明里做马列主义者，暗里研究“皇道”，很多官迷心窍的人根本不把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放在眼里，工程师、设计师、博士、作家、画家等专业技术人才只是他们御用的工匠，因为“要保证‘红’，才允许‘专’存在”，这是“又红又专”的来历，也是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来历，这冒用的名义，都是为了巩固独裁专制服务。而且，两类书都是公款购买。什么讲科学，顶屁用；什么讲自由民主和人权，讲为人民服务，完蛋去吧！这些还是有些事业心的官员，他们比那些围着票子、房子、位子、车子、饭桌和裙子转的干部又要强出许多。如此，康熙、毛泽东、邓小平心目中的家国、党国之万代江山不垮、不变色，哪谁垮、谁变色？此等不贻误中国，谁贻误中国？

其实，嘲笑独裁专制统治当局对科技认识“短浅”，也是不全面的。他们的智谋是深邃的，

只不过为了“久远”独裁专制基业，他们只好“短浅”科技、改革、开放、商业等了。有时
候，我们谴责独裁专制的清王朝“愚昧”，不重视科技，也不发展科技，还盲目排斥科技，是
我们太善良了。其实，任何独裁专制政权都“绝顶聪明”，善于“两手抓”，你看他们一方面
把“经学”研究得多透、多深、多厚，另一方面又“小聪明”十足，早就把自己个人、家族、
个体、个党等的小算盘敲好了。只有小算盘合适，他们才拨动大算盘。国家、民族、人民的
利益，靠边站吧！对独裁专制利益而言，科技等算什么。经学最重要，意识形态最重要！一
切经学的最高使命，就是人治！就是治人，吃人！就是皇帝等党政官本位利益高于一切！统
管一切！维护一人一家族一党独裁专制统治以外的，都是末技！

那么，社会（朝廷政权）稳定的需要是墨守成规、无需创新，整个政权的运作、存亡所
有这些建立在一级对一级的绝对权威或服从而无需创新（上级只选用听话者为部属），社会制
度扼杀创新，轻商而鼓励小农经济，等等，所有这些的实质都是因剥夺人民的人身自由、思
想与言论自由、生产与经营自由、财产自由、安全自由，哪人民如何能把创造、创新力贡献
于自己和社会？哪中国如何能够不落后？按照价值规律，过去科技成果如何能不流失？现在
的科技人员能不移民？

所以，数千年来虽然中国是文明古国，是文化大国，虽然知识界可以分为诸多流派，但
从来没有哪一支能够成为独立于独裁专制政权以外的社会力量。它们或者为独裁专制统治所
用，或者臣服、服从，或者退隐、流亡，或者被灭。独裁专制统治权益及其稳定才是真理，
皇权、官权、强权、一人制、一姓制、一党制、终身制、总代表、终身代表等才是真理，“知
识就是力量”只有知识利于帝制帝位帝王时才是真理。可见，只有自由了，一切知识才真正
有力量，而且因为平等、自由、民主与人权等本身就是力量。

（6）秀才遇官府，有理说不清。文的弱，武的雄，文的没人权，武的总该有人权吧？
不是的。“皇帝指挥枪，党指挥枪”等帝制帝位迫使军队皇家化、个人化、个党化、私有化，
军队与军人只是个人个体“器变道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的“两手抓”御用工具，而

工具本身则难以享有独立基本人权，即军人权没有保障。

拿历代将军们来说吧，如韩信、彭德怀、贺龙、林彪等虽战功卓著，对人民、国家、社稷有功，但很多人却战后死于非命。为什么？因为缺乏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保障，他们随时可能是“皇帝指挥军队，党指挥枪”牺牲品，是“王军，党军，党卫队”牺牲品，是“两手抓”牺牲品。因为他们的命运不掌握于国家和人民，而是被操纵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党（个人借党）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因为作为独裁专制下个人个体的战争工具，一旦没有战争，他们就失去了存在价值。相反，“兵权”还是对独裁专制政权的威胁，终将难逃“敌国亡，将军死”兔死工具烹之千古陷阱。另外，军队军人有时为了生存而显示自己重要，不得不夸大敌情，好象战争随时会发生，或“好战”，逼迫统治者不得不重用，从而给自己找一个保全性命、地位的“战争支撑”。这造成了紧张气氛，或战乱不断，不仅使天下不太平，还强化了独裁专制。

1949年以来，很多将帅、老干部虽饱受折磨，但凭着对人民与正义必胜的信念硬挺了过来。一些过不了“关”的人，则只好对人民寄予无限期望。刘少奇临死前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为什么不说“好在历史是党写的”？可见，他对党是绝望的，他不是死于人民，而是死于“党”，死于党是一人一党对全党全国全民独裁专制工具。不是他自绝于党，而是党的帝制帝位抛弃了他。如果人民主权高于党权，如果党的人民性高于党性，如果国家的人民性高于党性，如果不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中国，如果人民国家不是党国，如果现实也由人民来“写”、决定，那么，将帅们、刘少奇及其家属等的基本人权还会被践踏，他们还会怨死吗？

邓小平还会遭受三起三落之磨难，邓朴方等还会终生残疾吗？

将帅之死已经昭雪，国家主席刘少奇之死已经平反。但国家与党的帝制帝位仍然存在，灾难、悲剧之根源并未清除。“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是对党组织的直接否定，党组织为什么会被用来错误地写他们历史的工具？中国听不见他们对人民主权高于党权的呼唤吗？文革之错不是文革本身之错，而是中国缺少民主制度保障个人人权之错。我们不能满足于平反昭

雪，而要致力于拆除独裁专制制度，创立民主中国，使悲剧难再重演，使它绝对不可能重演！

只要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还存活，只要一朝君子一朝臣、王朝更迭循环机制还存在，谁能

保证新一代将帅们不步前辈们“兔死工具烹”、“敌国亡，良将死”后尘？没有自由民主政治

制度，只要“党指挥枪，个人指挥枪”盛行，只要“两手抓”想抓谁就抓谁，谁能保证军队

军人对国家、人民的奉献不被抹杀，功绩不被打成罪证？谁能保障证军人及其家属的人权不

受侵犯？有道是“千金易得，一将难求”，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良将固好，用了即杀”，

立功之日就是迈向悲剧之时。

军队、军人们、将帅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错！但它应该打出人民主权立法的民主政

权，而不是另外一个姓、另外一个党重新统治人民的独裁专制政权。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为了国家与人民能够保证你们及其家属的基本人权，不要因为服从“党指挥枪，两手抓”而

成为党卫军！

中国军人们，咱们猛拍胸脯自问：是为人民为国家作战崇高，还是为一个人一个政党作

战光荣？是宣誓“让党中央放心”，还是“让人民放心”？军人作战不是可以任由驱使，而是

为了伸张正义，保卫人民与国家。我们是人民军队，是卫国军，是卫民军，人权军！人民将

与军队一起，推动军队国家化！军队属于国家，属于主权在民国家！

别为保卫独裁专制制度“两手抓”而战，别为独裁专制特权而战，为自由民主与人权而

战吧！

民主与民生唇齿相依，民主属于全体国民，庇护全民，也庇护军人！

实现军队国家化而不属于王军党军个人军，军人不是党丁党将，才是军队军人们的最大

荣誉！它不仅使你们不遭愚弄而镇压人民，还将使你们免于个人个体迫害，使前辈们将帅们

的鸟尽弓藏、“兔死工具烹”悲剧不再重演。

军人们，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不是你们的敌人！你们不是剥夺他们人权的工具，你们是捍卫

人权的卫士！

我们的共同敌人不是任何人，它只有一个：帝制帝位之独裁专制制度，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

度！

加入吧，加入中国全民和解的和平非暴力人权大进军！

为建立民主中国而战！

（7）神权、皇亲国戚贵族权、经济富豪权、军人权等之外，权倾朝野的宦官权、秘书权等也从来没有好结果。宦官权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奇特现象，它可以大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可以更换皇帝，安排政务、国事。它因奴才之卑劣于嚣张，危害甚广，却好象没有一个朝代能摆脱这一痼疾。为什么？因为皇权需要它制衡一切敢于或者可能会挑战皇权的势力，如文武大臣、皇亲国戚等。它是“两手抓”的重要帮手。为什么单单对宦官们如此信任？因为正如他们不可能对内宫美女构成威胁，一群被阉割的人，一群阴阳人，是不会成为国民认可的国君的，他们的生理缺陷注定他们只能是皇帝的帮手和最忠实朋友。况且，不依靠皇帝，出了皇宫，谁理他们呀，更无造反的能量与威信。故而对他们，皇帝可以大胆提拔，大胆使用，而且最后总有收拾他们的人。现在，宦官没有了，但党政官本位里具有宦官心态者仍然普遍存在，非此，如不温顺、听话、可靠，不无反骨、不做孙子，不会拍马装傻，则不好提拔、委与重任。蒋介石国民党有侍从室政治，现在秘书从政十分普遍，实乃帝制帝位之宦官政治遗风也。此处不多说了。

（8）政党治国，政党兴国，政党政治等本来是近现代史以来的世界政治特征，但多党政治及其代议制民主则更是民主政治的基本三大特征之一。然而，中国政党史早有“人臣不党，有党必诛”等老“四项基本原则”存在。秦朝亡于焚书坑儒的460多位儒生们，可以称做为早期的“奸党”。东汉延熹年间，皇帝与宦官们联手，两次以“党锢之祸”镇压了太学生的清议运动。明代，也是皇帝与宦官合作，诛灭东林党人。他们称人民抗议腐败与镇压为“吴人尽反”，与1989年当局诬称人民反对“四·二六社论”、“五·一九戒言”、反对军车进城、反对清剿天安门广场为“扰乱社会秩序，发生了打砸抢，袭击军车、军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是同弦同辙，一路货色，一个伎俩，一个思路。清庭骂会党、学会等是“背叛君父，是无父无君之乱党”，认为“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下令“对党人可就地正法”。国民党扬眉吐气了，却“两手抓”，排共、剿共、排斥异己等成了他们的最大任务，1939

年抗战期间国民党专制政府还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反对他党。

推翻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但“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制和政治协商这种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实际上仍然搞成了自己的一党独裁专制，新

中国不新，还是旧得很，与秦制一样旧。而且，不同时期的第一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虽

然惯常誓不两立，但却并行一致对众多民主党派大加挾伐、禁锢、摧毁，大搞党禁，使它们

沦为甘当儿子党、孙子党地位才能生存、议政、“参政”。人大、政协成为“党的决议、会议

文件等”的法律过场，或者只能发出“拥护哇，坚决拥护哇”般的吹吹拍拍。还有一些政党，

尤其是六四前后成立的，则连政协都挤不进去，它们不受圈养，是“非法组织”，乃至邪教。

这是明代皇权对东林党灭杀的延续。

党禁、报禁、国家机器是“两手抓”工具，它们为“种党制度”与帝制帝位服务。如国

民党执政大陆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的际遇，又如中国共产党执政大陆时期的民主党

和其他政治团体的际遇，不是被剿杀，就是被限定在服从、配合、装饰的花瓶地位。过去有

《国民党组织法》，如今把“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均是意识形态下党国、党政不分的“政

教合一”式独裁专制统治的另外一个翻版。它无非是规定了“中国凡是都必须服从一人一党

独裁专制利益的需要”，使中国永远是一个附庸于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特权高于人权的“凡是

国”。

除了党同伐异、不容党外之异党，还不容党内之异己、不同意见、不同声音，全党必须对一

个人、一个思想、一种意见、一个批示、一个讲话、一个声音等保持一致，否则就是搞自由

主义、宗派主义，就是搞地下活动、非组织活动，就是反党、分裂党，罪不容赦。党一定会

对此进行无情斗争，给予严厉制裁，直至清除出党，甚至烧无姓名，死无葬身之地。多少次

党内斗争酿成了多少悲剧，其罕见之惨烈超过了敌我斗争！

相反，本世纪中国民主革命以来，如果人人平等、政党平等是指导中国民主事业的刚性

原则，如果以民主为己任的国民党强大时能容忍共产党等，如果同样以民主为己任的共产党

强大时能容忍国民党等，如果不是强权使其他政党沦为小媳妇或者儿子党、孙子党地位，如果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存在、发展，允许党内有党、开展党内民主，自然形成共产党一队、二队、三队等，如果组成民主联合政府（也许，中国的民主事业可以从大党分裂开始，从党员不屈从于一个核心开始），那中国民主事业会进步得多，人权状况也不会总令世人担忧。同时，也不会有台湾问题。两岸问题实质是国共两党违逆民主、彼此对立而引起的国家分裂，它起于两党竞相独得中国、并推行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其解决目前也受阻于大陆一党独裁专制统治。这是大陆仍然独裁专制给“一个中国，民主中国”造成的麻烦。

其实，“党政不分”提法实足是委屈了党，它俩不是一个层次，明明是党管干部、党高于政嘛，还有“党高于国、党高于民、高于一切！”同时，“党高于政”等还不是帝制帝位制度黑暗的终极，它还有一个金字塔尖：皇帝、核心高于党组织。六四镇压便是为了固守诸多政治黑暗。

今天，民主党是中国境内所有非执政党的集合名词，其中“民主”在中国有特殊含义。它表明只有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是永恒、高高在上的，其他党永远处于“民主”地位，是陪衬、绿叶，是月亮。“民主党派”称呼来自是帝党种党对它们“民主”一下，是皇党、老子党对儿子党孙子党的“民主”恩赐，是遮人耳目的虚饰：我让你民主，你点缀我一下，成全我天下归一的浩荡场面。至今各民主党派不能宣传自己的政见，不能随便发展党员，否则就是“煽动群众，破坏稳定”，是“与党争夺群众，颠覆政府”，罪莫大焉。所以，民主党派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它在中国的含义：就是被独裁专制党，就是处于下等地位的儿孙党。

迄今，除了台湾，政党政治也没有在全中国开创出民主政治，它是个人个体实现独裁专制统治的工具。人民不仅不能对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妄论朝政”，不能自由结社组党，也不能“附和匪党”。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吗？人民反抗独裁专制的民主革命不是人民最后被少数人重新独裁专制统治！可喜的是，一些政党在台湾不懈发展，促成民主台湾新近代表中华民族与文明实现了伟大的民主政治突破！

（9）其实，尽管以皇帝为首的官本位特权高于公众人权是中国人权被侵犯的主要表现形式，
尽管腐败、恐怖、以权谋私、以官欺民等官害官祸官腔官抢官拿官偷官卡官匪是中国主要之
祸害与土匪，尽管人民怒称土匪进了衙门，尽管最坏之人、危害国家民族人最烈者的确藏身
官府，但不是说官本位体系里都是坏人，更不是说为官者人权都得到了保证。
人治体制里，官员的基本人权和特权也是没有保障的。伴君如伴虎，他既要执行
“两手抓”，
还有随时被“两手抓”的危险。升官发财是一回事，失去自我，“从此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组
织、官组织”，“君打臣不羞（官场的阿Q精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等则是另一回事。
虽然数千年以皇帝为首的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特权高高在上，但它们本身也是尊卑有序、等
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并不能保证官员享有平等、独立的人格自由精神和民主、人权等。为官
之道，就是“保持平庸”，你再能耐、高明，还能高过皇帝？你比皇帝、核心还能耐，功高震
主，你遭遇两手抓，倒霉的日子就不远了。升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官再大也是
皇帝的奴才。除去有良心、有抱负的，争做上级、高官不过是争做管奴才的奴才而已，不过
是方便于“下可克扣，向上可讨封赏”和封妻荫子等私利而已。
专制制度糟改人，官本位作为糟改生产线，自然放不过官员。
政治上，他不能独立思考，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他必须保持一致，否则他获得的惩罚比普通
人更重。
言论上，他更不自由，他必须比普通人更善于掩饰自己，不能被人抓住把柄。
人性上，他必须学坏。公正、正直，责任心强，走正道，不拉帮接伙，很难有官缘。不踩人，
不挤人，不搞歪门邪道玩人、耍人、害人，更是难以升官。对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来讲，
为人民服务是次要的，关键是能在官场“混下去”。否则，你什么也干不成。一个“混”字，
含义太深刻了。“混世魔王”可能就是民间送给大小金字塔顶端之核心、一把手的。
生活上，官员在位时有保障，一旦遭贬了、不受信任、离退休了，则收入福利等有如两重天。
不满足“落后”、不甘心“倒退”，贪污、受贿、腐败等便猛捞又有被“法办”、“党办（党内
警告、处分一类的）”危险。其实，对很多官员、国有企业家等来说，不论在位或退位，如果

其人生价值、工作能力，包括政治信仰等能够得到正常承认，如果其基本人权能够得到法律

保障（而不是“没官一身‘轻’，树倒猢猻散”式人治保障），他们一般是不会走入腐败、堕

落、毁灭、的绝境的，没有必要嘛。但该你的不给你，自己拿了就是犯罪、腐败，此类制度

害了多少企业家、党政干部。本质上讲，“59现象”不是当事人之错，而是独裁专制制度没

有正常保证其权益、人权之错。

而且“鼓励腐败与反腐败”都是看好官吏、固守其帝制帝位的好方法。只要“讲政治，讲大

局，讲稳定，护核心”，不反政权、不反党、不反现行体制、不反核心，“违法乱纪，腐败”

便不必讲了。皇帝上级们是不怕贪污腐败的，有些罪大恶极的，他们还要保。那些钱财，谁

“拿”去都一样，反正没出国，随时可以“法办、党办”收回来。而且，他们不仅会把腐败

一类的东西当作奖励部下的一个手段，还会将其作为控制部下的手段。官员有腐败，有劣迹，

有欺民违法行为，才易于控制他，威胁他，他才会感谢我皇恩浩荡，拜倒于不斩之恩，才会

死心塌地地卖命。一旦有抗上苗头了，有民怨沸腾危及政权稳定了，正好避开主要矛盾，抖

包袱、问罪，安抚天下，安稳政权。相反，如果一些官员清正廉洁了，则也同时具备了傲物

抗上的资本，反倒不好控制了。（至于皇帝以下的上级，多收一些腐败者的礼品，更是心理无

负担。拿别人、公家、集体的财富送礼，这谁不会，这官也好当了）。民主与法治，有“法网

恢恢”一说，对独裁专制人治而言，“人网恢恢，皇权无边”。

社会地位上，如果说大众是父母官体系的子民，那么父母官体系里一级级下级则是一级级上

级的孙子。不做孙子，不得生存于官场，从而也无法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标和其他价值。

可能只有皇帝等独裁专制主一人不必做孙子，丞相也不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孙子。

不会做孙子，便要倒霉。据记载，明朝丞相有时被“当庭杖打”，而且还有“君打臣不羞”麻

痹、戏弄他。各级官员犯错了，或者遭诬陷，或仅仅是皇帝不高兴了，则不仅自身难保，还

会株连九族，惨遭灭门。人们往往羡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须知还有“一人获罪，全

族遭殃”。最后，即使是皇帝皇族也难以幸免于难，王朝更迭使他们不仅死无完尸，甚至祖坟

被挖、尸体遭鞭。

中国民谚“今世为官，下世为牛马”是有道理的，不是为官者还有下世做牛马的机会，而是

“一朝君子一朝臣”的人治制度使然：他的前人或者后代无疑会在权力争夺、倾轧和王朝更

迭中“受伤”。相反，平平安安做平头百姓，与世无争则最安全，无后世做牛马之忧。所以，

虽然贪官污吏害人害己、害国家害社会，但他们自己也是独裁专制制度的受害者。最大的官

一皇帝，也会是他及祖先曾经赖以荣耀的独裁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帝制帝位既存，即使不算

人民起义、反抗，也会有觊觎者，他们终究有一天会遭推翻、干掉。他们生前侵犯他人人权，

死后则难保自己人权。

古往今来，在任皇帝自杀者有之，祖坟被掘者有之，其满朝文武尽招斩灭或四散逃命者有之。

可以说，帝制帝位产生帝王，伴君如伴虎，实乃帝制帝位如狼似虎，而且帝王最终也将遭损

于帝制帝位胎生之改朝换代、王朝循环。

（10）还有地方权、地域权、民族权等。前面的城市权实际是地方权，但当今中国各省市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地区、县等的三级地方权，实际与均属于其上级所有，如人事任免、

长远发展规划，乃至重大企业走向、上市等，最后归于中央集权与一个领导集体、一个核心、

总代表。

各级党政机关、官员没有一点自治权，都是总代表派驻的地方代表，最大任务是巩固总代表

地位。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也同出一辙，无权可言。各地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等，必须经中央审批。你不请示中央，不经中央批准，自作主张，发展地方经济，造福人民，

也是不允许的，要惹祸的。如北京市曾经提出了“大手笔，大思路，大开放，大发展”一类

的发展措施，由于“未经中央批准”，便受到批评。这样的事情，全国太多了。中央免张罢李，

就是自己不引咎辞职。

学术界认为，唐宋变革期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南方地区，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自存性地方

精英集团，他们是明清缙绅阶层的雏形。他们掌握了地方的主要经济政治资源，但不如前代

那般关注在全国政治中建功立业，而是更注意地方安定与家族的进德延嗣。事实上，这是历

代统治者大忌。

他们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如联邦制，既能保持国家统一，又能鼓励地方加速发展。他们只看

到了政权离心倾向，并且不惜毁坏地方稳定与繁荣，也要迫使地方归顺，保持一致。方法很

多，主要是制造内讧、窝里反、一盘散沙等效果，削弱地方势力。汉代“推恩法”已经有了

升级版。如将主要领导人或异地做官，或上调中央，到人大、政协做官（实际类似于养老，

毫无实权可言），或者“掺沙子”，或提拔年青接班人，以分解、架空、瓦解其势力。又如挑

起地区矛盾，玩弄什么政策倾斜把戏，如西部开发等，以牵制各地。又如制造危机，以打台

湾、反对侵略等，制造凝聚力，形成虚假的上下一心局面。

3、保持一致是剃刀

（1）一切权力集于一个总代表，必定形成统治特权。它必定侵害人权。这

一是指寻求做总代表的过程中，他等必定践踏人权，二是指做了总代表，必定继续损害人权，三是指为

了巩固总代表地位，他等必须损害人权。

坏事没人问，好事有人抢。总也不能做主。一有好事，便被代表了。你说烦不烦？强行代表，

就是强奸民意，就是剥夺人民，就是特权吃人权，就是强行祸国殃民。

如今，六四当局为了“万千权威集一身”，抛出了什么“三个代表”身份。出其左右者，争夺

群众，安个恶名，揭批，取缔，斩！历朝历代历核心，均不喜欢帝制帝位帝王以外的任何势

力享有独立平等的社会地位。他们对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各事、各民族、各干部、各人

的评价标准是：“政治上坚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以此确保

其中央集权与总代表、核心地位。

有了三个代表、总代表，宪法、法律、军队、执法部门、人民团体、人大政协、政党、行业

协会、人权等，都无法挺起脊梁做事、做人。它喜欢对任何人、任何事物说：“别管了，放心

吧，我戒严了，我是三个代表，我总代表了。你们坚持四项，争做四有新人（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就可以了。”

别不识相，把你们各民主党派、各宗教团体、专业人士、社会闻达、知名人士、老等装进“人

大、政协”，国家出钱养起来，有荣誉，有地位，有实惠，也有一些特权，就不错了。什么神

权、宗教权、贵族权、法权、执法权、军人权、工会权、农会权、高干权、精英权、经济权、

科技权、知识文化权、舆论权、言论权、出版权、知情权、思想权、政党权、民族权、地区

地域权等，以及总工程师、总经济师、工会主席、妇联主任、人大政协和一府两院领导人、

科学家、作家、文化明星、体育明星、住持、主教、司令员、公安局长、武警、专栏记者、

行业领导人、青春偶像、研究学会、社团协会等各方面的专家、权威、领袖权等，必须匍匐

于他们总代表脚下，必须被“器变道不变，王朝不改姓、换党，江山不变色”的“两手抓”

抓住、抓掉。

他们都是异动势力、异己分子、大毒草，是另类，必须把它们纳入“主权在王，在党，在核

心，在个人”的家国党国的家长控制之下，或者能够为官本位一元化独裁专制中央集权所用。

否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或者批倒批臭，或者关进监狱、流放，或者消灭他们。罪名多

啦。创立民主中国是全盘西化，是邪路。法轮功是邪教，台湾民主化是台独。要求高度自治

是分化分子、分裂分子。西藏高度自治是藏独，还有疆独。哼，民运分子是西化分子，实与

汉奸卖国贼无异耳。

那些地方自治权、民族自治权等更是名存实亡，流于形式，一切党委说了算。官员任免权、

经济权、军权、文化权、舆论权、对外发展联络权等，都是中央说了算。地方实力派，不是

被“办掉”，就是“上调中央”被架空，反正不许“长大，坐大”。你有能力，想为当地干点

事业，很困难，得了民心，就是有“异心，野心，异志”，就得罪了“党心，党中央，总书记，

皇帝”。只有不主动干事，“党中央，皇上”说干什么，有什么文件，按文件、指示等办事，

忠实执行“党的，皇上的”文件、方针，就是好干部，好样的，保证官运亨通。在统治当局眼里，将帅、大臣、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未成年儿童权、企业家、士人、

文化人、科技者、外戚、强女人、政党、宗教、团体、地方、民族等一切都可能从皇权等中

央集权分离出去，搞对立、对抗，甚至取而代之。他们太可怕了，也许宫女、阉人等宫人也

不那么安全、有乐，他们不仅要富裕，还想要人权，要江山。你们有人权、江山了，我的特权、江山，往哪儿搁？这不是社会黑势力、恶势力吗！不得了哇，他们嘀咕，每一次人民起义都源于“黑社会、土匪、会党、红匪、共匪、秘密组织、邪教”等势力。他们从不认可“以德抗位，造反有理”，从不认为任何黑社会最初都是直指统治当局的，从不认为真正的黑社会势力，许多也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是“社会弱势群体，无权者在现行法律以外寻求自己权力”的结果，是“被官本位主流社会抛弃者的自觉、自救、自护、自强”。

相反，他们认为凡是不愿意被他们强行代表而愿意自选代表的，都是社会恶势力、异动势力等，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为此，当局捏造一个个替身，栽赃、摸黑，搞臭他们，麻痹、诓骗全国人民予以“毫不留情”的沉重打击。国民党时期，这个替身是共产党、“共匪”。文革期间，尽管此前此后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均不发达，但他们把凡是不符合其保持一致原则的，都贴上“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标签，予以猛打。现在，他们又发明了“黄黑势力、非法组织、邪教”等替身。

什么自由天赋，民主天赋，人权天赋，什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皇帝，我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利益才是鉴别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总代表。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我代表你了。你找别人代表，不行，那是违法，违反了四项凡是迷信。别人主动代表你，是拉拢群众，与党争夺群众，是大逆不道，要法办他，搞臭他。你自己代表自己，自己投选票，没门，你素质太低，你们不可能不被坏人利用。我主动代表你，是爱护你，别不识好歹。

中国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经济生活中历来有专营一词。如盐、铁、烟、酒、茶、矾、香料、药材等类专营。有些还延续至今。其实，作为统治者的总代表，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民各项权利的总专营。他们专营一切，专营天下，专营国家政权！他们专营国家军队，专营内政外交，专营各行各业之经济事业，专营人事任免，专营人民群众、臣民、党民，专营文化思想，专营媒体与舆论传播，专营言论、信仰，专营人民幸福或苦难等等。

他们专营特权吃人权！他们官本位吃民本位与资本位、为人民服务，专营少数人的绝对

个人主义（所谓集体主义）吃大众的个人主义，专营爱家国爱党国吃爱国主义。他们专营祸国殃民。

他们说中国不是自由市场，东方文明将集体性、党性，讲规矩，决不允许这些专营权受到争夺、挑战，决不允许他人、他党染指、参与、分享，形成自由化、多元化、多样化格局。

与人民对立的出发点，铁拳把握笔杆子与枪杆子，控制、愚弄、围剿、揭批、镇压等极权与

暴力恐怖手段，是其祖传专营思路与工具。可以说，独裁专制统治就是少数人专营国家、人

民和民族，乃至文明，就是独占独有、独治、独享，与民有、民治、民享等民主原则完全背

道而驰。它是任何家国、党国、核心国的必然走向，任何形式、名目的独裁专制统治都是为

了维护其专营权。

可是，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为什么会引起全社会广泛参与？因为人民始终不愿意中国、

中华民族与文明等被专营，不愿意自己的各项权利被专营。人民愿意自营，或者愿意委托经

营，或者以股份制等各种形式搞联营、合作经营，愿意自己代表自己，愿意自己选举代表，

委托权力，愿意走选举议员、议会、总统等的代议制道路，而不是被独裁专制强行代表。而

且，人民不仅认为代表是民选的，受人民主权立法制约，还认为代表不是终身制的，人民会

定期收回委托、经营权，每次只给代表们一个很短的任期，并还可以依照法律提前结束代表

的任期，重新选举合适的代表。

但是，这引来了“两手抓”的六四镇压。它实际上就是继续保持“强行代表权”的一个手

段。它决不容许任何其他社会势力出其左右，分庭抗礼，鼎立存在，三权分离，哪怕是王权

分离给王爷也不行，高干权分给另一批高干也不行，太子权分给另一批太子也不行。

什么“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

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北京市民请愿团、北京市民纠察队、北京

市民工人敢死队、“北京高校民主请愿活动协调会”、北大教师后援团、北外声援委员会、新

觉悟社、香港北上学生联合会、留学生声援团、芝加哥等大陆学生后援领导小组、民运组织、

流亡组织、法轮功等，都是非法组织、伪组织，只有它不是伪政权、伪政府，是合法政府。

什么罢工、罢市、罢农、罢课、罢教、罢军、起义、游行、示威、静坐、哭跪请愿、演讲、

上书、绝食、“不自由，毋宁死”、“民主万岁”、“反对专制”、“还我民主”、通电、发表声明

与告全国同胞书、《致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捍卫新闻自由——致中共上

海市委的公开信》、全球华人大游行、中国留美学者学生联谊会联合会紧急呼吁、反对戒严、

中国保卫天安门广场誓师大会、中国知识界新闻发布会、首都各界联席会议、空校运动、海

内外声援、指责、制裁等，都是非法行动，都是干涉内政，即干涉家内之政，党内之政，是

干涉家长政治，是干涉家国与党国的家政、党政。它痛恨一切“非法组织的头头”。

它决不容许任何人或势力对它说“不”，宰相不能对皇帝说“不”，政治局常委又算什么，决

不可以对总书记等说“不”。广大人民，则更不可以对党政官本位说“不”。新闻舆论是耳目，

是喉舌，决不可以对当局说不。它拒绝人民主权立法，拒绝法治的最大要义是人民可以对官

本位说“不”，它拒绝接受人民说“不”。

（2）现在，为了巩固“总代表”地位，六四当局一方面在国际上提倡多极化、多样化，

反对霸权主义，以此回避国际社会对其践踏人权的指责，阻扰创立民主中国。另一方面，他

们却在国内大搞一极化、一元化，大搞对人民的霸权主义。实在不行了，他会无赖地说，“中

国内政，不容干涉；中国人民的事，人民不自营，我专营了，没有人委托、请你们代营，不

容你们说三道四”。笑话，六四镇压是中国人民自找的？中国民主化会影响世界多极化和多样

性？

殊不知，中华文明认为六四镇压，以武力保持一致、一元化、单极化等才是“以力服人

者霸”。殊不知，如果12亿人口的中国被单极化、一元化，被“一个核心，一个政党，一个

主义”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如果中国国内不能“多元互补”，只能“一元无补”，只能全方位

全民对一元化俯首帖耳，被单极化剃掉，那才是世界多极化、多样性的重大损失。提倡国际多极化与多样性，不是自己在国内大搞一人化、单极化、一元化强权政治；反对国

际霸权主义，不是掩护国际社会对其国内霸权主义的谴责和打击；反对“人权高于主权”，“不容干涉内政”，不是阻止人权高于独裁专制特权的借口。

为了维持一人化、一元化的一人独裁专制，中国人民被迫承受了许多统治工具，而其中，

四项基本原则则若一把大剃刀，剃掉了一切利于中国社会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萌芽，

并以“稳定”使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处于持续的严冬酷寒。如以党法剃掉国法民法，以党禁剃

掉多党政治，以报禁剃掉言论思想自由，以一个大脑活动剃掉12亿人的思考思想权力，以

一套喉舌剃掉12亿人的说话权力，以一个声音剃掉人民信息来源多元化的权力，以个人一

极化并假借政治局名义剃掉三权分离与多极化，以“组织决定”剃掉同事和亲密战友而形成

惟我独尊，以太平天国般的共产主义剃掉信仰自由与社会创新，以“党指挥枪、两手抓，党

军、王军，”剃掉军队国家化、人民化，以“国有，党有，官有，一把手有”的所谓公有制剃

掉人民真正享有的私有制，以“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剃掉“主权在民”，以虚幻的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剃掉一切现实的思想、生活与工作自由，以一人独裁专制官本位特权剃掉

人民人权，以利于党政官本位绝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剃掉利于人民的人人的相对个人主义，

以众多“凡是迷信”剃掉民主墙、“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法轮功”等。

最后，改朝换代，新总代表要求保持一致，前总代表及其政权也将被剃掉，汉剃掉了秦，

魏剃掉了汉，满清剃掉了明，国民党剃掉了满清，共产党剃掉了国民党。甚至同为社会主义

事业，但接班人也靠不住，邓小平时代剃掉了毛泽东时代，江泽民时代剃掉了邓小平时代。

江三讲遭遇剃刀，也只是早晚的事。

三个代表、总代表，就是总剃刀。它以一人独裁专制一思想一个脑子一套喉舌一个声音

对12亿人的保持一致，剃掉自由，剃掉民主，剃掉人权，剃掉任何多元化、多样化、多极

化。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专制统治的主体哲学是斗争，它只有斗争掉、运动掉、剃掉非一致、非符

合一元化、一样化、一极化的，才能了却独裁专制心愿。剃掉旁的，无非是要保持全社会对

一个中心的臣服与凝聚力，维持帝位、帝制。而且，如同这样的帝制使中国成为封建皇帝的

土围子，它也使中国各地各级各单位各井田各土围子里产生了大小不一的土皇帝，他们接帮

拉伙，贪污腐败，以官本位特权危害人民人权。

什么总代表！《洪湖赤卫队》唱得好：他是人间强盗头。

不要忘记毛泽东主席对总代表、专营商的断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把“阎

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

为“鬼神系统（神权）”。认为这种神权累加政权、族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

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但是岂止于此，中国皇权男权等本

位又老朽发新芽，它发展出了党权、核心权，发展出了临时支部、支部、总支、党委、党组、

党的领导小组等党权、党政权等党本位、官本位，始终惟我独尊，不容异己，对什么都不宽

容，它动用一切手段把一切社会力量完全纳入、“归顺”其绝对控制、专营之下。

其朝廷与国家机器、长城等的最首要功能是保持警惕、“两手抓”，加强思想禁锢或者称为

思想政治工作，对社会和人民保持压力或镇压，加强统治者帝力，剪除一切异动势力，保持

一致，使一切因为顺从而与其保持一致。统一战线最初本来是民主政治的一个表现形式，最

后也因“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而成了独裁专制统治的一个工具，用它把一切社会势力统一

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之下，从而使自己成为“各种党派、民意、思想”的总代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独裁专制政权总是喜欢自封为“总代表”，

喜欢专营。它是一切神权、宗教权、家族宗族权、元老权、贵族权、女权、知识权、军人权、

工会农会、各行会团体的总代表，是一切社会资源、财产、一切金库的总代表！是一切自主、

自治、自由、人权的总代表！它还是一切人民利益的代表！它是三个代表！是总专营！知识

权等其他一切本位权力都是我的儿孙，都在它之下！都只能因为服从它的代表而存在。这也

是“大政府，小社会”长期困扰中国的原因，它的根子在于“皇权党权特权大，人权小”，在

于“官大民小”，在于“中央大，地方小”，在于家国里“皇帝是国家民族的代表”，在于党国

里“个人和党是国家民族的唯一代表”。

在中国，“代表”由于独裁专制统治而含义变味了。除了战争民主的自然选择，除了人民用刀枪炮弹和血肉选举，帮助建立一个新政权，它不用被代表者推举，无需被代表者选举，更无需被代表者定期定事质询、听政、考核、变更、罢免。它是一次成功上台执政或被推举，则“终身享用，万代不变”。最后，它是强权者或者窃权者想代表谁，就代表谁。是代表者是老爷子，高高在上；是被代表者是儿子、孙子，必须“尊老守孝”。

它随时可以让一切社会异动人物、异动势力与我总代表“保持一致”。的确，中国是各方面被迫“保持一致”的国家！什么平等，什么自由，什么民主，什么选择，什么人权，人民与各行各业各项事业，包括国家统一事业，必须与独裁专制体制保持一致，必须与独裁专制权威保持一致，必须与独裁专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个一致不是平起平坐的一致，不是对等的一致，不是横向的一致，不是主权在民的保持一致，不是多极化的一致，而是上下有序的一致，是尊卑有别的一致，是纵向的一致，是与上面保持一致，与领导保持一致，与权威保持一致，与党政官本位权力保持一致，是“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的保持一致，是一极化的一致，是不许超越的一致。

天哪，12亿人不能独立思考，要装做哑巴，对一个人、一个党、一个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多么费劲！又多么了不起！而又以践踏多少多少创新、多少进步、多少生产力、多少人权为代价？为了保持一致，与一个人、一个中央保持一致，周恩来等多少人说了违心话。问题是，这样逼良为娼、说违心话的土壤与机制，如党内、国家与社会制度等，还在中国横行霸道。

“保持一致”是独裁专制患有强迫症的表现，也是一把剃刀！独裁专制理念下，自由民主显然是异动势力，必须被保持一致掉。官本位特权盛行下，人权等任何其他权力的“横行”或盛行显然是异动势力，必须被保持一致掉。那民主台湾，当然也是大陆独裁专制统治的异动势力，必须被大陆独裁专制政体统一、保持一致，被“一个中国”，谁想以台湾民主化为样板，搞什么“一个中国，民主中国”，是妄想。不能这样，不能一方面在国际上高举多极化大旗，另一方面却在国内推行绝对的一极化；不

能要求世界文化多样化，却禁锢国内文化为单一化；不能要求国际权力分散，而自己却在国内大权独揽。而是应该，独裁专制向自由民主保持一致，官本位特权向人权保持一致！“官权、官本位”不是是万能的，它不能统管女权、子权、青少年儿童权、神权、贵族与高干权、宗教权、工会权、财富经济权、资本权、科技知识文化权、思想权、知情权、经书解释权、政党权、地方权等，不能扼杀商业本位、经济本位、资本本位、金钱本位、个人本位、女人本位、神本位、科技本位、文化本位或主义等本位，不能以官本位、官权等衡量一切，使一切向其坐标体系靠拢、称臣，才能找准位置、获得尊严，实现价值，如副省级院士、处级和尚、部级秘书等。

在过去中国，一切只能因为服务于皇权而重要，最重要的是皇权利益！在当今中国，一切只能因为服务于党权重要，唯一最重要的是一人一票独裁专制利益！在个人个党的独裁专制利益下，一切只能因为有被奴役的资格才能重要！一切因为具有奴才地位才重要！脱离这个奴才框框而“以天下为己任”者，必定倒霉！这是家国、族国、党国，是家天下、党天下，你们胆敢视它们为“己任”？吃了豹子胆？想翻天？

中国长期的这种皇权官本位金字塔式的一元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其成因常常被归结为文化同化力和统一力，其实它更多的是“一山不容二虎，皇权不容二主”的独裁专制力所致。统治，继续统治；独裁专制，继续独裁专制；垄断，继续垄断，把一切财产与权力归于皇帝，把一切掌握在官府党府。没办法，几千年来，中国的独裁专制政权最大的政治就是皇权官本位至少，它利用国家机器镇压一切异己，打压一切自由精神、独立人格、民主浪潮和人权至上思想。两个凡是、四项、六四、镇压法轮功、三讲等不过是其具体表现形式。

所有的国家资源和综合国力的最大使命是维护独裁专制制度，各具特色的经学与主义等意识形态都为掩护独裁专制制度服务。与它站在一起，保持一致，就能一帆风顺，混口饭吃，混好了还能封妻荫子；不与它为伍，只能独享清福清高，成为社会边缘人，或者退隐流亡，或者“被历史的车轮轧得粉碎”。经济发展必须益于稳定、巩固独裁专制统治，所以银行的贷

款几乎由党有国有企业包揽等。科学知识也必须益于独裁专制，否则难以发展，如中国社会科学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几经变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随时可以为满足独裁专制理念，而得到发展、创新以适合所谓“中国特色”的。历史上的儒学、佛教等地位通常较高，但一旦碍事，与独裁专制统治蛮拧、叫劲，它们的命运就是“焚书坑儒”和火烧寺庙之类的悲惨。道教、气功、慈善事业等允许被用作逃避现实、救助苦难的领地，六四后全民“练气功，不闹事，不参与政治”是利于“稳定”的，是允许的，是要提倡的，甚至不惜封级别，花钱买稳定。但法轮功等“围攻中南海，参与政治”是必须被取缔的，是必须被严密监视、蹲监狱的，或者流亡海外被通缉的。

据说，清初以后，满清统治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疑心“洋人支援汉人造反”，才拒绝传教士、拒绝科技交流、拒绝通商和外资进入中国、拒绝改革开放的，才闭关锁国的。和平演变太可怕！这与“多一个外资企业，多一个资本主义”是一致的，这与“谁卖武器给台湾，谁与台湾保持官方往来，谁接待达赖喇嘛，谁善待中国民主力量，谁就是王八蛋”是一致的，这与坚决反对“人道主义干涉，人权高于主权”是一致的。

现在，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两手抓”，一方面积极加入WTO，增强统治实力，另一方面又拼命“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教育教化、巩固四项四个凡是、大搞三讲”等，防止“资本主义势力入侵”，防止“和平演变”，防止“器变道亦变了”，丢掉帝制帝位。独裁专制者们很矛盾，很叶公好龙，既希望引进资本主义积聚物质力量帮助统治，又害怕随引进而跟进一些“苍蝇”等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精神污染，又害怕资本主义天生需要并制造、传播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精神“演变”其统治根基。退，人民不答应，进，自己不舒服，他们只好把“两手抓”当救命草，硬着头皮往前走。但他们也忘记了，“两手抓”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不过是百年前满清对抗国内外“资本主义入侵”的“器变道不变”的变体，就是“中为体，西为用”的变体，是对“根红苗正，又红又专”的继承，是“红专两手抓，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

封建独裁专制者的“中”是什么？就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党政官本位对人民民族国家独裁专制的“道统”，就是现在的四项四个凡是。那么，我们也都不要忘记王夫子的“道不离器”和谭嗣同“器既变，道安得不变”的怒吼，他们虽然死了，而满清就是最终在坚守“器变道不变”的顽固保守和“器既变，道安得不变”的必然前进中垮台的，连个君主立宪也没“混上”，使王爷序列彻底让位于党贵序列。

中国社会一直不存在女权本位、神权本位、宗教权本位、财富经济权本位、资本主义、文化科技本位等与皇权、夫权、父权、党政官权等官本位平等、对立、制衡，故而中国的民主基因才如此隐性，故而中国才“皇帝官等个人不容，党不容，则法难容，民难容，社会难容，国家难容”，故而中国的制度与物质现代化才如此艰难，所以中国人权事业才如此艰难。故而本世纪以来，国共两党的历次争斗，两党各自的一次又一次的“我党通过激烈的路线斗争，又达到了空前团结，高度统一，紧密团结在核心周围，一致同意，一致通过，保持一致”，这“诛灭异己，唯我独尊”，获得最后专营权的做法，与皇权等官本位独裁专制权欺负女权、神权、宗教权、民权等，是实质上的一脉相承。

他们不容异姓，不容异性，不容异己，不容在野党，不容反对党，一些手段较之“杯酒释兵权”残酷百倍。迄止今天，在表面“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而实质上维护独裁专制的旗帜下，在维护帝制的欲望下，古有“剪灭异姓诸侯王，剪灭同姓诸侯王”，今有“剪灭反对党，剪灭同党反对派”。华夏大地上，这古往今来的剪灭一切社会“异动势力”，这讨伐异己，酿成了多少中国悲剧？浪费了多少综合国力？中国还经得起帝力的折腾吗？还经得起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折腾吗？

有时候，一些貌似“分裂势力，或者干扰（独裁专制）社会正常秩序的异动势力”，实际上堪称为中国民主的先锋。在美洲和欧亚大陆两端，一个由众多国家组成的欧盟，一个由众多州组成的联邦制国家，富于我们由众多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组成的中国，这不是偶然现象。很简单，由自由人组成的国家，必然强大于由奴隶（或者充满人身依附关系）组成的国家。幸

亏中国现在有一个民主台湾！她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抹人权彩霞！我们能让自由民主牺牲于独裁专制吗？能让人权至尊归顺特权至上吗？能容忍民主台湾被大陆独裁专制总代表吗？

一部《西游记》表明，玉皇大帝系列是至高无上的，佛祖等与其配合默契，从无翻脸，从无矛盾。可怜的孙悟空等虽一身正气，现在的话叫“主持正义，解放自由民主，保障人权”，或者叫“妄图充当世界警察，大搞霸权主义，不尊重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从事颠覆活动”，但总是倒霉，或者称为“磨练”、“修炼”，是上层次的必要阶段，就那命。

他们拥有各种本领、各种权利，但总是“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魑魅魍魉怎么它就这么多”，没完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些妖魔都来自官本位体系，可以由权大于法的老领导说项，获得法外施恩而免罪，有些本身就是高官。孙悟空等即使拥尽天下的武功、佛家正义与文化功夫，懂科技、有产业、知晓天下事，能说会道，不让他们在民间做妖魔，他们还能返回官本位的天庭继续做官。相反，孙悟空们还经常被念“紧箍咒”，被八分钱邮票等折腾得够戗。这个社会真是不公正！当然，一部《西游记》能传诵至今，绝对也是人民总希望有个孙悟空能出来主持正义，把“妖魔鬼怪”、天庭等吃人世界“砸个稀巴烂”，所以才有连绵不断的农民战争，所以文革流行“金猴奋起千钧棒”，所以王塑、张艺谋、崔健、金庸等作品、武侠小说才倍受欢迎，他们是当代吴承恩嘛。可惜的是，孙悟空痛痛快快砸乱旧世界，并没有成功建立一个新世界；毛泽东、共产党曾经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运动起来了，但不确立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仅把希望寄托于好皇帝、清官、好的党组织等，中国人民还将囿于官僚主义阶级统治的旧世界中。可以相信的是，中国人民还将不满足于砸毁独裁专制旧世界，我们将上层次，建立一个人民主权立法保障自由民主之人权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续写《西游记》，直到人权至尊，保民护国！不怕慢，就怕站，中国的独裁专制总想站，总企图多赖几程。仅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中，我们就可以罗列一系列以皇帝为首的官本位独裁专制特权对社会其他本位人权的竭

力扼杀，如剿灭太平天国、白莲教等，镇压戊戌变法、追杀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复辟等，国民党剿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镇压地富反坏右等，控制为伪假议会的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右运动与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两个凡是，镇压民主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精神污染，做好老干部工作、老干部退位，学校教育教化的与军队整编，整肃经济界人士，所谓（太子党）清除太子党，六四镇压和取缔法轮功，四项与三讲等。这些都是少数独裁专制者对绝大多数人民搞“阶级斗争”的继续。

王朝政权时代换了几茬，主义都不错，民主旗号也从旧到新很堂皇，各有“特色”，干的事也不少，但最大目的只有一个：维护个人个体对全民全国的独裁专制。它就是“阶级斗争”，就是坚决维护以皇帝等党政官本位为主流统治地位的、对所有其他人民和社会团体的阶级斗争。它几乎镇压了所有其他本位的自由民主权力，如农民本位的，宗教本位的，贵族与高干本位的，武装力量本位的，政党本位的，经济与知识科技本位的，所有人民本位的，所有非独裁专制本位的，等等。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吗？“中国特色”不是维持独裁专制的借口。不分种族、肤色、地域、文化背景等，所有人生而平等，人权就是人权，就是人民主权立法，就是公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权利，就是生存、发展权利，怎么还会冒出一个“特色人权”呢？“特色人权”不是特权至上，不是不尊重、不保障人权，不是破坏、践踏人权。

（3）总之，历史上，王侯也好，将相也好，元老也好，宗族势力也好，工商行会、工会、农会等势力也好，士人势力也好，等等，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势力如果能够早些彼此民主，早些承认内部差异而分裂为多地域民主、多民族民主和多党民主，如果包括被“释权、清君侧”等在内的全体人民早些觉醒民主意识，并发展到以人民主权立法“保护异己”，做到“我决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拼死保护你说话的权力”，那中国历史书里不会有那样多的蔑称，如阉党专权、外戚专权、反党分子、反党集团等。这些所谓王朝之祸、党国之祸，本可以是
中国自由民主之推动力量的。

果如此，那么中国绝对不是今天的中国，那世界人权事业也决不会天天为地球上还有 12

亿人处在独裁专制之下而黯然神伤，愤愤不平，开会、提案、会谈、对话，那中国也可以挥

动人权之剑主持正义了，“推行‘人权高于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我们知道要求过去是痴人

说梦，但我们分析过去是为了现在与未来。至少，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吧！

（必须说明，我们讨论分析宗教权、神权、女权、市民权、经济权、知识产权、政党权等在中

国独裁专制官本位下无地位，不是批评、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不是无视历史，而是说如果

中国历史上的官本位对这些“权”宽容一些，那即使民主中国不是建立了，中国的民主环境

肯定要比现在好一些。）

不至于王制统治西欧 500 年，而秦制迄今统治中国已达 2200 多年；不至于国民党镇

压共产党、六四镇压、对法轮功的镇压、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还会在公元 2000 年左右

出现；不至于还有什么核心、接班人等古典名词活跃于现代中国社会；等等。

当然，也许所有皇帝官本位以外的其他本位权都曾经对人民十分凶狠，它们得势时也是不

容异己，“巾帼也不让须眉”。如晚年武则天的一大心病就是如何把皇位传给她的武姓侄儿。

它们也从不同角度践踏过普通人民的人权。而政教合一等则更为可怕！现在的中国一党独裁

专制和意识形态至上其实就是政教合一。不过，它这个宗教不是人民自愿接受、信仰的。但

是无论如何，有了那些社会权力或权势与皇帝官本位平等、对立、钳制等的同时存在，有了

它们间的竞争，则无益是利于人民“渔翁得利”的，是利于人民人权进步的。

这就是市场政治与自由政治，而不是独裁专制与寡头垄断政治，它象市场阶级与自由经济

而不是寡头垄断经济。即使有政府干预，有新经济政策，也是为了保持自由不受到干预而干

预，保持市场不被寡头垄断而干预，保持人民与国家不被执政者或统治者独占而干预。这市

场阶级与市场政治，无疑是利于消费者和人民的。它利于人民选择，并最终利于人民控制它，

把握它，指挥它，利于资源合理配置和选票控制下的政治走向和人权进步。

我们从不否定独裁专制体制时期的中华文明，但近现代以来，排斥一切权力，以皇帝为首

的官本位独裁专制一元单极体系，能够担当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重任吗？独裁专制没有误国

误民吗？时代不同了，汉代中国不是现代中国，汉代世界不是现代世界。独裁专制创造文明

的时代已经过去，自由民主的人权战车无与伦比，独裁专制者不能永远把中国各地各行各业

与广大人民的正常要求与发展敌对为“异动”，中国不能因为“文景之治”等曾经伟大而坚持

独裁专制政治体制，更不能关闭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大门。我们向前进，我们需要“器变道亦

变”的两手抓，一手抓人权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社会异动势力有天赋生存权力，私人财

产不得剥夺，自由不得剥夺，人权不得剥夺！

显然，如果不坚持自由民主与人权，如果不实行人民主权立法的法治，即使“党的基本路线

100年不变”能够保证100年不变，那100年以后也会变。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

要预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社会的诸多异动势力必将一如既往，仍然与独裁

专制体制持续对抗。这是人性与人类进步使然！

迄今为止，中国以及各路仁人志士，已经尝试了“各种救国、兴国”方略，但独裁专制

把持下，科技、实业、军事、教育、体育、强人等一切只能望“救国、兴国”兴叹，它们的

爱国能力受落后的帝制帝位制度阻碍、剃掉，很难开创、兴盛出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现代化

中国。但是，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

中国只有破除总代表、强行代表，破除一党制、终身制、一元化、保持一致制、独裁专制

统治制度，只有不辞任何推动社会前进的“异己、异动势力”，只有确立议会民主制、多党制、

任期制、自由选举制、多元化、自由民主化，只有建立“主权在民，在全体人民”而非“在

王，在党，在个人”的民主制度，保障人权，才能富民强国。

人权，也只有人权才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人权革命，只有人权至上，只有确立人民主权立法

的自由民主中国，只有人权兴国，才能铸造现代化中国！

人权兴中国！

4、谁以公有窃取私有，以集体窃取个人

诸般强行代表的结果是什么？

是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等没有了，是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被集中霸占了，是

决不允许以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破坏中国特色与国情。

就此，统治者发展出一套好词，以道貌岸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国家主权高于人权，共产主义觉悟，为人民服务，做内奴比做外奴好，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等控制人民。

字面上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很好，共产主义理想很好。但不是说掌握公共权力的党政官本位可以率先进入，并等级森严，独自享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好处，大众却沦为群众、奴仆。

让我们剥开这些虚伪的画皮。

（1）中国统治者们还常常试图借世界文化多样化、国际政治“多极化”等证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的合理性，搪塞其腐朽落后性，抵制创立“一个中国，民主中国”。可笑，好象少了帝制帝位帝王，世界就不能多样化、多极化了。比较一下吧，民主的一大信条是“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这才是是多样化、多极化。恰恰相反，独裁专制统治的一大特征是“求同灭异，保持一致”，不允许反对意见存在，不允许反对派、反对党存活，它奉行“顺我者活，逆我者死，如果我不同意，你必须闭嘴，或者滚蛋，或者蹲监狱，或者死”。

中国一位民营企业老板通过对中央电视台的细致观察，对我讲了他耐人寻味的比较。他说克林顿总统访华去北京大学演讲时，一位学生问他“如果有人到白宫外面游行反对你，你怎么办？”克氏笑而答到：“那表明他们对我有意见，那我会把他们请进来，谈一谈。”

台下一片掌声。但是，话锋一转，这位从官场下海的民营老板立马谈到了江泽总书记。他说，此前在江主席访问美国某个城市的宴会上，一位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外面的一浪接一浪的抗议声。他也是笑而答到：“我71岁了，耳朵很尖锐……我唯一的办法是我的声音比他还高”、“我只好提高嗓门，用更高的声音把他们压下去，盖过他们……”等等，并非常做作、得意地笑了起来。

正是高声音的六四镇压成全了他之帝欲。如果说声音有重量，但作为政治家，他这番话无疑属于最轻的一类，因为他轻视了民心民意。他是一只霸道个公鸡，只许自己吓叫，不许他人

报晓。在外国，他等提高嗓门，用嘴巴说话。在国内，他等提高什么，用什么对付人民的不

满、抗议、请愿、上访和持不同政见者呢？肯定比提高嗓门更可怕的剥夺财产、言论等自

由，秘密监控、武力镇压、恐怖统治、两手抓、办学习班、揭批等。这是他等独裁专制暴政

思维的再一次暴露。

而追溯过去，世界至少不会忘记是谁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制造了1989年“4·20

血案”和“4·22哭跪请愿，政府不理”的悲剧，是谁以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

反对动乱》拒不协商对话，是谁对全国人民持续了50余天的大游行大请愿不予理会，是谁

对全球华人大游行不予理会，是谁对世界民主浪潮不予理会，是谁以戒严封杀中国人民发出

的“我们再也无法沉默了”的声援，是谁最后以六四镇压回答了全国人民的请愿。

如今，在现实中国社会生活中，他确实提高了嗓门，并且越来越高，全国媒体都是他的嗓

门，他的喉舌。他三讲，强化“两手抓”，全面加强了维护其帝制帝位的政治思想禁锢，他越

来越有帝国皇帝的派头了，而中国人权状况则每况愈下。

他再次使12亿中国人民只有一套喉舌！

他再次使中国只有一种声音！

他再次使中国成为“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家！

12亿人必须听命于12亿分之一！难道这就是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带给世界的多

样化和多极化吗？国内国际，这是和平共处，还是无耻的霸权主义？和平共处，首先应该是

国内各团体、组织、政党、个人等能和平共处。有了独裁专制统治这类“物种”横行，世界

还能多样化吗？多样化不是独裁专制统治拒绝成为古董陈列的借口，多极化并不表明一人一

党独裁专制可以长存于世，继续党尊民贱、党尊国贱。相反，“使一切单一化，保持一致”，

正是任何形式独裁专制统治的天然劣根。面对世界人权大潮，我们不能感叹，当民主制度使

世界多样化、多极化得到充分保障的同时，中国人民却被独裁专制统治为单一化、一极化、

一党制、终身制。

两个国家，两个总统。一种提问，两种回答。独裁专制统治文明和人权文明。这是一个非常

经典、精辟的对比，它跨越大洋、时空，却把各自的精髓或底牌本性暴露无遗，宽容和霸道，

理解和蛮横，大气和狭隘，美和丑，自由民主和独裁专制，尊重人权和反人权，无耻和高尚……，多么栩栩如生的对比，好象两个观念在同台竞赛，孰优孰劣，一眼便知。这是一名普通中国人对世界人权事务的观察与理解，可谓相知无远近，人权万里有知音。我非常兴奋，倍受鼓舞，我由衷感谢他。这表明中国人民没有因为六四镇压而失去思考，没有无所事事、无追求，人权历史没有停止它在中国的前进步伐。相反，不管哪个阶层，中国人民正时时刻刻关注着中国人权事业，创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一点也不孤独。

（2）中国统治者还常常以“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搪塞海内外对其破坏人权的指责，说什么这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和人权。

但是，集体人权不是剥夺个人人权。没有个人的充分人权，也不会有真正充分的集体人权。国家与集体利益来自个人利益，集体人权来自个人人权，公共意志来自个人意志，公共权力来自个人权力的让度，国家主权来自个人人权的整合，政府权力来自个人委托。经过了这许多真正通过人民自由投票选举而“来自个人”，才能产生真正的集体人权、公共意志、公共权力、国家主权和政府权力等，否则就是自称的、僭越的、强加给人民的伪代表人民的党、伪人民政府。当局反对利于大多数人之人权的私有制，不过是以公有制保护利于其少数人之特权的私有制罢了。通常，他们剥夺个人人权的一个口号是“国家与集体利益至上，反对个人主义”，借此收缴个人人权而将其转换、集中为所谓集体人权，并以一言堂、一党制、终身制、党政官本位、一把手等帝制帝位帝王下的集体制、公有制为“人权—特权转换服务器”，将集体、公有、国有等嬗变为党有制、官有制、皇帝等一把手所有制。独裁专制制度提供了黑箱操作舞台，他们可在各级各地各单位各事各财产与资源上，轻而易举地狸猫换太子，把公有制等嬗变为利于自己的私有制，尤其是一把手私有制与官本位私有制。想一想中国现实，哪个单位不是一言堂剥夺了大家的发言权，党的总书记大权独揽是不是剥夺了所有党员的发言权？一个共产党是不是剥夺了所有其他党派的参政、执政权？国家各级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单位等社会财产、资源、机会等，包括、政权、党组织等，是否相

当于大小一把手个人的？在一个当权者可以用集体性质的公款包养情人等的公款私用无孔不入的社会里，被剥夺了个人人权的普通人民还有什么集体人权可言？基层人民便捷的收益就是看着自己的女儿、姐妹或者自身傍上一个官人，沦为情人、二奶、三奶、二房、三房等，以此分享一些外溢的所谓集体人权。还有一些人则铤而走险，沦为罪犯，或者流落街头、海外。

任何变体变态的帝制帝位统治，绝不会胎生真正的“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只有独裁专制者绝对的个人人权绝对地高于人民的集体人权、党权、国权、地区权和族权等。民主集中制往往就是集中制、特权制，对大多数人财产的公有制就是成全少数人的私有制，对大多数人生活生产的计划化就是成全少数人的自由化，对大多数人的言论限制和报禁、媒体管制等就是成全个人个体的一言堂，对大多数人的思想指导就是成全少数人的思想专制，对大多数人的思想与宗教信仰的禁锢就是只灌输一种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百党万万人就是独尊一家一党一人。总之，集中所谓集体化即没收大多数人的人权，就是成全少数人的个人人权，对大多数人财产、思想、言论、宗教等的集体化、保持一致化，就是利于少数统治者的绝对个人主义化、一言堂化、一党化、终身制化、家国化、党国化。

1998年秋，我访问了江南某被树为典型的集体致富村。一街之隔，邻村的一位正村妇正怡然自得，我探问：“它那么富，不羡慕吗？不想迁过去落户吗？”

“什么？迁过去？不想，我们的钱不比它少多少，但比它自由多了！”她瞟了一眼对面，满脸气愤看着那些小别墅，好象我侮辱了她。

“是吗？这话怎么讲？”我十分吃惊。“毕竟，钱是好东西，钱多自由多，想什么，有什么。”

我继续问。

觉察到我的疑惑，她提高了嗓门：“当然，他们有存款，但不是自己的，不能随便花。”她接着讲，买大件，要向头打报告，讲清用途，经审核批准，才能取出钱来。没错，吃菜不花钱，集体供给，但每家每户只能送什么、吃什么，想换个花样都不行。说话还要看干部脸色，不小心，得罪谁了，这些好处、待遇就没了。哼，你别看他们什么都有，可就是没自由！不称心！

她越说越有气，脸也涨红了。我深深感到自由之种遍布中国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灵魂，哪怕
是官本位体系下最底层、最被轻视的中国田野间的一位农人。钱很重要，但她知道自由比钱
更重要。

我还对一位当地司机赞叹：“某某村真好，家家户户有汽车。”

“他们有汽车？”他好象不知道唱遍全国的新闻。

“前些时报纸登的么，每家配一辆富康车，还有照片。”我重复了一遍曾被赞誉有加的新闻。

他莞尔一笑，好象恍然大悟：“哦哦哦，哦……是这样的：车是有，但锁在车库里。谁要用车，

必须提前一天给头打报告，说明用途、去向，多长时间，经头批准同意了，才能开。”他边说

边笑，做着个鬼脸，好象看穿、戳穿了什么鬼把戏，十分滑稽。

是啊，那钱真正是村民的吗？那车真正属于村民？我哑然无语，只有敬佩地看着这位年青的

农民兄弟，他象他的同乡姐妹一样深刻：集体不是皮影戏舞台，人民不是木偶，而操纵者不

是主人。他们喜爱自由，高看民主，珍视人权。可钱究竟是谁的？车究竟是谁的？自己的生

活究竟应该由谁做主？自己是什么？头是什么？谁是头？哪里冒出来的这个头、代表？谁选

他来着？谁请他来着？谁是谁的头？谁定的这个头当头？这个头自己要开车怎么办，他还需

要请示吗？向哪个头请示？共有几个头批示才管用？

谁管理、监督、确保这些头不滥用权力、不腐败，不犯错误、不违法？是德治仁政，是政治

思想工作、党的教育教化和社会主义觉悟、共产主义信念，还是反腐败、群众监督？谁保证

这些头不侵犯集体和其他个人的权益？一级一级的小头，都听哪个大头的？头是怎么产生的，

是委任、指定接班，还是民主选举？你当头，管天管地，还能管我吃什么菜、买什么家具，

8小时以外干什么吗？他们就是所谓的“红色资本家”吗，资本家有这么厉害吗，这不是用

奴隶主的做派侮辱资本家吗？

他们用这“两手抓”干什么？“头、报批、审核、批准、打报告、批准同意”等等，其中最

大的头是“临时支部、党支部、党总支、党委、党组、核心把持的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等”，难

道他们不是阻隔、取代了法律，而成为中国人民自由工作生活中横亘缠绕、数不清、无处不

在的枷锁吗？

这就是所谓集体主义在中国的新阐释吗？集体和公有制，不是人民任由摆布。

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不是说绝大多数人没有个人主义，而自封的集体代表拥有绝

对的个人主义；不是说大多数人把自己的财产、言论、政治等自由权利交给集体，而少数人

可以用集体这个杠杆的名义，限制、剥夺、驱使大多数人的个人财产和自由等人权；不是说

少数人的个人主义，可以通过集体主义这个高台阶，遥控、优先于大多数人的个人主义。

提倡集体主义，不是说集体内绝大多数人的人权由他人控制，并被压缩到最小，而极少

数人可以凌驾集体之上，其特权可以无法无天，扩展到无限大。集体主义，不是说少数人上

升为集体的主人，大多数人沦为集体的附属品、附庸；不是说集体是个大家庭，大多数人是

子女，少数人是为所欲为的父母官，使得家长制作风盛行，不是说家庭价值观意味着家长、

党长、统治者要中饱私囊；不是说在这种名义新却内容古老的人身依附关系下，主人、奴隶

主可以通过集体这个工具去奴役、剥夺附庸、他人。这“对人民马列主义，对统治者个人主

义”，难道不是奴隶主时代制度性地“剥夺他人，成全自己”的翻版？这类社会主义集体和集

体主义精神，难道不是鲁迅先生痛斥的“吃人的仁义道德”？他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

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者‘仁义道德’几个字”。

明白了吧，独裁专制统治当局推崇“一切为了集体”，但其集体主义不利于人民人权，而是利

于其特权吞噬人权的服务器，借此煽动人民互相监督、内斗、窝里斗，甘愿把个人利益奉献

出来，他等获渔翁之利。帝制帝位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天下为公。

相反，没有个人主义，便不会有集体主义；不保障人民的个人利益，就不会有人民的集体利

益；没有个人人权，便不会有集体人权。帝制帝位下的经济繁荣和“人民自觉性、社会道德

水平空前提高”，并不一定自动能带来自由民主，保障人权，它甚至如“贫穷助长独裁专制”

那样为统治者添砖加瓦、助威。如果公有制不保障人民拥有财富、支配财富，它只使少数党

政官本位等“三个代表，总代表”拥有绝对的财富支配权、分配权，乃至祸国殃民权，人民

作为财富主人，却不能自由支配，那样的公有制与财富又有什么意义？它与被剥夺、强制充

公有什么两样？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等一切资源和财产实行全民公有制、集体所有制，人民却

不能对其的生产、分配、使用、再生产等享有决策权，人民的一切都由一级一级被任命的大

小官员决定，那样的全民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怎么能体现于人民？这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统

治者特权阶层私有制？这难道是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

不，改名换姓没有用，这是古往今来一切独裁专制统治的本质！

从个人私有到公有，再到私有的演变程序，人民财产等人权被剥夺的路径清晰可见：

个人自由、财富等财产——全民公有制——党有制，官有制，核心所有制、一把手所有制，

特权私有制——人民无产制。

这难道是贡献自己、成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质吗？难道我们不能从中看到

“无产阶级”与人民贫困的真正成因？当局常称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大概是中国无

产阶级的来历。你从青年劳作至年老退休，仍然是无产者，连住房都不是自己的（组织分给，

也可以随时收回去）。甚至有人最后连生命权都是党的，如“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把

自己的一生交给党，而不是交给国家、民族、自己。

人们啊，反对私有化，不是剥夺全民的私有而成全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私有，不是使统治

者、执政党最富有。推崇雷锋等的集体主义精神，不要使我们忘掉了或者不去保护集体，防

止党政官本位权力盗窃集体，这也是缺乏责任感、不可取的。新编的保尔形象好评如潮，是

有道理的。

（3）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把卢梭的一段话当做备注：“人权乃是指个人的权力，而国家、社

会、集体等都不过是为这个个人权利而服务的手段或工具。只有人（个人）本身才不是工具

而是目的。在中国传统的思维里，个人从来只不过是集体（或某种人际伦理关系）的一种驯

服的工具，所以一个人就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集体。”

卢梭洞察力深刻，他道明了集体危害中国人权的事实。但这段话至少有三个不确切之处需要

注释：一是“中国传统的思维”应当明确为中国官方统治者的官性思维，及其误导、压制下

的国民民间思维，不把统治者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则很容易抹杀中国人民热爱自由崇尚民

主的人权精神本质。二是“一个人就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集体”的思维决不属于人民，而属于统治者。三是其“中国传统……个人……集体……”忽略了中华文化与文明之民本、民性、人性与人权精神，实际上中国也有尊崇个人主义而反对所谓集体主义的传统，如老庄派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秦制以来，中国不只“个人是集体的驯服工具”，任何政党、领袖、军队、社会团体、社会舆论媒体、各种机构、经济繁荣、科学技术、体育文化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等事业、政治经济体制等都是帝制帝位帝王中央集权、总代表的“集体工具”，甚至国际社会、联合国、自由民主、议会、三权分离等也只能因为符合统治者两手抓利益才能越过统治者构筑的各类长城、进入中国。如果可能，空气、月亮、水患、旱灾、沙漠、地震等都可能是两手抓的“集体工具”。

不管卢梭这段话“中国传统、集体”到底是何物，但中国的集体及其利益通常并不代表人民，它们代表朝廷、家天下，是家国同构、朕即国家、朕是集体，致使爱国家必须爱皇帝，爱皇帝就是爱国家集体，爱国家就是人民把一切奉献给皇帝，否则就是反叛朝廷。当代中国则是党国、党天下、核心国、核心天下，是党国一体、核心与国家一体、党即国家、党的领袖即党，爱国家必须爱党、爱核心，爱党、爱核心就是爱国，否则就是卖国、叛国、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

可见，通过利益的转换，由于个人或个体享有对国家、人民、民族、社会等集体的绝对专断权力，集体已经不是属于集体本身了，它们被异化为个人、个体的附庸。集体概念已经根本不能代表通常理解的大多数，而是代表少数的少数。它是黄袍加身在当代中国续演的道具，是从皇帝取代皇帝，到皇帝取代人民的同质续演。

家国同构、党国同构的最大坏处是国家与家、党的混乱，是个人、个体盗窃集体、国家的混乱，乘混水摸鱼。其最大受益者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家、党及其代表人物，最倒霉的是处于独裁专制统治官本位权力体系外围、边缘的无权党员和人民，他们只能任由权力教育教化、支

配、统治，否则便是违法、暴乱、暴动、起义。

由此看出，虽然我们不否认独裁专制特权文明与集体、家国、党国等曾经推动了历史发展，

但其漠视个人、扼杀个人等并不主要是为了真正的集体利益，而是为了保持统治者对集体享

有阐释、掌握、管理、经营、指挥、利用、继承等个人或个体的利益，即对集体里的人民保

持独裁专制统治权益。

（4）中国六四当局还屡屡祭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大旗，谎言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伟大的中华

民族复兴，以维持其承继了家天下糟粕的党天下、核心天下局面，其一党制、终身制、受核

心把持的民主集中制、以皇帝核心为首的一把手党政官本位制等，才是地地道道的党有制、

官有制、私有制、独有制。

提倡公有制，不是说少数人可以剥夺大多数人的私有财产，不是说所有国有资产都属于一党

所有，不是说国库就是党库，不是说全民之国是一党之党国，不是说中国是僵化的四项之国、

自封的未经选举的“三个代表”之国，不是说全体公民是一党是党民、私民。公有制不是“党

有制”，不是“官有制”，不是以皇帝为首的大小党政一把手所有制。它不能全“皇帝所有制，

一人所有制，一党所有制”，它不能以所谓公有而剥夺众多个人私有、反成全了少数人的绝对

私有制。

何谓“共”，何谓“共产”？这独占、独有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难道不是给共产与共产党抹

黑吗？它使共产党蜕变为真正的私产党，国家是一党之私有党国，国库是党库，国民是党的

好儿女，国企是党企，舆论媒体是党的耳目喉舌，人民思想言论信仰等不能违背四项而至少

表面上必须是党管党有，人民选举等权利被党管党代表，国家对外关系等一切国家资源的所

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都是党国一党私有。

其实，“党与党组织”只是客观存在，只是没有个体利益与欲望的超然或中性工具，党内

外的独裁专制制度才使它沦为个人个体弄权谋私、获取帝位与垄断利益的工具。故而，更为

可悲、可恶的是，一党私有实际是一人私有，是独裁专制统治体系的各级各地的一人私有、

一把手私有、个人私有、领导与领导集体私有。如党魁或党组织的掌握者，就是皇帝，天下

都是他的，皇帝通过组织考察、任命干部等方式分封官爵、领地，把公天下私分给其他大大

小小的皇帝。党国里、皇帝眼里，人民人权不是一文不值，也从来不是最高利益与价值观。

但剥夺人权就是邪恶，这可以系统剥夺人权的组织，难道与屡被唾弃的剥夺个人、成全教主

的邪教没有相似之处？难道不能这样说：剥夺个人人身、财产、思想、言论与安全等自由的

组织就是邪教？剥夺个人的组织就是邪教，这是极大的社会不公与丑恶。

这些就是用“公有和集体”等高尚名义剥夺人民的障眼法，使人民在其崇高名义或因恐

吓而求得自我解脱下盲目顺从、迷信崇拜、“愚忠”，绝大多数人甘做分母或入坟墓而成全少

数分子或皇帝。它的妙处是“聚私充公，以公谋私”，还有一个妙处是“被盗者为被盗叫好”，

以甘愿被盗求得“觉悟高”的表扬。这样的“公有和集体”迷糊了人民思维，压抑了人民进

取心，使人民在抵制、反对统治者“个人和个党的假集体”而伸张人权时，以为面对的是真

正的人民集体，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和卑贱感：“我怎么这么自私呢？我怎么没有觉悟

呢？”其实，岂不知真正的利己主义者正是竭力提倡、灌输集体主义精神的统治者，他们制

度性地剥夺了人民的财产、言论等个人人权，人民对集体、国家等奉献被他们肆意糟蹋、挥

霍。人民学雷锋等“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那里搬”、献爱心，却常常因被统治者滥用

而寒心、伤心、恶心。

帝制帝位黑箱里，一方面是人民付出自己、成为无产者，用“利他”贡献“集体”，另一方面

却是独裁专制者们利用“集体”利己。它们以褻渎的方式，应验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

一句名言：财产就是盗窃。公有制不是少数人不受监督地掌管社会一切资源的一言堂、“一支

笔”、一枚玉玺，不是一人对全党全国全民的独裁专制。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搞不成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等任何形式的公有制。

独裁专制制度天生异化公有制为私有制，它会使社会一切资源甚至包括人本身在内都朝着有

利于掌权者的私有化方向发展。如大的方面把“四项基本原则”塞进宪法，大搞“器变道不

变，两手抓”，使国家成为一党私有、一人私有；如小的方面为自己增加各种津贴、交通费、

电话费、奖金等，占便宜、贪污更不必列举了。它最可怕的异化是“使人私有化”，失去社会性，成为“采邑人”、“井田人”、奴隶、“地盘人、行业人、单位人”。人作为人或者劳动力，均不能自由流动，跑到哪里都会被”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另外一个奴隶主遣送回来。他是那个“单位的人”，是“他的人”，“你是我单位的人，不许调走”，“谁也不要接受这个人”，“集体农庄等人”等与集中营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种对个人人权的剥夺，直接限制了人跳跃成为更好的劳动生产力的新组合。

有形物质财产的强制充公不是公有制，无形社会公共权力的主权在民才是真正公有。它首先表现为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和社会治安、国防等国家机器的公正、公平、公有制和全民制，即全民产生、全民行使。它具体表现为人民不是党员，不是党的好儿女，个人不是凌驾于人民、国家、民族、政党、社会、单位等任何集体之上，宪法等法律不是低于党法党纪，司法、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等机构不是党有机构，社会诸多事业不是党有事业，国库不是党库，国有企业不是党有企业，国家军队不是党有军队，社交媒体舆论不是党的耳目喉舌，土地、地上地下等的资源统统不是党有资源。所有社会资源与财富，只有当国家属于人民主权时，才会真正是社会公有、全民所有。但是，独裁专制制度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官有、党有私有制，尤其是核心等一把手私有制。更有一些贪官污吏据此将国家、集体、公有等沦为竞技角斗场，大权大捞，小权小捞，纷纷私占、私分，人民无权无捞就想其他法子。近年来，中国农村流行一首民谣《农民插秧歌》，它唱到：“苛捐杂税如牛毛，听我唱唱插秧歌。一棵交国家，贪官也一棵。一棵县长吃，一棵乡长喝，一棵送村长，一棵免灾祸……一棵猪头税，一棵人头税，一棵给修路，一棵给挖河。一棵又一棵，之后才自个……三令五申下，效果又如何？年年吆喝减负担，负担反而多。科学加苦干，多收三五斗，又有什么用！”封建中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现在则是“普天之下，莫非党有，天下大罪，莫大于反党”，“人”因为必须依附一个“党的单位”才能存在、发展而

具有“非自由人”的奴隶性，我们怎么能奢谈什么“公有”。皇帝代表国家，国家是所谓家国；

党代表国家，中国成了党国。即皇帝、党等是集体的最高代表，统治者们直通集体，人民仍

然不是自由民，是皇民、王民、臣民和党民。不爱皇帝与党就是不爱国家，不同意、不拥护

皇帝和党就是消极对待祖国，反对皇帝、反对党（的具体政策）就是背叛国家，等等。那么，

热爱个人、个党，就是热爱、奉献于集体；反之亦然，就是违反集体利益，“没觉悟”。他们

反对私有化，打击资本家，其实如同家天下是最大私有制一样，党天下也是最大的私有化、

私有制，不光物质资本为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独有、私有，政权、思想权、舆论权等也永远是

他们的，他们才是最大的资本家，而且独一无二。

如此一来，独裁专制制度下被偷换了概念的“集体、公有”的真实含义非常明了。公众利益、

集体主义、热爱集体、讲奉献、公有维护制等项下的为人民服务嬗变为为统治者服务，“集

体、公有”是少数个人个体大肆捞取大多数人奉献的秘密通道和阶梯，是制度性剥夺人民的

黑箱操作平台，是他们损害国家财力、侵占公民权益的遮羞布，是他们个人以集体窃民、以

集体窃党、以党窃国的工具。一句话，集体、公有等沦为了统治者控制人民的法器。

中国统治者有一句教育教化人民的套话：“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国

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但较之人民大众拿小头，哪些“个人”拿了大头，偷

了大头？除了好党政干部，除了人民正当致富，那些贪官头头脑脑之权力不受监督，“头越大，

越拿大头”，大肆损公肥私。结果，国家、和集体等公有财产象个面包圈，广大人民站在面包

圈的空洞里，眼睁睁看着圈上的特权者把国家和集体窃为己有。

国家是党国、帝王之帝国，人民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与集体财产的老板，那些代理人成了真老

板。公有制、公有制，正是它制度性地帮助党政官本位盗窃国家、欺压人民，它是中国社会

不公的根源。只要存在贪官及其培养贪官的制度，只要存在一党制、终身制、核心与一把手

制，那么公有制、集体制、人民所有制等便是一句空话，那么邓小平的这句话便不可能正确：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

当大众开始抱怨、怠工、起义、反抗时，一些人发话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怕别人比自己多，比自己好。这话有失偏颇，至少是对大众的不公。其实，该特征改动一个字，则更真实、准确：不患寡而患不公正。家国、党国之官本位统治特权高于人权是不公正的病根，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制是其剥夺大众财富而不公的工具，一党制是剥夺主权在民而不公的工具，家长制、核心制是剥夺全体党员权利而不公的工具，终身制则是直接剥夺政治局委员权利而不公的工具（家国之私天下性质自然不在话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只有当个人利益高于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任何政党、团体和集团利益时，国家、集体与公有利益才是不可侵犯的，才是有保障的。爱国，首先是爱自己！爱集体，首先是爱自己！爱公有制，一心为公，天下为公，首先是爱自己。不爱自己，不爱个人主义，你很难真正爱国、爱集体！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不善自身，何以爱国、爱集体、爱公天下。同胞们，爱自己，才能真正爱国家！才能真正爱集体！才能爱公天下！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障人权，帮助人民爱自己。

5、“组织决定”决定什么

（1）与“公有制、爱集体，集体主义、集体领导”等匹配的，还有一个什么“组织决定”。

“组织决定”非常巧妙，它能把一把手的个人意志，安装成集体意志和集体决定，因而是任何个人或下级单位、地区等不可抗拒的。你个人个体地区等能怎么样，即使你等有胆抗拒个人意志，你还能抗拒集体意志、组织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可是真理！多少老一代革命家、老干部是被“组织决定”打下去的？又有多少人因为不可抗拒的“集体意志”而被迫举手，给

“一致通过”的“组织决定”凑分子，做了违心事，甚至成为“组织决定”的执行者？“集体领导”下的“组织决定”出了错误，制造了多少悲剧？个人可以通过“集体领导”独断专行，也可以由此以“集体领导所为”而不负任何“个人领导责任”。这便是民主集中制的好处？

说起来轻巧，但一纸“组织决定”害了多少人，耽误了多少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损害了

多少人民福利？它成全了多少个人野心，培育了多少腐败，庇护了多少贪官？仅在体育界，

“组织决定”违背奥运精神，内定金牌人选，击碎了多少中国运动员的金牌梦？邓小平的三

起三落恐怕都是“组织决定”决定的，都是“集体意志”决定的！三起三落当中的“三落”，

肯定是被当时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斗争下去的，也即是被“两手抓”

（此两者有共同

点）抓落下去的。尤其是第三落，他“走资派还在走”，走得正带劲，被“组织决定”的“两

手抓”抓一下，便立刻成了自由落体。他的长子邓朴方也是“组织决定”的受害者。据其妹

毛毛披露，1971年1月21日，人家忙着过年，但根据组织决定，已经致残的邓朴方被

人“两手抓”，从301医院送到了京郊清河镇的北京市社会救济院。

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过：组织不能成为个人的工具！我们反思“反右派、文革”等，为什

么不从体制、集体、组织等上着手，使独裁专制的行为失去工具，失去依托？为什么还让“组

织决定”继续垄断人民、国家和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包括内外方针？盛行“集

体领导”的中国出了多少错误，但就是不盛行集体负责、集体辞职，个人负责、个人辞职，

就是不厉行制度辞职：人民辞退独裁专制制度。现在，“集体领导”、“组织决定”还在被多少

个人利用，危害国家利益与人民人权？集体领导不是个人独断专行领导，不是一人党对全

党全军全民全国的领导，而是“权力分离”领导，是“权力监督”领导，是“权力制衡”领

导，是人民主权立法领导，是立法、司法、行政、新闻、经济、军队等六大社会公共权力独

立、平等、平行、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已经彻底否定了这，彻底否定

了那，向腐败和社会丑恶现象开战，但为什么不彻底否定孳生“这和那”的一党独裁专制制

度，甚至停止了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起步，逆潮流而倒退？

通过“集体、组织、集体领导和集体决定”，从乡村到政治局，整个中国大陆即使不是被高压

成了那个“无人练习法轮功村庄”那样的典型，也是一直在“四项、三讲”下朝它跋涉，也

是在“集体领导”下步履维艰。这诸多“典型”、“先进”、“安排”、“组织决定”、“集体领导”

等，吞噬了多少中国人权？也许，江泽民等具体官员没有一个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这是制度

之错。我们要追究的是制度之错，但如果谁顽固坚持这个制度，并打击努力改变该制度的人

民自由民主力量，他们就必定有错了。

有人研究了前苏联的极权统治后，发现它对违反了独裁专制“集体利益”的持不同政见者和

反抗者，也即是那些“表现不好”者，一般采取下列惩罚性管制性措施：进行开除党籍的威

胁；剥夺职位，包括专业职位；开除公职或使全家生活受到影响；不准其家属就读于高等院

校；取消大城市中的住居许可；取消公费医疗待遇；临时或永久性取消电话机；对旅行大加

限制；送进医院或精神病院；流放；送进监狱和劳改营，强迫劳动。

显然，这些都是“集体领导与组织决定”决定的，都是“两手抓”抓的！中国正是一个全体

人民必须服从“组织安排，组织决定”的国家！古今中外，这是家天下、党天下、私天下等

“集体、公有制”的共同套路。这些“集体”、“组织”措施曾经或者正应用于中国，当然也

不乏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措施。

在一切都由“集体”控制的社会里，离开了“集体”控制的诸多必备生活条件、福利，边缘

人们还有活路吗？为了生存，为了活命，为了家属，为了下一代，为了……，人民还能独立

思考，不与独裁专制保持一致吗？还能不免于匮乏与恐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活

吗？这就是所谓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生存人权大于政治人权的辩词，这就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制，还有共产主义等，不是限制、束缚人民自由的枷

锁。

政府权力不是权利，是打工。反对个人主义，不是官本位特权至上个人主义导致了贫富悬殊

日益扩大，不是社会不公，而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的赛跑。党政官本位不管好自己，还

有什么脸“教育（教化）群众正确处理三者利益的关系”，他们还装出一幅伪君子模样，号召

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究社会公德，力争社会风气好转”，但是，社会公德

首先掌握社会公共权力者之德，是官德、党德，是党政官本位之德，其次才是民德、公民之

德。而且不受权力原罪腐蚀，人民的德行永远比统治者之德行好。没有官本位内的精神文明，

那来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和良好风气？人民的高尚情操，决不掩护贪官作案。有时候，人们恭喜工人、农民、职员、教授、军人警察等发了一笔小财，他们戏言：嗨，还不够贪官们塞牙缝的。这是人民受到了“反面教育”的结果。

但是，无论“反面”或“正面”教育，到底谁该受教育？是人民教育党政官本位？还是相反？是社会主人教育社会公仆？还是相反？独裁专制当局还把持中国大陆《宪法》规定：国家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真是可笑，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官员言行的制约书，不是少数人借它吆五喝六、“教育（教化）”人民工具。国家、集体、国际和国家机器，不是少数人控制多数人财产、安全、思想、言论等自由的法器，不是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的帮凶。国家不是党政官本位强制人民为其服务的机器，而是人民通过它去选举、雇佣、监督、弹劾而要求政府及其人员依法为人民服务。没有什么党政官员有资格教育人民，他们只有资格向人民讨教、咨询、解释、征求意见，迎合、顺从、服从，或者争取、拉选票、求当选。

中国人民不需要接受谁的、什么教育，他们有权力选举官员及其政府，给予他们有限期的、有限制的权力，教育并让他们发誓不危害人民主权立法的宪法，并随时监督、准备替换、弹劾、罢免他们。人民应当自己立法，保障自己的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不受任何侵犯。

在中国大陆，除了文化学习教育等，“教育”和“受教育”是典型侵犯人权的坏词，其含义就是“教化”、“训导”、“驯服”和“接受教化、训导、驯服”，就是禁锢，就是异化人性，凌人权。其操作规则是“上级教育下级”，“上面教育下面”，党教育人民，党政官本位教育人民，官大的教育官小的。谁也逃脱不了“受教育”，皇帝教育一切，只有皇帝不受教育。“教育”你“听国家集体（党）的话，跟国家集体（党）走”。“正面”教育不灵，给你上“反面”教育，还有开除公职，断你生路，不“教育”你了，放弃你，让你自谋生路。哼，“集体”不管你，不“两手抓”你了，那就让你下岗、失业，离开单位，滚到社会边缘！没有生活来源、住房，没有主人、没有集体，没有党组织“两手抓”抓你，让你天天奔命于

“一地鸡毛”，满足于“民以食为天”的温饱。看你拿什么“自由”！搞什么“民主”！怎么“人权”！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要让你们永远处于“无力与争”的状态。“政治思想工作一天也不能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一抓就灵”，它是灵魂，是重中之重，是一切的一切，江山就靠它了。不服从教化可不行，否则“教育办法”多的是，文的不行，武的伺候，讲话、指示、评论员文章、社论、揭批、戒严、平暴、镇压等逐步升级。

（2）“揭批法轮功”以来，中国有个村庄倍受官方赞誉。原因是四周村庄都有练法轮功的，惟独它没有一人参与。原来，这个村“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和村委会”，他们政治立场坚定，规定：谁练法轮功，就不发生活补贴。村民问为什么？他们振振有词：你们练法轮功，不听集体（党）的话，便无权享受生活补贴，你练谁的功，就找谁要补贴。这大概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典范吧！党和国家一向反对土围子、土皇帝、土政策，但这样的土政策显然是标兵、模范，堪称思想政治工作的先进集体，值得借“典型宣传”推广。但是，钱是谁应得的？生活补贴跟什么挂钩？钱本来是人民的，但“党支部、村委会”等集体说是人民的，就是人民的，说不是人民的，人民只能干瞪眼。人民有理说不清，没办法，自己的财产被“集体”掌管，又不能象银行存款那样自由存取，只好听从“集体”意志了。迫于生活压力，迫于要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和经济财产，一些村民放弃了练法轮功等的言行信仰自由、生活爱好乐趣等人权。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温暖的集体”，但集体的温暖就是这般发放？这温暖的功用是大家可以享有更多选择的自由，还是只能更加顺从独裁专制统治？“暖气”本是人民的，可难道人民“取暖”的代价却是放弃言论、思想、信仰等自由，是对统治者及其一党制、终身制、家长制等俯首称臣，或者做奴隶？难道物质丰富了，个人个体的自由选择不是理应同步增长？我们喜欢“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温暖的集体”的表述，但它的暖气系统阀门不应该由少数人控制，并因此强迫人民听命于他们，或者方便他们自己多吃多占多

用。

面对种种不公平，常常闻听中国人被指责为“软弱，老实，逆来顺受，忍耐性强，依附性强，

奴性强，缺乏抗争精神，不争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等等。诸位，这些话没错。但大

家都是凡人，谁不吃饭穿衣过日子，不需要津贴，不养家糊口？没有钱的人，经济不能充分

自立者，没有生活保障者，怎么能有独立精神？不是中国人“依附性强”，而是独裁专制制度

使然。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当年的收入还堪称大款，使他有更多精力

为中国号脉、疹病。

人们啊，不要“怒”中国人不争，而要“愤怒”独裁专制制度，是它不准中国人争，不

允许中国人民独立自主。不是中国人民太软弱，而是统治当局太顽固、强硬；不是中国人民

奴性强，而是统治者之奴隶主、父母官、领导者意识太强；不是中国人民贱，而是统治者历

来只准官尊民贱。看看六四镇压，你便知道中国统治者历来是多么顽固、无耻、强硬、高压、

残暴，看看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你便知道中国人民是多么勇敢、坚强、忠勇，是多么

珍视独立、平等，崇尚自由、民主，热爱和平、人权。

据报道，那个“没人练法轮功”的村庄果真成了先进典型。

人穷志短。这只是以生活补贴难倒人、控制人的一个例证。还有诸多的评先进、专家补贴、

住房、职称、晋级、涨工资、培训学习、出国机会、子女受教育和就业、各类指标票证、内

定利益，乃至生孩子、探亲等所谓由集体与组织及其政策、条规等掌握的各类补贴、福利、

生活基础、工作机会，又难倒了多少英雄好汉、巾帼半边天！

诸般“两手抓”下的先进典型里，肯定有委屈，有压抑，有不自由，有恐惧，有冤案！有践

踏人权！这般“器变道不变，即帝制帝位不变”的典型里，肯定有皇帝，有臣民；有奴隶主，

有奴隶；有少数人的绝对自由，有多数人的绝对不自由！如今，960万平方公里12.5

亿人，中国有多少村庄、多少国有企业、多少居委会、多少营房、多少“单位”、多少“集体”、

多少“井田”，被“两手抓”抓成了这样的典型？中国是一个被“两手抓”的国家。中华民族

被“两手抓”了，中国人民被“两手抓”了！

岂止于小村庄，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局，也无能逃脱成为这样的典型。独裁专制统治下，

一切集体都有领导集体，领导集体有领导核心，民主集中制是组织原则，但“核心说了算”

常常使领导集体、民主名存实亡，仅剩集中、集权、极权、专断、独裁专制。政治局常委又

能怎么样，你敢不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胆敢“表现不好”，与某个人不保持一致？别

忘了，那罪名叫“分裂党”！别忘了，中国皇帝是可以“当廷杖打丞相”的，而且“君打臣不

羞”。你这常委也顶多是个跑腿、打工的执行者，而且必须象个酸孙子那样，卑躬屈膝，执行

指令“不折不扣，不走样”，二话不能多说，才能保住职位。不要借着民主集中制发表不同意

见，你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跟中央全会也一样，出席会议、研究国家大事的唯一

任务就是满脸堆笑，领会意图，拍马屁发表溢美之词，“举手同意”。否则，你第二天就别来

开会了，你的罪名是“反对集体，反对中央，分裂党”，坐飞机到天上，我也把你打下来。独

裁专制下，由于缺乏权力监督制衡机制，尤其是对一把手权力的看管，集体主义的虚幻还使

“集体领导”是成全个人独断领导的工具，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民主集中制完全走了味。

如果在固定范围内搞“民主集中制”，而我却处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少数派时，我可以通过

“改变程序”等办法，如增加会议人数，搞政治局扩大会议，则轻易变成多数了。现在，政

治局对全党全国全民的集体领导，实际是江泽民的绝对个人领导，人大政协、政法委等则完

全沦为摆式。同时，上行下效，全国各地各单位的集体领导也基本是“一把手”个人领导。

一把手们吞噬了其他领导集体成员的领导权，使他人只是其命令的接受者、理解者、执行者、

汇报者，而且一把手的威风使他们“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在职的恭顺党政官本位，“离退休”的中国人也不会忘记“安排、待遇”一类的词语。这些貌

似福利、善良的词，实际是剥夺人权、维护独裁专制统治的帮手。其运作方式为：“不是你在

职的时候，干多少，拿多少”，而是你的部分劳动成果交由“集体”保管，或者支援社会主义

建设，余者等离退休时再给你，即“安排、待遇”。但是，离退休前，如果你“表现不好”（即

使是对一个贪官“表现不好”），如果你不跟“集体”一条心，如不坚持“四项三讲”而练法

轮功，如果你离职，或者不经组织安排而是自己联系调动工作，或跳槽另谋职业（哪怕没出原系统，没进三资、民营等企业），或者出国，等等，总之，只要你“表现不好”，那么，对不起，你可以被“两手抓”了。你的现住房等待遇都难保，要回收，哪里还奢想离退休后的“安排，待遇”。

国有、公有、集体等实质是“党有”，是套子，你只要入了套，就很难“解套、脱套、离套”，你只能为求得“好安排，待遇”而与言听计从，保持一致，做积极分子，向它靠拢，落个“好表现”。多少成年中国人，多少中国的中间力量，背后被“两手抓”抓着，入了这样的套子。

什么事业心、为国贡献、为人民谋福利等，都不值钱，在控制集体的领导面前有个“好表现”就行。而且国家、民族、人民、集体、单位等都是次要的，关键是要“在领导个人面前有个好表现，在他老婆、孩子面前也行”。岂只是“离退休”等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各行各业各单位为了发展，莫不争先恐后在上级与上级机关面前图个“好表现”。又有多少中国军人为了退役、退伍、转业时的“安排，待遇”而大伤脑筋，忙于“表现”？另外，许多把童年与青春献给了国家的优秀运动员，退役前后也同样面临这“套人”的“安排，待遇”问题。又有多少在职人员陷入其中，不得自拔。

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本该顺理成章还给你的财产，你最后还得央给他发善心、施恩，赐予你。不要它们吧，这些年白干了，要吧，则必须失去部分尊严与自由选择。赶快装孙子，点头哈腰送礼吧。人多粥少，资源紧缺，晚了还不行，会有人抢先。这导致“安排，待遇”等成为权力寻租的天然良港。它黑箱操作，“装船、卸货”时孳生了贪污、腐败、污垢。看准谁拥有“安排，计划”权力的党政官本位及其动向，围着它转，套进关系，获得“批示，条子，打个电话、招呼，美言几句，推荐一下”，是获取事业成功、生活幸福、地区经济发展、有政绩的一大捷径。各地区、各企业则忙于“跑部前进”，各官则攻心于“跑官，买官”。但是。对一部分人和地区的特殊“安排”，则必然意味着对另一部分人利益和另一部分地区的侵害，导致社会不公。不公连着不公，没有尽头，使得“占了便宜”和“吃了亏”的都觉得不公。“我

这算什么，比起某某，我吃大亏了”，而且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即使占了便宜也要喊吃亏。人

人都不满足，都在那里“人比人，气死人”，人人都有气。

岂止于针对村民、政治局常委等个人。由于“组织决定，组织分配，组织安排，两手抓”等

在社会决策与财富分配中，常常因拥有“圣谕”般权威，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投资、项

目安排、机构设置、编制、物质产品、住房标准、受教育机会、晋级、出国考察、谁拿体育

金牌、生育指标等分配，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个人等必须互相踩、拆、斗，竞相巴结组

织。而组织此时实际上是“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的御用工具，个人代表、指挥、决定

了组织。这些一把手、皇帝等则实际上把人民对组织的奉献、敬畏，乃至忠诚、热爱等据为

己有，以权谋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财富紧缺，竞争激烈，不是你有就是他无。结果，为

了争得“好安排，好分配”，各单位以邻为壑，以同级为潜在竞争对手，“只唯上”，各省市自

治区甚至县市区等互设壁垒，各地各单位窝里斗盛行，职工不团结，士气不高昂，心绪不佳，

无法团结拼搏，不能形成全国大市场。这些大概是中国惯有的“一盘散沙，窝里斗”等的来

源之一吧，也是“一个中国人（企业，地区，省份等）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三条虫”的成因

之一。对这些独裁专制官本位“惹的祸”，掌权者们不仅不怕单位与社会不“稳定”，还会暗

暗叫好，“你们斗吧，你们越斗，越一盘散沙，我越可分而治之，越没人顾及我贪污、腐化，

我权位越无威胁、越安全，我越能从小一把手升任大一把手，我越能控制各省市自治区、各

部委，越能成为独一无二的核心。”

独裁专制社会的大小官员中，也许只有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不必看人脸色图“好表现”，

他们尽管可以“听凭死后洪水滔天”。为了保守独裁专制权利，官本位必须随时随地纯熟运用

权力制衡，这不仅是中国各界关系复杂与“乱”的原因，也是中国发展慢的原因。因为官本

位社会里，别的都是次要的，官员们必须把最大的精力用于“谋官、升官”，用于“权谋”，

即使是非常有事业心的干部也必须如此。在政府推动型——即官本位推动型的社会里，不弄权，

不站稳脚跟，你能搞什么事业？否则，还未施展拳脚，已被他人拉下马来，取而代之。无论

好官或庸官、贪官，官场权谋用剩的下脚料，才能用于事业：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官员的悲哀！这是中国政府的悲哀！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

（3）官不是神仙，况且神仙也有七情六欲。“由官安排”，由“计划而非市场”，很难创造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环境。于是，它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各地区以及人人之间互相猜忌，普遍不平衡。全社会因此充满怨气，“莫生气”字画成了畅销品，办公桌下压，家里墙上贴。它逼迫人们自私自利，光盯着他人碗里有多少肉，不去创造（即使创造了财富，自己也落不了多少，要交给掌管“公有和集体”的代表、主子、领导、父母官等），只等着“分配、安排”。

官本位形成的价值规律是“官定”，或是“党定，政府定”。结果，靠官、傍官是“进步”的捷径，“踏实肯干的，不如投机取巧的”，人心涣散，人们缺乏公益心、奉献精神 and 创新能力。显然，官本位权力“安排”至上而排斥市场机制引擎，市场价值规律无法“公平、自由”定，无法以其天生力量激励人民创新，推动社会进步。不尊重价值规律的社会充满危险！可悲啊！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名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分配不公平滋生的“好人一生不平安”却长时期唱遍了全中国。计划经济即是独裁专制经济，它出特权；市场经济即是自由民主经济，它出人权。知道权力机关、部委、行业管理、官位官员们为什么炙手可烫了吧？正是你被“公有、集体”制度逼迫交出了应得的财富和人权，被他制度性地掌握，他才能如此牛烘烘。

官本位等统治者会说，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爱国主义精神多好，我爱它们！通过它们，不说生杀予夺中的“生杀”，我等官员至少对你等的财富和人权拥有“予夺”的权力，“安排”的权力！这就象一家强人开的寄存店，按照强人自己制订的政策法规，大家的私人财富被迫汇聚一起，形成了寄存店这个“公有制和集体”。通过这个“公有制和集体”，不是每个人即大家，而是强人店主即个人个体，僭越成了大家财富的主人。一旦强人“僭主”因为自身统治利益而需要制服财富的真正主人，需要公民“表现”，他就有了拿人一把、耍流氓

的资本。“你如何如何吧，否则不能获得寄存物了”。他用你的财富敲诈你，逼你就范。不服

敲诈，不就范，不按要求“表现”？那好，轻则让你填一大堆申请表、保证书，让你受教育

教化，提高认识，重则罚款、没收财物，或者失去工作等，甚至蹲监狱、正法。反正，罪名

多的是。

制度如此，那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你能怎么着？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人民主权被僭主僭

越的国家，人民自由民主被僭主独裁专制的国家！这大概是“公有制和集体”等美好名称被

个人把持支配后，对社会风气的污染。常常闻听舆论说“中国人有这劣根性，那劣根性”，其

实，劣根的祖师爷正在独裁专制体制，正在家天下和党天下，家国和党国。如100多年前，

曾有人著书批评中国社会的多种状况，其最核心的为“缺乏公益心，很难在公共事务中合作”。

为什么“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集体，自己只是集体的一颗螺丝钉的人民”，为“集体”

做了那么多贡献的中国人，连国家都不是自己的人民主权国，是他人的家国、党国，却得到

了这般寒心的结论呢？因为独裁专制下，因为人民对国家不拥有所有权，管理权，只是家国、

党国的打工者、群众，是外人。任何未经家主、党主授权的为社会出力、贡献等，都会招惹

擅自行动、自做主张、僭越主人的过错，是有野心、突出个人的显露，有扰乱社会、叛国、

危害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的嫌疑。人民只能做允许做、被分配做的事情，只能按要求“表

现”。人民“老实本份”才是良民、“四有新人”，不多说话，不插手，只做“本份”内的事情。

如果未经请示、未获得允许，就自我“表现”，“表现”那自由言论、结社、组党等为社会做

贡献的事情，就思想、提出政见，就上书、请愿、演讲、游行、示威等，是万万不可的。否

则，是顽民、刁民、暴民，死罪一条！

总而言之，每位国民、公民、党民、臣民、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各项事业，最好的“表

现”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听党的指挥，听三个代表及其核心的指挥，顺从两手抓”。管理国

家、参政、议政、变政或政变，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社区，等等，都是统治者的事情。一切

由政府做主，实际是排斥人民自己做主，排斥其他人做主；学生只管读书，莫问政治；宗教

只管修行，莫问政治；科技只管研究，莫问政治；企业只管利润，莫问政治；文化教育只管埋头学习，体育只管训练……，各行各业莫问政治；新闻舆论只管当好耳目喉舌，莫问政治；军人只管训练，听皇帝指挥，听党指挥，莫问政治；工人、农民等一切个人只管自己，莫问政治，莫问国事……。

如果不怕六四镇压一类的极端形式的“两手抓”，如果被镇压法轮功吓着，如果没有看懂那些过问政治的企业家、军人、文学家、科学家、党内军内异己分子等人的下场，如果不“表现好”，那你们就插手、过问本由我独裁专制的政治吧！我把国家机器都愚弄好了，还怕你们不成。到时候咎由自取，别怪我不客气。

（8）截止目前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结果昭示天下，无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王朝和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制，无论它们如何诋毁资本主义私有制，任何国家、集体等的公共事务，任何国家与集体财产，只有独裁专制者拥有绝对的所有权、管理权、指挥生产权、分配权、收回权，人民和其他政党团体，只有接受分配权、有限度的使用权、生产力权。甚至连人民军队都因为“两手抓”、“党指挥枪”而成为私有军队，党有军队，根本不是人民拥有、国家拥有军队。他们顽固坚持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真正的私有制：人民没有制！它们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人私有、人人拥有国家主权而成全了天下公有，即公天下，它“公”得很！如，人人“私有”股份而成全了一家公司的社会公众性，而把一家一个人独资拥有的公司冠以公有或集体制的名称，便说它是全体人民的，则是荒唐可笑的，实际上它“私”得很！它一人一个班子一党所有制！

有了这个奇妙的明公暗私的“公有、集体”机制，中国各地是不是必须围着中央集权转？

“集体”的掌握者，是不是象一个高傲的主人，引得人民失去自尊，象狗一样围着他讨吃讨喝？这“公有、集体”制，实质是“人民没有制的真正‘私有制’”，它必然招致“人治”，形成各地对中央的绝对服从，形成人民对官本位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奴才必须对主子不断“磕

头作揖、表现”的强制机制。那“表现”一词，在一党独裁专制的官本位文化里，常应用于上级对下级，常见于“鉴定，档案、评语”等处所，其含义与作用太丰富了。它是封建文化的余孽，是表忠心的继续，是邪教控制人的一个手段。如果某个人被上级定为“表现不好”，如果某个企业、某个省市自治区被上级定为“表现不好”，那么他们麻烦就大了！不过，有管制你的办法，也有解脱你的办法。负荆请罪与消钱免灾，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创造好表现，恢复领导对你的信任”的一个好办法。

多少中国人，包括响当当的男子汉与巾帼英雄，为了落个“表现好，即可安排好，待遇好”，不得不在主子面前做奴才，在父母官前扮儿孙？弯腰叩头，送礼拍马匹？多少人权被吞噬？

常有大官感叹世态炎凉，并骂老部下和人民：“这帮小人，瞧中国人这个德行，老子在位时他装孙子，三天两头往家里跑，现在走个碰头也不打招呼。”干部老爷当惯了，一旦做平头百姓，没人“表现”了，他们心理不平衡。一些人以练气功来排解，有些人甚至为此抑郁而疾病缠身，酿成悲剧。可见，对官员与全社会来讲，“表现”是把双刃剑，它两头害人，害了平民，再来害官本位：你在位，我“表现”让你舒服，不可一世；你不在位，我“表现”让你难受，晚年遭回报。最后，还有党纪国法找你算帐！这大概是佛教的因果报应吧！

目前，你说怪不怪，很多为全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地区仍然一贫如洗；很多为社会发展失去自我的人，如工人、农民、科学家、军人、警察、文化教育等社会科学工作者，穷得叮当响；很多“离退休的中国人”工作了一辈子，还不拥有法律意义上的自己住房。为什么？是都“表现”不好吗？不是的！因为他们的财富被“公有”掉了，被“集体”掉了，被“公有和集体”没收了，被强制寄存了，被“两手抓”了。而非人民自由投票选举产生的店主，即一些特权者，寄存店的管理者等都富裕了，都“五子”登科了。这样的剥削，还可以保证，无论什么人，什么时候，只要你反对一党独裁专制，只要你“在领导面前表现不好”，只要你只听中央即中央某个人的，本来属于你的投资、你的住房等待遇随时可以被没收，或者“另行安排”。

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如今，中国各地区只有少得可怜的自主自治权。否则，中央集权就少了，皇帝的含金量就打折了！从皇帝集权到中央，从中央到地方，从地方到单位，从单位到个人，或者从“公”有到民有私有，从“集体”到个人，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权力递减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动用一切国家机器，绝对防止国家权力从“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递减成“主权在民”。那是江山从家天下和党天下，变色成为人民天下的可恶与可怕。因而，从更深层次的基层人民来讲，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迄今没有制订“私人财产”不容侵犯的法律。没收你的财产等物质生存条件，削弱你的地方实力，都是属于中央集权及其一把手或者“代表”们的，你活命尚且艰难，还有什么力气反对一党独裁专制，争什么自由民主，争什么人权，争什么自主自治权？

私人财产，私有制，保护私人财产，太重要了！它们是人人平等，保护人权不受侵犯的基础。

公有制，集体，没收充公，太可怕了！它们只是成全少数人对多数人独裁专制的工具。

“公有与集体”的那般威慑作用，在于迫使你终身不得有个人与地方意志，不得有个人主义、个体主义、地方主义、局部主义、行业主义，不得自由思想、信仰、言论、行动，在于牵制你，不得走自己的路或者走其他的路，在于使你陷于“无法免于匮乏与恐惧”，在于使你终身战战兢兢，终身“与党保持一致，跟党走，绝对服从独裁专制”。其结果是人民与各地区，一边创造果实，一边为自己制造镣铐。最后，在“三个代表们”的强制下，你用你的劳动成果，锁住了你自己。

无论如何，公有制不是剥夺个人或私人，不得侵犯私有制；集体不是人民财富的强制寄存店。当然，就绝大多数人只能享有“集体主义”而言，“集体”能够保证少数人享有绝对的个人主义。“集体”的真正主人是不会被集体制掣的，寄存店的经营者——店主，即皇帝、皇家、党政官本位等僭主的个人财富是不会被剥夺的。没有良心的官员，只会在集体中多吃多喝、多分、多拿、多占，把他人的寄存物据为己有。官做到一定级别，如处级、局级一类的，如

调动工作，则一般不存在房产等财富“被剥夺”的心痛问题。他们巴不得多调动，多换一个地方做官，至少多分一套住房。不仅原来的不必如普通人那样上交，据说除了原配家属和子女结婚用房，有的贪官还有余房把“二奶”金屋藏娇，或者租给无房户收租金，甚至还为没出生的孙子准备了住房。在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导向下，争着为店主帮工，傍上店主，成为他的亲戚，或者干儿子一类的“干后代”，是生活幸福的捷径。

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一党制、终身制”等的尊容？！它们是紧箍咒，它们

“两手抓”，使人民生活于恐惧之中：“咒”多的是，有的是办法治你，不听集体的，你必定倒霉！

这就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三个代表”这样当？集体之代表比集体本身还高大？谁握有强权，谁官大，谁便可以强行代表？皇帝是总代表，比国家这个大集体还高大？了不得，代表已经不仅仅是从集体中多吃多占多拿多住的寄生虫、渔利者、窃贼，还是控制者、霸王。

难道独裁专制统治政权之“集体、公有”不在“吃人”——“吃”人民自由民主之人权？！

列宁说集体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集体该是多么好的人权保障体系。但实践中的一些

“集体、公有制、国有”等似乎被搞成了“人人为集体，集体控制人人，少数人控制集体”的人权控制与剥夺体系，造成系列悲剧。

可喜的是，前苏联人民成功抛弃了这样的“集体、公有”。

可悲的是，中国正在四项三讲下巩固这样的“集体、公有”。

当今中国，就是被这样一个“大集体”所控制的中国，就是紧箍咒下的中国，中国人民人人

都被套上了紧箍咒。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定乾坤，一切事业都是党的事业。他们是全国的绝对

中心，国家主权附属党权，是党国；社会生活听一个声音，用一个声音说话；国有资源是党

有资源，国有资产是党产，国库是党库，公民是党民。人民被迫向党向集体靠拢，争做“党

的好儿女，跟党走”，一切莫不顺从它，为其马首是瞻。惟有如此，才能被“补贴”，才能不

被“咒”，才能生存，才能过得好，才能享有人权，而尽管“补贴”本身是自己的，尽管人权

是天赋的。

这样冠冕堂皇的“集体、公有”，是不是某些人某些党制度性剥夺他人的工具？自称是“三

个代表”的一党独裁专制及其国家机器，是不是借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理想等制度性

剥夺中国人民？难怪独裁专制政权被国际舆论贴上了“流氓”标签！

集体和公有制，不是囚禁个人自由的笼子，它们不应该一方面令大多数人生畏，而另一方面

则保证极少数人在笼外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是没收大多数人

的共产而成全少数人私产的变戏法。它们不是俗话指责的“对人马克思主义，对自己自由主

义”的紧箍咒。它们不应该是少数人套取多少人自由的绳索，不应该是扼杀个人追求独立人

格精神的法器。无论如何，集体与公有制，不应该产生一个无法无天、超越集体之上的霸王

式“代表”；公有制，不应该是假公济私、导致贫富悬殊的工具。无论如何，人类发展到今天，

集体、国家不是剥夺人权的囚笼，而是保障人权的网络。它们应该使人人得到自由、充分的

发展，它们应该保障个人主义达到尽善尽美。

我们拼命破除四项基本原则迷信和它鼓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因为实践证明它们只能

使独裁专制特权者能够个人主义至上；我们提倡自由民主和私有制，是因为它们能够保障人

人平等的人人享有的个人主义至上。

不要相信未经人民主权立法选举的政权及其统治者炮制的“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谎

言。古往今来，中国最大的“集体利益”一直主要是指皇帝、皇族、各级官僚主义阶级、政

党、党的领导人等的利益。“一个人就应该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集体”的结果是被异化为“假

集体”的个人或个体统收了人民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只不过是独裁专制的利益的附

属物，只有当真正的集体利益符合“假集体”的利益时，国家与人民才能“借势发展”，沾点

便宜。这也是他们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一种解释。为什么后来的中国共

产党总是打击它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因为他认为“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

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

所以他号召：“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

自主之人格”。难怪梁漱溟先生代表中国人民感慨：“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能

被发现。”因为绝大多数个人，被把持党有、国有、公有和集体等的少数个人淹没了，被“代表”了，被“三个代表”了。

（4）所以，有些事情好理解了：当人民对其独裁专制不满，当被要求保障人权时，总有人辩解说“一国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一国”是谁呀？谁代表“一国”呀？

谁是“自己”呀？独裁专制政权不是“一国”，那“自己”不是人民，不能代表一国之国权，

人民主权立法才能代表“一国”。几个人开会或者一个人独自都不能有权代表人民主权国家“决定自己的发展模式”。然而，有了人民是“集体”，有了超越集体的个人，那个假“一国”决定重大国事，才可以总不征求人民意见，更不让人民参与，讨论、投票、选举，而是家长一

拍胸脯：“我代表集体，我代表人民，我是“三个代表”，我说了算，就这么定。”所以，当人民坚持“个人主义、人权就是公民个人权利”时，独裁专制政权却强调中国特色

的“人权是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综合体”，“集体”无限大，个人无限小，中央集权无限大，

各地自主权无限小。因为只有把每个人的个人人权、各省区权等“综合”成为所谓“集体人权”时，独裁专制政权与少数个人才能解除个人人权、省区权对其“假集体人权、真个人特

权”的解码器，才能通过“集体人权”这个支点去“四两拨千斤”，控制、独占人民的一切。

所以，当人民坚持“人权天赋”时，独裁专制者们却强调“人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亦

即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有人生来有“家天下”，有至高无上的自由、人权，他人则是无权的，

人权只是后天的产物。只有“社会发展了，独裁专制主们开恩、赐予了”，人民才能得到“人

权这个后天的产物”。可是只要有独裁专制，社会经济等如何发展，人民也不会有衣食住行等

生存权以外人权。

所以，当人民坚持“首要的人权是个人政治权利”时，独裁专制主们却强调“首要的人

权是生存权、发展权”，亦即“吃饱喝足”最重要，平等、言论与信仰等自由、人身与财产等

安全、民主参政等政治人权或者微不足道，或者高不可及。殊不知只有保障了政治人权才能

带来、并真正保障人民的“吃饱喝足”等生存权和发展权。没有政治人权，则只能是奴隶。

所以与此同时，中国统治者总是乐意剥夺民本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坚持家天下、党天下、核心天下之绝对特权私有制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其目的在于“掌握公有者”享有绝对私有，而“贡献公有者”没有私有，只有虚无缥缈的公有。财产权总是服务于占有者，不保障私人财产权是就无法保障人民其他的各种人权。显然，只要“人民的劳动成果和私有财产被‘公有’而成为无产者”，那人民只能永远挣扎在求温饱等的生存权中，当然无暇顾及个人政治权利，独裁专制者们则可无忧矣。所以独裁专制政权的最大社会发展目标是“人民温饱”，不因为“没有温饱”而起义，也不因为“温饱过了头”而继续痴心妄想什么发展权、财产权、自由言论权，索要个人政治权利。如此，则可“国泰民安，政权稳定”。

所以，鼓励“群众”致富重要，但党政官本位控制财富更重要、更安全。千万不能让财富成为臣民进一步、上层次的天梯。对人民，给啥，也不能给自由！施舍啥，也不能施舍民主！

所以，独裁专制下，没啥不能没钱，有钱也不一定有啥。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相信、不要附和、不要帮闲这样的比较：“西方价值观追求个人主义，亚洲价值观注重集体、家庭、社会”。这是独裁专制的“经学”观点。而实际上，两者的实质都是个人主义，不过前者是大众的个人主义，属于每个人的个人主义；后者是属于少数人的个人主义，它不过是以“集体、家庭、国家、社会”等名义盗窃绝大多数人的个人利益，成全极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如皇帝，大小皇帝。这是对亚洲的污蔑！对东方的污蔑！对儒家的污蔑！因为它只是代表了官方的“经学”传统价值观，而不是人民追求人权的价值观。

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是被独裁专制最长久的国家，也是农民或人民起义最频繁的国家。

当官本位权力引导、纵容、实施下的对公有制的“集体”的盗窃使贫富悬殊使击穿人民不能容忍的警戒线时，人民只好通过会道门、黑社会、地下组织、革命、起义、战争和改革等维护人权正义、重新分配财产了。当生存权难保，人民只有用生命去“暴力、犯罪、抗争”了。

不要忘记，“集体、国家机器”不是勤王的工具，不是个人窃党窃国窃民的工具。人民是

主人，政府是打工仔。人民是他们自己一切财产的主人，人民无需他人假借国家和集体等名

义驯服、控制、剥夺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不要忘记，只有大众利益高于政权利益，才能保证政权存续、连任。只有尊重个人，才

会尊重集体、国家；只有尊重个人主义，才能有真正的集体主义；只有尊重人权，才会确保

国家主权；只有个人力量即人权的增长，才有社会力量的增长，才有现代化中国！

不要忘记这个秩序：人权、国家主权、政权。人权至上，国家主权至上，政权或政府存

在的唯一理由的保障人权和国家主权。政治人权是先行官，它是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

基本人权的屏障和拓展机。

不要忘记，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匹夫兴亡，天下有责，国家有责，集体

有责，政权有责，政府有责”，国家、集体、社会、政党和政府为个人服务而不是相反。国家

机器、政府权力和政权，只能用于维护其主人之利益，即尊重、保障、发展人民人权。

不要忘记，国家主权为人权服务，为人民服务永不过时！

中国人民只有不泯灭了自由精神与独立尊严，才能获得物质成功。前辈的“不自由，毋宁死”，

应当是中国社会的灯塔！中国人与各地区应该以主权在民撤消“安排、待遇、计划、中央慰

问、亲切关怀、看望大家、代表核心看望大家”之类的伪善与皇恩浩荡，撤消由于“主权在

王，在党，在个人”而伪善飞溅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撤消任何形式的对人民人权

的独裁专制统治。中国必须如同撤消封建王朝一人一姓对全国全民的独裁专制那样，撤消一

人一党对全党全国全民的独裁专制！

说到底，自由民主和独裁专制此两者均不过是手段，而自由民主可以导向真正的人人享有

人权的人民集体人权，独裁专制则只能孵化出真正的人民没有人权而统治者个人有特权。独

裁专制社会才使少数人确保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特权至上，自由民主社会才真正使大多数人的

个人主义和人权至上。为什么中国统治者们坚持诡称“反对践踏人权就是干涉内政，主权高

于人权，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社会主义公有制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一党制优于多党制，

终身制优于任期制，一元化、单极化优于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国内稳定优于中国向国

际发展？”因为他们害怕人权高于特权，害怕失去帝制帝位帝王权益。

6、总代表扼杀公民，使人民沦为群众、分子

(1) 1989年6月4日零时10分，天安门广场，猛烈的信号弹攻势完全退场了。这预示着当局万事具备，只待清场、清剿、两手抓。国旗区后，民主之神伟岸玉立。她傲然她翘，怒视对面的中南海、紫禁城等千百年来新老独裁专制统治重地。她的使命就是挑战家国党国的

的一人一家一姓一党的独裁专制统治总代表权威，以“分离、监督、制衡、制约”等方式清除权力原罪，使它不能作害大众人权，使政府权力不是统治权，而是人民按法律委托并聘请政府为公共社会服务。

国徽高悬于天安门城楼、人民大会堂，可它究竟象征了什么？为什么一颗大星高悬于四颗小星？据称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象征各界民众，它们共同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前进。可新中国究竟属于领导者，属于一党一人统治，还是全体人民？四颗小星拱托一个大星，就是党性高于人民性、帝位帝王高于人民、代表者可以永远强行代表人民等的来源吗？就是新中国是家国党国而不是民国的来源吗？麦穗、齿轮在哪里，你们真的代表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人民自由民主在哪里，人权在哪里？五星代表的人民主权，真的高于城楼所代表的皇权皇位，即“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从官本位、官僚主义阶级统治下站起来了？

独裁专制统治至蛮，对民族、国家和人民人权决非一口之恶，它从多方面误民误国。现在，一党独裁专制执掌权杖下的政府之朝廷性质，剥夺了人民的“国民和公民”地位。如同过去的封建王朝官本位的“臣民”，人民现在不过是一党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的“党民”，不过是各大小独裁专制寡头等统领下的“封建领地”等“单位”里的“私民”。“党民”或“私民”虽不象奴隶们那样是大小独裁专制主的私有财产，却也必须事事需听命于“单位”里的头头，才能在井字田、庄园、计划经济等独裁专制体制下得到更好的分配，听话与顺从，被主子看上了，才是获得生存权和发展权等人权的首要条件。从“臣民”到“党民”都是“私

民”，不是自由民。故而中国史学界有“秦汉以后无国民”的说法，“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

大家知道，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政府及其社会中，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是公民，是自由民，而不是什么个人或组织的“私民”。公民一词，具有国籍、法律等广泛的含义。公民的一个近义词是选民，他对很多事情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作为国家的公民，他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享有不可剥夺的政治经济权利，并相应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私民”若要实现这些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权利，则必须听命于大小独裁专制主们的分配、赏赐，即所谓“这嘛，好说！关键要看你表现怎么样了”。这个“表现”好生厉害，导致很多人工作生活、个人爱好等不是为了自己和社会，而是力图用及时的、领导看得见的、不过分的、恰到好处好的“表现”获取“主子”的青睐，并以此求得生存、发展等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前提。

公民意识，其基本精神是自由民主和平等，其基础是法制观和道德伦理观，其准则是权利与义务相等，其核心是主人翁意识。它要求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经济、法律、道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同时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制约、支配。

我们承认这个自然过程中，即人类发展历史中，人不断争取自身主体地位和“自主活动”，要经过臣民文化—市民文化—公民文化的历史走向。而公民文化表现为平等、开放、权利等的网络结合与分配。我们也坚信，历史也已经和将证明，不摧毁奴性、封闭保守的臣民文化，人就几乎不能独立自主，个性决难发展。中国眼前的问题是，政府的专制朝廷性质并没有改变，其政治经济等权力不是人民选举、让渡、产生的结果，相反，是由独裁集团强取、窃取、把持、分派的恶果，独裁还要求人民必须接受这个朝廷的管制、分配、主宰，并且爱它。也就是说，人民承担的责任义务与他的政治经济等地位和权利不匹配。例如，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中国人从出生入世到老，总有数不清的官员管理他，决定他的一切，他也为自己生存、为国家发展勤劳一生，但几乎没有一个主要官员是经过他本人投票、

选举产生的，更不用提市长、省长、总理、国家主席等重要公职人员。这也许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悲哀，而人民的悲哀必然是国家的悲哀，因为独裁集团下的朝廷“政府”拖累人民、祸及国家。国名、国徽、国旗、国歌等一切的中国颜面上，都赫然挺立着人民的形象，但如果不是被独裁者们剽窃，人民主权的实际位置究竟在哪里？当局及其官本位体系根本没有公民意识，他们总不忘了自己是个高官，习惯把人民看做是他们被任命的“为官一任”的“官界领地”等“单位”里的“私民”，低称、贬称人民为百姓、群众。各级各地统治机构里，还专门设有“群众工作部”。

一些人称呼“群众、老百姓”的口气，好象他们是什么贵族，是党政官本位新贵。他们总是说“党要领导人民群众”，把“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和“群众”看成是区分人民社会地位的两条杠杠，总是发出制造社会鸿沟的“广大干部群众、干部职工、干部农民、干部警、干部战士”等刺耳的怪调，这是干部的，那是群众的。群众还分为进步群众，落后群众，受过教育（教化）的群众，愚昧无知的群众，还有什么“中下层百姓”。深入人民之中，叫（仿佛是从金字塔尖下凡）贴近基层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方法等。这些都是“党政官本位王权在上、人民在下”的提法，叫得再响，也与人民主权差老鼻子远。

他们把人民的文体活动称为群众文化、群众体育；农民进城发展是“民工”、“流民”或“盲流”；买彩票的人是“彩民”；股市投资者是“股民”；上网者是“网民”；爱提意见的是“刁民”，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王海等是“刁民”，贫困地区的是“穷山恶水出刁民”；叫怨喊屈的是“上访者”（不是下访者，干部深入群众中叫下访），反抗独裁专制暴政统治的是“暴民”。人民富了，积极提意见议政参政督政，他们就象父母那样居高临下地指责人民“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群众不理解，我们要多做工作”，等等。他们还生怕中国人民知道自己不是群众，可以称作公民，而在对内宣传时把“群众”出口国外，“西班牙群众集会，美国群众游行”等，殊不知那是国家公民集会，国家主人游行。

“暴民、刁民、网民、彩民、股民”等“民”组合词，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习惯问题，而是

根深蒂固的党政独裁专制官本位至尊所至。数千年来，官与民作为概念或现实，从来是派对存在的，而且是对立的非平等派对关系。即使字里行间只露出了“民”这一面，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官”的存在，及其对“民”的压力优势。如有网民，必有网官，有股民，必有股官，等等。反正有民必有官，否则，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谁，跟“邪教”跑了，加入非法组织了，造反了，怎么办！“官”的职责是统治，现在叫管理，是管理者，其实独裁专制的“管理者”与“统治者”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不把管理者称做“管理人”呢？为什么不把网民等称做“网人、彩人、股人或者上网者、股票投资者”等呢？为什么《狂人日记》的“吃人”现象一直存在？这“吃人”的实质大致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独裁专制制度吃包括党政官本位在内的所有人，吃一切人，第二层次是独裁专制制度吃党政官本位以外的普通人，即吃“群众”，只不过这一层次的表现形式常常是按等级序列，“皇帝吃所有人，大官吃小官，官吃民，干部吃群众，群众吃落后群众，落后群众移民、流亡，或者形成黑帮”。

（2）中国儿童曾经与美国总统有过一段非常经典的对话。那发生在1999年克林顿总统

访问中国期间。在西安，他对一名七岁的中国小姑娘说：

“你很想见我吗？”

“是的，因为，你是美国总统。”小姑娘有点腼腆，但毕竟是大胆的，天真的。

“你知道美国总统是做什么的吗？”克林顿不象是在设圈套，也不是卖关子、炫耀。

“美国总统是管美国人的。”小姑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就象她身体里的血液循环那般顺畅。

“唔……”面对这样的回答，克林顿显然有点意外，他好象血液突然遭到了梗塞。是啊，

他碰到了一个误解，一个童真的无知陷害。他哪里敢对美国人民说“我是管美国人的！”否则，美国人民不请他下台才怪。这是常识问题。

他怔了一下，用右手托住下巴，沉思片刻，非常认真，象在回答考官的提问，又象为遭

受误解而辩白：“应该说是美国人民管美国总统。”

是的，人民管总统！人民管代表！

这是一场未经彩排的双人话剧！地点是西安，是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中央封建集权国家的首都，也是 11 朝古都。背景是两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碰撞、交融，一个是具有 5000 年历史的官本位独裁专制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文明古国，一个是建国 200 余年的人民自由民主本位统领社会生活的年青国家。一个创造了“主权在王，在皇帝，在党即个人”的辉煌的独裁专制文化文明，一个正在创造主权在民的人权至上的文化文明。它们都是伟大的文明，不过一个因为特权高于人权而过时了，甚至走向了阻碍人民进步的反面，它应当改弦易辙，弃旧布新；一个因为人权高于特权而倍受推崇，它是人类进步的主航道。

两位一位主人翁。一位是中国小姑娘，它生活的东亚这块华夏大地上，她祖祖辈辈的繁衍历程中，只有至高无上的“父母官”管他们，从未有一个由人民自由投票选举产生的总统，哪怕是公平选举一个最小的干部，为他们服务，或者说是“人民管总统”。另一位主人翁是来自万里之遥的一名美国成年人，他因赢得了美国人民自由投票选举而获得了人民以任期形式委托的权力，成为美国总统。他不因为是总统即“最大的官”而至高无上，他曾经受到人民的质询、司法调查和弹劾，他必须守法。

这是同一个地球上的对话，却如两个世界的对话。一个人民主权立法，法律至上，一个党权官权大于法权，权大于法；一个官管人民，一个人民管官；一个特权至上，一个人权至尊。

小姑娘没有受到成年人的诱导或欺负。她很天真，泄露了中国天机，这不能怨她不给社会主义添彩，不懂外事纪律。她实在太年幼无知了，她对人权和平演变没有保持高度警惕，尽管人权是她天性的必然使命。她的祖祖辈辈被官管，她的左邻右舍被官管，她周周围围的一切人一切事情均被官管，她怎么能说出民管官或者“官为人民服务”一类的大道理，而为“管官民”的一党独裁专制涂脂抹粉呢。

克林顿道明了民主的实质：人民管总统。他可能不是不经意，而是太狡猾了，有备而来，企图贻误中国下一代。狡猾的狡猾，克某人不愧是罪恶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一反遭遇考试而变成了传教士，抓住一切机会搞和平演变。

“管理、管理，部门管理、行业管理、人事管理、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军事管理、教育管理、文化舆论管理、网络管理、救灾与扶贫管理、腐败与廉政管理、官员管理、群众管理、地区管理、国家管理、党务管理等等，不断改进管理，加强管理，加大管理力度”，管理在中国就是皇帝管官、大官管小官，官管民，还有党管官。管理，管理，中国是一个童稚都知道“官管民”、而非民管官的国家！皇权核心权官本位管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无人无事无物他不管。他越俎代庖，侵犯人权。他自作聪明，自以为是，他忘记了傻子的一大特征就是以为别人是傻子。他无处不在，无事不在，太常见了。他非常霸道，见好就上。不该管的他强行管理，如言论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经济活动自由。该管的他常常管不好，如腐败，水土流失，工程质量，社会信用，儿童辍学，拐卖妇女等。而且，凡有管理，必立条条框框，必设人设卡设婆婆，成为乱收费、索贿、制造社会不公与负担的温床，成为公民言行、社会发展的障碍。现在，许多“管理”基本上是收费的同义词，管理费，服务费，办事费，车马费，纸张费，误餐费，红包进贡费等等。管理企业的诸多部门基本是要“吃企业”的，“吃人”自然不在话下。而且，有些比黑社会还黑，黑道还“义”字当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红道、官道、官场却常常不仅收费不办事，还干歪事。他们把很多的税收、利润等用于修筑各类长城，推行压力统治，禁锢人民，防止人民造反，当然包括镇压。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是谁出钱出力修长城，禁锢谁，收刮民财以治民。陕西人把村霸叫“村盖子”。他们盖住全村，红道黑道，黑箱操作，欺男霸女，为所欲为，黑全村。他们用各种长城，把全村垒成土围子，自己做土皇上。大到一个国家，只要推行独裁专制统治（无论开明统治，还是残暴统治），统治者便是大村盖子——朝廷盖子、国盖子、民族盖子，是国霸、民族霸、人民霸。他们也用各种长城把国家搞成一个土围子，里面的不许干预朝政，外面的不许干涉内政。他们舒舒服服做土皇帝，想咋的便咋的，号令天下，国民

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否则以“颠覆国家、叛国、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等治罪（不融于世界民主大潮，以“新罪名”陷害人民的国际接轨倒玩得很纯熟）。可是千百年来，中央集权式管理的独裁专制制度沿袭至今，不乏官员，不乏各级各类官僚机构、官权、官员，多如牛毛的管理规章与制度不可谓不全面、不细致（常常交叉重复），不可谓不制度化、经常化、责任人化、连坐化，但什么时候管理出了几个什么盛世？什么时候管住了官本位权力腐败等丑恶？不该管的瞎管，该管的管不好，中国的病根就是管理系统太庞大了，管理者太多了，就是统治当局管得太宽、太多了，管得太不正当了。仅近代以来，满清管理，国民党管理，共产党管理，中国又被管理成了什么样子？纵向比较是进步了，但横向比较，不仍然差距甚大吗！这“官管民”如此不争脸、奏效，我们为什么不能重打锣鼓另开张，还千方百计修筑各类长城，防范、镇压人民争取“民管官”的民主运动？

（3）中国社会一直有官民之分，“官”比“人”高一级，“民”比人低一级。中国人一直不是人民、公民，只是民。是谁的民？是官的民，是皇帝的臣民，是各级父母官的子民，是党国的党民，不是国民、公民；是官对民拥有处置权，而民只能依附于官。各级权利机关里的官，其条条本本中定位的是公仆，他们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骨子里却把公民当作群众、子民，自视其为父母官。

父母官的含义是官即父母，官即民之父母。千百年来，帝国也好，民国或者党国也好，也许独裁专制之中国一直是家国。这家国和那党国下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是滋生父母官概念及其官本位文化的大产房，是父母官的大产房。它们均实行家长制，而有家长，则有子女。以皇帝或集体之核心为首的官本位系列是高高在上的父母，人民不过是子女。这是“父母官”一词来历的源头。其中，皇帝是最大的官、最大的父母、最大的家长，其他的官员当然也都是人民的父母和家长们。皇帝作为天的儿子，除非因暴政而天怒人怨，他等实际上不受任何管制。

我的天，12亿中国人，不过是12亿儿子！

我的天，中国是一个“父母”满天飞的国家。科级父母，处级父母，局级父母，直到元首级父母。元首也是儿子，他们自称是天的儿子。中国人这一辈子真吃亏，得有多少来历不明的父母呀！不过，来历还是有的，如组织考察、提拔、指定接班人等。嗨，人是不能选择父母的，故子民是不能选择父母官的。所以，中国人民至今无权自由投票选举，无权通过选票委托自己的权力，无权选择父母官——掌握社会公共权力者。多么一脉相承！既然是父母，就得有架子，孝子贤孙就得卑躬屈膝伺候着、贡着，就得依附着。不要忘了，除了“儿子身份”，中国的人民大众也有一个“父母身份”，即“衣食父母”。为什么中国“人民大众”兼有“父母官的儿子，和父母官的父母”完全颠倒的双重身份？原因在于以皇帝为首的党政官本位既需要统治人民，还需要人民供着。只要他们需要，人民大众可以有无数身份。这个非“主权在民”而是“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的制度，使社会伦理完全颠倒了，是真正的儿子，或者是人民委托、雇佣的政府打工仔，总在欺负父母，欺负国家的主人、老板。这也是中国社会常常发生不敬老、欺老、不养老的内在原因。可气的是，只要独裁专制制度存在，父母官就不会消失，衣食父母与儿子就要一辈子做下去，还传宗接代、传辈。人民最大的出路在于敬孝，终生不过为争做优秀子女或者党的好儿女、好干部、突击手、劳模等地位而奔波，以期讨得比其他子女或奴隶更好更多的封赏而已，如农转非、转正、提干、分房、评职称、加工资等。最终，还可被“组织考察，任命，提拔”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我的天，多么可悲，中国人从生到死，总也长不大，总逃不脱做衣食父母、做儿子的地位，而且只有争做孝顺、听话、不抗上的好儿子，才有好结果。否则，清理门户，取消你做儿子的资格，扫地出门，让你下岗，取消有关待遇和福利，让你和你的家人成为社会边缘人，自己去闯、去混吧！一旦成为群众，麻烦可就多了。谁都可以管群众，管几乎成了收费、罚款等的代名词。社会上，官府衙门深似海，有的是“关卡、官卡，地雷、违法”等着你这无家可归、没有“单位”、没有“领主”的狗。一不小心，我查你三证、四证，没有？没有，交罚款！我法治兼人治，

罚款等修剪你的名目多的是，人穷志短，天天让你为生存而挣扎，还考虑什么自由、民主、人权。狗还不嫌家贫呢，你不依顺我，嫌我独裁专制，我让你无家可归，连狗也不如。不听家长的，叫你好受得了！

秦制以来，中国社会还一直畅行一些短语，如“与民同乐”，“辞官为民”，“削职为民”，“贬为庶民”，“民不与官斗”，“君打臣不羞，官打民不羞”，“以下犯上，以民犯官，大逆不道”，“爱民如子”，“一芥草民”，“达官贵人与平头百姓”，“贵官与贱民”，“大官与小民”，“小人，小的不敢”，“忠臣顺民与乱臣贼子”，“抢劫民女（抢劫官女又是什么意思）”，等等。同时，官本位们最害怕的也是沦为“与民为伍”，那意味着没有进步，是平头百姓一个，什么社会地位、社会保障也没有，是退步。反正，“民”不是个什么值钱的玩意，是低等、低劣、低下

的代名词。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的中国里，什么都缺，就是“民”不缺，它有的是，大把抓。“民”算老几，“民心”算什么，“民意”管嘛用，它跟飞黄腾达、生活富裕、治理国家没关系。

可是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多么希望活得有尊严，不依附任何人！多么希望活得有自由精神、有独立人格！多么希望被当做“人”看待！多么希望活得象个堂堂正正的“人”！多么希望真正实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外国独裁专制势力下站起来，也从国内独裁专制势力下站起来！

但是，独裁者们从骨子里瞧不起人民，独裁专制体制的社会体系里，压根就没有人民这个社会主体的地位。就是每年一度的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向人民述职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大量使用了“群众”而不是“人民”或“公民”这样的词语。也许，这不愧是未经人民自由投票选举而委托主权的政府，所以可以对人民代表无礼，而继续把人民看做“私民”、“群众”、“党民”、“子民”。

单说前不久的五十年庆典吧。在党政文告和新闻传媒里，凡涉及到非官员，则使用了大量的“群众”一词。如“首都国庆群众游行”等。这是投向人民共和国生日的芒刺。“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了，人民仍然无公民身份，更不能享受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

几乎任何表格，都有一栏选择填空：党员、干部或群众。人民不过是独裁专制阶层党政父母

官的臣民、儿子而已，不过是群众——一群人而已，一大群只有讨好、俯首帖耳于各级独裁专

制者们才能生存的低等人而已。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什么天命呢？是人

人平等的公民，还是皇民、臣民、党民、私民、群众、百姓？是享有民主权利的自由民，还是党政官本位里

的“单位人、井田人”？翻开字典一究，“群众”一是泛指人民大众，二是指没有加入共产党

和共青团组织的人，三指不担任领导职务的非共产党人士。另外，字典解释“群众组织”为

“非国家政权性质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等”。其实，从政治实践来看，中国各民主党派、

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等均是“群众组织”。

显然，党国、党天下之“群众”，是有政治含义的。它范围相当广，类似于于家

国时代的臣民，甚至更差。人民大众和“没有参加党团组织”的人均属于群众系列，群众系列就是“非官”

系列，处于种党种姓种人等级制度的低层。非官的群众的“天命”是要低人一等，边缘一些

的，享有更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权利，是不能当干部，更不能做一把手的。它与人人平

等的“公民”概念相去太远，只比“群氓”有所进步。字典解释群氓为“古代统治阶级对人

民群众的蔑称”。但是，历史使人民从“群氓到群众”，而非到“公民”，也同样反映了“当代

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蔑称”。

在中国，“群氓，群众，百姓”代表着一定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处于“种姓，种党”制度

的低位，并显然是被排斥在一党独裁专制制度的核心以外的。说白了，极权与集权制度

下，群众几乎是受统治者的同义词，是官本位权力系统的受力点。

“我是流氓，我怕谁”，这话能行。人民可不敢随便说“我是群众，我怕谁”。你是群众，你

谁都得怕，是个官，是个“员”，就比你强，高于你，就能管你，卡你，关你。你加入种党、

执政党以外的组织，你练法轮功，你信仰宗教，仍然不能改变你群众身份。你交税多，本事

大，专业好，贡献大，能拿金牌，能出科研成果，产质量好，那有什么用。你不是党员，就

难逃“群众命运”。而且，他们“统治阶级”也越来越表现出欺软怕硬的样子，你做顺民式的

群众，就比做刁民式的群众多吃亏。

你不是流氓，嘴里又喊着“我是流氓，我怕谁”，效果会更好一些。要真是被“官府，官卡，

关卡，组织安排”逼上了梁山黑道，形成人人不愿意看到的悲剧，那他们绝对真的害怕你了。

但是，直到有一天，人民又续接1989年民主运动，上访、上书、上街，去广场、去中南

海、去一切公共场所和窃取人民主权的权力机关，去集会、演讲、静坐、游行、绝食、示威，

推动中华全民和解的和平非暴力人权大进军，直到创立民主中国，取得主权在民的公民地位，

人民才不会怕除了法律以外的任何个人、党组织、官府、官卡，情况才可能彻底好起来！

那时候，三权分离了，多党轮流执政了，司法独立了，新闻自由了，有“民意测验”，有

“民选”，有“全民公投”，人民选票值钱算数了，能用百分比统计了，能决定宪法，能质询、

弹劾了，能决定总统等一把手的交椅了，“民心民意”是社会的风向标了，他等官们绝对抛弃

“父母官”的大架，绝对不敢蔑称人民，绝对“重民”、“尊民”、“拜民”，绝对甘作民子民孙，

他等绝对满脸堆笑、五体投地地争取每一张人民选票。

（4）可是眼前，芸芸众生的“民”们，“子民、儿子们”，“群众们”，再见吧！靠后站

吧！而且，另外还有比“群众、百姓、子民、臣民”等词更糟糕的，是“分子”。它常常后缀在一些词后面。被它跟着，可不是什么好事，至少不是好人，如犯罪分子、贪污

腐败分子、流氓分子、违法分子、不法分子、打砸抢分子、黑帮分子、敌对分子、政变分子、

反叛分子、恐怖分子、劫机分子、动乱分子、暴乱分子、暴动分子、武装分子、非法武装分

子、分裂分子、自由分子、民主分子、民运分子、民联分子、卖国分子、反动分子、反党分

子、党内游离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国民党分子、国民党右派分子、共党分子、四类分子、五类分子、黑五类分子、右派分子、

右派兼坏分子、右翼分子、5.16分子、西化分子、宗教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好战分子、

纳粹分子、斯大林分子、不良分子、坏分子、刑满释放分子、AB团分子、地富分子、资产

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顽固分子、死不悔改分子、“四人帮”残余分子、

军国主义分子、台独分子、藏独分子、达赖分子、狂热分子、法轮功分子、邪教分子、人权

分子、骨干分子、进步分子、积极分子、运动积极分子、入党积极分子、爱国分子、反全球

化分子、破坏国家秩序和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捣乱分子等。

还有个“知识分子”。

很费解，读书人、知识者、资产阶级、宗教信仰自由者、积极入党者、进步分子等，怎么与

纳粹分子、黑帮分子、违法犯罪者、劫机分子、刑满释放分子、腐败分子等尿到一个壶里去

了，都是“分子”一类的货色。是什么观念和意识形态，使汉语造词与中国文化怎么会出现

这般搭配？什么时候，也搞出一些“帝王分子、核心分子、总代表分子、官本位分子”试试？

查查字典，分子的释义为“属于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或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实际运用

水，它表示成员、要素等，较少单独使用，往往象尾巴那样后缀，起修饰作用，组成偏正词

组。不过，被它修饰，或者尾随，通常不是什么好事。除去真正的“坏分子”，它一般表示“坏”，

使“正”被它“偏”了，最多也只是表示“由‘坏’正向‘好’转变”。如“进步分子”，一

指进步者，二指可以争取、团结的正“求进步”的人。如爱国分子，多指爱国，但不爱党和

社会主义制度，属于一个政权既要防范又要团结的统一战线对象。称他人为“分子”者，往

往是居高临下的；自称为“分子”者，往往是自嘲自讽、甘拜下风，或者是主动反叛。如果

它是褒义，为什么不说领导分子、干部分子、共产党分子、左派分子、好分子？

显然，在中

国的独裁专制官方主流语言里，“分子”不是褒义词，也不是完全的中性词，它更多的是贬义

词，有明显的“坏、糟糕、差劲，不值得信赖，该遭怀疑、抵制、排斥，该受打压、管制、

清除，该接受改造、蹲监狱、乃至枪毙，是社会渣子，不能入主流、处于社会边缘、底层”

等含义。

在中国，谁被党政官方当局安排了“分子”尾巴，有“分子”尾随，可就几乎完蛋了，他们

多半属于当局要“防范、斗争，揭批、无情打击”等一类的了。除了真正的犯罪分子，一切

有碍于一人一姓一党独裁专制的社会力量，都可以被高高在上的所谓主流社会即统治阶层按

上“分子尾巴”。资产阶级分子与西化分子已经在中国倒尽了霉，党内外的“分裂党，反党”

分子结局更惨，法轮功练习者现在背上了这样的倒霉尾巴：法轮功分子。积极分子也不是个

什么受听的词，它的释义为“以前不怎么样，现在积极了”，虽是表扬，却含有明显的贬义。

知识分子起源较早，但倒霉于反右与文革。而且，它还有党内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党

外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和西化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差别。多么详细、森严的政治等

级划分。一个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别为己任的政党、核心及其党国、核心国政权，为了

确保一党制、终身制的种党、种人执政地位，它本身却人为制造了多少红匪、白匪，多少非

法组织、邪教，多少流亡、有国不能归，多少阶级、多少社会差别。不容异己，不重异己，

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窝里斗、窝里反，有了这些，全民和解的人权大进军，在中国多么艰

难。

现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早改变了，这个蔑称却留用至今。是鲁迅斥责的“哀其不幸，怒其

不争”，还是见怪不怪的麻木？它更是焚书坑儒基因使然！清代以文字狱随意砍读书人的脑袋，

现在给知识者后缀一条“分子”尾巴。中国人应该木然、安然、欣然受“知识分子”称谓吗？

中国国家与各地各家庭各人重视教育，不就是要培养出知识分子吗？也许，“知识分子”称谓

不再含有“嘲讽、贬义，排斥、压制”等，人们也习惯它而见怪不怪了，不需对知识者摘“分

子”尾巴、更名了，但“分子文化”现象中折射出的消极东西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分子文化”实在耐人寻味。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反党分子、民运分子、

台独分子、藏独分子、法轮功分子等，都是“分子一类”的东西，下一个被按上“分子”尾

巴的是谁？也许会来自网络界人士：网上的言论自由太过分了，揪出几堆网络分子。不管怎样，

反对独裁专制者，反对或厌恶中国还有皇帝者，不与党保持一致者，主张人民拥有自由民主

与人权者，主张民主改造共产党者，非党政官方主流的，肯定“分子”难逃，在劫难逃。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麻烦一直在于“民”与“官”的本末倒置，在于“公民是群众，人民人

权低于党权、政府组阁权”，在于“分子”尾巴常常被错误安装。

现在中国有个遗憾，有小部分很好的人，当了官，被推举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拿了金牌、唱了歌、演了戏、说了小品等成了名人，或者写了书、评了职称，或者受到“政府关怀”享受了国家特殊津贴等，就忘了平等和平民意识，抛弃了平等精神。他们把“我们老百姓”变成了“那些老百姓”，一口一个“我深入群众”、“我深入基层”、“那些老百姓真不象话”或者“真可怜”。俨然已是“官家的人”。他们开始高高在上，对人民要派头或寄予同情，而不是借着这个台阶做“棱子”，对独裁专制刚直不阿，坚持真理，为人民说话，办事事。一些人把把门者说：“嘿嘿，我是某某某，可以不买门票吗？”一些人挤在买票队伍里高喊：“请让开，我是记者，让我先买票。”

有一些人拼命包装自己，竭力使自己看上去象个“贵族”，穿名牌，去“帝王将相”饭店用餐，住“贵族公寓，等等。还有的名人甚至也象独裁专制者那样把自己神话了，听不得反面或批评意见，如挨了批评，就指责人家“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太可怕了。有“公开批评江泽民，揭露六四，是危害国家安全，反社会、反政府，蹲监狱或掉脑袋”撑腰，你就跟着攀比？

名人大概应该与名人自己经常提及的“精英”相差不远吧？不要求别人，名人精英们至少自己应该多一些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等人权精神。不过分吧？

时至今日，尽管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五四运动、中共奋斗、抗日战争、四五运动、1989年等倍受缅怀，但民子民孙尚未出世，父母官仍端坐高堂，兴旺发达，精简机构奈何他们不得，自由民主和人民主权更挨不着他们的毫毛。而且，父母官的毛病还在传染。

但是，创造历史的是历史，而不是帝王与精英。他们自己也是历史的创造物。

7、仁治德政：总代表决无仁德

（1）独裁专制制度以官本位为基石，其一大特性是依赖、推崇人治。与统治特权高于人民人权相应的，是人治高于法治。这导致其人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判官，推动社会发展动力，另一方面则本身制造了社会不公与信任、信仰危机，并以腐败祸国殃民，

使社会难以前进。

人治德政是独裁专制制度的基础。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他还

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因此，“为政在人”，

而“在人”则在于统治者的德行。一部《春秋》，就是把国家治乱的根源归结于道德，强调道

德教化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应该忠于君主，服从国家，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国家“不可一日

无君”。

于是，社会把进步与人权发展寄予个人、个党等个体的德政，重个人修身，重执政党的群体

修养。它推行人治，把治国看作是个人个体修身的延续，强调他们在治国与历史进程中的作

用。

但是，缺乏民主法治，官字两张口，变化无常最没准。人治靠政策而非制度，其一大特点是

不稳定、多变。它象月亮，初一到十五，天天不一样，人人不一样，事事不一样。人换政策

换，人亡政策变，本人变化政策也变。发誓的“50年不变、100年不变”也会变。变了，

就变了，他总有理由，平头百姓能把他怎么样。

统治者还常常装扮成圣人，“我用人格担保”，“用领导者的人格力量鼓舞人民，加强思想政

治工作，加强凝聚力”，而大小独裁者们的人格往往没有信用，难值几钱，泛道德化只是美妙

的泡沫或害人的谎言。统治者的德行很难推敲，危害国家、人民、民族最重者，往往就是权

力最大、几近于神的“人格最完美者”。

独裁专制政权对人民是没有信用可言的。儒家提倡仁治德政，要求国君“爱民如子”，爱护百

姓，道德高尚，还有现代人治思想，如提高共产主义觉悟、三讲、为人民服务等。虽然我们

承认德政本身是益于社会的，但独裁专制体制藉以支撑的德政中的传统道德观念，又总和社

会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如官本位等紧密相连，使得平等、法治理论与法治经验在中国思

想资源中极其稀薄。这使得独裁者及专制体制内的官僚者张狂肆意妄为，却要求天下百姓以

克己为处世之本。

如“王子犯法，不与庶民同罪”，“刑不上大夫”，“受党纪处分，免受法律制裁”等，使得社

会道德标准失去基础。对上“姑息养奸”，每一个“上层的下层”（实际上是除去皇帝、元首

等以为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不同程度的不满状态。故而，国君及其官僚阶层，绝大部分时间让人民失望。

德政基础是性善论，而擅用权力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权力有原罪。如果握有权力者“愿意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必然有可能堕落为危害人民的妖魔。虽然德政是所谓中国政治传统，

但“鉴不能自照，尺不能自度”也是流传久远的中国智语。古今中外，失去人民监督的权力

几乎从来不放过利己谋私的机会。据一位编者在肯尼迪的《扭转颓势》一书中记载：“五十年

前我在芝加哥的一辆电车上曾听见一位妇女给一个孩子解释说：‘总统住在华盛顿的白宫里，

他在那里签署人们呈交给他的法案，只要人们不制止，他愿意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一

位普通的美国妇女道出了逃避法律监督的权力的危害，

假定的“伦理教化（实乃社会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修身自律”成了“先小人后君子”，远

不如民主政治的“先小人后君子”的预防性那样科学、可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则更加

荒唐。这些包含了许多悖论，经不起推敲，并编织出大小独裁专制权力不受监督，在黑箱里

大肆腐败的温床。事实上，没有全民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做保障，没有捍卫人权的国家信念

深入国家统治机器，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也是难以苟全的。因为不仅独裁者与官僚体系无德，

满嘴的“仁义道德”，全是“吃人”二字，他们还希望，并以利益分配权挑动民众互斗，好让

自己隔山观火，便于分而治之。

（1） 缺乏民主制约，官字两个口，说话有两手，法治也两手。

孔子没有为治国安邦设计一个三权分离的民主模式，却过分相信统治者的道德力量与德

治。而德治思想下的人治既难，且没有明确的条文标准，随意性也大，缺乏法治的明确、稳

固、公正、一视同仁。

统治者出于统治利益需要，如巩固皇权、党权等特权，又无外界监督权力，必然对人民

人权缺德。而且，把人民国家窃为家国、党国，本身就是对人民的无德、缺德。所有这些，完全忽略了法的重要性，完全忽略了人性恶的一面，给统治者干无法无天的勾

当留下了空间。独裁专制体制下，“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皇帝权力神圣不可侵犯”，

统治者“乾纲独断”。法治与法律被摈弃于外，与治国无关，它的制定也与人民无关。即使有

“法”，它也是少数专制者制定的，它是大小独裁权力的附庸，是统治当局意志力的体现。当

某种利益需要时，尤其是少数人需要剥夺大多数人的天赋人权利益时，他们可以随时更改或

破坏“法”。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东西变得最快：一种是朝臣，一朝天子一朝臣；另一种则

是朝政，一朝天子一朝政策。完全可以这样说，专制制度里的“法”，不是民主法制的“制

约有权者”，是执政当权集团制定的个人法，家法，族法，党法，它很少制约有权者，更多的

是管理无权者。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法律乃是个人的专断，缺乏理性的管理与司法，全是家长式的处理方法”，

这不无道理。其基本原因是独裁制度里法律既不产生于人民主权，也不保护人民人权，所以，

它也根本无从真正主持正义，保障社会公正、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沦为空话。而法治的真正内涵在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在美国，近乎所有问题，

迟早都要

变成司法问题。而法律则可完全排除任何个人对问题的独断裁决和控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是个杰出的帝王，为让百姓安居乐业，巩固政权，他平定天下后就下令平分

土地。岂料个别官员查田归来，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为其详，儿子答曰：河南帝

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刘秀颓然无可奈何，只好妄做“有

道明君”。

“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这能算“公”吗？这能算“皇帝讲民主与法治”，或皇帝重情谊，

或无能吗？更不是，他们能着呢。九十年代，为保护居民生活环境，中国一些城市陆续出台

了“市区禁止鸣笛”的条例。调查表明，违反者多为出租车，市民很有意见，希望政府依法

执法，严格管理。但是，由于反对一些不合理收费、乱管理等腐败行为，很多城市的“的哥”

已经发起了数期规模较大的罢工抗议。慑于“稳定”压力，政府不代表大多数人民说话了，

不敢“惹”违章者了，只好让该条例形同废纸。姑且不论“市区禁鸣”是否合理，但就专制

政府在“依法治市，依法治国”等态度上，他们不仅不会真正依法办事，更不会以人民利益

作为“三个代表”的最高准则，他们的最高准则，最大价值观就是“稳定既得利益”。

一个古代“平分土地”，一个当代“市区禁止鸣笛”，它们似乎风马牛不及，但家国、党国是

一脉相承的，其统治利益是一致的。

国内事务上，“喇叭声”是小事，“的哥”力量也是有限的，而且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

了稳定，他们尚且能得到政府庇护，那么可想而知，政府会多么不遗余力地保护政权体系内

的贪赃枉法行为，尤其是那些要害部门，位高权重者，更甭说同他们穿一个裤裆的人。

国际事务上，为“结与国之欢心”，求得国际社会对其非法代表权的认可，对其残暴的宽容，

对其腐败、无能的吹捧，他们又会出卖多少国家民族权益！袁世凯为求帝制帝位，稳定它们，

搞了一个《二十一条》，他之后的专制政权又搞了多少个《二十一条》？

这难道是仁，是“德而圣，圣而王”的皇帝德行吗？皇帝能“心怀天下百姓”，做称职的“三

个代表？这是不是“以权谋私，以党谋私，以公谋私，以国谋私，以民族谋私”的老版本？

对天下百姓来讲，有法不依，人治不仁，仁治不公，德政无德，腐败透顶，由此可略见一斑。

为了稳定其统治利益，陷害忠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也不在话下。瞄准他们这个“谋求稳定

“的痛处，政治生意，经济生意，文化生意，什么都好谈了。

难怪洞悉中国官僚体制历史的史学家翦伯赞说：“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因为历代的统治者，

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完。”显然，他指的是封建等一切

形式的独裁的统治者及其专制制度。

（3）从本质上讲，当今中国，当局要求党政官本位“为人民服务”，也是一句地道的空

话。它常常是人们良好的愿望和控制各级官员的手段。权力的来源决定权利的服务方向。在

独裁专制制度里，权力是从上至下级级分封的，大小官员由组织部门“考察、分封”，替帝王、

核心统治“家天下，党天下”。

各级官员的权力来源（包括提升和降级，处分和免职，贬为“庶民”等）是上级组织、

领导，权力的作用点向下直指人民。他们的使命是代表总代表、核心统治辖地（当局自称为

管理、服务），即统治小官、人民，服务大官、上级。

权力的这种封建属性，决定了它只对掌握了它的任免力量的上级和组织负责、服务，尽

节效忠。否则权力难保。人民不能决定权力的去留，人民算老几？它岂肯屈尊为人民服务？

食王爵禄受皇恩，他怎么能为人民服务？否则，岂不是违背常理、人性，屁股坐歪了。

故而，政权早期，常常能够出现一批“青天”，但越往后来越是凤毛麟角了，使“以德为政”

成为水中月的幻景，把倡导它的人们嘲弄为一次又一次的“乌托邦”者。

古往今来，皇帝们能够“以力服人者霸”，但决不能做到“以德顺人者王！”任何独裁专

制的本质就是特权吃人权，就是“吃人”吞吃人权的缺德，它怎么够资格奢谈德治仁政？只

有有良知的党员、官员才会为人民服务。虽然他们贡献于人民人权的时候也为独裁专制添了

砖、加了瓦，但谁能否定这是好官、清官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最好方式之一呢。这是中国“好

党员、好官员”的悲哀。树劳模，立先进，不应当是巩固独裁专制统治的手段。热情有消退

的时候，人格力量也有低潮期，好心眼更会被坏心眼吞噬。焦裕禄虽好，但不能指望大家都

那样为人民服务；雷锋值得学习，但不能指望大家都是雷锋！中国的问题不是学习雷锋，而

是每个人尽力做好份内的事情。不是学习焦裕禄，而是每位官员必须“依法治己”，接受法律

约束，不做坏事，然后才是依法治国。不是各级官员与社会大众讲奉献的问题，而是他们的

利益、人权等是否不受统治者制度性侵犯。

一俊不能遮百丑，劳模、突击手、五好军人和优秀党员等可以激励人们前进，但不能改

变官本位大面积腐败的事实！我们尊重先进人物，社会需要先进人物，但更需要先进制度。

人民需要鼓舞，更需要用人民主权立法去监督执政者守法，才不至于因为腐败与社会不公等

而倍感沮丧。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说，除了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犯罪分子等践踏人权者，

不同党派、不同岗位上的中国人民都是先进人物，他们都是中国默默无闻的脊梁！忘掉独裁

专制的仁政德治吧，忘掉独裁者的人格力量吧！看清皇帝官本位对人民的《厚黑学》和《反

经》。

（4）再听听古戏怎么唱的：千里为官，谁不为钱？若不为钱，谁来当官？中国人民早

就看明白了！当官能不贪吗？贪者能有德吗？为什么当今中国人们争着当官，党政机构难以

消肿？因为当官好处多，收益大，有人上贡，可以“贪、腐败”。为什么一些小官、副职，不

惜本钱买官，不惜雇人杀官升官？因为买官是一笔收益不错的投资，因为杀人升官的收益大

于杀人抵命的法律风险。升官发财是并列词，更是因果词，象鸡能生蛋，官位能生财，他们

绝不会用一只鸡的价钱买一枚鸡蛋。福建省的一名县委书记曾经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

来；当官不收钱，退休没本钱”。独裁体制下权力投资的巨大回报率，使腐败在权力交易中

如同瘟疫那样蔓延，以权谋私成为社会普遍事实。而一个身居要位的腐败渎职的独裁专制体

制内党政干部，比一百个小偷、抢劫犯、不良职业从事者等更能危害社会。

人在官位上，官位通钱财。什么时候当官无特权，还有人愿意留在官位上，或者放弃其

他发财机会去做官，这样的人自然不是没有德行的人，机构改革就顺利了。眼睁睁的当官

有好处，凭什么裁减一批人，保留另一批人？谁服气？不要给官蒙上“德”的光环，他就是

普通人一个，一个在政府里为人民主权打工的人。他们是普通人，他们有人权需要尊重，有

“人之初，性本善”闪光，也有“人之初，性本恶”需要防范，需要监督。也不要搞什么“四

有”标准，什么考察、推荐、选拔等规则，标准与规则多了，当事人、局外人都记不清，又

多出一批专门解释标准的官员。人民选票是最好的标准，自由投票是最好的规则。民主法治，

就是人民选举、聘任官员，并用法律监督他们依法办事。说具体点，就是人民按照人民主权

立法之民主政治原则，通过自由投票选举、聘任代行公共权力、代做公共事务的人，并同时

用法律监督这些被称为官员的人，依法办事，不得违法，违法必究。

中国人，不要期盼清官，而要用制度制造清官！记住所有权力犯罪的原因，记住杰弗逊

的一句名言：“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侈谈对人的信任，而是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他们不做坏

事。”我们说政治体制是社会价值的主要物质载体，无论哪种形式的独裁政治体制，如封建的，

纳粹的，斯大林模式的，都更易于从内部产生腐败，并殃及全民全社会。因为独裁者垄断权

力后，为防止其他竞争对手起而代之，处心积虑设计官员权力互相牵制的官僚权力体系。不

仅造成机构庞大，缺乏效率，而且凭空造出更多的不劳而获的阶层，耗费国民税金与财力，而且朝廷事权不一，职责不明，政令懈怠，政府效能低下，运转不灵。具体到官员身上，是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妨碍了社会公正与正义，并且愈演愈烈，不可收拾，形成官员看破红尘，百姓看不到前程。上行下效，统治无德，德政不德，致使社会普遍缺乏公德，底层人民深受其害。就拿如今社会来说吧，人们利用职业与权力吃拿卡要，敲诈勒索，搞非法交易，大到贷款、批文，小到办结婚证、死人火化，处处设垒，致使普通百姓都有“办事难”的愤慨。而现代社会里，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政治统治，就是法律统治。难怪王亚南研究《二十四史》后，感叹：《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确实，中国有古语“独夫民贼”，皇帝、核心、总代表等是最大的贪污犯，他们是人民国家的窃贼，是人民主权的窃贼，是人权窃贼。在此，强行代表是盗窃的同义词。按说，过去是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的家天下，全国一切都是皇家财产，只有皇家作为主人是不偷自家财产的。其他人嘛，分配什么，得什么，若把那些没有分配给自己的据为己有，就是贪污、盗窃。按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党政官员应当与人民一样，都是法律规定的国家主人。主人是不会偷自己财物的。可为什么党政官员的浪费、贪污、腐败等丑闻不绝于耳呢？国营企业难以搞好，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东家自盗”。显然，一些掌握公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领导干部，并没有把自己当主人看待。而事实上，也不能冤枉党政干部，他们的确不是“主人”，而且人民也不是主人，顶多是名义上的主人。一党独裁专制的党国，就是党天下，这决定了国家一切财产属于党，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党所有制，国有企业是党有企业，人民是皇帝臣民式的党民，不是公民，等等。可见，这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与一人一家独裁专制是一个性质，家天下也好，党天下也好，由于没有解决独裁专制问题，不是主权在民，人民不是天下的主人，它们都无法解决同样的“官偷”型腐败问题。官偷，偷谁？偷家国的，偷党国的；偷皇帝的，偷核心的。最终，都是偷人民的。而且，皇帝与核心作为官本位里最大的官，可以最肆无忌惮地偷，是人民最大的盗贼。可见，任何形

式的独裁专制社会里，不应该是统治者要求“群众”提高“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

等觉悟，而是他们“非群众”等人物要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公民意识，“眼里有人民”，要克

己复礼，克己之私欲，复善待民之礼，不偷窃，不贪污人民与国家的财产。要求“人民群众”

有爱国主义热情和集体主义精神，不是纵容自称为“非人民群众”者的偷国主义和误国主义。

否则，被统治者偷得精光的人民只剩下造反的“觉悟”了。

俄罗斯沙皇时代，一个沙皇对其继承人儿子忿忿抱怨，“这个国家，好象只有你和我偷。”

前苏联有一个笑话：勃列日列夫领着母亲参观他豪华的别墅后，母亲忧心忡忡说，“勃儿，如

果红军又来了，你可怎么办？”到底谁是贼？前苏联的共产主义时代曾经有一首最流行的歌

曲，可以反映一切独裁专制下的人民心声：

现在买一瓶伏特加要我们花五个卢布，

可是我们还得喝。

替我们给勃列日涅夫捎个信儿：

十个卢布买一瓶我们还愿意花，

要是它涨到了二十个卢布——

啊呀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将向冬宫进军，

再次占领它。

是啊，当今中国，秋收起义又来了，南昌起义又来了，解放军来了，有些人可怎么办？

中国和前苏联的一党独裁专制时期，人民不是因为自然灾害贫穷的，而是因为被人为剥夺而

贫穷的。而且，制度性剥夺造成的制度性贫穷，则更是需要另外一个人民主权立法的制度解

除它。“洪洞县里无好人”在中国流传久远，是对独裁专制衙门官府丑恶的典型概括，即独裁

专制里无好人。但客观说，独裁专制里有好人，只是它更容易制造坏官，更容易制造“好人

一生不平安”悲剧。

独裁专制政治的体制性腐败，使政治和政府彻底丧失了除恶扬善、代民行使权力、为民谋取

利益、巩固国家民族团结等的能力，导致了人民的普遍失望、绝望，逼迫整个社会认同危机。

上上下下只好普遍渴望清官，渴望太平盛世。但清官何其少，太平盛世往往只是历史长河里

的几颗闪烁即逝的流星。

（5）人治德政、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践、共产主义理想等落到这步田地，是好心没好报吗？

是百姓素质低，贪得无厌，惯常“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感谢党和国家、核心，不感谢政策好，不富而思进”吗？不是，不是其心太软、心太好，不是其“为人民服务”的好心太多，而是其私利太多，并且一人制、一姓制、一党制、终身制、中央集权制等统治权益之私利高于一切国家、民族、社会公众等利益，是其满嘴仁义道德、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等，干的却是吃人、以特权吃人权的勾当。这表明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在本质上是违背了儒家精髓的。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利，小人喻于利”，大儒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要义（《晦庵集·与延平李先生书》）”。按照习俗，君子当是皇帝、核心、官员等统治者，小人是平头百姓，可实际上，中国历来是“君王、国君、君子”们最无信义，官场最无信义、情义，有时连梁山、黑社会也不如，而人民大众则是最讲信义、重情义的。至少，对官本位内来讲，伴君如伴虎，君子随时要吃人。而对官本位以外来讲，他们则不仅寄生于人民，还常常如妖魔鬼怪作弄、欺压人民。但是，义利不分，义利颠倒，作恶多端，必遭恶报，最终等待它们的是王朝循环。荀子曰“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墨子则强调“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明确指出“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统治政权、当局、统治者不义，其不义从何而来？除了他们天生有固守统治权益之私利高于人民而觉悟低、世界观差（没有改造好）等不义内因之外，其权力缺乏制横、监督等也是致命的不义外因。治、政、统治、两手抓、三讲等，就是管理、理顺，但中国最需要管理的是权力，具体来讲便是权力的载体或者握有者官员，使其不犯权力原罪。秦制中央集权以来的中国管理、治国等，均是由官本位体系自上而下进行，是官管，大官管小官，皇帝、核心管所有官，所有官管所有人。谁管管官的官呢，谁管皇帝？没有。御史、监察、反贪、纪检、政法等也是附属于同级官本位、党委、大小皇帝一把手等的另外一套官本位统治体系。说白了，是自己管自己。除了做正事，它们还是最高权力搞政治斗争、铲除

异己、保持一致、稳定帝位等的一个工具。而且，它们会演变为官官相护，非此不足以满足

政权稳定、统治利益等的需要。权力没有强有力的外部制衡、监督，做官又是事业成功的别

无选择的出路，权力原罪腐蚀他们为利而不义，乱世、乱中华，如妖魔般祸害中国。

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结果，“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人治德政，非但未能从根本上防止、

排除社会秩序的混乱，不是治国良策，反而是中国社会周期动荡的思想根源。德政不德，德

官无德，仁政无仁，仁君不仁，揭杆而起就必然造成循环不断的战乱、动荡。

而且，儒家德治思想虽然不赞成人民造反，但其“放伐”与“汤武革命”的理论无疑为臣民

揭杆而起提供了理论依据。换个角度看，儒家思想对德政的推崇，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成者

王侯败者寇”的强者逻辑。“以德抗位，有德者王”的思想又鼓励臣民们举“仁义之师”打天

下。所以，独裁专制体制对法律的藐视，加上德政命中注定的不完善和失败，两者沆瀣一气，

变本加厉，使得社会在不健康中打滚。“成者王侯”们得到天下后，毫无例外地对人民孤恩负

德，再一次打破人民的民主希望，不遗余力推行独裁专制。独裁专制历史形成这样一种循环：

统一强大—专制统治—高压—腐败—国力衰弱—民怨沸腾—内部分裂或外部势力侵扰—人民

起事与社会动荡—人民做主人—新统治者亲政—统一强大—专制—高压……。

这是令人民饱受折腾的轮回公式，一天的主人，一年的奴隶。这是国力衰弱的轮回模式，

重建—毁灭—重建—毁灭—重建……。这是缺乏民主制度保障的恶性循环，它象绞肉机，最

倒霉的是既缺乏民主政治权利又缺乏民主经济权利的社会底层人民。倒霉的独裁专制制度制

造了倒霉的人民，而且一定不会创造出一个不会倒霉的国家，因为倒霉的人民必定无法全面

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

显而易见，相对民主法治下最大的祸害是违法者而言，独裁专制社会里，人治是最大的

人祸，德政最缺德。独裁专制政治就是无德政治，就是不仁政治，就是吃人政治，就是腐败

政治。独裁专制制度就是腐败制度，其朝廷政府就是腐败政府，他们如妖魔般祸国殃民。

8、制度性腐败只能用另一种制度铲除

(1) 天文学中有“黑洞”这样一个名词。《词海》上注释曰：“黑洞是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一种暗天体。外来的物质能进入视界，而视界内的任何物质却不能逃出视界。因此，远处的观测者，无法看到来自黑洞内的辐射。”显然，黑洞中的洞主及其一切逃避了监督。而没有公开则无公平，也无正义。

独裁专制政治生活中的黑箱及其黑箱操作，就是天文学中的黑洞。统治者们的钟情的独裁专制制度，宛如这种暗天体的黑洞，它可以躲藏其中，扮做妖魔，逃避人民民主的监督与制约，肆意妄为，朋比分肥，集团腐败，危害社会，作弄人民。一党制、终身制、家长制，就是黑箱操作制。没有了民主庇护，一切，中国人民的一切都陷入了黑箱腐败。中国与人民的一切受党的指挥、监视、决定，还有所谓批评教育教化，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批评教育党，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指引党、监督党、决定党。党怎么还能代表人民呢？它从哪里代表人民呢？对社会利益分配来讲，“先锋队”成了“先捞队”和“多捞队”，他人比他捞得多，就是“违法”，并受到惩处。“党员与官阶”等权力身份是更能为人民服务，还是更能为自身捞取好处？不要忘记，仅党员开会一般是占用工作时间，甚至动用国库支撑的。这是党国里对非党员社会成员的不公正，令人厌恶。中国官阶本身代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特权利益，当官的怎么会奉行德政，推行廉政？结果只能是吃人、伪君子等虚伪盛行。在“权力万能，权大于钱，权能捞钱”，这就是官本位独裁专制制度腐败的根本来源，也是其落后于“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悲哀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好党员、好干部、好官只能在独裁专制的重压下忍辱负重，凭着良知在党的名义下为国出力，为人民工作。另外一个悲哀是它把一些有理想、有道德、有抱负的中国人赶走、排出了这个体系，甚至流落海外。

没有了民主，黑箱可以不让天下事大白于天下，独裁可以横行霸道。政治制度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政治黑箱，就是社会腐败的暖箱。独裁专制制度下的黑箱操作养痍遗患，后患无穷，政治生活质量，经济运行质量，科技发明与推广，教育方向与手段，公共工程质量……患何复患哉！回首过去，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在于制度的落后，亦即在于独裁专制制度

的落后；社会的腐败，在于制度的腐败，亦即在于独裁专制制度的腐败；许多错误，根源也

在于独裁专制制度的错误。饱受独裁专制体制压抑的人民虽然生活在黑箱中，看不见民主的

光明，却对腐败不可谓不司空见惯。

我们说，公共权力就是人民的权力。自国家产生以来，它主要表现为国家的政治权力，是根

据公众意志，组织、协调、控制社会公共生活的力量。它一旦失去民主这个社会权力的制约

与监督，总会有一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利用黑箱效应，公权私用，以个人意志顶替公众意志，

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这即是腐败。

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到今天，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中的民主因子长期受到压制，致

使在几千年的封建独裁专制统治中，封建国家的权力及政治腐败愈演愈烈。著名学者王亚南

曾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亦即，它是独裁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剥夺史，贪

污史，犯罪史。姑且不算被专制思想束缚而不得发挥的人民创新创造力等，仅只维持一个封

建统治集团的俸禄、运转，光维持一个几千万人的集团的正常运转与腐败润滑剂，还有大腐

败，就需要多少民脂民膏，它们影响了多少社会投资就业，多少新增加的社会生产力被扼杀，

多少社会福利被吞噬？

延续到近代史以来，我国在推翻了封建皇帝却又被无冕之王们拒绝民主制度的历史进程

中，我们不能否认，有意或无意间，由于实际上的独裁强人政治体制过分强调中央集权专制，

不搞自由言论、信仰、新闻和自由投票选举，不搞社会民主，一些本意为人民某福利的集团，

又由于内部监督机制失灵，或者根本无法正常起作用，导致社会、政体、机构、企业、人民

等一切实际上仍然受困于滋生腐败的独裁专制温床里。

（2）具有普通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应当从规律上寻找答案。

体制内发生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十五大将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的严重程度去看待，决不是危言耸听。但是，如果不从制度层面着手，反腐败的行动与结果

注定只是口头上的。如果行动上继续拒绝民主政治这副人类根除腐败屡试不爽的良方，我们

相信，中国国家不会亡，只会贫穷落后；独裁集团无论主动或被动，它都会变化，即使不变

为民主，也会更换朝代，朝廷必将易主。

这就是党内外人士都说了多少年的警世良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倒象孙悟空

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腐败的恶性肿瘤已经在独裁专制体内孳生、膨胀、扩散、溢脓、冒

毒。历史证明，所有中国独裁集团均强大无比，谁也打不倒他，他只会被自己打倒，被他的

独裁专制制度打倒，腐败是独裁专制集团自戕的利器。我们想，这历来是独裁集团不愿意看

到的，也是羞于看到的。但如果缺乏民主，则是必然的。

恰如一个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过河，反腐败也是不可能在孳生腐败的独裁专制体制的

黑箱里完成的。相反，正是独裁专制体制启发、放纵、制造、包庇、扩大了腐败。权力不能

失去监督，权力越大，越需要强有力的监督。而独裁体制，是权力失去监督的绝对黑箱，它

的绝对专制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现实的独裁专制权力体制结构中，情况恰恰相反，权力地位

越高，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反而越少越弱。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曾对人扬言，“到我们这一级

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没人管的权力会干什么呢？党内监督等自己管自己的权力会干什么

呢？况且，权力感到危机，就去捞钱了。腐败分子的堕落固然有其个人品质原因，但腐败活

动既然发生于体制内，那我们一定就能从体制内、体制层面找到原因。

还有多少“没人管了”的干部？现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谁管谁监督象江泽民这样的

各地各行各业各单位各等级的大小一把手？他们身负德治人治重任，如果变了质，则是源头

性腐败，源头性社会污染，因为权力越大，腐败的可能性与危害性也越大。御史、监察、纪

检委等不可能发出民主框架内的反对党那样的威力，因为设置它们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独裁

专制集权与极权。除少时候发挥权力制衡、清廉吏治外，它更多的时候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担当了合法打击政敌、清除异己、搞政治迫害的任务。况且，助纣为虐并不是它们在历史上

的少数时刻。

人民最正义，社会舆论最公正。事实已经屡试不爽，对一元化权力等独裁专制集权和极

权最有效的制约只能是分权、削权，最好是扩大民权、人权，实行三权分离，允许反对党存

在，并向执政党迈进。这是铲除权力腐败的必由之路，它能避免中国把过多的人财物新闻等

社会资源用于维持独裁专制体制的正常、有效、廉洁地运转。纪检委、监察局、反贪局等难

以真督实察，而且多个婆婆多张嘴，维持这些部门运转的国库支出远远高出一个反对党的自

负的社会成本，其社会效益则远远低于言论自由和一个反对党的监督威力。1999年12月8

日在一位北京出租车司机关于反贪局、公检法、坐台小姐、黑社会等中国社会四大黑的说法，

则让人苦笑不得，这些特殊的有产者几乎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民意传声筒。

当然，我们也承认，三权分离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固然能有效、廉洁并使治国成本大大

降低，民主政治却也不能完全根除腐败。但时间证明，国家制度中，民主政治的发育程度一

定同权力腐败的发生量呈反比例关系，它至少比独裁政治更是腐败的克星，而不是它的相反

一温床。

目前，清廉吏治的“三讲”，就是不讲自由，不讲民主，不讲人权。而中国近代以来的社

会腐败、国家落后、民族受辱之所以连续上演，其总病根子就在于缺少，乃至压制、打击“讲

自由，讲民主，讲人权”这伟大的“人民主权三讲”。时不我待，腐败不我待，经济发展不我

待，世界强林之竞争不我待，我们必须加速以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让中国人

民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共同充分享受任何一种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的幸福阳光。

（3）独裁专制的最大受益者是腐败，最大受害者是社会公众和国家，我们不得不再多

说几段。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视人权，是造成

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重

的宣言之中。”它还进一步断言：一切政治组织的目的在于保全自然的及永不磨灭的人权。

这些人权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独裁专制社会里，腐败周而复始，越惩越猖獗。基本原因乃独裁专

制体制所为，因为它窃取人民的政府主权，而独裁权利无限、不尊重人权。独裁专制体制的

属性决定了独裁者们是人民“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最大盘剥者、掠夺者、施暴

者，是人权的公敌。

一、独裁体制下，缺乏外部监督力量，腐败分子和查办腐败分子者同属一窝，且君权绝对至上，家国同构，官官相护，他们一致性的根本利益，使其反腐败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如《西游记》里危害人间的妖魔鬼怪几乎总跟天庭的独裁专制官僚主义阶级有关联，他们不是其官本位本身，就是“圈内人”，即“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他们被擒，或现原形后，总是不仅逃避了惩罚，而且在主子的包庇下毫毛无损，重回天庭。又如当今中国，各地及中央，为表政绩，显太平，为避免拔出萝卜带出泥，为显示什么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压下了多少腐败案子，掩盖、赦免了多少腐败分子？有古语为证：专制统治下，“政则有私无公，令恩泽偏而无平。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隶；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

二、反人民的官僚体制和专制主义黑箱操作，极易诱发、保护腐败。

三、君主的人生价值观、喜怒哀乐等秉性决定了反腐败的结局和命运。

四、中央与各地好大喜功，包括政治斗争的需要，必然掩盖众多腐败。

五、腐败是维持独裁专制统治的润滑剂，乃至一个手段。

独裁专制统治下，处于金字塔不同等级层面的大小独裁者们的最高利益是家天下、党天下、个人天下的个体利益，他们最担心的是大臣、武将、属下等的谋反，而不是贪污与鱼肉人民。贪污的可以追回来，人民的他们不在乎。宋太祖赵匡胤曾对宰相赵普道出了经典的独裁心思：

“朕今选儒臣……即使是全部都贪污受贿，也比不上五代时一个叛乱的武臣危害大。”可见，

独裁专制主不害怕腐败，他“拒腐”的最大目的在于“防变”，此乃“拒腐防变”的由来。

六、腐化官员之间是怎样对待反腐败的呢？他们的一个原则是：你不反我，我不反你；你若

反我，我必反你。三讲也是这样反腐败的：你不讲我，我不讲你；你若讲我，我必讲你。这

实际上是官官相护的一个侧面。

独裁专制体制的官僚腐败源自官僚权力。因为专制国家内，官僚权力不源自人民自由投票选

举，而是皇恩浩荡等各上级独裁者们的赐予。而由于人政的德政已经无德，它多半只能是上

一级官僚的意志体现，它不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所以，独裁体制下的官僚权力，既不等于于

国家权力，也不等同于人民权力，而是个人权力。它会想方设法，尽量绕开监察等约束，去

广泛“寻租”，获取利益。

它在运行中，总是不可避免地附加了官僚的个体利益，造成腐败和社会不公。以至于前扎伊

尔总统蒙博托大胆放话：“在我们的国家一切都可以买卖。”梁衡说：个人有了权就拼命享受，

有多大的权就捞多大的利。封建社会权力最大的是皇帝，他把全天下都看作自己的财产。刘

邦得天下，睥睨四海之际，得意地问他父亲：你过去不是老批评我在家里不象老二那样治产

业吗？现在你看我的这份产业比他如何？并“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其他官僚当然也如法炮

制。

据一些学者称，元朝政权存在98年就灭亡了，根本原因不是它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

压迫政策，也不是全国大部分土地逐渐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而是以皇帝为首的独裁统治集团

的日益腐败所至。一是忽必烈以后，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宫廷政变连绵不断，愈演愈烈，二是

处于“亚独裁”地位的各级父母官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甚至在天灾人

祸时侵吞赈灾款。

腐败与专制体制，独裁大腐败与其他大小官员的小腐败的盟友关系，导致了腐败肆无忌惮，

并对人民的财富与人权为所欲为。独裁专制下的独裁者“地位的稳定要求”必然是官官

相护，掩盖腐败。因独裁专制暴政而乘机上台的人，为了保住权力，推行独裁，必然违背不

破不立不发展的进步哲学，借国家、人民名义大造稳定理论。而作为掩盖制度性腐败的稳定，

亦即“稳定独裁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或者是腐败的最大温床。

皇帝与独裁者，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者。反腐败必然触及统治集团内部纷争内讧产生不稳定，

而反腐败太坚决彻底，必然动摇其独裁专制的官僚体系根基。不仅如此，他官官相卫，以腐

败作为诱饵谅解、宽容腐败官员，甚至主动用腐败收买官员，稳定官员，借以稳定政权。清

官不易控制，有犯上资本，贪官有把柄，好使唤，他们甚至认为清官讨人嫌，贪官忠于朝廷。

于是，独裁借口稳定至上，养腐败之痛，造人民人权与民族国家之大患，坐视国家经济退化

不管，却忙于加强独裁专政机器，欺压百姓，打击、清除政治异己，并保护了一批经济腐败

分子。从一定程度上讲，独裁的稳定就是人民的牺牲。

同时，独裁者与专制体制内的腐败者相互支撑，因为与政治民主化并存的反民主势力，

主要来自封建独裁顽固派及独裁体制下既得利益者。他们保住权利、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是

扯独裁虎皮，做专制大旗，如“祖宗成法”，“天朝上国”等。维护独裁权利，必然造成国家

政治生活的腐败，这无疑是独裁制度酿造的社会根本性腐败。

“民不告，官不究”充分显示了独裁专制下人治的必然腐败性。如公元 2000 年前后据一

位高级中纪委干部公开披露：“在全国检察机关办的案件中，80%以上是由群众举报的；在中

央环境机关各部委的纪检监察机构查处的大案要案中，90%以上是由群众检举的。”真奇怪，

中国大陆在各级各地个行业个单位均设有庞大的“御史机构与人员”，他们干什么去了？各级

犯罪分子相应的上级领导和下属应该最有权力举报违法乱纪，他们干什么去了？

（4）迄今，六四错误没有如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盼望、预料的那样被终止，被拨乱反

正。为什么没有知情者举报六四黑幕？除了高压与恐怖政策，原因之一正是另一种典型的官

官相护所至，即当今部分中国最高决策人物是六四镇压的既得利益者。解决六四，必然涉及

他们（我们赞成用和解的方式）；反腐败，必然动摇他们。因此，他们一方面自知六四必被否

定，因而过一天捞一天，另一方面彼此掩盖，抱成一团搞腐败，致使腐败愈演愈烈。

人民反腐败，往往被独裁专制者视同反党，其实这种理解没错。中国执政阶层缺乏良知，

大面积的社会腐败屡屡袭击人民，其发动机就是一党独裁专制。一个渎职的腐败党政干部通

常比 100 个小偷、10 个杀人犯更危害、残暴于社会。想想吧，一个胡长清贪污腐化的钱财要

让一群小偷偷摸摸摸“忙活”多长时间？杀一个胡长清哪里管用，全国各地有多少这样的胡

长清？什么“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完全是“为官一任，祸害一方”！什么皇帝与核心，这

最大的官的独裁专制时代，就是中国人民不能享有自由民主的政治荒蛮时代。

另外，同是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官本位系统内的“官办”叫腐败，（平）民办

的叫犯罪。处理方式也不一样，普通人犯罪就意味着直接蹲监狱。因腐败犯罪的党政官员则

有缓冲余地，先是什么党内处分、降级、行政记过、开除党籍等，最后才是蹲监狱。而且级

别越高，越有富余的级别可降，受到刑律处罚的机会就越少，直到没级别了，成为平民贫民

了，才会如普通人一样蹲监狱。可见，由于官本位的“党票、级别、处分记过”等值钱了，

法律就不管用了，不能对人人平等了。同是犯罪，平民蹲监狱，官员降级别，这难道不是社

会不公？这是“刑不上大夫”的当代翻版。独裁专制历来如此，制度性地优待、宽容官本位，

不善待大众。

同时，也不要忘记一个事实：贫民犯罪往往是被穷困所迫，为了生存，养家糊口；贪官腐败

犯罪则是欲壑难填，为了锦上添花，为了存折上可能毫无意义的数字的增加。过去，针对穷

人犯罪，我们总相信“穷人无罪，贫穷才是罪恶的渊源”，其实我们忽略了独裁专制下的黑箱

操作、以公谋私、腐败、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恶性案件增加、动乱因素抬

头等罪恶之父，我们忽略了官员腐败也是犯罪，是更大的犯罪，是逼迫人民犯罪的犯罪。腐

败引诱良民犯罪。

六四表明，人民不仅仅是腐败的直接受害者，还会因为反腐败而遭受镇压。镇压之后，

一方面“保护、稳定”了政权，另一方面也庇护了官本位政权腐败，腐败因此愈演愈烈，形

成统治腐败之升级轮回。独裁专制制度才是一切罪恶的总渊源！“反对贪官污吏，拥护好皇帝；

反腐败，保留独裁专制制度”是行不通的！“盼望好皇帝，希望出明君圣主”更是不行的！

一边对人民犯罪，吃着人民人权，独裁专制官本位还不够，常常要求人民献爱心，“只要

人人献出一点爱，明天会变得更美好”。但人民的奉献与崇高理想常常被糟蹋了，人民受够了，

所献的爱心都被独裁专制吞噬了，对独裁专制已经没有爱心可献了。这逼迫社会道德常常陷

入疑惑、混乱状况。相反，只要独裁专制者们献出良知，抛弃独裁专制，“明天才会变得更美好。”

官本位腐败加重的另一个原因的确是“党政干部缺乏信仰”。想想看，一个正直的党员、

干部，能继续信仰制造六四镇压的现政权，现任领导人吗？他们能信任六四镇压的既得利益

者是人民公仆和共产主义战士吗？普通人“学习雷锋”争做杰出公民没错，领导干部“学习

焦裕禄”争做好公仆也没错，但泛道德化并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更不能以此奖励独裁专制官本位里的贪官。而且高层官员不讲道德引起的怨气和上行下效，容易败坏整个社会风气，降低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地产生危害人权的妖魔，必须用另一种制度消除他们。制度性的犯罪，必须用另一种制度终结它。人民主权下的三权分离的自由民主的人权政治制度，是独裁专制官本位腐败与犯罪的天然终结者！

9、总代表是奴隶奴才生产线的工头

（1）任何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必然以推行官本位金字塔权力体系为首务。其表面特征之一是官府是黑箱，外面似“光明社会”，一览无余。一级一级的，上级统治者躲在暗处，黑箱操作外面光明的。而且官府黑箱如同天文黑洞，你看不见它，它看得见你。它能量极大，不仅财富、好处，还可以将人的尊严、人性、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一一吸入、吃入，还可恶性异化人，“改人，糟改人”。

作为帝制帝位的一级，他们黑同事，黑下级，黑人民，黑天下，改同事，改下级，改人民，改天下。而且所有衙门都是门槛高，屋檐低，苟且偷生也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也好，除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多少人可以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帝制帝位的基本特征是“轻视人类，使其不成其为人”，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等人身依附、剥夺个人尊严、个人自由自主权等为法统，普遍缺乏维护民众人格独立、自由思考行动发展、社会公正等的制度保障。它们致使“秦汉以后无国民”，“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也”，“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奴隶史也。”鲁迅先生更描述说：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做稳了奴隶与连奴隶都做不稳的两种状态。活着象奴隶，争做好奴隶，能有一种什么精神面貌？梁漱溟老先生曾经断然宣告：“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而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亦不是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

之处”。“礼教名教”就是专门用来约束人民按君主意志行事的独裁专制意识形态，“种种在上
的权威”就是独裁专制制度及其大小独裁者们，它们导致个人人权不得发展，社会发育不能
充分，社会形态、生产力、经济等处于落后地位。

对于独裁专制统治者倡导社会大众压抑个性的“克己，异化人，改人”，杜亚泉则在《论社会
变动之趋势与吾人处世之方针》中说，这种思想“致才智不能发达，精神不能振起，遂成卑
屈萎靡，畏苟且之习惯。我今日社会之所以对于西洋社会而情见势绌者，未始非克己的处世
法之恶果。”这里，社会大众压抑个性的“克己”的积累名义上是为人民存福利，但由于被独
裁挪用、错用、挥霍等，实质上是人民克己，独裁享用。

不单是中国的贤达人士洞悉历史，能分辨独裁与民主的优劣善恶。无独有偶，还在上个
世纪，也是后来被误解误用的共产主义专政斗争哲学在那里取得成功，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

那种名义类型政权的、实质是地道独裁专制制度的那个国家里，有个著名小说家契诃夫。他

针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和残暴，以大量著作对深受其害的人们的变异心理进行了深入的揭

示，如《胖子和瘦子》中的瘦子。这些被迫扭曲的人格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 1、冷漠之中的孤独，无望的自我救赎；
- 2、两极意识的错位和对立，造成自贱和自狂；
- 3、惶恐之下的残喘，造成自缩和自屈。

4、怯于展示个性和独立思考，盲目迎合官员和上级，盲目从众，随大流而不敢冒尖，圆

滑世故而掩藏思想观念，中庸而让人不可捉摸，有神化领袖的倾向。

制度本身是导向，是生产线、改人线。改好，或者改坏，它决定国民的脊梁是否挺拔。民主

制度因以保障人权而使政府有存在的理由，故它能培养国民的平等、独立、自由、民主和博

爱精神。而专制社会则本身是集中营、病房，带有“改人”的、扭曲人性的、把丰富多彩的

人性往一个模子里赶的天然病态心理，朝廷机构则是病人生产线，是奴隶般依附心理的强制

机床，是人民大众“永无尽头”的病源、灾难，总代表则是这个奴隶奴才改人生生产线的工头。

世界贫穷与苦难的一大根源，是有统治者与强行总代表，是统治者及其政权组成穷人生产线。

中国封建专制与俄国沙皇专制何其相似。毛泽东称旧中国的统治体系是神权累加政权、族权、

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列宁称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契诃夫眼中的独裁制度下被扭曲的人物与中国作家笔

下的人物何其相象。又如鲁迅笔下的阿Q，《狂人日记》“全是吃人二字”，现代作家王朔笔

下的充满变异反抗精神的人物，契诃夫笔下的《胖子和瘦子》、《套中人》等。鲁迅描写的少年闰土来自农村，机智聪颖，生机勃勃。这是人权天赋的。他的未来如何“遭

改”、演变？遭改便是糟改。政治文化权利方面，统治者从来没有忘记意识形态之神秘的精神

控制力量，以其（教育）教化、异化、糟改人民。经济方面，皇有制、党有制、官有制等糟

改了人民的多少劳动与经营成果，糟改了多少繁荣昌盛？

官本位产父母官，闰土们见官矮一截，是儿子、孙子。越大，越肩负社会责任，越融入社

会，见到的父母官越多，管理他的人越多，他越受压迫，越矮。他的人生路就是父母官不断

增加，他作为儿孙，伺候对象越来越多的辛酸路。他越大，越老，越高龄，越长寿，越是

做孙子。

看看迄今的中国农村，一代接一代，老人们辛酸、穷困，不是欠债，便是勉强度日。

再看看华夏城乡，由于尚未出生或刚出生便遭遇糟改（如领指标，上户口等。这些糟改由长

辈承担了），而且“异化、糟改”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多，这似乎是中国人民由少年而老的必然

缩影。少年时代是幼苗、闰土，聪明、有活力，是少年英雄。中壮年时代气壮如牛，出成果，

是脊梁，是民工、苦力，是骆驼样子。老年时代则穷困不堪，几近于“甩货”，难有尊严。老

人们腰弯背驼，象个问号，困惑、埋头于辛酸的回忆：“我这一辈子”，咋地啦？

他们迷惘，为什么祖祖辈辈熬不出头来，吾等后辈之年景、光景，总与祖辈差不离？这是自

己做什么缺德事了，不得好报，还是社会出了问题？好容易退休了，不能下地干活了，还陷

入了养老的困难（至少，这不是子女们不孝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不是自己没出息，

而是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奴隶生产线的必然产品）。甚至，微薄的退休金，还要补贴失业、下岗

的儿孙们。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这鬼世道，什么时候去他妈的？出国吧，移民吧，

孩子们，我看透了。

从儿童、少年而至中老年，遭吃的痕迹越重。除去自然因素，这是一脸皱纹、满脸沧桑，目光迷惘，步履蹒跚等的基本来源。禹作敏曾经行，大邱庄曾经行，可最后落到什么下场？官本位至上的社会容纳他们了吗？不，陈焕生进城，进了也白进。看谁还不守规矩，不遵守新的“三从四德”，有几个钱就抖？达官贵人，自以为非常成功的人士，又能怎么样？他们也是奴隶生产线的制品，顶多比奴隶高一级，是奴才。为官之道，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大官管小官，皇帝、核心管所有的官。官再大，也是上级的奴才，最终都是皇帝的奴才。官场上，他们的奴态、奴性意识，比基层人更过分、更恶心，更没骨气、血气。也许，官本位里只有一个人身前不做奴才，他就是皇帝、核心。其实，他做皇帝以前还是做够了奴才的。尤其是非家传的党国及其非战争年代，英雄无用武之地，反遭排挤、迫害。那些血气方刚的人，只能感叹生不逢时，命乖时蹇了。最终能够脱颖而出，一步步爬上去的，是得益于奴才做得好的缘故。而除了运气、时势等原因，能够成为接班人的，不过是奴才做得最到位、最得体、最好的人。俗话说，“做得人下人，才做人上人”。他等善于做奴才，是奴才冠军，所以才遭钦定，荣登皇帝、核心宝座。可悲的是，奴才做了皇帝、核心，势必比开国的英雄皇帝没志气、没胸怀。他等更会强化奴才机制，心理更阴暗，只选任与其同类的，听话的，驯服的，管得住的，做同党与接班人。这些导致正压不了邪，香的不香，臭的不臭，反而更香，形成一代不如一代的社会退化机制。而且，宫人、宦官、奴家们等反而大行阴道，朝廷中间与前线英雄。他阳刚之气少，别人不能多；他无阳，别人也只能阴。直到烂透了，阳雄之气完全没有了，连接班人也生不出来了，只好落花流水春去也，名花重有主，江山新人坐，任由改朝换代，开始新一轮的统治者英雄——奴才轮回。这是王朝初期多出盛世英豪，后期多出混蛋昏君败家子的根本原因。西周东周 800 年，文王武王已绝后。西东两汉 400 年，开朝与中兴，再无明君圣主强天下，三国收拾乱摊子。全唐北宋，大明加满清，各自 300 年，还有大元九八载，再无秦

王、匡胤与元璋，康熙乾隆匿迹了，成吉思汗哪里寻？隆基与咸丰，各自虽中兴，却已入膏

肓，回光返照再无春。1949年以来，江泽民们更比前辈们差远了。这也是“乱世出英雄，

顺世重奴才”的根本原因。看看各王朝末期之宦官、宫人当政，便可略知一二。阳气下降，

阴气上升，歪邪笼罩正气，奸邪丛生天下乱，这些与诸多因素一起，形成了所谓“末法时期”。

屈原、李白、苏东坡、包青天等最终必然失败于这类奴才政治。

最高领导人更替于奴化、矮子化、弱化、无能化、阴气化，各级各部门各地各单位之大小一

把手也是如此的。有个中年人抱怨说，“我们那个大学同学，平常女里女气的，哪方面都不行，

体育课跳马，女生都跳得过去的马，就他跳不过去。现在，同学之中，他的官做得最大”。“跳

马”等虽然不是素质的全部，但至少是一项。可见独裁专制制度不仅改人、糟改人、排挤人，

随着时间推移，它也是一个优汰劣胜筛选机。

难怪世人悲叹中华民族人种在衰退。一个引导世人争做好奴才的社会，必然导致优汰劣胜。

这一是指优的劣了才能胜，二是指本来劣的才能胜。也即所谓社会是个大染缸，染坏了，才

能获得人生与事业的成功。

奴隶奴才生产线是人才生产线；保持一致是剃刀，专门枪打出头的，阉割有志气、有骨

气、有能力的；压弯那些高的，剃掉那些出类拔萃的；把不同意见、对手都软禁了、镇压了、

流放了，逼得出国了、移民了，矮化保持一致了。宫里男人遭阉割，皇帝有能无能都是宝，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有了这等人呼风唤雨，“振兴中华”还能实现，中国还能好到哪里

去？

这些都是独裁专制制度恶性异化人、糟改人的恶果。

马克思说专制政治就是庸人政治，君主是庸人之王。它更是奴才政治，君主与核心等不过是

奴才之王（一乃他一人表示奴才，二乃他是奴才中的奴才头）。独裁专制社会就是这样，它不

断以统治特权吃人权，吃一切人的人权。从生到死，一个人活得越久，其人权便被吃的越多。

攀登得越高，摔得越惨。除了死亡，期待来世，你永远也崩想翻身，有出头之日。来世做了

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能怎么样？身前不可一世，十全十美，死后遭遇重新评价，

二八开、三七、四六开、五五开，一开不开，彻底否定，不也是摔下来了吗？

可见，不论什么人，从生到死，到来世，再转世（如果有），独裁专制制度一定糟改他，使他
注定是一个悲惨轮回。身前逃脱了痛苦，死后它找你清算。可倒霉的是，对大多数人来讲，
身前痛苦，并不意味着身后一定能幸福、进天堂。转世做帝王的更少。而统治者则往往信奉：
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必问了，恶性异化人，改人，糟改人，制做人问号，是独裁专制
制度的特长。它批量生产，年月已久。它至少始于秦制确立。它扭曲人性，毁损了国民性与
中华文明。它是“中国宋以后无壮士，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冷漠，缺乏公益心”污词诬词
等的制造商。
再看看中华民族史。显然，如果把他分为少年、中壮年和老年三个时期，少年则是秦制以前
之中华，他生机勃勃，创意茂盛。中壮年是秦汉唐，他浑朴豪迈，胸襟开阔，纵横世界。自
宋至今，千年已去，一直处于老年状态（几次中兴不能说明全部问题），驼背蹒跚，艰难行进。
大修长城，明清以后的闭关锁国实际就是龟缩。这帮龟孙子，祸害我中华。
当今中国，疑惑四海，问号遍地。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大问号。
有人说中国是早熟文化，但不如说是早衰了。早熟本身并无坏处，它的辉煌遗泽至今。而是
顽固漫长的独裁专制统治之重压，之禁锢，之毒素，迫使她早衰，才坏了中华民族的大好事。
这早衰就是退化，后患无穷，也贻害至今。作为后代，我们至今得以荣耀的中华民族辉煌，
多数来自于她的少年和中壮年时期。不是中华民族不行了，而是独裁专制统治制度使它不能
行。
二十六史，乃糟改人史也，真乃奴隶史也。
惨遭糟改的中华民族！惨遭糟改的中华文化与文明！

（2）帝制帝位帝王的特质是强制。《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断言：“强制的结果是什么
呢？只不过是把世人的一半变成了傻瓜，一半变成了口是心非的伪君子而已。”
有的可能言重
了，但都不同程度存在。
约翰·密尔则在《论自由》中说：“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中，曾经有过伟大的个人思想家。
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于光远先生则进一步说：“约翰这样来概括历史，今天看来似乎还不全面。他没有见到在希特

勒的统治下，任何思想家都不可能，也不存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这样。”
1989年民主运动期间，很多中国青年迸出了“活得象个汉子”的呐喊。他们用这句口号
阐释了“不自由，毋宁死”。六四后，现代文化家王朔、张艺谋等大受欢迎，调侃型演员、小品、相声等大得其道，“丑星、另类”成为新宠，决不仅仅因为他们“逗人乐”，是文学艺术与娱乐，而是因为他们成了暴政下的民声代言人。他们是时代的英雄！他们代表基层人民，智慧、巧妙、透彻，几近胆大妄为，为各界民众和全社会营造了发泄不满、呼唤民主的呐喊大管道，建立了同情民众、揭露暴政腐败的舞台。这是人民在宣泄，国家在自嘲，是社会在无奈，更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高压下被扭曲的民族苦难呻吟。只可惜，人民只能在小品与调侃中探头探脑，挣扎着映出悲屈滑稽的投影。国民，国民的爱国热忱，只能这样埋置于地下，几近荒废。

古今中外都一样，但凡受压制于专制制度，便是受到妖魔折磨。一切社会生灵与机构都严重缺氧，面黄肌瘦，萎靡不振，失去活力、创新力、创造力。国民的精神是苦闷、没有阳光的，是灰暗、没有色彩的，是迷茫、没有希望的。我们如何能够从一个被独裁压抑、束缚的民众与民族的身心肉体上，得到一个不被压抑而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国家呢？专制制度造成的人性被扭曲，不仅严重损害、降低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质量，还阻碍了民众与国家的科技发明创造力，削弱了综合国力。并且，还使人民有惯于顺从独裁专制的倾向，陷入其恶性循环的泥潭。

《丑陋的中国人》曾名震一时，但首肯、喝彩者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本不丑陋，与其喧嚣、失望、指责丑陋的中国人，不如剑指丑陋的独裁专制，不如剑指一人一家一姓对全民全国的独裁专制，不如剑指一人一党对全党全军全民族全国的独裁专制，不如剑指家国独裁专制，不如剑指党国独裁专制：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是中国人病态、丑陋的根源。独裁专制统治制度最丑陋！鲁迅先生一方面指责独裁专制社会“吃人”，又一方面对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这是对社会大病房中的中国人的冤枉，我们应该“哀其不幸，痛其难

争，怒其争而艰难，苦其争而不得”。天安门广场安营扎寨，我们盘踞，我们宁死不屈，我们

争了。可是十面埋伏，武装清场，最好只得流亡、羞辱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中俄两个伟大民族，为什么先后同样受到同样的独裁专制的煎熬，如农奴制、封建制，变了

质的共产主义的？为什么集权与极权政治制度的实践能在那里取得成功？我们不否认共产主

义理想曾经使苏联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但极权统治也使其人民吃尽了苦头。古往今来，剥夺

人民主权的辉煌从来不如尊重人民主权的那样长久。中国一定全是前苏联的学生吗？不，中

国是自身独裁专制传统的受害者，不然前苏联解体了，放弃极权统治而大步走向公开化、自

由民主，我们怎么会“以前苏联为鉴，倍感紧迫，提高警惕，防止演变”。

中国历史不能不感叹俄罗斯这面镜子，研究中国历史的走向不能不把俄罗斯当作前言或者背

景。中国辛亥革命先于俄罗斯 6 年推翻了君主专制制度，是亚洲除日本减缩皇权以外的头一

份。但我们的民主道路在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步入了前苏联首创

的本身并不以独裁专制为特征社会主义阶段；当我们先于前苏联着手政治经济改革并在 1989

年准备实行更为彻底的民主政治经济改革时，当中国人权事业被腰斩于六四时，俄罗斯却在

随后九十年代初期的前苏联解体中，抛弃了一党独裁专制等极权政治制度而厉行了初步的民

主实践。

只可惜，世纪末俄罗斯民主经验不能象它世纪初独裁专制经验那样在中国被学习、借鉴、推

广，它反倒成了一面镜子，提醒当今六四当局如何“韬光养晦、保全自己”。这使得本世纪以

来奋进中的“民主中国”两次受害于俄罗斯。一次是世纪初，前苏联独裁专制统治经验被中

国效仿，一次是世纪末俄罗斯独裁专制制度的坍塌使六四当局更有经验对付自由民主的人权

运动。

尽管两国苦难而英勇的人民并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尽管前苏联老大哥与俄罗斯并没

有争做中国的老师，尽管中俄两国人民象厌弃自己头顶的独裁专制一样厌弃他国的独裁专制，

但是中国总是失败于自己先行一步的民主改革，总是专门挑着拣着学习人家的独裁专制，或

者捧着人家丢弃的垃圾，挑着拣着保留、巩固自己的独裁专制，因而越来越独裁专制。

真是欲哭无泪，前苏联独裁专制经验害了中国，其自由民主经验也害了中国。为什么？谁给

它的能量，究竟谁害了中国？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此无它，是中国之历史悠久之帝制

帝位帝王史的主动选择。没有前苏联，他们还会借鉴前 A 联、前 B 联，他们还会搬出自产的

“祖宗成法”，“全盘西化”以外的老祖宗，还会自成独裁专制统治体系。

与其说确实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适合于某些国家，倒不如说某些独裁专制当局断章

取义利用了它的一小部分。

（3）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2 条规定：各国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确认

人人有权享受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体与精神健康”。

振奋国民精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剔除独裁专制，给人民以公民权，有言论自由、行动自由，

能民主议政、参政，个人生存权、发展权、一切财产权等人权都得到有效保障。只有释放了

人民的活力与创造力，“藏富于民”，才能增强国家实力；只有国民精神的振奋，才能有国家、

民族的兴旺。

民主制度导向自由，导向发展，民主精神的引擎力量无可比拟。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亦即

民主精神文明，便不会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不会有强大的国力。中国历来重视精神力量。从

积极意义讲，先前的“仁义道德”，“仁政德治”等也是推崇精神对治国和人性发展的支持作

用。最近几十年，精神文明更是“两手都要硬”中的一硬。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精神文明”

的概念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式提出来的，1979 年 10 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

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人人崇尚文明，它是实现人权的阶梯。

因为文明，与落后、愚昧、野蛮相对立，指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不管自觉与否，人类

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落后走向进步，由野蛮走向文明，从而也是由独裁专制走向自由民主。

抓精神文明是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应该很得人心，只可惜我们的路子一直不甚

完整与明确，抓不到正点子上。为什么独裁一谈到精神文明，人民就鸦雀无声，甚至独裁官

僚体系内都默不做声呢？这一是由于独裁错误把灌输巩固独裁专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当做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实质是禁锢思想、愚弄人民，二是不恰当把道德当作精神文明的核心，其借口一是中国是伦理社会，三是道德比法律更高，四是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未来社会也是一个不包括法的、高度自觉的道德社会。而人，尤其是掌握社会公共权力却不受监督、制衡的人，往往是那么容易违法、缺德。这四点原因的确高超，但太高了不切实际，就走向了乌托邦。它完全忽略了人类尚有许多缺点，将长期处于一个不断进化的“初级阶段”式的发展过程，必须有优良的法律与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防止、克服、制裁人性恶的那一面的贪欲、妒忌等。法律主要是治官，而不是治民，尤其是要约束那些代替人民掌握权力的领导者们，因为他们对社会的损害远甚于普通低级趣味者的小偷小摸和打砸抢。况且，独裁专制制度本身是社会最大的精神污染源，是“病人”生产线。如果不解除独裁专制制度，那提高社会和全体国民的精神文明水平永远是一句空话。这一是因为独裁专制体系里的官本位的等级价值倾向使其上层建筑阶层难以平等待人，由此产生众多的精神文明；二是从对人的影响而言，“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其实，人们惯常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物质文明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富裕程度。精神文明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二是社会政治思想和道德的发展方向和水平，尤其是后一点，由社会制度性质决定，并且强烈反作用于社会制度本身。制度是如此重要，以致于我们要说，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是现代文明的三大组成部分。制度文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因为制度是一个国家社会提挈纲领的东西，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前导，区别一个社会，评判一个社会，首先是考察它的制度。所以，应该说，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的首要内容是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第一文明。人类社会历史的文明正是从原始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官本位制度、民主资本位、人本位制度等发展进化而来。这诸种制度还有花花色色的变体，但它们主要只能按独裁专制和自由民主的两大类标签对号入座。

独裁专制与自由民主政体，各自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独裁专制

制度不仅不再是文明的，而且是反文明的。只有越是民主的，越是尊重人权的，才越是进步

的，越是文明的。

当今社会潮流，惟有民主制度，能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与意志，使人民真正当家自主、做主，

能保障国民享有（应当）天赋的言论、信仰、自由选举、财产等各项现代国家公民的各项权

利。所以，谈到精神文明的核心，应该说，普天之下，一国的精神文明，首先应是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首先当属政治体制文明，政治体制文明的最佳状态是自由民主政治。国家的政治体

制不文明，如封建的、腐朽的、专制的，国民精神就不可能文明。也即是说，没有文明的国

家政治体制，便没有文明的国民精神。剥夺了国民的自由与人权，便是剥夺了国民与国家的

创造力。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是制度落后，它妨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

社会主义大师马克思说得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即社会）自由发展的条件。”

而且，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最通常的提法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理想的国家，只能由“有

道义的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亦即，人的最大发展，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性在自由状态中

的完善与发展。专制制度泯灭人性，只有民主制度能满足马克思说的这个条件。因为民主制

度是自由人的制度，是宽容人性、释放人的创造力的制度。在此，我们要再次谴责反马克思

主义者，他们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独裁者们，他们故意泯灭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反独裁专

制的真谛。因为，马克思认为个人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并且是一切其他事物发展的前提，

他反对独裁者们利用所谓专制集体、朝廷等名义束缚个人个性，妨碍个人自由。同时，制度本身超越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关系，它是一

切生产关

系之首；制度不是简单的生产力，它是一切生产力之首。我们认为，作为确定社会生产关系

的政治制度，它是根，是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定向仪与导航仪。它要么独裁，压抑如黑箱；要

么民主，催进庇护如河床。

制度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规范界定者，本身就是生产力，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有什么样

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活力，如科学技术、创新等来自于人，并完善或毁灭于人。

民主制度如此重要，不如说它简直就是生产力导航仪，简直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引导、创造者。

更为确切地说，自由民主制度是当今社会第一生产力，即自由民主等人权是第一生产力！

发展经济，制度先行。保障人权，制度先行。虽然民主不能离开经济基础，不能建立在空中

楼阁里，但民主制度本身是第一生产力，它自己可以建造楼阁。在目前的后工业文明和网络

时代里，生产力对民主制度的要求更为迫切。

本世纪以来，民主国家与带有专制思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快慢与优劣，已经证实了这个论

点。远的暂且不说，就说九十年代初以来吧，亚洲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和学界人士，

大力推行独裁式的强人政治，而不是强民强体制式的民主政治，如那几个人物等还在大力倡

导、吹捧带独裁性质的权威型政府主导型价值（任何形式的计划经济就是独裁经济，专制经

济）。他们漠视中国先秦的原典儒学，还把中国古代官方儒学误以为是中国全部的儒学价值观。

他们认为什么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把一种体制强加到一个它并不能起作用的社会，

说什么亚洲社会不同于西方，是伦理社会，个人存在于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砖瓦，其实质就

是“人民要忠于国君”，就是独裁专制的变体。

这实际上就是想在世界民主大潮中，否定法高于伦理，无视人权，继续压抑人性，坚守落后

的被亚洲人唾弃的封建“三纲”腐朽思想，保持旧的独裁专制体制不变。看看他们的逐步曝

光出来的独裁体制下特有的丑闻，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吹捧独裁专制。如某副首相一

夜之间被打入监狱，某人毫无气度指责索罗斯，某人儿子继任副总理，某总统的腐败家族等。

再看看中国大陆不可阻挡的腐败之祸！

他们总是象个家长，骄傲地对人民说，“你们不要嚷嚷什么民主权力，我保证你们吃好、玩好、

住好，其他的，政治啊，竞选啦，人事任免啦，等等，你们就别管了”。这些观念与实践，都

得到了我们的六四当局及其媒体的赞许与呼应。可笑的是，这些不断升级、日嚣尘上的沆瀣

一气，很快被制度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冲得渺无踪影，经济出现大幅度负增长，致使国

民与国家一夜之间开始返贫。亏得经济领域的自由民主机制对政治领域的独裁专制做出了抗

议，否则他们更要吹捧独裁有理、专制利国的歪理邪说了。

忽视自由民主机制的制度力量，忽视人权的生产力，把亚洲小虎、小龙，乃至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经济繁荣归结被篡改了的官方儒学价值观，是令人费解的。这如同把中国大陆采取务实态度，因为逐渐靠拢资本主义自由民主而获得的经济增长成就，归结为逐渐疏离了的变了味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一样，即如同把冲破“四项”意识形态过程中而取得的成就归结为“四项”的正确指导一样，如同把击中靶心的好枪法归结为因为靶心本身一样，如同把解决困难取得进步归结为困难本身一样，可笑、令人费解。这不是给政治思想工作等贴金吗？为什么乐此不疲？因为还想继续独裁专制，保持个人权威，保持特权利益。事实不断告诉我们，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开性、透明度和社会审计监督等民主的人权力量。国家民族与社会的发展，永远不能无视、低视、敌视人权的发展。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是生产力的增长，但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人服务；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没有人权的全面发展，便没有经济的全面增长。而且，经济增长的成果决不能用于增长独裁专制的暴政实力。

“民以食为天”早已过时，甚至民性中国传统文化是赋予了其前提的。如《汉书》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可见，统治者话说一半，是极力掩盖人民本身就是天，是王、官、代表、三个代表、总代表、核心们的天和上帝。人民人权还有比“食”更大的天。解决12亿人吃饭穿衣等生存权，不应是当今独裁者们搪塞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借口，让人民吃饱饭不是不归还言论自由、开放报禁、自由选举、参政督政等人民主权的卖好托词。人民完全可以依靠自己和自己委托的政府吃得更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一个只能满足并停留于人民吃饱饭的政府是一个不及格的政府，它应该自动解散，或被解散。

马克思曾经还多次论证过，不富很难幸福，富了也未必就幸福。的确，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也不是思想禁锢等的独裁专制。他说的富，包含物质的富和精神的富两个方面。不言而喻，他认为精神富统领下的物质富，才是真正的幸福。可见与其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语）”，不如说人权天赋。人权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的素质的第一基础，更是人生第一目的，。

(4) 据传，一位大学教授访美后与国内一市长座谈时说：“这回访美丢了脸。在一个幼

儿园里，一个六岁的男童站起来问他，‘你的国家自由吗？’”

他说，当时他欣快的心情被打搅了。他怔然无语，幡然自问：是啊，我自由吗？回国路上，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座谈会上，市长默然。别看市长往往有很多特权，但较之下层、基层，他更不自由。老大的

中国人闻者无不哑口，人们想笑又笑不起来，太沉重了。地球上，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在一

些地方已经是妇孺皆知的常识，我们却还在动用国家机器，千方百计地阻止包括高校在内的

中国各界知晓它、获得它、掌握它；地球村里，在一些地方“人权至上”，保障、发展人权已

经是政府的首要职责，我们还在用“四项”称霸宪法，用一党独裁专制特权欺凌人民人权，

还在说“中国人，哼，吃饱饭，最重要”。

中国人民不是猪！不只是知道“吃饱饭，最重要”。

这是一名独裁专制政治制度下高素质的大学教授，对一名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上低素质的

幼稚园童稚的相形见绌，这是一名“老政治奴隶”对一名“年幼自由民”的尴尬与自惭形秽，

这是一个至今不曾间断的古老的被独裁专制把持的国家和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对世界上最年

青而又是近代以来第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和人权文明的黯然神伤，还有啜泣。

在民主国家里，童稚们岂止于胆敢质问他国的“教授奴隶”，他们还敢质问自己的总统。

还在1977年春，在法国电视二台的一个《25个中学生在共和国总统家里》节目里，一

名中学生向当时的总统德斯坦问道：“作为国家元首，你能不能在治理国家时不搞欺骗？在您

看来，道德和政治是否可以兼顾？”

不单这质询般锋利的问题，孩子“够格”提问总统的本身意义，已经超过了德斯坦的回

答。

是什么使法国的中学生敢于“犯上”？是自由民主，是平等，是人权！

是什么使“中国的未来”只能在领导面前听话、唯唯诺诺，在国家领导面前“激动得说

不出一句话来”，或者只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或者只能赞美、恭维，或者拍马屁？是

独裁专制统治，是等级，是特权，是统治，是总代表，是群众身份！是其政治思想工作：孩

子们，你们要做四有新人。

我们并习惯于、顺从于、屈从于了它吗？但岂止于孩子们，专家们、教授们、记者们、理论工作者们又能怎么样？我们那么多大通讯社、大报、大台、大节目等又能怎么样？它们哪一天不是把最好的版面、黄金时段等用于拍马屁、吹牛，美其名曰为“正面宣传”，而对人民的呼声置之不理？它们惟如此，才能存活于独裁专制世界。任何一个下级对上级又能怎么样？一个中央委员、一个政治局委员又能对总书记怎么样？那是身败名裂之罪！即使不是生命死罪，至少也是“政治死罪”！服从家长，是存活于家长制的求生本能。那位老教授回国后敢于传达这个“尴尬”已经殊属不易，他已经在向马寅初等靠拢了。他是勇敢的，市长也是宽容的。不论主动或者被动，他们不做赶潮头的先进和劳模，真是不容易。当然，劳模、先进本身不是坏事，没有错，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其中隐含的泛政治教化（异化人性，收缴人权）、愚民、控制人等的因素，实在令人侧目、反感。现在，社会上少部分人发出一种糊涂的反感，说张艺谋用大量的作品在海内外“埋汰”中国人，并因迎合低级趣味而获奖。难道国际社会与海内外观众都欣赏他的电影作品里的埋汰中国人的那种独裁专制统治方式？其实，张艺谋等并没有埋汰中国人，他用同情人民的深情和犀利的冷峻，埋汰的是独裁专制生产线上的社会丑恶和缺乏人权的人民之痛苦，他埋汰的是人民苦难的根源——独裁专制。他更张扬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独立人格精神。他更没有给中国摸黑，他是勇敢地揭独裁专制之黑，他是独裁专制里的一盏睁眼的亮灯。人们通过他导演的过去，了解了中国的现在。电影是他的武器，他是为独裁专制丑行立此存照的行家里手，他用电影娱乐使娱乐本身厚重、沉雄起来，他因揭露了独裁专制生产线改人反社会的运作过程而倍受赞誉。如他鼓励人民“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莫回头”。如他用《秋菊打官司》鼓励中国人民向独裁专制官本位叫板：“我要公平，我要自由民主，我有人权”；我再次，我大肚子，我再困难，官场再昏暗而复杂，我也决不屈服，我要“讨一个说法”，“俺也踢他一脚”。

（5）社会上有一些人，包括部分北大人，对巩俐读北大硕士研究生十分反感，认

为她“不够格”，是对北大的“侮辱和藐视”。真是可笑，巩俐塑造的“秋菊”等一些影视形

象对中国独裁专制官本位社会的揭露与冲击力，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奋力达到的。

六四以后，你我中国人迫于镇压，有多少还有条件象秋菊那样与“官”打官司，“讨个说

法”？我们不是现在都难以公开，而只能从心里为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讨个说法”做

准备吗？难道《秋菊打官司》的民告官精神和捍卫人权的执著信念，不正是1989年中国

民主运动变着法的续演吗？不请她做客座教授，就是有点没眼光。她主动做学生，真是谦虚

得可以！

同时，值得高兴的是，法轮功练习者正在继续接力与官打官司。为捍卫人权，他们的多么坚

定、果敢，不怕牺牲。以至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当局不得说法轮功事件是“1989年政

治风波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他们屡屡去广场练功，其实质与1989年中国人民屡屡

到广场去游行、示威、演讲、静坐、上书、哭跪请愿、绝食，去盘踞等，完全相同！

北大建于清代，是清庭“器变道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的一

部分，但你最终成为中国反对独裁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旗手。你现在也是如此。请不要“自

由民主顶个悖”，而要“自由民主顶地球”！象蔡元培那样兼容并蓄，真正扛起自由民主的大

旗！为自由民主者开路！

有了前辈如鲁迅先生等中国是幸福的，有了当代人如张艺谋、王朔、崔健、巩俐、法轮功练

习者等中国是幸福的，他们以批评、埋汰、挑刺、讽刺等追求进步，使自由精神不停留地扩

散、传播、积淀，并准备爆发在国民头脑里。较之控制媒体、舆论、出版，只允许正面宣传、

唱主旋律、歌颂、歌唱，严格控制揭露性、批评性作品与报道的人，较之吹鼓手们，他们不

入流、社会地位低、生存艰难，受当局慢怠，乃至审查等刁难、打击，但他们更加是真正的

爱国者。

鲁迅埋汰中国“吃人”，仍然被评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是因为独裁专制制度仍然在

中国“吃人”，是因为人民主权和国家富强需要他。中国不是因为鲁迅、张艺谋等批评家多了

而受到轻视，而是因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所谓正面宣传太多了而缺乏国际社会和海内外

受众的信任。

最糟糕的病人，才掩盖病情，讳疾忌医。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才是贻误国家。这既是任

何独裁专制政权的禀性，也是回击批评者、反对派而巩固政权的政治伎俩。这些必然导致虚

假报道，谎话盛行，而且小道消息漫天飞。缺乏公开性，权力集中，没有议会与言论自由，

必然是寡头政治、黑箱操作祸害天下。缺乏批评、揭露，必然导致数字出官，掩盖错误、腐

败与腐烂。它必然导致大跃进、放卫星、实现了小康。这也是满清自大（不是盲目自大，而

是故意造假的自大）、当今大陆当局自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无比优越性”而误国的根

源。须知，当隋炀帝挂丝绸于枯树，向使者炫示虚假繁荣时，人民已经准备起义了。它是

历史上少有的短命王朝。

一个社会，如要保持活力、创造与创新，必须有胸怀容纳对手、反对派、反贼、批评者、评

论者、监督者。这正如对手、观众与裁判，使运动成绩提高。没有思辩，则没有前进方向。

没有社会批评，便没有社会进步。没有三权分离与多党政治，没有议会、议员，没有司法独

立与新闻舆论监督，对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下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粉饰太平的宣传，只能使

中国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

一个缺乏思辩的民族是注定衰亡的民族，一个缺乏思辩的社会是麻木、冷漠、毫无生气的社

会，一个缺乏思辩的国家是难以正视自己、容易失却方向与引擎动力而逐渐衰弱的国家。一

个缺乏批评家的社会是一个因为肌体缺乏清理、刺激、激励而缓慢进步的社会，一个缺乏批

评家的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一个批评家受到打压扼杀的中国是受到禁锢的中国，一个批

评家没有地位的中国也将是一个缺乏国际亲善力的中国，一个不能三权分离而导致社会缺乏

批评权的国家注定会贪官污吏横行、腐败丛生。

人民主权国家不是这样的，人民因为自由言论、自由投票等而都可以是社会评论家，评论家

因为活动于社会各个层面而使国家充满活力。人民喜欢这样的评论家，国家民族需要这样的

评论家，他们因此专门组成了一个社会评论家团体，把自己主权委托给他们，聘请他们评论

一切，立法一切，监督权力，改善一切，消除和弘扬一切。这个评论团体就是代议制民主政

治中的伟大的人民议会、国会。
它们的职责决不是一味赞同、吹捧政府，而是与政府过不去，挑毛病、批评、修正、否决，
最后才是同意。议会作为人民主权的代理人，是社会思辩的领头羊，它体现人民意志，主持
国家思维。它即使不能阻止国家、领导人，甚至它本身犯错误，它至少更能减少犯错误，更
能尽快地改正错误。
而如果没有一党独裁专制，没有强行总代表，中国的人大、政协本来也可以象一个称职而富
有尊严的评论家团体那样而使中国熠熠生辉的。
自我批评总比批评难一些，骂自己总比骂别人难一些，骂国内统治者总比骂侵略者难一些。
前者更应受到尊重。可是，中国官方已经习惯于给国内外正面宣传者、谄媚者、吹捧者颁奖
了、评职称、给予优待了，他们对此类人请客送礼，就象公司花钱做广告。他们排挤、流放、
打击异意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更不必提反对者，不敢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交朋友，哪怕会谈
一次。他们都是“焚书坑儒”的对象。
有一天，中国政府不自吹自擂，不邀请海内外一些无耻的吹捧者为座上宾，不给他们发奖金，
拒绝捧杀，而是自我批评，善待海内外批评者，不把他们视做仇敌、反华势力和所谓西化者
或者汉奸卖国贼，多交诤友、谏友，中国便有希望了。花钱买吹捧，修筑长城，打击苦口良
药，这是什么心态，什么政权？花钱买意见吧，那是买进步。喜欢反对意见、反对者吧，那
是喜欢进步。
有一天，持不同政见者自由了了，批评家自由了，中国便进步了。

10、谁妖魔化中国

六四以来，面对外界指责，有人说国际反华势力“妖魔化中国”。这是没有看透本质的误解，
这是搞错了“妖魔化”的主语。
承接古代、近代以来，华夏大地各类独裁专制制度及其家国党国统治，便一直是鲁迅先生痛
斥的“吃人”、吃中国人民的妖魔。不是国际社会妖魔化了中国和人民，而是独裁专制制度本
身就是妖魔，正是它如妖魔般折磨中国人民，祸害国家、民族，危及世界。
帝制帝位就是妖魔，它们会使很好的人与党沦为统治者，并天性妖魔般反人民，反社会、反

进步、反人类。其危害一点也不逊色于战争妖魔。对沙皇俄国，列宁称其为“各族人民的监

狱”。对旧中国，鲁迅称其“吃人”，毛泽东说统治者是“勒索中国人民的绳索”。

前苏联学者季诺维也夫说：苏联在对德战争中死了2000万人，国家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但在没有枪炮声的冷战时期，苏联受到的损失比这大得多。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人权征

程中，人民亡于皇族、军阀、一党独裁专制等国内各统治政权的生命财产和思想精神等的损

失，远远大于外国侵略者的猖狂和无耻，国家民族因此蒙受的落后与挨打更为严重。

现代政党政治，本来是很好的，可在中国，它常常掺杂了会道门、邪教一类的东西。国民党

有变节一说，共产党有叛党一说，这都是杀头的罪过。总书记悲剧链，彭德怀、刘少奇、张

志新、胡耀邦、赵紫阳、六四镇压、揭批法轮功等悲剧就是此类妖魔化的结果。

日常生活中，大陆政权对党员人民和非党员人民推行独裁专制统治，党员要从思想意识和行

动绝对服从党内的一人独裁专制，搞什么入党宣誓，“永不叛党、退党”，向党“表决心和忠

心”，否则便是比所谓普通群众还坏、不值得信赖的社会渣滓。这不是妖魔化，精神控制与恐

怖，又是什么？用这标准，李登辉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他先入共产党，后又退党、叛党，

可气的是他还投靠了国民党，跟共产党作对。

可是，世界在进化，人的信仰难道不能有进化、改变的自由？况且，党组织有跟不上形势与

人民需要的可能，有被错误的人引向了错误方向的可能，有犯错、犯六四镇压之罪的可能，

为了全国全民利益，哪怕就是为了本党利益，党员也不能脱党、分裂党，反抗、纠正、反党

吗？这不是强迫人民盲从、迷信吗？这些不本身是妖魔化、邪教吗？

人们不会忘记当局关于邪教的几个标准：其一是“教主崇拜”，即“全党必须紧密团结在以江

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党中央、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否则

就是“反党、反人民、反国家”，其二是“精神控制”，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否则

就是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是破坏宪法，危害国家安全。

现在，全国正通过“三讲”表达对独裁专制当局者的绝对服从，这其实是“早请示，晚汇报”

的变体。一切人民更要从思想意识和行动绝对听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一切社会事务均是政

治挂帅，即服从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利益。中国之外，国际社会也只有通过这个把持一

切的“一人”或“一党”才能接近中国，与中国人民交流。

这以“束缚人、控制人”为党组织形式、为所谓纪律信条，这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一

切社会生活都由“虽万万人而一人一言国”和“虽百党而一党一言国”为决断和运行方式，

与世界人民痛恨的邪教有什么本质差别？这些四项基本原则、共产主义教育（教化）与那些

三纲五常、德治仁政等是一丘之貉，它们都是类似邪教一类的东西。

邪教的东西就是妖魔，它们迷信人民，毒害社会，妖魔化中国。

是的，中国被妖魔化了！但妖魔正是长城以内数千年来惺惺相袭、代代相传的独裁专制统治

制度及其政权腐败与腐败者。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指责共产党红军为共匪、匪军，而正是

他们自己这些当权妖魔及其腐败统治才使得中国民不聊生。而六四后时代以来，中国社会流

行的一句顺口溜是：过去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下了山，在机关。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它说

明和平时期沿用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必然产生官僚主义阶级，使民主革命者变质，保守一己

之统治特权而妖魔般吞噬人民人权。

中国需要一个人民反妖魔化运动！毛泽东主席不仅把官僚主义阶级看成社会渣滓，还称其为

不耻于人类的牛鬼蛇神，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的！不受制横、监督的权力必然易发原罪，它

必然腐败，腐败就是侵害公众与公共权益，就是牛鬼蛇神危害人间，就是统治特权吃人民人

权。

看看一部《西游记》，便知道腐败的官僚主义阶级是如何装神弄鬼，作害人民的。奇怪的是，

他们常常得到更高权力者的庇护，虽败于孙悟空，却毫毛无损地回到天庭，这些无异于异地

做官、官官相护等。帝制帝位不除，如此反复，金猴奋起千钧棒又有何用？黑箱操作盛行，

谁能保障牛鬼蛇神们不会偷偷下凡、不异地、不化装，再次危害人间？不受制横、监督、管

制，很好的人一做官，很好的党一执政，一搞一党制、终身制，便不是他了，便变质了，走

向人民的对立面——统治者。

不确立民主制度的改朝换代，不可能阻挡腐败变质的新权贵们续接前任而妖魔化中国，如仅

近现代以来，太平天国痛骂“清妖”，它自己也产生了妖魔；满清家国之后的中华民国之国民

党党国，其党妖之腐败丑闻不亚于“清妖”。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四大、群众运动、造反有理”

等大民主不能奏效，甚至走向了反面，四项三讲更是直接反对任何形式的党内、党外民主。

当今中国，结束文革而改革开放，否定四大却祭起四项，没有民主制度，尤其是“反腐败，

反官倒，要民主，争自由”遭当局六四镇压后，被毛泽东称做牛鬼蛇神的官僚主义阶级中的

腐败者们已经把二十六史中的腐败妖魔史推到了最登峰造极的地步。谁，什么，可以阻止它

不继续恶化？可以说，千百年来，鲁迅痛斥的吃人制度一直循环往复地推出妖魔，祸国殃民。

党重人权，才能立党，保障人权是政党与政府存在的根本理由。解除束缚人民的四项凡是迷

信等精神枷锁，解除独裁专制制度枷锁和负担，充分释放国人创造创新力量与人权正气，使

国家由“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成为主权在民的家园，使封建朝廷伪政府成为人民政府，

使奴隶臣民党民子民成为公民大民，才能使使国家、民族不被妖魔化。

人有人权，才有尊严。国重人权，才有正气。其实，中国和人民不是被国际社会妖魔化的，

是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妖魔化了中国，是国家的家国、党国性质妖魔化了中国。人类人权事业

发展至今，对任何事物强制推行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就是对人民和地球施展妖术魔法。任何

独裁专制统治都是笼罩中国上空的妖气，它滋生、孵化妖魔，它作弄、危害中国人民，它吃

人。

1 1、总代表扼杀人才

（1）六四镇压如妖魔，逼走了多少中国人！数千年迄今，追溯华人奔涌海外的原因，

多是为了躲避独裁专制“猛于虎的苛政”。当局常常宣传“海外华人史是一部辛酸史”，如 1998

年的印尼针对华人的骚乱、暴力，但饱含辛酸是人们为什么不愿意回到他的母国？有人说自

古以来，流布海外的中国人没有政治目的和宗教目的，只有经济目的，但是不能否认，躲避

独裁专制苛政，躲避政治，就是政治目的。国际上曾几度胡说什么“黄祸”、“中国威胁论”，

那其实是躲避独裁专制之祸之“祸”。帝制帝位帝王统治恐怖与祸国殃民轮回之祸与威胁，首

先是祸害、威胁长城以内，然后波及周边国家与地区。有人权正义感者应该帮助中国人民获

得人权，而不是蔑视、排斥。

有人发出疑惑：为什么中国人都奔着出国，哪怕花钱偷渡？为什么一些很有前途的企业家、

影视演员、音乐家、画家、教授、体育教练等，宁愿去美国打工、刷盘子？

诗人回答曰，瀑布歌道：“我得到自由时便有歌声了。

民主制度在吸引人心方面，无疑是一朵四季吐香的鲜花。以美国为代表的人权国家已经无可

争辩地引导人类前进，成为人类之高山国家。如工业革命以来，自从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诞生以来，地球上人口的迁徙路线与趋势，已经能充分证明这一论点。相反，无论是

从民主国家，还是从独裁国家，鲜有优秀人才流往独裁国家。这是由人性人权的本能进化力

所至。其实，中国人勤劳、智慧、踏实，大多事业心强，工作投入，不太计较物质利益。不

论是学理工的，还是学文科的，所有劳动者都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充分自由、充分民主的精

神思维和劳作空间。这对家国、党国之“政治挂帅，三讲讲政治”泛政治化禁锢是不合节拍。

爱因斯坦说：“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

权利……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抑制知识的传播，从而妨碍合理的判断和合理的行

动……自由是这样的社会条件——一个人不会因为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主张而遭

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显然，独裁专制国家缺乏任何科研必需的“自由”这样的社会条件，

这也是堂堂十数亿中国人迟迟不能摘取诺贝尔奖等科学皇冠的根子原因。

对稳定一党独裁专制来讲，社会里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发展经济、科技文化、体育金牌等，而

是制度性地、组织性地剥夺人民的自由民主等人权，是维持、稳定、巩固一人对一党一国的

独裁专制政权，是政治挂帅及其新形式的四项、三讲，是维持剥夺党员和非党员等人民人权

的生产关系，其他的都是生产力和枝枝叶叶。

只有当科技发明、新技术、管理方法等生产力能够有利于独裁专制生产关系时，它们才能被

恩准存在、发展，否则必如网络技术因可以被用做传递民主而必须被限制发展。所谓的政治

思想工作无处不在，就是控制社会、禁锢人民使其丧失自由民主等破坏人权的工作无所不在，

就是保持巩固一人对一党一国的独裁专制无所不在。所谓重要的是“抓思想政治工作，时时抓，事事抓，一刻不能放松，一事也不能放松，否则就要出问题”，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重要的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都是幌子，它们掩盖着的实质就是坚持一人对一党一国的独裁专制，这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工作。由此而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丰富人民文化生活、外交等都是工具，都是“为党工作”，它们只能在被用做利于独裁专制时才是允许“存活”的，是二等工作，解放人民自由民主精神等则是不入流或被禁止的工作。

结果，一党独裁专制的中国现实是一切事业都是为党服务并被党绝对管理的事业。大到人大、政协，小到个人生意，任何事情、机构、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党”或“党组织，小组，支部，委员会，党组”等在监视、管制、评判、决定等。埋头苦干抓业务的人受制于握有党权的同级或上级干部，业务上冲锋陷阵的人“白干”，可能还要“挨整”，干多好都是监视者的功劳。

因为抓党的工作的干部是直接为党服务的，抓业务工作的干部是间接为党工作的。

为什么中国有很多企业家、改革家、省市市长等行政系统官员被“两手抓”抓落马，而各级党的组织系统永远是不倒翁。“两手抓”的人是不会犯错误的，他们永远不会犯错误，因为他们不干具体业务，没有人能够监视他们，管人者是不会犯错误，只可惜很好的中国人被独裁专制拉了进去。而军队里，九死一生、作战勇敢的团长、师长、司令员等可能会不死于前线而在后方被整死，而政委永远是正确的，不受制于人而可以制人的直接稳定、巩固独裁专制个人权位与政权者永远是监军，永不倒。而且，越是独裁专制政权晚期，稳定越为重要。官员们不是因为锐意进取、敢做敢为敢创新而受到“赏识”，而是“守土有责，稳住阵脚，不出乱子”等稳住了独裁专制的江山，才是最大功劳，才可以如“又跑又送”那样“进步”，并封妻荫子。“改革治理，干工作创造价值者有罪，花钱买稳定者有功”俗称“赚钱无功，花钱有功”，即是这种社会不公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一个极权与后极权社会，如何能凝聚人心、创新发展、经济繁荣、党政清廉、军事稳定、富民强国？

维护帝制帝位帝王之政治思想品质是第一标准。这就是独裁专制下中国各种人才的悲剧。你
勤奋刻苦，纵有天大本事，只要你不喜欢独裁专制，不喜欢皇帝，不服从党的领导，不跟党走
保持一致，你就永远是二等公民，永无用武之地，并倍受排挤、打击。以至于人们说，在中国
你有业务技术专长可以生活好，但你业务不行却有为党工作的热情和忠实，能够维护党，
那你生活会更好；如果你业务好又为党工作，那最好不过了。但是，请注意，中国几乎没有
多少业务好的人同时是一党独裁专制的党政大官，他们太难得了。从总书记、省长、部长，
到厂长、科长、村长，他们似乎总是单纯政治老手的败将。

（2）一个始终以稳定为主的社会，必然是以进步为次要的社会。一个帝位与官位吃香，
并为主导价值的社会，注定是一个发展缓慢的社会。党票是官票的前提，党员吃香了，非党
员必定受到压抑；官员吃香了，人民必定倒霉。

企业家、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家、体育家、教育家等各类专门人才只有臣服、
贿赂、依附于官员，才能生存，才能最大程度贡献于社会。官本位必然导致其他行业受到轻
视、失去魅力而缺乏创新活力，必然导致科学家不愿深入研究、官兵不愿练武、工人不愿做
工、农民不愿种田、海员不愿航海、企业家不愿做大企业、艺术家不愿专心创作，大家都力
图挤上官路独木桥，在官位上体现自己的价值，如能力、学识、贡献、经济收入等，挖空心
思在官场上竞争，往官路上奔。

一个“一把手”对下级握有无穷权柄且不受监督、为所欲为的官本位社会，注定是一个
破坏人权、没有前途的社会。而且官僚体系越庞大，官员权利越大，社会越落后，越黑暗。

这里，不是说官员本身不好，“当官的没有个好东西”也是偏激的，而是说独裁专制官僚体
制必然滋生腐败，制造“坏官员”，“官员”们本身也是独裁专制的受害者。因为，在独裁专
制社会里，这关那关，这难那难，这祸那祸，这害那害，都少不了官关、官难、官祸、官害，
都是人关、人难、人祸、人害。这关、这难、这祸、这害能够得手，都是独裁专制体制天赋
给这官那官的一言堂权利所至。它们都是一党专制之关，一党专制之难，一党专制之祸，一

党专制之害。岂不知人民对整风、反腐败、三讲的流行评价是：根子坐在主席台，问题出在前三排。只有主席台才最有资格犯错，犯大错。官员本身不是生产力的代表，相反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担当了维护独裁专制体制的重任，更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企业家、科学家、劳动者、艺术家等才是生产力的开拓创新者，是社会的希望，应该享有高地位、高薪等待遇。这也是为什么独裁专制体制下的改革开放口号是解放、发展生产力，从哪里解放、发展生产力。就是从独裁专制体制及其执行人官员们手里解放、发展生产力，如果没有民主体制约束官员对生产力的解放、发展，就只能靠官员们的良心与责任感。可是，党组织对其官员的共产主义教育与廉政风暴不起作用了，权力又缺乏人民与社会舆论监督，没有这两种紧箍咒，广阔的腐败天地可是大有作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南中国经常听到“他没本事，当官去了”，“你不认真学习，长大了就让你当官”，这也是为什么南中国经济发展远远强于某些“当官才好发财”的地区。贫富只是南北东西差距的一个表象，其间隐含的思想观念、体制等差别将是各地摆脱中央控制、中国四分五裂的经济发展性的本能动机。我时常为此忧虑，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要依靠别于一党独裁专制的民主政治解除各地政治压力，使各地既能享受充分自由，还能使国家保持统一。什么时候，企业家无需给官员进贡、拍马屁，官员给的企业家跑腿、打场子，中国就有希望了。没有民主体制保障，这在独裁国家里是万难实现的。一位农民企业家说过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中国富不富，关键在于中组部。这道出了以党代国、一党专制的威力，突出了“选拔干部”等人治手段的危害性，也倾吐了中国及人才缺乏民主制度的悲哀。中国需要好人才，更需要好制度。独裁制度泛政治化毁灭人才，民主制度发挥人才，创造人才。也许有人说，政治就是阴谋诡计的游戏，谁上台都一样。但我要说，于国于民于社会，至少，法律范围内的民主政治游戏文明安全可靠，天马行空的枭雄独裁政治，损人权，害社会，毁经济，好小人，误国家民族之大事。

独裁专制的人治靠各级官员去落实、推行，官员成为社会运作最重要的促进力或反动力。

科学、技术、思想、市场、自由民主人权等生产力尽数被压在官僚体系以下，一切由官说了算，大官说了算，正是所谓官是一切，官大一级压死人。官本位社会价值机制是反人才、反科学、反国家综合国力的。以官本位为特征的独裁社会里，无论大小事宜，俱往官阶靠拢，官员们把独裁赋予的官阶权力，视为个人事业有成就的体现，视为谋取个人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的依据。一切行业的成功标尺都向官僚体系靠拢，甚至出现了科学院院士相当于“享受副省级”待遇的笑谈。多大的科学家，多大的艺术家，多大的思想家，多大的工程技术人员，多么有特长的个人，也不如一定级别的官员有价值、有地位，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很少能超过相应级别的党政官员。

难怪呢，中国人无可奈何，千军万马奔官路。它高尚、实惠，是大人物的事业！什么科技、文化、教育、企业、体育、专业专长、民主、自由和人权，都是官本位独裁专制社会里的二、三流货色，末流货色，都是见官矮一截的酸孙子。没能力做部长、局长，至少也要奔个处长、科长，只要当官带“长”就行！或者享受什么级别的待遇。最差了，也有机会当“长官”：成婚生儿育女，做家长。这就是中国官本位的长官系列文化特色，或者称之为家国党国的官本位家长制文化特色：什么人，最后都能带“长”当官，一切向长官看齐、靠拢！一切以官为中心！

关系学盛行与办事靠关系的实质是家长制的延伸。这个延伸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纽带是血缘、家族、宗亲、领导身边工作过的记录以及同乡、同事、同学、同路、同房等。它使社会生产、分配等的运作不是依据市场方式，而是依据远近亲疏效忠程度等杠杠，通过每位下级、晚辈、下属、属下、属地、企业、部门等对上级、长辈、综合部门，获得照顾、提拔、安排、封赏、封赐、分配、投资等。官乃父母、家长，必受遵从、孝敬！可是，中国官僚结构太庞大了，官员太多了，中国人民、国库、金库、财政哪里孝敬得过来？哪里抵得过“安排、待遇”等？唐朝一个县太爷管理一个县，现在是县以上机关均有五套班子施政。与中国的脊梁——一线工人、农民（应该包括军

人、教师和绝大多数干部等）的人数相比，全国吃财政饭、吃皇粮，或者是沾共产党一党独

裁专制便宜的公职人员多达（注意，中国共产党有 5 0 0 0 万党员）：2 0 比 1。天那，庞大的官本位体系要吃多少民脂民膏？不算家奴、家仆、官奴、官仆（官方安慰他们

说“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光抬轿子、吹喇叭的就得多少？可见，国际知名

学者写的那篇《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细说起来，应该是《谁来养活中国官本位体系》。

从根子上说，中外历史已经证明，并还将证明，不是贫困人口，不是难民，而是培育效率低

下、设卡卖关、贪污腐败成风的独裁专制官本位体制，才是中国与人民的负担，才是对世界

粮食供应的威胁，才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唐太宗时全国只有 6 0 0 多名官员，中国却是当时的世界首富，现在的中国排在第几十富？

贫困地区与人口，占世界几成？谁说中国的官员不值钱，他们太值钱了，以至于中国人民一

直难以值钱，中国一直贫穷落后！值钱的社会资源、位置、财富、受教育机会等，大多被他

们以机关、团体、集体、公有制的名义，或者干脆是个人、家族占有、享用！

这是父母官文化对中国的馈赠？父母官分明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父母官体系分明是

羁绊中国进步的囚笼。官员越多的社会，必然是效率更低、腐败更多的社会。当今中国，最

不缺的是党政官员，改革开放，调整机构，行业转产，产业调整，最不愿意下岗而最难以被

下岗的、最麻烦的正是他们。很多人“一生只会当干部”，只愿意换岗、升岗，“万金油”么，

搞专业不行，玩权术手腕，那里都一样，玩得转。各级官员绝对不是综合国力的紧俏资源，

他们可以突破编制，被任命出无数个来。他们大把大把抓，少了一个顶一个，谁被放在那个

位置上谁就能干，他只需要顺从上级，就是称职的“好官，优秀干部”。

而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专门人才呢，从来不是谁都能干、可以轻易替代的，他们中任

何一个人的不幸都可能招致他所主持的领域的长期停滞、落后，都是国家人民不可估量、的

损失。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一旦同时失去 100 名顶尖级学科领衔人物，或者他们停止

工作，中国将不是中国。而如果各个官僚权利部门和各地方同时更换、撤换、对调或新选拔

100 名最显赫的官员，中国将仍然是中国，而且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中国。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是独裁长官意志和“关系”

横行霸道的典型写照。国内外人士深知：在中国，最值钱的是“关系”；没有“关系”，不会

搞关系，你本事再大，再有技术，再怎么有钱，你办不成事，你寸步难行，“正直，公事公办，

只能表明你是个大傻子”。而最值钱的“关系”又在哪里？它们集中在“衙门”，在各种独裁

专制的办事机构和大小独裁者们手里。关系就是钱呐，你得拿钱打通关系，俗称买通关系。

不维护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失却了这些关系，没有关系网保护（注意，不是法律网），“你再

大的买卖，我能把它搞黄”。

说白了，除开亲情友情，这些关系的总师爷，就是人民和社会运作对独裁专制及其阶层的人

身依附关系，其它值钱的关系皆因此繁殖、派生而出。官位就是权力，职位就是权力，权力

就能自动产生“关系”，“关系”就是资本，能生钱获利。没有这个公有制，没有人身依附关

系，他们就无法名正言顺地剥夺人民的财产，如平调、计划分配等，他们就无法把部分剥夺

的财产用于维持他们少数人的高生活水准，用于维护巩固他们的独裁专制基础。现实生活中，人们痛恨这些关系，又离不开这些关系，还必须加紧编织；最高掌

权者反腐败，

而腐败的总根子正是这些关系，他又离不开这些关系，因为维持这些关系就是维护独裁专制

统治基础。

另立一些机构关系打击腐败，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权力关系参与寻租和瓜分社会利益，造成恶

性循环。所以，独裁专制关系不断，腐败不断。独裁专制的干部们的“官权寻租”，不仅以社

会资源、利益等再次“黑洞分配”的形式腐败、腐蚀了社会运行系统，还破坏了“天下为公”

等社会道德观念。

另外，“官权寻租”虽然是独裁专制权力不受监督的必然结果，也是官员的正常利益被大为贬

低的结果。“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价值分配，按贡献分配（不是按能力与职称、学位等）”

是所有正直社会的正确分配，但正如企业家因其承担的责任与其贡献而应该拿到比普通职员

更多的报酬，一些行政官员当然也应该拿到与他们职位和价值等相称的收入。显然，如同“独

裁诱专制，专制出霸权，黑洞诱腐败”一样，“低薪出贪”也是必然，这是价值回归的必然。

价值规律告诉我们，当价格与价值背离时，价格必然向价值回归。即：在公共权力不受公众监督的独裁专制体制运作下，当相应的规定的官位收入与官位的实际价值不相称时，“大权大捞，小权小捞，不捞白不捞”的“官权寻租”的腐败是一种客观规律。同时，由于独裁专制体制下的官员们权力不是来自人民公众，而是来自上级任命，各级官员也不会以剥夺上级的方式搞腐败，他们搞腐败占便宜的对象只能是下级，即对各级的上级权力无法行使监督权力的各级普通人。最基层的平头百姓无有高腐败的对象，那就利用岗位刁难人吧，或者不用心工作，少干点，干差点，或者拿点、沾点，拿不了的破坏点，反正“当官的得实惠，百姓落个心理平衡”。倒霉的是，人民不能监督权力，而上级对下级的腐败的警觉与反感的宽容度很大，往往仅限于“下级腐败对上级或政权造成了威胁”。另外，设立纪检委、反贪局等廉政机构的立意本身是为了维持独裁专制体制的存在，其次才是维护人民的利益，它们往往还更多地担当了权力斗争的工具，打击异己的腐败，保护自己人的腐败。所以，上行下效，由于独裁专制的“仁政不仁，德治无德”，使社会风气被严重损害，民族与国家的国际形象、人民的尊严因此蒙羞受辱。这是独裁专制的制度性腐败，制度性的祸国殃民。目前，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真正阻力在于必须改革分配关系了，即改正独裁专制体制下的不合理分配关系，这主要是解决党政权力机关及个人在社会分配中的绝对把持地位。这种改革的好处在于，更多的中国资源可以用做增加企业利润、个人收入、社会就业，增强综合国力，它的痛苦在于一些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者会失去享受惯了的社会地位和“权益”。这主要涉及到党政机关里的“干部”阶层。除了官本位制度以外，这是中国最头疼的问题。虽然科学、民主与经济繁荣、保障人权应该的国家民族立世的根本，但在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一夫当关下，官即是“神”，它生杀予夺一切！有了政治思想品质为人才第一标准，有了官本位价值观，有了对独裁官僚体系内的官员的首要尊重，我国的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严企业家体现在哪里呢？这不是反科学、反人才、反国家、反进步，又是反什么？这不是制度性的妖魔化中国、腐败，又是什么？这不是制度性的危害国家、社会，又是什么？

(3) 官本位独尊，则必然扼杀其他人才。官本位批量生产奴才，必然打压人才。是人才，先做了奴才，才能做人才，这是许多报效国家的中国人忍辱负重的根本原因。现在，迫使人才俯首称臣，先做奴才的，是意识形态，所谓政治思想品质等。这些是迫使人们夹着尾巴做人、做奴才的一个利器。如入党武器，写思想回报，屈服于当局政治杠杠等。否则，就是傲气啦、只专不红等等，有才也不用你。想调走，想出国，我还刁难你，不放你。你是人才，我惜才，爱才。

独裁专制体制下的中国人民，言行必须与独裁者们保持完全的一致，任何不一致都是“异端、越轨、另类”，根本无权“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能复述被独裁规定为正确的东西，只能循规蹈矩被独裁认为正确的样板了的动作，谁胆敢不与独裁者们保持一致，轻则是监狱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被剥夺，重则是进监狱。

目前，我国学术界的精神思维空间太小，并且无有自由，无谓的意识形态纠缠太多，人才则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外行，可以居高临下对业务工作者指手画脚，并用独裁集团成员的权力优势地位遏制非独裁集团成员的业务技能发展，扼杀眼中的竞争对手，这势必会限制、压抑人民的总体精神创造活动，势必极大地妨碍了人民视作生命的事业的发展。

壮大，人民只好忍痛割爱，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投身异国。这实在不是中国人的报国初衷，实在是万般无奈而为之。对统治妖魔，人民惹不起，躲，还不行吗？独裁专制下，有时候，真是躲都躲不起，因为社会工作生活娱乐等资源与机会，事无巨细，都早已置于无所不在的独裁包围下，计划下，配给下，乃至监视、控制下，人民随时随处承受着独裁专制统治、所谓管理的桎梏与铁锤。

躲避奴隶奴才生产力线，是人的天性。人权至尊的天理下，人民爱国，不必爱朝廷，不必爱一党之天下。违逆民意的政府，人民就会流离失所，恰如“苛政猛于虎，人民流亡它处”。人才的流失，与人心对制度类型的选择向背紧密相连。六四后的社会事实表明，很多单位，尤其是机关和国有企业里，一些当时积极投身民主的人民，甚至只是捐款、慰问，或者说了几

句公道话，就从多方面被“两手抓”了，受到排斥、打击，被剥夺了晋升、出国、长工资、改善住房乃至工作的权利，包括一些基本人权。有些人愤而出走，到三资企业就职或出国。

我们想，中国一些优秀人才的出走，供职于三资企业，也是三资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基本原因，更是国营企业，其实是党营、独裁集团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败北的基本原因。如果不从改变独裁制度着手，不推行民主制度，中国经济恐怕永远竞争不过其它国家，他只能通过人民紧衣缩食、剥夺人民的方式“打人民脸、充独裁胖子”，维持其专制暴政统治基础。

另外，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是皇帝治理天下，集大权于一身，实行“乾纲独揽”。但历史上，能堪当“乾纲独揽”的皇帝不多。他们通常又不放心把大权托付给真正有能力的朝廷大臣，只好不择能力而专择“放心、听话、可靠”，委政于左右心腹之人，或者有裙带关系的皇亲国戚等一干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宦官、宫人、秘书专权政治能在国家大政中屡禁屡凶的基本原因，也是男子硬汉多遭斩灭或被强行修剪，才能立身处世而导致中国社会里长期阴盛阳衰的症结所在。广大女同胞们，千万别怨怪华夏大地不能孕育男子汉，痛斥独裁专制制度吧！

古代皇帝眼里，只有宦官、宫女是没有威胁的，与大臣大将相比，把权力交给宦官更安全。所以用能人，防能人，盼英雄，杀英雄，奖励功臣，杀功臣，兔死狗烹，卸磨杀驴。而一个被阉了的男人，能威胁他皇位什么？如果认为皇帝制造宦官，养宦官，只是保证他的女人不被侵占，那就太小儿科了。在最高权位、权力与下属之间设立一道安全屏障，保证他的独裁专制权威与江山，才是他们的政治目的。

一方面，那些不阴不阳的人，心理最阴暗。凭着奴才的卑劣与嚣张，他们整起人来，更一凶二毒三绝，坏事做尽。所以说，专制政治是庸人政治，是奴才政治，它更是阴人政治，恶人政治，最歹毒、最不讲道德的政治。

另一方面，这与纵容、默许属下腐败也是一个道理。抓点腐败等把柄在手里，随时可以“修剪”那些不听话、有“野心”取而代之的官员。废掉一个人的命根子，他便只能忠心耿耿于皇帝、核心、总代表了。

皇帝怕什么，反正那些被腐败的财务还能收缴回来。你一个宦官算什么，谁会推举一个被阉的男人做皇帝？你不男不女的，离开了皇宫，失去了皇权庇护，谁还那你当回事？这样的干部，用起来放心！现在，独裁专制政治体制里，虽无生理上的宦官，但因“绝对服从、保持一致”而心理上被阉割的人又有多少？也许，独裁专制制度妖魔化中国，祸害中国人，而最大受害者则是官本位中人，山野村夫、和尚、村姑等无求于官人，更能保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一部分党政干部尤为不幸，他们虽然曾经是帝制帝位官位的最大受益者，但也是受害者。如庞大的党政机关里的负责宣传、思想、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干部，尽管其工作性质特别“虚”，但是“赖汉干不了”。他们并无过错，当初步入这类职业，是由命运和谋生手段所致，很多人甚至是放弃其它更实惠的职业，抱着“为民请愿，监督社会”的一腔热血进入中国新闻界的，独裁专制下的“适者生存”改变了他们。他们长期靠被独裁专制御用而生存，一旦独裁专制垮台，这些做工不如农民、工人，又不会其它应用技术，现学又来不及，卖力气的粗活干不了（只怕也瞧不起），原来擅长的也不吃香了，那找工作、谋生就困难了。

1999年底，中国机构改革举步维艰。某刊物转述了一位局级干部的抱怨：“我在干部岗位工作了这么多年，现在叫我不当干部，我还能干什么？这一生，我只会当干部！”他好象振振有词，很占道理。

多年来，一党独裁专制体制的确养肥、养懒、养娇、养退化、养无能了一批以“干部”为职业的人。我对一位青年人谈及这类干部时，不料她脱口而出：“溥仪尚且活下来了，他们也没问题。听说，溥仪的皇妃起初对突如其来的例假还不知所措呢。”不知怎的，我猛然想到了中国人民经常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讽刺的古往今来的贵族们，他们一生只会当“贵族，干部”，多么高贵、时髦的病与愚蠢。

中国不亡，继续前进的动力在于改革独裁专制体制，“树倒树叶落”，先前被迫或自愿依附独裁专制体制的人怎么继续保持尊严、拥有工作、贡献民主社会呢？不给这些“干部”找好出路

路就推向社会也是“不人权”的，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是个大麻烦。但为了中国的人权事业，必须让这些人连同他们的权利自愿地、顺利地退出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如同所有“军民和解，民族和解”等一样重要，全社会全体人民必须与独裁专制阶层和解！难怪一些中国人说：中国的官没什么做头。当然，独裁专制官本位社会里，任何一位官员也都有张狂、嚣张、抖几下机会。但除了皇帝一个人，任何官员都有做奴才的时候，因为任何一个下级都是其上级的奴才，只有奴才做得好了，才能升任大奴才。宰相是皇帝的奴才，政治局常委是总书记的奴才。这可能是所谓中国人“奴相”十足的来源之一。都是奴才出身嘛，做皇帝以前，也做过奴才。没办法，独裁专制国家，就是一个制造奴才的国家，它决不愿准有个性、有独立意志的男子汉、巾帼英雄们存在。不当奴才，有骨气，硬气，你就滚蛋，移民，或者“归隐山林”，或者洁身自好于斗室，做社会边缘人。但是，生理被阉割也好，心理被阉割也好，小奴才也好，大奴才也好，都是独裁专制政治制度的牺牲品。我们完全可以说，正如中国从来不缺少民本与民主思想，中国也从来不缺乏人才，只是独裁专制制度打击、迫害了人才，它排斥厌恶其意识形态、不受其教化的各类专门人才。更甭提那些反对它的人才。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单位大小独裁者们口出狂言：我不要他能干，听话就行。统治者要的是服从、听话，没有主见、没有思想的办事者、仆役。这就是独裁专制政治的历史罪过：选油头滑脑，用庸人，传可靠人。能干人要么排斥受打击，要么退隐求自保，要么轰轰烈烈闹造反，不择手段打上台，铁血政治塑江山。这是中国历来宦官当政、秘书坐大的病根。这也是中国普遍缺少男子汉、世人大惑不解的中国阴盛阳衰的原因。没有英雄，谁硬收拾谁，谁出头打谁，都象孙子一样，软条条的，硬雄不起来才好。难怪世人惊叹：中国人种在退化！

（4）祖国需要人才，人才是国之栋梁。治国者共知，现代世界的竞争，实则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是明智国家的聪明选择。

如美国，甚至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吸引外来人才就一直是它奉行的基本国策，众多德才兼备者移民美国，对其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均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极大推动作用。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鼓励移民的政策，但作为自由民主的乐土，在维护人权等人类共同尊严的旗帜下，美国总是能在反对独裁专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谋取到额外的人才利益。独裁黑箱国家的人才流亡、流往美国，是人权事业的灯塔效应所至。譬如，30年代纳粹德国疯狂迫害犹太人时，美国向逃往北非和葡萄牙的难民伸出救援之手，使1236名科学家进入了美国，其中除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12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外，还有大批人在国际上享有同等声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美国的难民中，除了政治上亲美或反对社会主义外，基本上都是经济条件优越或拥有技术专长的人士。如截止到1980年，美国共安置了80万古巴难民，由于他们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通晓英语，被称为“西半球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才流失”。又譬如，在1975年以后进入美国的50万越南难民中，共有三分之二以上从事白领职业，其中教授、工程师和经理等占24%，仅有5%属于一般体力劳动者。

不言而喻，一国人才的流失，是其动脉血液的流失，是其发展引擎马力的衰减，是综合国力的直接递减。1998年7月，法国历史人口学家雅克·迪巴基耶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杂志采访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才能把一名青年培养成具有相当文化和专业技术知识水平的人才。如果让他们大量移居到发达国家，必将损害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他说，多年来，法国曾向许多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但这些国家的经济至今仍处在落后状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有所长的专业人才不断外流。这位善良的学者谴责发达国家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才，是富国挖走穷国专业人才的“损人利己”的行为。他呼吁法国政府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加强移民管理，不能草率将所有滞留法国的无证件者合法化，否则就会鼓励新的移民潮。

中国并不缺乏这位法国人口学家那样的睿智老人。大学时代，老教授讲经济学时还多少带着计划经济年代的眼光，他环顾满堂，痛心疾首：其实，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剥削，最严重

的是名目张胆抢挖人才。现在，美国大约每年从第三世界国家净流入人才 20000 名，我们穷国穷人省吃俭用，养儿育女，他们富人拿去就用。大家可以算一算，我们的培养投入，培养投入的机会损失，人才外流的机会损失，其换算的价值额，远远超过了具体的贸易利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价值，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经济学老教授讲到最后，不禁声泪俱下，情绪悲壮。

经济者，经世济民助国也！我永远无法忘怀，这位老人壮怀激烈的悲壮一幕。我们钦佩国内外教授的睿智、人道主义、爱国精神，同时，更激起我们对独裁专制的愤恨。我们更要深思，挖究，究竟是谁，为什么，逼走了国内的人才？此无他，统治者是也，独裁专制制度驱赶是也，社会黑箱效应折磨是也，投奔人权光明是也。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强大，是独裁专制政权奉送的，希特勒等把科学家、财富、投资机会等送给了国外，他们才是最大的卖国者。也许，不仅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没有国界，自由民主无国界，追求它们的人也无国界。一句话，人权无国界，人也无国界。

1 2、总代表以家国党为核心国，阻碍人民爱国

如何进一步看待人才在世界经济、综合国力等竞争中的作用？我们且看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1983 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等人运用“生产四要素”理论（即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非技术劳力、人力资本和新思想），进行了调查，最后得出结论：妨碍穷国赶上富国的，是人力资本的缺乏，而不是缺少有形资本。

无独有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是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经过长期研究发现：本世纪的头一个 50 年里，促使美国农业产出迅速增加及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经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遗憾的是，也许他研究环境里的对象并不缺乏自由民主，所以他的“人口质量”的含义中没有具体指明“民主”，仅指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而实际上，我们认为，人口质量应该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内在素质，它是人们经常

提到的人的自身素质，如上面说的人的知识、能力、技术水平、健康状况，甚至长相、身材

等，但这一切都仅仅是人的素质的一个方面而已。世界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引进人的外部

素质这个概念，因为人早已是社会中的人，环境决定了他的内在素质含量和素质的发挥水平。

这个外部素质就是我们所指的人口素质的第二部分：人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质量、外部的人

文政治环境质量。更为重要的趋势是，人的素质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外部的自由民主体制的促

进，依赖于个人自身的人权实现程度的推进，或者是独裁专制体制的限制矮化。

这些应验了一句中国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当然培养

出素质成分不同、素质高低不同的国民。与人口内在素质不同的是，人口外部素质不是更多

地依靠先天遗传、后天教育与自身努力，而是更多依靠生活环境赐予的培育、塑造。那么，

这要求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风气，社会倡导的价值观念，应该更多地以人

中心，解放人

权，伸展人权，开发人权，给人民以自由，给人民以自主，给人民以民主，给人民以人权，

亦即建立尊重人权的民主的国家政治体制。我们认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原子弹爆

炸，阿波罗登月，克隆，火星探测，令人目不暇。时至今日，当大家都从娘胎里光溜溜出世，

当各个国家站在同一个地球上，面临同一个机遇时，个人的发展力，国家的竞争力，至少有

50% 要受制于独裁专制制度黑箱的约束、封杀，或者受惠于自由民主制度的释放、推动。

现代社会里，诚如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的那样，最大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发展经济提

高综合国力，人才是首一首二的关键生产力因子。独裁体制排斥人才，打击人才，即使它招

用人才，人才也不愿意为它出力，这些都导致人才外流。这是我国生产力的悲剧，是民族国

家的悲剧，也是家庭与个人的悲剧。

人才外流的悲剧，减弱了爱国的力量。究其根源，出自独裁专制体制。因为爱国本不分意识

形态，但独裁专制制度以其“独”排斥爱国者。统治者以爱家国、党国，阻碍人民爱真正的

国家。还说没有党国与集体利益，便没有个人利益。没有党国主权与集体人权高于一切，个

人人权便无法保障。爱国得有资格，首先是爱党、爱核心，爱其禁锢人民的四项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谈“港人治港”时，专门讲到了爱国者。他说：“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无疑是独裁专制意识形态下的开放开明的爱国者，但有什么理由，阻止这样的标准适用于祖国大陆？毫无疑问，是独裁体制担心自己辖地的崩溃。谁不爱国？国民皆爱国，但国家与朝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南辕北辙，不能混二为一。在独裁专制体制下，家国同构，国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家，是一人之朝廷，是一家之朝廷，是一党专政之朝廷，这种爱朝廷则可能是被强迫的，是不必要的，不太崇高的。但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自由民主体制下，以自由民主和全民参政为特征的才是近现代意义的国家，它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国家是全民之国，这时爱国是自发的，必须的，神圣的。

中国古训曰：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人讲求孝道，但最大的孝道是精忠报国。爱国始终是中华大地上永奏不止的交响乐章，但雄浑、热烈、高昂中时常夹杂着凄婉、疑惑、无奈，还有伤感、悲愤与离乡背井，甚至爱国心被摧残者的诅咒、反抗、反叛和猛攻。

可怜中国人，从家国到党国，仍然不拥有现代意义的公民国家。朕即国家，党即国家，核心即国家。爱国必须爱朝廷或政府、爱皇帝或核心、爱党或组织。大清帝国，只有不反对大清，才能享有生存人权，才能爱国，才有资格爱国。国民党党国，只有不反对国民党，才是爱国，否则就是汉奸、卖国贼。如今共产党党国，只有不反对党，不反对“四项、三讲，三个代表，总代表”，只有拥护党，才享有生存人权，才算爱国，才能爱国。只有忠君，忠于皇帝，忠于核心，忠于党，只有甘愿作为统治基础的一块长城砖，支持他们，帮助他们，爱他们，拥护他们，誓死保卫他们，才是最大的政治，才是最大的爱国。这就是崇高“四项三讲”的实质，这就是一切意识形态、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可见，“三讲”不是虚假政治，不是泡沫政治，是地地道道的一人对全党全国的独裁专制政治，是皇帝政治的翻版。

非如此，不为其巩固帝制帝位出力，便是落后群众。反对他们，则背上了背叛祖国、反社会、反人民、反政府，是汉奸的罪名。

流落海外的爱国之士，常说：我们爱国，但“不自由，毋宁死”，实在难以苟同独裁专制。这

是人民的爱祖国、爱独裁与爱自由民主、远离祖国的两难选择。海外华人 5500 万，有几成不

厌恶独裁专制？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独裁专制留不住人才，留下的人才为什么又难以发挥，

更应洞察为什么海外华人受辱宁愿去其他什么处所也不愿意回到大陆故土。这也是独裁体制

及其总代表祸国殃民的具体体现。正是他们赶走了人才，以第三者身份离间了人民爱国与爱

民主的激情，鸠杀了人民的创造创新活力与国家的发展动力。

班固说“爱国如饥渴”，但是当今时代，“吾爱吾国，更爱民主”。正如人民之政府不是独

裁之朝廷，祖国也不是独裁控制下的朝廷之国家，祖国与朝廷国家也是两个不同概念。相比

较而言，祖国是人民的家园，是故土难离的祖宗之地，是人民的土地，国家则更多地表示政

权构成、政府的属性、当局等。显然，在 18 世纪英国政治家贝尔克的名言“若要人爱国，国

家须要可爱”里，“爱国”是爱祖国，“国家”是政权、政府或朝廷，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当

政权属于人民主权时，爱祖国与爱国家是一致的。

而事实上，人民不能拒绝祖国，但可以拒绝政权、政府或朝廷，也可以不信任它，反对它，

推翻它。人民有权选择、解散、改组、重组自己的政府。

陶渊明不满独裁专制昏暗辞官回乡而追求精神自由值得称赞，象张志新、顾准等那样坚

持真理而激励我们奋进、发扬光大，象周恩来、钱学森、李向群等那样在独裁专制政体内忍

辱负重、尽可能为人民和国家服务值得敬佩，不愿意做一党独裁专制的孝子贤孙并在海内外

奋力活动的中国人也同样值得我们击节称赞。

国破山河在，家国破中华在，党国破中华也在。爱国必须爱党是悖论，爱党就是爱国是

悖论，爱党就是爱人民也是悖论；不同意党或反党就是叛国是悖论，反对一党独裁专制就是

背叛、自绝于人民更是悖论。

党不是人民，人民聘任党，也可以解聘它。人民可以反党，党不可以反人民；人民可以

解散政府、反政府，政府不可以反人民。人民主权立法掌管一切！

1 3、“一盘散沙”谁造，“亡国论”亡谁

（1）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反人民，不仅离间、阻止、侮辱了人民的爱国热情，也给一些恶势力以可乘之机。

事实上，本世纪30年代，日本敢于打中国，是因为一些军国主义狂热分子——日本战犯作出了这样的估计：中国人是个具有亡国性格的民族，四万万人不过一盘散沙，谁也不能把他们聚成一个坚固团结体。

“一盘散沙”符合中国情况，很耻辱。但这四个字从何而来？它不来自“四万万”中国人民，而是来自统治中国人民的独裁专制制度及其总代表。它是保持政权“稳定”的必要前提，是统治者“两手抓”抓出的“一盘散沙”。

古代法家以性恶论为基础，是帮助加强君主个人权力的学说。它由“势、术、法”等组成，基本方法是由统治者在臣下、宫内、政权机构、社会大众、外事交往等方面制造散沙，便于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天下归一，全面控制。

如“势”是“知臣主之利异者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术”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

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朋党相合，臣下得欲，则人主孤。群众公举，下不相和，则人主明”，“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法”的目的则在于“严厉统治臣民，让天下象害怕法律一样害怕君主”，巩固君主个人集权。

统治者历来以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人权地位差别“分化”人民、民族、地区。他们有阶级划分、

干群划分、级别划分、种党与民主党划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籍划分、民族区别划分、

一国两制划分、军民划分、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划分、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划分、

群众和落后群众划分、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划分、群众与华侨划分、成分划分、待遇划分

等等。他们以此制造森严的等级制度，挑动人民斗人民，民主党派斗民主党派，民族不团结，

互相监督、制横、提防、攀比、一锅粥，或者老死不相往来。

社会各层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地区的、部门的、行业的，都成为一粒粒散沙。彼

此不团结，相互猜忌、监督、制横，打小报告，窝里反、窝里斗，各自却围着中央集权、总

代表、核心等拼命巴结，争食、争项目、争资金、争提拔、争授衔、争职称、争名额、争不

成为反腐败对象，争位子、票子、房子、车子等。同时，以此形成对他的凝聚力、向心力和

最大程度的效忠，他等才称心如意，觉得没有竞争对手威胁了，天下稳定、太平了。

秦制以来，虽历经家国、党国之轮替，但中央集权权力架构体系却一朝胜过一朝。政府结构

由中央、省市直辖市和地县组成，除了金字塔尖的总代表，各级官员均由上级任免。这些形

成了极权社会，完全否决了地方的自治权利。而且，地方除了上奏、上疏、提建议，更不能

干预中央事务。各省书记、省长均不得自由参与总书记、总理的提名与竞选。

从国家机构设置上讲，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离，以权力制衡“治官员”，从而保证人民主权不被

滥用、侵犯，确保国家的“主权在民”性质。而历来的中国独裁专制统治者，为了却保“主

权在王，在党、在个人”，他们也一直讲究权力分离和彼此制衡，衙门、部委等中央机构一般

同级并行设立，各省市自治区的壁垒或对立情绪大于合作，各自直接对皇帝、总书记等负责，

可以互打小汇报，不可串通一处对付党中央，最后由皇帝“集权”，分而治之。中国各地各部

门各行业各机构各单位不团结，上下级、职工不团结，窝里斗等一直十分普遍，多半是由于

上级挑拨是非造成的。

汉武帝时，诸侯国势力强大，他推行了“推恩法”。实质内容为：破除长子继承权，允许各诸

侯把土地分封给所有子弟。这一方面受众皇子欢迎，又分解了各诸侯国，“使他们日趋削弱，

不消几代，诸侯王国的问题就解决了”（这难道不是劫富济贫、公有制的另一面）。宋代，赵匡胤立下“守内虚外（长城内外）”原则。为了确保中央集权，他分化

事权，大搞叠

床架层的官僚机构。他集大成，把春秋战国以来的法家学说制度化了。他谁也不信任，用兵

无常帅，削弱了军队战斗力。所有这些后患无穷，堪称靖康之耻乃至南宋政权灭亡的祸祖。

如今，计划单列、上调中央、另设行政区与部门等，大多是中央集权“分而治之”的手段。

干部调动、交流，军队换防等的部分职能，也是为制造“散沙”服务。各机构、各官员只可

干好份内事，不可串乎、联合、联络，官员、政府机构等团结一处，拧成一股绳，是皇权的

天敌，非常可怕。他们还有很多完善机构设置一类“的两手抓”手段，如设立无所不在的党

组、党小组、工委、领导小组、临时党小组等。

皇帝、皇党等作为统治者，一向把全体人民视做对立面，他们只有分而治之，使各地各部门

各行各业直接对中央负责，由中央直辖，不得串联、横向合作，并竭力使人民及其社会各派

势力互相猜忌、窝里斗，才自觉帝制帝位地位安稳。部门之间互为沟壑，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社会缺乏公益心，是中央集权的直接产品。你做好事，做好人（如富了想捐款），想拉拢谁呀。

与核心、总代表争地盘，抢群众（选民）？没门！

作为多民族国家，当局害怕民族纠纷引起内乱，但他们更害怕各民族间亲如一家。太和睦了，

太紧密合作了，他们便坐不住了，要搞点离间小伎俩。56个民族，彼此井水不犯河水，单

独存在，不要搞什么跨地域、跨民族、跨行业合作，各自直接效忠中央集权，依靠中央，最

好不过了。

甚至一个体育运动会，它不是按市场规律搞俱乐部制，或者运动员自由注册制，而是按行政

区域划分成很多代表团，互相竞争。各省市不仅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资源分配、流

动打架，还要为体育金牌多寡动脑筋。并且，人为为运动员自由转会树起排排壁垒。

重要的还在于经济方面。区域经济，横向合作，如果形成全国大市场，这与各省拧成一股绳，

各部门相安无事，各大军区亲如一家，领导班子一条心，人民团结一致等一样，是统治当局

绝对忌讳的。这些易于形成势力，干预“朝政，领导，政权”。

计划经济与中央集权紧密相连。它貌似一统、团结，“全国经济一盘棋”，实则胎生诸侯经济，

割据经济，从经济的实质基础上分裂了国家。行业分割，地区分割；企业办社会，重复建设；

以邻为壑，争夺资源，地方保护等，计划经济是其病根。大到各省市自治区，小到科级企业，

一个个“大而全，小而全”，多象彼此毫无关联的散沙！只要不缺上级、上级主管部门，不缺

中央领导与政策，缺谁都行，缺什么都行。

同时，诸侯经济与政治、文化、军事相连，容易产生地方割据。阎锡山以窄轨经营山西，是

非常好的例证。它使中国各地各类资源在自我优先原则下封闭，而不是效率优先、最大效益

原则下的资源社会化自由配置。此类割据小的结果，是谁都可以以“地方利益，人民利益”

的名义，用行政手段在辖区内任意行事，“国法”相对软弱，纵容了诸侯法的相对“管用”和

日趋强硬。导致“法中法，国中国”，为内战、分裂与一盘散沙埋下了祸根。

从经济结构及其活动来讲，提倡零敲碎打，力戒形成规模。一户一村，一县一地，小而全，

大而全，不求人，无需交换、流通，手工业不要发展成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不发展商品经济。

人民永远无需走出自己的狭小天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过好小日子，交

足皇粮或公粮，万事大吉。

那自由流动、自己做主的市场经济，把人民和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岂不是削弱了中央控制？

给它来个“两手抓”，这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计划经济，这彼此独立封闭的“散沙”，埋头

生产不必问行情，不必关心外面的事情不干政，人人心中只有皇帝，低头只看见自己，抬头

只看见皇帝，两耳不闻其他事，最符合独裁专制统治需要。

这是控制广大农村的最好办法。农业稳了，农民稳了，小手工业者、商人、士人等又根本不

具备与朝廷国家机器对阵的资格，另有万里长城军队把住国门国境，文武大臣也被制衡成散

沙了，也就没有什么势力可以破坏政权稳定了。天下太平矣！

为此，科技等能形成大规模生产力者，市场经济，大交换、大流通、需要大规模用工的

企业、行业等，必被禁绝。最近因加强独裁专制权威而被捧为“英明皇帝”的雍正，的确是

英明。当有些官吏奏本欲在广东招商开矿时，他坚决反对，认为：“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

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

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

作为杰出皇帝的代表，雍正尚且把当时头号行业——工商业视做“末业”，他不看世界，

认为这等“末业”对国家（即王朝）不利。他还在一折御批中写到：“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

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完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

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

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

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

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

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

这两段文字不多，但从第一段中“人……良顽……约束……喧嚣争竞……”等字词的组

合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人民的聚集，对于人民聚散沙成铁板的聚集，对于人民在天安门

广场的聚集，对于人民在中南海周围的聚集，对于人民的上访、游行、静坐、示威、绝食等，

统治者们是何等的敏感、恐惧、害怕，深恶痛绝！一切聚集都是“非法聚集”。在第二段中国最高元首的御批中，工贾是社会底层人，人民逐利的追求美好生活是逐末，工

商业“害于农”，放任人民逐重利则危害其“本业帝业”，对生活有“争尚华巧”的人民被蔑

称为“愚民”，其核心不过是“稳固本业，固守帝业”。其害怕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农业的心

态，正如当今中国部分人士对农民进城和农民办乡镇企业的反感、恐慌。农民面朝黄土，学

生呆在校园里，工人守在机器旁，军人保持警惕，都如散沙般无力关心国事，最好！

其“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多象是“艰苦朴素，反对胡耀邦提倡全民喝牛奶，反对资产阶级

生活作风”的前辈啊！真可谓：各人的特点，都能从基因中找到出处；现实的表象，都能在

历史中找到前辈！

至于他的后代以“坏了龙脉”阻止修建铁路，根本不是愚昧与迷信，擅长马术的满清统治者

岂不知道路的重要性。而是铁路乃发展工商业之根本，它必将以速度快、便捷、运量大、流

通多、信息传播快、广等而使人多聚众，妄议朝政，或则闹事。它不仅使天下“难以稽察”，

更助长“喧嚣争竞之风”，令王朝失去“一盘散沙，万马齐喑”的稳定。

我们不能再把“重农抑商”与“重本抑末”相提并论了。农业是国家之根本，但统治者抑商

不是说商业之与国力不重要，是“末”。而是“抑商”就是抑民，民就是末。因为“工商业”

等太厉害了。工商业等钱权“奸”得很，可以与官权对阵。它们需要自由推动，同时也挥洒

自由。它们削弱皇权、中央集权等官本位权力。它们很可怕，以市场经济走向市场政治——

民主政治，是其不可阻挡的内力。货币是市场经济的选票，人民是民主政治的选民。货币—

——金钱选票决定商品的命运，选民——政治选票决定权力的归属（政治家的命运）。当人民可以以自由致富，金钱选票成为市场经济最具决定性力量，谁能阻挡人民不成为选民，不拥有政治选票，并左右政治？击中要害，斩草除根，抑商才能抑民，民处于末位，统治权才能独霸首位。

至于洋务运动总有市场，而且统治者总是宁愿与外资合作建设中国，而不愿意人民“掺合国事、国有党有企业”，反对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参股、兼并、收购“国企党企”，反对私有化，不许国内人民资本发展壮大，为国出力，为什么祖辈相传允许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却竭力扼杀国内（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走向世界，为什么卖国，倾向卖国，那就更好理解了。

统治者的一个信条，是“宁赠外人，不与家奴”。实际上，它也是远交近攻、“强于内压，弱于外争”的一个变体。先收拾长城以内的，在徐图发展。外商如“外贼”，再怎么厉害，也是过路客人，呆不长，迟早要滚蛋，他们不过要的是商品销售，是资源，是市场，是钱，这都好说。“量中华之物力，接与国之欢心”，顶多臣民清苦点，勒紧裤带，不就妥了？

国内“穷棒子”则不能富，一有钱就找不着北，不认识主子、不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了，或者当什么资本家，搞私有化，都私有化了，都自己做主了，不服从“两手抓”，成为“不法商人”，我还有什么权威，我还能管得了谁，谁还服我独裁专制，听我发号施令？或者搞什么民主墙，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或者造反，或者卖身求荣移民、逃跑了，当汉奸。

俗话说的好，“外贼好打发，家贼难防”。家奴们要是团结一心反对主子，闹造反，或者富裕了要“上进”，则要的是翻身，是房子，是江山，是地位帝位，是命，是改朝换代，是所谓“外贼要钱财，内贼要江山”。这家奴家贼危害最大，他们一穷二白三散沙，四傻五愚六不知窗外国外事，七是愚忠，八是愚忠，九还是愚忠，才可靠、可爱、放心。

不过，可恶的是，这外贼跟过去不太一样了，长了贪心，好管闲事，现在越来越爱煽动、拉拢、团结着家奴搞什么自由、民主、人权了。还宣扬什么“自由民主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

那些新闻自由、因特网、网络信息化，也让人恼火。这不是明摆着鼓动家奴造反，要命么。

要江山变色，要王朝改姓么！境内外不法商人、不法分子，大有手挽手、内外勾结，一致对

主子发难的态势。我们要“两手抓”，帮助人民树立民族自尊心，弘扬中华文明，不屈服西方

那一套虚假的民主，号召人民反抗任何形式的侵略。

现在，研究中国过去何以闭关锁国，被动挨打，现在入关何以艰难，何以常常被排斥在

世界主流社会以外，万万不可以“昏庸愚昧，妄自尊大”为精明的统治者开脱了！他们很聪

明，他们那是“两手抓”：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提高朝廷综合实力或国力，利于稳定江山，

长期执政，但对妨碍一人一姓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地位的一律不得让步，对利于人民自由民主

的一律不得让步。

这也是近现代以来，统治者们极力扼杀内部的资本主义，排斥外部的资本主义进入中国

的直接动机，必须让它们完蛋于“两手抓”。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太可怕了，它无孔不入，四

处交易、做买卖，传播思想、信息、文化、科技，其资本位，其利润或金钱至上，其诱惑，

直接动摇了我封闭的散沙，动摇了我官本位的至上权威。

总之，必须“两手抓”，抓成散沙。凡非独裁专制王朝势力，而能把散沙凝聚起来的行业、行

会、通商、市场、科技、文化、娱乐、人物、势力、目标、舆论、思想、宗教、信仰、价值

观、庙会、集会、大会、党派、团体等，都是对一人一家一姓一党独裁专制权威的威胁，都

是要碾碎它、打烂它、分散它，让它成为散沙，或者消失，无力与中央集权对抗。不把汝等治成散沙，不让你们只搞宗族主义、门庭主义、部门主义、单位主义、

条块分割主

义等的“个各人自扫门前雪”，各人、各单位、各地、各事等只对中央效忠，万一再出了些洪

秀全、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达赖喇嘛、李洪志、瓦文萨、马丁·路德·金、曼德拉、

甘地等那样的人物，那我等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特权政权岂不要卷铺盖下台？

（2）独裁专制统治，就是人治。人治就是“治人”，把人民“治”成散沙，把统一的国家

治成条块分割、彼此壁垒的各省区、各部门，互不联络，互不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这样的

散沙能说是“统一的中国”吗？

如以“一国两制”制造“两岸三地”，台湾、香港、澳门、大陆，互不关联，如一盘散沙，各

自直接由中央集权统领。既能大一统，又能保持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多好！真是伟大的政治

构想！大陆的人权状况差一点，你们民主三小俊就不要以为“回归了，就不是干涉内政”，我

中央政府多给你们一些人权，不就行了。大陆的事，便不要管了。什么叫高度自治，我不管

你，你也别管我。这与国际准则“和平共处”是一个道理，互不干涉内政么。如此，则不必

前进一步，不必用和平、民主统一中国。如此等等，我掌握了国家机器，外围是钢铁长城，

御外压内，内部是因为分散而无足轻重的散沙人民。在这针插不进，水泼不出的中国，政治

则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了，王朝稳固矣！江山不变色，传万代矣！

这个市场经济也令人恼火，鼓励各地都以市场为纽带，搞区域合作，横向合作，抱成一团，

我这垂直的中央集权领导，还有谁听？这是资本位主义猖狂向官本位主义进攻，是金钱本位

向官本位进攻，是他们向社会主义进攻。一百年不变，以后再收拾。

可见，是历来的独裁专制政权迫使中国与中国人民成为一盘散沙。被治成散沙，也是梁

启超先生的近代中国是“世界之中国”的悲怆所在：中国可以被世界瓜分。但人民无罪，国

家本不是散沙，人民不愿意做亡国奴，是独裁专制统治使然。是独裁专制统治使中国人民倍

受歧视，它使“中国人不成其为人”，人权被藐视、剥夺，它也是日本侵略者残酷杀害中国人

民的一个诱因：自己人不把自己人当人，那外人……。

“一盘散沙”与“亡国性格”是独裁专制体制长期压抑人性、禁锢人权的恶果，是独裁专制

体制的“亡民”本性制造出来的人民“亡国”性格。而且，与其说是亡国性格，不如说是亡

朝廷、王政权、王王朝、亡统治集团、亡帝制帝位帝王。

这至少是人民的一种朴素认识，既然没有或者不认识民主制度的科学性，那自己起义，或者

“引狼入室，借狼打狗”，换个皇帝，换个王朝、政权、政党，日子可能要好过一些。

同时，独裁专制下，皇帝或党或朝廷或政府统管一切，包揽一切，人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或被剥夺主政权而希望垮其政。这些导致人民不愿意为独裁专制政权出力。我们不能不想起，

每当当今朝廷推出什么公益事业项目，需要人民、私营企业家捐款时，多半是社会反映冷淡。

问及为何不爱国、回报社会时，人民的心理活动是“那的确不需要多少钱，但我们不愿意给独裁者们贴金，我们的爱心被当局贪污了”，“那是人民的国家吗，哪个官是人民选的？那是我的政府吗，哪个官员是我自由投票选举的？”钱没掏出，反有一堆牢骚、不满，其潜台词是人民不愿意把自己能控制的、尚未被剥夺的权利再次让渡给独裁专制者们，不愿意增强、促进独裁朝廷的凝聚力和实力，相反盼着独裁统治早日垮台。这恐怕也是中国吴三桂多、汪精卫多、高层人士叛逃多、汉奸多、卖国贼多、移民多等的原因之一吧。他们多半是独裁专制统治制度逼上梁山，逼良为“娼”的受害者。按照统治者观念，明末降清者是汉奸，清末创立民国者是汉奸，国民党党国降共产党者是汉奸，所谓“变节、退党、叛党”者都是汉奸、卖国贼。而且，大陆移民，香港回归前的香港移民，参加、声援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海内外华人都是汉奸。迄今仍然致力于创立民主中国的华人都是汉奸、卖国贼。的确，改朝换代时，全国人民都是前一个家国、党国、核心国的汉奸。有时候，做汉奸、卖国贼是如此光荣，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魏京生等都曾经是这样的汉奸。事实证明，他们是家国朝廷、党国政府的汉奸、卖国贼，却是中华民族的爱国者。孙中山反清是爱国，1949年以前共产党反国民党是爱国，现在一切反中国大陆遭遇独裁专制统治都是爱国。一句话，他们是敢于自我牺牲的爱国者。可见，不爱皇帝，不效忠王朝、军国与党国，要推翻帝制帝位，均不是不爱国，不是汉奸、卖国贼！统治者属于中国，中国不属于统治者。领导者属于人民，人民不属于领导者。也许，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民都是任何独裁专制政权与统治者们的汉奸。热爱自由民主，追求人权，筑起人权长城，才是最好的爱国！否则，立志推翻满清政权的孙中山等，立志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岂不都是汉奸、卖国贼一类的人物，岂不都愿意做亡国奴？

虽然中国和中国人民，总是因为遭独裁专制统治而受到轻视、侮辱和苦难！但“散沙”般的人民为何没有被沙漏掉，反而总能在关键时刻牺牲个人自由，集中民族力量，团结一心，

舍生忘死，赶走海外野心独裁势力的入侵？回顾历史，每到自然或人为的国难当头时，中国
人民总能奋起或抵御自然灾害，或抗击外敌入侵，因为人民虽然不喜欢朝廷，但人民必须有
祖国，有家园，有赖以生存的土地，人民毕竟要有所依托。人民是因为热爱故土，所以才拼
死抵抗、反击，统治者们不过是坐收利益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民“团结御辱；不御辱，则不团结，则如‘散沙’”。可惜、可悲的是，人民的爱国热情常常被统治者享用。人民爱国，不应当、也不是爱独裁专制。如果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总是被独裁专制者们狡猾地误导为“爱独裁，爱专制，爱朝廷，
爱皇帝，爱核心”的热情，被误解为对独裁专制的护卫、捧场和效忠，那真是天大的悲哀。

这是对人民人权事业的阴险利用，这是投向人民人权事业的长矛，是鸠杀它的毒酒。

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总是被搞成了“爱党、爱当局、爱政权，爱皇

帝、爱个人，爱帝制、爱所谓社会主义”的歧路。结果，人民赶走长城外面的敌人及其独裁

专制，却又一次收获了长城内部民贼独夫的独裁专制。

家国、党国、核心国，家国不分，党国不分，人核心与国不分，从很多方面迫使中国人为难，

爱国也难。有时候，它有为家国党国核心国等统治者帮闲之虞，有时候，它又有沦为汉奸的

危险。

（3）李泽厚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爱国反帝始终是首要主题。这一主题

经常冲淡了和掩盖了其它，这与欧洲为争自由而革命的数百年思想进程很不一样。资产阶级

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主义，在近代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宣传普及。”这就是为什么五四运

动掀起了民主和科学狂飙，中国却没有在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以至于1989年5月12日，

上海“七人请愿团”在赴京途中散发了《黑狼挡道70年》的传单。

又如官史通常把近代中国发生变化的原因总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打开了中国封建

王朝紧闭的大门”，并使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无意中透露了“闭关锁国，

被动挨打”的事实。是谁闭关，是谁锁国？是谁挨打？是统治者闭关锁国，是人民、国家与

民族被动挨打，是统治者、独裁专制统治利益受到威胁。难怪统治者那么乐于闭关锁国，乐

于制造各种各样的长城。姑且先不议论是谁“打开了中国封建王朝紧闭的大门”，但这独裁专制的“大门”究竟应不应该打开？自由民主的人权文明之光究竟应不应该惠及中国人民？看门人数千年来一直阻止国内人民打开它，他自己也不主动打开，那外部力量帮助中国人民推开门人，从里外结合打开它，对不对？行不行？这是不是不爱国，乃至叛国？那么，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派，诸多“朝廷重犯”是不是叛国分子？那么，辛亥革命是不是祸国殃民的举动？那么，国民党是不是一直在卖国、叛国，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是不是也一直在卖国、叛国？那么，1989年中国人民岂不是全体卖国、叛国，只有少数制造六四镇压国耻者才是爱国？那么，现在改革开放者，主动使“国门洞开”，用优惠条件吸引外资、招商，岂不是地地道道的“国之祸害”？按照某些人的逻辑，信仰主权在民，追求自由，推行民主政治制度，打击、瓦解独裁专制的言行，一定是卖国、叛国、祸国，罪不可赦！那么，袁世凯、张勋、伪满洲国等岂不绝对属于爱国派？

五四至今八十年过去了，中国仍然落后，中国仍然站在五四开创的民主起跑线以后。正是独裁专制者们“指鹿为马”的混淆是非，正是他们愚昧人民，正是他们使用伎俩转化、贬抑民主精髓，正是他们举着冠冕堂皇的实为爱朝廷、皇帝的伪爱国主义旗帜，才迄今仍然把中国人民与全社会压抑、钳制在形形色色的独裁专制里。

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因“救亡压倒启蒙”而使中国民主启蒙运动中断了，更莫如说是独裁专制压倒了自由民主。近代以来的中国自由民主的人权运动屡屡受挫于盲目排外的假激进民族主义下的独裁专制。中国人民追求人权的热情，如果没有被利用为救独裁专制的假爱国主义、假民族主义和假民族文化主义，中国的今天肯定更美好。令人不安的是，独裁者抓住人民“国难当头，一致对外”的天生爱国特性，有时甚至故意放纵自然灾害，制造国际灾难，煽动人民反对独裁势力以外的力量，一是利用人民的爱国热忱麻痹人民对独裁专制的痛恨，二是乘着全国“上下一心，众志成城”一致抗击外敌或自然灾害的机会，掩盖独裁专制的贪污、腐败、腐朽和无能，三是利用“民族矛盾高于国内矛盾”

的血脉亲情掩盖人民对独裁专制的愤恨与离心力，目的都在于借机加大专政，巩固其独裁专制地位。独裁如若惯用“人民危难，则利于专制”的伎俩，中国与中国人民将始终“国难当头，永无宁日”。

人民爱国，领袖爱国，党派爱国，但强国之路在于强人权而非独裁专制权，在于个人人权而非虚假的集体人权，人权引得中国无数强国英雄竞折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近代史表明，人民不强大，领土就会沦丧，国家就会遭殃，不捍卫人民主权，就难有强大的国家主权。”

也许，我们要重新认识日本战犯的“一盘散沙”和“亡国性格”论。历史学界还要重视研究，中国历史由大一统和割据两种时期轮换组成，也有唐朝的开放、开明与相对应的极端独裁专制，但究竟是哪个时期，人民更自由、幸福，科技发明更多，社会更富于活力、创造创新力，更民富国强？

的确，没有一位强人，没有一个强党，能使中国人民长久地紧密团结，能使中国真正富强。

自毛泽东主席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后，“紧密地团结在以某某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已经除

了加强独裁专制以外，而几乎没有什么感召力、凝聚力、战斗力、进步力、向上力了。只有

经人民自由投票而当选的政党才有权代理行使人民主权，组成政府，只有采取联邦制、任期

制、自由选举制等才能更团结各地各族各界人民，只有与人人息息相关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人

权事业，才能以天生的感召力把每个中国人招至麾下，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富民强国。

事实上，没有人民主权立法，人民也无法喊出“国家利益至上”的口号。因为中国迄今仍然

不是现代国家形态的国家，主权“在王、在党、在核心”，皇帝轮流坐，与人民有什么大关系。

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以前，中国是一人一姓的王朝国，是家国同构，卫国就是护卫一姓王朝，

这私产性质的家天下王朝当然不能象全民的公天下那样凝聚人心。从国民党演变到共产党，

一党独裁专制国使中国是党国，是一人一党的党国，是党国同构，卫国就是护卫一党之党天

下，这王朝私产性质未改变的党天下当然也不能象全体公民之国家那样凝聚人心。

面对这“一盘散沙”的非“亡国”而是“亡王朝亡党国亡私天下”的国民心态，统治者只好用意识形态和武装力量等“两杆子”搞“两手抓”，构筑所谓“长城”，作为制造人为而非自发的凝聚力的武器。现在，一天到晚威胁着打台湾，他知道有多少大陆国人反而做汉奸、卖国贼，希望“民主台湾和平演变大陆，或者打过来”吗？这一是希望能够普及民主，二是最差了也能换个皇帝，驱除腐败，休养生息，带来新希望。

完全可以这样讲，中国人民之“亡家国亡王朝，亡党国亡核心，亡总代表”，不是“亡国性格”，而是伟大的爱国情结！他们不是汉奸、卖国贼，而是真正的爱国者。辛亥革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57年右派运动，支持扳倒“两个凡是”，拥护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1989年民主运动，欢呼邓小平南巡，人民厌恶四项三讲及其对付法轮功的错误做法，台湾人民和平演变掉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海内外华人都积极致力于演变掉大陆现在的一党独裁专制等，都是伟大的爱国情结！

中国人民都愿意砸乱独裁专制的囚笼，都愿意是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及其总代表的叛逆者，反叛者，推翻者，终结者！都愿意亡终身制的强行总代表，而自己亲自代表，亲自投票选举代表。

中国人民都愿意做自由民主事业的开拓者，所有者！

这些就是“不过一盘散沙”和“亡国性格”的真实原因。

六、长城长万里，睡狮睡万年，家国党国核心国传万代

1、保家卫国：主权高于人权，什么高于主权

1989年6月4日1时许，我们很多人站在天安门广场北端，凝望天安门城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横幅，还有国徽，还有紫禁城、中南海、金水桥前新筑起的长城。人民军队受统治当局“党指挥枪”蒙骗而来，此时此刻，作为长城，他们无法保卫人权，而是捍卫从紫禁城苟延残喘到了中南海的帝制帝位帝王统治特权。他们现在不是人民解放军、人权军，而是勤王军、皇军、党卫军、核心军。

如果六四镇压不能洗刷统治当局“四项、三讲”、三个代表等的虚伪，不能擦亮人民的眼睛，

不能揭露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国家民族的危害，不能戳穿统治当局所

谓主权高于人权及其爱国主义、以不得干涉内政确保特权高于人权、以反对多党制、多极化、

多样化、多元化确保一元化一党制终身制、社会主义公有制高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集体主义

精神以及共产主义信念等掩盖的封建帝制帝位帝王思想，不能证明失却外部监督、制衡的党

政官本位及其权力根本不可能“为人民服务”，那么，什么可以实现中国人民1840年以来

的人权抱负？哪么，什么时候中国人民可以真正推翻帝制、取消帝位、罢黜皇帝，创立民主

中国，走上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之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横幅永存，可她早遭嬗变，已是盛行一人制、一党制、家长制、终

身制的家国、党国。家国、党国、核心国，国家主权属于谁？难道不是一人、一党？难怪当

局总是叫嚷国家主权高于人权，社会主义公有制高于私有制，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生存

发展人权高于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权。他们说这中国国情、特色与传统。

但是，中华5000年文明包括官性统治特权文明和民性人权文明，两者共存、对抗、斗争，

推动历史发展。演进到1989年，中国当局又一次盗用国家主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

公有制利益等，发动六四镇压，使自己之统治特权高居人民人权之上。

六四镇压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统治者们公然冒海内外之大不韪，悍然把世界人道主义力量

踩在脚下，蹂躏中国人民的生命，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的。他们历朝历代均无视生命，

从来不平等对待人民，无视人民意愿，从来不尊重人民主权，而六四镇压不过是当今中国一

党制、终身制、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帝制帝位登峰造顶的杰作而已。他们如其先祖们一样

应付世界谴责：国家主权高于人权，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管，任何人、任何国家不得干涉别

国内政。

我是父亲，儿女们少废话，一家之内我说了算；

我是丈夫，小脚女人们哪里跑，一丈之内我定乾坤；

我是族长，各位不得七嘴八舌，一族之内我做主；

国家是家国，我是家长，我是国君天子，万民之父，乾纲独断，一国之内我坐朝；

国家是党国，党指挥枪，我是党魁，中国国情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全党全民全国，一党

一国之内，我等一人一党说了算，思想政治工作是我的神器。
夫权父权，族权国权，君权党权军权帝国权，内权外权一切权，人权民族权，地方权部门权
行业权等，都捏于我党政官本位中央集权手心。我独裁专制统治，我怕谁？我说对了算，说
错了也算；做对了算，做错了也算。谁也甬说三道四，更何况台港澳、海外华人、外人、外
国政府、什么国际组织、联合国，你们妄想以“人权高于主权”，指手画脚，蛊惑我臣民忠顺
之心与共产主义理想，促其逆反，这是演变、颠覆国家，这是反华。
他们有理论，对国内外人民说：“人权出自国家主权”，“人权问题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没有皇上恩准、上级批准，人民怎么能随便确定人权内容、享有它？人权是政权（国家主权）
的附庸，也即是统治者个人个体的附庸。你们不要短视，我中国自满清以来，除了毛泽东时
代，什么时候亏待你们外人了？除了江山，你们要什么，我们给什么。至于我国臣民之人权
什么的，你们不要管了，特权中国比人权中国更能保障你们的在华权益。我们历来是有原则
的，“守内虚外”，“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防民甚于防寇，攘外必先安内”，“日
本人是皮肤病，共产党是心脏病”，“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内紧外松，稳定最重要”，只要政
权稳定、安宁，经济、文化等权益都是小事。我们还有“宁赠外人，不与家奴”的祖传，你
们会受益者的。你们会知道，中国还是有个家长好，还是帝制帝位好，这些符合中国国情与
特色。
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虽还远不是地球村，但毕竟休戚与共，情感大同，真理大同，人权大同。
同在地球，不分国界、洲际，不分宗教、民族，无论白人、黑人、黄种人，出于人类一家的
共同情感和道义，凡为“人”者以及为“人”而存在的国家、政府、机构、企业、组织等，
已有许多需要共同遵守的原则。此前，法律作为人的共同行为准则，已经在各国打入了家庭、
企业、政党等，拥有介入家庭、单位、政党、组织、社会空间等而保障一切人之人权的内含
和外延力量。现在，继保障人权跨越家庭、企业、政党等之后，它正要跨越国家、政权等，
走向人类人权保障的更高阶段。为此，一些国家、政府已经将其权力让渡给了国际社会，成

为国际人权保障力量，使人权保障走向国际化。国际法正向人权、干涉权、国际监护等方向演变，以捍卫人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如全球性禁止奴隶、禁止种族灭绝、救助难民、战争中保护妇女儿童、不虐待战俘、保护一切未成年公民等。

联合国等国际社会应该高举“人权高于主权”旗帜，它们的使命便是保障、改善、促进人权，并使非民选政权、自称总代表的政府等还政于主权在民，同时还努力发挥民间的非政府机构作用。我们认为人权天赋，又不否认国家天经地义拥有主权，但国家主权与政权主权是两个不同概念，人民、民族与政权更不能等同。今非昔比，主权含义不同了。从君王主权，王朝主权，朝廷主权，帝国主权，到民族主权，国家主权，一个比一个高级，但人民主权比它们更高。

主权在民就是人权天赋，它无需仰仗政权。相反，人权产生政权、政府，一个政权或一届政府，只有接受人民按民主程序委托的权力，并为人权服务，才能合法存在。人民主权立法运作的政权，是国家政权最高级形式。任何独裁专制政权，企图用国家主权名义，固守王朝和官本位权益，都行不通了。中国人民要象世界先进看齐，用人民主权及其立法等取代独裁专制政权。国家主权不在于它是人权被统治者没收或集体化了的集合体、三个代表，而在于每个公民对国家享有主权。国家主权以契约形式出自人民主权，是人民自由与民主的公共意志的体现与应用，是集体人权。国权与人权可以完全一致，此二者则与政权完全不一致。

如果国家主权不来自人民主权，而是以骗取、强权等自封，如“三个代表”、总代表，它不能能够代表并行使人民的集体人权，也不能享有代表国家主权的资格。人类发展至今，人权已经进入开放型历史阶段，绝对的、排他的国家主权已经不复存在，未经人民自由投票选举而产生的不合法国家权力机构是帝制帝位帝王之朝廷、衙门，是伪政权、伪政府，其所谓内政也不是人民的，而是统治者个人个体的。可以说，政权与政府的合法性，在于人民主权是否授予它代理权，其权威性也仰赖于此。

目前，国家与政权广泛地被理解为其人民主权的公仆，而不是相反。时代不同了，世界人

权事业进入了新阶段，人民已经由摆脱神权、君权、党权等专制权，已经由获得公民经济权利、物质富裕而成为有产阶级（资产阶级），进入了获得公民政治和文化权利、思想精神自由、成为国家主人等的人权资产阶级。即人民早已是新人类，是有个性的自由民、公民，而不是统治者的奴隶、臣民、党民、私民、单位人、井田人，无产阶级的标志已经不是没有钱等物质财富了，而是无公民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人权。

在这人权大同世界，一家、一组织、一政党、一企业、一国家和国家集团等已经不能在其界限内为所欲为了，如果某位家长、头领等称成员是其私有财产，他等可以随意以长城等国家机器惩罚、虐待他们，禁锢他们的言论、信仰、宗教、财产等自由，可以使成员恐怖、贫穷，可以用暴力打掉他们的欲望，摧毁他们的要求，解决他们与其之间的纠纷等等，这种愚昧狂妄一定会引起社会公愤，被绳之以法。除非，人类还处于中世纪黑暗，除非，家长等还因为握有强权而能够有恃无恐，除非，强权就是真理，还能确保特权高于人权。

继民族主权、国家主权之后，个人主权即人权应该越来越受到重视。主权在民国际准则已经使非民选的独裁专制政权不再合法，不再享有完整意义的国家主权，“其国家主权高于一切，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等不能成为其“践踏人权”而免受国际干预的挡箭牌和尚方宝剑。

不允许家长虐待家庭成员，也不允许政权镇压人民。国内法、国际法，已经应该，而且能够用法律保护任何形式、任何集体的任何个人的天赋人权。家长打配偶孩子老人是违法，应该受到国法法办，如果一个政权、政府、国家与执政党镇压人民、践踏人权，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人权准则，国际社会也应该高举“人权高于主权”等国际人权、人道主义大旗，保护人民人权，并大胆插手、干涉这不属于内政而是攸关人类共同尊严的国际事务。

什么样的人及其政权，恐惧“国家法律高于家法族法”？家庭里对成员握有绝对权力，并且黑箱操作、胡作非为、一言堂的家长、家阀。他们害怕国家人权正义之剑直刺其罪孽。

什么样的人及其政权，恐惧“人权高于主权”？帝制帝位帝国之独裁专制统治者们，他们因

掌握枪杆子、笔杆子等各类长城形成的国家机器强权而对人民国民握有无穷权柄，他们贪污腐化、官本位特权至上、不能善待人民、随意破坏人权。他们害怕国际社会人权正义之剑直刺其罪行。如中国六四当局。

可恶的是，家长、头领们、当局总是糊弄人民，把国际社会保障人权而对其的监督、指责，污蔑、散布为“反华”、阻碍中国富强、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等，以“这令我们回想起他们过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愚弄人民与他们站在一起，护卫家国情事业。果真如此，已经民主化了的台湾、香港、澳门岂不是最大的反华基地，所有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岂不都是反华分子（所以，他们活该流亡，蹲监狱，遭揭批）。果真如此，国际社会应该赞扬、吹捧中国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任凭中国与人民偏离人类人权主航道，随着帝制帝位帝王而落后、沉沦、黑暗、灭亡。

中国人民，中国长城，人民军队，爱国，保家卫国，不是保家国，卫党国。其实，人权高于主权，并不是最近的事，更不是舶来品。陈独秀 1919 年 6 月 8 日发表了《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提倡：“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可见，爱国，须要国家可爱。陈独秀还认为，要让中国人民摆脱独裁专制蒙昧时代，“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我不仅感慨万千，坚持民主的陈独秀先生，先被军阀逮捕，后创建中国共产党，又被共产党开除，再被国民党投进监狱。他的受难史，几乎是中国民主受难史的缩影。

有一个时期，国共两党正在彼此撕杀，几乎没有共同点，但在谴责陈独秀、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观点上是惊人的一致。五四民主狂飙为何中断，中国为何仍然伧立于五四开启的现代民主门槛之下？为何这类自由民主人权的呐喊不被留传？否则，何须我等再绞尽脑汁写出这国家、朝廷差别的文字？五四运动的民主精髓常常被独裁专制者们销毁或冷藏，以至现代人读起他们竟如古文。

这也令我想起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据他记载，毛泽东曾多次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超过

了其他人。”我感到正是心中装了人民主权，才有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才有了“农民运动”、“痞子运动好得很”，“农民运动讲习所”，才有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轰轰烈烈的恢复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的人民革命。正是胸中装有人民主权，他老人家才有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气魄和雄才大略，并走向胜利，成为人民的大救星——从帝制帝位帝王及其党政官本位统治特权中解放人民人权。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毛泽东的文革对皇权官方之儒家思想的彻底清算，应该是对五四时期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等的继续。毛泽东说他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赶走了蒋介石，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分量在伟人心里如此之重，可见他决不是要用文革“对不起国家、民族，对不起人民的”。他痛恨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对人民“当官做老爷”，他晚年的文革四大、运动式民主等悲剧，在于他没有找到，没有实行一个和平民主制度，真正使国家“主权在民，人民当家做主”，去巩固他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成果。

人们啊！人类一家，人民爱人民，国际社会爱中国！人权价值也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发展主线，它不是外界要强加于中国的。“人权高于主权”对人民没有丝毫损害，更不会损害中国，它确保人民人权高于独裁专制统治特权。国民党不再享有对台湾的独裁专制统治权了，台湾民主化了，台湾与台湾人民并没有受到损害。香港、澳门也是如此。

“中国威胁论”不是中国具有威胁，而是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先威胁中国人民，并对威胁世界。

“遏止中国”不是要遏止中国人民，而是要遏止独裁专制统治的邪恶势力，制止它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做坏事。

“国际反华势力”更不是反华、反中国人民，而是反对任何针对中国人民的独裁专制统治。

事实上，所谓“国际反华势力”并不是外国人，而中国人，如被当局称之为“民运分子、台独分子、藏独分子、法轮功分子、非法组织”等的中国人，和一切希望终结一党制、终身制、家长制、核心制的中国人。

也许，人权之路上，人是没有国界的。

总之，四项基本原则决不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原则。人权是天下最大的原则，是天则。爱国，首先是爱人权！卫国，首要是卫人权！维护人权的霸权主义好得很！任何人民与国际社会不

允许任何独夫、独裁专制统治集团关起长城大门，借口不得干涉内政而胡作非为、鱼肉人民，干些打老婆孩子一类的侵犯人权的勾当。

2、 长城，两手抓：保卫人权，还是统治特权

统治者的信条是“守内虚外；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防民甚于防寇，攘外必先安

内；外贼是皮肤病，家奴是心脏病；内紧外松，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国内、党内”。

独裁专制统治的一大特征是两手抓，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即一手抓经济等发展，一手

抓固守特权。而且，抓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地位。一旦经济等发展促进了人权发展，

统治者便宁愿放弃、阻扰经济等发展，也要固守统治特权。秦代“焚书坑儒”，汉代打击“异

动势力”，清代“祖宗之法不可变，道变器不变”，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等，都

是“两手抓”。

两手抓便是统治者对人民宣战，是统治恐怖，它无处不在，手段众多。冷战与平和时期，通

常是修筑各种各样的长城，关键时刻则是社论、揭批、满门抄斩、武装镇压等。总代表的一大嗜好是修筑长城，他们喜欢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为任何人、任何事情修筑

各种各样的有形、无形的长城。精神长城，军队长城，公安武警长城，思想长城，网络长城，

经济长城，文化长城，体育长城，教育教化长城，等等。近代以来，面对自由民主与人权至

尊大潮，形形色色的统治者重视修筑各类长城，就是要使中国万年孤独，睡狮睡万年。长城

越多，越闭关锁国，越排外，中国人民越与外界隔绝，越受困于各类长城，家国、党国、核

心国便越安全，越能传万代。

很多时候，诸般长城与其是保家卫国，不如说是保卫帝制帝位帝王之延续，不如说是囚笼中

国人民。

修筑长城，统治者的名目总是很动听：中国人民不可辱，为国捐躯，关门拒敌于境外、长城

外。可是，统治者及其当局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他们受辱，不一定是中国人民受辱；家国、

党国不是中国，人民不能以爱国热情便宜了家国、党国。相反，是统治者侮辱了中国人民，

是家国、党国妨碍了人民为国捐躯的热情。而且，清点历史，人民发现，外敌不多，挨打的常常是城内自己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硬碰硬难行，欺负手无寸铁的人民倒很行。打击外敌、侵略者不力，却非常热衷、擅长、凶狠于剿灭同族、本家自己人。长城，这难道是关门打狗的新解，打自己人？任何近代以来，中国统治者反复强调，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没有强大的长城，便没有强大的国权和人权。可是鸦片战争以来，或者仅1949年以来，谁发动了最惨痛的军事镇压？事实上，人权不进步，社会便不能真正进步。中国自秦制中央集权以来，尤其是近代中国与世界民主革命以来，党政统治机构设置、国防建设、意识形态、税收摊派、外交等长城即国家机器不可谓不长、不坚固。但从来兵器先进、多了、原子弹氢弹核化了，并不表明人民人权更有保障。从来中南海、紫禁城等皇宫高大了，并不表明民居坚固了。从来皇权党权强大了，从来党性加强了，并不表明民权人权更有保障。从来帝制、衙门庞大了，帝位、帝王、一把手们多了，并不表明社会得到更有效的管理，人民人权更有保障。从来是从属于中央集权的反腐败监督系统强大了，政权、权力腐败反而更猖獗了。从来意识形态天下一统了，并不表明社会思想言论信仰更自由开放了。从来天下富足、国库充盈，并不表明人民财产自由、可以继续进步了。即便是在所谓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五十年代、改革开放等所谓太平盛世里，中国人民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权从来没有因此强大过，从来没有比一人制、一姓制、一党制、一言堂制、民主集中制、终身制、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等统治特权更强大。相反，常常会走向反面。看一部《三国演义》，科技发明、人民生产的粮食等综合国力，大多用于了名为统一的称王称霸之连绵征战。可是，人民最后收获了什么？新的统治者。我们不能苛求近代以前的古人，但至少鸦片战争以来这种状况也从未改变。太平天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打倒四人帮等，莫不如此。鲁迅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查考，真教人觉得不象活在人间。”其实，较之来自

国内统治者同族之苦，异族之苦是短暂、有限的，中国人民最大、最凶恶的敌人始终在长城

以内，从家到党，独裁专制制度一直不曾闭合它吃人的血盆大口，它使中国横溢“血的

蒸气”。仅1840年以来，苦难于、死于国内统治当局的中国人远远多于两次鸦片战争、甲

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的总和。共产党员死于国民党的多，还是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多？八年抗

战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文革浩劫多少年，右派帽子扣了多少中国人多少年，多少高级干部死

于内斗？反对六四镇压而至今不得成功，我们已经用了多少年？“教育转化”、镇压法轮功，

又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我们不是掩盖、化小外敌、外族之罪恶与危害，而是必须认清国内

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千万不要上当于其假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而放过真正最凶恶的敌人、

内敌。

不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仅从辛亥革命算起，中国人民不是仍然遭受独裁专制统治奴役吗？

各类长城高大、坚固了，政权、帝位安稳了，便是统治特权进一步，人民人权退一步。捍卫

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全了党政官本位特权等级私有制。集体人权成全了中央集权，集体领导

成全了个人专欲、核心领导。国家主权成全了统治强权，民主集中制成全了极权统治，集体

主义、爱国主义成全了集体和国家的僭越者。民富国强，并没有扩大人民的选择范围，并没

有带来标志着社会进步的多党制、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仍然是一党制、一元化、单极

化、终身制等主宰全社会。

六四镇压干了些什么，这朝鲜战争以来的最大军事部署对准谁了？那些综合国力因素组成的

所谓强大主权，好象更多的是用做对付、镇压人民自由民主，永保“主权高于人权”幌子下

的统治特权高于人民人权。

秦始皇肯定没有料想他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是修筑长城，而且更不会想到虽然秦王朝仅延

续了二世，但始皇帝的帝子帝孙们却以他开创的各类长城，护卫着帝制帝位帝王之秦制延续

至今。

长城，我们对你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你保障人权，还是护卫统治者特权？如果我们一直把

修筑长城等墙的精力，用于修路等社会公益基础设施，那中国的道路交通网等该但是何等发

达！如果中国的传媒出版不受独裁专制意识形态控制，那我们可以使多少人得到更好的文化

学习机会！可以扫多少盲！

可怕的是，中国各独裁专制王朝的朝廷和政府，总是忙于为人民修墙，疏于为人民筑路。

在这信息高速公路伸向全球的年代，中国的一党独裁专制政权也正忙于对信息流的围追堵截，

修筑拦截信息的长城与围墙！当局不尽力发展中国网络，反而“加强管理，加大网上精神文

明建设力度，提倡做文明网民？”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与发行，自由

信仰、自由选举等，便是不文明了？

可惜啊，五千年中华文明，最壮烈的是农民起义，最惨烈的是镇压人民的六四等暴政，而

存物最多、最显赫的则是长城、城墙、皇宫、皇陵等帝制帝位帝族帝王之遗留。中国的那些

皇帝、王朝，把主要精力用到了固守独裁专制、江山传代、指定接班人和死后仍然享受皇帝

威风或来世再做皇帝的大业上了。秦始皇的国道几近无存了，可长城还在，但如果秦国道还

在，中国目前则是道路交通何等发达的中国！如果当局的主要精力、中国的主要国力不是用

于修筑各类长城，那么当今中国该是何等发达、繁荣，哪里还会持续孳生诸多贪官污吏，还

会存留诸多老少边穷地区、边疆、禁区，包括人文科学、文艺、思想等禁区。

中国统治者不是没有“要想富，先修路”等的改革开放智慧，而是有了太多的篱笆、长城

思路：筑篱笆，守住一亩三分地；修长城，守住江山不改姓，不变色，不换党。这是“两手

抓，器变道不变，基本原则不能丢”，确保一人一姓一党独裁专制统治思路的历史根源！仅六

四以来，为了坚持暴政错误，搪塞国际社会，挤兑台湾民主化，我们浪费了多少综合国力，

牺牲了多少人民利益和国权，修筑了多少种长城？

摊开地图，打开历史年表，我们会发现什么地方修了长城，什么地方相对贫穷。而且，

那些由于地理地貌因素而被视做天然长城的地区，总是一度、几度，乃至始终相对欠发达。

如西部高原、西南高原与热带丛林、东南海洋、东部沿海、北方大漠和冻土森林等地区。

什么时期大修各类长城，什么时期便相对贫穷、落后、缺乏创新、充满压抑。如明朝、文

革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六四后时代等。

难怪人们总结说：帝位地位不行了，便抓经济；经济不行了，便抓政治；政治不行了，便抓军事。而每抓一项，最大目的便是修筑各种长城，稳定、巩固其一人一家一姓、一党一政治局一核心一人等的独裁专制统治之江山。

表面上看，是什么不行了，人民反对什么，当局便抓什么长城。好象是人民惹的祸。其实，正如土财主越有钱，越往地下埋，历代统治者总是社会越繁荣、国库越充盈，他们越修长城。而且一旦天下穷了，闹饥荒，人民穷则思变，他们恐怖于帝位即倒，更收刮民财修长城。

总之，不论富了穷了，统治者的最大国事永远是修长城。而且长城越多，越了不起，越修长城，中国便越民穷国弱。直到人民遭殃，统治者垮台，可谓祸国殃民。

中国长城，你历来“姓王，姓党，姓个人，姓王朝，姓家国，姓党国”，还是姓人民、姓国家？你姓特权，还是姓人权？难道你的常用功效总是“守内虚外，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常常甘做防范“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是工具，更经常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内紧外松，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稳定（帝制帝位帝人）”的打击力量？

长城，人民军队，我们的兄弟我们的血肉，无论你们在大山里、海疆边、高山之巅，还是你们驻扎在城乡，还是你们在天安门广场巡逻站岗，人民对你们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你们来自人民，你们却总被迫尴尬、困惑于党性和人民性之间；你们被愚弄、欺骗得难以明晓自己究竟是个人个体之军、是党军、独裁专制军、维护特权军，还是国军、民军、自由民主军、维护人权军。你们努力使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非四项化、非三讲化、非凡是迷信化，军人非个人化、个体化、私家化，实现军队国防化、国家化、人民化、崇高化，但却总是被绝对的“两手抓，党指挥枪”逼向所谓党性。

长城，你更多地被用来禁锢城内的人民，还是抵御入侵、开拓疆域？

长城，你更多地用来戒严、搜查、闭关锁国，还是督促党政官本位为人民服务？

长城，你曾经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但你不应该是中华民族被独裁专制的象征！

长城，你应该是护卫人民人权的巨龙，而不是护驾千百年来独裁专制官本位特权的御用工具！

六四镇压中的人民军队，你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人民人权，还是独裁专制之特权？中国武装力量的使命，难道就是要使人民对独裁专制政权和个人皇帝服服贴贴，不存二心？中国国家

机器的使命，难道就是要帮助独裁专制禁锢人民，剥夺人民自由民主与人权？

还有我们的身处党政官本位的国人，你们兢兢业业工作，难道只是甘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

统治全党全军全国全民族全体人民？

也许，中国不能没有长城，但如果长城只是为了封闭，那我们宁愿没有它；但如果长城只

是为了维护独裁专制体制，那我们宁愿拆毁它。

另一类隐形长城也对中国危害甚大。回顾历史，看看当今，中国的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的

墙文化可谓成龙配套，系统庞大，无处不在。社稷或国家有长城大墙，城市有城墙（中国城

市的官僚统治基地作用，大于经济文化等含义），皇宫中南海有高大宽厚的宫墙，官府衙门有

围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黑箱操作则在各级别各地如墙的层层黑幕下进行。天赐的漫长

海岸线没有使中国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也没有开创出一个什么海洋经济和海洋国土，更不必

提什么以海路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海岸线与海洋，它们只是封闭人民、确保独裁专

制的海上长城，是实施“海禁”的无成本长城。西南的世界屋脊与西北大漠，也是天然长城，

都是“两手抓”的工具。

这层层城墙，完全把中国搞成了一个核桃式的“墙中国”，它最核心的部位就是皇宫和中南

海。虽然宫墙城墙长城等千墙万墙纵横交错，如迷宫，如八卦城，还互相制衡，还有那四项、

三讲等意识形态等思想之墙，均是为皇帝皇家皇党皇宫实施独裁专制服务。

放眼世界，相形之下，中国的墙文化和“墙中国，墙中人”色彩如此丰厚，实在耐人寻味。

是害怕人民进攻，还是便于黑箱操作，还是树立威严，便于统治？还是过皇帝瘾？有庙就

有和尚，有官墙必有干部，有干部就必定有权，有权就必定为人民服务，或者吃人民：不找

人民收费，还勒索上级当官的不成？虽然有的地方政府开始拆墙，开始透明，但还有那无形

的党政官本位官墙，如报批、待批、申请、跑程序、盖图章，那办事难、腐败、索贿与被迫

行贿等等，哪个不是一面面官墙？

哪面官墙，和其中没有外部监督的墙内权力，不是在为人民服务中生存、发展、壮大？有

的巨贪，哪个不是老虎？不是人民的灾星？困在围城之中！此官本位是墙，那官本位是墙，

你是墙，我是墙，互为墙，直到墙象牢笼那样精密：你围我，我围你，你关我，我关你，打

“关三家”，练阴功，互相刁难互相关，不是你关我，就是我关你，都关了完事。反正，明天接着关，来世接着关。砌墙围墙，挡人卡人，直到多得看不见的墙湮没了一切人，或者几近埋没了一切人。

有官墙就有门，就有关卡，就有官卡，权卡，有卡就得留下卖路钱。官墙高而多，门低而狭窄，墙内衙门“深似海”而阴暗，人民望墙生畏，钱少了进不起，进去了又怕被吃得精光，除非进去大盗一笔。这么厉害的官墙官卡，人民甭期盼什么自由民主人权，穷人生存权也困难，有钱人也不易。它们怎么能够适应现代网络信息社会的需要？国家经济怎么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少，少设一些揩油的机构，少搞一些揩油的管理，少修一些官墙、官卡、关卡、收费站、洗车站，中国会更顺当地从自行车大国升为汽车轮上的国家。至少，社会畅快了，阻碍少了，农民负担轻了，市民、学生等负担全轻了，国家负担轻了，都跑得快了。

有的独断专行，决策错误，哪个不是贻害天下？人们只知道议论“足球队，坐台小姐黑社会”，须不知这黑那黑，最黑的还在官墙里。大城独裁专制小城，黑小城；大墙独裁专制小墙，黑小墙；大官独裁专制小官，黑小官；小官独裁专制无官，黑无官；上级独裁专制下级，黑下级，没级最倒霉！无官独裁专制办事者，黑办事者，黑群众。群众黑谁呢？放心，办法也很多。

总之，独裁专制统治社会里，由帝王核心至上主义，发展到官僚主义，再发展到民僚主义，社会风气极度败坏。由皇宫发展到部委、地方党政机关，发展到大小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再发展到民房，既不讲民主法治，又以邻为壑，全国一片窝里反、窝里斗、窝里黑。整天你长他短，当面笑呵呵，背后使绊子。一个黑一个，谁也逃不了，谁也甭好受。实在不行了，实施犯罪，组织黑社会，给贪官污吏制造麻烦，或者危害良民。最差了，拖个垫背的。上级还专门准备了一些渠道。哼哼，红白两道，可以官黑、红黑、明黑，也可以私黑、黑黑、暗黑。相形之下，那些讲真话、善良的人，美好的事物，倒成了害群之马。为环境不容，乃至引起众怒。

这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

善良的中国人，经常到官墙外上访，等候接待，好诉冤、得伸冤，有时举着“求救星，找救星”的牌子，他们哪里知道官墙内的清官也在盼救星。清官何其少，清官多难当，不是被染黑了，就是自身难保呆不住。他是贪官的眼中钉，皇帝也认为他不好使唤，不听使唤。

都说中国是睡狮，其实中国是墙中狮，墙笼中狮，是城中狮，是城笼中狮，是被黑之狮，是被捆绑之狮，是被“两手抓”之狮，是肉体与思想均被麻醉之狮，是被独裁专制之狮。

墙！墙！墙！

官墙！官墙！官墙！

党墙！党墙！党墙！

官墙养虎！党政官本位养虎！一党独裁专制纵容虎！

还有狐假虎威！还有扯张虎皮做大旗！还有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还有只要独裁专制制度不被终结，即使没有老虎、猴子，还会有它们一脉相传的血缘亲戚！

看看历史，即使大明终结了还会有大清，大清终结了还会有袁世凯登基称帝；洪宪皇帝之死

结束了帝制，但最后还是出现了帝制的变体——蒋介石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

现在，台湾民主了，中国大陆仍然是“四项基本原则立宪国”下一党独裁专制的党国，它

还嫉恨、想破坏台湾民主。大陆独裁专制的墙，甚至涌进了国家大法，公然霸占人民自由民

主之人权的主权地位，在法律里建造维护独裁专制特权之党政官墙，剥夺人权。

好端端的中国，被统治者及其官本位搞得长城、官墙、官卡、官卡、收费站等横生，如

同一盘散沙。那“一国两制”之长城，是官墙、党墙、中央集权墙，它必然导致两岸三地。

这是统一中国，还是分裂中国？

3、盛唐并未筑长城

（1）历史记载表明，汉代以降，北魏、北齐、北周、隋、辽、金、明及六四前后的中

国大陆等，诸王朝均对长城进行过大规模增筑或修缮。而且，它们不仅仅是包括汉族，还包

括很多其他少数民族。若把先秦各诸侯国修筑的长城除外，秦代以后则只有汉、隋、明等3

个汉族统治的朝代大规模修筑了长城。另外，还有北魏、北齐、北周、辽、金等5个少数民

族统治的朝代修筑了长城。

注意，虽然这份修筑长城的名单里，不包括声名显赫的唐、宋、元、清，但它们却都曾经

胸怀宽广，创造过不同时代的封建盛世。汉代修筑长城，部分原因应该是秦代的历史惯性使

然。

唐代以内外开放著称，它的各类常常非常少。对外开辟丝绸之路、东渡扶桑等自然不在话下，

其内政也是相当开放开明的。在权力组合与用人制度方面，它逐步削弱、拆掉了六朝时期的

门阀制度长城，庶族地主阶级（相当于现在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知产阶级等）势力开始

上升、壮大。这些为高门寒族、贵族平民等平等议政参政，建功立业、经邦济世等开拓了平

坦、广阔的前景。人们活力四射，社会人气进入上升阶段。

值得指出的是，在民本思想的引导下，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经过汉代“清静无为，

休养生息，敬天畏民”的治国实践，到了唐代，中国应该说是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民主政治实

践。有学者认为，唐代政治开放，是指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唐代政治走出了皇帝

孤家寡人政治的封闭圈，形成了君臣一体、朴素民主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这个民主式的开

明政治共有五个重要标志：

一、多元化权力机构的形成和完善，国家机构中的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军事、财

政、教育等机构日臻完善，权力的合理多元分配且又相互制约。

二、建立了君臣集体议政决策体系，军国大政一般均由宰相和百官集体讨论，皇帝在广泛听

取群臣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做最后决策。

三、封建法律的完备与司法制度的建立，部分限制了皇帝以权代法的现象，初步形成了以法

治天下的局面。

四、建立了广泛严密的监督机制，监督机构由御史台和谏官组成，同时还有比较广泛的

社会舆论监督。

五、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参政，从以夏治夷、以夷治夷到夷夏共治，充分体现了唐

代多民族封建国家政治的开放。

专制社会里，最难监察的皇权、核心等大小一把手权，侵犯人权最烈、社会危害最大的

就是他们。尤其值得重点指出的是：由于唐朝监察制度可以约束皇权，它已经超出了中央集

权金字塔权力架构，具有“分权制约”性质。这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谏官众多，职责

明确，谏诤内容广泛，而且言事谏诤权有切实的行使保障。二是门下省可以封驳诏书，纠正

皇帝违误。三是御史台官吏可以拒受诏书。这些制度框架与治国方略，几乎就是现代民主的雏形。在这里，中国最开明的皇帝李世民功不可没，由于他的开明政治的指导，全方位开放，主动出击，而不是修筑各类长城，给了唐代容纳世界的海量，有了开创“丝绸之路”的胸怀，使“贞观之治”开创的繁荣局面延续了数百年，使中国文明享誉全世界，使处于封建独裁统治下的中世纪欧洲望尘莫及。当时，长安城真乃世界之都。据贾平凹考证，它的面积是现在西安城的7倍，长居外国人逾3万，超过了当今北京与上海。这段时期，堪称经济发达、社会繁荣与开明民主政治的相互促进的正比例关系的典型代表，政治愈开明，形势愈稳定，经济愈发达，社会愈繁荣；反之亦然。唐朝，梦一样的王朝。

（2）盛唐之后，许多因素致使民主式的开明政治急转直下。如战乱等内忧外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不到广泛萌芽与发展，集权主义者又不断以强化独裁专制制度的方式巩固统治地位。社会篱笆、（集权下的）制横、长城等等越来越繁杂、冗长了。它们不仅阻碍社会前进，社会还要为它们提供巨大开支，它们更是前进的负担。

而且，几度桑田，几度牧场，中原地区长期被不如其文明的、更倾向于独裁专制的文化与统治者力量所侵扰，并数度被统辖或部分被统辖。如北宋，南宋，元朝，战乱频乃，常有少数民族侵扰中原，且元朝是蒙古族统治中原地区。征服者的破坏，征服者的被征服，都是以后退与原地踏步为代价的。人为战乱，自然灾害，治乱，巩固政权，掌权者人性恶的一面无从监督、限制、制裁，游牧民族文化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独裁专制统治甚嚣尘上，使极有前途的民本与民主事业遭受挫折。在独裁势力能够逞蛮斗狠的年代里，天性爱好和平的民本与民主思想是占不了上风的，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不在罕见之列。自北宋起，中国政治舞台又上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绝对君权，没有别的力量能够制横、制约它，到明朝，甚至一度取消了相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可以被皇帝当庭杖打，其他人还有什么人权可言？“公民权利不可侵犯”没有一点踪影！而几乎是同时期，英国诞生了《大宪章》，法国喊出了“国王必须死，因为人民必须生”，而

充满人权精神的《独立宣言》则诞生了美国，明治维新塑造了近代以来的日本，等等。显然，资产阶级革命、人权宣言等先后风靡、惠顾了东亚大陆的另外一些地球亲戚！

随后的世界政治版图里，西方渐强，东方渐弱。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国仍然在独裁专制体制里颠来倒去、打滚，西方则逐渐摆脱中世纪封建独裁黑暗统治。欧洲的大学成为产生、传播自由主义的土壤，中国的书院则仍然讲授理学等，只能完成维持独裁专制体制持续运转的使命。西方自由民主革命始终轰轰烈烈，人权文明逐渐成熟，自由民主的三权分离的议院政治纷纷开花，新技术、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在人权进步下节节攀升。于是，两者差距逐渐被缩小，中国逐渐被追上，逐渐被超过，并最终导致西方超过东方，成为世界科技进步、探知未知世界、经济繁荣、人权改善的领航者。导致我国落后的这枚盘根错节的大病根，大概是从人类社会与国家体制开始向民主转型的时候埋下的。

史实表明，工业革命前，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技术输出国，有 35 种重要技术与发明从中国传入欧洲，那期间仅有螺钉、钟表等四种技术传入中国。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国力最强的帝国。据经合组织（OECD）1996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1820 年时，中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 28.7%，相当于现在美国的世界占比。但我们认为，这是粗放型的 GDP，也不是人权文明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至，其经济规模与经济质量不成正比，必然缺乏后劲。它为 20 年后、75 年和 80 年后分别惨败于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所证实。这是别的话题。

又如有关资料表明，在 1830 年的世界制造业产量中，英国、奥地利、法国、德意志联邦、意大利、俄国等西方六个主要国家的相对份额总和为 29.3%，不及中国的 29.8%。但是，由于西方掌握先进的民主制度来与手持落后的独裁制度不撒手的东方竞争，致使差距越来越大，到 1880 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展开时，仅英国就占了上述指标的 22.9%，中国则跌至 12.5%。人权因素，最终导致以中国为代表的独裁专制的东方，彻底落后于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西方。

（3）尤其倍令国人惊叹的是，日本本是东亚秩序与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其闭关锁国程度不

在中国之下，综合国力更是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从1851年美国“五月花”战

舰开至日本海岸，仅到1853年佩里准将率领美国舰队即逼迫日本天皇第一次签订通商条约；虽然1

863年发生了英舰炮轰鹿儿岛战争，1864年发生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占领下关地

区的战争，日本也与中国一样被迫签订了神奈条约、安政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锁国政

策被打破，但在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志士推动下，它很快就朝野一心，抛弃独裁专制体制，

变被动为主动，打开国门，开始了师从美国等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历程。

1868年日本睦仁天皇弃独裁专制投自由民主，以东方经典、中国《易经》的“圣人

向明而治”，开始了学习西方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经典的“明治维新”。在成功地完成了以尊

重人民自由民主与人权为特征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迅速强大，成为西方的一员，并有实

力大举把中国变成一些狂人征服东亚乃至世界的最初战场。仅在“明治维新”不到三十年的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日力量对比即发生了彻底倒置。

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日本，本来同为君主专制国家，几乎是前后脚受到西方人权文明的冲击，

所不同的是结果：中国朝廷违背民心民意，丧失了改革开放、就势转变为一个政治经济

文化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机遇，贻害至今；日本则朝野一心，由此开始了与世界先进文明同步

的现代化进程，并始终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看看现代中国与现代日本之差距吧，看看一些人

的“恐日症”病因吧。

其实，在甲午战争前，中日几乎是同步走向现代化的，我们今天的落后完全是制度的落后，

完全是当权者坚持“两手抓，器变道不变”的落后，坚持一人一家一党独裁专制制度的落后，

被动挨打完全是制度落后招惹的耻辱。日本的成功源于“两手抓，政治与经济同时改革”，

中国的失败源于“两手抓，经济改革，政治保守”。

日本，作为民主制度在亚洲运行的最大受益者、收益者，我们不能不怀疑其支持袁世凯恢复

帝制、称帝的险恶用心，也不得不识破其至今绝少抨击中国现行制度的伎俩：以帝制帝位帝

王为基础，中国永远陷入家国、党国、核心国改朝换代之祸国殃民轮回，它才称心如意。

我们也不由得感慨，日本人民支持其天皇与天皇制度是有道理的，他等支持自由民主改革开放的胸襟，完全比慈禧、满清权贵更有资格获得国人尊重。他们的君主立宪“两手抓”似乎更高明。历史已经表明，他等皇室及其权贵顺应世界人权文明潮流，尽可能多地给予日本人民自由民主，不仅实现了富民强国，还受到人民认可与热爱，继续高居皇位，成为日本的国家象征。在那种时代，这样的开明国君，理应受到人民尊重与爱戴，这算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来我往的人之常情吧。相形之下，中国的皇室及其权贵党贵则是“只管自己”的“器变道不变，两手抓”，完全无视人民自由民主权益，顽固阻止中国汇入世界人权大潮，拒绝立宪，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改革，最终以其暴政招来人民的暴力革命，以其保守顽固招来彻底摧毁、荡然无存，遭到人民唾弃与切齿痛恨，落得被推翻和千古诟骂的下场。

（4）有人疑惑中国清末的10余年“改革兴国”，即以改良式改革走向现代化，为什么会被暴力革命取代？虽然原因有三条：一是朝野重臣互为冰炭，以品行卑劣、争权夺利从内部破坏的改革改良计划，二是未能实现由政策创新到制度创新的主动过度，三是政权腐败、法人腐败、集体腐败等腐败之风盛行，独裁专制强权加剧、横征暴敛、苛政暴政等使军界、经济活动、文化思想活动、企业与个人生存等举步维艰。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在于第二条，即在于如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两手抓，保政权”堵塞、停滞于由经济改革向政治改革过渡，在于没有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在于全国对一人一姓一党独裁专制的保持一致。戊戌政变和六四镇压就是重拳出击，暴力打击，是“两手抓”的极端形式。这顽固与暴政，最终导致民心丧尽，反而促成了军民一致、臣民一致、干部群众一致等，使其瓦解于暴力革命之下。暴力革命，显然不如和平演变那样利于中国前进，但这不是人民人权革命之错，而是独裁专制当局当事人固守独裁专制既得利益之错。在此，我们无意赞美日本天皇等权贵，不认为君主立宪优于民主共和，更是厌恶帝制而倾心民主。但如今，睦仁天皇使其后代还有皇位可坐，从大到人民与国家，从小到皇室地位，他

不谓不“英明”。

反观慈禧、蒋介石国民党等权贵党贵，他们不仅因顽固保守而愚钝，而且因愚钝而误国误民，

她的后代也失去皇位，“啥也不是”了，既不掌权，也失去了象征国家的荣誉，她不可不谓鼠

目寸光，缺乏远见。

可以说，满清覆灭，皇帝退位，皇室滚蛋，完全是“器变道不变，两手抓”挡不住“器不离

道，器变道亦变”的结果，完全是违逆民心、咎由自取，其结果可谓误民误国误己。国民党

及其党贵被赶出中国大陆，不也是顽固坚持其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自食恶果吗？

共产党一人

一党独裁专制会步其恶果后尘吗？

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又以“两手抓”抓住四项凡是迷信不松手，搞“器变道不变”，是以开

明专制为标志的，这无疑缓解了全社会的暴力反抗情绪，可以延缓中国共产党的一人一党独

裁专制地位。但六四镇压表明，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与开明专制不会自动过渡到民主政

治。晚清洋务运动与戊戌政变也早已指明了此论。改革开放之力度，仅能支撑有限时段的政

权延缓、不变色是不够的，还应继续改革开放，直到最终确立主权在民的民主中国。这需要

共产党及其党贵率先拿出勇气来，不要愚党愚民愚军愚国，而要尽快推行党内与国内民主化

进程，知错就改，见师就拜，在顺应民心的让步中保全名声与实力，以期在全民大选中获胜，

东山再起。

话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袁世凯还是有优点的。他恢复帝制，做皇帝固然不对，但他迫于压

力，不用四项三讲、三个代表等坚持“两手抓”的错误和迷信，知错就改，最后取消帝制，

则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较之一些卑琐的固守者，如江泽民，也是高风亮节的。不过，人民一方面无法知道遭一人把持的共产党是否会主动创立民主中国，另一

方面也不会

被动等待其施舍，中国人民必定共同努力，创立民主中国。不过，请当局当事者放心，时代

进步了，民主革命不是赶走他人、践踏任何人的人权，中国人民不会象赶走国民党那样对待

共产党了，不会以暴力革命去推翻任何人任何政党了，我们坚持和平演变，坚持以和平非暴

力人权大进军创立民主中国。

（5）上述帝位与王室得失延续之比较，发生于亚欧大陆的东端，一个是岛国，一个是大陆国家。

有趣的是，在亚欧大陆西端，另一对岛国与大陆国家——即英国和法国，其民主革命成功与

王位的延续与否，尽管中日绝对没有抄袭，但它们几乎是中日对比的模子，几近完全相同。

不同的是，英日两国君主立宪，保留王室，却仍然是非常民主的国家，法国抛弃王室也是非

常民主的国家，惟独中国有皇室时搞独裁专制，抛弃皇室后还是搞独裁专制。当然，世界上

还有许多非常民主的君主立宪国家，也有一些假自由民主真独裁专制的国家。真是活见鬼，

戴皇冠或不戴皇冠，加冕或不加冕，有皇室或没皇室，这个党或那个党执政，这个核心或那

个核心，中国人民都能看见中央集权帝制帝位顶端有皇帝。现在有了电视，一天看好几回，

躲都躲不开，真倒霉！

“明治”之尊重人权，典出中国《易经》“圣人向明而治”，却在日本维新成功；魏源著《海

国图志》，旨在以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激励中国，不料它在国内反响寥寥，却墙里开花墙外香，

轰动日本，成为“日本学者、文化人等……倾向于开国主义……契机”，启蒙了其改革开放；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华文明的精品，它写进了现代法国之根基的《人权宣言》，高悬

于联合国总部大厅，我们却在自己的宪法里找见了四项迷信不见它，扣以“全盘西化”帽子

打击、拒绝它；中国第一个在亚洲以辛亥革命推翻了王朝帝制，却至今仍然受党国帝制困扰、

羁绊。

这是不是，中国出经验，日本出成果，或者中国出思想，法国得实践，或者中国出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却打回中国，或者中国出人才，人才被埋废或出国的同根现象？

而另一方面，前苏联老大哥出马列共产主义经典供我们学习、追随，现在人家放弃了，苏共

也抛弃党内独裁专制制度，在民主潮流中寻求再生。我们却仿佛不愿意走出一人一党独裁专

制的死胡同，无视民主救国、民主救党的正义与真理，还在三讲三个代表地拼老命坚持四项

凡是迷信，说它符合国情，是中国特色，中国要“两手抓”，走自己的路。

这是中华民族与文明的传统吗，排挤、抛弃、浪费自己的好的，捧回、尊奉人家的废弃；或

输出、流放国粹如民运，固守国耻如六四，引入国祸？不，这是官方或官性主流文化对民性

中华人权文明的篡改与破坏，这是坚持独裁专制制度者们接力棒式地排队为中国人民丢脸！

但不管怎样，历史的一个讽刺是：在人权文明的历史浪潮前，固守者失去了，保守者下台了，

而顺应者则前进了，改革开放者得胜了。

满清王朝扼杀了戊戌变法，菜市口喋血，谭嗣同等死了，康有为等流亡了，它自己也已经灰

飞烟灭，可谓亡家王朝。国民党全力剿杀共产党，拒绝成立中国民主联合政府，结果被赶到

台湾岛偏安了。六四镇压至今，牺牲了的还活在中国心中，关进大牢的与流亡的仍然奋勇直

前。而且全国人民都是六四镇压既得利益者当局潜伏颠覆者，社会貌似平静，实则沸腾，民

心思变。没有什么戒言、戒严、严打、镇压、屠杀等可以阻挡人民向其讨回公道与正义！

法国王室不存在了，英国王室仍然受到国民尊崇。日本天皇支持了明治维新，西乡隆盛和吉

田松阴成功了，其天皇皇室也顺民生则自己生，他们仍然活跃于世界舞台，与日本及世界共

同前进。（必须指出的是，浪人、倭寇的接代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了“明治维新”后

的自由民主与人权蕴涵的实力搞非人权的勾当，人民的进步被用来搞反人民的勾当，令人深

感耻辱。他们疯狂地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如在 1874 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 年侵略朝鲜，

1879 年吞并琉球，还在 19 世纪末提出了丑名昭著的“大陆政策”。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动

的侵华等战争中，日本侵略军使用了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

妇孺，其残忍和灭绝人性之程度，在近代战争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中日甲午战争以

来，中华民族的每次灾难，都有日本侵略主义势力贪婪而残酷的影子。人类人权文明的成果，

不是用来践踏自由民主、破坏人权的。遗憾的是，日本国至今有人仍在为非人权的罪恶辩护、

掩盖，并篡改、涂抹历史。当然，用民主体制积蓄的力量，干独裁军国主义的勾当，也是不

会得逞的。有独裁倾向或已经独裁的国家，应该臣服于人权正义，它实力越小越好。但人权

政治对一个国家、民族所催生出的热情、繁荣与实力，是不能小视的。我们不得不叹服日本

是东方文明中实施民主政治而大得其利的人权成功试验田，它是人权文明战胜独裁专制文明，在亚洲获得成功的典范。）

历史讽刺独裁专制，是因为自由民主必然进步！人权必然进步。正是尊重绝大多数人民的人

权，保障了他皇家的人权。相反，看看中国，国民党不与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被

赶出了中国大陆。环视世界，可以说，不论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还是从皇室利益出发，还

是从政党利益出发，东边的日本皇室比满清皇室强，北边的沙皇比满清皇室强，苏共比中共

强，甚或“英明”。这是中国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人言周边实力强，中国处于包围之中。其

实，实力是表面现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基因。是自由民主、人权的，还是独裁专制、

特权的。比较而言，如果说中国又遭遇新一轮的强势力包围，那么实质是统治特权至上政权

造成的弱势综合国力遭遇了人权至尊国家胎生的较强综合国力的包围，受害的是国家与民族

利益。

环视“一个中国”，国民党曾经极端独裁专制，现在它弃暗投明、民主化了，不是个人统治国

家的工具了。大陆共产党却仍然被核心操纵，沦为党国、核心国独裁专制统治人民的工具。

如今，先前被国民党一党窃为己有的台湾已经实现了和平民主过渡，顺应民心与历史就是储

存了以退为进的功德，谁说国民党没有公平竞争、卷土重来、再次执政的机会呢？

但是，显

然，明朝、大清帝国是没有机会了。台湾不是国民党的了，但国民党仍可以通过自由竞选，

获得轮流执政的机会。

正在拼命固守一党独裁专制的人们，留点东山再起的机会吧！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满清与

国民党独裁专制王朝，六四与前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的兴盛，还有其他例证，都在眼前，以史

为鉴吧！中国要统一，要富强，但如果个别人或者野心家，不顺从民心，反而假借共产党组

织名义，成全其个人对全党全民全国的独裁专制，则是置自己于危险境地。

在此，我们可否这样预测历史：正如民主化进程由岛而大陆，但不是日本岛国，不是侵华战

争，而是“一个中国”的几个民主化了的岛，台湾、香港、澳门等将最终以先锋身份推进中

国大陆民主化，与大陆人民共同实现“一个中国，民主中国”。

冥冥之中，也许这是历史暗示，更是历史规律。民主大潮伴海洋，天降大任于民主化了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等三岛，让我们壮大它们，为创立民主中国导航。

4、 明朝：船队最大，长城最强，最无能

明代，陆地封关修长城，海洋禁海修长城。它是截止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前的长城修筑

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也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无胸怀、最独裁专制，也最腐败的一个朝代。

而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它还是长城工程技术史上的最高阶段。

他的开朝皇帝朱元璋得天下之前，就奉“高筑墙”为其“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

方略之首。其城墙的独裁专制力之威猛，就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庞大船队也由它调遣于股掌之间。

所以，我们能造大船，更能造长城，而且连大船的航海开拓性也只能起到制造海上长城的保

守功效，使得沿海、海疆、大海更是禁锢中国人民的海上长城，而不是海上国土、乐园、财

富、进步。

如史料表明，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整整早了87年。其船队有船近2

00艘，最大单载重超过1000吨，船员兵力逾2万。而相比之下，哥伦布、麦哲伦的船

队简直不是船队，仅有三四艘船，最大单载重仅120吨，船员不过数百。而美国独立后抵

达中国的第三艘船只“实验号”仅只84吨而已！

一些西方人据此认为，当时的中国放弃了制海权是“千古之迷”。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

虽然16世纪中国即拥有颇具实力的造船、航海技术和海军，那时候中国海军与陆军力量一

样，是“王军，党军；是皇帝指挥枪，是党指挥枪”。他们是“两手抓”的极端工具，最大任

务是维护长城内的独裁专制制度，是贯彻海禁政策，是抓捕违禁海商的朝廷或国家机器，不

是保护通商，开拓、发展贸易等。

不要忘记，明朝被史学家们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无作为的朝代。科学技术逐渐停止了前进步

伐，海上丝绸之路被禁止，资本主义萌芽也总是病病歪歪，不能茁壮成长。

更不要忘记，修丝绸之路、通西域、西天取经等热情远远大于修筑长城墙的汉唐两代，不

仅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也铸造了世界历史的辉煌灯塔！

历史正在表明，路是最有效的开放开发手段和“御外”长城，它的输出与引进功能是富强

引擎；墙是笨拙的“防内有效，防外无效”的窝力蛮防御工事。又如阎锡山窄轨铁路，害苦

了多少山西人？以至于本世纪九十年代的修路，成了胡富国的最大业绩。

明末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外比较历史的重要窗口。显然，热衷于修筑长城、禁锢人民

时，我们落后倒霉了，而人权革命则英国一度“日不落”。马克思对当时中国的评价：“一个

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

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是谁，“不顾时势”——不顾世界人权潮流？

是谁，“安于现状”——大搞稳定，稳定六四镇压及其独裁专制特权既得利益？

是谁，“人为地隔绝于世”——新闻封锁，网络管制，愚民政策？

是谁，“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共产主义世界无限美

好？

是谁，还在使中国有“被打垮”的危险？

是什么体制，仍然埋头于祸害中国，是什么使政权更迭充满血腥与暴力，并危及海内外和平

与人类人权事业？

是什么工具——各类长城。

马克思是对的，他抨击的帝国帝制与皇帝仍然中国的大麻烦。如果说唐朝是世界的唐朝，那

么明朝只能是明朝的明朝，围墙中的明朝了。一个开放，开出盛唐。一个锁国，埋下迄今仍

然祸国殃民的病根。

邓小平曾经愤愤不平地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

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他

一针见血。

最好的长城没有挽救大明，最严丝合缝的闭关锁国也没有挽救大清，所谓马列主义发展新

阶段的四项三讲的专制尾巴也长不了。

满清一朝300年，没有一个皇帝要修长城。但满清结束后，又沉寂了几十年，毛泽东时

代不修长城，甚至还拆了许多城墙（文物、文化意义另当别论），但四项时代却又承接了明代

的长城修筑史，它无疑从各方面把长城修筑史推向了新高峰。虽然作为文物事业，修缮长城

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历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合：2200年前秦始皇建立中国第一个封

建集权国家后，为了使一家之基业万世相传，他统一中国后的一件大事就是修缮、扩整长城。

为什么现代中国在四项基本原则被塞进宪法的同时，也大修长城？

尽管秦始皇大修长城是缺乏远见的蠢笨，虽然其理想中的江山传万世只存续了二世，长城

却被褒为其“历史功绩之一”，显然“修长城”的象征意义是明显的。他后来的任何一朝一代

一人一党的独裁专制政权，明修长城也好，暗中与敌勾结也好，组成庞大舰队下西洋也好，

洋务运动也好，引进外资也好，祖宗之法也好，四个现代化也好，两个凡是也好，四项三讲

也好，政治思想工作也好，都是“器变道不变”的“两手抓”。

几乎所有“修筑长城”的全部或部分意义都是为了巩固独裁专制统治，同时还假借了民

族主义和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保证一人一姓一党之王朝安全，苟延残喘帝制帝位，一党制，

终身制，核心制。

5、海洋沦为统治长城：毁了“入世”与航空母舰

（1）自由民主的演进，就是冲破禁锢。信息时代以前，冲破海洋，走向海洋文明，是

它们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可是，近代人权革命以来，海洋一直是中国的伤痛。

当西方国家开拓海洋文明的时候，续接陆地长城思维，中国统治者忙于把海洋当作天然

的新长城，新的两手抓工具。他们抱残守缺，以“祖宗成法，四项基本原则”固守帝制帝位、

家国党国，阻挡先进的出国，也阻挡先进的进来。

正如北方大漠与西面的青藏高原是天然长城，统治者眼里，庞大的海洋不是国土，不是资源，

也不是经济价值极大的“河西走廊”。海岸线只是长城防线，出海口、港口只是闭关自守的城

堡。它既防止人民觉醒、受益于海外交流而从内部推翻它，又防止外部势力从滔滔海上入侵、

颠覆它。

他们不重视沿海岛屿的开发和利用，不开拓通商与保护贸易，不重视设置海岛政区。相反，

为防止人民利用海岛进行反抗、罪犯利用海岛作案藏匿，为防止海外贸易、通商等交流，为

巩固独裁专制特权地位，他们更多的是采取封锁海路的劣招。据学者研究，明代抗倭，轰轰

烈烈，部分作力点乃是反走私。反走私固然正当，但开放走出去，岂不是更好的长城，更主动。

这些使得拥有强大郑和船队和漫长海岸线的中国，不具有多少海洋特点，更象个内陆国家。

直到现在，海洋仍然是海防，不是海疆，至少其边防含义还远大于它的海疆疆土含义。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开年法令是禁锢海洋生产力的“两手抓”：“一块木板也不

许出海”。这是老一辈的四项基本原则。

1434年，他的接班人——孙子的孙子——第五个皇帝朱瞻基，誓死捍卫祖宗成法，下令

封关。此举中断了唐宋元以来，800多年的中华开放历程。

他的后代朱厚（去“聰”的王旁，加左火旁）则进一步摧毁海洋生产力：“一切违禁大船，尽

数毁之。”这又是一项基本原则。

到嘉靖年间，明朝“正式闭关”：管它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别打搅我就行！两手抓，加固长城，

御外压内，能从内外守住长城，我能做皇上就行，我能指定接班人接班就行！于是，遇有倭

寇侵扰沿海，明朝皇帝内强外软，只强令当地居民内撤，息事宁人。这是不是后几百年里“闭

关锁国，落后挨打”的前兆？

清朝，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即那个“七下江南”，巡游内河很在行的皇帝执政时期，

朝廷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海禁宁严勿宽”，限制对外交往。

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只允许外国人在一年两次的“朝贡期”

内来华贸易。可是到康熙五年却保守为：下不为例，永行停止。这一“永行停止”，造成中国

100多年没有官方对外贸易。

康乾时期，朝廷还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

卫充军”。为防范出洋的水手、客商，清庭则“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

兵易于稽查。”中国人到海外设厂开店、投资等，必须按规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即丧失

再返资格。即使是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可能被“两手抓”招回治罪，并且株连家属。这

些是清代的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更是华人华资只有移民、移资海外，才能发展壮大

的原因，是中国迄今没有“入世”，没有航空母舰的昏招。

而与此同时，英国等政府也“两手抓”，奖励私人造船，对造120吨以上船只者发放国家津

贴；对航海发现者予以“分红、股份”；对开拓海疆、新大陆者论功行赏，封官进爵，予以鼓励、提倡。为了发展海洋渔业，培养水手、扶持海军，英国甚至从小处做起，国会通过了法令，规定每周三为全国食鱼日，而且戒斋期不吃肉，但可以吃鱼。难怪人家不缺钙，足球踢得好，能够雄起，从海上创出一个日不落帝国。在另外一些西欧国家里，则人民甚至把“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作为生活信仰。

这完全不同的两手抓，制造了海洋贸易落后，海洋资源开发落后，也制造了中国军队1840年鸦片战争完败于4000英国军人，制造了一系列海战的完败，致使中国海军迄今落后于世界。这是中国海军的原始耻辱！

翻开中国近代史，看到“海洋”二字，就连带着中国遭受耻辱的记录。据不完全统计，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中国被从海上入侵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在赢得山区战、平原战、游击战、陆地战、运动战、地道战、人海战等的同时，我们似乎很少赢得海战。

明朝，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危害甚烈，他们常常满载而归。倭寇是军国主义分子的前身，这是他们从抢掠资源财宝到二十世纪占领土地的开始。

清朝，1840年，仅16艘军舰、4000余人的英国舰队敲开了4万万人的中国国门。这时，英国民主革命正好过去了200年。

1860年，英法联军炮舰突破中国海防，驱兵北京城。这时，法国革命过去了71年。

1884年8月，中法马江一役，福建水师全军覆灭。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北洋舰队已经是一支在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令人刮目相看的海军舰队，但它却初被挫于丰岛、再遭创于黄海，最终全军覆灭于威海军港。这时，日本明治维新只过去了27年。

1900年，八国联军炮舰迫使清王朝签定《辛丑条约》。从此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外国军舰在中国领海和内河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国。那时，德国、俄国等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

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统治者“两手抓”，抱守独裁专制之家天下、党天下，屡屡诱使外部势力从海上入侵中国，致使丧权辱国的误国误民史。其中，倭寇是最早的急先锋。以

至于孙中山先生在吊唁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时，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代浩叹。

中国人都熟悉“黄河入海流”的壮观诗句，还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豪情。但是，黄河文明为什么不能把华夏民族融入大海？为什么中国海岸线巨长、天然良港众多，却始终是个海洋小国？虽然1840年，中国因鸦片战争被动打开了国门，海禁、海上长城有了洞，海潮开始涌入中国。但是，海水倒灌，比主动“直挂云帆济沧海”要难受千万倍。其实，继开放、进取、繁荣的唐朝之后，宋朝已经开始做缩头乌龟了。赵太祖留下“守内虚外”祖训，即是老版本的“防民甚于防寇，攘外必先安内，四项原则两手抓，内紧外松保稳定”等原则。它们共同是靖康之耻乃至南宋政权灭亡的祸祖，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寇入侵、使馆遭炸等一系列国耻的引路贼。他们骂别人是汉奸，统治者自己才是最大的卖国贼。

海洋文明时代，新的机会来了。可是，在失去统治特权和开放之间，中国统治者又选择了修筑长城，封关锁国，高压人民。结果是落后挨打，祸国殃民。这一思路与陆地文明时代同出一辙。

（2）我们不能总是说“坚船利炮使国门洞开，中国被侵略了”，而要分析是谁，用什么工具，使得中国没有主动走出去，落得被动挨打，丧权辱国。显然，是独裁专制统治者的帝制地位，是诸般海禁、长城、闭关锁国、基本原则、两手抓等工具，是他们祸国殃民，是他们埋下了中央泱泱之国，沦落为“东亚病夫”的隐患，并贻害至今。

这是海盗、倭寇、走私、海上骚扰、入侵等猖獗的原因。

这是贸易战不断、而中国国际贸易仍然十分落后的原因。

这是中国仍然为进入WTO而艰辛谈判的原因。

这是中国仍然没有航空母舰的原因。

其实，从明清开始，中国与人民已经被国内统治者囚禁于WTO之外了！极具煽动性的利益均沾以来就是普惠制与最惠国待遇。这是何等登峰造极的独裁专制！仅此一点，邓小平也应该因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入关等而不朽！丝绸之路，西天取经，长城，海上丝绸之路，海禁，四项凡是迷信，三讲三个代表，全国到处都是长城，闭关锁国，鸦片

战争国门洞开，通商口岸增多，“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成立特区，开放14个沿海城市，
开放城市已经达数百个，关贸总协定谈判，正奋力冲入WTO，通过这开门前进与长城林立的进退交加，中华民族走了一条多么艰难曲折的开放之路！
近现代的世界繁荣，人权与资本的全球化扩张或发展，是以海上贸易为特征的。谁率先走出
大山大河，由山而河，由河而海，谁率先奔入海洋文明，谁就获得发展、进步的领先权。尼
罗河、多瑙河、印度河、美洲大河、黄河等两岸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在中国，有了对帝制帝
位、传帝位的私利贪婪，一系列号称“圣明”的中国帝王的胸怀，远远逊于公元8世纪的“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知识分子、诗仙李白，也远远逊于冲破其海禁大做生意的“海盗”和漂洋
过海的华商、华侨。
他们搞的海禁、基本原则一类的长城，不仅拒绝海洋，还扼杀长城内部人民对海洋的渴望与
冲浪。中国的海上商人与海上贸易不得“长风破浪会有时”，往往是死于长城以内，而非长城
以外。王直应当是现代全世界华侨华裔华商的榜样，如果不是被清庭诱杀，他恐怕也会早早
就戴上了“世界船王”的桂冠。
中国的独裁专制制度耽误了多少王直这样的资本家、知本家、商人、企业家等的前程，绞杀
了多少跨国公司的雏形，危害了国家经济实力与社会发展。他们在台湾、香港、澳门与国外
能做橡胶、地产等行业大王，在中国大陆就是不行。中国人只有逃出国门、移民，改变国籍，
再回国投资、建设、爱国，才能安全、受欢迎。多亏了华资对推翻帝制、国民革命、抗日战
争、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吸引外资、1989年民主运动等的贡献。否则，中国将比今天更不
发达。我们也不会忘记，1989年全球华人大游行。
但反思一下，为什么华人华资只有离开中国，才能发展、成功，把企业、事业做大，才能“爱
国，报国”，才能安全？为什么中国人在龙的故乡难以成龙，只能是虫，出了国，改变国籍，
倒能成龙？为什么一些在海外受到排挤的华裔，宁愿去哪儿，也不回大陆？为什么黄河、黄
皮肤的中国人，流出中国大陆，就不愿意、也无法回来了？为什么台湾不愿意统一于“一国
两制”下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下的中国大陆（即“回到祖国怀抱”）？

不是大陆物质太穷了，而是全社会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太少了，是大陆的独裁专制统治制

度太凶了。它是剃刀，用剃刀“保持一致”，要剃掉一切经济、文化思想等领域冒尖的、妨碍

它独裁专制统治地位的人和事物；是苛政猛于虎，要吃人；是帝制帝位使得中国只能独尊“真

龙天子”一条龙，其他人便只能做虫，是一人做龙，12亿人做虫。回大陆，敢么？要不是

你们有外国国籍，我又不能出国抓你们，仅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就够你们好

受的。看我怎么“两手抓”抓你们！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有国际法等做保证，台港澳等世界各地的华人及富商有多少会被诱杀，

或者直接抓回来杀，甚至就地正法。有焚书坑儒、反右及其扩大化、六四镇压、镇压法轮功

等“两手抓”，有“非刘姓封王者，天下共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长城，谁敢、谁愿意

回到“祖国怀抱”——独裁专制统治当局的怀抱？

真可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可是，到底是黄河水、台湾、中国人抛

弃了中国，还是中国独裁专制统治制度赶走了他们？

无论如何，中国，一定走不出大山吗？一定不能冲破陆地长城、海禁长城、思想禁锢长城等，

由河而海，投入海洋，直挂云帆济沧海？黄河长江，真的永远只“奔流到海不复还”吗？它

们发端、流淌，您冲决壶口瀑布，挣脱羁绊，集结万川、凝聚人民，不正是为了创造一个海

洋中国吗？

它们冲出中国大陆，只是为了抛弃中国吗？它们民主台湾，民主香港，民主澳门，惟独不能

民主中国大陆？难道这是中国民主事业发展的定律：只能从沿海的岛屿开始，逐步走向沿海、

沿江、内地、边疆？

（3）民主大潮与海洋文明的同步演进，是人类人权事业的主旋律，它是人类的福音。愿意

的，民主领着走，不愿意的，民主拖着走。近代以来，虽然很多民主国家也是从独裁专制转

换而来，但比较而言，中国统治者总是显得更加被动、顽固。

100多年前，与东方的日本对比，同为儒家意识形态的东方帝制国家，满清皇室不如日本

皇室，慈禧不如睦仁。二战后，日本迈向民主制度，蒋介石国民党则坚决拒绝成立中国民主

联合政府。

现在，与北方的前苏联及俄罗斯对比，同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共不如苏共、俄共，江泽民等一班人不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等。

对顽固者、被动者、落伍者、不深明国家民族人民大义者，历史却是无情的。不主动加入、操作、主导人类潮流，就会被动陷入、打入、卷入、绞入、无能为力于潮流，被吞噬于潮流。

如今，日本皇室仍在，满清皇室则灰飞烟灭。日本经济发达，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则被赶出了中国大陆。现在，台湾、香港、澳门民主化了，中国注定要进步，“一个中国，民主中国”必然创立，谁能保证拦路者不遭清除？

遗憾的是，中国中国的独裁专制统治者不仅自己拒绝自由民主，还常常以假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的“两手抓”伎俩，诱骗人民与他们一起保守独裁专制制度。“中国人民不可辱，团结一心，赶走外敌”，有了这等表态，这等觉悟，统治者高兴了。

通常，惹祸之后，他们自己弹射跳伞了，留下一飞机无辜的乘客自我奋斗。他们一边四处逃命、躲藏，逃往热河、西安、防空洞等，一面进一步煽动人民挺身而出，流血牺牲、保护他们。他们不提家国、党国了，美言人民是国家主人。别做亡国奴，中国人民可杀不可辱！外国强盗比我怕，快来保护我吧，保我之江山，卫你们之家庭。否则，你们更难受。没有强大的政权，没有朝廷的“国”权，没有朝廷主权、党国党权和集体人权，哪来汝等臣民、党民之个人人权？

那些与占领军合作的，那些脱离我的临时政府的，那些什么自治政府、傀儡政府，一切企图与外国人勾结推翻我的（管你是组建民主政府，还是想借机改朝换代），都是汉奸、卖国贼。

看我回来怎么镇压他们。这些事情还在发生。看见了1999年东北那个女银行职员的下场了吗？强盗来了，不拼死抵抗，为了活命（也最大限度保证了银行利益），竟与其合作？这不是汉奸，不是卖国贼，是什么？必须开除公职，取消一切待遇。看来，为了其家国、党国，人民只有忠烈自尽，才算是良民，才算是不卖国。统治者高兴了，需要了，还能立贞洁牌坊，追认为烈士、党员，家属享受有关待遇。

海内外人士常常纳闷：近代以来，中国统治者为什么不仅不能主导或者跟随世界潮流，抢潮

头，反而总是闭关锁国，站在后面、岸边“两手抓”，拼命把人民往回拽，往长城内拖，在世界潮流面前别扭、被动、挨打？为什么总是如费正清教授总结的“外界冲击—内部回应”模式，无冲击则无回应，甚至退步，很少、很难主动前进？究竟是什么原因？关键不是什么“祖宗成法”、蒙昧无知、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信念等的延误，也不是传统文化、文化民族性等原因，而是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需要旧体制维护。这正如六四当局及其新权贵需要四项三讲去维护。历朝历代、历党历核心等统治当局一点也不愚昧无知、盲目，为了保守帝制帝位统治权益，他们极有“主义，主意”，精明透顶！一切堂而皇之的“卫道”、坚持什么主义、人民利益之说，不过是借口罢了。信息时代来了，新的机会来了。可是，由陆地长城而海洋长城，当今中国六四当局最紧迫的任务是修筑网络长城，防火墙。人言中国是睡狮。但是，不是中国人民贪睡不醒，而是被“两手抓”了，麻醉了，被各种长城捆绑了。只有中国睡狮睡万年，家国党国核心国才能传万代。中国前进的最大麻烦，在于统治当局常常精心构筑、蒙骗了各类统治长城，以此保障其“强权即真理”的强权统治之推行，最终使统治特权高于人权。

6、中国需要什么长城

近现代世界史几乎表明了这样一个秩序不容颠倒的定理：人民产生政府的都富裕，政府管制人民的都贫穷。人权强而国权强，不同地区的不同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遵循法治，人民做主，是制造富国、富人的强中手；民弱国必困，不同地区的不同形式的独裁专制政权都腐败猖獗，人民倒悬，是制造穷国、穷人的高手。

当今中国之官方舆论，历史书里，经济史里，地缘政治里，社会常识里，谈及西方的进步与领先，常常过分强调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甚至只谈工业革命，有意或无意中避谈、免谈了成功于西方的人权革命。每当比较中国落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达，我们总是归罪于政权腐败、外国侵略、科技落后、小农经济、国民素质低等，总是刻意不分析什么产生腐败、为什么被侵略等。

其实，历史的顺序是，1215年英国《大宪章》、欧洲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等人权革命在先，工业革命、科技革命随后。正是人权革命启发、促进、成全了以资金、土地、劳动力、管理、技术等资本能够按市场经济原则自由流动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当今发达国家，几乎都是其受益者。如日本、俄罗斯等脱亚入欧，走向民主。

从不同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得出了同一结论：“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随后却发展减缓，最后趋于停滞。”是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曲线在资源与增长的坐标图里成不成比例的“资源消耗无限增长，产出水平几无增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可以拿出很多原因，如与游牧民族融合、战乱、气候变化、江河泛滥、尚文轻理、陆地思维大于海洋战略、地缘政治、国际比较优势与劣势、“帝制晚期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展”等，但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世界范围内，当主权在民的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超越“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的封建主义官本制度时，当自由民主的人权文明超越独裁专制的特权文明，并成为第一生产力时，而中国统治当局仍然沉醉于构筑各类两手抓长城，仍然是独裁专制统治权益至上，而非主权在民的国家与人民利益至上，是经学，思想政治工作，党建，是巩固独裁专制统治至上。

一句话，当局、统治者“两手抓”而拒绝人权潮流是中国落后的病根。宋代迄今的中国落后之根源在于制度落后，在于中国的独裁专制政治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英国等的成功及其对人类的贡献不只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而在于它们自《大宪章》以来确立了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在于它开展了人民人权对王权特权的（资产阶级）人民民主革命。而与此同时，地球人类的科技进步、与经济繁荣与文明程度之所以在最近几百年里超过了过去的几千年，也在于自由民主日益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解放了人民人权。

中国自宋以降，全无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西天取经等的汉唐胸怀和雄风，并至少错过了三次世界性大机遇，反而在国内外人权文明潮流的冲击下更加保守，走向更加僵化的独裁

专制中央集权统治。最近的例证是，即使前苏联东欧等国家放弃一党独裁专制的社会主义、走向民主建国时，我们仍然大搞四项四个凡是、三讲，顽固坚持主权在党、在核心，固守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制度，把自由民主与人权视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是“乘改革开放飞进来的苍蝇”。

实际上，鸦片战争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洲、各国、各地、各民族、各行各业等的强弱、胜败、荣辱、兴盛衰败、前进后退、存亡之分，已经完全由对自由民主的人权价值观和独裁专制的特权价值观的取舍定乾坤了。此乃所谓世界大势，自由民主优于独裁专制，人权战胜特权。但是，历朝的中国独裁专制当权者，历来总是以暴力、暴政选择了背离民意，选择了与世界人权大潮逆行。

目前，当局“改革开放两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等，与1900年前满清朝廷的“中为体，西为用，洋务运动，器变道不变”如出一辙。从戊戌变法到1989年，再到2000年，跃过百年，从满清王朝到袁世凯，再到国民党、共产党，再回溯从2200多年前的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循环，中国统治者是不是一直在坚持不懈“两手抓，修筑长城”，仍在做千年承接？

我们可以歌颂长城的文物文化价值，但不能赞赏它为统治者出力的使用价值。顺着“修筑长城”的所谓御外轨迹，我们会同时同步发现丝绸之路没了，海上贸易被禁止了，民富民生民权没了，和绅等多了，汉唐雄风没了。这御外国防工事更是一条对内控制人民、剥夺自由、制造社会不平等的高压线。这条高压线与其他各种独裁专制手段联成歹毒的密集高压网，强盛了独裁专制却致使国家科技却步、文化停滞、经济滞后、社会凋敝，公益事业落后，贫困人口增加，因权力而非市场的富贵者增多。它们狼狈为奸，制造人权高压网兴盛而国耻丛生、民族遭殃的“墙中国”、“网中国”，官性儒学中国、经学中国、两个凡是中国、四项四个坚持四个凡是中国、三讲中国——被监禁的中国，流泪的中华民族。

新的中华长城是什么？是修缮、补修、扩建原有的长城吗？

绝对不是！

人民啊，不要相信独裁专制之长城，它从来没有在关键时刻抵挡住任何进攻，却使我们自

己身陷牢笼。不是独裁专制朝廷或政府之长城赶走了外敌入侵，是人民自己！不要相信救星，相信自己！不要期盼清官救星，不要期盼皇帝救星，不要期盼换皇帝式的期盼救星，属于自己人民的主权才是救星！
人权是新的中华长城！

7、中国少年长城观

一天，读小学的儿子与我谈起了秦始皇：“秦始皇很了不起，但他做了三件坏事，不能原谅。”

我看了他一眼，鼓励他继续讲下去。他看着远方，说：“一是烧光了许多好书，二是修了长城，三是为自己修了一个大墓。”

我心中暗惊暗喜，爷俩的想法如此相通，是他有进步，还是我如他般幼稚，写了这么一大堆关于“长城”的不是？

我问道：“为什么？”

他说：“烧书是毁灭文化，我们看不到那么多好书了。修长城太浪费，投入那么多人、钱，没起什么作用，反而耽误了别的事、别的发展，还搞得孟姜女没有丈夫，一些家庭妻离子散。

至于为自己修一个大墓，太不应该，有些活着的人还没上好日子呢。”

现在看起来，秦始皇“不能原谅的三件事”都跟巩固独裁专制统治制度，永做总代表等有

关。统一不久，他害怕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害怕文化多元化、社会多样化、信仰与指导思

想多极化等影响中央集权政治一元化、意识形态一元化，害怕人民与社会其他势力干政，害

怕一人一家一姓的皇权不能独统天下，于是他便两手抓，一手抓抓国道建设、统一度量衡、

经济建设、法制等同时，一手抓焚书坑儒、诛灭异己等，不惜毁灭中华文明。他为了排除

干扰，一心一意“搞统一，搞建设”，为的是坚持他那个时代的四项基本原则，使江山从始皇

帝开始，能够传到二世、三世，直至万世。

其实，以大陆统一为标志，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7年反右及其扩大化，就是200

0多年前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后焚书坑儒的同性质重复。当然，1949年以来连绵不

断的中国人民民主运动，也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同性质重复。

他大修长城（包括有形无形的长城）的一个首要考虑，也是为了便于“两手抓”，闭关锁国，

外面的不能进来干涉内政，里面的只能服服贴贴听使唤。他认为这两方面不仅能够从内外护

航独裁专制皇权及其江山万世不变姓不变“质”（其实他们最害怕变质，如从独裁专制制度变

到自由民主，从主权在王变到主权在民），还可美其名曰“御外安内，造福人民”，或者“皇

帝皇权强大了，族权强大了，党权强大了，能够海内外无他权出其左右而独裁专制权强大了”，

才能集体强大，国家强大，人民才有幸福可言，个人人权才有保障。

事实上，中国的皇权、党权、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权一直是全社会至高无上的主宰，但大

多数人民似乎很少有幸福可言。想想看，几千年的历史里，中国人民享受了几许太平盛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享有的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权，与经济增长、物质

财富增加、党政官本位大兴土木、当权者腐败敛财等同步增长了吗？

至于“修大墓”，秦始皇的一个明显意图是“活着”做皇帝，“死了”还能做皇帝，帘前做

皇帝，垂帘听政也能做皇帝，生死都是皇帝，帘前帘后都是皇帝，都能“两手抓”，永握独裁

专制权柄。

在此，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不是偏激者，我们不是谴责秦始皇，他有历史局限性和

相应的伟大性。在独裁专制统治文明称雄的时代，我们怎么能要求他等进入人权文明？但我

们不认为中国目前仍然需要独裁专制制度及其威权治国，而是认为仍然企图使秦制衣钵“万

世”者违背了历史潮流，当局应当悬崖勒马，还政于人民。中国领导人不要做秦始皇的孝子

贤孙，中国人民不需要秦制祸害万世。

儿子说起来轻松自如，面部表情不象长城的历史那样深邃，也远远朝气于秦制的朽没。我

还是有点诧异，有点窃喜，问他听谁说的，从哪里看来的。他说：“自己想的呗！”

那轻描淡写的语气，完全掩盖了这个话题的沉重性。

这是一名中国少年眼中的秦始皇“三件坏事”，这是一名当代中国人启蒙时期的长城价值观。

他不是完全不幼稚的，却是值得思考的。有理由相信，象他这样独立思考问题的中国少年还

有很多。有理由十分高兴，他们眼里已经不光是足球、网球、变形金刚、水浒传、武打片了、

电子游戏、卡拉OK、汉堡包和还珠格格、干脆面了。

我专门列举这个例子，不是吹儿子怎么样，而是说这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四个坚持，四

个凡是”、四项三讲城墙内的事情，而是说中国人民都在思考，都不那么拘泥于独裁专制的经
学了，不那么容易被“两手抓”抓住了。中国的少先队员，中国少儿们，与他们的大哥大姐
大学生一样，不满足于做唱诗班、颂经班了，开始对强调意识形态的五讲四美三热爱表示怀
疑，发出疑问了。

中国不会忘记，那热热闹闹的1989年中国民主浪潮里，有很多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们
也走上了街头，声援、慰问他们的大哥大姐和长辈。他们不光是看热闹，更不是瞎起哄，那
是人权的承先启后，他们是人权种子的种子。他们天性流淌着自由民主的人权血液。人权是
祖传的，从生命存在的开始，它就奋力前行。

历史是抹杀不了的，是独裁专制不了。虽然很多中国少年还没有成熟到懂得历史，但人类
天性使他们懂得珍视自由民主与平等，懂得人权这与生俱来的宝贝！

虽然很多中国孩子象我儿子一样，六四前后还在娘胎里，他们经历了六四，但还不知道六
四，我们目前也无法向下一代启齿。但历史注定要召唤他们，为前辈，为后人，为他人，也
为自己，伸张人性，推进人权。

七、从斜阳到正阳，中国传统并非独裁专制

1、人权文明是正阳文明

1989年6月4日5时25分，放眼北望，广场笼罩一片肃杀之中。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
民主小屋——帐篷。数不清的迷彩战车首尾相接，横成排，竖成行，连绵无际，阵势浩大。
它们一个个伸出粗长的枪管，一个个齐唰唰对准东南方向，加大马力把自由人逼向奴隶与狗
之自由通道。

我太累、太伤心了，陡然一屁股坐定了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台阶，享受这自由人的最后自
由。我能坐穿这个台阶吗？天空越来越亮，我却如仆跌万丈冰渊，没有猝死，却寒颤、惨遭
折磨于无尽的倾跌。似乎直到这一瞬间，我才真正、彻底意识到广场之民主盘踞难保，19

89年中国民主运动之败亡已成定局。不是我反应迟钝，是我太希望胜利！有几个人新泪冲

旧泪，咬紧下嘴唇从我身边走过。面对这无法挽救的败北，我陷入了绝望。

中国，你真的完了？

仰望苍天，不料一眼瞥见了正阳门。据北京市地方志记载，正阳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七年（1419

年），俗称“前门”，是北京内城正门。它高40.36米，曾经是北京城最高建筑。它屡遭战火

焚毁，最近一次是1900年，遭八国联军炮轰、炸毁。目前的正阳门是1906年重新修建的，

作为珍贵文化遗产，它于六四镇压前一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它巍峨挺拔，虽沧

桑深沉，却等级可辨。它顶部错彩镂金，色彩鲜艳，轻巧开放、自由，奢华靡丽，底座则单

一灰暗，沉重封闭，拙朴寡欲、寂寞禁锢。琉璃瓦等立于笨重灰砖，下部大面积灰暗衬托了

顶部的小面积雕梁画栋。

这恰如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时代的社会资源、财富等分配的金字塔，多数人的财富、自

由因为修筑长城而失去，并同时捍卫了少数人的富足、自由和特权，它充分反映了中国脊梁

们的人权悲哀和统治者的特权至尊。它已是活着的历史，见证那无视大众人权、等级森严的

官本位制度。

正阳门，可见世界乃有正阳、斜阳之分，可中国的正阳在哪里？神权与英雄时代，独裁

专制统治及其特权文明是社会正阳。它有过辉煌，我们感谢它，世界也感谢它，它创造了伟

大的中华文明，它使中国是世界唯一连续发展的四大文明古国成员。但是，这并不表明它仍

然更有能力、有资格继续推动中华文明创新、进步。

相反，帝制帝位，暮气沉沉。近代以来，它度过了日头正午，人类发展、完善人权的的天性与

正义日益使它夕阳西下、日薄西山，成为夕阳文明、斜阳文明。中国宋朝与1215年英国

《大宪章》诞生处于同一时间窗。自那以来，自由民主之人权文明已经开始挑战独裁专制之

特权文明。不幸的是，它在中国中断了，欧洲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发现新大陆等却发

扬了它。受惠于它国家与地区，因此以新的社会发动机——人权是第一生产力，开始了领跑

世界的旅程。独裁专制制度沦为老发动机，不改弦易辙的中国统治者，使老冠军——中国远

离了领跑地位。一些学徒，如日本、韩国、四小龙、四小虎等，很多我们自己的亲生骨肉或兄弟，如香港、澳门、台湾等，也因为改门学艺，抓住人权文明而进入了领跑大军。面对诸多失误与差距，历代中国统治者均不思过、反省，反而说什么特权高于人权是中国特色，符合国情。

秦制、独裁专制、中央集权统治，以及家国、党国、核心国等，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侮辱了中国的尊严，损害了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形象，数度使我们陷入内难与亡国亡族的边缘。中华民族的贫穷、困厄、落后、痛苦、灾难与屈辱等几乎都与它直接相关，与统治者拼命维护、固守它相关，与竞相成为其帝制帝位帝党帝王接班人的内乱、内斗相关。戊戌变法失败、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国共内战连绵、两岸对峙及其分别推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等比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日本侵略中国、北约轰炸驻外使馆等造成的灾难与损失要深重得多。

我们总是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独裁专制统治的实质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少数中国统治者打中国人民”，就是鲁迅先生所痛斥的“吃人，中国人吃中国人，少数中国统治者吃中国人民”。这些才是中国苦难的根源。

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等是国耻，屠杀共产党、拒绝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共内战、两岸分治、反右、六四镇压等更是国耻。一系列外来的不平等条约是国耻，一系列国内统治者剥夺人民人权的所谓制度、管理办法、条例等更是国耻，如国民党之“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戡乱动员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核心、军事戒严等。

国内统治者给予中华民族的磨难，实在比外敌入侵、骚扰多得多。人民人权不能忘了内敌，甚至为统治者唱赞歌，说出些什么“做自己人奴隶总比做外人奴隶好”，“殖民不好，治民好”。不，中国人民不做任何人的奴隶，不做外奴，也决不做奴隶。而

且，中国人权事业的主要敌人在国内，它们的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及其奉行着。统治者们常说

“守内虚外，家贼难防，防民甚于防寇，攘外必先安内，内紧外松，国内稳定是头等大事”

等，人民更应该说“防国内统治者甚于防寇，防皇帝等大小一把手甚于防寇，防党政官本位

甚于防犯罪集团，防独夫独党等失去监督的权力甚于防流氓、小偷等刑事犯罪，防官甚于防贼”。方法便是三权分离以制横，多党政治以监督，司法独立以公正，任期制、自由投票选举等以把关。

好在中国人民觉悟了，很多农村不是已经把“干部进村”称为“鬼子进村”了吗，很多工厂不是已经把“干部来了”称为“鬼子来了”吗。吃喝拿要，与抢有什么差别，不过以“干部、官、组织”名义进行而已，这名义不能保证其合法性，不能掩盖其抢的本质！共产主义理想激励、觉悟教育教化、三讲等已经不可能保住官本位的德行与操守了，它们与历史上的德治仁政同样是一纸空文。也许毛泽东时代及其文革能管用，但较之民主制度，它缺陷太多，而且易于走偏。我们必须以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任期制、自由投票选举、新闻自由等防范权力原罪，它们象一套精密的科学机械，可是使社会公共权力系统不以统治者而以打工仔身份存在，他们是接受人民委托权力、聘请的有任职期限，并且受到权力制横、监督的执政者。这些即是主权在民的人权文明，是当今世界的正阳文明。

近代以来，人权文明迄今自由民主的人权文明已经成为地球主流、取代独裁专制统治文明而成为第一生产力，是正阳，是社会进步的朝阳动力！它带动许多朝阳行业，形成朝阳政治、朝阳经济、朝阳文化等，使社会充满朝阳、活力、创造、创新！

可中国至今却仍然以党国代替家国而被这统治特权的斜阳文明阻隔！查古睹今，我们至今只能炫耀兵马俑、帝王陵墓、紫禁城、长城等特权文明，我们的社会财富至今还仍然更多地用于制造特权文明。

走上马路，看看四周的建筑，便一目了然！打开电视、翻开报刊、查阅报道，便一目了然！

什么都是官字号的更多、更好、更大、更快、更强、更自由，如官有企业（国有企业、党有企业）、官有资本、官商、官府、官房、官车、官服、官道、官场、官校、官席、官食、官样文章、官方消息、官哨、官人、官太太、官属（家属、秘书、身边工作的人）、官贪、官嫖官娼，乃至官殡仪馆、官葬等。

反之，凡是跟民沾边的，总要差一些，如民营企业、民间外交、民间资本、民房、民歌、民

谣、民俗、古民、平民、民妇、民女等，都是下脚料、受限制、遭管制一类的。甚至如果人民英雄、民族英雄等不符合固守家国党国统治利益的四项基本原则等要求、精神文明，他也只能啥也不是，或是狗熊。总之中国仍然是个统治者的社会，即官的社会，官本位至上，特权文明至上，民本位即资本位只能靠边站，人权文明是小老百姓文明，不能登朝廷、党国的官方大雅之堂！近代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致力于修筑各类长城，拉回斜阳，保守官本位制度。这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与人民幸福，如戊戌政变、恢复帝制、屠杀共产党、拒绝成立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反右、摧毁民主墙、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镇压、镇压法轮功等。六四镇压当局，你要把斜阳挽留多久？

今天，虽然正阳门历经了五百余年中华特权文明史，但它还是目睹了过去不曾想象得到的统治暴力。虽然改了朝、换了代，它也不会觉得开眼界，这朝那代根本没有什么新鲜，恰如它出生时的世界，都是500年前的陈谷子、烂芝麻，一脉相传了独裁专制统治制度。也许不同的是，1900年它因外辱而承受了近代军事暴力，1989年它因内辱而目睹了现代军事暴力。

百年前我们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发奋图强、立志抵外辱而自强。如今我们发现内辱才是中华民族自强的最大敌人。轰轰烈烈的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虽然席卷全国、引起全世界关注，却又一次在当局暴政下前功尽弃，重复了屈辱失败。

黎明的朦胧已经散尽，晨光初抹北京城。正阳门默默伫立于六四镇压后的第一抹阳光，它并不陌生！可是正阳门，中国哪里还有正阳！太阳，人民心中哪里还有太阳！古代，夸父累死于追逐太阳；今天，中国人民屈死于追逐民主正阳。当代世界，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主权在民，一党制、终身制、继承接班制、制一元化、一极化、独裁专制化、特权化等剥夺了多党制、任期制、选举制、多元化、多极化、多样化、自由民主化、人权化，人民人权尊严得不到保障，国际道义得不到维护，社会就没有正阳，就必然是斜阳当道，邪门洞开，邪气上升，斜劲乱窜，必然是任由黑箱政治的特权、腐败、邪恶等瘟神、牛鬼蛇神、妖魔们为所欲

为。

六四镇压固守了一党制、终身制、继承制之独裁专制统治文明之斜阳，打掉了中国之自

由民主之人民人权正阳，使中国又一次失去了发展机遇。我眼探长空，感慨千古，岂料又瞥

见了那亮顶暗身的正阳门。

几乎同时，我内心腾升怅惘、感慨与悲哀：正阳摔跤了。一代伟人邓小平，你推动中国改革

开放，实现古今未有之变局，乃弃斜阳、追正阳也，功莫大焉。但你怎么解释六四镇压，你

怎么解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我们最心爱的人是你，六四镇压，伤我们却

是最深。你一手爱我们，一手杀我们。你一手抓正阳、抓进步，一手你抓斜阳、抓退步。你

究竟是正阳，还是斜阳，我们怎么评价你？

你让人民失望了！伟人的一生也只有几个关键选择，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您功业彪炳，

本应愈老弥坚。这次你本只需顺水一推，便可利民利国利己利世界，但你逆水行舟，偏为国

家、民族涂抹了灾难，也为自己写下了耻辱。我们如何揭开这个迷团，如何以“伟人”载你

于青史！你糊涂！天下人难以理解你糊涂、你错误。可惜呀，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你为邓小

平时代留下了败笔。中华民族的伟人一定要有污点？

你谦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可你这次更象中国人民的老子，一言堂的老子，说一不二的

家阎老子！古语曰：从善如登，从恶是崩。您成于“右派”，现在败于打击右派。你功过自抵。

一代伟人竟于晚年遭污损，我等不可不替你扼腕痛惜。谁之错？汝之，历史之遗害之，社会

背景之？六四之祸国殃民，覆水难收。有人妄言毛泽东主席三七开，你等准备几开呢？人们

说毛主席是大救星，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说你象月亮，白天不亮晚上亮。独裁专制统

治的特征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直到亡朝亡国，这是规律。你已经不如第一代了，可为什么不

以自己的威信创立民主中国，反而培养什么第三代核心江三讲。

人权文明时代里，他等坚持独裁专制统治特权文明之斜阳，岂能立正阳！这是误国误民！什

么领导集体与核心，只要不实行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他等核心国权、党权、军

权一把抓，必然导致核心领导集体，造就皇帝与独裁者。

现在，没有一个核心、一个党有能力成为中国的救星和正阳，只有民主制度是正阳，只有和

平民主强中国！否则中国仍然陷入斜阳文明之悲剧。

如有学者认为，中共八大确定了正确路线，却仅于一年后遭否定、中断。一个关键原因便是

中央领导核心毛泽东对八大提出了批评。当时，由于中国是党国，共产党处于绝对领导地位，

毛泽东又处于全党绝对主导和支配地位，加上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是绝对集中制的工具，

故难以有人、也没有人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所以中共中央不仅“很自然地”接受了毛泽东的

批评意见，还全部采纳了他的新观点。当时的政治局、领导集体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让全

体党员、全国人民说话？

又如“三自一包”鼻祖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但核心的绝对力量曾使他顷刻间变得弱小无力。

1966年他曾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提审他的人抗议：“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会。”那宪法是他1954年呕心沥血半年而起草出台的国家神圣大法，当时完全是草纸一堆。

196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人们高喊“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把刘少奇“永

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冤案。当时无可奈何，

刘少奇把希望寄托于人民，寄托于人民为他做主，他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没有寄希

望于他的党、他的同志。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他在河南开封秘密关押地逝世，

满头白发长逾一尺。运送遗体的车太小，曾贵为国家主席的小腿不得不裸露于中原大地的寒

风。

八大的悲剧、共和国主席的悲剧，都是制度的悲剧。悲剧前的一个细节发人深省，正是刘少

奇于延安时期率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而据彭真回忆说，毛泽东多次在书记处会议

上提出“毛泽东思想不能提，咱们就提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大家不同意，说“中国革命走的

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几次开会讨论后，毛泽东才有条件地接受了。本文无意于此讨

论毛泽东否定八大、共和国主席之死等的历史究竟，而在于是什么原因使致了悲剧能够“顺

利发展”。还有很多其他悲剧，我们怎么能只怪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并把责任推到

所谓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本身也是受害者。

最大的责任者应当是一人独裁专制全党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全国的制度。这是祸害中国的根

源！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触动，反而以“四项基本原则宪法，两手抓”等强化了它

们。可只要帝制帝位帝人存在，谁能保证诸般悲剧不再重演？缺乏民主制度庇护，一国元首

况且自身不保，何况平民百姓乎。

邓小平三起三落复出后，代表人民于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

同志平反的决议》，恢复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

人之一的名誉”。可是，如果有民主制度保障，八大与共和国主席等的悲剧怎么能不被阻止！

我们必须从根本着手，建立民主制度。否则人人自危。多少生前不可一世的人，死后遭掘棺

鞭尸，甚至坟被挖，抛于荒野。

有一句老话，我痛恨罪孽，但决不痛恨犯罪者。卢梭还有一句名言：“不论怎样开明的

人只要当上君主，王位必然腐蚀尽他的开明，使他成为专制主。”也许，千错万错，错在帝制；

千罪万罪，错在帝位。

我们和解、我们宽容，但决不会放过罪孽渊薮的独裁专制制度，民主中国必须创立！

2、“全盘西化”是反污，人权天赋不是数典忘祖

多少中国青年伤亡于六四？他们青春年少，一定要做烈士？他们咎由自取，是西化的牺牲者，

可以教育教化一批人？老人一定要屠杀孩子，古老的中华文明一定要永远古老，永远不能走

出独裁专制统治模式，迈入近现代以来新生的主权在民之自由民主形态？永远不能终结统治

特权斜阳夕阳文明，挺举人权正阳文明？古老文明、老人政治等“老字号”一定是中国国情

与特色吗？不，独裁专制制度就是一人制、一姓制、家长制，就是一人制、一党制、党长制，

就是终身制，老人政治不过是它的一个特殊表现形态。

中国人民为什么不惜生命而执着于民主，尽管对民主的理解可能不同，但近代以来几乎每隔

10年一次的起义、斗争、变法、战争、和平非暴力游行等的反抗、反对对象却是相同的，

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反对朝廷、政府，反对家国、党国。

为什么？因为人民反对任何姓氏、任何政党、任何形式、任何名目、任何主义的独裁专制统

治，这就是不同时代、不同中国人对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共同理解。可是我们一直不成功，原因多种多样，有古老文明说、封建历史久远说、背弃理想变质说、遭人利用说、人民力量不够强大说、人民奴性意识强素质太低说、经济科技文化不发达说，等等。其实，千说万说归根到底只有一说，即无论胜利或是失败，我们民主革命了，却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没有民主制度，使对统治权力的拼命保守成为可能，使一些民主革命党、革命者变质了，走向了反民主，使权力原罪失去控制而腐败、污浊、败坏了社会。明里暗里推行帝制帝位帝王党政官本位特权至尊制度的不同统治者，总是如同人民一代接一代反对他们一样，他们也一姓接一姓、一党接一党、一代接一代，把以“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财产言论宗教信仰宗教出版舆论等自由”为特征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说成是西化、全盘西化。其实，民主制度与我们的四大发明作为人类共同财富而传遍全球、惠及各民族一样，他们都是科学的，一个是社会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他们没有姓氏，不单独属于发现者、发明者和率先使用者、实践者，它们属于人类。我们应该象尊重自然科学那样尊重社会科学，而不是谁占有统治地位、有一张嘴，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便可以在“焚书坑儒，清除精神污染，打击邪教”之后，瞎搅和、胡说，甚至糟蹋中华文明，反污中国无此传统。所谓东方、西方，其主体都是人。他们没有差别。而这种分法，一是习惯性说法，二是学者们为了对比，方便研究，三是统治者诓骗、麻木、分化人民，以所谓传统、特色、假爱国主义、假民族主义等一类的伎俩固守其帝制帝位帝王之独裁专制统治。

自然科学本身没有意义，它因为推进认知，改进人权而有意义。民主制度本身没有意义，它因为约束权力原罪，保障人权而有意义。它是保障人权的科学。科学没有姓氏，没有国界，民主也没有国别与国界。科学就是科学，民主就是民主，它们的最大存在价值是保障、改善人权。而人权就是人权，它天赋与人，存在与社会。没有专门的西方人权，也没有专门的东方人权；没有专门的欧美人权，也没有专门的亚洲人权，更没有什么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人权，是没有地域、种族、文化、政党等差别的人人平等的人权。

自然科学可以试验，社会科学也可以试验，民主制度虽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但它无疑是目前

保障人权、克服权力原罪、避免腐败与社会不公的最有成效、最值得普遍信赖的。放眼当今

世界，很多试验已经表明，民主国家几乎成了富裕、发达、繁荣、强大、人民幸福等的同义

词。当然，独裁专制制度一定时期、一些事情等也能同样达到民主制度那样的效果，乃至更

好，但它是牺牲人民人权为代价的。这种强大与国家、政府的首要职责保障人权是完全

背道而驰的，而且强于牺牲人权的政权最后必然崩溃于人权的缺乏与进步。

完全可以这样说，人权文明目前意味着人权不仅是一切社会生产力的努力方向，人权本身就

是第一生产力。

人家可以接受四大发明，也曾经对各王朝中华帝国创造的独裁专制统治官性特权文明以及民

性人权文明等赞赏不已，而我们可以接受牛顿定律、蒸汽机原理、核技术等，为什么便不能

从社会科学、社会形态方面融入人权文明时代呢？而且，除了民主奋斗了、却仍然收获老帝

制帝位上的新帝族、帝党、帝王时中国人民觉得自己是傻子，别的时候中国民主事业从来不

是聚集了一群“西化傻子”，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从来不是人权傻子，中华民族5000文明

史更不是人权文明空白史。

完全相反，虽然中国独裁专制统治历史相对长一些，甚至以家国、党国、核心国形式延续至

今，但中华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人权文明及其演绎、奋斗史。只不过它长期不处于政权与社

会主流地位而已，否则中华民族与文明怎么能够延续至今。而正因为不处于主流地位，才有

了前仆后继的奋斗。一旦民主中国创立，人民仍将前仆后继地捍卫。

我们更可以说，中华文明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推翻帝制帝位帝王而建立民主制度、

尊立人权文明于社会主流地位的奋斗史，它包括一些璀璨明珠，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

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党革命、抗日战争、共产党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

民主主义革命、右派猖狂进攻、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革命、改革开放第二次

洋务运动、民主墙、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法轮功、各变

质政权内的人民起义游行绝食盘踞等。

近代以来，“全盘西化，美化殖民主义，否定民族文化，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等，是中国独裁专制统治者们经常扣在人民头上的一项黑锅，是经常劈向中国人权事业的一抡大棒。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原理：中国人民从来不愿意做任何形式的奴隶，中国人民从来愿意自我做主；但他们泯灭了祖先的早已为世界各国人权事业共享的民主思想精髓。就自由、民主和人权思想而言，外国有的，中国都有，中国少的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治国实践。况且，科学与民主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精神，科学没有国界，那么自由也不分地域、民主不分种族、人权没有国界，它们因人性而共通，它们的旅行无需签证。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观也不是美国等所谓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中国人民争自由，夺民主，追求人权，是人类天性使然。

同时，统治者们还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理想恰恰来西方。凭什么把他们算成东方序列？按照他们“全盘西化”的分类法，中国早已全盘西化，只是如何西化、西化什么的问题。故而只说推进民主制度是全盘西化，是荒谬可笑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全盘西化，而在于保留国粹时西化些什么，如何吸收西方的先进文明，如何执行拿来主义，保留什么，如何配制，如何调制等。要独裁专制的，还是要自由民主的？正是历朝历代统治当局独尊帝制帝位，他们才是数典忘祖，篡改、湮没、忘掉了中华民族的人权文化与文明，他们也西化，只西化那些利于推行其帝制帝位统治的西化。为了固守帝制帝位，他们可以化任何化，把有的化没，把没有的化有。为此，他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就是统治者篡改了的儒学，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的，人权天赋是西方的，等等。

另外，与统治当局抵制“全盘西化”一样，我们也十分厌恶这个词组。以后对“全盘”一词宜慎用，什么事情都不是想“全盘”就全盘得了的。各种文化和民族均自有免疫力和吸取力的选择机能，自有扬长补短力、修正自身的进取进化力量。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等在中国的传授极为彻底、全面，但中国仍有自己的传统和特点，任何极左或极右都不曾使中国不是中国。民主化了，香港、澳门、台湾也都还是洋溢着一张张中国脸（按照统治者观念，

他们等已经大逆不道，全盘西化了，应当以武力迫使他们回归其所谓的官性中国传统）。况且，就是想全盘西化，也没那么容易。那繁荣与人权保障体系，决不是一天堆砌出来的。

“全盘西化”也是不可能的，是不会存在的。这一词及其提法本身也是不科学，甚至有害的。

所谓西方也在“东化”，向东方学习。被标签为“西方民主”的文化文明与制度，早已吸收了

中国等东方文化的人权精髓。“全盘西化”、“西欧中心论”等描述的发明者，不是中国人民，

也不是西方自己，而是统治当局自己搞抛出了这么一个利于“假民族主义、真独裁专制主义”

的词，是离间人民，是捧杀自由民主，是“两手抓”的一个阴险伎俩。

对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保障等给予“全盘西化”式的污蔑和打击，是统治者们妄图煽动、

愚弄人民，假借人民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热情，打击人民自己的人权事业。它表面被斥为洋奴

哲学，实则更服务于维护独裁专制统治的家奴哲学。统治者常常举起这面虚幻的旗帜，目的

在于使中国人民永远甘于遭秦制等独裁专制制度禁锢，使民主中国永是梦想。人民不要上当，

被“西化”字眼隐含的愚弄煽动起民族自尊等民族主义情绪，引发对西方、对民主事业的不

满，从而“抵制民主，为巩固中国独裁专制帝制、帝位出力”。

民主化就是人权保障化，就是清除国家“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化，就是实现国家“主

权在民”化，就是人权化。中华民族自身并不缺乏人权文化与文明，它缺乏的只是一个比独

裁专制统治制度更先进、更好、更科学、更文明的载体，这就是民主制度。

西化、西化，不是西化文化与思想，最根本的“西化”是首先确立人民主权立法的民主政治

制度，黄皮肤、黄河不会变，长江、北京不会位移，是要政权变色，由“主权在王，在党，

在个人”，西化为“主权在民”。这正如一个山村，被乌云覆盖是它，被阳光灿烂也是它，山

村不会变，所不同的是大自然和人间等生灵的感受有变化而已。

目前，中国大陆显然没有被“西化”。但按照一些观念，谁能妄言西化了的台湾、香港、澳门

等地，不是居住着中国人、中华民族人！殊不知，保持中国特色、坚持爱国主义，并不是盲

目排外或盲目自大，更不是阉割中国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等人权精神。

人权就是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与生俱来的权利，它们不因为地域、肤色、受教育程度

不同而不同。没有特别的白种人特色人权，也没有特别的黑种人和黄种人等不同肤色的特色

人权；没有欧洲、美洲等的特色人权，也没有亚洲的特色人权，更没有“有中国特色的人权”。

中国特色，不是一人一家族一党对全民全族全国全党之独裁专制特权，永远可以剥夺人民自

由民主之人权。

历史上，中国的独裁专制传统文化是要浓厚一些，但我们决不否认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中华

文明，乃至人类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时代不同了，我们分析它，总结它，想终结它，请它

退出国家机器和社会主流地位，不是说它一直不好，一直是混蛋，而是说现在仍然推行压制

自由、剥夺民主、藐视人权之独裁专制不好。这才是历史的态度。

象历史上的一些时期那样，把过去标准和环境下的事情，用今天的标准和环境把它清算个底

掉，或者捧上天，或者打进地狱，都是不可取、有害的，错误的。我们今天说自由民主的人

权文明是第一生产力，不是说过去的独裁专制特权文明就一定不好，相反，我们应该肯定它

的巨大贡献。如我们过去讨论过的“墙文化”等也是这样，世界各国都有墙文化，都曾经建

墙、城墙、长城、城堡、王室、皇宫、紫禁城和中南海等。不是说它们过去都不好，总有罪，

更不应该如文革那样毁掉它们，而是说现在仍然这样不好，固守它们更不好，这几近完全是

对人民的犯罪。

中央集权之独裁专制统治曾经适应社会需要而推进了人权，它的历史存在是合理的。但

是，如果说存在即合理，那么分析、扬弃存在也是合理的，那么对正在存在的存在做不该存

在的处理也是合理的，对正在希望存在的却尚未存在的做争取其存在的存在也是合理的，这

是合理即存在的永恒的新长征。人民人权正是一个永恒的新长征，它永远在否定过去中进步！

除了独裁专制特权利益既得者们以外，中国人民从来不反对融入世界民主大潮，从来不喜欢

前进的时候被从背后“两手抓”。因为中国人民从来不喜欢牢笼，不喜欢太上皇，不喜欢被委

派的官员，不喜欢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制占领自己喜欢的生活工作空间，不希望一人一党掌

管一切。中国人民从来希望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财产受到保护，希望亲自选举、

推举自己的领袖。

3、二元中华传统：官性与民性

（1）套一句鲁迅先生的说法：“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那么，凡外国所有的，中国也都有。在不赞同把社会民主化说成是全盘西化的同时，我们还要着重强调：中国文化并不缺乏民本与自由民主等人权思想。如世界范围内，独裁专制盛行前，西方有贵族民主，中国也有。不过时间短些罢了。西周时期，太史寮神学政治势力下降，卿士寮与其分享了军事、行政、司法、外事等权利。卿士是王室的最高政务官员，多由王室近族成员出任。他们之上，更有太师、太傅、太保等“三太”坐镇。这些职权主要由王族和王亲等王室成员出任，他们之上便是周王。三公地位高，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成员与常委，但他们更有权力。有时能驾驭周王，代行王权。如周召共和。即使是貌似新鲜的海洋文明，中国也不缺乏。譬如，山东长岛县大黑山岛上，曾经发现了早期人类文化遗址。时间比西安半坡遗址更久远，雅称“东半坡”。据考古发现，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亚欧大陆东南沿海的中国古越人“饭稻羹鱼”，已经敢于轻舟航海了。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木桨、舟船的模型，以及许多鲸鱼、鲨鱼的骨骼等，都表现出海洋文明的特征。出土的“有段石铳”，陆续在菲律宾、南洋群岛、波利尼西亚群岛和南美洲沿海等也有发现。国际考古学界认为，该石器结构复杂，不可能由不同地域各自独立发明，并认定它是由中国东南沿海传播至世界各地的。至于造船技术，则更是发达。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的。他的宝船长44丈，宽10余丈，舵杆逾11米，挂帆12张，造船与航海技术都达到了同时代的颠峰。坦普尔认为，“如果没有从中国引进船尾舵、指南针、多重桅杆等改进航海和导航的技术，欧洲绝不会有导致地理大发现的航行。这些均印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调查的结论：中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另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表明，“海洋是浩瀚的，但不是不可逾越，不可征服的”早已

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见，中华文化与文明，不仅仅是江河与内陆文明、农耕文明，它天然的是黄河、长江和海洋

共同哺育的结晶。它有着丰富的海洋因子与内涵，也创造了不可替代的舟船技术、海洋文化

与文明。后来，尤其是明清以来，是统治者自弃、自绝于海洋，把海洋视做固守其独裁专制

统治地位的天然长城，才断送了我们的海洋贸易、世界市场、入关与航空母舰。才使我们受

惠于海洋较少，受害、屈辱于其较多。

四大文明古国，举世公认。文化方面自不在话下。史学界更有学者已经提出：与西方一样，

从商周至战国，中国古代也存在一个城邦民主时期，它完成了从都邑国家到领土国家的演变。

先秦中国的华夏大地上，国民与治国者均不知道“专制君主”为何物。孔子本不独裁，儒学

本非专制，皆因独裁专制者们“两手抓”曲之。先秦儒学与君权没有联系，它只是后来被改

造为从选料、烧制、维持、上釉等几方面为君主极权统治服务。

新近的考古发现可以佐证我们的观点。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郭店村一座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原典儒学竹简。

他们没有宣扬“三纲五常”，只是有关于“夫妇、父子、君臣”六种角色的行为规范。这些角

色关系互有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后来“三纲”里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原典儒学的变异、异

化，完全是后来的独裁专制者们为巩固家天下而横加取舍、篡改、毁灭的糟粕。又如在《唐虞之道》里，它崇尚“禅让”，主张“公天下”，反对“家天下”，

透露、散发出原

始的民主性和人民性。

在《语丛》里，它说：“君臣，朋友其择者也”，“友，君臣之道也”，这明确宣扬了君臣之间

是一种可以双向选择的朋友关系，而不是绝对服从的独裁专制。而“忠”，则被解释为：恒称

国君之恶者为忠，与后来的盲目忠君、愚忠等截然相反。

它们表明先秦以前的原典儒学有许多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思想。独裁集权与专制暴政，无

疑与儒学的仁义道德、民本、中庸等背道而驰。污蔑儒学为独裁专制的思想基础，完全是对

儒学的假冒伪劣，是独裁专制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汗颜，是独裁专制肆意篡改原典儒学的恶果。

以至于鲁迅先生奉告中国青年：少读，或最好不读中国古书。

独裁贬抑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文化精华，专制化地歪曲、侮蔑、毁损儒学原典，不过是“两手抓”，为控制舆论，愚弄人民，巩固独裁基础，独尊独裁专制体制及独裁者、独裁思想罢了。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曾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指出：“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其矛头直接对准历代独裁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孔教，对准被帝王专制篡改、为护身符的儒学，而非真正的孔子和真正的儒学。

由此可见，共产党并非生来独裁，相反，他们中的许多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他们反对“帝王专制”，崇尚人民民主。

可惜，充满人民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人权精神的先秦儒学本来是人民的朋友，却长期被阉割成了独裁专制“两手抓”、“吃人民”的帮凶。直到本世纪末期，它才在被抛弃、埋废了2000多年后才被“考古、发掘”出来，这应该说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损失。不过，人权的正义与执著总算使人民的朋友又回来了。

民族本自由！文化本民主！人民本人权！创立“一个中国，民主中国”，虽被标签为“西化”，但这实质是人权化，是对世界文明的学习，更是对中华人权文明的复兴，是开发人权第一生产力！当今中国文化的最大任务，就是要复兴以自由民主、仁爱博爱、平等人权等以人文精神为特征的中国人权文化，并以此立国，以此兴国旺族强民。

中国需要复兴中华人权文化与文明！
世界需要中国复兴人权文化与文明！

（2）世人谈及当代中国，尤其是缺点与不足，往往以“中国传统如何如何，有这传统，这是祖传”等做开场白。其实，“中国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相对应的“中华文明”等门类多，内容广博。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混为一谈。只有区分细说，才能避免两眼一抹黑，既看见统治者独裁专制逞能，也看见人民自由民主奋斗。

历来，独裁专制制度下，中国传统、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均是二元传统、二元文化与二元文明。它们有官性与民性之分，有统治特权性与人民人权性之分，有所谓上层主流和下层边缘之分，有所谓精雅和世俗之分，有所谓主旋律和大众流行之分，有显形与隐性之分。

一是维护独裁专制统治的传统、传统文化与特权文明，这叫独裁专制官方意识形态，是所谓正统，是主流，是经学、显学，是中国统治者传统文化，是统治文化，是家奴文化，是特权文明。它们强调皇权官本位至上、中央集权统治、民主集中制，见诸于“官史”，官性足，并是“两手抓”的工具之一，扼杀科技和社会生活多元化等利于人民人权的事物。如“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诸子集成》）”，“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礼记·王制》）”等。

二是人民渴望行使自由民主权利的人民人权文化、人权文明，是所谓民间文化，是末流，是民学，是中国人民文化，是人权文化、人权文明。虽倍受压制与曲解，但它们流在人民血液里，世代相传，民性充裕、珍视人权。如“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等，则完全是民性中国传统文化。如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提倡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的教育与学术风气。这完全否定了意识形态泛政治化，并以其保持一致而禁锢天下的统治者虚妄。说简单点，也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文明应当分为：官性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特权文明和民性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人权文明，或者是官本位统治传统文化、文明和人本人权传统文化、文明，或简称为统治文化（或家奴文化）、统治文明和人权文化、人权文明。它们两者惯常是以对立、交叉、渗透、融合、重合、等面积重合等形态同时存在的。官性不只存在、活跃于官员、官方、官本位，民性也不只存在、活跃于民间、大众、社会边缘、非主流社会等。它们相互影响，互为表现。如民本、人权思想大面积存在于官界，奴性意识也广泛存在于全社会。尤其只得提出的是，独裁专制意识形态占据绝对主流地位的同时，民性人权文化与文明一直在挣扎、生存、掘进、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官性极度凶恶、民性极端困难的时候，既有焚书坑儒，也有夹墙传书，既有镇压，也有起义，既有六四，也还会有学运、工运、农运、法轮功、台湾民主化等民运。也是为什么有贪官，也有清官；有明君，也有昏君、暴君；有奴才奴家，有不合作者、隐士；有帮闲、帮凶、狗熊，也有壮士、英雄。也是为什么有右派、彭德怀、遇罗克、张志新等。也是为什么有太平天国、法轮功等。也是为什么有禁书。

在人民主权社会里，官性传统文化与和民性传统文化与文明等此两者大体一致，即主权

在民使人权文化就是统治文化（也许根本不存在“统治”一词了），即人民性就是“官性”或

党性（否则不可能当选为执政党，做官）的准星。民性是恒星，官性是卫星，围着民性转。

或者两者是同心圆的，党性面积只能尽可能大地向人民性靠拢，这是它不遭弹劾，谋求连选

连任的基本方法。当其“官性”或党性妄图与人民性不一致时，人民性通过民主法则，就可

以牵着不轨者的鼻子走，反民性、反人权者难以生存。

而在中国的独裁专制官本位社会里，统治者最大价值目标是固守家国、党国、核心国之统治

特权，不改姓、不变色，人民大众的最大价值目标是解放个性，伸展人权。此两者不是同心

圆，常常不一致，彼此对立。“官性”或党性凭借国家机器，总是力图收服、统治人民性，反

官性反党性者难以生存。虽然人民性总是倾向于自由民主、平等独立，但由于官性或党性因

凭借威力而占据主流地位、执政，人民性成为地下、民间、在野的。除非是人民主权立法的

国家，文化、文明等的官性与民性在大多数时候是不一致的，这正如它在当今中国的表现形

态：党性与人民性经常不一致，甚至处于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

这两个非同心圆，有五种状态，一是交叉重合，二是切边，沾点边，三是不交叉、无重合，

四是同心重合，五是同心等面积重合。当官性越顺应民性，它们交叉越多，直到重合、等面

积重合。如在克服人为和自然灾害与外敌时时，它们上下同心，一致对外，可以短暂地成为

同心圆。但是，较之二者常常处于的二元相异与背反状态，它们部分重合与等面积重合形成

的同心圆蜜月时期几乎只能是“时点”，它们太短暂了。前者。而且，即便处于该“时点”，

统治者也总是与人民貌合神离，面合心不合，各有异志，一个伸展人权，一个固守特权。另

一方面，无论谁主动，它们却常常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不交叉无重合、二元背反的对立状

态，如农民战争、起义，罢工、罢课，六四等时期。

看看当今中国，谁能说大众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

由于中国官方和中国人民在很多方面很少是一致的，统治地位使他们与大众长期处于冷

战和热战状态。中国长期是统治阶层特权国而非人权国，长期是官本位国而非资本位国，长

期是家奴文化即统治文化与文明的意识形态而非人权文化与文明占据社会主流，长期是家帝国党国而非民国，故而我们考虑问题，看待中国，正确把握中国，必须把二者分开。如果说中国官方独裁专制文化与文明是所谓“国粹”，那中国人民自由民主人权文化与文明则是“民粹”，创立民主中国的一大任务与标志便是使民粹上升为国粹。单纯的官性文化与文明，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明；单纯的民性文化与文明，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明。当今，我们的任务是要使民性文化与人权文明占上风，使它超过官性文化与特权文明，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主流。

（3）其实，有文字记述以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独裁专制官方意识形态“国粹”和人民自由民主人权文化“民粹”的两种传统文化与两种中华文明，即家奴文化和反家奴的人权文化，统治者特权文明与人民人权文明。虽然仍然处于独裁专制状态，但中国一直是民性刚烈对抗独官性党性王性的社会。不要忘记，中国是盛产家国党国皇帝的大国，也是反抗一人一姓一党独裁专制最烈的大国。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战争大国，也是人民上街大国、游行大国、示威大国、静坐大国、绝食大国、“动乱”大国、“暴乱”大国，当然也是人权被践踏、人民牺牲大国。可是，中国文化的人民性从未停止反抗，如表面平静的当今中国，反官府的武侠小说、电影、电视剧畅销中国，美国的西部牛仔片、抗暴大片等风行中国荧屏，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消遣文化现象，不说它们反映了人民在积蓄、准备，至少说明了中国人在欣赏、寄托。现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是如此，音乐、写作、研究、影视、出版、媒体、教育、考古、体育等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既有民本、自由民主、人权的人民文化与文明，“另类”一出，跟者甚众，也有占官方地位的独裁专制意识形态等。不过，后者已经改头换面，不再盗用儒家身份欺骗天下，换成了同样来自西方的、被断章取义篡改滥用了的马克思主义，好象马克思主义是东方的。当然，亚洲一些国家因自由民主的人权政治制度而发达繁荣的事实，也曾使某些人窃喜不已，认为是官性儒学取得了辉煌胜利，以为抓着根稻草，是对其独裁专制政治制度的一个声援。

中国六四当局甚至认为苏联与东欧巨变也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的确，正如披上英雄、法律等外衣者的失败并不表明英雄与法律的失败，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沙俄独裁专制统治、农奴制等帝国帝制帝位帝王的最终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它们退出历史舞台。

而且，也正如六四镇压及其当局能够维持至今，并不表明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是表明秦始皇、中央集权之秦制等帝制帝位帝王之独裁专制统治仍然延续，拼命拒绝退出历史舞台而让位于主权在民。

真可笑！官性儒学不是儒学本身，它更多的是统治者驾驭百官、禁锢天下的反经之“儒术”，是统治工具。官性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它更多的是“马术，或共产主义”，也是统治工具。儒术非儒学，马术非马学。民性儒学与民性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儒学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放眼世界，假冒儒家行独裁专制家天下已经绝迹了，这个官性“国粹”是没法炫耀了，先秦古典的民性儒学正在恢复它的人权价值，恢复“民粹”。但假冒马克思主义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之党国仍然有人固守，只不过也已经硕果仅存、为数有限了。它这当今世界稀罕之物，定然也是对官性国粹的继承和发展吧。

如今，这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之“国粹”，人家扔的差不多了，象国际社会的过街老鼠，也象大清王朝的辫子，是不是更是“国耻”？有趣的是，现在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假借马克思主义，大搞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帝制帝位的国家，虽然屈指可数，但至少亚洲的几个曾经在历史上深受官性儒学、家奴文化的影响。与其说这代表了官性儒学和假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使命，不如说这是独裁专制特权文明的最后余辉。

它制造了 六四镇压、驻外使馆被炸、镇压法轮功、层出不穷的社会灾难、政权腐败等，这是“国粹、国耻”的新杰作，它使中国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承受着沉重的人权压力。儒学不完全是经学，马克思主义不是独裁专制统治的工具。虽然我们决不否认经学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许多精华，但它们与糟粕共存，其最大的糟粕是排斥一切人民自由民主和

人权。此糟粕足以令它们退出历史舞台。

当今弃儒尊“马”，仍然是为了维护独裁专制政治体制。但是，如同儒家本不独裁专制，马克

思主义也不抛弃自由民主，它们都不会死亡，以后也不会被别有用心者把弄得近乎邪教了。

尽管儒学数千年来被整治、批臭、打倒无数次，独裁专制者“坑”它、烧它，打击它，自由

民主者也曾经“打倒”它，但民性、人权性使它仍然存活、中庸、发展。

家天下完蛋了，党天下也过时了，民性人权儒家不会死亡，它定然发展、复兴，也会胜利，

它定然益于人类。

有鉴于此，言及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近代世界格局与形势，常常闻听的“东西文化等冲突，

洲际等冲突，中外文化等冲突，文明的冲突”等，尤其“东西、中外”等字样就是不准确的。

它们混淆了“冲突”的主体与实质，好象各地各国各洲人民主动参与了其中。

但事实上，其实质不是人民彼此间的冲突，既不是民性间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彼此间的官方

或官性冲突。

它是家奴文化统治文化、文明与人权文化、文明的冲突，是人民自由民主与官性独裁专制间

的冲突，是主权在民与“主权在皇帝在官在党在个人”的冲突，是民性高于官性党性与官性

党性高于民性的冲突，是民性至上与“官性党性皇帝至上”的冲突，是民性政府与官性朝廷

间的冲突，是官员统治人民与人民选举官员的冲突，是权力分离制、多党制、任期制、独立

制、自由民主制、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与中央集权制、一党制、一人一把手制、终身制、

独裁专制制、一元化、一极化、极权化的冲突，是人民本位的人权与官本位特权间的冲突。

显然，除非被迫或遭受禁锢、愚弄，人民没有兴趣，更没有必要与独裁专制的官性党性王性

站在一方，主动加入什么“东西冲突，中外冲突”等。

我们也不要再轻言东西冲突、中外冲突、文明冲突了，它们就是官性党性与民性冲突，就是

官民冲突与党民冲突，就是独裁专制和自由民主冲突，就是特权至尊和人权天赋冲突。

我至今没有看到亨廷顿先生《文明的冲突》一书，但我看到了人类共同的人权文明和仍然不

退出历史舞台的独裁专制特权文明间的冲突。我们千万不要把独裁专制文明中的家奴文化统

治文化和人权文化混为一谈，不要把官性党性与民性混为一谈，不要把官府党府、统治衙门

与人民政府混为一谈。

4、民性中华文化与文明集萃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5000年中华人权文化与文明从来是世界瑰宝。

中华民族历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尚书·舜典》疏解“文明”曰：“经天维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古书又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天地之性，人为贵”。可见，人与人权，是文明的中心。人权天赋，改善与发展人权，是一切物质文明、文化文明、科技文明、精神文明、环境文明和制度文明等六大人类社会文明的中心。而且，人是作为大众的人，不是作为少数统治者的人。经天维地的是人，照临四方的是人，人也应该是接受一切福音、恩泽的主体之一。

默罕默德有句名言：“求知，哪怕远在中国。”显然，这不是求暴政残民之知，而是求仁爱、爱民、人性、人权、人类进步之知。国内外公认，五四民主运动是中国思想解放的狂飙，它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影响，更受中国人权爷爷、奶奶的影响和指导。这爷爷奶奶之上更有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

尽管我国古代汉语中没有现代意义的“民主”一词，在《尚书·多方》中，“民主”意味着“人民之主”或“人民的君主”，如“天惟时求民主，……汤……代夏作民主。”但是，并非西方独有，东方民族并不缺乏民主、人权基因，东方国家并不缺乏民主、人权思想。而且，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决不象独裁专制者们描述的那样，是独裁专制主义文化，至少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皇帝——秦始皇，是焚书坑儒的。

再往前的春秋战国之用兵争雄之时代，也没有一个诸侯国对它“感冒”，它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一个学派。孔子落魄，三千弟子也未有几个行大运。到汉代，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评论

学术思想的“六家要指”时，儒家仍然只是序列于阴阳家之后的六家之一而已。

秦“焚书坑儒”，儒家因为民本位思想浓重，曾经是遭“坑”的主要对象。它在治理国家中的走运，被推至正统地位，恰恰是在短命的独裁专制秦王朝灭亡后。刘邦等看到了以加强君主集权为使命的“法家”政治理论的局限性，认为马上取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才在汉代总结经验，“休生养息”。这种顺应民心的“民本”做法，逐渐传到了80年后的汉武帝那

里，儒学才被正式被“独尊儒术”的。正是儒学的人权性，才使得它流传久远，虽屡“坑”而不亡。才使得统治者可以在篡改中利用它，以官性儒学统治人民。中华文化与文明也并不注定以独裁专制见长，是独裁专制长期霸占了历史和历史主流地位，才造成了那样的直觉或者错觉。况且，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学等的综合。中国民主并非完全从西方引进。在中国推行民主，并非崇洋媚外。而且，恰恰相反，自由、民主与人权等以民为本的人文思想一直贯串于中华文明史，虽在国内始终不处于社会主流地位，但人性、人权的力量却使它“墙里开花墙外香”，并受到西方文明的钦羡。胡说中国人民不懂得自由民主，胡说中华文明没有人权基因，是独裁专制统治者对中华民族的最大侮辱。如儒学在本质上是人本学、人权学，不是独裁专制学说。举个例子来说，1988 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了一个宣言，它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 2500 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世界的智者劝告各权力集团和个人吸取孔子的什么智慧？是独裁专制的智慧吗？那真是天大笑话。当然是民本与民主人权智慧。这足见，当独裁专制者们拼命编写、夸大、无中生有孔子的独裁专制思想时，华夏以外已经让华夏以内人民羡慕的民主世界却仍然能从孔子的儒学里吸取非常丰富的民本、中庸等人权精神营养！民主思想、人权文化，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凡人，必是追求人权的实现、发展与完善。凡人存在的地方，必然存在民主意识；凡有社会，必然有渴望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群体与力量。人类的全部历史，其实就是独裁专制统治特权与自由民主之人民人权此消彼长的历史，就是人权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不只在地球的一部分土地上完成。一部奇伟、纷繁夺目的亚欧大陆东部的华夏大地的文明历史，在历史的爱克斯光透射下，在它林林总总的流派中，自由民主脉络分外鲜明，人民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人权文化与中国人权事业历久弥新，一脉相传。回首先古，在漫长的人与社会的发展、进化、完善历程中，中华文明浮出了《诗经》、《尚书》、《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国语》、《左传》、《孟子》、《墨子》等

元典文化，中国逐渐形成了儒家、道家和佛学等三大治世思想。如果包括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四大治世思想。但至少古代先秦时代以前的先贤诸子百家中，就已经萌发、存在了许多民主思想意识。很多精辟的民本和民主思想更是如滚滚洪流，枚不胜数，始终在中国社会中激荡着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权主义传统。它们是否见于官修典籍、官史，已经不重要了，却同时在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广为传送、推崇，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它们不仅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口头禅，并已经渗透、影响了西方民主，为其借用、发扬光大。到了近现代，各路民主言论更是层出不穷。直到现在，它们都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享用的人权精神财富。

（1）远古：

“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天地之性，人为贵”，即是生命为贵、人权为贵。帝尧“设立诽谤之木”，鼓励人民议论朝政。

《史记》记载了“许由箕山洗耳”的故事：尧欲以九州长相聘，许由坚辞不从，并以此为辱，觉得耳朵受到了污染。于是，他到山下颍水河畔清洗听脏了的双耳。其时，朋友巢父牵牛饮水，乃问其何故洗耳。听了许由的介绍，巢父忙牵牛朝上游走去，他不仅认为许由是沽名钓誉，还担心洗耳之喝水会玷污了河水和牛嘴。世人常论清高，此即是！它后来演化为“洗耳恭听”，告诫天下人要勇于、乐于、恭于、善于听取、吸纳不同意见，确保政令之道能符合人民利益。

“尧传舜，舜传禹”，尚贤为本，开创了帝位禅让的公天下制度。《尚书》云尧能平等共生，由近及远团结天下人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公元前2200年左右，禹放弃他看好的益，传帝位给其子启（据说受了很多贵族的鼓噪），公天下才被改写为私天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父传子，兄传弟”的一姓之家天下史（另一说是从夏桀传位其子开始）。

韩非子总结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力气。”其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郡县制”、中央集权委派官吏制（概不世袭）等，废除了同姓与异姓贵族参政议政

权。从此，虽然主张“德力并重”，有德者更容易赢得竞争，但“王者，兵强马壮者当为之”，

“以德兼人”彻底让位于“以力兼人，官位兼人，以权兼人，官高权大者兼下级、兼人”。“朕

即天下，朕即法律，天下皆奴”，一家之天下又变成了一人之天下，统治权集中为一人独揽。

皇权以下无人享有人权不受侵犯的权力。皇帝对一切臣民，哪怕是丞相、元帅，自己的同胞

手足、长辈宗亲等，都享有任意生杀予夺的权力。同时，上行下效，各级各部门各地各单位

各小组等大小一把手，都搞一言堂，争做小皇帝，土皇上。

二十世纪以来，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均以民主革命为己任，但他们也“两手抓”，先后通过宪

法确立了各自一党之“党天下”地位。

所以，党天下固然比家天下有进步，但它仍然是变体的独裁专制，是由一人一家一族对

全民全国全民族独裁专制“进步”为一人一党对全民全党全国全民族独裁专制，中国和人民

均未逃脱被独裁专制。不过，从中国政坛人物结构和社会现实来看，由于一些观念仍被人纠

缠不放，如“谁打江山谁坐，家属烈士后代最放心”等，致使党天下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家天

下气息。

也许，除了蒋介石——蒋经国以外，其唯一的进步是不能按嫡亲血缘传，而按党亲党缘

传。其实，只要有人民主权立法的民主制度做保证，只要遵循民主原则，就是前任的嫡亲血

缘又当选了，也不是坏事。如果因为是皇亲国舅，是干部子弟，如果借反腐败等名义，发文

件禁止他们从政、经商等，那也是践踏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权准则的。世袭“贵族，党贵”

固然不好，但剥夺后代自由奋斗的权力也不对。请注意，由于独裁专制制度天生反人权，它

总是走极端，不是这样反人权，就是那样反人权。它常常陷入保证此人权，必破坏彼人权的

矛盾泥潭。

中华文明提倡的治国安邦王道，其实亦远非不是六四镇压的那般霸道，而是“王、霸分明”：

“以力服人者霸，以德顺人者王，以德服人者王”，即要求统治者以仁爱之心待人，对人仁爱，

即是善待人之人权。

夏禹“政在养民”。

《周易·贲·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中，“观乎人文”

的主要含义应当是探索“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含义与使命，即人的生存、发展等客观要

求，即人权。它表明，治理国家，不仅要注意自然界变化，还要关心人，关心关于人的一切

事情，以人为中心。

《易》“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包含了重民治国思想。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

则久”，强调了“顺天应人”是社会变革（易）的必要条件。

《易》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强调只有接受大众舆论监督的君王、朝廷或政府，

才能得到大众舆论支持，才能得到人民拥护。

“生生谓之易”，生与易，均是天下最大的法则；而“一阴一阳之谓道”，它们互生又互

相制衡，即不同的事物（以和平或者战争形式）共处而又对立的发展，是天下发展的道理。

《易》曰：“圣人向明而治”。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之“明治”的由来。

《诗经·大雅·蒸民篇》：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较之夏商，周朝社会已经开始“重人事，轻鬼神”了，神性至尊逐步让位于人本位。中华民

族与文明开始了由神本位，走向人本位的历程。而且，人本位包括两个阶段，即从帝王本位

与官本位等统治特权的英雄时代，彻底走向人人平等、人权天赋的大众人权时代。

周朝创立，动摇了夏朝统治者“夏服天命”和殷商统治者“有命在天”的天命论。当时，政

治家们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康诰》）”的“奉天承运”之竞争（帝位竞争，

政治竞选）思想，提倡“德者，国之基也，人之性也，智之帅也”，要求以德配天，“敬德保

民”。

何谓“德”？

“行道有得于心之谓德。”

“敬德”内容包括“保民、慎罚、无逸、忠孝”等。他们强调“天命靡常”，殷人“惟不敬厥

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失去天下，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有德者，王天下，

则是符合政治伦理的。

这样，虽然周朝统治者仍然自称“天子”，因循了“君权神授”老路，但商周多少还是有一些

准改弦易辙，其命维新的新意。

“天”与“德”发生了关系，开始联袂主宰中国政治舞台。

君民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两者同属于国家。而且“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君为民设，“为人民服务，关心人民权益”是考核君王们德行的一项硬指标。

君国关系上，两者并不等同，而且国家高于君主，亡君并非亡国，“国破山河在”有了原始出处。家国完了，党国完了，核心国完了，所有私天下完了才好，中国仍在！人民要公天下！

这与后来的“朕即国家”有着本质不同，“朕们”更是刻意忘记了“民贵君轻，天下为公，公天下，人民天下”的真谛。

西周初年：天道和人道已经分化，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命题。天人相分，社会开始逐步从重神走向重人，即从神本走向人本，认为很多事情乃主宰于人，“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认为“已经提出了“国讲兴，听于民；国讲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思想。认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以“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提出了“民为神之主”主张，要求圣主先做人，做德行高的人，而后才能“致力于神”。同时，较之法治刑治之法治，“德治”的另一大进步意义在于主张“以德化天下”，推行“思想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理想觉悟教育”的教化。而且，虽然法治中有德治，德治中有法治，两者各有偏重，但“古典德治”与后世的“意识形态德治”是完全不同的。如“存天理，灭人欲”，最初恐怕也不是要求人民服从统治者之意识形态天理而隐灭自己的人欲。相反，是要求统治者以“天道、德道与人道至上”，灭其自己的个人欲望。民性“存天理，灭人欲”，蜕变为官性的，与当今“共产主义觉悟，马克思主义信仰”等要求只对大众、下级，不对党政官本位与上级是同理演变的。

可见，“内圣外王”也好，“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世界大同也好，都讲究“天人合德”，是以德，以人民，以德天下、德人民为基础的。

天道与君道不是合一的（有人将其合一理解为中国传统），天国（国家）与君国（家国、党国、核心国）不是合一的。他们中间有神道、德道与人道主之。

而且国家是主体，是永恒的，君国等朝廷政权是客体，是过客，有德主之、王之、执政之，
无德下台。有德道才能通往神道、人道，并由人民主之，才能成为执政者，以过客身份建立
一个家国党国政权。不能以暴力、强权镇压人民对德的检视与要求，要礼治、德治、仁治天
下。一旦统治者昏君无德，并以暴抗德、抗民，沦为暴君，则礼乱乐崩，天下近亡，改朝换
代不远矣。
这些虽无现代民主之精细，但它以“民为神之主”，将天道与君道分离，将国权与君国权（政
权、各届政府权）分离，则体现了主权在民精神，是符合民选原则的。
世界范围内，这应当是主权在民政治理念的鼻祖吧！
故而，如果君无德，当局无德，中央政权无德，人民游行、演讲、静坐、绝食、自焚、哗变、
倒戈、起义、暴动等造反，不是“犯上作乱”。没有和平民主制度渠道，人民上书、进言、上
访、评理、打官司等不起作用，更无质询、弹劾、罢免、审判、判刑、重新选举等可以切实
保障人民各项权利，总之，和平非暴力人权大进军无法遏制、改变（最初，大众往往只要求
当局开明一些）统治当局对人民发动的冷战与热战恐怖，人民只好诉诸准战争民主和战争民
主。
这是以德抗位，以人权天赋抗统治特权至尊。为此，人民可以革命、起义，推翻现无德政权。
性相近，习相远，人性相通，人权相通。这些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人权乃“生命
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相通的，与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人权乃人民保护
“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是相通的。
革命无罪，它不是“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更不是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它合乎“天
道、政道、人道、人权”，是“顺天应人，应人权”，是“替天行道”的义举与德举。它们成
为了举兵起事，革命造反，证明历代家天下、党天下改朝换代之正义性和合法性的理论根据。
然而，它的进步性已经终结于人类人权文明登台之际，中国的遗憾在于它已经落后了，但它
仍然存在。从它附着于家天下，到依附于党天下、核心天下，从家国到党国，从帝国到核心
国，是如出一辙的老路。不改弦易辙，别旧请新，创立民主中国，当局之为人民服务、共产
主义觉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决不是什么新鲜。

这些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解放。较之当代民主政治任期制、和平自由选举制等，它虽然相去甚远，没有彻底将主权在王改弦易辙为主权在民（当时也不可能），但它打破了一姓制（一党制的前身）、终身制，说明了改朝换代的合理合法性。

在中国，这些是神权政治开始走向人权政治的起点。

以后，一些德行不高的帝王，包括现在的核心、总代表，德行功力不够，便只好以精神与武力强制人民服从了。此乃暴政、暴君的根源，也是中国人民起义与规模位居世界之首的原因。

前者固守特权，后者伸张人权。遗憾的是，他们之角力，是革命成果遭篡夺，或者淹没于革命者变节为统治者之专制洪流，形成了二十六史之老路老辙轮回。

综观西周东周，秉承了文王武王之德政精神，它确是非常仁义有德行的。800年间，它自己没有屠杀人民，是一些诸侯国你争我夺，争霸天下，惹了不少事。它无为而治，孵化的春秋战国之文化、文明与精神，至今的中华民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瑰宝。

后人常说周朝宗室软弱、无能，不具君主风范，是值得商榷的。难道如以法家统一天下的秦始皇那样，残暴天下，焚书坑儒、大肆镇压等，才算是有作为的君主？不要忘记，周朝绵而长，周朝延续了800年，暴秦也暴亡，仅二世二十年而亡。周朝是值得怀念的，秦朝除了一统天下的功绩，还有什么？不是说统一不重要，不是说我们有资格苛求古人，而是说值此当今人权文明时代，“一个中国，民主中国”最重要。

不要光把眼睛定于秦皇、汉武、宋祖了。以后谈及帝王，除了称赞结束分裂、一统天下的有为作为，也要重视研究长期批上了“软弱、昏庸、无能、败家子”等帽子的皇帝。无为而治嘛，很多皇帝们隐身了、不独亮、无为的时期，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发展与科技发明创造正热火朝天的时期。他们的缺席，推出了更多的学者、发明家。查查孔子、李时珍、徐光启等生活于什么年代。有意或无意，皇权微弱时，人权光大了。这难道不正是他们无为或开明中的有为吗？后人能不因此研究、尊重他们，反而藐视、蔑视，乃至大骂他们吗？也许有的真是无能无为，有的是无为而有能。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偏颇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导向问题，是重视自由民主人权的，还是独裁专制的。谁能否定周朝以来，中国不存在实践无为

而治的帝王及其时期？至少，东周西周与唐宋、邓小平改革开放前期等是值得研究的。如宋

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教发达，文哲高深，科技创新多，有些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

这些极有可能孵化出近代资本主义，可惜它中断于元朝与明朝初期的独裁专制统治。这埋下

了中国落后，迄今不得摆脱独裁专制文明，走向自由民主之人权文明的祸根。

现在，如果中国各省（或分为几大区）不是听命于一个中央集权、一个领导集体的一个核心，

而是作为联邦制成员享有东周各诸侯国的自治自由，那中国繁荣无忧矣。

二十六史以来，为了一个中央集权之称霸天下，为了成全一个又一个的家天下、党天下、核

心天下，为了一个人的帝欲，中华民族失去了多少？秦朝一统之后，各家国与党国及其帝王

核心们轮番登场，华夏大地轮回流淌的是无尽苦水。

现在，我们坚决反对民主化了台湾、香港、澳门亡于大陆独裁专制当局，坚决反对任何势力

任何人称霸中国。

况且，毛泽东、邓小平任内都主张“台湾问题放一放”，便比江泽民霸王硬上弓强出许多（霸

王要有霸气、霸质，这方面他又比毛邓差了许多许多），有眼光。至少，整天威胁打台湾，势

必影响台湾出人才、出成果、出繁荣。

（1）春秋战国：

梁祝之恋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比孔子生活的时代还早100多年。它流传至今，表明

珍

视自由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专制社会里的一种精神寄托。

《尚书·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而无论多么开明的独裁专制统治，它最终必然

走向违逆民心，反人民。既有帝制帝位，则必无民制民位。

《古文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心即天心，表明民心的天下最大的

准则、法则。

《左传·襄公十年》：“众怒难犯，专欲难成”。

《左传》“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则提出了人人独立平等的思想。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其子。”显然，“家天下、党天下”乃私天下，不可能为“公天下，人民天下”也。他们只会

“独亲其亲，独子其子”。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实际上隐含着“党之患，在好为民师”内涵。如果皇帝、政党等不以民为本，反以自己为民之师，那么其己之患也不远了。从以人为本、维护人权的观念出发，儒学则直接否定了执政者、执政党、王朝等传万世的谬论。

《论语》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天选定你作为统治者，降大任于你，是要你按正确的方法勤勉治国。如果统治者和执政党不维护“四海”之人权，甚至践踏人权，作为“天禄”的执政地位就会永远失去。维护人权而非统治者的帝制帝位等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利益，才是被天、被人民选中执政的基础。

《论语》曰：“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悦。”

可见，要想使天下人投你的票而“归心”，首重乃“人民”。宽厚待人民，即保障人民人权，才会“得众”而受到众人、选民的支持。

《礼记·大学》：“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儒家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他们认为“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亲亲仁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提倡“仁

者爱人”。而无论什么人，人人平等，其本质就是“爱人”。

从象形文字的构字上看，“仁”字的结构表明：“二人成仁”，“仁”是对他人的关爱。“泛爱众，

而亲仁”推崇人人之间双向的博爱，更提倡亲近有德之人、有德之君等仁者，仁者相亲而更

“仁”。

因而，无论包括君王在内的一切人，人人应该“仁”，做到“爱人”、“立人”，人人应该“推

己及人”，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

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正”的确切含义是要求治国者必须遵

循“民本和人权”原则，并且“言必信，行必果”。

本民、贵民，仁爱、爱人、立人、立国，则必须重视“富民与民富”。儒家对此提出了“恒产”

观，亦即“富民，足民”的私有财产、私有制观。《孟子》认为，“制民之产”是推行仁政之

必要，使民有恒产，能够自立生活，则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稳定，天下太平。

它曰：“无

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因此，“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

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

紧接着，《孟子·梁惠王上》提出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方略：“五亩之宅，树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

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民之恒产应当是人民的私有财产，不可剥夺。民有恒产不是人人无产的假公有制，而是人

人私自拥有财产私产的真公有制。假公有制曾经让人动心，但太平天国的公有制和1949

年以后的公有制都使人民、国家吃尽了苦头。为什么，因为不以私有制（即人人拥有）为基

础的公有制、国家制、国有化，实际是真正的独有制：一王朝、一政权、一党、一人独有所

有制。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质是独资企业、独有企业，是党有企业、官有企业。它们属于人民

吗？实质上不完全是的，人民没有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分配权、发展权。属于社会吗？

也不完全是的。属于从总皇帝到大大小小的一把手的吗？有点像！更像一党独裁专制的党产、

私产！他们各自对管辖的范围、企业有绝对的支配权！又推及，中国是人民国家吗，是社会

主义公有制的人民拥有主权的国家吗？也不是的，中国是一党独裁专制把持的国家，是党国！

“大道归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是天下尽归“公”，是天下乃公天下，是天下归

所有天下人。此乃“大道”！而“公”则更不是“独”，公有不是独有。我们一定要认清公有

制掩盖下的独有制，一党独有制，领导集体独有制，领导核心独有制，一把手！一定要认清

“人大政协、一府两院”国体掩盖下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即帝制帝位帝人制！孔子提倡“士志于道”，“君子忧道不忧贫”，要求君子关爱“国家、民生”。

他认为天下人人

均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入世志向，力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则接着说：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些入世志向是以服务天下人民而非以“伺候君王天子”

为出发点的，充满了公民责任和权力意识。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对“中庸、克己复礼”等的官性解释，完全违背了儒学的原典含义。

实际上，儒学的礼乐文化是人文主义，它“立于礼，成于乐”，整合社会，以人文精神化成天

下。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包括帝王在内的天下人，只有先知礼，而后才能自立，

自立而后才能立人，是为人的本质——仁。

他的“礼”，不主要是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封建纲常之礼，不主要服务于维护统治秩序。

其核心内容是“仁，爱人，不忍人之心”，是“恭、宽、信、敏、惠”，是“能行无行于天下，

为仁矣。”

为此，它提倡“重义轻利”，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孔子说“政者正也”。政治，乃正治也。“正”之基本内涵是执政者敬民以“德、仁、礼、义、

信”等。这些虽然是对任何人的要求，但执政者，更应该“先仁后人，再人而仁治天下”，正

派正直无私（去其私，除了自我约束、内圣外王，更应该实践三权分离等民主政治制度约束）。

他要求统治者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遗憾的是，儒学治国思想缺乏原罪观念，孔子过于看重所谓“共产主义觉悟”一类的东

西了，而统治者往往自身并不具有人格力量，故难以行“安人之道”。孔子在世事，没有一个

君王重视他的儒学，他在怅惘失落中辞世。而法家虽然有性恶论，但其本质却是帮助君主“认

识臣下之恶，巩固独裁专制统治权力”的学说，与民主制度之制横皇权、一把手权等完全相

反。

荀子继续解释“礼”，认为“国之命在礼”。他将“礼”之伦理与政治规范结合为礼制，视其

为社会组织的根本大法。他说，“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

依此，他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如富国强兵，强本节用，王霸兼施，仁义之兵，用人

唯贤等。

“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作为人学大师大师，孔子等向君

王们进言的“礼治天下，德治天下，仁治天下”等，绝对不是只要求人民做顺民，而主要是

要求统治者应该具备“由仁而人，由人而仁”之进化，有“集体主义与为人民服务精神，共产主义觉悟”。

“克己复礼”将个体原则（包括帝王、核心等个人）与群体原则结合起来，其隐含的逻辑基

础是人人平等，上级与下级，不同职业者等均是人格平等、人权平等的。平等之人人参与社

会活动时，应该抱有宽容的精神，容他人，克己之独欲、私欲，克制自己，以礼待人，“礼”

就是约定俗成的双向的自由民主理念与制度，鼓励、给予并保护他人以自由言行的环境。

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诸多党国不分、党证不分、党企不分、官本位腐败、欺压民众、

政治思想教育教化、统一思想、保持一致、武装镇压、强行代表等，不就是以偷偷摸摸、和

强制等方式损害人民利益，对人民不仁不义，对人民非礼吗？可见，顺着孔子的思路，统治

者常常不仁，不是人，是毛泽东所言的牛鬼蛇神下界了。他们，如六四当局，要求“人民有

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精神和爱国主义觉悟”，自己却大行党政官本位腐败、享受。

难怪孔子临终前悲歌，“泰山坏乎，梁木摧乎，哲人萎乎”，他是凄凉悲怆离去的。而且直到

现在，由于拒不创立民主制度，无法克服权力原罪，致使无道昏君及其统治体系猖獗作恶，

“仁、礼、德”仍无保障，执政者们仍然不能让他安息、痛快。

孔子还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做让”。可见，如果天下人均不克己，不讲

“礼”，导致迷惘、无礼、动荡、大乱，过错首先在权柄握有者。独裁专制制度使党政官本位

握有无限权力，过错者当然是以皇帝为首的官员体系；人民主权立法的自由民主制度使人民

握有国家大权，过错者当然是人民。问题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真正掌握国家大权，

所以人民无法对其间的战乱、落后、腐败、衰退、国耻等负有责任。

另外，“仓廩实而知礼节”也不能单向理解为“人民温饱、小康了，便懂得尊重上级、效忠帝

制帝位帝王了，便有羞耻荣辱感，懂得精神文明了”，而还可以双向理解为“人民温饱、小康

了，便有个个人尊严、个性发展了，觉悟到可以要求上级、统治者‘克己复礼’，尊重其平等、

自由、民主等基本人权了”。

不难看出，对于“克己复礼”的立存、传世，它更首先是对君王执政理念及德行的要求。它

自上而下要求执政统治者自己首先克制欲望，“贵人贱己，先人后己”，尊重人民，恢复对人民的礼仪，善待民意民情，恪守责任，去“仁爱、爱人”，实施“礼治、德治”，而不是随心所欲、胡作非为，破坏社会仁爱、道德和人权。

这与目前的党政官本位要求人民讲文明的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本质差别，与上级要求下级的“三讲”也完全不同。它礼仪颠倒，被歪曲成了皇帝等上级只对下级臣民有权利而无责任义务，下级与人民只对上级有责任义务而无权利。这自下而上，只要求人民对官本位和政权的克己复礼含义，在文革期间遭到过猛烈批判。

对人民无礼，就是不尊重人权；不尊重人权，就是对人民无礼！实际上，当今中国的一切病症都是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践踏人权、对人民无礼造成的。如以强行代表、笔杆子戒言、枪杆子戒严、武装镇压等，推行一党制、核心制、家长制、终身制等。也许，对于当今中国来说，“统治者对人民有权无礼，而人民对统治者无权有礼”的礼仪颠倒、政治伦理错位，是一切腐败、落后等社会丑恶的病根。而祛除病根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克己复礼”，即克“主权在王，主权在党”之独裁专制私欲，复“主权在民”之礼，以人民主权立法，建立民主政体，组成民选政府，才能使人民受到“礼遇”。

可以说，“克己复礼”作为一个政治理念，靠权柄握有者自觉遵守，或者内部监督，靠他们的德行与觉悟，靠他们“多年受党的教育教化和培养，多年吃国家的俸禄”，是靠不住的。它应该有一个运作载体，即人民主权立法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多党政治、三权分离、司法独立等。这是保障全社会能够“克己复礼”的人类发明！

中国需要民性儒学的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伟大的重民治国思想，它是人民主权政治理念的先锋与进化阶梯。它欠缺的，它需要的只是一个实践载体：民主制度。

教育与学术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多么开放、博大的胸怀，充满了平等、自由、民主精神。他是抑郁、不得志，悲怆走完人生路的。他恐怕没有想到“独尊儒术，教育为政治服务；政治挂帅，坚持四项，‘三讲’讲政治”会串成为一把长长的剃刀，横立数千年，扫尽天下独立思考、自由言论与思想。

为提倡人人享有天赋平等的社会地位，儒家认为“圣人、王、民、普通人”俱皆同类同等。

《孟子》曰：“麒麟之与走兽，凤凰之与飞鸟，太山之与丘垤，河海之与行潦，类也。圣人之

与人，类也”（《公孙丑上》），“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舜，人也；我，亦人也”

（《离娄下》），“尧舜与人同类耳”（《离娄下》）。

它进一步鼓励天下人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这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如

出一辙，彻底否定了后来的什么“龙生天子，君权神授”一类的荒谬。而是昭示天下人，人

人享有平等的自由竞争机会。遵循人性，尊重人权，维护、保障、发展人权，人人均有机会

成为“尧舜、圣人、王”等“非普通人”。

对所谓“君臣关系”，它原本也不是什么“三纲五常”的“君为臣纲”的。它说：“君臣，朋

友其择者也”，“友，君臣之道也”，明确主张君臣之间是可以双向选择的朋友关系，不是绝对

服从的独裁专制。而“忠”的原则，是要求包括君王在内的人人，以“仁爱”精神为出发点，

对他人“尽心尽责”；其“忠”也不是“愚忠”，是“恒称国君之恶者为忠”，与盲目忠君、愚

忠等截然相反。

不仅反对愚忠，儒家还主张君王以贤能为师，求教学习于臣。《孟子·公孙丑下》曰：“将大

有为之君，必有所不招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

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而且提倡忠君爱国爱民，乃是忠“有德之君”。对昏君、暴君等“无道之君”，一则“天下有

道则见，无道则隐”，二则更要“死谏之”，乃至效法文王武王，“杀之，换之”。此乃爱国爱

民真谛也。

《孟子·告子下》还进一步阐释了君臣关系。它反对君王“姑舍汝所学而从我”，也反对臣一

味阿谀奉承、顺从君王的“妾妇之道”。它的恭敬观与贼臣观是：“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

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离娄上》）

它甚至说：“长君之过其罪小，逢君之过其罪大”。它反对君王利益与意愿为天下最高法则，

在社会里，在国家、人民里，臣下不应当以君王为最高原则，而应当以道义（人性、人权）

为最高原则，“格君心之非”，以利于人民、国家。对待官僚主义阶级的态度上，毛泽东做到了此点。

儒家推崇“禅让”，主张“公天下”，反对“家天下”。对皇帝、尊者、权威等身居独裁专制高

位者，它的道德思想体系还包括“以德抗位”，主张任何人，即使毫无政治、社会地位者，都

拥有主体独立性，可以以正义、道德等“抗上”，对抗独裁专制官本位金字塔等级序列的“高

位者”。可见，它认可的政权应当是充满民主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

儒学不仅中庸，还异常刚烈，疾恶如仇，它强调人人不分等级、职位，不分君王、民众，均

应该有平等、独立意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士可杀，不可辱”、“杀身成仁”

等体现了独立人格的大丈夫精神。我们却常常在痛斥西方个人自由时忘了这些，用“提倡集

体主义，排斥个人主义”的官方学说，走入了“假集体主义，成全独裁专制绝对个人主义”

的反人民反人权的陷阱。

儒家还反对“强凌弱，众暴寡”。这是现在民主政治“保护少数，保护弱者”是一致的。为了

全天下“保持一致”，独裁专制总代表常常使用的一个伎俩是“我代表人民枪决你”。其骗人

的逻辑思维是，他代表了大多数人（尽管未经选举证实），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便可

以合理合法任意处置少数人。他们气壮如牛：谎称“为了人民，我们有什么可怕的！”一旦他

想永远代表人民时，其他一切都只能是少数了。而且他想说谁是少数，谁便是少数，谁便可

以任其宰割。其实，民主与法律的真谛，不仅是要保护大多数人的权利，还要保证少数人的

权利。如此两方面，才是完整的民主。如果只有前一种，不仅不完整，而且法律可能沦为专

制法，社会可能沦为专制社会。

另外，关于“中庸”，可否大胆假设，它最早可能不是对人民的要求，更可能是对执政者统治

即治国理念的要求：予人民自由做主、民主，统治者少干涉、少强求，少武断、独断，以“中

庸、庸碌、无为”而治。儒学是治国的学问，“中庸”等的原典含义应当是对有志于治国者的

要求、劝说。如它继续要求执政者或统治者保持中庸，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这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是一致的，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要求全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人民服务；当官要为民做主”等也是一致的。

想一想，封建王朝也好，国民党执政也好，共产党执政也好，如果执政者的党政官本位体系遵守了这些“中庸”要求，中国上层社会还会贪污成风、堕落腐败吗？还能不民富国强（注意，不是国强民富，它们有本质差别）吗？当然，权力往往是不接受道德、“中庸”监督的，也往往不接受独裁专制制度下的纪检委、监察局、反贪局、举报等的监督，只有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才能确保“德治仁政”。

同时，中庸作为治国安邦理念，它还应该包含了“宽容，民主，集各派各党、各思想各主义之中而民主，即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政治制度思想。如孔子在《论语》中指出：“政者，正也”，即“为政之道在于‘正’”。对这“正”字，恐怕不只是小儿科地要求为官者“用人正派公道，做人正大光明，作风清正廉洁”，更不是提倡“不越轨，不出格，不做出头鸟，不做最肥猪，不做第一，不敢为天下先，不创新，而甘于保守”的中庸，而是从大处着眼，要求“国政、国体，政治，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等应该“正确，正中，中正，中间，中庸”。

作为统治者或治国者，目的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手段则也必须是以大多数人“为正，为中，为中正”，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而且必须“守中，守正（正也是中），守中正”，并努力使少数互不相容的极端者能够向大多数中间者靠拢、中和，以大多数为中而集中，从而实现“中庸”治国的大道。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创立民主中国，民选总统，主权在民，民主立法，代议制等，不正是“中庸治国”的杰出典范吗？可惜，儒学的中庸理论没有找到民主制度这个载体去实践、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单纯依靠了靠不住的“什么德治，共产主义觉悟，三讲”等，这不能说不是孔子的遗憾，儒学的遗憾，中华文明的遗憾，中国的遗憾。有人或友人反思中国文化的一大缺陷在于思想大于实践，科学与专利的发明与申报大于使用与实用等，不是没有道理的。

儒学不仅讲人文和仁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普及开

来，它推崇人人有坚持原则、维护人权尊严的道义责任。它更提倡“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要求仁者不仅应该爱人，还应该去恨不仁之人，爱恨全面了，是非明白了，才是仁者。

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理应有新的合理释义，即：对于民众，应该（用德

等）引导他们，鼓励、允许他们自由言行、选择，不可以强迫他们接受什么；或者说它是对

统治者的“德行要求”，要求“治民者应当先正自身，然后才能引导民众”。对于一个有“己

所不欲，勿施与人”等思想的老人，我们怎么能相信一些统治者对其的歪曲呢？那些歪曲是

独裁专制者们借用圣人力量统治人民的。

承接孔子，《孟子》是重民的。它认为，国家之宝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国家之强也不仅仅是综

合国力。它说国有三宝，曰土地、人民、政事。并说：“得天下之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

如果不“重民”，不“以民为宝贝”，《孟子·离娄下》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

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若寇仇”。它进一步在《尽心下》中倡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贵

民思想，并极力推崇为此而“克己复礼，舍生取义”。这些充分体现了它思想中重民的民本、

贵民与人权至上的人性精华。

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下》），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要求有志者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

他认为大丈夫应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

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滕文公下》），提倡“士

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

天下”（《尽心上》），实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心上》）。君王

当然应该是这样“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尽心上》）的身任天下的人权卫士大丈夫！而

不是做天下人民的窃贼！

而尽管重视人，珍视生命，推崇建功立业，但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表

明，与生命的本身价值相比，他们更看重生命的道德与人格等延伸价值。孟子还在《告子上》

中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这些充分体现了孔孟儒学的刚烈：为保全生命高

层次的仁义道德价值，而不惜牺牲生命本身。

显然，古往今来，在人民国家民族等的利益关头，为了权位、权势、权利等，很多独裁专制

者都是做不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孬种，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仁德，德治仁政”。他们

宁愿人民陷入苦难，国家民族陷入危难，宁愿冒着被推翻的危险，哪管“身后洪水滔天”，也

要“祖宗之法不可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丢”，也“器变道不变，两手抓。即一手抓变，一手

抓不变；一手抓进步，一手抓保守、落后”，也要过足皇帝瘾头，这样的人物仍然存在被称做

为“社会主义”的中国。

孔子非常看重统治者的“仁德”，如他在《论语》中对政权及各种权位、权力强调说：“知及

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

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他认为统治者即使涌才智夺得权位，但如果一

不用仁德去保持，二能用仁德去保持，却不能以负责任的态度去治理，三能用仁德去保持，

也能以负责任的态度去治理，但如果不能用礼仪差遣百姓，这个政权也算不上是完备，有亡

之危险。

可见，儒家并不认为“天道与君道是合一的”，两者中间有诸多“仁、德、礼、义、能”等要

求、条件、杠杆。它们分离了国权与君权，分离了国权与家国权、党国权、核心国权。它们

是变压器，能把缺乏它们的统治者变下台，把突出具备它们的变上台。而变压器的制动装置，

则掌握在人民手里，由民心、民意、民情等决定。这些突出了主权在民思想，与现代民主政

治之理念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缺乏实践工具，即没有建立一套和平民主制度推行和平改选，

沦为昏君暴君的统治当局又常常不仅不主动下台，反而无视“民为神之主”，企图将他一人一

姓、一党一核心的统治特权永远与天道国权连在一起。他们文过饰非，弄虚作假，愚弄天下，

制造精神恐怖，甚至武装镇压人民对其“无仁、无德、无礼、无义、无能”等的指责、抗议

与造反，妄图以恐怖统治维持其特权地位。民为神之主，以德抗位，革命无罪，人民只能揭

杆起义造反了，以战争民主选择新的执政者。这是中国二十六朝改朝换代史乃“稳定——战

乱轮回史”的根源。

那些“仁德、负责、礼仪”实际上是对权力以及掌权者的要求，也是试图监督、约束、制衡

权力。然而，它们更多的是说教、教育，由掌权者进行内部监督、约束与制衡。它们没有提

出权力分离监督，即权力外监督，与反对党监督，实际上是放任皇权等各级各地“一把手权”

等处于为所欲为的境地。二十六史，就是一部大奴隶史，一部腐败史，就是一部官本位特权

吃人民人权的“吃人史”。可见，历朝历代独裁专制制度与帝王及其各级各地的统治者大多是

令孔子与儒学失望的。它们吃人，吃人权，以六四镇压等各种方式吃人权，吃出了300多

个皇帝，各地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受考察、分封的大小一把手不计其数。这种逐级独裁专制的

金字塔式权力系统虽然指挥社会运行了数千年，也创造了辉煌的、伟大的文明，如四大发明、

长城、故宫、卫星上天等。可是，它是以禁锢自由、压抑民主、吃人权的方式堆出来的。并

最终文明难保，如四大发明难以进入社会实践。它创造文明的直接目的是保障统治利益，即

特权。所以，它创造文明的手段是吃人权，目的也是吃人权。这致使独裁专制社会的文明总

是远离它的创造者、脊梁、人民大众，远的如皇宫，近的如门票。当然，长城是人民修筑，

也由人民值班。这与近代以来的人权文明截然相反，它以主权在民为最高法则，以权力分离

等铲除特权，或者说吃掉特权，以人权为第一生产力创造文明，最终由人民人权享用。我们

不能否定以统治者特权吃人权创造出来的中华文明、人类文明，但关键是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了以人权吃特权创造文明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否定任何人、任何主义、任何政党、任何形式

的独裁专制制度，我们不能容忍它们继续以践踏人权的方式创造文明，它与真正解放人权是

背道而驰的。

德者王，为什么二十六史翻来倒去，仍然是吃人轮回史？为什么提倡“礼制礼治，仁政德治，

内圣外王”的儒教没有诞生几个明君，为什么共产主义觉悟没有教导出几个党政官本位系统

的共产主义战士，却发现人民大众的觉悟几乎都比他们高，至少没有他们那么贪婪、腐败？

因为孔子与儒学虽然提倡“仁德为本”，却没有确立确保统治者“仁德”的途径（政治实践制

度）。这也是他们的最大悲剧。“德政仁治，领导干部要有思想觉悟，国民党是反封建的政党，

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为人民服务，要三讲”的屡屡破产，在于他们过分依赖了“人之初，

性本善”这一适于情感实践而不适于政治及其权力实践的理念，在于没有确立道德以外的权

力制约、分权等政治机制。殊不知，权力有原罪。没有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思

想言论自由、舆论自由、信仰财产自由等监督、制衡、制约，各级各种的权力原罪会向恶魔

一样，总是在全社会率先把“德治仁政，道德约束，共产主义觉悟，三讲”等撕得粉碎，把

独裁专制制度的吃人本质暴露无遗。

看来，儒家的人权理想，不可能在任何独裁专制制度及其帝王身上实现零的突破了。救世主，

天子，救不了中国，他们最大的兴趣是采取一切独裁专制手段，维护独裁专制权益。与此相

反，不同时代里，人民则真正前仆后继了！洪秀全、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与文革等都抛

弃了儒学而希望建立一个有别于它的开明政治，可是独裁专制制度怂恿、保护了权力原罪，

落空了他们的理想。只有民主制度塑造的人权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

老庄学派于诸子百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地位。

它认为“人”是宇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二十五章》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

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庄子更是认为尽管人人不同，万物不同，但人人之间，人

与天地万物之间，均是无差别的平等，鼓励人人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

“平等至尊”的精神境界。

庄子进一步推崇，人人具有不羁绊于任何环境的独立自主之自由精神。他说：“至人神矣！大

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显然，这不单指自然界环

境，也指社会环境。他有《逍遥游》，认为有相对自由，也有绝对自由。但无论如何，自由的

是幸福的。相对的相对幸福，绝对的绝对幸福。

在繁荣稳定、富民强国方面，老庄学派还尊崇个人主义，反对所谓的集体主义，即反对牺牲

大多数个人的个人主义，而成全掌握了集体所有权的少数人的个人主义。如《列子·杨朱》

曰：“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老子有“无为而治”，庄子有“在宥天下”，与“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管得最少的政府是

最好的政府”相通。宥指放任自流。官无为，则人民自有为、必有为。自由的人民，按自由

民主原则构建自己的国家制度，委托自己的权力，选举自己的政府，必能照料好自己。从而

达到天下太平、发展，“无治而治”，“无为无不为”。否则，必“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秦制

以来，二十六史，任何统治者从来没有放松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治理，可是他们一代接

一代，按着老套路，迄今治理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了？不改弦易辙，革故鼎新，几近祸国殃

民矣。

庄子提倡“不以人灭天”，不仅仅是反对把自然界的的东西变成人为的东西，人作为自然的一部

分，他也反对任何对人性的泯灭，反对任何人任何政党自以为是，整天叫嚷“教育教化人民，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93年湖北郭店新出土了竹简《老子》，有章句“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也？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

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这些就是劝告政府、统治者少充当人父、人君，少干涉、

少教育教化、少管理、少插手，少加强什么精神文明、政治思想觉悟教育、树立共产主义新

风、三讲等，少对人民和天下事指手划脚。君主为首的官本位“无事、无为、好静、欲不欲”，

则大众自然“自富、自化、自正、自朴”。

而且，即使是圣人、圣党、宗教，也不是至高无上、坐享一切、自以为是的。与《孟子》的

“国有三宝”对应，《老子》认为统治者有三件宝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强调统治者

不得“先于天下享受”，要如宋代的“后天下之乐而乐”，要如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只有

解放了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

《老子·四十九章》还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也就是说，个人与政党没有什么独自设定的理想应该高于一切，他们不应该有个体理想，只能以人民利益与理想为理想，不应自上而下自称代表人民和自命为“三个代表”，而应该由于自下而上服从了人民而被人民选票钦定为人民代表。

后来汉代班固《汉书·鲍宣传》也有类似倡议：“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而宋人杨万里则断言：“国之命，如人之命。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人心。”总之，民心，而不是个人个党独裁专制野心为“宗旨和国之命”。

而“黄老学派”强调“清静无为”与“无为而治”，推崇“无为而无不为”，则充分传达了“自由民，可自治”或“自由，则民可自治”的治国信念。它们应当是当代“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祖师爷，也是毛泽东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信奉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先师。

庄子《齐物论》实际是反对主观之武断与偏见，反对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反对党同伐异一元化、一极化、一把手化，反对以一种价值否定另一种价值，反对一种人以“阶级斗争”等灭掉另一种人。他提倡大道同行，兼容并包，保留个性，才能有多多样性，多元化优于一元化。

否则，有可能沦为井底之蛙，把有限认识视做绝对真理，把自己不知的知识斥为迷信，把自己不喜欢的与妨碍自己的视做敌人，灭之而后快。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直接否定了一分为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独裁专制与极权政治理念，道明了第三条道路、中间派、反对派等的作用。这是否可以视做三权分离等三分形态民主政治架构的先祖理论？

古人还崇尚“三位一体，三足鼎立；一分为三，合三为一”，这是否为乃崇尚三权分离、两党政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等？显然，一位一体是不稳定的，除非它是金字塔结构。一体、一党、一极、一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集中制、一个核心等是靠不住的，二元化、两极世界、两党政治也不一定靠得住，允许第三条道路存在、发展，三角形最稳定。并且，继续允许新闻媒体成为第四力量，还允许未来的不知名的第五力量发展壮大，则更为稳定。反观民主集中制、一党制、核心制等，与金字塔、帝制何等神似。

他们互生互克，对立统一而存在，阐明了互相支撑（借势），互相倚靠（攻击），共同存在、发展的道理，与三权分离何等神似。

墨家认为安邦治国应当“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可为之？……为政若此，非过之务者也”，政府的组成应当采取“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的用人之道，等等。其“入世”、“救世”、“平民”意识，其“兼爱”、“非命”、“尚贤”、“非攻”等思想充满了反特权、反等级、反腐败、倡和平、贵平等、尚廉洁的人权精神。“平民”者，天下人民平等也。墨子也提出了“兼仁爱”的主张，如“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认为人人不仅应当伸张自己的天生平等权利，还应当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不分远近、亲疏，兼爱一切人。实际上，“兼仁爱”是当今“人权无国界，人道主义干涉”等国际关系与政治新原则的前辈，是地球村里“人权至上”的古典形态。

《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最为天下贵也”，突显了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主体地位。法家虽然是“主权在王”的法治，迥异于主权在民的法治，但其重民思想不可忽视。如“民怨国危”等。韩非子说“明主治吏不治民”，表明即使是王法而非民法，其要义也应当是“治理、控制、制衡、奖惩”掌握社会权力的官员，即王法应当治理官员而非人民大众。

管子明确主张以人为本，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曰：“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并把这富民强国的国策，四处推销。显然，这一国策包含了最基本的民主思想：包容，宽容。党不辞异己，故能强大，政权或国家不辞“异动势力”，由一切人民做主，故能强大。管子曰：“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这些人未必都信仰皇帝、皇族、执政党的理想与意识形态。他还在《管子·牧民篇》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

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他把这写归纳为“知予为之取”。这“予取”，实际上是现代民主政治“为人民服务，才能取得人民选票”的前身。

管子接着说：“欲为天下者必重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其民力。”可见，人民及其利益是国家与政权、政府的中心价值目标，民力是立国、强国的价值导向。人民利益好理解，可民力是什么？民力已经不是生活富裕、良好教育与身体强壮等能全部囊括了的，不是庄园奴隶主的炫耀：“诸位，看，我的奴隶多结实！”民力的本源是人性的人权诉求，是伸展人权。其基本力量是人权，是没有被奴化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是民主权利。鲁迅先生正是看到强壮的国人有迷惘、麻木的奴化表情，才发现躯干强壮没有用，精神上不被奴役、不是奴隶才最重要。他断然决定：弃医学文，为恢复中国人民人权精神而呐喊。管子用文字表述了“天下、国家、人民、民力”间的关系，2000多年后，他的知音或者后继者用数学公式阐释了他的思想。二战后，国内外专家提出了一个有关国力或民力的计算公式：

$$\text{国家力量} = (\text{可利用资源} + \text{人力}) \times \text{愿望}$$

这简单的方程式中，前两项参数是易于确定的，这“愿望”则难说了。不涉及、讨论国外愿望，它可包括政权或政府愿望和人民愿望两大块，它们共同组成国家愿望。如果是人民主权立法的人民政权下的民选政府，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基本是同心圆，而且是人民愿望占据主导地位的同圆心。政府愿望基本可以与人民保持一致，若有偏离，想与人民离心离德，则会遭到人民弹劾、罢免，以保持其人民性，继续发出同心力。

如果国家被一人一姓王朝式的独裁专制朝廷把持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治制度把持，那政府愿望与人民愿望则不能常常保持一致，这本该统一的国家愿望被分成了党性和人民性，此两者不能常常是同心圆。而且独裁专制者因握有政府和国家机器等强权，通常还会强迫人民改变愿望而顺从他们的愿望，即把个人个党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要求人民“忠君，或者‘跟党走’”。君王高于臣民，奴隶主高于奴隶，党性高于人民性，党“领导”或者牵引人民前进，这是独裁专制政权的一个显著特征。

“国家愿望”是乘数，当它越是同心圆，人民越是万众一心，越是同仇敌忾，其合力越大，数值越大，“积”也越大，国力则越强。当它不是同心圆，交叉很少，甚至是离心离德的互不交叉圆，背离圆或者反叛圆，那彼此间的“抗力”使数值减小，“积”也越小，国力则越弱。有道是，民心散了，国将不国。可见，国家要强大，每位公民务必对它拥有主权；国家要统一，国家的每个部分务必要对它拥有发言权、参政权、治理权。“一国两制”，只有一个中央政权，你被统一进来，你是属下，是我的一部分，你最大的权力是高度自治，不得参与中央级全局性的国家事务。这就是独裁专制理念阻碍了国家统一，它由于对人民蛮横而根本不懂得同心圆，它只知道四项四个凡是与党性高于人民性，党国高于人民主权立法国！朝韩会谈是深明大义的做法，是尊重人民与民族同心圆合力法则的典范，它已经使中国相形见拙了，这恰如明治维新成功、戊戌变法失败而使中国至今仍然相形见拙一样。它们已经或者即将对亚洲的局势产生深远影响。我们要落后到何时？

荀子甚至提出了“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屈原主张依法治国，力图打破王家皇家等世袭权贵（接班人）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倡导“举贤才而授能”，其《离骚》充满了“恒称其君之恶”的贤人政治思想。他在受楚怀王重用期间，制定“宪令”，改革内政，努力实践“美政”理想。商鞅变法曰：“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战国《吕氏春秋·孟春记·贵公》断言：“天下非为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可见，古人早就发出了主权在民的“公天下”呐喊：国家，不是一个独裁者、一个独裁专制政党拥有主权的国家，不是一人一姓一党的国家，国家是全体人民拥有主权的国家。即：国家是公天下，是民天下，不是私天下，不是党天下。

（2）秦汉晋：

中国治国安邦的政治文化讲究“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那么“争人”靠怎么去“争”？显然，靠“顺应民心，解放人权”去赢得民心，赢得人，争得人。“求同存异”宽容不同意见，允许反对派存在，提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人各有志，不必强求”，则充分肯定了个人主义，不赞成以强力改变个人的独立意志和人格

精神，是对独裁专制“逆我者亡”强迫症的彻底否定。

陈胜吴广代表被广大统治的人民，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天问，则彻底否定了“君

权神授”的荒诞。它藐视独裁专制权力，是普通人民对种姓种党制度的挑战，是中国人民对

出身论的早期质疑、驳斥与否定。

汉初，统治者悟出了“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是统治阶层对秦独裁专制暴政

的直接回击，也是对其后历朝历代统治们的千古警告。“清静无为，刑罚用稀；清徭薄赋，休

养生息；敬天畏民，节省安邦”，才是长治久安的良策。自称为秦人也好，英语中的C H I N

A也好，唐人和唐人街也好，新中国人也好，我们更多的是自称和被称为“汉人，汉族，汉

语”，这恐怕不是偶然的。“汉唐雄风”大概也是典出这里。

它们肯定与汉代的这些治国文化与理念有关，与自由环境下催生出来的国民素质、文化文明

程度、综合国力、通西域等开拓创新精神有关，是海内外世人景仰“汉”的结果。

因为“清静无为，休养生息，敬天畏民”等政权与治国文化中蕴涵的当代自由民主与人权意

识，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地球人类文明的又一期高峰。崇尚自由民主与人权是人类天性，人们

怎么能够忘怀这般宽怀、自由、进取的“汉文化，汉文明”，而惦念那狭隘、禁锢、保守、大

修长城、海禁、闭关锁国的明清？和本世纪以来分别被国民党和共产党大搞一党独裁专制的

“四项、五项、百项原则不能丢”的20世纪的中国？

针对危害天下的官本位腐败，汉文帝曾经出了一个策问晁错的题目：“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宁”。可见，不称职的官僚体系及其官僚者，历来是政权、国家、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

祸害。

汉代统治者以“畏民”等心态治国，而董仲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则提出：

“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

害民者，天夺之。”用现在的观点看，那“生、立、予、夺”的“天”，不是神仙，是民心民

意矣，是人民矣。

《汉书》提出了“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而统治者往往仅强调后者，隐藏了“官以

民为天，民是官的上帝”对其的约束。

刘向“存亡在于得人。”

曹操指责“独裁者之心者，不顾民众。”

贾谊“民为政本”，“民者，万物之本也。”

张角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是在宣告一个吞噬人权的王朝必须死，一个保障人权的“天”

正在来临。

钟相杨么之“等富贵，均贫富”等不是中国人民“不患寡患不均”的大平均思想，不是如通

常理解的中国人爱犯红眼病，而是人民对独裁专制下种种社会分配不公、无正义的抗议，官

本位的至高无上和肆意妄为，使社会失去了公平的天秤，人民信心动摇，是对社会不公的回

击。如计划经济和官本位下，社会生产、流通、消费，个人工作、收入、住房等不是依据自

由竞争原则“天定”，是由“人定”，这是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源头，故而人民普遍不认头，思

变。又如当今中国，人民很少为股票投资失利而怨天尤人反党反政府，因为他认头，他是在

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破产的，怪不得他人。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世外桃源，表达了为追求自由生活与独立人格，甚至不惜以避

世做反抗，而决不向独裁专制官本位妥协、屈服，正是这样的精神境界才使他及其作品受到

世代传诵。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不是如通常评价的那样反

映了中国人民的小农意识和消极避世，而是对独裁专制“帝力”的一种躲避，是无声嘲弄和

反抗。这与当代作家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和“见谁灭谁”、崔健“改革路上的新摇滚”

等有异曲同工之妙。

（3）唐：

柳宗元“吏为民役”。

“官清民自安”。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比“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差一点，但也充满了平等意识。

“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博爱、互爱意识，直接否认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和“没有共产党，便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代表；党性高于

人民性，忠于党，忠于一把手，党指挥枪”等的封建礼教。

“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人皆可为尧舜”等的平等意识，它们继续从根本上否定了皇帝、天子的至高无上的虚妄。

“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

唐太宗提出“为政之道，必须先存百姓”，他“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天下顺治在于民富，天下和静在于民乐”。

“人为万物之灵”。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人民警告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紧箍咒，但他们总是违背了。

晚唐杜牧的《阿房宫赋》“蜀山兀，阿房出”，不止于是关切自然，更是关怀人文、民生，这

是反对独裁专制特权高于自然权、人权的觉醒。

值得指出的是，在民本思想的引导下，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经过汉代“清静无为，

休养生息，敬天畏民”的治国实践，到了唐代，中国应该说是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民主政治实

践。有学者认为，唐代政治开放，是指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唐代政治走出了皇帝

孤家寡人政治的封闭圈，形成了君臣一体、朴素民主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这个民主式的开

明政治共有五个重要标志：

一、多元化权力机构的形成和完善，国家机构中的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军事、财政、

教育等机构日臻完善，权力的合理多元分配且又相互制约。

二、建立了君臣集体议政决策体系，军国大政一般均由宰相和百官集体讨论，皇帝在广泛听

取群臣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做最后决策。

三、封建法律的完备与司法制度的建立，部分限制了皇帝以权代法的现象，初步形成了以法

治天下的局面。

四、建立了广泛严密的监督机制，监督机构由御史台和谏官组成，同时还有比较广泛的社会

舆论监督。

五、广泛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士参政，从以夏治夷、以夷治夷到夷夏共治，充分体现了唐代多

民族封建国家政治的开放。

尤其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唐朝监察制度不仅仅自上而下运作，它还可以约束皇权。它已

经超出了中央集权金字塔权力架构，具有“分权制约”性质。这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

谏官众多，职责明确，谏诤内容广泛，而且言事谏诤权有切实的行使保障。二是门下省可以

封驳诏书，纠正皇帝违误。三是御史台官吏可以拒受诏书。专制社会里，最难监察的皇权、核心等大小一把手权。侵犯人权最烈、决策错误、社会危害最大的就是他们。管住皇权，管住皇帝、核心自己，便管住了最可怕可恶的权力滥用。现在，谁敢管江泽民？这些制度框架与治国方略，几乎就是现代民主的雏形。在这里，中国最开明的皇帝李世民功不可没，由于他的开明政治的指导，给了唐代容纳世界的海量，有了开创“丝绸之路”的胸怀，使“贞观之治”开创的繁荣局面延续了数百年，使中国文明享誉全世界，使处于封建独裁统治下的中世纪欧洲望尖莫及。这段时期，堪称经济发达、社会繁荣与开明民主政治的相互促进的正比例关系的典型代表，政治愈开明，形势愈稳定，经济愈发达，社会愈繁荣，政治愈开明；反之亦然。

（4） 宋：

为了变法，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众而不可欺者，民也。”苏轼“贪者，民之贼也。”包拯“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宋·程颐）这难道没有包含罗斯福总统的“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等四大自由？宋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仅是对每个人的要求，更是自民而官对官本位体系的要求，是对君王、总书记的要求。不过，在独裁专制官本位权力失去外部监督的体系里，仅靠自觉是出不了几个清官的，他们只要求人民做“四有”新人，而自己做“四旧”官员。北宋经济伦理思想家李觏以“礼”为其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核心。他认为求利行为应该“节以制度”，符合“礼”的规定。他尤其强调民利，主张公利，反对统治者以损天下之公，肥一己一家、一党以核心之私。当今所谓“国家、集体、个人”公私观于其是颠倒的，正是家党国核心国之极端功利主义。

（5） 明：

如果说唐代的开明政治得益于民本思想，得益于独裁皇帝的主动放权，开明独裁专制，成功

地实践了早期形态的“民主治国、强国”之路，那后世的华夏后裔则开始主动要求言论自由、个性解放等民主人权权益了。

中外学术界都认为，从现在后推，大约 400 年前，中国民主历程越过了民本的这个民主思想

的初级形式阶段，进入了具有近代自由与民主含义的阶段。亦即，在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已

经出现了追求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个性思潮。

这个时期，亦即是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末，虽然“两手抓”从未间断，但中国社会生活

仍充满变革、动荡。因为从明朝中叶开始，一些中国城市的商品经济逐渐繁荣，出现了资本

主义萌芽，市民阶层不断壮大，生活情趣多样化。同时，政治斗争尖锐，王朝鼎革带来社会

大动乱，使处于正统地位的封建理学出现危机，社会各阶层反对独裁专制的“异端”思想开

始抬头，士人们与民众的自觉自醒自主意识不断萌芽、成长。

这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精神状态等方面的时空碰撞与结合，为中国人的个性

的发展编织了温床。当然，虽然当时的情景有点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初期，却也只是初露

端倪，离早期资本主义启蒙思想还相去甚远。但是，这并不妨碍梁启超、胡适、周作人、侯

外庐等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文化和新文学的源头。

针对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训条，许多有识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开始了类似今天

的解放思想活动，即解专制束缚，回归人民之主权。

傅山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自秦以来，“尽天下之权而收之在上”，

“予夺之权，自民主之”，明确地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认为人民享有天下公权，人君应该

是天下公权的执行者，即是社会公仆。

唐甄宣称：“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即“凡为独裁专制统治者皆贼也”。他痛骂：“杀

人者众手，天子实为大手”。他主张用极刑处置他们。这些被标签为贼者，偷了谁，偷了什么？

他如何偷的？他贼胆偷天，公然偷了全体国民的天下，他的作案手段是凭借独裁专制之帝制

帝位。他以“公有制、国有、集体”等名义，把大众的国家、财产、思想、精神、信仰等窃

一人之朝廷，窃为一家族之朝代，窃为一己一族之家国，窃为一党之“党国”。

他把国家的权

力与利益，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凭着个人利害关系、个人善恶行为治理国家，分封天下。

人们失去思想与言论自由，全社会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头脑在思考、一套耳目喉

舌在说话，“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荣；天子辱之，则群趋以为耻”。

拿到现在来说，就是：一党宗旨要求全民马首是瞻，要求全体国民接受、共同奋斗；一党之

否定要求全体国民群起攻之，致其一臭万年。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提出“尊身立本”，表达了朦胧的人格平等意识，

汤显祖提倡“尊情抑理”，

冯梦龙呼唤以“情教”代替礼教，关切普通人的情感生活，

李贽抛出“童心”说，

公安“三袁”主张“性灵”，求新求变，

王夫之说：“饮食男女，人之大共也”，“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他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提出“天下之公欲即理”。

顾炎武提出了“和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

黄宗羲《原君》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它西方“主权在民”如出一辙。即人民拥有国家

主权，是国家主人，君王等统治者是客人，是人民选票推举、聘请来的权力被委托者。他认

为国家“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封建专制君主是“天下之大害”。

他还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封建君主为了自己淫乐，不惜荼毒天下肝脑，离散天下子女，

敲剥天下骨髓，是“寇仇”和“独夫”，是天下大害。

李贽还与何心隐等人大胆宣扬“欲”为人的自然本性，提出让“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获

其所愿”的主张，

而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以“吟风热血洗涤乾坤”的精神，“裁量人物，訾议国政”，追

求理学自新，大搞以自由讲学为形式的文化革新运动。他们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表明了国家非一家之天下，政府非一人之朝廷，社会非一种

意识形态而统之，而是国家姓人民、政府姓人民，社会姓人民，人民应该在国事里面享有的

民主、民权与民生的权利。

顾炎武《日知录》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可见，“国家与天下是两回事”，“国

家”是君主的，它可以改号变姓，“天下”则是天下人的，人民可以脱离家国、党国、核心国

等之制掣，自主救国、兴国、强国。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如传统说的那样“报

效朝廷，爱天子爱党爱国”，而是对先秦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继承发展，它扫除了“天下事乃君王一人之事”的“臣下”被动意识，初步表达了分享“天下”权或国权的人民主权意识，申明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的强烈参政意愿。

顾炎武还认为，君主中央集权，把一切权力操于其一人之手，可天下太大，他是管理不好的。假借吏治，又必至国弱民穷。为此，他提出了“限制皇权，扩大地方分权，恢复乡治制度，允许民间评论国事、政事。这些虽然不同于以三权分离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但与其与同一时间窗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理念的相通的。

此外，还有“执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察其疾苦（张居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法乃天下之公器”，要以“天下之法”取代“桎梏天下人之手足”的一家之法”等。明末流行“迎闯王，不纳粮”，其实质含义与英国“不出代议士不纳税”是相通的：前者是人权救星来了，不纳粮了；后者是不尊重自由民主等人权，没有自己人代表议政、参政，则不上税。

东林党人遭到“两手抓”镇压后，一批热血中国青年，如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等前仆后继，以“复社”为组织开展政治反抗运动。虽然“复社”的活动最终归于失败，但启迪了民主思想，使社会各界对独裁专制制度的黑暗腐朽有了新的痛恨与背离、抛弃感。这些时代的强音，是远古时代的华夏先民朴素的自由、民主等人权理念的自然延续，是尚在襁褓阶段的中国人权观。它们承认人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力图以个性自由，自然人性，打破义理人性和天理人性的束缚，减轻封建纲常伦理对人性的压制，最终导向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格和个人权力的近代思想意识，具有明显且强烈的解放思想的倾向。从人权发展的历史渊源来讲，这与五四时代、与近二十年来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是不谋而合，而是历史地人性地有谋而合，这也正是五四精神、邓小平及其时代的历史地位所在。

然而，物以载道，经济基础是民主理念、人权信仰的先驱。学者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人文精神，必须建立在发达的城市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而且要有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遗憾的是，这是明末清初的中国经济实力所无力提供的物质载体。另一方面还是由于当时的资本

主义力量弱小，市民阶层发育不成熟，社会没有出现类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规模的解放

思想的宣传运动。而当时的欧洲，“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国民财富”等思想已经被广为

倡导、实践。

民主大潮的演进是人类人权事业的主旋律，它是人类的福音。愿意的，民主领着走，不愿意

的，民主拖着走。近代以来，虽然各民主国家也是从独裁专制转换而来，且不论其原统治者

配合与否，但比较而言，中国的统治者总是显得十分被动。100多年前，与东方的日本对

比，同为儒家意识形态的东方帝制国家，满清皇室不如日本皇室，慈禧不如睦仁。二战后，

日本迈向民主制度，蒋介石国民党则坚决拒绝成立中国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与北方的前苏

联及俄罗斯对比，同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共不如苏共、俄共，江泽民等

一班人不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等。对顽固者、被动者、落伍者、不深明国家民族人

民大义者，历史却是无情的。

不主动加入、操作、主导人类潮流，就会被动陷入、打入、卷入、绞入、无能为力于潮流，

被吞噬于潮流。如今，日本皇室仍在，满清皇室则灰飞烟灭；日本经济发达，蒋介石国民党

政权则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中国注定要进步，“一个中国，民主中国”必然创立，谁能保证拦

路者不遭清除？近代以来，清朝等的“活鱼摔死了卖”，不主动必被动，长城内的革命使其土

崩瓦解，长城外的坚船利炮使国门洞开。在丧权辱国中，中国被迫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这是人民之错，还是独裁专制之错？至少，最终倒霉的是人民大众，最受羞辱的是民族、国家。

（6） 满清：

然而，独裁专制河满，自由民主河干，它们完全是此起彼伏的跷跷板对立关系。在民主受到

极端压制的情况下，中国封建独裁专制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出现了。它长达1

30年。在这之前、之中和之后，清王朝交替使用高压与笼络手段，全面推行专制政治，维

护统治的理学继续成为官方学术，修《四库全书》，禁止结社，大兴“文字狱”，使个性思潮

中的自由、民主、人本主义、人权等几近哑口默言。

可喜的是，时代的民主良心还在发展。尽管身处独裁专制空前的重重重压，中国社会的
人本精神还是在倔强地谋求生存。如问世于18世纪中叶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和《镜
花缘》等，以它们栩栩如生的锐笔，揭露了封建家法、独裁、礼教文明的虚伪与
堕落，塑造
出追求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新型人物形象。

著名学者颜元：“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
强；天下动，
则天下强。”

康熙“首务足民”。

清朝皇帝的起居室里曾有一幅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这
是一个皇帝应

该勤勉自励的觉悟。

天地会的“替天行道”，喊出了“行人权正义之道，拯救人民于独裁专制”的口
号。

洪秀全太平天国颁发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认为“天父上帝人人
共，何得君王

私自传”，宣传“天下多男子，尽使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
提倡建立“有

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和“天下
一家，共享

太平”太平天国，直接否定了帝制下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力，弘扬平等，深得人心。
尤其是后

期的《资政新篇》超越封建独裁专制观念，在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和对外关系
等方面提出

了按照资本主义模式反对封建制度、改造中国的系统著述和大胆设计，是中国历
史上最早提

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著作。虽然它没有得到实施，但仍不失为中国资本主义
的先驱，我

们能从近现代的中国民主革命和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征途中看到它作为铺路工
的影子。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

郑观应认为“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欲得民心，莫要于通
下情；欲通下

情，莫要于设议院”，他主张“君民共主”。他还说“十万富商，胜于有百万之
劲卒”，充分认

识到了“人民致富与资本主义”对国家发展的贡献，他还主张设立商部，把商
部立为六部

之首。

左宗棠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中
不如西，学西可

也”，务求实现“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

仁人志士针对专制制度下“政则有私无公，令则偏而无平。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隶；官吏如虎，而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继续探究中国民本与民主之出路。清代改良派人士认为，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对国富民强、社会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呼吁实行政治层面的变革。他们说，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民众“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坊不止”。早期维新派深刻指出当时中国病因所在：“中国致弱之因，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专制制度就是中国败弱的病根。改良主义者提出建立“通民情，参民政”的政治体制，反对“操政柄于一人”，要“兴民主，设议院，重民权”。梁启超干脆直言：“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派认为，封建独裁君主“奴其国，奴其民”，“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并用“物竞天择，最宜着存，万物莫不然”的天演公理，去说明民权必然战胜君权的“政体进化”，认为：“二十世纪之天地，盖断不容专制余威稍留其迹”，“君主专制，政弊而不能久存”，号召“去专制，行民主”，提倡“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号召民众以革命行动“扫除数千年种种专制之政体”，“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换回我生来之自由，以购来人人平等之自由”。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群体指出：民与君势不两立，自由与君主专制势不两立，“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与君主专制的完全相反，“一个重在平等精神，一个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鼓倡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和伦理民主，要求实现“经济上之财产独立”，“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学术上破除迷信，思想自由。陈独秀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先驱，更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他后来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是如此可爱可敬，编一部中国右派史）。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个人政治，而可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他们相信只有待包容自由、平等、独立自主观念为核心的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才能在现实政治经济生活中推

行“惟民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建设中国的民主国家。
从康有为的《大同书》“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
从蔡元培的《新年梦》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到共产党，莫不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宗旨的对封建独裁专制和外国强权专制的呐喊与战斗。
严复、梁启超等认为“立宪乃世界潮流，非此不能立国”，并提出“民权救国”论，指出“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

（7）孙中山与国民党民主革命：

孙中山倡导“平均地权”，提出“三民主义”，“主权在民”，“天下为公”，“三大主义皆本于民”，“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选集》第七十八页）。他还认为民权主义、共和制度与皇帝思想水火不容。他说：“共和国家成立以后，是用谁来做皇帝呢？是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民来做皇帝”，“四万万中国人都是中国的皇帝”。显然，他认为人民人人有帝权，惟独不能有皇帝。虽以“洪秀全第二”自称，但他指陈太平天国败亡的最大原因时说，“他们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针对国民党内不少人有做皇帝的欲望，他说：“大家若是有了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就要同志打同志，二来本国人便要打本国人。”
看看蒋介石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扶持嫡系，打击“杂牌”与异己，“日本人是皮肤病，共产党是心脏病”，剿灭共产党，拒绝成立中国民主联合政府；看看共产党内的历次政治斗争，看看1949年以来共产党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对中国人民自由民主事业的“反右、反右扩大化，镇压民主墙，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镇压”等等，看看对台湾民主的战争威胁，看看对中国大陆有增无退的独裁专制高压，都被孙中山先生不幸言中了：要当皇帝，就要打自己人；有皇帝，国民、自己人就要挨打。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民无权，便生帝权，或者曰“帝权吃人权”。大概是起于民国时期，中国人民把独裁专制者均归为“独夫民贼”一类。贼者，盗窃者也。

独夫盗窃了什么？盗窃谁的？他们盗窃了国家的人民主权，盗窃了人民的自由民主于人权。

邹容高唱《革命军》，陈天华悲歌《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

（8）共产党民主革命：

陈独秀认为让国人摆脱蒙昧，必“急起直追，当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他还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个人政治，而可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鉴于“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他号召：“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注意，独裁专制者常常故意把“个人主义之独立人格”混为自私自利，麻痹人民，使人民痛恨个人利益。

李大钊在1919年《劳动教育问题》中写到：“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D的颜色，都沿着D的轨辙。……D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代就是D的时代。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D的表现。”

毛泽东提出了“立党为公”论断。

中国共产党1947年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比后来的公社制，现在的联产承包制，都要进步许多。现在，中国农民不过是向独裁专制政权“租用土地，交租”罢了，根本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土地主人。这与工人等各行各业的公有制中人，不是各单位的主人一样，是廉价的打工者。这都是“公社化，归公，公有制，国有化，一切缴获与劳作要归公，越公越好”的后果。这是后话。

共产党人号召为人民服务，提倡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报告中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毛泽东主席还曾直截了当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加以总结，承继这一珍贵的遗产。”他还说：

“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使中国民族文化“利于推动中国的新文化”。

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在《论十大关系》里专门论述了“共产党万岁，民主党

也要万岁”的重要性，否则共产党就“无所忌惮”了。

对一些人说的“中国人素质低，搞不起民主”，毛泽东大唱“六亿神州尽舜尧”。

毛泽东赞叹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周恩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陈毅说“人民的选择是最公道的”，他曾经有一个罪名是“反对设立政治委员”。

邓小平自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一个皇帝般的独裁专制者是没有做“人民儿子”的境界

的。他还在1941年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强调：“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

主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

他尤其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

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一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其要

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9、12页）

邓小平还反复告戒全党，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

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衡量是非、善恶、美丑、功过、得失的根本依据；他警告说：“一个

革命的政党，就怕听不到群众的声音，最怕的是鸦雀无声”；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民主。

陈云的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充满了反独裁专制、提倡

自由民主、坚持真理的正义、诚实与正直。

共产党人相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5、中华民族复兴不是“西化”

总之，中华文化与文明具有鲜明民主性、人权性与人民至上性，它们在中国历史发展与

社会精神培育中起过重大积极作用。否则，中华民族不可能延续至今，中华文明不可能不间

断发展至今。这些积淀人权尊严的思想，厚重顿挫，激越坦荡，句句如大海之波澜。它们是

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一串串闪耀自由、民主和人权光芒的灿烂波峰。它们彩笔煌煌，因而代代

相连，辈辈相传。

虽然自从华夏大地上第一场奴隶起义、第一场农民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地播种自由民主图人权，却不料屡屡收获独裁专制，但是平等、自由、民主与人权从来扎根于中国，它们一直贯串于中华文明史，并受到西方文明的钦羡、借用。它们始终与独裁专制统治特权针尖对麦芒，奏响着人权当仁不让的主旋律。哲人思想、统治者休养生息等政策、维新变法、人民起义与革命、学潮等彼此串联成行，顶托起闪光耀眼的波峰群。在华夏大地的历史长廊里，它们虽然排斥于社会主流地位却流传久远，虽败尤荣，它们串起盏盏人权之明灯，组成自由民主之星汉，光芒四射，美妙绝伦。

时下，有舆论认为，一些名言警句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它们包含了封建社会中的“子民”和“圣贤”意识，主要服务于确保君主独裁专制统治权。并进一步认为，它们作为民主的对立面，缺乏民主价值体系的公民意识和个人权利观念，并无法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也就无法从其中开创出现代民主与法治。但是，相反，民本与民主的发展事实与思想历程，表明它们能在中国的民主与法治中大有作为。

《礼记·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一切事物、思想相互启发、承接、转换。众所周知，独裁专制与自由民主对立，特权与人权对立，但民本与民主则是相互提携、本质趋同、阶梯相连、顺次推进的。虽然我们不把民本与民主混为一团，但必须承认，民本和民主思想决不对立，它们同属于人类人权价值体系，不过是分属不同层次的亚人权价值分体系而已。

正如社会在不断进化，人权事业的民主思想也在变化，民本思想是民主的初级表现形式。不承认民本的民主意义，也不会产生现代的民主意义。它们斑驳相交，互为基础，互相启发，以千丝万缕相连相通，而且相成。它们在历史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分属不同的层次阶段，天然地具有彼此渗透、承接、演变和互补的关系。而且，在民主的精髓：“重民”这一点上，两者秉承一意，绝无歧义。所以，我们更倾向认为，民本与民主是人权价值观的天生孪生姊妹，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同卵双胞胎的一致性。

而且，即使是“万圣”儒学，尽管由于它实质上被统治者篡改、曲解、分离，被搞成只“独

尊儒学之统治面”，尽管它在大多数时间里被独裁专制政权“独尊儒术”而高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其民本和民主思想也是累见不鲜，甚至是重要组成部分。如公元前五世纪，当西方哲学家柏拉图还缠绵于奴隶制理想国时，孔子的学生们已经泼墨于“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理想图了。同时，儒家虽然讲究集体观念，主张个人对社会要有责任心，但这些并不妨碍它推崇个性解放、尊重个体与人权。如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就是强调个人的人格独立、意志独立。孔子的集体责任感建立在尊严个体权益的基础上，他并不赞成用被歪曲成为独裁专制利益的集体利益去湮没个体人权利益。他正是提倡社会通过个人个性的伸展、发展达到集体的强盛，即孔子的“集体共同前进”是“社会尊重个人，个人奋斗”的结果。

另一方面，儒家的一些民本与民主思想精髓，也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成为地球人类民主大河的主流思想。如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满了人性至上、人权至尊的力量，被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起草的《人权宣言》引用，它云：资产阶级的“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独有偶，费尔巴哈在《幸福论》中公开赞扬孔子的这句格言，称它的思想是一种“不离开人性的理性本性所赋予人的那种义务的道德律。”

毛泽东主席对中华文明史中民主思想的认同更是直接了当，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当然，他还接着说：“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显然，毛泽东主席认为，吸取、继承中国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亦即复兴先秦的原典儒学的自由民主等人权精华，是复兴中华文明，振兴中华，改善国民精神面貌、提高公民素质的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

人类历史的连续性，人类思想的连贯性，世界文明的融合性，不允许我们把民本思想排除在民主思想系列以外，不允许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缺乏民主文化。如果非说不可，那么，我们也承认，中国历来缺乏以三权分离为特征的民主政治实践，家天下、朝廷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中缺乏言论自由、竞选、代议制。除了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的三权分离实践与已经民主化了的台湾、香港、澳门，直到现在，中国大陆上仍然看不到权责利相互制衡而又共同带领国家前进的政治三驾马车，只有中央集权、一党制、终身制、一元化等的独轮车踉跄斜行。

古今中外，无私无利不独裁的伟人、思想家都不否认、掩盖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民主性。历来的独裁专制统治集团大放獠词，胡说什么中国没有民主思想与实践的传统，矢口认定民主不是人类共同财富，仅为西方独有，处心积虑否认中国一直生生不息的民本、民主、人权思想，这完全是“两手抓”的伎俩，是对中国文化的肆意歪曲，恶意篡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向西方输出了民主思想，怎么自己搞民主，反倒成了“全盘西化”？统治当局不顾事实，侮辱祖宗，毁损中华文明缺乏民主思想，完全是出于巩固独裁专制地位的需要。

切记，创立自由中国、民主中国、人权中国，不是说中国缺乏自由、民主、人权思想，而是要采用一个比独裁专制制度更科学的民主制度作为载体，来复兴、实现、保障中华民族的人权文化与文明。我们主张的西化，其实是一个人权至尊本质不变，而中国坐什么车，中国人穿什么服装的问题，其实只是一个外表西化、制度西化、中华文明之载体西化的问题，是坚持中华民族人权文化与文明不变，并以此对接世界其他国家率先发明、实践、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

这与无论坐进口车，还是坐国产车，与无论穿西装，还是穿长袍马褂、留长辫子，与无论受满清一人一姓家国统治，还是受国民党党国、共产党党国统治等一样，中国人仍然是中国人乃是一个道理，我们不曾因为曾经元朝化、明朝化、满清化、袁世凯化、国民党化、共产党化等而不是中国人。

况且人类发展至今，就车的内涵、创造、发明等而言，谁能分清“车”是哪个国家的，东方，还是西方的？正如“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是中国发明的，但它们正应用于世界各行各业、各地各国，谁现在能分清它们是哪个国家的？与这些自然科学属于全人类一样，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人文科学也同样毫无差别地属于人类。而且，自然科学是科学的，人文科学也是科学的，科学有发明、发现者、创造者之分，但它不分国界、种族、语言、地区、东方西方等，它没有姓氏，如果有，也只有一个，它姓人类。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早已应用、风行全世界，人家怎么不前缀中国以抵制、污蔑它们，说它们不符合本国传统、国情，而必须另行探索、摸黑，摸石头过河，创造、使用有本国特色的指南针、火药、印刷术。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不要以为前缀一个西方，便以为它不属于人类，不应该实践于中国、东方，以此煽起民族排外情绪，达到假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而真独裁专制主义统治的目的。说简单点，所谓西化、全盘西化，就是换制度，换独裁专制统治制度为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从特权文明走向人权文明；或者就是换动力，换破朽之官本位动力车，坐人本位、资本位、私有制动力之新车，换名为公有制、实为官有制、党有制等真正少数人的私有制为人民大众的私有制，换“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为主权在民动力，换统治特权至上推进型动力为人权至尊动力，换一党制、终身制为以“三权分离、多党制、司法独立”等为特征的民主制。如果偏说创立“一个中国，民主中国”是“全盘西化、西化”，那么这便是它的实质。这与统治者污蔑的全盘西化不是一个意思，与其“器变道不变，中为体、西为用，两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不能丢”等西化也是本质不同，他们认为不变的是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并以此对接世界其他国家的先进自然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管理技术等，最终确保统治者特权至尊不变，完成两手抓。说到底，独裁专制与自由民主是两种不同的载体、工具、方法。前者是特权至上推进型文明，一切因为特权而存在、发展、进步。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以威权为动力，推动社会进步、

人权保障，如毛泽东时代，二是确保特权至上。所以，它有扼杀生产力与进步的倾向，因为当进步、生产力危及特权及其统治地位时，统治者便扼杀它们，这是中国科技落后、闭关锁国、排斥市场经济、市场政治、“盲目”排外等的基本原因。后者是人权至上推进型文明，它确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它不会扼杀进步，这使人权本身既是目的，又是第一生产力。比较而言，近代以来，富于人权思想而短于其政治实践（毛泽东时代的文革实践也失败了），缺乏民主制度载体，是中国落后、人民贫穷、社会不公、腐败猖獗、国际形象受损的病根。这有本身缺乏的内因，更有统治者顽固拒绝的外因。

八、新中国新国歌

1、民族主权属于谁

（1）官方《中国革命史》教科书总结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是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可以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三个阶段。他还设计了中国革命两个步骤的战略目标：“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如关于第一个目标，中共中央 1949 年 1 月 19 日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着重指出：我们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令人敬佩的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于 1949 年结束了 100 年的外国统治，摆脱了横行中国 100 年的臭名昭著的治外法权，及赶走了自明代以来就不断骚扰、侵略中国的倭寇、浪人等的后代的日本军国侵略势力，完成了从外国侵略者手里夺回

民族主权的使命，实现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赢得了民族集体自由的中国人民，开始在不被殖民化的条件下追求现代化，这种自豪激发出了巨大的热情。但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全民的自由民主制度，共和国公民的个人自由征程迟
迟不得展开，甚或退步，以“人民当家做主”为特征的第二步开始出问题了：没有真正建立起“民主主义的社会”的中国，没有建立三权分离等人民主权的运作机制和政府，一切
大胆的、浪漫的革命实践，终究没有使中国人民超出存在了5000年之久的独裁专制制度。
一切名义下的伟大梦想，仿佛是延续5000年独裁专制的借口。革命者蜕变为掌权者，逐渐丧失“觉悟”和理想，不讲政治，不讲学习，不讲正气，带头把歪风邪气带到“民主革命阵营”
里。旧的权贵势力打倒了、赶走了，而新的掌权者成为社会新权贵，人民仍然受欺压、被糊弄。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我们都进行了，毛泽东还把文革的革命作为他一身两件大事之一，而且我们正处于邓小平理论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四项，两手抓，江三讲，三个代表”。但是，从规划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纲领上讲，人民自由民主在哪里？中国
人民的人权保障体系在哪里？
可见，我们只解决了第一对矛盾，如日本等侵略者早被赶走了，它是长城外面的矛盾。而第二对矛盾，即一人一姓一党的封建独裁专制和全体人民自由民主的矛盾，即特权和人权的矛盾，即长城内部的矛盾，则几乎完全没有解决。
外来的殖民统治和国内的治民统治如一丘之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都不是主权在民的人民自治。“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只对了一半，终结了殖民统治，没有成功防治治民统治。即
中国人民已经从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站了起来，另外一半则尚未实现，即中国人民没有从封建的一人一姓一党独裁专制下“站起来”，没有生活在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社会”里，还没有获得与生产力水平、人民愿望、国际潮流等外部环境相适应、匹配的人权，没有从国内形形色色的独裁专制主义如思想、言论、信仰、经济、政治等独裁专制的压迫下站起来。
的确，承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政坛领袖，几乎个个充溢人权精神。他

们几乎都是从辛亥革命、五四民主运动等的民族正气之歌中闯撞而出。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改革开放（江泽民的“三讲”是背道而驰的）等，令人倍感振奋。

而回顾五四民主运动，它的两个具体目标是“外争主权”（拒签巴黎对德和约）、“内除国贼”

（罢免曹、章、陆）。如果同心放大这两个具体的核心目标，它们的宽阔外围就是抵御外辱，

外争民族主权；内除独裁专制者们，内立人民主权。历史发展到今天，杰出人物已经自觉或

不自觉地用接力赛的形式，基本完成了“外争民族主权”的历史使命，当今自以为是的少数

独裁者们不过坐享其成而已。

然而，三座大山都是中国人民的太上皇，而且“清除对人民独裁专制的封建主义及其势

力，内立人民主权”似乎更难。人民主权是政治与治国的最深根基。对外斗争，革帝国主义

之命，实现民族主权回归以后，伟人们继续奋斗，还要对内斗争，革封建主义之命，不断革

命，实现人民主权回归。孙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毛泽东主席说“将

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实则是将人民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参见前述），邓小平总设计师说“发

展是硬道理”，他们实质是力图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

可见，终结殖民，民族主权回归是一回事，回归到谁手里则是另外一回事。它究竟应当真正

回归到谁手里？是回到“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的老路，是王朝循环，还是回到主权在

民的新路上？是新的统治者，还是人民自己？是它被少数独裁专制者们强行代表，骗取夺走，

还是由人民自由投票选举去委托？这条路究竟怎么走？

新中国不再是殖民。但她是治民的，还是民治的？是民有、民治、民享的，还是任何政党、

任何个人独有、独治、独享的？

（2）二战结束、最终赶走日本侵略者后，代表中间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

中的紧急呼吁》，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口号，要求“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

1945年底，由各方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削弱个人权力、国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

制、整编军队”等民主原则，通过了“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草原则和军

事问题”等五项协议。

而甚至在抗日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打败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全

国范围内把民族战争引向人民胜利的结局。

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它也在1945年5月召开了六大，中心议题之一却是“维护国民

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

独裁专制是行不通的，国民党“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要消灭共产党”的结局是自己滚出

中国大陆。人民应该高兴了吧，应该成立“民主政府”了吧？不然，太早了。现在在中国大

陆，我们看到了“在全国范围内把民族战争引向人民胜利的结局”的辉煌吗？没有！

是的，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是的，我们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我们没有“成立联合政

府”和“民主政府”，没有“把民族战争引向人民胜利”，而是看到了新的“一党专政”，一切

都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当权者说了算。

果然，1949年后中国大陆政权也“如蒋介石国民党炮制”，也是“逐步成了民主革命的保

守派，反对异己，日益醉心于保持独裁权利。结党营私，入党便于营私，它从人民利益是它

的全部，蜕变为一个自身利益与人民主权等权利对立的利益集团。甚至蜕变为反人民、反其

他一切政党，只捍卫自己权利的寡头政治独裁者”。

这些无一不秉承了前任蒋介石国民党之党国特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沦落为“四项基本原则

立宪国”，“四个凡是国”。如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公共权力公有制使一切

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嬗变为私有权力，并且不受监督；社会公共生产资料因被少数人掌

握而被闲置，不能发挥最大价值；社会思想因“反精神污染”而只能独尊一种，国民精神被

更加奴化；社会公共财产因为被少数人掌握分配权而实际上嬗变为私有财产；一切人的一切

因为“被计划，被分配”而失去了自我自由做主的权力，因为“计划与分配”的执行人不是

民选，“计划与分配”的标准却由执行者自我搞定；等等。总之，人民失却了选择权力，就只

能把自己的一切被迫留给自己不知根底的人去“计划、分配，或赏赐、裁决”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话没错。可是，新中国就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吗：就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就是一个人、一个党派，可以

“一劳永逸”，无需人民自由投票选举而长期执政，而永远是“三个代表，总代表”？就是人

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下岗，而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体系主宰社会一切吗？

不是的！无产阶级仅仅只是工农阶级，不包括其他人民吗？不是的，钱财不是人民最重要的

资产，人民不以钱财多寡分高低，一切人的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权，才是人民最重要的资

产。在独裁专制制度里，一切人因为不享有主权在民而是无人权天赋资产者，而都是无产阶

级。

革命不是摧毁或剥夺财富，消灭富人，它是消灭特权，保障人权，使人权作为第一生产力，

并使每个人能够充分发挥、创新、享有自己的生产力，以此生产更多的财富、富人、和社会

繁荣与进步，成为享有人权资产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平均物质财富，更不是国有化、公

有化等名义下的“没收私人资本归公”而实质为“个党有，一把手有”、党政官本位所有。

的确，“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但如果人民民主革命成功，却不建立主权在民而仍

旧是“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的独裁专制政权，尽管给它封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名称，那么，革命的根本问题，则根本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任何人、任何所谓阶级一旦掌

握了政权而且无有任期限制、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等制横、监督，他们便失去了

原来的（阶级）属性，权力原罪必定腐蚀他们，使他们沦为人民的统治者，并由此走向反人

民、反自由民主、反人权。

故而无论是满清家国等一人一姓独裁专制之封建政权，还是国民党党国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之

所谓资产阶级共和国政权，还是共产党党国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之所谓无产阶级政权，最后都

走向统治阶级政权，他们都在夺取政权后从人民大救星变成了人民统治者。

也许，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人类最古老、最基本，而且是唯一最清晰的阶级划分。

（3）应该讲，民主的一个定义就是无有统治。追求民主就是反统治、铲除统治，创立

“一个中国，民主中国”就是中国不遭统治，不遭任何内外统治，而是主权在民之民主中国！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近现代民主革命等一旦收获了家国、党国，一旦国家不姓人民或因
为划分阶级而不姓全体人民，即不是主权在民而是“在王、在党、在个人”，政权必然因为领导人走向统治者地位而成为统治人民的政权，即反人民的反动政权。他们虽然扛着国泰民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等崇高理想，但政权及其统治者之最高使命便不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
保守家国不改姓、党国不换党、核心终身制而不换人，其次才是保障人权。当局因此把综合国力、社会资源与其最大工作精力投入其最重要工作——两手抓，如江泽民
时代的“稳定第一，改革、开放、发展、人权其次”。这便产生了独裁专制制度社会最古老的
社会基本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对立，即统治特权与人民人权的对立。这对矛盾主宰了社会焦点、热点及其进程，其情况与结果基本分为两种，一是统治者逐步放弃特权，人民人权进步，最终完成君主立宪或者议会制多党民主，二是当局先开明专制、后
暴政专制，重复上演统治恐怖、统治腐败等社会病症由轻渐重的轮回，最后各类病症综合爆发、气数将尽，直到改朝换代，进入新的王朝循环。
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都不曾开创出第一种社会局面，均于王朝循环中重复打滚，了无新意
（世纪末的台湾民主化除外），这使“一个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从来没有一个总体国家最高
目标与国家利益至上，甚至由于皇帝、核心至尊而没有政权利益至上，一些设想，如满清洋
务运动、孙中山《建国方略》、共产党四个现代化、邓小平改革开放三步走战略等至今仍然不
得实现，它们均被帝制帝位帝王核心之家国、党国的统治利益所阻隔。这是中华民族与文明、中国的悲哀，国家、民族与人民利益从来不是第一位、至高无上，它
们从来屈从于家国、党国之统治利益，乃至帝王、领袖、核心之个人利益。这是“一个中国，
民主中国”不得创立、中华民族与文明灾难深重的根源。
可见，近代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应该是从国外强权势力回归民族主权（包括领土主权、经济
主权、国家主权等），到从国内强人强党等独裁专制势力回归人民主权（包括人民立法、民选
政府、人民执法，自由言论、信仰等）的完整过程。就顺序而言，可以先完成民族主权回归，
也可以先完成人民主权，也可以交替竞相完成。
但实际上，御外、救亡图存的民族主权回归（尤其是取得胜利以后）常常淹没了人民主权回

归，并常常有强人强党以假民族主义掩盖其潜行的真独裁专制主义，而国民党成立、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1957年右派、文革、民主墙、改革开放、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等都是中国人民追求人民主权回归的自发行动，也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线。

2、四大不行，四项更糟：新三讲好

（1）1949年人民高歌《东方红》入主北京城，是为了享受反右、大跃进、后期文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镇压等东方黑吗？是为了继续受从紫禁城到中海等皇城皇权统治而不是真正当家作主吗？固守统治权益使《东方红》逐渐东方黑了。它不再响彻四方，不再遨游银河系。以国家、集体、人民、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主义理想等名义剥夺了大多数人的个人财产、言论、出版、结社、信仰、宗教等自由，反而谎以所谓国有、公有、集体所有等实现了少数统治者的党有、官有、私有制，使人民彻底沦为依附于党组织、官本位的奴隶，亦即是统治者及其国家机器奴隶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应当是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民主与人权，不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否则它不配称做社会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中国实践社会主义，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等制度设计有重大缺陷。最大缺陷在于人民自由民主如同天上月亮那样可望却不可操作、实践、实现，这使全民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嬗变成为少数官僚主义阶级、党政官本位统治权力体系的社会主义党有制、官有制、私有制。本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使命是“其命维新”的，它是信仰、理想、目的，曾经更是毛泽东、共产党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工具。他们认为，继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中国应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直到1956年，毛泽东主席还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指出：“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看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是“发展民主的革命”。他的出发

点完全体现了“人民大救星”特点，因为他及同事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民主”超越了五四时期的民主内涵，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且虽然“文革”未有定论，但它可能是老人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理想”的一次浪漫的超常规行动。当时，毛主席还认为官僚主义阶级即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都存在，并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官本位主义统治）”，是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同它们的斗争的长期的，文化大革命这种群众民主运动“要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在当时，他事实上就是要发动一次人民针对官僚主义阶级的起义，通过文革“四大”等打倒他认为已经走上了对人民腐败、对人民独裁专制的所谓修正主义道路的党本位和官本位政权里的领导干部。如他全力反对领导干部间“一团和气”，提倡以保守派、造反派等对立形式而继续革命，实质是虽然他不喜欢三权分离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他还是尝试、创新，力图在党政官僚体系内部建立一个监督氛围与机制，或者说是彼此为在野党、反对党。他希望各地、各级、各单位的领导干部能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包庇。而彻底否定文革、四大、造反派等，只留下一个党、一个派、一元化、一个核心，看看当今中国，很多不正常的东西，如形式多样的腐败以官本位为基础，成为官场和社会风气，在被追捧和攀比中蔓延、恶性膨胀，成为个人社会地位、面子、能力、本事等的体现。想到在被如今当权者彻底否定的文革中，江青还要找丈夫毛泽东借稿费钱花，不觉令人感慨万分。又如否定了文革对“官僚主义阶级”冲击的正确性以后，大力提倡什么“班子团结”、“班子稳定”，结果不仅仅是官官相护，而且是你用公款等“公”给我送礼，我用公款、公权等“公”给你办事，如以公款赞助获得子女就学就业方便等，互相谋私、集体腐败成风，部分领导班子一窝一窝地烂，一窝不如一窝。没有三权分离的彼此制衡，权力寻租则是规律，集体腐败不过是“集体寻租”，而且他们看准了“法不责众”，有恃无恐。况且，即使他们不对个人寻租，不搞“私腐败”，也会对其他“公家”寻租，搞“公腐败”，如利用权限限制公民自由，

对法人和自然人“名正言顺”搞罚款、收费、提成、上交保护费、摊派等。其实，权力寻租是个新词，与过去的向上级权力“进贡、上贡”是一个意思，都是“大权欺负小权、无权，战败者向胜利者称臣”的范畴，如中央集权之与地区、军队、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一切权，三个代表、总代表等之与人民，核心一把手之与下级等等。贡献这个词就是“下面进贡，献给上面”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权力获取利益的从进贡到寻租，是个进步。进贡是制度性的，是公开的，是必然的，是合王法的，送获双方均心安理得的；寻租则是偷偷摸摸的，灰色的，地下的，是不合法的秘密行动，尽管它已经向公开化合法化进军了，它毕竟还是慑于外界监督的。但天下乌鸦一般黑，最黑莫过不受监督的权力对人民与社会之黑！两者如一丘之貉！这是任何独裁专制的体制性的毛病，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它自上而下的供给制，实际上是建立在自下而上的“贡给制”基石上的，供给制就是“贡给制”。官本位里的部分“官僚主义阶级”索贡、寻租，蜕变为人民“公有制”的窃贼，成为人民的对立面，被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的一则批示不幸言中：“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时至今日，毛泽东对危害人民民主的官僚主义阶级的分析判断仍然是真知灼见，他们就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他过去要改造、重建中国共产党，他身后的中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按照人民主权原则改造、重建，获得再生。如今之中国，出现了多少无法无天、不可遏止贪官污吏，干净的干部占几成？当然，我们在此并不否认由于官员待遇过低而被迫“逼良为娼”的腐败与犯罪，看看那些妻离子散、被投进监狱的中国干部，他们本身是独裁专制的受害者，令人同情。与小偷部分是因为贫穷造成的一样，他们得以贪污得手也部分是制度怂恿的恶果，是制度“害了干部”。毛主席如果在世，是不会有这么多干部家庭悲剧的，他会让一些干部活的有尊严，而不是活得有财富却无尊严，被人民骂为“不干人事，不屙人屎”，名声形象丑极了，

甚至沦为阶下囚。可见，毛泽东及其时代不仅是人民的大救星，也是干部的大救星。

（2）过去与现在之中国，谁最怕文革？谁最怕文革“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一党独裁专制

统治特权党政官本位及其腐败者最怕文革！最怕它又来了！为什么？从民主是外部监督、人

民监督的内涵来讲，尽管有那么多不足，失败了，也绝对不允许再搞了，但毋庸置疑，毛泽

东时代的四清、群众运动、四大、大民主等毛式人民民主，与资本主义人民主权的“三权分

离、互相监督”式公民民主监督是有共同之处的。相反，现在的党政内部的纪检委和监察局

等内部监督系统与它们差得太远了，此类反腐机构增设了很多，费了很多综合国力，腐败却

仍然有增无减。而且据中纪委一位高层人士发表文章说：他们在一个时期内查处的大案、要

案，90%是由“群众举报”的。而且，虽然由于担心报复，“群众举报”仍然是处于地下状

态，但说到底，还是公民监督、党外监督、政外监督等党政官本位体系以外的外部监督起了

大作用（顺便附注如下：真正的民主党是不敢象人民群众举报那样监督的，他们只能和平共

处，否则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当心”反右扩大化）那么，设立、维持那些党政内部监督体

系有什么用呢？它们嬗变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也许，从该反腐败体系里，人们更能看到权力

斗争、政治腐败的影子：领导要办谁才办谁，领导同意办谁才能办谁。让他们游离、独立出

来，改造成反对党、在野党，多好！

可见，尽管人民主权的三权分离最伟大可行，但还是毛主席“四大”群众大民主比现在的“四

项四个凡是”完全排斥外部民主，显然更英明伟大。如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

命的理论”和阶级斗争等被在宪法中完全肯定下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当作

是人民民主革命的新形式。并且，宪法规定“国家保障群众运用这种形式”。耐人回味的是，

“四大”下的“大民主”，最早是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的整党鸣放中由一些被某些人冠以

“少数激进分子”的人提出的民主要求，它还在反右派运动中被用作“引蛇出动”的方法。

对“四大”的核心“大字报”，毛泽东1957年7月就在上海的一次干部会上予以了肯定，

他说：“大字报是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他后来又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表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武器……应该永远使用下去”。虽然没有建立三权分离的民主制度，但他认为，人人可以通过“大字报”等监督、揭露、制裁“官僚主义阶级”，使他们难以违法乱纪。

刘少奇也曾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指出：“目前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始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可以看出，老人家及其文革时代提倡人民言论自由的一些做法虽被喻为创举，但它们是与国际人权标准相通的。如《世界人权宣言》倡导：“人人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又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主张：“一、人人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可见，尽管由于一是缺乏法律规范，二是缺乏“自由是每个人享有的不妨碍并尊重他人自由的自由”的正确自由理念，三是演变成了全面“内战”，四是被人利用了，等诸多原因，但与“四项四个凡是”相比，毛泽东时代的“四大”，显然使（狭义的）中国人民享有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及议政、论政、参政、督政、把政的公民权利，类似于议会民主的党派对阵、抢班夺权则使官本位内部发生制横、监督，铲除了腐败。撇开局限性和错误性，它把全中国都变成了海德公园、议院，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限制、不怕跟踪、不被迫害地自由言论、交流思想、信息等。全中国都是海德公园、议院固然不行，也不好，但法律及其它国家机器等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都具有海德公园精神则无疑是进步的，只不过适当的做法，应当是把这种精神体现到媒体、选举、议院、立法等国家政治生活中，体现到每个固定的“公园”里。

历史的矛盾在于，毛泽东是以绝对的个人独裁专制权威，发动了绝对的“全民”大民主，使全中国都变成了海德公园，这当然也不妥。历史的错误是，后来者或者矫枉过正，或者就是

背离民主潮流，以“四项四个凡是”撤换“四大两个凡是”，并发展到用三讲维护新迷信、新帝制、新帝位、新皇帝，绝对地扼杀了人民民主，绝对地巩固了一党独裁专制及其官本位既得利益，让所有人民为生存而挣扎，即“大人民喝西北风”。如今中国宪法，有了四项称霸，四个凡是封国，其他条款的公民自由权利都是酸孙子，几乎都是“纸上谈兵”，难以受到普遍的法律保护和判决执行。如同过去任何对封建独裁专制王朝及皇帝的建议、批评、指责、改变等言论自由，都是“犯上”的杀头大罪，对一党独裁专制及其“四项四个凡是”等的任何不拥护、不赞成的言行自由，也都是“触犯天条”的不赦之罪。须知，据荷兰的两位宪法学者统计，目前全世界142部宪法中，有124部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这项基本人权。有人埋怨毛泽东，说他用个人权威，否定了八大制定的“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正确的党的方针、政策，而搞起了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错，文革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但正如自由民主的人权政治制度能解放、发展生产力，他相信“抓革命，促生产”是能繁荣经济的，只可惜运动式的人民大民主不是制度式的人民主权民主，它结出了经济混乱、衰退与崩溃。但是，我们痛恨灾难等副产品，也要谈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制造灾难，他看到了人民民主政权内新生的官僚主义阶级背离人民的巨大危害，他认为“鼓励富裕，但多数富人是官员，其财富来源于盗窃人民的贪污和腐败，那样的富裕又有什么意义？”富裕不是腐败，不是盗窃，不是“吸工人阶级的血”。于是他“革命，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永远革党政独裁专制官本位的命。老人家的“继续革命，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使一些人恼火了，他们后来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名义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被革命。现在，一些人把毛泽东当时也不能控制的极端现象事件，作为攻击他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也不是盲从“文革”，而是真的相信那是一场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革命大实验、大发展、大创举。不错，文革的大民主实验结出了悲剧，但并不是说可以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后退到坚持一党

独裁专制就是正确、合理的。把“运动”式大民主，变成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的

“制度”民主，应该是中国前进的正确方向。当今官史总是称：“1978年中国共产党拨乱

反正，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文革没错，但“拨乱反正”不是“大民主退一步，一党独裁

专制进两步”。没有主权在民、没有委托主权时将其一分为三、并且三权分离的代议制民主政

体，我们的社会主义如何体现“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辉煌

人权？我们又如何能防止它走向民主的反面：独裁专制？

靠“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

度”吗？除了它们的“人民民主”这一出发点正确，五十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实践已经表明，

它们是对人民民主的红色欺骗。以至于有人在总结五十年来的中国民主是感慨：社会主义民

主本来是资本主义民主不可比拟的，但在国际社会民主好象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不摆

脱这种尴尬境地，社会主义就直不起腰来。大家还不要忘记了人民的感慨：社会主义理想挺

好的，就是被一些贪官污吏搞糟了；共产党挺好的，毁就毁在那帮贪官污吏手里。但是大家

想过没有，是谁制度性地滋生、纵容、庇护了“贪官污吏”？又是什么制造了刘少奇、彭德

怀、张志新、胡耀邦、赵紫阳、法轮功等悲剧？是独裁专制制度！一人一党独裁专制！跟制

度相比，一个帮派、几个坏人、一群“贪官污吏”等是可怜、甚或不是最有罪的，因为他们

本身是制度的受害者，体制给了他们权力，却不监督他们如何运用，在客观上起到了失察、

诱导犯罪的坏作用。这有点象一句中国古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父之错。即官之错，

管不严；管不住，制度之错也。

（3）实践证明，类似一人一姓独裁专制之家国制度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之党国制度，不可

能走向社会主义理想。这是共产党的悲哀，是社会主义的悲哀，是制度阻碍了理想的悲哀，

是手段破坏了目的的悲哀。哪个党员参加过对自己组织负责人的自由投票选举，如支书、总

支书记、党委书记、党组书记、党的总书记？哪个非党员人民参加过对各种掌管社会公共权

力者的自由投票选举？哪个党政官员，尽管他们可能很优秀，不是经上级指定而带有强加性

质地坐在人民头上的？哪个非党员人民因为群众身份而不是党国里的最低级“臣民（不是党员）”，不得不低人一等地接受党的领导？

这些不仅使人人平等，人民做主，人民代表等几近空话，还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实质是一个等级社会。它包括了党本位和官本位等名下的等级，自上而下依次为：党内干部（职务）、党员行政干部、领导身边工作过的人、领导身边生活过的人如七大姑八大姨、党员、团员、非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合作型社会名流、独立型社会名流、各种专家、民营企业家、富人、群众（工人、农民、市民、民工、盲流）等。这些等级体现在出任公职权、参政权、知情权、经济分配权、医疗权、接受教育权、各种待遇等社会各方面。不同等级享有不同大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和待遇，等级越高，收益越多，而责任与义务往往越小、越少。党政官本位是社会主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任何人的成功、荣誉和相应的社会地位等，必须参照官本位体系衡量，如副省级院士、处级和尚、大校级警卫员、处级司机、局级公司、局级调研员、副局级工程师、处级教授、局级记者、局级球星、科级运动员，只有普通人民没级没别。你再成功，你再有专长，你再有贡献、再有价值，只要你没有相应的官本位级别，你就狗屁不是，谁都可以不拿你当事儿。国家机器与社会体系主要是为独裁专制服务的，只要不与官本位沾边，你就是一个社会边缘人。看着各行各业搞业务、投身一线的公民，如农民、工人、店员、船员、学生、民工、秘书、办事员、科技人员、营业员、研究员、企业管理人员、教师、司机、各级基层干部、军人、战士、警察、司法人员、医护人员、记者、演员、运动员、教练员等，他们或兢兢业业，或汗流满面，工作生活环境却最差，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称赞他们为中国的脊梁。但同时我们也痛心看到，中国的脊梁大多弯了腰。因为他们处于官本位金字塔的最底层，权利最小、最少，承受的担子却最重；因为过去一个县太爷主政，现在是五套班子主政。当然，处于生存、发展的人性本能，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权威也使他们不得不低头弯腰、点头哈腰。一些人只道中国人“天生奴才相”，只道知识分子“孔乙己”酸溜，哪知他们天生没人

权的辛酸和奴才地位。有骨气？哼，找倒霉！别忘了，这吃人制度，谁有骨气先吃谁！

中国是一个脊梁弯了的国家，重压出自无所不在、无事不管的独裁专制党政官僚体系。这是

一个体形、体格、思想、人格、精神等脊梁，均被官本位压弯了的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及资

本本位、加入世贸组织等对中国脊梁是一次补钙、健身、拉直、强壮，但受官本位钳制仍然

太大，故而进展十分缓慢，中国脊梁弯得厉害。

中国是一个谁当脊梁谁倒霉的国家！脊梁就是受气包，他们包揽了卑微、坚韧、贫困、窘迫。

他们受压制，是底座，是分母，如置身坟墓，如被打入地狱，却托起了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这些家国、党国、核心国之统治者，酷爱一人制、一党制、终身制、家长制，才是真正的一

小撮。每次看到各地各行各业的中国脊梁，包括党政基层干部和很多有良知的高层干部，我

们都情不自禁想起小学课本的一幅插图：天昏地暗，高高的金字塔下，奴隶们弓身拉车，奋

力向上，建设“国家”，这党国、核心国，这自称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此时，“国

家”的主人——奴隶主们，一边享乐，一边奋力工作，盘算着如何保持“稳定”，防止、镇压奴

隶们围攻皇宫（中南海）、占领广场、动乱、暴乱、造反、起义。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始终是一切正义事业的基石。一个从社会运行的各方面把人民分成三六

九等的一党独裁专制体制，我们怎么能期待它真正高举人民民主大旗、推进中国人权事

业？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自由不是社会主义，不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独裁专制及其天

然孵化的等级制度不通往社会主义。国家是一党之国，人民争做一党的好“儿女”，国家和人

民不是高于党而是处于一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主义，绝对不是人民民主的国家，更不是大名

响当当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宗旨”的共产主义实践从毛泽东主席的理想与激情发展到了邓总

设计师的实际与实干。这是一个表面上的跌落、倒退，而实际上是回归与进步。他痛定思痛，

曾经说过：“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这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不够格，

经济不发达、科技落后的不够格，更致命的是社会自由不够格，民主未达标，是不以保障人

权而以保障统治权益为最高执政目的的独裁专制制度不够格。没有人民主权的民主体制做保障，因社会不公、党本位、官本位和贪污腐败等产生的富裕成果似乎比正常致富更为容易、普遍、耀眼。这样权力下非道德、不公平的贫富悬殊令人民难以接受，这样的富裕似乎使穷人更穷。所以，不推行改造一党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经济体制最终不能保障人民利益。而如果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为了为巩固一党独裁专制增加暴政手段、捞取筹码，那更是背离人民、反人权、反人民了。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继续蒙骗中国人民了。为了过好日子，我们曾经拥护社会主义，我们大搞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充满了人权理想。社会主义不是阶级斗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也不是官本位唯一占据社会主流、并为人民父母官的本末倒置，社会主义更不是任何形式的一人一家一党对全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独裁专制。它的定位是由全体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主权的社会。可我们的社会主义成了什么？谁当家做主？谁掌管国事？谁说了算？它是一个人对于一个政治局说了算，一个政治局对于一个中央委员会说了算，一个中央委员会对于一个党说了算，一个党对于一个国家说了算。它是人治，是党治，不是民治，不是法治。它是一人之国，一党之国，全体人民除了被迫在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等上面摆摆样子外，几乎被剥夺了参与国事的权力。这难道不是全体人民主权社会的反面吗？这难道就是我们标榜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吗？

人们已经知道社会主义不是贫穷，不是独裁专制，不是有大小皇帝、一把手、党政官员在这个社会里无视人民、无法无天、至高无上，或者自以为是法律化身，乃至模仿封建皇帝，如自称是“真龙天子”一样，自称是“三个最根本利益的代表”。当然，人们也已经“知道”它还有个初级阶段。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仍然是模糊、没有答案的。如果这不算虚幻，那么社会主义都被搞成了独裁专制则是真实存在、痛苦四溅的，那么自由民主的三权分离作为保障人民主权之桥梁则是真实、有效的。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被搞成了“蒙昧主义”，那它至少是虚幻主义、虚无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很

好！为了人民民主，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弃桥不用，非要“摸着石头过河”呢？

（4）即使关于“社会主义”，1949年以来的中国也有两个社会主义。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虽然他所做的很多事情如文革等虽然分别结出了善果和恶果，如他利用宪法提倡“四大”。但他的主要出发点几乎都是力图加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的人民性，并保持其“不变色”，不让被他称做为官僚主义阶层或资本主义势力走资派等重新成为独裁专制势力去“统治”人民，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性质永不变色。尽管不恰当的阶级划分、错误的阶级斗争理念等结出了恶果，但这是一个主要意图是用社会主义保持人民主权不变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另一个是毛以后时代的社会主义。它还可以细分为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的社会主义。它坚持“四项四个凡是”，虽然名称与前一个相同，但内容却背道而驰，它坚持社会主义是要保证毛泽东全力反对的官僚主义阶级永握独裁专制权柄，永可对人民发号施令，它的“保持社会主义不变色是保持官本位的独裁专制权力不变色”。如果说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因为“错误阶级划分下的少数人搞大民主”而走向了民主的反面，那毛以后时代的社会主义则是从根本上反对人民民主的。其荒唐做法是凡事不得偏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被神话、迷信到高于民族、国家利益的地步，并利用被置于附庸地位的人民代表大会，硬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塞进了宪法。其卑劣的做法是制造了六四人权灾难，使中国与世界蒙受了不亚于文革的人权损失。至少，它从时间上已经超过了文革的持续时间。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非毛以后时代的社会主义。前者被称为“左”，是因为错误的阶级划分、阶级斗争等使它过于狭隘、偏激、残酷，使他不能代表全体人民，因为暴力而丧失人心，最终走向了反面。它的特征是用社会主义拼命固守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主权。为此，毛泽东不惜砸乱、搞垮他亲手创立、但变了质的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伟人的风范！另一个社会主义的特征也是拼命固守，只不过它玩命固守的是一人对一党一国的独裁专制，是用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组织固守个人个体的独裁专制的寡头政治体制，及其官僚主义阶层的各种社会利益。在此点上，江泽民时代表现得尤其明显，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

可见，两种社会主义是两种招牌，也是两面盾牌，也是两个大棒。一种招牌是方法不得要领
的为人民服务，一种招牌干脆是赤裸裸地保守一党独裁专制；一面盾牌是保护被错误地缩小
了范围的人民的盾牌，一面盾牌则是保护自己免遭国内外人民民主正义力量打击、谴责的盾
牌；一个是挥向反人民的官僚主义阶层的杀威棒，一个是舞向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等人权的罪
恶棒。一个是用文化大革命等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清除官僚主义阶级，一个是用四项
四个凡是、三讲“坚持一党独裁专制”。一个敢于大张旗鼓研究、宣扬古今中外的历次农民起
义和五四运动等，一个对农民起义、学生运动等禁若寒蝉，对人民的任何举动都保持敏感神
经质心态，把全年的大部分时期都定为什么敏感时期，用思想和武装力量实施恐怖统治，确
保“稳定”。它害怕水浒，害怕李自成，害怕朱元璋及“明教”，害怕太平天国，害怕早期的
中国共产党，害怕“痞子运动”、“民工”等。又如狗续貂尾的“核心论”，三个核心全不一样，
哪个更贴近人民性？自我标榜的第三个核心是对第一个和第二个的污辱。毛泽东有《实践论》，
邓小平有“猫论”，他们比那虚无缥缈的“三讲”论高明千万倍！虽然我们多次声明文革式的
民主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只有全体人民团结和解下的三权分离的制度式民主才能保障人民
民主，但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1989年后中国人民无限怀念毛泽东主席，人民重新佩
带他的像章，读他的书，把他的画像当作护身符、护车符、吉祥符。一些人甚至希望象老人
家说的那样“过七八年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没有办法啊，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一无民主
制度保障人民人权，二无伟人领导人民获得人权，三无大学生等尖兵替人民索要人权，四
无……。

两个社会主义都不尽正确，四大两个凡是和四项四个凡是都有错误，两个人也都有缺点，毛
时代和邓时代江时代也同样充满矛盾。但它们性质不同，毛泽东等是对人民主权“我本善良”
立意下的方法错误导致的结果错误，六四则完全是违背人民自由民主与人权的错误理念下的
错误方法引导的错误结果。如果说文革是悲剧，把美好的人民主权撕破了给世界看，那以六

四为特征的四项四个凡是时期则是中国的灾难与丑恶，把数千年的封建独裁专制官本位的吃

人惨剧延续给世界看。

从第一代到第三代，人民理想越来越淡薄，政权的人民性越来越稀少，一代不如一代。相反，

腐败、无能等却成反比例上升。毛泽东的长子牺牲于战场，卫士长只在一家工厂做了一名处

级干部。你再看看他身后的两代，凡是沾边的，实际官位都在处级以上，有的是封疆大吏。

他们哪里有毛泽东“五湖四海”的胸怀。他们说陈永贵等不行，难道他们的秘书便够格做封

疆大吏？

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有文革，文革里面有“四大两个凡是”，那时党政官员没人敢腐

败，经济决策错误多。毛以后的时代有四项四个凡是，四项里面有六四，六四后有三讲，官

员腐败成风，腐败对社会的危害不亚于毛时代的经济损失。对于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革的错

误，我们，包括受害者，要站在一个高度——一个人民主权冲击独裁专制官本位特权的高度，

去看待它，分析它，承认其立意的正确性。对四项四个凡是和六四，虽可以商榷，但我们主

张完全否定它们。

文革，中国人穷，但城乡之间，人民不矢志气、朝气与尊严。现在，中国人虽然稍富一些，

但富得很窝囊、憋气。换一个角度说，毛泽东使中国人民几乎站起来了，但代价是穷。后来，

中国人民富起来了，代价却是低眉折腰事权贵，是低头，是对官本位低头。

历史告诉中国，提倡“四大两个凡是”，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主权民主！坚持“四项四个凡是

与三讲”，更是与人民自由民主背道而驰！社会主义不是独裁专制，更不能把独裁专制贴上社

会主义标签！

中国自由不是四大两个凡是，也不是四项四个凡是。中国民主不是极左，也不是极右。中国

人权不是文革，更不是六四。它们都无法对中国人权事业“其命维新”。但我们要继续努力！

探索、创造、借用、拿来！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能被歪曲，人民自由民主和人权不能被歪曲，四大与四项要改造，

“凡是”要破除，三讲要讲自由、讲民主、讲人权等老三讲，全国要和解，民族要和解，人

民要和解，地区要和解，官民和解，军民和解，官本位体系内外的各界人民要和解，用各界

国人的共同意志与力量，去用人民主权立法，建立一个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自

由民主的人权国家！

总之，毛泽东时代文革的四大实践是失败的，邓小平时代的四项实践背离了“主权在民”性

质，江泽民时代的三讲三个代表实践只是邓小平时代的延伸，没有任何创意，而且更左、更

保守、更反人民。

3、争做人权阶级

（1）百年来，由家国至党国，中国一手批了封建主义，一手批了资本主义，还批了官

僚主义和殖民主义，国民党政权还批了社会主义，可中国究竟得到了什么主义？

答案只有一

个：封建主义。官本位、一党制、核心制、家长制、终身制、任命制、接班制等仍然至高无

上。

真可笑，当今中国统治者——毛泽东定性的官僚主义阶级，欺骗人民说：资产阶级的

最后一个剥削阶级。那么，腐败了的党政官本位的他们，是什么阶级？他们打着社会主义旗

号，难道不是以封建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吗？口口声声消灭剥削阶级，难道失去了监督的党政

官本位不是以腐化培育了新的剥削加强盗阶级？现在，他们一方面害怕资产阶级革命，另一

方面也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

因为任何名义的独裁专制社会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最基本的两大阶级划分。较之统

治者，人民之间不存在根本的阶级差别。他们因职业、收入、地域、接受教育程度等不同而

形成不同阶层。他们无论姓资姓无，都姓人民。统治阶级害怕的是人民民主革命。人民不能不识破统治者的阶级划分，尤其是因贫富而起的一类阶级划分，不能陷入其“分化

陷阱”，被“分而治之”。实际上，人民没有道理痛恨人民中的“富人”——资产阶级，企业

家，思想家，科技文艺、体育运动等专家。他们富于财产，富于金钱，富于思想，富于技术，

富于管理，富于智慧，富于歌喉、舞蹈、口才等，富于想象、模仿，富于拿金牌，富于各种

专门特长和技能。只要肯于奋斗，人人均可因为专门特长而致富、成功。人民更会把这样的

各类专家视做真正的社会英雄，并通过努力奋斗到达类似的境界，以便在贡献社会的时候获

得个人成功。

也许应该换个说法，获得个人成功的时候必然有益于社会。这不仅仅只是西方的个人主义，

而且也是东方的人生哲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个人成功的本身，是满足社会需

要并受到欢迎的结果。这是真正的集体主义。“为富倡仁，仁在人权”。各类专长、物质和思

想财富多者能力也更强，不应该只满足于“独善其身”的自由民主和人权，说什么“我在中

国很好，在中国做个富人就行，我那些钱在中国够花，比大多数人活得好就行了”。

“达则兼济天下”，各种富人应该更有责任感，主动站在建立民主中国的前列。财富大众化、

社会化、资本化的实质，即是人民自由民主对独裁专制的和平演变。财富是人的力量，财富

助长自由，财富支撑民主，财富完善人权。个人成功了好，富人多了好。多一个富人，多一

个中产阶级，多一个民营企业，多一份资本主义，应该多一分人民主权力量，多一层抵制独

裁专制的自由民主。

人穷志短，富长人权。人的财富越多，自由度越大，民主意识越强，人权越有保障。大家都

富起来吧！

我们不应该陷入“是富人养活了穷人，还是穷人养活了富人”等一类的不利于人民团结的争

论。穷或富的一些偶然因素是不可以认为控制的，穷富标准和含义也因人而异。也不要国

际上总问“是富国养活了穷国，还是穷国养活了富国”。转动地球仪，我们会看到，穷国或地

区大多都被独裁专制政权所困扰，而民主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几乎是一跃而过，一片

富裕。多问问穷或富的原因，如政策、制度原因，并努力改进它。

古人曰：苛政猛于虎。的确，人民穷在无人权，中国祸在独裁专制。当今世界，人民不会因

为独裁专制政权的强大而富裕，独裁专制总是最大的穷因，人民总是独裁专制的最直接的受

害者。

致富等追求美好生活是人性的内在要求，人权则是成全、保全它们的引擎和长城。人民如同

不能把幸福寄托于皇帝的仁政德治，更不能把幸福寄托于“一个党”的“好”政策，否则对

坏政策或令人民穷困的政策岂不是只能逆来顺受！独裁专制社会的别无选择属性使我们吃的

亏还少吗！人民的利益不在于“为人民服务”者们的恩赐，在于人民主权，在于人民主权对

被委托者——执政者及其政策的选择、监督、罢免。不好好干，人民剔了你，换党！换政策！

换人！

全社会关键在于应该建立、维护一种人民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人民有权力选择党、选择政

策，选择人，使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法制社会里努力向上而致富、成功，并使个

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专制权利的侵扰。

甩掉穷帽子，致富光荣。为富要仁，富长良心，富是能力。“达则兼济天下”，富人更应该有

社会责任感，社会环境更要支持他们，正是他们更有能力开发各种新边疆，提供就业与受教

育机会，推动经济增长，支撑社会生产力、科技发明和思想等体系的创新与进步，提高全社

会生活质量和道德水平。在独裁专制的现实里，富人不应该只做一个只管存钱的土财主、土

老帽，至少应该在生产、商业等经济活动中做到诚实信用、正直而不制售假冒伪劣，不贪图

不合理的暴利；至少应该在自己的企业里不欺压员工，尊重人权、扶持人权、改善人权，并

积极参与参与改造独裁专制社会，推行人权价值标准。

（2）主席人民事业的败类们因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使真正的资产阶级蒙怨。我

们不会忘记，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由工人阶级发动的革命都发生在自称为是工人阶级政

党的一党独裁专制的国家里，如 1953 年的东德和 1956 年匈牙利，而波兰则前后发生了三次，

东欧、苏联等人民已经推翻了自称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执政，等等。

资产阶级被消灭了，怎么无产阶级还要革命，殊不知这是革未经人民自由选举而获权并

滥用权力者的命，而它的根子在于金字塔结构般的自称为工人阶级政党却大搞一党独裁专制

的党尊民贱。

必须提请注意，对一个长期把巩固独裁专制政治体制当作最大价值目标的政党来讲，无论他

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还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还是三个代表（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

方式等吗？），他都不能代表人民了。他已经不具备创立、壮大时的政党性质了，过去的人民

性质被他抛弃了，即此时党非彼时党。

他在独裁专制的同时必定背离了人民自由民主与人权。他不能代表任何人民了，他只是被用做独裁专制政治体制运作的推动者和收益者，他只是一个为了执政而执政的“执政党”（这就是僵化、停滞的含义！）。借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叫做“官僚主义阶级的政党”。套用前苏联的实况，就是社会上存在一个“红色特权阶层，有红色恐怖”，它与国内外的白匪时期存在一个“白色特权阶层，有白匪恐怖”没什么两样。资产阶级宣扬的是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人权，他们因经济实力等雄厚而能走在人类人权事业的前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官员因为是置于人民主权下被选举、任命、监督、弹劾、罢免等的公仆而“无足轻重”，就物质财富而言，人人都是享有人身自由的资本家。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实没有根本差别，其区分在于财富、才智的多寡厚薄。广义的资产阶级不是只指狭义有钱人，而是指所有拥有自由的人，因为所有自由人至少拥有劳动力资本（独裁专制下的奴隶身份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即使大资本家也不是世袭的，人人几乎可因努力而成功，改善自身状况，更大程度上地参与、推动人权事业。人民不会因为富裕而被独裁专制者们讥讽为“有钱算个屁，你什么级别（官爵）？”

当今世界，天赋人权是个人的最大资产。无产阶级的真实准确范围与表述应当是无人权阶级，是一切无以人民主权原则而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人权的人。资产阶级阶级应该表述为（有）人权阶级。

独裁专制社会里，除了皇帝、核心一人，人人都是无产阶级，都是奴隶。大官是皇帝的奴隶，小官是大官的奴隶，群众是各级各类官的奴隶。而且皇帝及其家族、亲信、身边工作过的人，也有下台做奴隶的那一天。

主权在民的民主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更大限度地拥有更多的人权资产，而是所谓资产阶级，是主人。只有任期制下暂时做官的人，才是“奴隶”，因为他们必须在各个方面严格置于社会各界监控之下，保证他们不犯错误。

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讲，当今中国无产阶级众多，重要原因是在于中国人民一直

只有独裁专制政治制度这一固定资产。反之亦然，也在于独裁专制者们一直把中国人民禁锢为他们的固定资产。
人民啊，追寻自由民主和人权吧！争做资产阶级吧！争做人权资产阶级！争做人权阶级！
人权是第一资产，人权是第一资本，人权是第一生产力！

（3）独裁专制当局最恼火之一是“一切向钱看”，他们害怕“十万富商，胜于有百万之劲卒（郑观应语）”的资本威力。他们竭力反对“金钱至上”的所谓资产阶级价值观，攻击“资本主义民主是金钱民主”，反对用钱衡量一切。
为什么？因为当“钱”成为一种衡量标准时，当被污称的“金钱拜物教”比“官权拜物教”更受宠时，最受冲击的是官本位价值系统，并最终导向人民主权立法，确立民法。那时，人民不必加入官本位体系这唯一的社会成功之路，也不必顺从、恐惧、依附于它，而是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创造，独立使用，通过创造、发挥专长、出名、赚钱等改变自己的地位，甚至获得比官位更好的生活。
可见，“金钱本位”与“资本本位”，天生会发起挑战，与“官本位”分庭抗礼。它会以人民主权立法，立“民法”。它的“钱权、资本权”分享官本位的“党政官权”，瓦解“党政官权”，并最终超越“党政官权”，大于“党政官权”。“钱权、资本权”使“党政官权”惶惶不可终日。
所以天下富人越多，独裁专制越感恐惧，越感“官法、官本位”不灵了，自己权利有限，悲观的甚至觉得穷途末日。
独裁专制官本位痛恨“金钱万能”，就是要确保“党政官权万能”。宣扬“无商不奸”，就是麻痹人民，确保“无官不奸”。反对“金钱至上”，就是要确保“党政官权至上”，就是要确保党政官权而不是人民主权至上，就是要确保党政官本位而不是人民资本本位至上，就是要保证人治而不是法治至上，就是害怕“民法”顶替了“官法”。
所以，巩固独裁专制的天性需求是不能重视商人、企业家等有物质财富的富人，不能重视知识分子、运动家、艺术家、手艺等有专长资本的富人，他们都是瓦解独裁专制基础的天生力量。顶多只能把他们“统一战线，挂起来”，弄到人大、政协，或者什么协会、学会里干干，党政大权是万万不能给予的。

(4) 同时,除了有良知的好官以外,一些官员因此拼命反对改革,一些官员则因此疯狂贪污、腐败,大肆捞钱,以期在“官权”转为“钱权”时仍然保持权利。这是当今中国官员腐败猖獗的根本原因。他们非常机敏,看准了中国“官途无定,食路有方”的发展方向,只不过用错了手段。

说句玩笑话,由于“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民主价值观远远高层次于官本位“官权至上”的封建独裁专制价值观,它使人民主权受益时,也使独裁专制“官权”成为最大受害者:面临两难选择,或者放弃官权,或者利用官权捞钱、腐败而为自己掘墓。虽是腐败,搞经济建设、经济活动,怎么能不向经济效益、不向自己口袋看呢?

独裁专制意识形态下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它制度性地毁灭了一批有作为的中国人、党政干部,使他们正常“经济利益”(也是人权的一种)得不到保障时沦为“经济罪犯”,成为独裁专制的殉葬品。

而且,自从晚清以来,晚清洋务运动、宪政改革、新政也好,军阀混战和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时期也好,共产党一党独裁专制下的允许个体经营、改革开放、引进外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也好,由于都没有厉行彻底的人民资产阶级革命和私有制,都是保留独裁专制政治体制不变,都是朽瓶装鲜水,都是由独裁专制官本位权力参与、推动、乃至主导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即“官商”。

故而“无官不商”,一是指“官”大于商、管制商,二是指缺乏官权推动则不能为商、难成大商,三是指官员们得天独厚、纷纷入商或经商,四是指以官本位谋取商利,五是指主要依靠“官治、人治”调节、指导、仲裁经济商业活动,而非法治、民治。如它以“官令、官法、官话”等为指导最高权威,即中央政策、地方土政策、行业土规矩、条例、规定、暂行规定、通知、紧急通知、大人物金口玉言等等,而不是以人民主权的立法,即民法为准绳。

同时,“官商”的终极目的也不是推动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使人民获得自由民主等人权,而是为各种独裁专制体制“拥有无比的优越性”提供证词,为修筑各类长城,巩固独裁专制服

务，它还顺便被腐败分子用官商谋私利。这种排斥人民主权的立法和人民自由民主力量推动，

而由官法官权推动的各类产业等的官商经济发展，由“官”做主导，“官”无所不能、无所不

插手、染指，领导并谋取好处。同时，官谋商，商靠官，官商勾结，互相觊觎、利用，行贿、

受贿等个人个体好处是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前提条件。

只有“官法”而“无民法（人民主权法）”，“官商”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裁判踢球，裁判还随

时可以依据利己原则，改变规则、官法。经济活动中，国有企业兼并民营企业，自然是好事；

如果相反，是民营企业托管、代管、兼并国有企业，那闲话便多了，左查右查，让你不得安

生。

民营经济纠纷中，如果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是正常的债务关系。如果相反，则是“侵

占国有资产”，乃至“盗窃国有资产，挖社会主义墙角”。如果国有企业拖欠银行贷款，可以

享受“打呆”待遇。如果民营企业拖欠了，有可能以“诈骗罪”论处。是不是，查你一通，

就让你好受。国有企业就是官有企业、党有企业，这便是以党欺民，以官欺民，以上级欺下

级。这是“官本位吃人，欺压群众”的高级形式。

在这样的经济活动环境里，很难有公正、平等、自由竞争可言。官商们“合适就行，高兴就

好”。这势必发酵出腐败浊流，污染社会，使国家蒙羞，政权金库被掏空，流入腐败官员钱袋

里；人民遭殃，社会公益事业受损失。这才是挖人民墙角。

对社会经济生活来讲，对市场经济来讲，对国家繁荣、国库与人民的钱袋来讲，官商就是裁

判参与踢球、参与分红。经济活动以赚取正常正当的利润为主，在有官本位、官僚资本参与

的官商经济里，决无正义可言。如果说“无商不奸”不成立，那么官商最奸最黑无疑是事实。

看看当今中国，难道我们不能从百年前的“官商”的“红顶商人”继续倍受推崇、膜拜而得

出中国经济界仍然是“朽瓶装鲜水”的党商官商经济吗？它没能挽救大清帝国于衰败，没能

帮助一党独裁专制的国民党富强中国，那对它的一脉相承能帮助一党独裁专制的社会主义“振

兴中国”吗？不仅如此，它危害国家是从危害个人开始的。

“官商经济”污浊社会，大批的优秀中国人因此落入“逼良为娼”的陷阱。几乎可以这样说：

没有人民主权立法，只要你愿意做一名有作为的企业家，为使企业发展，为闯独裁专制的“衙门、官权”关，你必须非常悲壮地“以身试官法”，至少做几件触犯“党纪国法”的事情，才能使企业生存、发展。因为独裁专制下，一方面鼓励“大胆试，胆越大，经济越繁荣”，另一方面最大的经济功臣也可能是危及独裁专制的最大的“乱臣贼子”：有经济权而进一步谋求政治权，或者用经济权抵制政治权，甚至意在推翻独裁专制政治权，此三者都是掌握独裁专制权力者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故而，虽然有道是“钱没装进自己口袋就行”，但你的业绩正是你的“罪孽”，它们都是闯过条条框框“强攻”下来的，它们都是你日后倒霉、被“两手抓”的证据。尤其是你不听党的话、欲图摆脱党的领导或者遭人暗算时，你的业绩可就派上利于“整治你”的大用场了。拿下步鑫生，把承包企业家冰凉以下；拿下禹作敏，把中国乡镇企业家全震住了；拿下储时健等，令国有企业家都寒了心；拿下牟其中，看看哪个民营企业还胆敢自以为是？现在，看看那方面的企业家还敢挑战一党独裁专制政治？还敢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梦想什么用经济权获得政治权？等着吧，也许下一个就轮到网络企业家。遭殃，即遭殃，遭中央：遭遇中央集权独裁专制统治！遭遇它，必然遭殃。中国屡屡陷入这样的遭殃轮回。看明白了吧，拿下这个，拿下那个，就是没有一个党组织系统的官员，如委员、书记、副书记等，陈希同等例外。拿下一个胡长清，也不知有没有其他政治背景，至少他是副省长，不是党组织系统的官员。管人的人是不会错的，那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别看企业家、专家等是国家经济增长的脊梁之一，但在中国，谁是脊梁谁倒霉，只有“坐脊梁者，监管脊梁者”才舒适、安全。

中国企业家不难在市场竞争和经营管理，不难在企业办社会，而难在外部环境，难在受官本位压制、盘剥的外部政治环境。现在虽然表面上不搞政治斗争了，但我们总能体验到独裁专制新的政治斗争表现形式，我们常常能感到“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更多是为了“依法打击异己”、“依法巩固一人对一党一国的独裁专制”，是使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合法化，是使人民象害怕极权人治一样害怕其极权法治。他们故意搞一些模糊“官法”、政策，说行也行，说不行

就不行，擦了边，犯法不犯法，如何定罪，他“人治”，他说了算，永保你前途甚至小命，都捏在他手里。

每当要办掉一个人时，一些权力部门不是经常这样理直气壮或者叫嚣吗：官法条例等多着呢！

我就不信查不出他的毛病！女人、经济、泄密、玩忽职守、私设小金库、不上贡却滥发奖金、

打过擦边球；没受贿，但为了发展企业而行过贿，曾经给上级领导、职能部门送礼……，毛

病多着呢！

为什么中国经济难以发展？为什么有的中国企业家十分寒心、悲壮、不得善终？

就是因为中

国经济是一党独裁专制的孙子，企业家是党政官僚系统的孙子，就是因为没有人民主权立法

的民法保护他们。这是一个必须冲击“官法、官权毛病”并因此“犯官法、染上毛病”，才能

成就事业的一党独裁专制毛病世界的真实写照，这是一党独裁专制误企业误经济、误国误民

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自明代以来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得发达？为什么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始终是个孙子？为什

么改革开放下中国的民营企业也难得做大？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资本外逃？为什么国人有了

钱就想移民？为什么12亿人口的大国只有大市场、没有人民自己的大产品、大企业？就因

为没有人民主权的民法，他们始终是官本位统治、官法统制、官办企业、官商结合、所谓国

有企业的孙子，始终处于对资金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竞争地位，是补充，受限制，受官本位

压制。惹不起，躲得起，逃避的只是独裁专制。

人们常说，中国经济活动中有两种人。一种人事业心、开拓进取精神强，他们“大胆地试”，

“无理无法”发展经济。一种人躲在后面看着、议论着、造谣中伤，他们可以设置障碍，“合

理合法”整前一种人。前一种人有市场的时候，经济便发展了，他们如邓小平等走资派于文

革后成为当权派。后一种人感觉不错的时候，经济便停止、下滑，乃至衰退了，他们如六四

前灰溜溜，险遭合并、撤消，却于六四后如“还乡团”般如日中天的所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者。这是讲个人与群体，就是讲地区，那深圳特区等部也是闯过来的吗？按照一些人整人的

观念，这些地区、城市、一些行业等也有罪，该换班子，狠很治理。

政治挂帅，你邓小平怎么能大讲发展经济。“三讲”讲政治，你们怎么能搞经济。在独裁专制社会里，政治的最高要义、最大价值目标是“保持一致”。“保持一致”须得高压，这使它基本上沦落为意识形态，是整人的同义词，整异己，整大众，整社会（所谓加强教育教化，社会主义教育教化）。

何止于经济领域，科技文化教育、警察武警军队等武装力量、体育娱乐中南海等，一党独裁专制制度性地在全社会各行各业各地生产批发这两种人。总是弄得谁搞业务、谁干事情谁倒霉，谁带兵打仗谁倒霉，还得没完没了受教育，加强政治学习。干事者收获了、拿好处，他们一点也不少拿，人家亏了本、白干了，他照样吃皇粮，多悠闲的日子。以至于中国人哀叹，不干事不安心，干出事来讨人嫌。

这是平均主义吗？这是地地道道的不公平、非平均主义，有点象强盗主义。加上一些极端的害人惨案，总让人想起戍边拒敌的前线英雄，反被宫人残害的悲剧。如前有岳飞和秦桧，后有赵紫阳等一班人马和其他一帮人。

又如改革干正事的人，生前总难有好报。古有商鞅、王安石，近有谭嗣同，今有胡耀邦、赵紫阳等。

而且，独裁专制统治下，最终结局是里外、前后无好人，都难逃倒霉。李斯反分封，禁私学，设计了焚书坑儒，并且“诸男皆尚公主，女悉嫁秦公子”，是秦家功臣与儿女亲家，最后也遭腰斩，落得夷灭三族。岳飞等生前不得好报，秦桧等生后也不得好报，至今还跪于岳王庙下。

谁也逃不脱它的折磨。生前身后，瞿秋白两次蒙难。陈独秀曾经国共两党均恨之入骨的人，他现在也没有得到官方的公正评价。多少生前不可一世的人，身后遭遇重新评价，乃至彻底否定，早世人唾弃。

都是中国人，也许不能说谁是魔鬼，谁是天使。但魔鬼曾经对天使说：到处都是邪恶，你怎么能坚持正义。是啊，到处都是特权至上，你怎么能坚持正义，人权天赋。在一个以皇权、核心权为首的党政官本位至上的社会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引擎是政府管理权、统治特权，是治党权。使其养尊处优，是其他一切生存、发展的先决条件。

这种制度性的悲剧至今仍然在中国续演，因为独裁专制制度仍然在延续。为什么？因为皇权

独裁专制需要，因为一人一党独裁专制需要。

（5）有了独裁专制，有了党政官本位管制一切经济活动，有了党法官法大于人民主权民法，
有了党权官权大于人权、钱权、商权（“有钱能使鬼推磨”不能说明钱比权大，除非设计陷害，
行贿者总是有求于受贿者），有了官商，有了官商结合，有了商必须“傍”官，
有了官权与钱
权的价值交换，有了国有企业就是党有企业，有了所有事业必须为党的事业服务，
中国商业
等经济发展的社会价值在思想家爱默生的预言下大打折扣。
他曾经在日记里写到：“我们都咒骂商业，但今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看到，商业是自由的原则，
它建立了美国，它摧毁了封建制，它还要消灭剥削。”难道权钱结合的官商经济、党商经济及
其腐败，一定是中国经济或者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受吹捧的特色？
我们为什么不能由人权、民法推动经济发展，而必须由官权、官法坐镇？
目前官权不倒，民法未立，我们也不能停步。无可奈何，让我们从“钱权”开拓人权之路吧！
人民没有“党政官权”，还不能奋斗出“资本钱权”吗？但须要记住的是，官商经济繁荣与市
场化，即实质为固守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并不一
定能自动导致人民自由民主。只要有独裁专制党政官本位之苛政虎视天下，人民主权立民法、
钱权资本权和自由民主的人权决无真正出头之日。我们必须坚韧不拔地和平演变！
人民啊，千万不要跟着独裁专制者们一切痛骂“资本主义认钱不认人”。“认钱不认人”不是
不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情谊，不是独裁专制愚弄人民的“西方情意淡薄，亲情疏远”，而是不
认官本位特权、官法，不认那些掌握“党政官权”特权的“官僚主义阶级”，不认自以为特殊
的“官人”，不认官位、地位、条子。
人民主权资本本位，使“党政官本位”平等原则失去存在基础。它建立一种崭新的仅次于“真
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金钱面前，人人平等”好得很！它超越党
政官本位“官阶平等、平民无等级”的不平等，它是人民主权民法超越官法，是历史进步！
人民啊，千万不要上当而痛骂“资本主义民主是金钱民主”。独裁专制剥夺民主，金钱催生、
培养、保障、进化民主。“金钱民主”是人民主权的民法民主，它比独裁专制下的“指定民主”、

等级民主、没有民主等强得多。快快发财吧，钱财越多，民法越能超越党法官法，“金钱民主”越有力量。人民“抵御独裁专制“吃人”特权的本领越强大，人民就越能确立人民主权立法，建立人民主权政权，越能保证自己的民主政治权利。

人民啊，官法不平等，追求民法平等！
官商可恶，让民商开花！
官权不认我们，让钱权认我们！
官权压制自由，让金钱平分、削弱官权！
特权侵蚀民主，让经济发展催生民主，保障人权！

独裁专制主义还常常愚弄人民说什么资本主义是富人的世界，这是否说被搞成独裁专制的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世界。事实不是这样的。缺乏三权分离制约、缺乏人民主权立法监督的“社会主义人民公有制”，实质上是少数掌握公共权力者的独裁专制私有制，独裁专制社会既不是富人的世界，它也不是穷人的世界，他是掌握公共权力而又不受公众监督的大小官员们的世界，是官本位的世界。象很多人富了不行，我等穷了更不行。社会主义不是贫穷，也不是独裁专制，而资本主义虽不是最好，却已经被证明是目前知道的最能担当保障、发展人民自由民主等人权的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被独裁专制者们视做洪水猛兽，是因为资本主义大旗下的一切资产阶级等人民都是独裁专制及其官僚阶层的天生狙击者。把一切独裁专制的罪过都不恰当乃至错误地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把一切可以瓦解独裁专制的都贴上私有化，这是多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莫大的误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弯路或倒车，使中国人权事业丧失了巨大的前进动力，并使生产力发展受到迟滞。

一些人天天喊叫遵从马克思主义，但却遗忘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客观评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 100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生产组织。必须承认，自由是“多样化与发达”的前提。那些倍受推崇的生产力实质是由资本主义自由制度下的自由人创造的。反对资本主义，是不是心态如中世纪的封建专制反对自由民主？

金钱、各类资本、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很重要！资本主义不是万恶之源，它因为弘扬个性、

拓展自由、确立民主、尊重人权而是独裁专制的终结者。如果说他们是“吃人”的，那他们更多的是吃独裁专制，它们生来是阻击君主权、皇权、家族权、独裁党权、独裁行政权等特权剥夺人民人权的利器！在自由民主社会里，任何人都是准资本家，人人都有机会转化为资本家。因为除了土地、金钱、技术、信息等资本，每个自由人至少拥有自身的人力资本，他不是依附于某个独裁专制下的“党的人”、“单位的人”、“这个地区的人，那个省的人”等奴隶。

让我们为确立“人民主权民法大于党法官法”而奋斗吧！
让我们为树立“钱权大于党政官权”价值观而奋斗吧！
让我们为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个人准资本能越过独裁专制生产关系或不受其阻拦而转化为社会资本而扫清道路吧！
让我们为“资本权大于党政权”社会秩序而奋斗吧！
让我们为资本正名吧！
让我们为资本主义正名吧！它本身是人权主义对付独裁专制主义的历史战车。
让我们为私有制正名吧！其本质是人民所有制，社会大众所有制，是集个人之私为大众之公。
变了味的公有制才是真正的独裁专制寡头私有制，它集大众之私为个人个体之私。
让我们为资产阶级正名吧！它本身是人民的一分子。
再一次大喊：民法，立起来！
来吧，资本！多起来吧，资本家！发达起来吧，资本主义！
公民，快快发财吧，解放人权！
无商不坚，坚破独裁！

（6）较之官本位权力资本及其原罪，金钱与其他各类资本更具美德，它们尤其具有挑战、制服、削弱、平衡官本位权力的美德。

人民啊，冲破权力经济吧！冲破官商吧！使其不能危害人民自由，使官本位不能谋商、害商！
不仅要党政分开，还要党商分开、政商分开，更要人民主权的民法高于党法官法，人民经济权利高于官商权利。否则，人民富裕了也白搭，不是遭官欺，就是被剥夺，至少也得买通官法求过关，花钱买官做或者寻求保护伞，求个平安吧。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人民主权的民法，没钱没自由，有钱也没自由；没钱没力量，有钱也难有力量。即使是无产者用暴力革命和生命流血打出的天下，最后仍然不过是改朝换代后的官本位天下。

人民要人民主权立民法，要资本位天下，只有资本位，只有资本主义，只有自由民主的政治

制度，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人穷志短，没钱没地位，无产者无力量，说话官不听。自由民主不能没有钱，人权不能没有

钱。没有钱，哪能自立、独立？鲁迅之所以成为斗士的鲁迅，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因是因

为他当时的收入每年达16万多，充分的财力使他能够不求不靠不怕，专心于独立思考，奋

力战斗，掷匕首、扔投枪，为所欲为地打击吃人的“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等独裁专制。

中国人，致富吧！有钱有力量，有钱腰板硬。确立人民主权立法吧！争做人权阶级、资产阶

级吧！无人权者无资产，有人权有力量。有人权就是有产者，它必会派生更多财产。自由和

人权盛产有产者，资本主义里人民都是广义的资产阶级。摆脱独裁专制奴役，争做自由人，

做自己自由劳动力的主人，至少拥有劳动力资产、财产。否则，集中营里，一个“井田人”

而非自由民，一个“单位人”而非自由人，劳动不能使人民成为有产者，创造了财富也不是

自己的，会被公有化名义私有掉，高尚因为被独裁专制官本位低级地利用而“空洞”、虚无缥

缈。

象自由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基础一样，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也少不了自由民主，并且它们

都必须发展经济、获得利润，以此保障、推进人权。民主的一大核心是个人可以依据市场的

自由竞争机制赚取利润，创造财产，政府则被选举、雇佣来保护个人财产，及其他个人人权。

没有人民主权制度保障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表明，它的一些做法和结果，与古时因

改朝换代而人民财产被肆意没收没有什么太大不同。

人民主权立法很重要，资本主义很人权，资产阶级很重要。中国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太多了而

危险，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太少了而危险，对自己危险，对国际社会也危险。中国不是私有制

太多、太可怕了，而是私有制太少、太不发达了。中国不是资产阶级太多了，而是富人、中

产阶级、资产阶级等太少了。中国经济的麻烦独裁专制官本位党政特权大于人民主权，在于

“官法官商”大于“民法民商”，在于一切中国人的个人人力资本、资金资本、技术资本、文

化资本、祖传资本、管理才能资本、信息资本等，太难于越过独裁专制生产关系而太难转化

为发展经济的生产力资本了。

有人说“中国富不富，关键在于中组部”，不仅是期望中组部能否选任能人，其要义还在于中

国国家和人民的富裕必须冲破党政官本位这道关卡，要形成党法官法小于民法、党政官权小

于钱权资本权民权和党政权小于法权人民主权的社会价值观及其运作机制。如果中组部纯粹

是一个人才公司，猎头公司，或者干脆取消它对中国人才资源的配置职能，并转由市场主导，

则中国必然人尽其用，国富民强。

当今中国，社会的麻烦不仅仅在于党权官权大于国权人权，党法官法大于国法民法，如把四

项基本原则“四个凡是”塞进了宪法后，使党政独裁专制权大于法权民权，它还在于“党政

权大于钱权”和“党政权大于资本权”。显然，利用执政党的权力把自己置于宪法规定的独裁

专制地位本身是违反人民宪法的。资本主义法律不是如宣传的那样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而

是给予每个人成为狭义资产阶级的权力，鼓励人人成为资产阶级，而是服务于保障全体人民

主权而限制、监督官权等各种特权。它管官，管特权，统治官，统治官本位，而不是如独裁

专制的法律主要是统治人民。

中国人民不是吃了资产阶级太多、资本主义太发达的苦头，而是吃了资产阶级太少、资本主

义太不发达而独裁专制势力太大的苦头。说白了，中国人民没有吃自己钱多或他人钱多的苦

头，而是天天在吃某些党政机构、某些人权力太大而又不受制约监督的苦头，即吃了党政特

权大于人权的苦头，吃了“权大于钱”和“权大于资本”的苦头。中国人民的麻烦在于自食

其力并创造就业与财富的资产阶级太少了，吃财政饭而可任意施展权力不是来自人民委托而

是来自上级委派的权柄的党政官僚体系太大了，在于吃纳税人饭者可以任意支配纳税人。

唐朝时，一个县只有一个县太爷，如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全国只有643名官员，那

时的中国却是世界首富。现在的中国，一个县五套班子，有四项四个凡是、三讲等最大的真

理担纲撑腰，却连四个现代化也支撑不起来，甚至遥遥无期。除了是人口大国，除了是党政

官本位体系最庞大的大国，除了是执政党拥有最多人数的大国，除了是政治思想教化大国，

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大国，除了是一人可以统辖最多臣民与党民的大国，除了

是越打扶贫攻坚战而贫困人口却越来越多的大国，除了是有最多的权力最不受监督的大国，

除了是腐败最多最广泛最无孔不入的大国，除了名义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实际上无产阶级

人权最无保障的大国，中国——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什么大国也不是！

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民等纳税人及其国家民族的悲哀。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人民的贫穷而富裕，会因为人民主权的弱小而强大。

中国落后、

苦难、被动挨打的要害之处在于缺少资本主义，缺少私有制，缺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在

于多了独裁专制制度，多了统治当局及其官本位，在于本应由人民自由投票选举委托主权产

生的政府是用独裁专制方式产生，并不接受人民监督。

全中国无人权者，联合起来！争取人权！争做有产者！

争取以人民主权立民法，这是人民最大的资产！这是保障人民一切资产的资产！

让我们用尊重人权的方式获得人权！让我们和平演变！两千多年的农民战争、暴力革命，从

来是流人民的血，成全统治者的江山，暴力从来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权，

人民的血肉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让我们非暴力，它是武装力量的非暴力，是军事警察力量

的非暴力，是一切国家机器的非暴力，是政党的非暴力，是政府的非暴力，是政权的非暴力，

是强权者的非暴力，是统治当局的非暴力，是全体民众的非暴力。总之，不要暴力，而以和

平，以全民和解的和平非暴力自由民主大进军赢得人权！

赢得人民主权立法的国家！

（7）目前，独裁专制者们害怕人民富了，防范资本主义和私有化，也害怕人民穷了，搞什

么“民心工程”。但由于他们看不清或有意回避人民人权事业的前进方向，这些都是“瞎子点

灯，白费力气”。民心工程不是对人民的施舍与忍让，而是还政于民，让人民自己行使自由民

主的人民主权。

整个社会里，人民对现政权怨声载道，经济宽裕者不喜欢它，经济不宽裕者不喜欢它，非法

乱纪者不喜欢它，官风不正者因为是受害者也不喜欢它，人心思变。为什么？不分彼此，因

为所有人的人权都被一党独裁专制悉数“集中，集权，极权，统一、统制，一元化”，因为所

有人民的自由民主的人权权利都不宽裕，因为所有富了、穷了的都要民主革命，因为富人穷人都享有平等的天赋人权，因为人民急迫需要的是中国人权工程。富人不是罪人。独裁专制反对的，是人民自由民主需要的。所有的人民，都是要革独裁专制体系的命，真正实现人民主权回归。

让人民联手吧——富裕人民即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全体国民继续人民民主革命吧！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进一步：全世界人民主权，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确保任何政府政权按照人民主权运行！

有人总结历史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力量薄弱，资产阶级过于软弱，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很快被旧势力吞噬。而无产阶级则当仁不让，“成功地”领导了中国民主革命，并把它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革命）。但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民主进程表明，面对强大的独裁专制势力，任何一个社会阶层（阶级）都不能单独领导、完成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任何一个阶层、一种思想、一个党派等对另一些阶层、思想和党派等的排斥、专制更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缺少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参与的民主都不是完整的民主。任何人都不可能用不民主的手段获得民主，更不可能因为残暴而获得民主。只有全国和解，只有全民和平平等的自由民主，才是真民主。

为保持一党独裁专制地位，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排斥、剿杀共产党，它最后只得偏安台湾一隅；现在，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让大陆人民与民主党派实质性地参政，另一方面用“一国两制”排斥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人民与党派参与大陆即整个国家的治理，也是行不通的。否则，共产党起于民主，也必将败于拒绝党内和国内民主，重蹈国民党 1911 年辛亥革命至 1949 年之覆辙。

中国民主不是部分人的事，也不是“一国两制”规定下的个别地区的事。中国民主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所有人民共同参与、领导，并完成。况且，人民之间本身没有敌我之分，自由民主革命本身就是所有人的人权事业。我们不要陷入 1976 年以前的因阶级划分而形成的“挑动人民斗人民”的圈套，只有掌握社会公共权力者需要我们监督、防范、制约、调整，只有独裁专制才是人民的共同敌人。只有所有人民联合起来，实现民族和解，全国和

解，人人和解，不分意识形态、种族、地区、思想信仰、宗教、男女等差别，人人平等参与

自由投票选举，选举出类似过去所说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更好地完成中国民主革命，那才

是巍巍大中华。

站在现在，回顾中国当代史，中国两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如果有一个党在控制

中国局面的时候，能够拿出象对待日本那样的宽宏大量，主动屈尊附民，与中国各民主党派

和人民团体联手协作，成立中国民主联合政府，那中国绝对不是今天的中国，世界人权事业

也绝不象今天这样有一个大大的覆盖了 12 亿人口的盲点。

当年，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执政时排斥代表农工等的共产党，并极力剿杀之而后快，代表

农工的共产党执政时则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也是极欲“斩草除根而后快”。除了保持

一党独裁专制的需要，我们依稀看到过去“仇杀心理”的残存。这样相互仇杀造成的民族疤

痕、国家损失、社会恶果、人间悲剧等远远超过了外敌入侵的危害。从根源上讲，所谓海外

华人难以团结等实质就是国共两党誓不合作、海峡两岸被分治的结果。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都是人民么。也许，这类“人民内部的彼此仇杀”正是“窝里

斗，同室操戈”等国民痼疾性在中国政党政治反映。难道不同政见的中国人一定不能彼此和

平共处、团结奋斗？难道不要和解要分裂是中国人的天性？不！这是由于长期的独裁专制的

压抑使人民容易掉入“非此即彼”的反民主的陷阱，把“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求同存异；

和为贵”等祖训忘得一干二净。

反人权的独裁专制赢不来人权！

目前，虽然社会生活中不强调《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关于“人民”和“人

民的敌人”定义了，即：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

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但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大陆的一党独裁专制政权对资产阶级和

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和非共产党的事物仍然采取抵制态度，怀有极大的戒备、反对心理，

仍然在实质性地推行上述那些关于“人民和人民的敌人”的定义。

如民主的一大特征是人民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但一些反民主反人民的口语、教条仍在充斥

媒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么别的思想、其他真理和成功的方法经验都不能在中国实验、运行、通行？那么人民永远只能“别无思想，别无选择”了？那么不赞成社会主义就是不赞成救中国了？那么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对救中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不赞成、不加入共产党就是不赞成救中国了？那么不保卫共产党就是不保卫中国了？那么，反对共产党或者成为共产党的反对党，则一定是反对中国了？那么，总之，凡是非社会主义、非共产党的，则一定是非中国的，与中国有害的？果如此，那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项大帽子压在头顶的“一国两制”太可怕了，其“允许人民选择另一制度”的民主意蕴充满奸险，完全行不通。香港、澳门、台湾岂不是中国的祸害？非此即彼，不是中国被它们祸害掉，就是它们祸害掉中国？迟早要把社会主义强加在台湾、香港、澳门头上，加在每一寸中国土地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嘛。显然，如果不是以建立民主中国的姿态推行“一国两制”，那“一国两制”的后果不堪设想。而不堪设想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加强一党独裁专制的过程就是增大肿瘤、为中国深埋隐患的过程。

（8）如今，国民党享有决定性发言权的时代灰飞烟灭，主动权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但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如当年的中国国民党一样，由一个人民民主革命党蜕变成了一个反对人民主权的保权党、独裁专制党。如今的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主席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的两回事，虽然我们遗憾于毛泽东主席没有能够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治体制去实现人民主权，但我们仍然有理由佩服毛泽东主席大胆大识地把继续人民民主革命的大火烧向他认为大搞官僚主义、蜕变成了人民的老爷的部分党政官僚主义阶级。不推行三权分离的代议制多党自由竞选民主政治，又不可再用“文化大革命”一类的大民主运动制止独裁专制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种种丑恶现象，那共产党及其大陆政权如何能真正有效克服、剔除党内存在的反人民的毒瘤？用什么打击独裁专制势力而保持党的人民性？用什么推动三个“有利于”，使自己真正成为人民权益的“三个代表”？显然，只有

用人民主权改造共产党，改造中国政治，改造国体，使党员享有人权，使全体国民享有人权，才能达到目的。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共产党增加紧迫感，立即着手，先从自我做起，推行党内多派民主、政权多党民主、中国多区民主，最终建立一个民主中国！中国需要戈尔巴乔夫！需要叶利钦！这不会是一个复杂动荡的过程！文革是一夜之间发起的，也是一夜之间结束的；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崩溃的，起于 1978 年的农村改革也是以夜之间波澜壮阔的，六四也主要是靠一夜的血腥堆砌的。也许我们太天真了。有人说：共产党铁血江山怎么能拱手相“让”？还有人已经说了：不要忘记，这是三千万颗人头换来的！可是更不要忘记，那是人民的三千万颗人头，是人民追求人权解放事业的流血牺牲。不要忘了，新中国的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共产党独有国”。如果“共产党打江山共产党坐”，那现政权与“大清江山大清坐”的王朝性质有什么两样，与无数太平军打天下却“非洪姓不得封王，太平天国姓洪”有什么两样？这是与违背主权在民的狭隘观念。它哪里有一点人民民主的意思？人民支持共产党，共产党代表人民打江山，但代表人民不是反仆为主独裁人民，独裁人民江山。人民打的江山人民主权坐！这样的政权转移，不是独裁“让予”，而是“回归人民”。“人民代表”或“代表人民”已经不能自封了。过去，代表人民的共产党是代替人民主政，现在人民要“亲政”，通过自由投票选举“钦定”立法者、执政者等名单，并只对获得大多数人民信任的党派和个人委托人民主权。戈尔巴乔夫可鉴！前苏联可鉴！德克勒克可鉴！南非可鉴！也许，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我们不该说它的不是，更不应该“鸟尽弓藏”，而应该讲“良心”。但国富民强和人权是最大的良心，是党员人民和非党员人民共同的最大良心。但无论如何，一个政治局、一个人对一个拥有 6000 万成员的党的独裁专制是对党员的人权与党权的剥夺，至少是不正常的，至少是容易犯错误，而且难以纠正错误的；但无论如何，一个党、一个政治局、几个常委，最后是由一个人对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 12 亿人的一切事

情（如人民思想、国家统一等）的独裁专制至少是落后时代、违反民心民意的，是极其危险的，至少是容易制造灾难，而且无法弥补、挽回的。

历史已经表明，独裁专制是人民、国家与民族，乃至世界的悲哀，也是党和党员本身的悲哀，唯一的受惠者只是独裁者们。没有宪法约束“党的内部组织必须符合民主原则”是个重大缺陷，它使个人可以凌驾于全党之上，党可以凌驾于全国全民族之上，容易造成“一人犯错，全党吃药”、“一党犯错，全国吃药”的悲剧，它容易造成全党全国对一人一党的盲从迷信，它容易造成“一人一党提倡、指向那里，人民才能打向那里”而致使人民丧失创新精神和国家活力。退一万步讲，即使对中国及人民的一党独裁专制是“存在即至少有一点必要或合理”，易于集中力量与意志办国事民事，但一人对一党的独裁专制则是完全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合理性的，是完完全全有害的。这只能败坏这个党的风气，损害这个党的形象，削弱这个党的执政能力，丧失它的民心，危机它的生存。

如同我们希望国家昌盛，人民幸福，我们也希望一切党不走弯路，多一些成熟，少一些被个人当做实现独裁专制野心的工具的危险性，并使国家、民族和人民从中获益，党也因此被人民热爱，被选举为执政党。人民希望政党的成熟与坚强有力，但它不能大于人民。这是一点旁白吧。

惟如此，中国才能真正摆脱专制制度之羁绊，实现四个现代化，走向民富国强。而非民贫官强，民穷党富，小官小富，大官大富，核心总富。

4、现代化核心：制度现代化

（1）1989年6月4日2时许，北京天安门广场与城楼之间，枪声、火光、天空的弹曳，血腥、硝烟、惊慌的人民，交织出战争的恐怖。我们感到中国在地震，天安门城楼在颤摇。

民主引导人民前进，人权引导国家富强。历史看到中国人民继续在人权事业的光荣与梦想中奋进。

四十年前，伟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他还高声衷心祝愿：“人民万岁！”那时刻，天安门城楼上站满了从独裁国民党统治下投奔人

民民主领袖共产党的中国各界、各党派的民主人士，还包括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统治的各方面实力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人民共和国，多么闪光的大名！它推崇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人权。它包含了

“人民主权立

法、人人自由平等、依法治国”等至宝。它还一改沿袭了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纪年法，不用

宣统三年、民国四年等，以公元为新中国的纪年，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上与世界和人类同步，

汇入进步大潮。世纪末，美联社主办的由36个国家71家新闻机构选出的20世纪20件

大事中，“1949年，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政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得67分，排名

第19位。中国国家或政权形态终于超越了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袁世凯、蒋介石等领

导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封建独裁朝廷性质。千百年以来的中国人民革命不正是为了建立一个

真正人民主权的国家吗？不正是为了建立一个人人与族族享有自由、平等、和平相处而“共

和”的国家吗？

“人民万岁”多么激动人心！“万岁”本来是封建皇帝的专有称呼。现在，新中国的缔造者和

他所代表的集体把它还给了人民，中国人民可以万岁了！如果有皇帝，那一切人民都是皇帝，

所有人民一切平等！这不正是5000年来中国人民追求的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权精神的体现

吗？据当时站在毛泽东身后的人回忆，毛主席还把“人民万岁”具体分解而高喊了：“干部同

志们万岁！”、“工人同志们万岁！”、“农民同志们万岁！”、“学生同志们万岁！”、“解放军同志

们万岁！”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还能万岁了！多么自豪、兴奋！这不是人类人权事业在中国的

进步，又是什么？

然而，这是真的吗？人民能够相信自己的耳目？不，以战争民主建立政权，拥有民族主权和

人民主权意识，却不以和平民主政治制度做保障，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仍只能打

滚于封建独裁专制之家国、党国。官方宣传“中国完成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才完成的从

结束封建帝制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跨越”，只能是吹牛。

实际上，仅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人民、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的革命等等，都因为没有建立民主制度而失败了。

民主革命的血肉只是改变了帝制帝位的姓氏，如爱新觉罗氏、太平天国洪氏，国民党以“一

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六四当局则以“四项基本原则、

一个领导集体、一个核心”推行了主权不在民的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

中国人民仍然被独裁专制！中国仍是帝制，帝位尚存，帝人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嬗变成了

“四项基本原则立宪国”，“江三讲”国，核心国。凡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不一致的经济、

文化、教育、科技、宗教、体育等人士，凡持不同政见者，甚至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者，均

无立锥之地，或被迫逃亡、流亡，或被关进监狱、打倒，乃至迫害致死。这是为什么？是谁

背弃了“共和”？人民从生到死经历无数个官员的管理，但哪个官员，从村长到政府总理、

国家主席，是人民自由投票选举出来的？人民的公民权，人民的言论、人身、财产、信仰和

政治等自由哪里去了？中国民主哪里去了？

回顾历史，从明朝到清朝，从清末近代的洋务运动到新中国现代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

从“器变道不变”到“两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太平天国到名义被盗用了的资产阶级

共和国的中华民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民党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到共产党

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究竟帝制、皇帝等是否离开了中国舞台？中国人民民主事业究竟有多大

进步？从扳倒“四大，两个凡是”，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讲”，中国民主化进程究竟取

得了什么成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从独裁专制统治下站起来了吗，获得了自由民主？人

权受到了有效保障？实现了从“主权在王，在党，在个人”到“主权在民”的飞跃？

党政官本位大于人民本位，特权大于人权，“官”大于人民，城市人民制度性地优于农村人民，

“共和”，“共和”在哪里？“共和国”在哪里？官位就意味着特权，官阶越大，特权越大，

一直大过法律，“人人自由平等，依法治国”哪里去了？人民站起来了，可仍然是独裁专制官

本位制度的奴隶。肉体直立是从猿到人的进化，思想直立才是现代人的标志。中国人民不愿

做趴地的奴隶，也不愿做站着的奴隶，我们要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享有彻底的人权。我

们不仅要站起来的肉体，更要站起来的精神，直立的思想与自由意志。
但辛亥革命后的 78 年来，我们仍然被剥夺了天赋民主与人权，我们仍然被压迫在独裁专制
体制下卑躬屈膝。从袁世凯中华帝国，从国民党中华民国，从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尊孔
是为了独裁专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是为了搞独裁专制，打着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美名也是为了坚持独裁专制统治。人民始终看不到人民主权立法的人权正义，历史老人
也未发现自由民主，惟见独裁专制一脉相传。
台湾刚刚代表中国民主化了，有人气得直想揍它！
作为曾经的人权解放者，统治者可能说人民得寸进尺。但中国人民不仅崇尚从外国列强手里
夺回的民族主权，也决不停止从国内的一切独裁专制者手里夺回人民主权。人类的历史就是
人类自身不断进取完善的历史，就是人权进步完善的历史。解放者不能屡屡蜕变为无法无天
无人民的统治者，领导者不能总以有功者自居，走向人民民主的反面。
恰如毛泽东主席所说，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是人民解放了人民自己。
恰如甘地所说：“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建立在剥夺个人自由的基础上。”
法西斯暴政，退隐吧！独裁专制，见博物馆去吧！还我民主，中国人民要站得有尊严，活得
有自由意志。
解放者们，一如既往吧！继续蔑视、横扫独裁专制，继续解放人权吧！

（2）过去，你们从其它统治者手里夺回被没收的人民主权。现在，人类进程需要你们把自
己手里的统治权力进化、演变为人民主权，难度更大了，是不是？我们不否认任何政治力量
都会致力于社会发展。但发展有个方法与方向问题。
发展的一个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先行官。
发展归根
结底应当是社会发展，而社会发展的本质就是以个人和全体人的人权为中心的全面发展。它
既包括经济的物质文明，还应该，且必须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文明。
“民以食为天”是远古、蒙昧时期的人权观，“匹夫不可以夺志”人权观已经判定了它的死刑。
在世界一日千里的今天，“能让 12 亿中国人吃饱肚子”已经不是什么值得说山的事情，这是
外界无聊的吹捧，是麻木中国人民的客套话，是“捧杀”。如果中国人民永远满足于吃饱肚子，
并洋洋自得，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执政党只有确保人民吃饱肚子的治国能力，那

它还有什么值得炫耀，该不该让贤？这是一党专制不求进取，只给人民基本物理物质生存人权而阻拦人民精神思想生存发展人权的借口。现在，中国人民不是低贱得只配吃饱肚子，中华民族以人权为天，非以食为天也。

统治者对人民的训导是，“有吃有喝就得啦，政治么，国家大事么，你们别掺和啦。选举、监督、弹劾一类的玩意，你们就别要了。我们不怕累，我们喜欢做代表，替你们做主，有我替你们指导方向，教育教化你们，有我替你们思考就行了，国家也足以，国家缺少汝等群众（不是公民）照样发展。”

特色，特色，独裁专制者们近年又抛出了什么中国特色的人权。难道只配吃饱肚子就是中国特色的人权吗？世界范围内，人们的肤色、语言、起居习惯等可以不同，但所有人的物质生存和精神发展人权都相同，所有人的尊严完全相同，所有人的人权完全相同。没有专门的白人人权，没有专门的黑人人权，也没有专门的中国人人权，各国的人权标准应该是各不相悖而并行一致的。

“一个中国”范围内，没有大陆特色的人权，没有香港特色的人权，没有澳门特色的人权，也没有台湾特色的人权，没有“一国两制”下的两种人权。巍巍中华，只应该有一个人权，即统一的中国人权，这是与人类人权事业大道同行的、价值标准完全相同的人权。除了衣食住行外，它们都包括立法权，自由选举自己代理人的人权，还有对一切政党、政权、政府提建议、监督、表示异意，甚至反对、罢免的人权，应该享有充分的任何公民权、言论、人身、财产、信仰和政治等自由权。

独裁专制下的诸多特色，都是统治者强贴在中华文明和中国国家形象上的狗皮膏药，是剥夺人民主权的“吃人”基因，是强塞给中国人民的耻辱。有了诸般先入为主的臆断的特色，所以多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文明目前远远落后于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所以固守人权差距的“一国两制”成为中国统一的障碍。全国人民精神文明的体制、制度等外部环境的改善，远远滞后于物质生活的提高。这些都是因为独裁专制制度是社会最大的不文明，它们妨碍了人民的生活文明和全社会文明。

人类发展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个体生存完全依赖于共同体，它造成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维持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压倒了对个体的个性发展。到商品经济占据统治地位时，共同体可以瓦解，有时还必须瓦解。个体可以单独生存，有时还必须单独生存。这就形成了孤立的个体。这个孤立的个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人权利，这是前一阶段的个体不可比拟的。如十九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劳动者的个性，首先作为“自由”雇佣工人形式表现出来，他在资本要素的运作过程中，因社会生产及企业的兼并、破产等被迫频繁更换自己的职业，从而多方面开拓发展内在的才能，其个性就这样亦步亦趋，在社会发展需求中获得发展。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新技术革命，如办公网络化、单个化等，对个性发展提出新挑战。未来世纪的人，应该除掉依附性，增加独立性，在本质上必须是有个性的人，是以民主意识为精神文明之首要特征的人。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这面挡箭牌，庇护了脚踏实地、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人们。然而，遗憾的是，人们理解它，普遍感到它更多的是指物质文明的发展。但实际上，更为硬道理的硬发展，首当其冲应是人脑软件的精神的发展。人的精神文明，不仅仅是会背诵唐诗宋词和礼貌待人，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人性的解放，人性的发展。也就是人的自我觉悟的提高，从被约束到自由伸展，到自我做主，也就是到“民主”。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人本精神，就是以人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各处潜能的发挥，促进人的个性的丰满，从而促进人们德智体美全面提高，并推动社会进步。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究竟是以“两个基本点”促进经济建设，还是以经济建设固守它们所代表的独裁专制统治制度？中国应当倡导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不以人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必然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肠梗阻，使全社会畸形发展，最终难以推动、顶扛现代化发展。

对于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彭定康当年7月1日发表在英国《独立报》上的广播讲话说：“过多的亚洲国家忽略了基本因素……我们赞成家庭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

统治者家族要中饱私囊。其次，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发展。……同没有独立和公正的法院的封闭社会相比，实行法治的公开社会从长远角度看更可能取得成功。”对于党国而言，这“家庭价值观”的背后便是“党国价值观”。

罗马俱乐部前主席佩奇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也分别在《人的素质》和《21 世纪的警钟》中指出：当今时代要求的人的思想、观念、道德素质的改善和变革，绝对不同于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是完完全全的“人的革命”。他们认为，如果说二十世纪“财富源于物质资源”，那在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高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二十一世纪则将完全进入“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崭新时代。地球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则是彻头彻尾的人才和国民素质的大交锋。

国内，有学者提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在“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之后，应加上一个更重要的“无文不高”，认为生活中的“含文量”，即文化因素，是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评价指标。我们认为，还应该加上“无人权不优”。因为人民做主，人民的自由发展，才是衡量社会进步程度最终评价指标。公民的民主意识，社会政治体制、法律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上层建筑的民主含量，这一切赋予给人民的民主权力的程度，亦即民主，才应该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体系中独占鳌头。

显然，人力资源的主要指标是人权实现程度。民主在个人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含量，是人才和国民素质的最重要指标，也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指标。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权，不仅是理想，还同时是工具。奴隶与自由人，不可同日而语。不能自我做主的人民，没有个性充分发展的人民，受到统治压抑的人民，决不可能充分发挥个性、才智。还权于民，还主与民，藏富于民，才是富强国家、进步民族的明智的根本策略。邓小平不愧是一流的世界政治家。他曾经指出：“我们的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但是，他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己受到局限，却没能超越独裁体制的框框，使蕴涵在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之中的生产力难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甚至阻碍这两者的活力。

前几年，有学者研究比较，发现采取了民主制度的发达国家，科技资源配置与科研开发大都采取企业主导型。例如九十年代初，美国有 75.4%、英国有 68.5% 日本有 64.8%、韩国有 54.9%、泰国有 51.7% 的研究开发人员在企业。而同时期中国（大陆），42% 的研究开发人员在政府部门，22% 的在高校，两项累计为 64%，企业仅占 27%，余为其他，这恰与发达国家相反。

而且更糟糕的是，同样是由于独裁专制制度的僵化性、压抑性与缺乏激励机制，导致了研究机构科研成果的可怜性。国家科委一份研究报告公开披露，我国有近一半（44.62%）的研究开发机构，一年中竟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平均每个研究开发机构一年只获得 0.09 项发明专利；97.4% 的研究开发机构的被应用的科技成果不超过 10 项。与此同时，须不知，如同以往只能学习、应证、研究、发展“经学”意识形态而使中国古代之自然与人文科学大大落后一样，由于一党独裁专制意识形态的禁锢，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远远逊于自然科学技术。过去最发达的是“经学”，现在最有头脸的是变了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没办法，独裁专制意识形态永远是“显学、玄学”。

中国人不笨，当华裔科学家在美国等民主国家大展才华的时候，同是中国人，为何判若异族？面对中国（大陆）科技界的这份羞辱，谁应该脸红，谁该承担责任？是科学家，是科研机构，是科委，还是制度？不言而喻，这个尴尬，这份耻辱，非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制度独裁莫属。

所以，大展鸿图，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提及国民素质，我们不能忽略人才的民主内涵与外延。我们不知道伟人邓小平所指的劳动者素质是否包括了劳动者身上的民主内涵，是指单一狭义的科技素质、业务水平、创造力、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当然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思想素质等），还是有意无意隐去了民主成分。现在看来，他的继任者江三讲是不会给国民素质注入绝对需要的民主成分了。

（3）论及近代以来的中国落后，多半认为其主要表现在国家始终没有能够完成从传统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任务，并始终处于这一转型的过渡阶段。但是，实现这一转型的阻碍

何在？我们为什么总在过渡，总迈不过这一坎？

关于中国陷入这种落后的原因，历来有文化延误与制度延误之争。我们承认，文化与制度相

互作用，两者从来不可单独承担历史责任与荣誉。而且，中华文化与文明是有官性统治特权

与民性人权之分的，文化延误不是全部中华文化的延误，是其中官性统治文化的延误。而制

度延误，则是主要的。

任何形式的独裁制度与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相比，更具有强制性、封闭性、压抑性、愚民性。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各种形式的独裁体制政权在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同时，顽固以“器变

道不变，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坚持独裁专制制度这落后的生产关系，不吸收民主力量，

造成了我国体制僵化和改革滞后，并在政府与人民之间造成日益趋大的裂痕。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根源在于制度的落后，是拒不接受民主的落后。近代中国的屈辱，根

源是独裁专制制度强加的屈辱。近代中华民族与中国人的不幸，根源是帝制帝位帝人赖于历

史舞台的不幸。

落后的一个表象是没有实现现代化。究竟什么是现代化？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

经济现代化，最后通过政治民主化得到全面实现。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功利、片面的，值得

商榷。它把现代化仅仅看作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过程，只强调经济的增长。

而我们认为，现代化并非仅是孤立的经济发展过程，应该是一个涵盖经济、思想、体制、

文化的多方面过程，是涉及人类内在思想与外部物理活动的所有领域的现代化。同时，现代

化还应当是人们心理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等趋向现代化的改变、创新过程。况且，如果把政

治民主、政治效率、体制结构科学化打入冷宫封杀，现代化生产力系统也会由于运转不灵而

劳动生产率低下，市场经济也会演变成为腐败的独裁权利经济，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也会被

独裁专制体制的天生宠儿——腐败分子们贪污、挥霍殆尽。故此，虽然谁也不能否认改革开

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它在低层次的时候取决于资本的流入、技术的转移、人口素

质的提高和经济市场化运作等，而只有当这些繁荣能取自于自由民主、并最终能保障自由民

主等人权时，那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开始。

中国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关键中的关键。而其中，民主意识又是人的现代化的关键的关键。

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现代化国家必须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现代化，既不能象用现代枪炮演三国演义那样可笑，

也不能象在秦始皇的陶俑上披挂巴黎时装那样滑稽，国民必须是包装有现代化软硬件的国民。

二是如果制度等外部社会环境没有赋予公民们以自由、民主与人权等现代化精神意识，从领

袖、部长、法官、军官、经理、工人、农民、学生等，就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人，

也就无从真正获得物质建设成就。

所以，当邓小平意在科教兴国，创造性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候，尽管我们非常赞

成，但我们更愿意修改些许，更应该更上一层楼，我们更应该提出民主制度是很好的、科学

的生产力之催化剂与载体，是第一生产力的第一引擎，而最终，人权就是第一生产力。我们

更应该进一步实施自由兴国、民主兴国、人权兴国战略。四个物质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国家

制度的民主现代化和国民思想精神的民主现代化。这六个现代化，才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生活

的真正现代化。

现代化的核心，是国家政治制度现代化，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核心便是民主政治。其次，才

是教育、科学技术、文化、经济技术、体育、个人等的现代化。缺少现代化的生活，不能算

富足；缺少民主的国家，不能算是现代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制度

的生产关系已经拖累了劳动力、科学技术、管理等中国生产力要素的现代化。

我们不必匆忙断定哪个制度优秀，哪个低劣，同期横向比较的结果，能说明问题。战后的日

本、德国、意大利，中国、东北亚诸国、前苏联、东欧诸国等，都是满目苍夷，资源匮乏，

现在，事到如今，谁在废墟上爬起得最快，站立得最好，建设得最好？

又如中美对比。中国是封建独裁专制历史最长久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近代以来第一个民主

国家。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首航中国以前，美国与中国没有直接往来，甚至美国国父

乔治·华盛顿不清楚中国人究竟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但却对文明礼仪之邦的中国尊敬、羨

慕不已。1841年12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昆西·亚当斯发表演讲，指责清

帝国“完全否认其他国家和它本身的平等”，视美国为“奉命维谨、纳贡称臣的外夷”（抛开

盲目自大，清帝国多少还是有实力做后盾的。据经济史学家们说，尽管内部已经腐朽了，那

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世界第一。）本杰明·富兰克林对中国推崇备至，希望美国能在较短

时间内拥有同中国一样的资源和财富，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引进中国人的勤劳、生活艺术和

改良农业的方法，美国很快会象中国那样遍地炊烟”。

可是，当清庭等家国、党国坚守“祖宗成法不可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美国表现

出巨大的创新勇气，不断为维护自由民主体制而努力，并且发展它们。一系列确定人民主权

的法律陆续出台，并且在历时四年的南北战争中，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击败了落后的一

方，北方的自由劳动制度击溃了南方的独裁专制式奴隶制度，使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原则与

人权事业得以发扬光大，又反哺综合国力迅猛增长。仅仅 200 来，在民主体制的河床上畅流

的美国一跃而起成为超级大国，成了带领地球上的人类，用哈勃望远镜探索宇宙的先驱。

朝廷等统治者常常欺骗人民，说中国落后是外国入侵造成的，把矛盾外移，企图利用人民

的爱国热情保护它的统治地位，闭口不谈正是因为独裁专制制度才造成了中国落后的被动挨

打地位。

很难想象林肯的北方失败了的推行农奴制的美国，或南北相安无事、实行“一国两制”

的美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至少，它不会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如果

中国大陆一直用抱残守缺的态度，推行“一国两制”，我们将很难看到 21 世纪中国龙的腾飞。

大陆人民的创造性和生产力必然受到极大的禁锢和摧残，香港、澳门或者台湾等“民主三小

俊”如何遮拦大陆“独裁专制一大丑”，如何执拗得过大陆大面积的独裁堕落和专制腐败。况

且，“三小俊”还有被“一大丑”吞吃之虞，那对民主统一中国的事业更是灾难性打击。

另一方面，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的竞赛结果也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

1835 年的分析，可以佐证自由民主等人权制胜独裁专制暴政的结论。

他说：“虽然出发点不同，世界上有两个大国似乎在走向同一个目标，我指的是俄国人和美国

人……美国人同他们面临的自然界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的敌人则是人类……因此一个国家
靠犁头进行了征服，另一个国家则靠宝剑进行了征服。盎格鲁——美国人靠个人的兴趣来达到
自己的目的，并使公民的无人指导的努力和理智有自由发挥的机会，俄国人则把社会的全部
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前者的主要工具是自由，后者的主要工具是奴役。他们的出发点不
同，进程也不一样。”
当然，结果也不一样。对于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忘记毛泽东 1956 年 4 月 25 日政治局扩大会
议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
义”，“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
独裁专制统治当局常常误导国民讥笑美国历史短，由此推断它文化也短，思想也短，文明也
短，国家也短，民族也短。须知，人家是近代史以来历史最长的民主国家。它正是吸收了
人类政治文明和人权文明的先进成果，才站上了历史巨人肩，文化思想巨人肩，文明巨
人之肩，并不断发扬光大人类人权之路，才成为巨人。我们常说美国是座大熔炉，但它不是
对种族、思想、信仰、经济、生活方式等按照单一统一模式的冶炼，越练个越大，越练内容
越单一，而是自由民主原则下的各自发挥，相互影响，优胜劣汰，是越练越大，越练越丰富
多彩。而且，这般文化、思想、生活等的多样化、多元化、多极化，仍然只是表面上的繁荣，
奇妙深层次的精品是每位公民都可以平等地在这块土地上找到、感受、享有、行使人权尊严，
树立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信心，并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不断为自己，也为国家、社会、
民族贡献创造力和创新力。
必须承认，中国的落后，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间的差距，主要从独裁专制制度与民主制度
间的差距因袭而来，派生而出。依据近代史，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结论：美国本无奇，人权铸
造之；中国总落后，专制拖累之。而且，如果说日本的过去使中国唐朝师以徒贵，日本的今
天则完全使美国欧洲等师以徒贵。当今中国则因一直秉承、因袭国内外独裁专制制度的陋习
而落后、屈辱。

我们还可以从很多方面说明为什么大陆人民日子过得不如香港、澳门和台湾，为什么海外华

人回家看看就想走，为什么海外华人受辱之后不愿回大陆，也不愿向大陆而向别处求助求援，

为什么乡土观念极重的中国人落叶也不愿归根。这不是嫌贫爱富，原因在于中国人民之根被

“吃人”的帝制帝位帝王占据，在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不得人心，在于人民之家园被大小贪

婪的苛政猛于虎的腐败的官本位们所占，在于鹊巢被鸦占，被“一国两制”的另一制所占。

故而，中国人民有根不能落，有国不能爱，有土不能归，有家不能回。这是因为人民有啥不

能有独裁专制制度，没啥不能没有自由民主！

中国大陆自己的纵向比较，也能说明这个问题。1978年以来，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上来，并同时提出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目标。遗憾的是，经济改革尚可，但

政治改革太慢，而且几乎停止不动，时有回潮。政治慢马，乃至滞马、退马，早已牵连、拖

拖累经济快马的后腿，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好比两驾马车中的单匹马，分别被

“两手抓”中的一手各自抓住，不仅力量过于悬殊，而且常常是反向运行，致使马车不得前

进。亦即是固守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拖累了中国现代化，“两个基本点”妨碍了“一个中心”，

是所谓“两手抓”的精神文明建设妨碍了物质文明发展。

我们社会里，最大的精神文明应该是政治生活领域的文明，即政治体制的民主，政治体制的

文明。遵从民愿，服从民意，为民服务，人民执政，民主政治，是最大的政治文明，是人类

最充分的精神文明。鸟无头不飞，社会的一切在制度内运行。制度的生产力适应性优劣，也

即民主因子的多寡，决定社会的一切。

水涨船高，泥多佛大。人人是国家的主人，比一个总代表是好。人人有权自由投票，委托天

赋权力，选举代表，比强行代表好。《孟子·尽心下》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马克思是反

对独裁专制的。《共产党宣言》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更重要的是权力社会化，而不仅仅是生

产资料的社会化。所说的公有制，不一定是国家政权或者一个政党的单独所有制，而是公众

共同所有制，即大家都有，你有我有全都有。

具体来讲，权力的社会化是指社会中的成员人人有权力，即选举权，把自己的人民主权通过

选举委托给他人行使，参与社会管理，不是指权力集中于未经选举的少数人手里，或由独裁任命。政治方面，民主选举使人人享有政治权力得到保障；经济方面，股份制等使人人享有经济权力。没有这些权力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只能是虚假的，国有化成了变相的独裁指定化、个人化、私有化、专制化、腐败化。人民表面上是主人，实际上成了真正的单一劳动者，没有一点企业财产的所有、运营、管理、分配等主权，人民完全摸不到一点公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全民”影子。

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一个多层次本质关系的立体空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性的一级本质，它需要民主力量推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中间性的二级本质，它需要民主力量推动。“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终极性的三级本质，这也需要民主力量推动。总之，中国社会需要自由与民主。

可惜呀，改革开放“两手抓”，一手建设市场经济，以自由民主促进生产力发展，一手抓

“器变道不变”，固守现存一人一党独裁专制政治制度，以四项三讲等死保独裁专制的生产关

系。生产力的天生使命是打破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生存发展在于顺应生产力，我们“两手

抓”的使命正好相反：器变道不变，发展新的是为了保护旧的，发展新的生产力，保护旧的

生产关系，即用源自自由民主的生产力，保护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的生产关系。其最终结果是

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改革开放越深入，阻碍越明显。

先秦著作《尺子》曰：“鹿驰走，无顾，六马不能望其尘。所以及之者，顾也”。当今中国，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难以为继，社会矛盾普遍加剧，贫困增加，执政腐败增多，就是

四项三讲等“两手抓”、三心二意、三讲回头看等的结果。再看远一些，我们要这样“两手抓”，

即“道不离器，器变道亦变，道变器亦变”，一手建设市场经济，一手建设民主中国。只有它

们，才能保障人权，保障人权第一生产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总之，电脑要造，关键在于软件；高楼要起，关键在于图纸；个人要创新，关键在于自由；

民族要兴旺，关键在于民主；人民要幸福，关键在于人权；国家要建设，关键在于制度；中

国现代化，核心之关键在于制度现代化，即建立人民主权立法的自由民主之人权政治制度！

中国是有希望的。一天，儿子非常认真地问：“爸爸，美国只有 200 多年历史，而中国却有 5000 年历史。为什么美国比中国还强大？”我默看他一眼，从自由竞争、经济繁荣、资源丰富、科技发达、人民勤劳勇敢等很多方面做了解释，单单不敢从制度上分析、启发他，不敢从人权角度切入，担心他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被成熟的独裁专制者们擒获。他听后不甚满足。其实，我们有责任驱散孩子们大脑里的疑惑，我为自己有意避讳感到羞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为此羞耻？相信吧，一个幼稚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民族，迟早会解决这个问题。

5、新长城，新国歌

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的历次民主革命总是失败。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极右到极左，从结束文革到 1989 年民主运动等，都是失败，都败于“帝制制造帝位，皇帝们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它们最后总是把人民打回原形，从独裁专制制度长城及其两手抓的老窑里烧制出新的统治者，新的权贵、党贵，新的种党、种人，新的各地各级各行业各单位至高无上的大小皇帝，新的帝王之家。反帝爱国运动，赶走了长城外的独裁专制势力，也总是被搞成了“爱党、爱当局、爱政权，爱帝制、爱所谓社会主义，爱皇帝、爱核心，爱个人，团结在核心周围”，总逃不脱被独裁专制的厄运。中国统治者惯常称人民役为外奴是遭受殖民统治。那么，人民役为内奴，是什么统治？它是治民统治，它比殖民统治强？这些都是统治特权高于人民人权的奴役统治。但是，赶走长城外的敌人独裁专制，不是为了遭遇长城内的敌人独裁专制。反对殖民统治，不是喜欢治民统治。不做外奴，不是为了做内奴。从败因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断言：人民人权的最大敌人不在长城之外，而在长城以内，它们是帝制、帝位，和大大小小的皇帝，是多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及其原罪，是自封和任命而非民选的代表，是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制度及其长城。国外的帝国主义独裁专制殖民统治人民不要，国内的封建主义独裁专制统治人

民也不要。

中国人民不做经济贫困者，也不做政治贫困者；不做外奴，也不做内奴；不做洋奴，也不做

家奴；不遭受殖民，也不愿意遭受治民。中国人民从国外殖民独裁专制势力下站起来，也要

从国内治民独裁专制制度下站起来。而且外敌骚扰、入侵都是暂时、有限的，国内的独裁专

制治民制度才一直对中国人民人权事业危害最烈、时间最长，是最狡猾、最凶狠、最危险的

敌人，它总是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前进！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可是敌人在哪里？冒着谁的炮火？向谁前进？现在，

如同独裁专制统治者信奉的“守内虚外；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攘外必先安内，

防民甚于防寇；侵略者是皮肤病，人民反对独裁专制统治、索要人权才是心脏病；两手抓，

内紧外松保稳定”，中国人民也明白了。天下之祸，不论内外，均在治民。殖民统治是皮肤病，

治民统治是心脏病。只有真正由人民主权掌握了国家主权，才最终可以实现民族兴旺、国家

强盛。显然，民族主权必须回归到人民人权手里，亦即组成“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王，

在党，在个人”的政府，实现人民主权回归。

中国自由民主之大敌是独裁专制，人权之大敌是统治特权。国家之祸是独裁专制，是假民族

主义真独裁专制的帝制帝位。它们主要在国内，而非在外；人权之患，主要在长城之内，而

非长城以外。中国人民要“清除独裁专制制度，防统治者甚于防寇”。抗日战争时期，一声“鬼

子来了”，中国人民便拿起武器，一致对敌。现在，谁来了？是“还乡团”来了，是以皇帝为

首的官本位独裁专制统治来了，是中南海续接紫禁城又来了，是统治者以改朝换代的方式复

辟了。

不要忘记，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中，各界中国人民空前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奋勇追求

自由民主，痛恨腐败无能，反对一党制、终身制以及戒严等，所奉献出来的万众一心、同仇

敌忾之战斗精神，与投身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反抗外来侵略是毫无二致的。其

本质也是一致的，为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权和尊严，人民反对任何独裁专制统治，反对

外族、外来的，也反对本族、长城以内的。

前进！前进！奴隶们，起来！革命！革命！革命是为了保障人权，可革命本身不能保障人权，
即暴力革命或持续不断的革命、运动式革命等本身不能保障人权，革命而建立和平的主权在
民的民主制度，应当是保障人权的优选之科学办法。相形之下，近代以来中国人权状况一直
不佳，究其原因便是革命不彻底，革了旧统治者的命，却没能成功防范新统治者的出现。
革命，革命，究竟最终要革谁的命？不是人的命，不是任何人的命，不是富人的人，也不是
穷人的命，不是官人的命，也不是臣民、民众、群众的命，而是权力的命，是有权欺压无权、
大权欺压小权者的命，是权力滥用即权力原罪的命，是权力原罪得以孳生、嚣张的独裁专制
统治制度的命。这种权力可能是表面的统治官方的党权、行政权，也可能地下的黑帮、犯罪
团伙的命，也可能是金钱、信仰等权力的命。无论什么权力，我们都要防止它侵犯人权，以
大欺小，以众凌寡，恃强凌弱，防止它侮辱、侵犯、毁灭每个个人的任何人权。自满清家国覆亡、国民党党国以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革统治官方的党政统治权力的命。
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以皇帝、领袖、核心为首的官本位权力体系，它的存在基础是独裁专制
统治制度，它的载体是党政官方统治政权、权力机构及其掌权者。我们只有铲除独裁专制统
治制度，才能真正创立主权在民的民主中国，使党权、官权不再凌驾于公民权、国权、民族
权等之上，使它们不再是治民权、统治权，不能如妖魔那样祸国殃民，而是服务权，而是飞
翔权，由谁飞，往哪儿飞，飞多高，如何飞等，全由牵线的人民主权定夺。这些具体办法便是裂变、分裂、折腾、削弱、整治权力，分离它们，离间它们，制横它们，
监督、弹劾它们，定期易主等等，便是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新闻舆论独立等。

“前进！前进！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可是我们应当筑起什么样的长城？长城为谁服务？千百
年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不停地筑长城，1949年以来我们高歌国歌“用我
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我们也一直奋力筑长城。可筑长城、改
革开放究竟为谁服务，是巩固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制度，还是改善人权？在人民军队长城、政治思想工作长城、武警公检法法制长城、国家党政机构机关长城、经济

长城、舆论媒体文化长城、网络长城、体育金牌长城等越来越高大、坚固、完善的今天，在
人民物质生活丰富于过去的今天，中国人民对领导人、执政者、执政党、社会团体、舆论媒
体、文化、宗教、生活方式等的自由选择多了，还是少了？亦即中国公民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权力是多了，还是少了？
不仅没多，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些公民权反而少了！这是两手抓的结果，它一手抓改革开
放、经济建设，一手抓巩固美其名曰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人一票独裁专制和所谓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就是坚持四项，就是把党组织与全体党员诓骗为工
具，把全社会作为统治、教化、管制、专政对象，以种党种人等固守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帝
制帝位帝人，就是这般政治倒退吗？六四镇压以非凡的勇气与决心践踏人权、侮辱中国与世
界人民的感情，是此类“改革开放两手抓，内紧外松保稳定，守内虚外，防民甚于防寇，道
变器不变”统治理念的必然恶果。
叙往事，思来者，如何改弦易辙，革故立新？改革开放应当为人权服务，各种长城应当为人
权服务。我们更应当筑起全民的人权长城，用它抵御一切形式的党政官本位特权，保障平等、
自由和民主，为人权服务。所有无人权者，团结起来！前进！前进！不要暴力，以“全民和
解的和平非暴力人权大进军”前进！中国人民都是人权义勇军，中华民族要高歌猛进新的国
歌：

起来！不要殖民治民统治！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人权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拼死爆发自由民主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终结独裁暴政，前进！
防治专制困厄，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国人民如何成功“清除独裁专制制度，防统治者甚于防寇”，摆脱“最危险的时候”？统治
者就是党政官本位系统，就是国家权力的掌管、行使者，就是国家机器掌握者，谁能把他们
怎么样？唯民主制度可以堪当，它是人民的人权长城。它以保障人权为最高宗旨，以主权在
民立法，是一部科学设计、选材适当、指标全面、精巧灵敏、运行有效的政治机器，如“代

议制、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舆论自由”等科学的政治制度设计，筑起一道道人

权防范系统，防范政府、政党、官员、议员、议会、权力机关等一切权力机构和个人践踏人

权。它虽然不是最完善的制度，却是迄今为止错误最少、最有效的制度。那时候，独裁专制

制度被彻底清除了，权力机关及其官员，不再是权力随心所欲的主人，而是人民委托权力、

自由投票选举产生的权力代理人，这从根本是消除了“统治者”这一概念，当然也就能够成

功“防范统治者”了。

中国与中国人民，尤其是党政官本位中人，尤其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机关中人，奴隶与管

奴隶的奴隶们，都必须终结鲁迅先生所描述的两种状态：中国几千年来只有做稳了奴隶与连

奴隶都做不稳的两种状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以全民和解的和平非暴力人权大进军，筑起

自由民主的人权长城！

只有成功防治统治者，才能防寇，人民才能真正站起来！

本章文字撩笔很久以后，我细读了《半夏小集》，倍受震撼，顿时更加敬佩痛斥独裁专制制度

“吃人”的鲁迅先生。我也更上层楼，真正理解了毛泽东主席为什么自三十年代开始便推崇

鲁迅先生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第一人，奉为至伟。这是伟人们在人权事业高山之巅的握手，他

们思想的人民性、自由民主人权性、深刻尖锐性、战斗性、彻底性等方面的一致性，实堪至

高至伟。其中，鲁迅先生告戒国人：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

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

奴隶好。”

他被推举为 20 世纪中国乃至亚洲最伟大作家，是因为人民不愿意做奴隶。他活于人民心中，

是因为独裁专制统治还在“吃人”，是因为人民必须完成人权事业的新长征。人民啊，人权天

赋，谁也不给。赶走外敌，勿忘内敌。我们要自爱，世界也爱我们。人民不是封建家国君主

极权统治的臣民，也不是一党独裁专制党国统治的“党民”，党员也不应该是“党奴”。人民

不是任何形式下的奴隶般的没有资格参政的低人一等的“贱民”，人民是国家主权的主人，是

国民、公民，是对执政党、政府等拥有发言权、决定权的主人！

人民啊，千万不要“不悟己之为奴”！千万不要“还是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千万不要被统治者以“假民族主义、真帝制帝位帝王主义”所利用！千万不要被任何形式的独裁专制统治借口迷惑！平等、自由、民主、博爱、人权，是我们永恒的目标。我们拼死反对一切形式的强权，不是要使任何其它的强权更加蛮横。我们万万不能被国内统治者们制造的假民族主义真独裁主义所诱惑、煽动，被他们泯灭了推翻一切形式的帝制帝位的斗志，反而为他们添砖加瓦，做他们的螺丝钉，帮助统治者禁锢自己，阻碍、鸩杀我们人权事业。不要忘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前辈奋斗：“……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中的内敌，不要被假爱国真专制迷惑，我们还要继续高唱新的国歌。洋奴，家奴，哪样的奴隶，中国人民都不做。我们不受外国主子独裁专制统治，也不受国内主子独裁专制统治，我们不要任何势力、任何花样的独裁专制统治。我们外要民族主权，内要人民主权，人民主权的，谁也不给。

6、警惕假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创立人权中国

（1）可是人民前进有很多障碍。殷鉴不远，中国人民必须警惕统治者们以“救国家之亡，家国党国之存”的假爱国主义、真爱帝制帝位帝王统治特权的伎俩苟延残喘。如六四后时代以来，他们常常窃喜于给中国人民造成苦难的任何天灾人祸，总以为脱颖而出、总揽大权的好机会来了。洪水来了，人民遭殃，军人牺牲，他等高兴。他等借机“师挥三江”，搞个人崇拜，造神，“凝聚力加强了”，反利用一切手段使中国军人忘掉“敢以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护卫民主、讨伐国贼使命。人民下岗、穷困了，他们高兴。因为“民主政治不能当饭吃，谁不老实，让谁下岗”，人民永远处在“民以食为天”人权水平，仓廩实而知礼节，饿肚汉、无颜女哪里还有功夫要什么民主政治权利。自然灾害来了，人民苦不堪言，军人奉献了，他们高兴。施舍浩荡皇恩的露脸机会来了，“体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机会来了。

人祸来了，他们高兴。“我们维护人民利益，一贯重视打击腐败等人祸，看看，我们又挖出一个”，“过去很多灾难是由个别人失误等造成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具有无比优越性，要改变的只是政策”，“没有团结统一强大的党，没有个人威信，怎么反腐败？”大使馆被炸了，外交政策有误，战机撞毁，他们高兴。他们顺势转移人民对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和愤懑、失望、不信任，“紧密团结于核心周围”。以至于中国有人认为前者是江泽民与克林顿会谈时秘密商定的让中国人民忘掉六四的一个阴谋，后者是布什赠送给江泽民的厚礼。

李洪志出来了，他们高兴。总算逮到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突破口，一身冷汗换来了“经济利益多元化，但政治必须一元化”，换来了“必须加强基层政权对人民与社会的监控力度，过去居委会干部多能干，谁家来的什么人，干什么，住几天，去哪里，都摸得一清二楚。可以乘势查处“非法民间组织”，还有多少潜在的“反朝廷”势力，赶紧动用一切力量打击李洪志，吓死那些敢于群起者。哼，“与党争夺群众”，抢社稷，没门！中国是群众，是我私有的，是朝廷臣民、党民。他人不能竞争、竞选、抢夺，群众也不得胡乱跟，必须听党的话，跟党走。“四项迷信”以外的都只能“帮闲”，谁出格，就是邪教。迷信愚昧不可怕，“人民变心，江山变色”才可怕。

李登辉，台湾民主化就是台独，太好了，我高兴，我感谢你：“全军指战员们，团结在我周围，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我搞军事演习，我乘机调兵遣将，换人换防，试探、渗透、强化我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毕竟我没有当过一天兵啦！瞧！我多牛，可以超越一切法规之上，可以破坏军规，可以穿着不佩带任何标志的军装。国际制裁，太好了，经济发展缓慢，对外交流停滞，人民因此倒霉，不耽误我等江山，这对我有利，我可以把治国无能、经济衰退等一切狗巴巴赖下去。臣民们不相信你们了，我还要挑拨他们愤恨制裁，一切不是都是你们造成的。中国被孤立了，人民没有别的路走了，更老实了，只能一心一意跟着我，只能听我的了，我更好统治了。你们这些外国傻瓜，自绝于中国人民，我现在是唯一靠山。

人民团结、铁板一块，那不利于分而治之。我说坏人不死心，和平演变等颠覆迫在眉睫，我

划分阶级，我把统治对象分成三六九等，挑动小党斗小党，挑动官官相斗，挑动人民斗人民，
我制造地区间政治经济等裂痕。我太明白了，家国党国等社会的最大矛盾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中央和地方、部门等的对立，人民互斗吧，各地互斗吧，各行各业互斗吧，这是我安稳的基础。
洪水等自然灾害利于统治，贫穷利于统治，外辱利于统治，腐败利于统治，好戏连台、彩票、吃喝嫖赌等利于统治，战争利于统治，异己者利于统治，外界指责和抗议利于统治，制裁利于统治，一切不满、反对统治的言行利于统治，设置假想敌和制造灾难利于统治。总之，独裁者们乐于利用一切“灾难”、“危机”加强独裁专制统治，甚至不惜制造灾难如台海危机等，借此掏空国库、扩大机构、加强统治实力。他们总是乐于以假民族主义真独裁专制蒙骗中国军人和各界人民为他们出力、牺牲，使人民人权被自己的爱国爱民族爱家等热情吞噬，而充满皇帝欲的野心家们则坐收统治渔利。正如希特勒、蒋介石和朴正熙等是借口反共产主义而背叛民主、大搞独裁专制，任何内忧外患也都可以是六四当局加强独裁专制统治的借口。
人民穷了好，内难不怕，外乱更好。什么乱，我统治什么，就怕不乱。如果没有灾难，怎么摆平干部及其子弟，怎么摆平普通人民，人民怎么会团结在以我为核心的周围，我的工具（党）与我怎么做总代表？我等还可制造灾难，夸大灾难，省得没有专制借口。“天灾人祸”再大，我等专制者决不辞职，而是借机“加强了凝聚力”。乱是天赐良机，我乱中夺权，乱中固权，我乱中独裁。来吧，来吧，“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骗术太老了，赠送一些新版本的煽动假民族主义、假爱国主义而真独裁专制主义的猛料：“你反华，利于我反全盘西化；你叫嚷人权高于主权，利于我煽动中国人民不可辱，主权高于霸权，主权高于人权，坚持私天下。”这下好啦，军权、党权、政府组阁权、经济权、人事任免权、外事权、国家权、等一切权全部归于中央集权，归于我。脱离我的控制，不让我当皇帝，就是削弱党的领导，没门！我有党组织、国家机器，我到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行业到个体摊群大搞“党建”，设立“工委”、

“小组”、党委、支部等，还在健身、晨练场所等设立临时党支部。我不存异己，我动用国库，我派出干部，我把中国的一切组织、团体，凡是有人、有生产文化研究体育等的地方，我都派出太上皇，党管干部，党管一切，任何有形的地方和无形的任何思维等背后都匍匐着我的“党人、党组织”，他们密切监视、管制、整治、决定一切，一切都在我手心里。总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心，大陆政权一切工作的中心，一切社会资源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之帝制帝位。泱泱中华，尽在掌握，满目皆空，惟我独尊，我终于可以摆出一幅“我是独裁，我怕谁”的派头了！中国人民人权事业只得大道默默。亚洲历史上我们曾经以辛亥革命第一个推翻了君主极权统治，但现在仍囹圄于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当局丝毫不解决六四悲剧，却时刻叫嚷着“要把一切不稳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中国人民人权的政治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一人独裁专制一党正愈演愈烈，党员人权状况正恶化；一党独裁专制全国正愈演愈烈，人民人权状况正恶化，中国国权正恶化；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正愈演愈烈，中国和国际人权安全正恶化。

（2）人民人权和统治特权是一对跷跷板，特权越猖獗、神圣，人权越少、越小、越被破坏。面对经济全球化、民主全球化世界大潮，面对它们已经使一些国家迅速从农业国迈进工业国、信息国等富裕国家的事实，一个对内政策的最高境界就是忙于筑固各种长城、禁锢人民自由的当局，一个最高利益就是保守六四镇压既得利益的当局，一个顽固以虚伪三讲拒绝“讲自由，讲民主、讲人权”等老三讲的当局，人民怎能期待他们搞好国家经济，促进社会文明，解放人权！一个对外政策的最高境界就是扎紧篱笆、大修各种统治长城、阻挡人民与外部世界双向交流的当局，人民怎能期待他们有精力、能力并有尊严活跃于国际舞台！我们怎能期待他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们最高使命是“稳定”统治权利。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各媒体的最好版面、黄金时间都是江泽民重要讲话，他好象事无巨细都有研究，而且对本应由他人主持的工作有抢先一步的研究，而且从来了无新意、招人厌恶。

中国各地各部门各行业拼命创新，也出不了他的帝制帝位帝王框框。他抢镜头、抢讲话、抢研究成果、抢军队、抢人、抢权、抢颁勋章、优秀称号，他演戏、做作、耍派头，不是勤政，而是为了巩固地位。

江泽民时代是一个他要帝王派头的时代，是一个他续演中国皇帝史的时代，是一个停滞的时代，是一个沉闷的时代，是一个公式化的僵化时代，是一个后退的时代，是一个个人党统治特权利益高于人民人权的荒唐时代，是一个使中国与世界倍感荒蛮的时代，是一个为中国与世界埋伏灾难的时代。

他没有主义，没有理想，没有党员，没有人民，满脑子全是如何维持其个人地位。下岗职工满街摆摊、民不聊生时，一位民营企业家告诉我：“瞧电视上江泽民的那个派头，肚子一挺，我只讲‘三讲’，一幅‘我吃饱了，谁也不管’的恶心模样”。

三讲三讲，世界上哪个政党、团体、个人、民族、国家、社会不讲政治、不讲学习、不讲正气？这是立足根本。但江三讲笼罩全国，使中国又是政治挂帅的政治小国了，政治概念极端而狭窄，政治活动频繁而于国无补，政治手段专制而与民主背道而驰，政治目的自私而令人厌倦，政治成为统治工具、引起国内外普遍不满等。三讲三讲唱高调，实则祸国殃民，帝制帝位越讲越“稳定”，民心党心却越讲越散，社会越讲越乱，危机越讲越多，腐败越讲越猖獗，人民却越讲越穷，国家越讲越落后，越讲台湾离心力越强，越讲海外华人越寒心，越讲国际社会越轻视当局、越同情中国人民，越讲国家与人民生存发展环境越糟糕。

用“三讲”时间干点什么实事多好，最起码种几棵树，挡挡北京风沙、沙尘暴。

“三讲最重要”就是“批邓比生产重要”，“三讲”最高就是阶级斗争统帅一切的延续，“三讲”万能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变体！许多国人认为江泽民试图学习毛泽东主席，但他缺乏内核，皮毛也学不像。虽然经常出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并排的宣传，但这并不能抬高江泽民，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江泽民更相差甚远。学毛主席，他不够威望，学邓总设计师，他不够解放、开明、民主。

他坚持四项与同袁世凯大肆歪曲“尊孔”一样包藏祸心。有笑话云毛泽东获悉江泽民接班，

气得不行，坚持要再次出山亲自干。江泽民做皇帝倾向比毛泽东、邓小平等强烈得多，中国人民人权事业从很多方面表现出加速退步、恶化的迹象。大家曾对他寄予希望，并错误地把后邓前江时代的“一党独裁专制回潮”归咎于邓。其实这是对邓小平正确的误解，是对江泽民错误的善解，正是他把中国共产党及政权引向了更不实事求是的路。他因缺乏威望而不能如邓小平般推行开明统治，他更左、更虚伪、更意识形态化、更“四项三讲”，甚至很多方面与邓的改革开放背道而驰，国内国际社会已经看清了他的真正面目。他大树自我核心，却使中国空前缺乏凝聚力；他大讲稳定，却使中国陷入空前困境。稳定，稳定得如墓地般死气沉沉。邓小平看走了眼，把改革开放事业委托给了这样一个党贼、国贼、民贼。好的东西他不继承，差的东西他不断发扬、“创新”。表面上社会团结，经济增长，文艺晚会连台，一片稳定繁荣昌盛，但黑箱操作越演越烈，腐败趋重，社会风气日趋冷漠，“高兴就好”、“活着就行”、“各人自扫门前雪”等弥漫社会。社会缺乏正义，人民缺乏尊严，道德水准下滑。爱国无门，真理无路，党政官权决定一切，强权指导一切，强权获取一切，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利益中心。为维持帝制帝位稳定，各种新旧巩固皇权的锦衣卫、东厂、西厂等专制机构越来越吃香，越来越因为“上面有吩咐”而有恃无恐。对社会各界的专制愈演愈烈，思想工作者和记者们很忙又无聊无奈，警察军人等武装力量很忙而又没劲、无意义。如“三讲”是党员干部的紧箍咒，谁不团结核心周围，不拥护、不听话，就给你讲经，还逼你自己讲。同时，把这威力由党员干部辐射到全社会，在全国造成思想恐怖，并因恐怖而顺从，如此帝位无忧矣。这就是背离“讲自由、讲民主、讲人权”等“世界三讲”潮流的“江三讲”的险恶实质，讲出权威，讲出服从，讲出独裁，讲出专制，讲出中国新皇帝。如覆盖 13 亿人的新闻舆论等媒体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大唱赞歌、证明优越性、保证稳定、贴金等，造成龚自珍时代的“万马齐喑就可哀”。“两杆子保江山”的恐惧导致谎言盛行，人们普遍表里不一，一人多面难诚实，人防人、人骗人。地震局长讲真话是不懂政

治，媒体讲真话是“不与党保持一致”，统统撤职、换人。人们只能大唱赞歌，大吹“皇帝的新装好”，大讲所谓党性原则、组织原则。顺口溜戏曰“大报糊弄小报，小报糊弄人民，全国人民糊弄党中央”。

统治当局一言堂，全国人民只能有一个思维，只能有一套耳目喉舌，全社会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全国媒体只能发出一种新闻，多么可怕、可悲的社会局面！都说吹牛撒谎不上税，但历来统治者的“假大空”使中国付出了高昂成本，耗损了巨大综合国力。又有多少传媒资源被浪费，多少人力资源被浪费，多少人被愚弄，多少真理与进步被阻碍？这“税”岂能用金钱衡量，其流失海去了！

同时，“江三讲”欺骗全体领导阶层，用政治思想工作禁锢所有人民，使中国人只能以虚伪欺骗“官方”求生存，如官话一套，家话一套；官场一套，民间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对领导一套，对同级、下级又有两套。甚至其他政治局常委，也只能在大会上用“珍惜时间”旁敲侧击“三讲”，警惕“说空话”。在一个政权里，当它或执政者对人权真理视而不见，当六四等大小冤案如石沉大海，当人们只能隐藏真身，违心恭维，送礼吹拍，或欺上瞒下，当人们只能维护“稳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能装呆装傻睡不醒，当一个民族不能崇尚忠诚、奉行诚实，当人民难以讲理、获得公正，当人们难以诚实、正直地谋生、改善生活，这个政权对国家民族的危害已经使它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三讲”逼得党政官员不仅不能用心工作，而且必须用讲假话谋求“过关、晋级”。它逼迫官员大搞政治虚伪和浮夸风，昧着良心大讲什么“三讲”好，讲出了团结，讲出了干劲，讲出了信心，讲出了效益，讲出了经济增长等等。这不是中国干部不诚实，而是讲假话成了独裁专制社会一种必要的“生存哲学”。毕竟张志新、遇罗克、顾准等是不能存活于独裁专制社会里的，我们还要韬光养晦如邓小平三起三落，留存一些力量在关键时刻给独裁专制致命一击。

党员人民和非党员人民虽然心底里与独裁专制的暴政高压离心离德，表面上却不得不装出一幅同心同德、保持高度一致的样子。虚假虽然有害，我也坚信它是独裁专制下迫不得以的生

存智慧，是“潜龙在渊”而欲一跃千里修行。我还看到人民在虚假下积蓄、潜藏着力量，人

们在虚假下盼望，拼着命呼吸新鲜空气，大喊“给我给我，给我感觉”。

在这后极权的独裁专制衰败社会里，中国的党员人民和非党员人民追求精神解放将是英勇无

畏的。象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乡追求精神自由是可贵的，象周恩来、雷锋、

焦裕禄、王进喜、林巧稚、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袁隆平、蒋竹英、李国安、

徐虎、吴天祥、王廷江、李素丽、邹延龄、侯殿禄、李向群、范玉恕、方红霄等那样在独裁

专制体制内忍辱负重、尽己所能为人民服务，并潜藏起来伺机而动的大批中共党员和人民则

是可敬的。如果说张志新、顾准等使我们觉得中国人权事业有希望，那这些人则使我们有了

行动基础和胜利的把握。党员和非党员等中国人民将用自由民主请天公重抖擞，抖掉假民主

真皇帝，抖出人民主权。人民随时准备行使人民主权。一旦时机成熟，那人权精神对独裁专

制的最后的不可逆转的道义打击就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与世界的希望。

个人独裁专制使共产党和党员深受其害，独裁专制使人民和国家深受其害，并祸及世界。他

们胡说什么是什么是戈尔巴乔夫搞垮了苏联共产党和前苏联，其实是一人对一党的独裁专制搞垮了

苏联共产党，是一党对苏联的独裁专制搞垮了前苏联，而戈尔巴乔夫则是一个顺应了历史的

“真心英雄”。而当今中国，对共产党的独裁专制者必将是损害共产党的罪魁，对国家的独裁

专制者必将是危害国家的祸首，对人民的独裁专制者必将被人民唾弃，或者因侵犯人权而被

押上人类审判台。江泽民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成员，把经济、治安、军事和外交等组织机构等

玩弄于股掌之间，变成对中国人民实现个人独裁专制野心的工具，中国军人等一切人民应该

象民国初年反对袁世凯称帝那样反对江泽民这个实质上的中国皇帝。

（3）六四当局常常指责属下腐败是“党政干部缺乏信仰”造成的，这也不无道理，中国人

民当然不会信任六四镇压当局，当然不会相信他们有德行、资格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从而失

去了对共产主义本身的信仰。不会有人相信“三讲”、政治思想工作能讲出高的政治觉悟、学

习进步和勤政廉洁的正气，根除腐败，如果可能，也是一些优秀人物与人民大众“凭良心做

事”所至。如各级各地各行各业繁多的党校应该是“三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最高学府吧，但哪一个危害巨大的腐败干部不曾受党校培训、学习、提高？但官越大，越经过组织考察，提得越高，贼胆越大，能耐越强，花样越多，腐败越严重。很多腐败分子曾经挂有“优秀共产党员”、“劳模”、“红旗手”、“突击手”等荣誉章，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莫非党校是教唆贪污腐败、训练犯罪的培训处？一些不分六四镇压是非的学校算一个什么学校？一个不敢正视六四是非的政党、执政党，还奢谈什么“思想政治工作一抓就灵”？还探讨什么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发表什么评论员文章“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藏身”？看好后院吧！上行下效，只要中国社会无法制横、监督、弹劾江泽民等大小一把手，官本位的后院决不会干净。完全可以说，对中国人民和社会各项事业危害最大者都出自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体制的官本位体系，只有他们失去监督的权力才有可能为非作歹。真可惜一些优秀中国人入党后的悲惨遭遇，雄心壮志者，富国强民者，意志薄弱者，本身都是一党独裁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党要对其堕落者承担责任，而不是开除、投进监狱或枪毙了事。不经过人民主权的选举、雇佣，一党独裁专制必然黑箱操作，天生腐败，它作为腐败的母体，怎么能消除腐败？只有改造它，引入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推行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使它被控制、收敛、不肆意妄为。六四当局还一边大搞一人对全党全军全国的独裁专制，一边造“法治”舆论，欺骗世人。他的“法治”意识与意图了无新意，是“依法领导，领导依法”，是“依法统治，统治依法”。其实质是把法治当作“治人、治民、治党、治国”之法，不过沿袭了《管子·任民》“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其以官本位高高在上，对人民漠视权利、详订义务，与法治的真谛背道而驰。他的“法治”，就是他不必守法，但用守法约束、制裁他人，就是使他人象害怕专制主一样害怕法律。如他带头破坏军规，穿军装而不佩带任何标志、标识等，这是对全体中国军人的蔑视与侮辱。他要两面派，不仅吞吃了他1989年9月2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我们绝不能以党代

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的承诺，还大搞“个人代党，个人代政，个人代法，个人代民，个人代国”的封建朽没作风。在他眼里，法治与党组织、军队、政府机关、舆论媒体、思想工作等一样，“皆为帝王之具也”。他是用法“治民”、“治属下”，排除异己，耍弄政治权谋，巩固其地位，是使全国上上下下对他的权柄俯首帖耳。如今中国官员讲话，从政治局常委到一些芝麻官，言必称“江泽民”，总给人一种用“吾皇万岁万万岁”表示效忠、保住官位的感觉，把社会空气和官场搞得象封建社会那样空洞怪异、乌烟瘴气。面对国内外对其滥用法治的指责，他们还常常说我们已经制定了很多很好的法律。但很好的法律不是装饰，法治意味着制定良好的法律并使其得到良好的遵从与执行。独裁专制体制下，最大的违法者往往不是小偷小摸或大盗，而是在官本位体系里占有一席之地者。如享受特权而侵犯公民权益，带头藐视个人收入调节税法，当官本位扇动全社会对歌星们偷税漏税咬牙切齿时，他们自己想尽办法不交税。又如法律规定只要年满 18 岁的公民，无论男女，均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实际上是既无自由投票选举权，又无自由组党、演说等被选举权。这些权力都被“集中”了，被“集体”了，被“集中、集体”到官本位手里了，由他们黑箱操作，敲定、公布。

（4）为了搪塞其独裁专制权力的不合法性，他们还常常自称是“三个根本利益的代表”，是人民最杰出的代表，一切权力是人民给的，统治或领导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这些实质是最大的强奸民意，是盗用人民的名义对人民实现独裁专制。现在，年长些的中国人，还有大批青少年幼儿从娘胎里、甚至从还没影儿的时候就需要官员批准才能被怀孕、降生，他们一辈子有无数事情需要无数官员批准才能成事，可扳起指头数一数，有几个官员是经过公民自愿自由投票选举产生或者罢免的。至少邓小平的三起三落都不是。有人民做主，他可能不至于蒙受后面的两落。至于被选举权更是天上的月亮，“大选”则是大逆不道，就象台湾的大选引起大陆独裁专制的极度恐慌一样。与其说用飞弹与白皮书影响台湾大选，更是威胁大选、恐惧大选、痛恨大选。

法治的要义是人民主权下的“治权、治官、治党、治政府、治法”，不是“治人、治民”，不是党政官员治“人民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当今法律的公理是：宪法没有要求政府做的就是政府不可以做的，宪法没有禁止公民做的都是公民可以做的。完全可以这样说，真正的法治首要是规范、约束国家权力与掌权者，使人民能够监督他们是否越权即违法；其次是保障人民的最基本权利，明确哪些公民权利不能被政权或政府剥夺和侵害。应该说，最重要的守法是当权者守法，而且权越大者越能给社会造成大危害，他们更当守法。法律的真谛是良好的法律得到严格的执行。可当今中国，国上有党，党管国家；民上有官，官管人民。人大立法，党管人大。法外有法，国法之外有党法，党字红头文件高于一切。一些很好的法律、正确的量刑，得不到执行，唯一原因均是一党独裁专制可以随意凌辱法律权威。“遵纪守法”只是各级权力部门对人民和下级的单项要求和训导。而实际上最大的超越法律之上者难道不是他等独裁专制者？放眼当今世界，除了“江三讲”和他的个别国际朋友，还有哪个国家元首活得像个皇帝？九十年代，亏得没有派志愿军去帮助另外个别朋友，否则，不仅本国人民受苦，还祸及他国人民。前面的例子还不够吗？法律还有一条基本原则：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而在独裁专制下，为维持官本位里“大小官皇帝、土皇帝”等独裁专制者的特权地位，有多少人不诚实，有多少人受到损害，有多少人没有得到或大大超过了应得的部分？国库遭到多少滥用、盗窃？不要在一党独裁专制的死胡同里，探索什么“建立一个既能理顺党政关系，又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办事三者高度统一的法治领导机制”了，这是对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水火不容的捏合。善良的中国人，认清独裁专制的本来面目吧！难道六四及六四以来的中国现实真的不能使我们对独裁专制睿智一些？

（5）“三讲”之“讲学习”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色，独裁专制意识使一些人很不善于借鉴、学习，反而经“提醒”而更强化保守缺点。睁眼看世界的学习使中国人写出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思想启蒙书籍，但它们根本

不受政权重视，难以推广。而传入日本后却被誉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仅《海国图志》1854

年至1856年在日本就有21种被翻刻、训点、翻译的选本。而当今中国，《河殇》、网上聊天

室、评论、人大政协发言等均遭封杀。

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学习，使得清王朝戊戌变法一定失败。

对袁世凯称帝病亡的学习，使“天子欲”极强者学会了如何偷偷摸摸做“不戴皇冠的皇帝”。

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学习，使国民党坚决排斥共产党等其他中国政治团体，拒绝成

立民主联合政府，用《国民党组织法》确立其一党独裁专制地位，结果中国陷入内战和外敌

入侵险境。

对苏共二十大、1956年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学习，使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早些时候在八大

提出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正确主张，并使“阶级斗争”愈演愈烈。

对美国等西方民主的学习，使我们得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一团漆黑的恐惧结论。

对文革“四大、两个凡是”的反思，使我们把“四项四个凡是”立作天条，既不要运动式大

民主，也不要制度式的三权分离的议会民主，而是一根筋搞“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对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思，我们得以迅速加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

防范和平演变”的思想控制两手抓，殊不知独裁专制统治是毒害人民的最大精神污染。

对一切处理洪水、人为耻辱等灾害的反思学习，总使我们得出“只要坚持帝制，团结在帝位

帝王核心周围，中国人民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结论，而不反省灾害的成因，并解决它们。

对1989年中国人民民主大潮和1990年前苏联解体的学习，使中国共产党停止了很有希望带

领中国和他们自己走出泥潭的政治体制改革，连累得经济改革关前勒马，难以前进。

对1990年2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宣布放弃宪法规定的一党专制地位的学习，使我们强化四

项基本原则宪法地位不动摇，强化、“合法化”了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中国的地位。

对国际上被独裁专制统治糟蹋了的社会主义崩溃的学习，使我们还美其名曰什么“面对国内

外大气候、小气候，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这是“前进路上的曲折与反复”。

对戈尔巴乔夫等公开化、民主化和诺贝尔奖等的学习，使我们深深感到人民自由民主的人权

事业将是一党独裁专制的克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损失”。

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和诺贝尔和平奖的学习，使我们觉得还是因循守旧老思维比

较好，不与什么诺贝尔沾边好。

对俄罗斯1991年8月政变失败前的学习，使我们窃喜了一小会，“看见了吗，社会主义旗帜不倒。”

对政权内改革派的学习，提醒我们必须勒紧缰绳，或者把他们搞下台。

对富裕的提倡，对反对平均主义的学习，对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期盼，是使少数掌握官

本位特权者可以通过“官倒、批条子、带头多发奖金、提高职务补贴，率先获得内部消息，

设立利用自己的游戏规则”等以权谋私，并先于人民富裕起来，是鼓励党政官本位们以权钱

交易、腐败、侵吞公有权益等先富裕起来，是怂恿掌权者通过对个人、个体、民营企业等富

裕者实行“关、卡、压、要、拿、拔毛、罚款、捐款、收保护费、摆平费”等方式先富裕起

来，是要使普通无官职者忍受官本位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中国之贫富悬殊，历来首先存在

于统治者与人民大众之间，存在于官民之间。比起官本位体系，所谓的地主、富农、资产阶

级、小资产阶级等也是穷人。

对反腐倡廉的学习，不是要使毛主席眼里的官僚主义阶级大有世袭化、贵族化趋势。

对民主台湾的学习，使我们同情仇敌国民党而恨民进党等民主势力，提醒我们要强化大陆一

党独裁专制政权建设，一定要把“大陆的李登辉、民进党和陈水扁”等打杀在苗头状态，千

万不能不要象老对手国民党那样因为建立民主台湾而成为在野党，不要因为建立民主中国丢

了江山。

对苏共俄共和中国国民党成为在野党的学习，提醒我们千万要防止党内出现个什么赫鲁晓夫、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李登辉，警防党外的“民运分子、藏独分子、疆独分子、法轮功分子”

等。历史资料表明，从1789年开始，叶·卡捷琳娜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逐步深入而逐步

收回许多她早年颁布的改革条例的。

对“法轮功”的学习，使“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日益重要，使中国面临再次跌入“政治统帅

一切”的“三讲”陷阱。

一些人反省历史时是用语是不准确的，如常称“我们一直在探索中国繁荣富强之路”，说“中

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道路上苦苦挣扎”，其实他们是对人民追求的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弃而不用，一直在坚守、狠守、毒守、独守、苦守独裁专制统治之路，致使中国人民在吃人制度里

苦苦挣扎。看看那些进城的农民，看看那些下岗走向马路摆摊的工人，看看苦考托福或冒着

偷度危险出国的中国人，看看党政机关门前的上访者……。什么时候狠守、苦守独裁专制，

什么时候就少不了还内外苦苦挣扎的中国人。

（6）当我与一位局级党委书记讨论“全国认认真真抓三讲”等政治思想工作的虚伪和险恶

目的时，他意味深长说：“不要忘了，当年齐奥塞斯库是经党内一致推举为领袖的两周后被秘

密处死的。”

我深感震惊，很多人比我深刻、透彻、“偏激”、走得远，这马上使我记起齐氏被处死前的一个

历史细节：齐氏此前访问了中国，当局把他这样一个自己的朋友说成是“中国老朋友”、“中

国人民老朋友”。可以想象齐氏的异国老朋友兔死狐悲心情。当今世界，独裁专制统治政权般的“中国老朋友”越来越少了，剩下的也如同世界人权大潮残骸，或者热锅蚂蚁，他们惶惶

不可终日。

下一个苏哈托是谁，下一个齐氏是谁？六四后时代迄今，江泽民等把持下的中国大陆政权已

经失去了自动纠偏能力。他等坐于六四门，等待废墟坍塌；坐于六四火山口，等待喷发。

路是自己走的，皇帝是自己做的，占便宜就是吃亏，统治人民必被人民抛弃。皇冠的代价是

其被摘除，破坏人权必受惩罚。今日的得意可能正是明天的罪证，今天的皇冠一定是明天的

坟墓。悬崖勒马吧，给人民留一条赦免你们的正当理由！

（7）是恋权癖导致不知老已至？当世界多数国家都由二战以后的公民主政时，中国年轻人

哪里去了？当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政坛僵化在仅仅出现了“三代领导集体的三个核心人”黑

箱里时，当台湾迄今也只出现了第二位民选领导人时，美国、日本、英国等却涌现出了多少

生机勃勃、各富魅力的民选领导人？当隔着年龄辈分的中国领导人平等或者高傲或者谦恭地

与外国领导人切磋国际政治关系时，这是中国的骄傲，还是有点哪个？老人政治是独裁专制

的必然结果，“老人”本身是受害者，如果不思进取，不“己所不欲，勿施与人”，那同时又

是害人者。

令人悲哀的是，尽管邓小平比前人有进步，尽管他曾经抱怨“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

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但他却没能往深层次进化并坚持自己的民主主张，

并且选错了接班人，选择了一个身背六四包袱而不能迈步前进的接班人江泽民。

你不到处题

字，他却连长江源头都敢题，他这样的独裁专制心重者怎么能够容得下朱（容加金旁）基请

工程师等建设者为大桥剪彩等民本民主伟举。

六四以来，作为中国灾难的他，一大错误就是违逆民意，并做自己力不从心的事情，试图独

霸全党，独占中国。殊不知个人威望与留名青史不是通过题词实现的。你曾经带头反对家长

制、老人政治、元老政治，但不是说要树立一个比你与他人更过分的独裁专制主——一个当

代中国皇帝！殊不知，除了权力欲望得到满足，皇帝已经是“天下共击之”的靶子，鲜有好

结局了。

你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

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却大搞“三讲”本本。你等元老在世时，

我们以为他“为长者讳”，先收敛点，以后大干。但是，你等遗憾地走了，他没有挡箭牌了，

我们更明白了，他甚至对你等也倒行逆施了，他比你等具有更陈腐的独裁专制帝王思想。不

思进取的他应该是一个过度性人物，可惜帝制的惯性使他在位时间太长了，并且他由于固守

六四镇压既得利益而抛弃了进步、乃至过度，走向了保守、退步。他是一个没有理想却赖坐

在六四政治废墟上杂耍权术、自鸣得意的历史小人，可鄙、可笑、可气、可弃。你自己不当

“圣人”，提醒聂卫平“圣人不好当呀！你还是当老百姓好。”

你为什么不继续政治改革、成就大事业，反而在六四后扶持或者被人利用而成全了江泽民这

个离圣人差得太远的假圣人？这个假圣人也许是你政治遗产里最坏事的一着丑棋。在玩弄权

术方面，他是聪明的，把你也耍了，但他聪明没用在正道上。有人说江泽民是左派，保守派。

其实，他和他代表的六四政权哪一派也不是。

“成派”者应当有坚定、成熟的信念和思想，但他没有。他不过是六四血腥既得权益权势的

守护者，是六四派，他两头敷衍，“左右”逢源耍权术，而且偏左，搞军事、思想文化等独裁

专制，才能保守、守护得更好。“三个代表”是幌子，他谁也不代表，老干部、新干部、干部

子弟、工人、农民、普通公民，个体、民营企业、外企，集体、国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

军人、警察，等等，他都不能代表。

他不是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守护者，也不是四项四个凡是和邓小平理论的守护者，否则他必定

有远见，他必定及早妥善清除六四这枚被塞到共产党政权基座下的原子弹。他也没有事业心，

他的最大价值观就是守护六四既得权益与权势，仅此而已。

确立接班人，就是“立王储，立帝储”。接班接班，就是传递江山，把自己的政治遗产及利益

传递下去，这是“江山不变色”的真实含义。不传子女传党员是进步，但人民大选更进步。

自称是人民的政党，自称是人民政权，那为什么不让人民自由投票选举接班人呢？如果中国

推行人民主权国体，何需邓大人劳心费力挑选接班人，还看走了眼！中国不要再搞什么“接

班人”吧，这个必须破除接班人制度，妨碍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只有利于自由、利于民主、

利于人权等“新三个有利于”，才是实现您那“三个有利于”的最佳途径。

而且，历史已经昭示，江泽民当局倒行逆施只会败坏共产党，共产党将被他整垮！正如致使

苏共坍塌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他以前的一党独裁专制本身。邓大人，你为什么不在生前把

他“拿下”，至少以权力分离、多个核心、司法独立、规定任期等限制他？如果说政治和经济

的两方面的变革造就一个完整的改革家，那可惜的是邓小平总设计师只是半个改革家。我们

敬佩他，可是由于制度原因，每当他自称为“中国人民的儿子”时，我们都感到无法接受，

这个称呼与现实差距太远了。他太谦虚了，他有时候更象是中国人民的老爷子，更象是中国

国家的老子。

他不该忘却了鲁迅先生吧！政治家、政党应该用一种精神把社会不同地域、不同职业、不同

生活方式等各界人民团结凝聚起来，他们没有自己的固执己见，人民的见解就是他们的见解，

人民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把人民的追求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和奋斗追求。这种精神就是

平等、自由、民主和博爱等的人权精神。你批毛，你批文革，全面否定它，但在治官护民、

保障人民民主方面，你的时代比毛泽东时代差远了。毛泽东对你的要求是不翻案，你对江泽民的要求该不是永保六四本色吧？不管如何，他这个六四灾难最大受益人，很难有一个正确的自由民主法治观，民族和国家使命感，和人民人权价值观。

“三代核心”已经走了两个，还有人在极力鼓吹核心论，不就是为了突出第三个核心自己吗？

难道还想搞第四个核心不成？第三个核心比前面的差远了，他坐在六四的废墟上，倒行逆施，一门心思搞“三讲”，就是不讲自由，不讲民主，不讲人权。没有这“新三讲”，使中国发展面临着空前的国内外压力，他及其固守的独裁专制把人民金灿灿的黄金时代拦截成了废铁时代。当今中国，六四还在得到庇护，其恶性肿瘤已经膨胀到自爆的边缘。埋藏事实，也埋藏了真理，更疏离了民心民意，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一个执意坐于六四政治废墟的领导人，还能有什么正气？还能是什么核心？还能代表什么？

他的“三讲”，还能讲出什么新鲜、正义？

一个包庇六四错误的政党，还有什么正义可言？还能自我吹嘘是什么“三个利益”的最杰出代表？

一个包藏、坚持六四悲剧的政权，还怎么能够奢谈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个宁愿对抗全世界，也要对六四错误视而不见、甚至以其为正确性的政权，还怎么能够对世界和平和人权事业不构成威胁？

无论体制是引导，还是个人权欲作祟，无论是危害一个党，还是危害一个国家，但愿如同袁世凯是中国最后一个加冕皇帝，江泽民则是中国最后一个可以耍皇帝派头的国家领导人和党的领袖。也许，是独裁专制制度造就了他，或者成全了他，而他又强化了独裁专制制度。这是恶性循环。我们既反对独裁专制制度，也反对那些强化它的意识形态、势力和个人。为避免误解，我们强调我们反对的不是任何个人和任何团体，我们反对的是任何实际上做着或想做皇帝的个人，我们反对的是任何企图对任何其他团体实行任何独裁专制统治的团体，我们反对的是任何企图对任何他人实行任何独裁专制统治的个人。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党派团体成为个人与个体实现其帝制帝位野心的工具，我们坚决反对个人以党谋私。而事实上，自国民

党开创中国政党政治以来，很多政党正是因为党内有皇帝般凌驾于党之上的个人才损害了党的威信、国内外形象和执政能力。正是党组织对其内部独裁专制的无力制止、鼓励放纵等不仅损害了国家民族利益，也损害了党本身，国民党在大陆“亡党亡国”已经是前车之鉴。

人民不无端嫌弃任何党，而是要求任何党不在党内外推行独裁专制统治，而是要求任何党应该有足够的觉悟而不沦为个人独裁专制的工具，而是要求任何政党不要沦为法西斯政党或类似邪教的组织。人民不无端反对任何党，而是要求任何党守法。我们不反对任何党员，而是要求他首先是一位国民，首要任务是爱国——爱人民主权之国，其次才是爱党。我们不会因为任何党员背叛任何叛党而制裁他，但我们要求他忠于人民及人民主权国家。我们不无端反对任何个人，而是要求任何人不得置于人民与国家利益之上。我们不是不要国家，不是不爱中国，而是只有不受独裁专制统治，不爱朝廷、家国、党国，才能更好爱国家、民族和人民，才能更好爱中国——“一个中国，民主中国，人权中国”。

九、尾声

1989年6月4日清晨，伫立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看着那狗与奴隶之自由通道，我亲眼目睹中国民主事业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惨烈、最悲壮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打击。这“戒严、平暴、清场、两手抓”等延续的不仅仅是一人一党独裁专制之共产党党国，也是对国民党党国、满清家国、明朝家国等一直到秦始皇秦朝之家国的延续。秦始皇之万世梦一直后继有人、进展顺利，他之帝位不仅仅只传到秦二世，其帝制帝位以皇帝、领袖、核心等形式传到了现在，已经有数十个王朝400多世皇帝了。唯一有变化的是家国改姓、党国改党之改朝换代。

但秦制开创的独裁专制统治特权文明至迟到1840年便由正阳而是斜阳文明了，可中国统治者屡屡阻挡中华民族与文明汇入人权正阳文明之大潮，致使中国大地上的统治恐怖轮回、统治腐败轮回、统治贫穷轮回、统治落后轮回等轮番上阵，折磨中国，侮辱人民，危害世界，

这也是鲁迅先生痛斥的“吃人制度”还在“吃人”。这些就是毛泽东痛恨的“复辟”。

家、党国时代，每一次人民战争推动的改朝换代都是对帝制帝位的复辟，都是新的统治阶

级剥夺人民人权的复辟。老人家试图用文革及其“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以制度化地阻止这种

复辟，我们佩服他的伟大创举和革命气魄，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文革的动态大民主实现

不了人民民主，七八年一次也间隔太长，阻止不了人民中国之变色，反而容易产生新的统治

者，制造新的人权悲剧。而只有确立以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法独立等为特征的主权在民

之民主制度，人民才能每时每刻把每事每人、社会公共权力系统纳入适时之动态制横、监督

之下，防范权力原罪，保证他们不变质、不复辟，不走向帝制帝位帝王之独裁专制统治。

我们不能指责秦始皇、刘邦、成吉思汗等不推行人权文明，也许我们也不能要求明末清初放

弃独裁专制统治之特权文明，但我们至少自1840年近代以来有充分理由要求中国汇入世

界人权文明大潮，积极主动加入全球化，而不是屡屡以捍卫家、党国之统治特权而闭关锁国、

被动挨打、落后、贫穷、屈辱。

可是中国人民历经奋斗，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等到辛亥革命、国民党

旧民主革命、共产党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革命，帝制帝位却一直克隆中国人

民遭受独裁专制统治之历程。换了衣服、变了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如今仍然复制了毛泽东对中

国人民缺少政治权利的愤慨描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

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毛选2卷，1991年版第631页）。”

的确，如海涅诗曰：我播下的是龙钟，却不料收获了跳蚤。自华夏大地第一场奴隶起义、第

一场农民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播种自由民主图人权，却不料屡屡收获独裁专制。人

民追随李闯王，他进了京城做皇帝；人民追随太平天国及其“公有制”，但所有财产全部属于

天王，最后也是收获了新王朝。人民拥戴孙中山，为何收获袁世凯？人民拥戴国民党，“民国”

成泡影，最后蒋家王朝霸中国；人民拥戴共产党，最后却公有制、共产共有变成了少数人随

心所欲的党有制、官有制、私有制、私分制、私占制，全中国的资源都成为“一党之党库”。

最后却人民一无所有、干到离退休，还买不起本属于自己的住房。这只是个小例证！

5000年中华文明史似乎表明了这样一个颠来倒去的不幸：在帝制帝位一次又一次陷害人

民，几乎每次民主奋斗都以重新沦落、困厄为“狗与奴隶”。《左传·襄公十年》曰专欲难成，

但卡尔·马克思的预见似乎更准确，他在《致弗·波尔特》中画龙点睛：“陈旧的东西总是企

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人权革命最难的是革除特权，尤其是革命胜利者的特权，

新编历史书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从此帝制永难在中国复辟”几乎是自欺欺人。如中国

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民主革命起家，虽然彼此分分合合，谈谈打打，打打杀杀，但

获胜者都拒绝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最终使人民重陷独裁专制统治，什么军政、训政、宪政、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核心”，什么“中央周围论”、“领导集体论”、“核心论”、“保持

一致”等，实际上就是延续帝制帝位。

如今，六四当局抛出稳定论、三个代表论等，实质就是维护六四镇压错误，维护六四镇压既

得利益，维护帝制帝位皇帝及其意识形态的不垮台，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精神污染。萧规曹随，国民党规共产党随，帝制帝位帝王随。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剧！悲剧的

实质在于，

自世界近代民主革命300余年来，自五四民主运动以来，中国人民始终全力播种自由民主，

收获的却无一例外的总是形形色色的独裁专制。

1989年6月4日以来，当局视全民和平民主运动为“动乱、邪教”，视追回天赋人权为

扰乱社会秩序，颠覆朝廷政府，反社会。为什么？因为独裁专制与自由民主水火不容，特权

不容人权，治人民。事实上，没有民主体制做保障，中国人权事业永无出头之日，人民的流

血牺牲永远只是成全了帝制帝位之易主的王朝循环！不使这般落后、腐朽、吃人的独裁体制

统治特权文明退隐，不彻底改造中国制度，确立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文明之人权文明，使天

下乾坤再造，中华民族与文明则继续陷入由轻渐重之恐怖轮回而不得发展。

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积中国与人类人权历史之经验，今天，中国人民也要正告形形色

色的一切独裁专制者们：

独裁专制必须死，自由民主必须生！

特权必须死，人权必须生！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以公有制名义剥夺个人财产、使人民贫弱而真正富强起来，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其人民不享有言论自由而其统治者能吸引国际社会倾听发言，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其人民生活于恐惧而真正使统治者享有国内国际安全，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人民不能信仰自由而能实现统治者的信仰，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其人民不自由而在世界大家庭中享有自由，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大众卑贱而能获得国际社会尊严，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拒绝民主和法治而真正稳定、繁荣，
没有一个政权会因为人民无人权而长久，
没有一个民族会因为人民无人权而拥有真正强大的民族主权，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不尊重人权而获得强大的国家主权。

十、附录：

“1989接力”倡议书

各位国人、朋友：

又一个6月4日即将来临。其实，1989年六四镇压后，中国天天是六四，中国人一直工作学习生活于六四恐怖中。而且，只要独裁专制统治制度不变，六四之前有六四，六四之后有六四，六四随时在发生。

不终结六四，谁能幸福？

不终结六四，何来民富国强，世界和平？

历史的使命不是追究责任，而是完善未来。但不能正视历史，便不能正视未来。勿忘历史，

正是为了开拓未来。我们更紧要的任务是铲除造孽各类六四镇压悲剧的制度祸根。从秦姓家

国到满清家，从家到国民党党国，从国民党党国到共产党党国，从一人一姓独裁专制统

治到一人一党独裁专制统治，从皇帝独裁专制统治到核心独裁专制统治，这些以官本位为基

础的人治统治制度，为什么总是不能善待人民？中国人民为什么总是受到镇压？受伤、死难、

痛苦、流亡的，为什么总是人民，而发动者总是以皇帝、核心为首的官本位统治者？为什么

总是统治者有权而人民无权？为什么中国人民总是不能创立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王，在

党，在个人”）的民主中国，彻底、成功地铲除这中国最大的疾病，而享有安全、平等、富裕、

自由、民主等人权？

六四镇压使“一个中国”迄今仍然延续了家国、党国、核心国等的私天下政治形态。我们

从不否认独裁专制统治制度盛行时期创造的中华文化与文明，但世界范围内，

“主权在王，在

党，在个人”的皇权官本位及其特权至尊推动型文明，已经彻底让位于了主权在民的民本位

（资本位、人权本位）民主制度之公天下推动型文明。较之人权至尊文明，它过时了，它祸

国殃民，它反人权、反人民、反社会、反科学、反民族、反人类。

六四镇压是统治当局的错误，但家国、党国、核心国不是全部意义的“一个中国”，它们不

能妨碍我们爱中国，爱“一个中国”。六四后，我们痛定思痛，夹叙夹议，写了这本关于六四

镇压与中国、中华民族与文化文明乃至世界的书。

完善人权不仅仅是人的终极目的，人权本身还是富民强国的第一生产力。独裁专制特权文

明落后久矣。近代以来，中国的苦难与贫穷落后，大多是长城内的统治者及其独裁专制统治

利益至上所至。我们拒绝外来殖民统治，更应勿忘终结长城内的治民统治。我们不反对任何

人、任何党、任何势力，但要反对任何人、任何党、任何势力对其他任何人、任何党以及全

国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独裁专制统治，直到终结它，使家国、党国、核心国等统治不再继续

代表“一个中国”，不再继续危害中华民族与文化文明，乃至世界，而是改弦易辙，除旧创新，

创立民主中国。

压制党内民主者，是全党公敌；压制军队民主者，是全军公敌；压制地区民主者，是地区

公敌；压制民族民主者，是民族公敌；压制全国民主者，是全国公敌；压制人民民主者，是

人民公敌。他们也是世界公敌。望天下共击之！民运、法轮功、台湾民主化、港澳坚持真正

自治、西藏争取真正自治、大陆各地人民反抗当局苛政与暴政等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也继

续呼吁国内外支持，这是中国人、全球华人和国际间一切关爱中华文明者的共同事业。中国，

一个中国，应当是民主中国，人权中国。它属于全体人民，而非一个皇帝、一家、一姓、一

家族，而非一个核心、一党、一政治局、几个政治局常委。政党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国家

人民主权化，社会人权化，这些是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人民幸福、民富国强、世界和平的

根本保障。

六四迄今，千年灾难屡重复。国屡遭祸，民屡遭殃，祸国殃民的罪魁是独裁专制统治制度。

中国同胞们，六四以来我们一直在积蓄、等待，现在我们还等什么！

虽然自由可贵，民主可靠，人权天赋，但是自己的自由，自己争取；自己的民主，自己争

取；自己的人权，自己争取。自己的，自己争取。对人权而言，权利最大的是人民大众，最

有义务、责任最重的也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是自己，最值得等待的是自己，力量最大的也

是自己，导航成功的也是我们自己。

1989接力，生于六四的不是一人、一些人，不是一群人，也不是一代人，而是一国人，

所有“一个中国”下的中国人。我们都是创立民主中国、人权中国的中坚。六四等形形色色

的统治长城及其镇压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联手，继续共同向中国人大政协、中国政府与各

地各级各相关部门、六四镇压既得利益者当局、统治者等上书、进言、请愿、游行、静坐、

绝食、盘踞、进军。

让我们1989接力！让我们继续盘踞天安门广场！我们应该重走1989年中国民主

运动道路！让我们续接陈胜吴广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国民党革命、南昌起义、共产

党革命、1978年改革开放、民主墙、反对“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

89年民主运动、法轮功运动等之人权至尊革命精神，6月4日涌向天安门广场（也许每一

天都是6月4日），涌向各地民主阵地，继续进行全民和解和平非暴力人权大进军！直到摒除

独裁专制统治制度，改弦更张，创立民主中国、人权中国。

我们的纲领与目标是：

（1）否定六四镇压。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是正义爱国的，否定一切污蔑、诽谤与错

误认识。要求否定六四镇压的错误做法与错误结论，平反昭雪，恢复所有六四镇压冤屈者、

受害者等的名誉、自由与其他一切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公民权利，建立遇难者纪念碑。要求

六四镇压既得利益守护者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道歉、认罪、请罪、谢罪、赔偿，寻求将

功补过，主动下台，和平交接、过渡、演变、改弦更张。寻求人民谅解，避免暴力革命、分

裂与国家动荡。否则，必受受到人民依法审查、审判。

（2）政治民主化。释放任何政治犯，政党民主化，政治民主化。开放党禁、报禁，并且政党内部也必须民主化，禁止任何政党及其领导人独裁专制统治其成员，并进而以政党为工具独裁专制统治全国全军各地各民族人民。为避免社会动荡，可以从保障执政党正常分裂、分化，推动党内民主化开始。

（3）军队国家化。废除“党指挥枪，核心指挥枪党，新闻舆论是党的耳目喉舌，两杆子保江山”等专制制度，恢复党组织与军队、公检法、国家机关、舆论机构等国家机器的人民属性与正确法律地位，使他们都不再是改朝换代，维护帝制帝位及其帝王与核心权益的工具。人民军队不是党卫军、核心私家军，确立“人民指挥枪”，军队国家化、人民化、人权化，恪守“忠于宪法，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原则，保家卫国，不介入政党纷争。

（4）和平民主救中国，强中国。看不清历史，看不见未来；无有和解，也没有未来。也许，我们唯一不能与之谅解、和解、携手共进、共存共荣的只是任何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及其奉行、推行者。区别独裁专制制度、统治者当局与国家机器系统，以“和平演变，和平非暴力”实现党民和解，官民和解，军民和解，警民和解，党党和解，官官和解，军军和解，警警和解，民民和解，城乡和解，地区和解，民族和解，社会和解，全民和解，尊重人人平等的每个人的个人人权。以人权为中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人权是第一生产力确保民富国强。从源头遏制统治腐败与社会丑恶现象，彻底变革以皇权、党权、核心权等为首的党政官本位特权高于人民大众人权的制度，消除不平等、离心离德、一盘散沙、暴力恐怖、统治恐怖等社会灾难源。

（5）经济民有化、私有化，文化自由化。摒除意识形态迷信与禁锢，确保人民文化教育自由、信仰宗教自由、言论出版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财产自由，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享有个人人身、思想、精神与财产等安全。揭开统治者名为四项基本原则、三讲、三个代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制、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平均主义、共同富裕、集体人权高于个人人权、主权高于人权、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全盘西化、反对资产阶级

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一国两制、统一中国、中国特色与国情、国际多极化多样化、稳定

（既得利益，统治地位）最重要等所谓正统、正教、为人民服务的虚伪本质。他们打着这些

旗号，反对资本本位、金钱本位、民本位、个人本位、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利于人民大众、

国家与民族发展的私有化、私有制、民有制、代议制、自由投票选举制、任期制、质询制、

弹劾制等，推行的却是皇权本位、核心本位、党权本位、党政官本位、统治者至上本位等的

假爱国主义、假民族主义、真封建主义、真独裁专制主义、真帝制帝位帝王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

维护的却是绝对不平等的一党专有权、一人一党独裁专制、官有制、一把手所有制、

帝制帝位、核心所有制、少数*!

司 运接兄啤16.先苏 巍12. □ 日疲 酥梁谕渲啤14. 榴啤 5.ノ恢啤(18)中單 值持秩酥啤(6)

老 啤(1) ブ啤11.齧 咎襍频取*

（6）国家主权在民法治化。反对治民，确立民治。厉行主权在民法治，铲除任何能够便

于一人制、一党制、核心制、家长制、一言堂制、终身制等帝制帝位，杜绝任何个人、任何

个党、任何个别势力集团对“一个中国”的“独有、独治、独享”，确保“民有、民治、民享”。

以帝制帝位帝王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7）社会平等人权化。人权至尊，振兴中华。修改“四项基本原则”宪法，推出人权至

尊新国歌，新政体新国体，以民主科学建国。废除便于任何人、任何党大搞家国、党国、核

心国，独裁专制统治人民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制度，建立以三权分离、多党政治、司

法独立、新闻自由、信仰宗教自由等为特征的主权在民的民主中国。

（8）“一个中国”民主化。反对内战，制止军事威胁台湾，确保香港与澳门高度自治。并

且变革中央集权制度，最终以“一国一制，民主制度”等联邦制或邦联制等形式创立“一个

中国，民主中国”。

（9）国际关系人权和平正常化。人权高于政权、政府权、政党权、执政权。以个人人权

至尊为标准，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以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的全面改革开放参与世界人权大潮，

和平共处，互惠往来，共同发展，维护国家民族与人民利益，复兴中华民族与人权文化文明。

致谢

“1989接力”联：广场生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